二十世纪中国人文学科学术研究史丛书

史学专辑

陈祖武 杨泓 主编

内陆欧亚古代史研究

余太山／主编

福建人民出版社

策划编辑：刘亚忠
责任编辑：史霄鸿
装帧设计：魏智海

20世纪是中国历史上变化剧烈、发展迅速的一个世纪。19世纪中期以来的近代化进程到20世纪开始加速，完成了由传统向现代的历史性转换。学术研究是一个时代社会文化的构成部分，同样经历、体现着这种历史的变化。20世纪中国人文学科涌现出了众多的学术名家和大批的学术经典，中国的学术研究也在这一世纪从学术观念到著述形式逐步建立起现代学术思想研究的体系。研究、总结20世纪人文学科学术发展的历史，不仅是对各个学科学术研究百年成就的审视，也是对中国学术研究现代化进程的一次集体回顾，意义深远。



ISBN 7-211-04648-1
K · 375　　定价：26.00元

内陆欧亚古代史研究

二十世纪中国人文学科学术研究史丛书

史学专辑

陈祖武 杨 泓/主编

内陆欧亚古代史研究

● 余太山/主编

福建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内陆欧亚古代史研究/余太山主编．—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6（2006.6重印）

（20世纪中国人文学科学术研究史丛书）

ISBN 7-211-04648-1

Ⅰ．内…　Ⅱ．余…　Ⅲ．①欧洲—古代史—研究②亚洲—古代史—研究　Ⅳ．①K502.07②K30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03106号

20世纪中国人文学科学术研究史丛书

内陆欧亚古代史研究

NEILU OUYA GUDAISHI YANJIU

余太山　主编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市东水路76号　邮编：350001）

福建省天一屏山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福州市铜盘路278号　邮编：350003）

开本890毫米×1240毫米　1/32　14.75印张　2插页　392千字

2005年6月第1版

2006年6月第2次印刷

印数：2001—4000

ISBN 7－211－04648－1

K·375　定价：26.00元

余太山，江苏无锡人，1945年7月生于上海。198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系，此后任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至今，1993年起任研究员。主治古代中亚史、中外关系史。主要著作有《嚈哒史研究》（齐鲁书社，1986年）、《塞种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两汉魏晋南北朝与西域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古族新考》（中华书局，2000年）、《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研究》（中华书局，2003年）、《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要注》（中华书局，2005年）。

20世纪中国人文学科学术研究史丛书

出 版 说 明

20世纪是中国历史上变化剧烈、发展迅速的一个世纪。19世纪中期以来的近代化进程到20世纪开始加速，完成了由传统向现代的历史性转换。学术研究是一个时代社会文化的构成部分，同样经历、体现着这种历史的变化。20世纪中国人文学科涌现出了众多的学术名家和大批的学术经典，中国的学术研究也在这一世纪从学术观念到著述形式逐步建立起现代学术思想研究的体系。研究、总结20世纪人文学科学术发展的历史，不仅是对各个学科学术研究百年成就的审视，也是对中国学术研究现代化进程的一次集体回顾，其意义便显得格外重大。

1998年初，我社与中华书局原总编辑傅璇琮先生、清华大学教授刘石先生共同筹划编纂一套反映20世纪人文学科发展历史的丛书，并定名为《20世纪中国人文学科学术研究史丛书》。之后，我们约请到傅璇琮、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陈祖武、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楼宇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杨泓四位先生担任丛书主编，并由他们规划框架，制订体例，拟定选目，延聘全国各地专家学者承担编写工作。

在诸位学者和出版社的共同努力下，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和福建省新闻出版局的大力支持下，这部涵盖文学、史学、哲学三大系列近30册的丛书终得面世。从酝酿到成书的六年间，人类已经跨越了一个世纪，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跨世纪工程”。中国传统学术包容广博，蕴涵深厚，讲究“一致百虑，殊途同归”。20世纪的中国人文学科，亦充分体现了这一历史特质。唯其如此，这套丛书的选题



不可能面面俱到。我们的学术定位是，不仅限于对各学科百年学术研究面貌的勾勒和研究成果的综述，同时也力求结合社会历史文化的发展变化，从学术思想的起伏演变探索20世纪学术研究的发展脉络、得失成败。通过历史反思来探寻规律，获取经验，为新世纪人文学科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至于各书的布局和风格，亦不强求体例的划一，旨在充分发挥作者的创造性思维，驰骋其表现才能，以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我们高兴地看到，就在这部丛书面世前不久，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意见》强调指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必须进一步提高对哲学社会科学重要性的认识，大力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意见》并指出，要扶持对弘扬民族精神、传承民族文化有重大作用的研究项目，要在国民教育中加大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比重，不断提高全民族的哲学社会科学素质。

体会《意见》的精神，我们更加感到这部丛书的出版正逢其时。我们希望也相信这部丛书能够为《意见》中所指出的立足当代又继承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立足本国又充分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努力建设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体系、积极推动学术观点创新、学科体系创新和科研方法创新等做出自己的贡献。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4年10月

绪 说

本书所谓“内陆欧亚”是一个地理名称：大致东起黑龙江、松花江流域，西抵多瑙河、伏尔加河流域，具体而言除中欧和东欧外，主要包括我国东三省、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以及蒙古高原、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和西北印度。其核心地带即所谓欧亚草原（Eurasian Steppes）。

内陆欧亚幅员辽阔、资源丰富，自古以来繁衍生息着无数的民族，创造了千姿百态的文化。这是一个种族、语言、文字、宗教、生产、生活方式千差万别的地区。

主要由于游牧民族、特别是所谓骑马游牧民族迁徙、征服、贸易等活动，古代内陆欧亚形形色色的民族及其文化、经济、政治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联系。

同样主要由于游牧民族的活动，欧亚草原文化与周邻诸文化（汉文化、希腊一罗马文化、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形成了积极的互动关系，并深深地影响了世界文明的进程。

内陆欧亚古代史研究的对象正是活跃于古代欧亚草原及其周邻地区（特别是我国新疆、甘肃、宁夏、青海、西藏和小亚、伊朗、阿拉伯、印度、日本、朝鲜乃至西欧、北非等地）诸民族本身的历史文化及其与世界其他地区各民族交涉史。

我国20世纪的古代内陆欧亚史研究是按照传统的概念分地区（如中亚、北亚和东北亚等）进行的，而各部分研究的发展历程大致



相同。

首先，这些研究大致始于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外国学者对这些地区的考古调查和发掘起了催化作用。

这些调查和发掘不仅发现了新材料，更重要的是传入了新的观念和方法。观念方面，最主要的是中国中心观的打破和夷夏之辨的摒弃。至于新方法，不妨借用陈寅恪的话：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简言之便是比较和联系。

新观念、新方法和新材料相辅相成，尤其是新观念和新方法，拉开了我国的古代内陆欧亚史研究的序幕。

方法是由观念决定的，而新材料的发现和运用在很大程度上也受观念的影响。面对新材料，如果观念和方法还是陈旧的，或者不能与时俱进，则难免穿新鞋走老路，新材料的功能就未必能够充分发挥。而一旦观念更新，从原有的材料也能得到新的认识，即所谓化腐朽为神奇。在这个意义上，材料无所谓新旧，关键在于如何利用。

由于国事多艰，我国的内陆欧亚史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末之前未能获得应有的发展，且一度完全停滞，以致落后于欧美、日本，但在最后20年内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似乎可以这么说，20世纪我国的古代内陆欧亚史研究主要成就是收集和整理材料。这些收集和整理工作基本上是按照传统的区划进行的，但这类局部研究每前进一步，都加深了内陆欧亚本来是一个整体的认识，这种逐步加深的认识反过来又极大地推动着局部研究的继续深入。

目前，这种对材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已经进展到可以使古代内陆欧亚史研究向前迈出决定性的一步，也就是过渡到对材料做系统地研究，以全面揭示各个局部之间存在的联系的新阶段。于是，局部研究也就具有了全局的意义。严格意义上的古代内陆欧亚史研究已经开始了。

今后的研究，除了原有的局部研究（以往重视不够的中欧、东欧等无疑会得到加强）不断向纵深发展之外，主要的趋势必定是研究范围超越传统领域，研究者自觉地将自己研究的局部放到内陆欧亚这一普遍联系的宽广背景中进行考察，在重新审视以往全部研究成果的同时，着手探讨带有全局性的问题，尤其是理论性的问题。

不言而喻，本书章节的划分是20世纪内陆欧亚史研究的实际决定的。应该承认这样划分是不得已的，但每一章仍有其独自存在的价值。而各章间不可避免的交叉和关联，本身就昭示了内陆欧亚古代史研究的系统性。

编者确信，经过脚踏实地、坚持不懈的努力，当我们总结21世纪内陆欧亚古代史研究时，必将会采用全新的安排。

本书的核心部分是前六章，第七至九章是必要的补充，第十至十二章因人而设，最后一章的意义不言自明。

本书各章分工如下：

第一章　陈　戈

第二章　巫新华

第三章　魏存成、陈全家、陈国庆、朱永刚、郑君雷、冯恩学

第四章　荣新江

第五章　刘迎胜、韩中义、马娟、特木勒、杨晓春[①]

第六章　王　颋

第七章　许序雅

第八章　聂静洁

第九章　华　涛

① 本章作者署名刘迎胜以下不分先后。文中资料的搜集、整理与写作由青年学者与博士研究生韩中义（负责唐以前）、马娟（负责宋辽金元）、特木勒（负责明代）、杨晓春（负责清代）分别完成。刘迎胜在上述成果的基础上加以汇集修改。



第十章　张　云
第十一章　徐文堪、许全胜
第十二章　林悟殊
第十三章　陈健文、隋皓昀

余太山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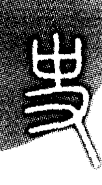
第一章　中亚考古综述

中亚，是一个跨国的地理概念，它主要包括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土库曼斯坦共和国、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南部，我国的新疆、西藏、青海和甘肃及内蒙古的西部亦含其中。

考古学研究是以田野调查和发掘为基础、以出土遗迹和遗物为基本研究资料的，但在整个20世纪中，我国学者未曾走出国门，到境外其他中亚地区进行考古工作，显然是一个空白。尽管我们也或多或少地了解境外中亚地区的某些考古工作和研究情况，但那都是得自于国外专家学者的著述或介绍，并非我们国人的研究成果。另外，由于本书的编辑体例和篇幅的要求与限制，我国境内西藏、青海、甘肃和内蒙古的考古研究情况亦需割舍。因此，本章虽然名为“中亚考古”，但实际上仅仅是我国境内的新疆地区考古，这是首先需要交代清楚的。

第一节　新疆考古简史

比较巧合的是，20世纪的开始也恰是新疆考古工作的发轫。虽然早在1898年俄国人克列门茨就到吐鲁番地区进行了考古调查和发掘，但是真正大规模且有重大惊人发现的田野考古工作却是从1900年瑞典人斯文赫定对罗布淖尔楼兰古城的调查发掘开始的。20世纪的新疆考古工作可划分为两大时期，每个时期各占半个世纪，其分



界线是最有纪念意义的一年，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 1949 年。

一、第一时期（1900～1949 年）

这一时期又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为 20 世纪的最初 20 年，后一阶段为其后的三四十年代。

前一阶段的考古工作均由外国人主持进行，主要是：1900～1901 年瑞典人斯文赫定对罗布淖尔楼兰古城的调查发掘；1900～1901 年、1906～1908 年、1913～1916 年英国人斯坦因前后三次对塔里木盆地南缘的丹丹乌里克遗址、约特干遗址、拉瓦克寺院、安德悦古城、尼雅遗址、米兰古堡和佛寺、罗布淖尔的楼兰古城及其附近遗址和墓葬、吐鲁番地区的高昌古城、交河古城、阿斯塔那墓地、柏孜克里克石窟、天山北麓的北庭古城等的调查发掘；1902～1903 年、1904～1905 年、1905～1907 年、1913～1914 年德国人格伦威德尔和勒柯克前后四次对塔里木盆地北缘的图木舒克寺院、克孜尔石窟、库木吐喇石窟、七克星寺院、吐鲁番地区的高昌古城、柏孜克里克石窟、胜金口寺庙等的调查发掘；1902～1904 年、1908～1909 年、1910～1914 年日本人大谷光瑞、渡边哲信、崛贤雄、桔瑞超、野村荣三郎、吉川小一郎等前后三次对塔里木盆地周缘的约特干遗址、尼雅遗址、米兰古堡、克孜尔石窟、库木吐喇石窟、七克星寺院、罗布淖尔的楼兰古城、吐鲁番的高昌古城、交河古城、柏孜克里克石窟、吐峪沟石窟、阿斯塔那墓地、天山北麓的北庭古城等的调查发掘；1906～1908 年法国人伯希和对塔里木盆地北缘和西缘的图木舒克寺院、阿库尔寺院、苏巴什寺院、三仙洞石窟、康奥依遗址等的调查发掘；1909～1910 年俄国人奥登堡对天山北麓的乌拉泊古城、吐鲁番地区的高昌古城、交河古城、柏孜克里克石窟、吐峪沟石窟、胜金口寺庙、塔里木盆地北缘的七克星寺院、克孜尔石窟、库木吐喇石窟、森木塞姆石窟、苏巴什寺院等的调查发掘。这些考古工作，除斯文赫定和斯坦因在罗布淖尔和巴楚采集的一些石器被认为是石器时代遗物外，其余均为历史时期遗存。

后一阶段的考古工作均由中外合作进行，主要是：1928～1934年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中的瑞典人贝格曼对哈密的庙尔沟遗址、吐鲁番的胜金口遗址、乌鲁木齐的柴窝堡遗址、罗布淖尔一带的遗址和墓葬、若羌的米兰城堡和墓葬及瓦石峡遗址、且末的考那沙尔遗址和墓葬及江戛沙依遗址、库鲁克塔格山的兴地遗址及墓葬、焉耆的七克星寺院和博格达沁古城等的调查发掘；考察团中的中国人陈宗器对楼兰古城及其附近遗址的调查；黄文弼对罗布淖尔北岸遗址和墓葬、吐鲁番地区的高昌古城和阿斯塔那墓葬、交河古城及其沟北沟西沟南墓葬、胜金口寺院、柏孜克里克石窟、塔里木盆地周缘许多遗存如焉耆的七克星寺院、四十里城子古城、哈拉木登古城、库尔勒的玉子干古城、羊达克沁古城、狭尔乱旦古城、轮台的黑太沁古城、柯尤克沁古城、着果特古城、库车的库木吐喇石窟、森木塞姆石窟、苏巴什寺院、皮朗古城、沙雅的大望库木古城、通古斯巴什古城、羊达克沁古城、拜城的可可沙古矿址、刘平国石刻、克孜尔石窟、阿克苏的喀拉马克沁古城、巴楚的托呼沙赖遗址、和阗的麻札塔格遗址、喀拉墩遗址、阿克斯比尔遗址、什斯比尔遗址等的调查发掘；袁复礼对天山北麓的北庭古城和其他遗存的调查；1931年中法西北科学考察团中的法国人德日进和中国人杨钟健对哈密的七角井和三道岑遗址、阿克苏县城附近遗址的调查。这些考古工作，既有历史时期遗存，也有史前时期遗存，而且后者较前一阶段大有增加。

这一时期的考古工作，虽然仅仅是开始，但其规模宏大，成绩可观。所有暴露于地面之上的古代遗迹几乎全被发现，其中比较重要的遗存被反复多次调查或清理发掘，出土文物种类繁多，数量巨大，精品震世，新疆地区顿时成了古代文化宝库和世界瞩目的焦点，从而掀起了世界范围内研究西域和丝绸之路的第一次浪潮。斯文赫定的《1899～1902年中亚考察科学成果》、斯坦因的《古代和阗》和《西域》及《亚洲腹地》、格伦威德尔的《中国土耳其斯坦古代佛教遗迹》和《古代库车》、勒柯克的《高昌》和《中国土耳其斯坦地下



宝藏》及《中亚古代晚期佛教遗迹》、伯希和的《吐木休克》和《都勒都尔一阿库尔和苏巴什》、大谷光瑞的《西域考古图谱》、上原芳太郎编辑的《新西域记》、奥登堡的《1909～1910年俄国土耳其斯坦考察》、贝格曼的《新疆考古研究》、黄文弼的《高昌陶集》和《高昌砖集》及《罗布淖尔考古记》与《吐鲁番考古记》和《塔里木盆地考古记》、德日进和杨钟健的《蒙古、新疆和西部中国发现的一些新石器（或旧石器）》等考古调查发掘报告比较详细地纪录和介绍了各类遗迹和众多遗物，为学术界提供了可资研究的宝贵实物资料，世界各国的专家学者根据这些资料进行了诸多方面的探索研究，成绩斐然，古代新疆的神秘面纱被逐渐揭开了。

二、第二时期（1950～2000年）

这一时期亦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为前20年，后一阶段为后30年。

前一阶段的考古工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完全由中国人自己独立进行的，主要是：1953年西北文化局新疆省文物调查工作组对全疆各地的调查；1957～1958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黄文弼对全疆各地的调查和发掘；1959年新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对全疆各地的调查；1961年中国佛教协会与敦煌文物研究所组成的新疆石窟调查组闫文儒对全疆各地的石窟佛寺调查；新疆文管会和博物馆及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民族研究所考古组组织当地的文物考古工作人员对全疆各地的普查和发掘等。这些考古工作绝大部分都是对第一时期已经发现的诸多遗存进行重新复查或再次发掘，但同时也有一些新的发现和扩展，这主要是将调查发掘地点扩大到了第一时期尚未涉足到的天山以北的伊犁和阿勒泰地区，在这里发现了阿里马里、吐鲁番圩子、磨河、海努克、夏台等古城和许多有封堆标志的墓葬，并发掘了夏台和波马墓葬及克尔木齐墓葬，另外，在哈密、吐鲁番、伊犁、库车等地还发现了含有细石器和彩陶的遗址或墓葬。

后一阶段的考古工作依然由中国人自己进行，但从20世纪80

年代后期开始，有些外国人如日本人、法国人等又被吸引了进来，开始了新一轮的中外合作。这些工作有一部分仍旧是对过去已经发现的遗址或墓葬进行再次调查和清理发掘，且多属历史时期，但是绝大部分都是新的发现，且多属史前时期的遗址或墓葬，例如东疆区的交河古城沟西台地石器遗址、孔雀河古墓沟墓葬、南湾墓葬、五堡墓葬、焉不拉克墓葬、雅林办墓葬、寒气沟墓葬、黑沟梁墓葬、艾斯克霞尔墓葬、阿拉沟墓葬、苏贝希遗址和墓葬、艾丁湖墓葬、喀格恰克墓葬、洋海墓葬、三个桥墓葬、营盘墓葬、北疆区的额尔齐斯河畔石器遗址、七城子细石器遗址、塔克尔巴斯陶细石器遗址、伊尔卡巴克细石器遗址、克拉玛依市细石器遗址、柴窝堡细石器遗址及其附近墓葬、塔城卫校遗址和墓葬、托里萨孜村墓葬、乌拉泊水库墓葬、四道沟遗址、水磨河遗址、五马场遗址、阜北农场基建队遗址、大龙口墓葬、石河子市和南山墓葬、安集海墓葬、特克斯一牧场墓葬、黑山头墓葬、铁木里克墓葬、巩乃斯种羊场墓葬、七十一团一连渔塘遗址和墓葬、哈拉图拜墓葬、索墩布拉克墓葬、博乐古城、昌吉古城、北庭回鹘佛寺遗址、南疆区的吉日尕勒遗址、玉龙喀什河和克里雅河及尼雅河畔石器遗址、阿尔金山细石器遗址、乌帕尔细石器遗址、阿克塔拉遗址、新塔拉遗址、察吾乎沟口墓葬、哈布其罕墓葬、拜勒其尔墓葬、群巴克墓葬、克孜尔水库墓葬、包孜东墓葬、扎滚鲁克墓葬、加瓦艾日克墓葬、圆沙古城及其周围墓葬、香宝宝墓葬、山普拉墓葬、库兰萨日墓葬、苏里唐·苏吐克·布格拉汗玛扎调查发掘等等。

建国后新疆地区的考古工作，其地域范围覆盖了全新疆的各个地区，时代范围包括了史前时期和历史时期，不仅对暴露于地面之上的遗迹进行调查和发掘，而且对大量埋藏于地下的遗迹和墓葬进行清理发掘，获得的考古资料是丰富的、全面的、科学的。随着这些资料的逐渐披露和政治环境的宽松开放，新疆地区又一次成为中外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从而形成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研究西域和丝绸之路的第二次热潮。就考古学研究本身而言，这一时期是中国



学者将考古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贯彻实施于新疆地区的重要时段，特别是从80年代开始，提出了许多新的概念和观点，基本上架设起了新疆考古学的总体框架和序列。这一时期出版的考古报告主要有：黄文弼的《新疆考古发掘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的《北庭高昌回鹘佛寺遗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和克孜尔千佛洞文物保管所编著的《新疆克孜尔石窟考古报告》、中日共同尼雅遗迹学术考察队编著的《中日共同尼雅遗迹学术调查报告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中国代表处和新疆文物事业管理局及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的《交河故城——1993、1994年度考古发掘报告》、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的《新疆察吾乎》、解耀华主编的《交河故城保护与研究》、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的《交河沟西——1994至1996年度考古发掘报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和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的《中国新疆山普拉》等，另外还有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辑的《新疆考古三十年》、《新疆文物考古新收获（1979～1989)》、《新疆文物考古新收获（1990～1996)》，收录了历年来发表的考古调查和发掘简报。但是，这些考古报告和简报，与大量的田野考古发掘相比，显然不成比例，特别是一些比较重要的发掘资料，尚未全面整理公布，是为憾事。

第二节　新疆考古研究概况述评

20世纪的100年中，新疆考古研究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发展进步，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和收获，考古学的总体框架和年代序列初步形成。兹按史前时期和历史时期两大部分予以概述并略加评说。

一、史前时期

与我国中原地区不同，新疆地区在汉代以前没有什么准确可靠

的文献记载，更没有像夏、商、周和春秋、战国那样的朝代更替，因此，新疆地区在汉代以前都应属史前时期。新疆地区史前时期或文化的概念在20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就已提出，[①] 但那时由于考古资料太少，难以进行深入研究，且都将其划归石器时代或铜石并用时代。从那以后，这种概念不再显现。直到90年代，由于大量考古资料的积累，新疆史前时期或文化的概念再度提出，[②] 并开始按考古学的时代框架和体例进行归纳研究。根据目前的研究认识，新疆史前时期的考古学研究共包括旧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铜石并用时代、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

（一）旧石器时代

新疆地区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发现较少，见于报道的仅有五个地点，即帕米尔高原塔什库尔干县的吉日尕勒、[③] 塔里木盆地南缘的和阗市南玉珑哈什河右岸、洛浦县东南干河床边、民丰县南尼雅河干河床岸边、[④] 吐鲁番市的交河古城沟西四号台地。[⑤] 前四处地点都是在可能属于晚更新世的第三阶地或洪积扇地面上采集到少量打制

---

① 贝格曼著、王安洪译：《新疆考古记》第一部《新疆史前考古发现》，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39页。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第二篇第一章《石器遗址》，北平：国立北京大学出版部，1948年，第91～96页。裴文中：《中国史前时期之研究》第三章中的“新疆之史前考古”，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年，第186～199页。

② 陈戈：《新疆史前文化研究评述》，《中国文物报》1994年1月16日、1月23日，第三版。陈戈：《新疆史前文化》，《西北民族研究》1994年第2期，第102～111页；1995年第1期，第39～51页。

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北京自然博物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区测大队联合考察队：《塔什库尔干县吉日尕勒旧石器时代遗址调查》，《新疆文物》1985年第1期，第2～3页。

④ 黄慰文、欧阳志山、瑞迪克、梅莎莉、雷加强：《新疆塔里木盆地南缘新发现的石器》，《人类学学报》1988年第7卷第4期，第294～301页。

⑤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中国代表处、新疆文物事业管理局、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交河故城——1993、1994年度考古发掘报告》第一章《四号台地旧石器地点》，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1～14页。



石器和碎石片，吉日尕勒地点还在原生堆积中发现有人工用火遗迹。这些石器都用锤击法制成，有砍砸器、石锤、石核和石片等，被认为具有旧石器的特征，从而当作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存。后一处地点即交河古城沟西四号台地是在主体为晚更新世沉积物的地层表面采集有大量石制品，同时还有一件手镐和一件石片采自剖面上第一层的底部。这些石制品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以石叶——端刮器为代表，共计 580 件，用自由锤击法打成，种类有石片和石叶、碎石片、碎石块、柱状和锥状及圆盘状和无定形状石核、端刃和边刃及圆盘状刮削器、凹缺器、锯齿状器、尖状器、雕刻器、手镐等；第二类以细石核为代表，共计 32 件，用间接打击法制成，种类有锥状细石核、柱状细石核、半锥状细石核、楔状细石核、无定形状细石核等。第一类被认为是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存，第二类是否与第一类同时，目前还未能下结论。上述这几处地点虽然都与旧石器时代晚期相联系，但其石制品基本上都是地面采集，缺乏地层根据，又无其他相关资料如动物骨头和测定年代所佐证，仅凭石制品的制法和形状类型作判断标准似嫌证据不足。因此，它们能否真正确定为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还需要今后继续进行工作，特别重要的是要取得考古发掘的地层资料。

（二）中石器时代

新疆地区的中石器时代文化发现和研究都很不够，虽然在一些论著中多有提及，但真正可以确认者几乎没有。目前只能这样认为：仅有几处细石器遗存如哈密市的七角井和三道岭、[①] 鄯善县的迪坎尔[②]

---

① P. Teilhard de Chardin and C. C. Young. "On Some Neolithic(and Possibly Palaeolithic) Finds in Mongolia, Sinkiang and West China". *Bulletin of the Geological Society of China*. Vol. XII, No. 1, Peiping, 1932, pp. 92～94. 安志敏：《中国西部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报》1987 年第 2 期，第 133～151 页。

②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普查办公室、吐鲁番地区文物普查队：《吐鲁番地区文物普查资料》，《新疆文物》1988 年第 3 期，第 1～84 页。

和英都尔库什[1]、木垒县的塔克尔巴斯陶和七城子[2]等较有可能属于中石器时代。它们均有较多的细石器和石片石器，其中细石器主要是各种形状的石核和石叶，石片石器主要是各种刮削器、尖状器、切割器、敲砸器、斧形器等，另外还有少量的石核石器如砍砸器和斧以及大型打制石器如斧等。这些遗址中未见有磨制石器和陶器，按一般概念，似有可能属于中石器时代，特别是像七角井遗址，多次调查采集均未见陶片，而其中的船底形石核又是我国早期细石器的代表物，更具有中石器时代的特征。但是，这些遗址均系地面调查采集，没有任何地层根据，也无科学测定的年代数据，而细石器在许多地方都继续存在和使用于新石器时代乃至更晚的金属器时代。陶器的有无也并不是区别中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唯一标准，在有陶新石器时代之前，还存在有无陶新石器时代阶段。因此，这几处遗址只能说是较有可能属于中石器时代，并不排除它们也有可能属于新石器时代甚至更晚。确切的结论，还有待于今后继续进行工作和研究，特别重要的是要有科学的发掘资料和测定的年代数据。

（三）新石器时代

新疆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曾被认为是很多的，遍布全疆各地。在 20 世纪 60 年代以前，曾被划分为三大文化，即细石器文化——以细小石器为主的遗存、彩陶文化——含有彩陶的遗存、砾石文化——以大型天然砾石打制成石器的遗存。[3] 60 年代至 80 年代，这三大文化又被改称为三大文化类型，即第一类以出土大量细石器为特征，第二类以比较大型的磨制石器为主要特

---

① 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第二篇第一章《石器遗址》，北平：国立北京大学出版部，1948 年，第 91～96 页。

② 王博、覃大海、迟文杰：《新疆准噶尔盆地东部两处细石器遗存》，《考古与文物》1993 年第 5 期，第 1～7 页。

③ 王永焱：《西北史前文化遗址概况》，《文物参考资料》1951 年第 2 卷第 10 期，第 155～166 页。吴震：《新疆石器时代文化的初步探讨》，《光明日报》1962 年 3 月 28 日。



征，第三类以出土彩陶器为重要特征。① 80年代以后，由于许多比较重要的墓葬进行了较大规模和较为科学的考古发掘，获得了相当丰富和全面的实物资料，同时又测定了一系列碳-14年代数据，从而对新疆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认识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提出了完全崭新的观点和意见，即过去曾经认为属于所谓新石器时代的三大文化或三大文化类型的许多遗存实际上并不是新石器时代文化，而是属于青铜时代或早期铁器时代。② 可以这样认为，直到20世纪结束时为止，新疆地区经过科学发掘的、真正像样的、准确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尚未发现，而已经发现的一些含有细石器的文化遗存暂时只能认为有可能属于新石器时代或仅仅可以作为探索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一种线索而已。

新疆地区已经发现的含有细石器的文化遗存约有数十处，③ 它们的主要特征是都有各种形状的细石核和有加工或使用痕迹的细石叶，同时还有加工成各种刮削器、尖状器、切割器、砍砸器等的石片石器。除了这些普遍存在的打制细石器和石片石器外，有些遗址还见有磨制石器和陶器或彩陶，如吐鲁番市的阿斯塔那和乌鲁木齐市的柴窝堡及尉犁县的辛格尔等遗址；有些遗址还见有铜器或铁器，如罗布淖尔周围和木垒县的伊尔卡巴克和疏附县的乌帕尔等遗址；有些遗址则未见磨制石器和陶器，如哈密市的七角井和木垒县的七城子及额尔齐斯河畔等遗址。由于所有含有细石器的遗址均未进行

①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建国以来新疆考古的主要收获》，《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年，第169～183页。

② 陈戈：《关于新疆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新认识》，《考古》1987年第4期，第343～351页。陈戈：《关于新疆地区的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文化》，《考古》1990年第4期，第366～374页。

③ 伊第利斯·阿布都热苏勒：《新疆地区细石器遗存》，《新疆文物》1993年第4期，第15～59页。邢开鼎：《新疆细石器初探》，《新疆文物》1993年第4期，第60～71页。

过科学的考古发掘，其资料都系地面采集，有较大的随意性并缺乏地层根据，所以这些细石器究竟是与其他打制石器、磨制石器、陶器、铜器和铁器同时共存，还是单独存在，很难判断，而根据其他地区已经科学发掘的许多遗址和墓葬来看，细石器既可以与打制石器单独存在，也可以与磨制石器和陶器同时存在，还可以与铜器甚至铁器共同存在，也就是说它既可能属于中石器时代，也可能属于新石器时代，同时还可能属于青铜时代乃至早期铁器时代。因此，在未进行正式的考古发掘并取得比较翔实的地层和年代资料之前，还不宜将含有细石器的遗存完全划归为新石器时代文化。

严格说来，新疆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基本上还是一个空白，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新疆地区根本就没有新石器时代文化。根据新疆地区已经发现有较多的青铜时代或早期铁器时代文化，它们理应有当地更早的来源，而与新疆相邻的周围地区诸如甘肃、青海、西藏和印度、中亚各国等都已有新石器时代文化，它们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与新疆地区有相若之处，因此，新疆地区也应该有新石器时代文化，只不过直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或未能完全确认而已。今后如能继续深入调查，特别是以某些细石器遗存为线索，有目的有计划地开展田野考古发掘工作，大约在公元前 2000 年以前真正像样的、准确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将会显现出来。

（四）铜石并用时代

铜石并用时代是新石器时代与青铜时代之间的一个过渡时代，一般也认为它相当于新石器时代的末期或结束时期。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由于新疆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被认为是很多的，所以铜石并用时代文化也被认为不少。80 年代以后由于对新疆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认识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原来认为的许多所谓新石器时代文化实际上并不属新石器时代，而是属于青铜时代或早期铁器时代，因此，过去曾经认为的一些所谓铜石并用时代文化自然也就不可能还属于铜石并用时代，而也应该属于青铜时代或早期铁器时代了。这样，到 20 世纪结束时为止，新疆地区的铜石并用时代文化也是一个



空白。其实，由于铜石并用时代是介于新石器时代与青铜时代之间的一个过渡阶段，所以，一般来讲，只有当某个地区的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的文化研究得比较充分和深入时，才有可能比较有把握地研究和确定铜石并用时代文化。可是在新疆地区，如上所述，真正像样的、准确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尚未发现，而青铜时代文化也刚刚开始认识和研究，还远远谈不上充分和深入（见下节）。在这种情况下，要研究和确定铜石并用时代文化显然是很困难的。因此，根据新疆的具体情况，铜石并用时代文化的发现和确认恐怕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五）青铜时代

新疆地区的青铜时代文化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提出来的新概念，[①] 在此之前，一直是一个空白领域。这主要是因为长期以来将一些含有铜器的遗址或墓葬都误认为是新石器时代或铜石并用时代文化，从而掩盖、模糊和影响了对青铜时代文化的认识和研究。由于它刚刚被提上研究的议事日程，发现的遗存也不很多，目前还基本上处于对单个遗址或墓葬的认知或定性阶段，尚未能用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确定出具体的考古学文化来。虽然有的学者对新疆的青铜时代文化进行了区域类型划分和分期研究，[②] 但都误将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的文化遗存混为一谈。[③] 根据迄今为止已经发现的资料来看，基本上有可能属于青铜时代的文化遗存主要有下列

---

① 陈戈：《关于新疆远古文化的几个问题》，《新疆文物》1985年第1期，第27～38页。陈戈：《关于新疆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新认识》，《考古》1987年第4期，第343～351页。陈戈：《关于新疆地区的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文化》，《考古》1990年第4期，第366～374页。

② 水涛：《新疆青铜时代诸文化的比较研究》，《国学研究》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47～489页。安志敏：《塔里木盆地及其周围的青铜文化遗存》，《考古》1996年第12期，第70～77页。

③ 陈戈：《关于如何认识和界定新疆青铜时代文化的讨论》，《中国文物报》1997年6月1日，第三版。

几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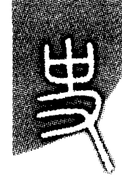
1. 孔雀河古墓沟墓地。

该墓地位于干涸了的罗布泊西约70公里处的孔雀河北岸第二台地上，其墓葬形制有两种，一种是竖穴沙室，在竖穴两端各埋一根木柱作为标志，沙室内有弧形木板做成的木棺；另一种是埋七圈环形木桩，其外又有许多木桩呈放射状向四周展开，环形木桩中间即为墓室，墓室内亦有木棺，但已朽坏。每墓一般葬一人，个别的葬二或三人，仰身直肢，头东足西。随葬品比较贫乏，主要是毛皮或毛织衣物和草篓、木盆、木碗、木杯、角杯等日用品以及玉、骨、石、铜等装饰品，另外还有木雕和石雕人像、桂叶形石镞、小麦和粟等，未见陶器。铜器仅为三件很小的装饰品，但从许多木桩和木棺上的加工痕迹判断，当为金属工具所为。根据碳-14年代数据，其绝对年代约为公元前1800年左右。[①]

2. 新塔拉遗址。

该遗址位于和硕县城东南原胜利公社红星二队村旁，系一椭圆形沙丘台地，其上层似为一小城堡，城墙用土坯砌垒，但破坏严重，形制不明；下层发现有灶坑和土炕，亦用土坯砌成，灶与炕之间有甬道相通。出土和采集的遗物有陶器、石器和铜器。陶器多为夹砂红褐陶，也有夹砂黑褐陶和灰陶，均手制，多素面，但也有一部分饰有刻划纹、篦纹、锥刺纹、附加堆纹、按捺纹、凸弦纹等；彩陶较多，大部分为黄白色陶衣上绘紫色或红色彩绘，亦有红色或灰色陶衣上绘黑色或紫色彩绘者，花纹主要有倒三角、内填平行斜线的正三角、折线纹、网格纹、锯齿纹、水波纹等；器形主要是双耳罐、筒形杯、瓮、缸、釜、杯、钵、碗等。石器多为磨制，亦有琢制和打制者，器类有磨盘、磨棒、杵、镰、斧、球、砺石、锥、臼、砍砸器、刮削器等。铜器有斧、镞、锥、刀等。另外，还发现有朽粟

① 王炳华：《孔雀河古墓沟发掘及其初步研究》，《新疆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第117～127页。



残骸。根据碳-14年代数据，其绝对年代约为公元前1500年左右。①

3. 南湾墓地。

该墓地位于巴里坤县奎苏乡政府东北约7.5公里处，其墓葬形制主要是竖穴土坑，个别的用砾石砌筑墓室，多数墓葬在头向一方的填土中栽植一根短立木。墓室内多有用原木搭叠而成的木框架或木槨式葬具，主要是单人葬，亦有二至六人合葬，既有一次葬，也有二次葬，一次葬者多为侧身屈肢，头向东南。随葬品有陶器、铜器、石器、骨角器、木器和毛织物残片等。陶器基本是夹砂红褐陶，均手制，多素面，少数饰有压印纹、指甲纹和刻划纹；有一定数量的彩陶，主要是红衣黑彩，也有少量的红彩和白彩，花纹主要是在口沿内外绘一圈小倒三角，其下接绘竖条纹或内填网格纹的大倒三角，三角之间又填以曲线纹、树枝纹、小圆点纹等，有的则是在腹部画几条粗短竖线或十字纹；器形主要是腹耳壶、单耳钵、单耳罐、单耳杯、双耳或四耳罐、无耳罐或杯、鋬耳盘或杯等。铜器有刀、锥、凿、镞、钺、镜、牌、铃、扣、管、珠、耳环等。石器有锤斧、锥等。根据碳-14年代数据，其绝对年代约为公元前1100年左右。②

4. 雅林办墓地。

该墓地位于哈密市区内雅满苏矿和林场办事处院内一带，其墓葬形制有两种，即竖穴土坑和竖穴土坯墓室，葬式主要是单人侧身屈肢葬，随葬品有陶器、铜器、石器、骨器、金银器等。陶器主要是夹砂红陶，均手制，多素面，少数饰有压印纹，戳刺纹、附加堆

---

① 新疆考古所：《新疆和硕新塔拉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8年第5期，第399～407页。张平、王博：《和硕县新塔拉和曲惠遗址调查》，《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2期，第16～19页。

② 资料尚未全面整理公布，简要介绍见：常喜恩：《巴里坤南湾墓地66号墓清理简报》，《新疆文物》1985年第1期，第4页。贺新：《新疆巴里坤县南湾M95号墓》，《考古与文物》1987年第5期，第7～8页。吕恩国、常喜恩、王炳华：《新疆青铜时代考古文化浅论》，《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72～193页。

纹、刻划纹；有较多的彩陶，红衣黑彩或红彩，花纹有三角纹、竖条纹、菱格纹、折线纹、水波纹、网格纹、树枝纹、手形纹、人物纹等；器形主要是双耳罐、另外还有单耳罐、四耳罐、双系耳罐、双耳注壶、单耳杯、双耳盆、无耳盆和杯等。铜器有刀、锥、镰、锛、凿、矛、镜、耳环、手镯、泡、扣、管、珠等。石器有杵、敲砸器、细石镞等。[①] 这个墓地中出土的陶器特别是彩陶双耳罐和素陶双耳罐及素陶四耳罐与甘肃河西走廊的青铜时代四坝文化完全一样，其年代应与之相若，但是测定的几个碳-14 年代数据却大都在公元前 800 年以后，明显偏晚，尚难合理解释。

除上述几处遗存外，还有吐鲁番哈拉和卓遗址、塔城卫校遗址、石河子水泥厂和良种场墓葬等也可能属于青铜时代文化，由于其资料比较单薄，且受篇幅所限，故略而不谈。

这些遗存均有铜器而未见铁器，有些铜器经过检测，既有红铜，也有青铜和钟铜，既有锻打，也有铸造，它们的年代基本上都在公元前 2000—前 1000 年间，而在这一年代范围内，新疆周围的其他地区都已处于青铜时代，所以将它们划归为青铜时代文化似乎是合适的。不过，由于资料还比较贫乏，特别是有些比较重要的发掘资料尚未进行全面的整理研究，它们有无可能还会晚到早期铁器时代，或者最终能有充分把握地将其确认为青铜时代文化，还需继续努力。但是，无论如何，新疆青铜时代文化研究的空白局面应该是结束了。

（六）早期铁器时代

新疆地区的早期铁器时代文化与青铜时代文化一样，同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才提出来的新概念，在此之前，毫无论及。该时代是指从使用人工铁器开始到有明确文献记载的公元前后的汉代为止，

---

① 资料尚未全面整理公布，简要介绍见：常喜恩：《哈密市雅满苏矿、林场办事处古代墓葬》，《中国考古学年鉴》（1989），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年，第 274～275 页。吕恩国、常喜恩、王炳华：《新疆青铜时代考古文化浅论》，《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 年，第 172～193 页。



它包括了过去曾被误认为是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许多遗存和一般都认为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多遗存。已经发现的资料表明，新疆地区的早期铁器时代文化遗存是很多的，遍布全疆各地。由于资料相对较多和丰富一些，故其研究程度也较青铜时代为快，已经走出了仅对单个遗存的认知和定性阶段，开始用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综合性的分析和探讨。到20世纪结束时为止，新疆早期铁器时代文化已被提出和划归了四种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即察吾乎沟口文化、焉不拉克文化、苏贝希文化和伊犁河流域文化，有的已开始进行更深一步的类型划分和分期研究。

1. 察吾乎沟口文化。

这种文化是因和静县察吾乎沟口墓地而得名。① 它分布于新疆中部，范围较大，北起天山南麓，南达塔克拉玛干沙漠东南缘的且末县，东自和静县，西至温宿县。已发现十多处遗存，主要的有和静县的察吾乎沟口墓地和哈布其罕墓地及拜勒其尔墓地、轮台县的群巴克墓地、拜城县的克孜尔水库墓地、且末县的扎滚鲁克墓地和加瓦艾日克墓地等。其主要特征是：墓葬表面有石围、石堆或土堆标志，其下有一或几个墓室；墓室结构为竖穴石室或竖穴土坑，个别的为竖穴土坯，口部多棚盖石板、木头或杂草，有的墓室一侧有短浅墓道，有的在主墓室周围附埋小孩墓和马、牛、骆驼坑，有的墓室有焚烧现象；流行多人二次合葬，骨架较完整者多为仰身或侧身屈肢，头向西或西北或无定；随葬品有陶、铜、木、骨、石、角、铁、金、银器和毛织物及毛皮衣物，其中陶器最多，基本为夹砂红陶或灰陶，均手制，多素面，器形主要是各种带流器，另外还有单耳罐、双耳罐、单耳杯、盆、钵、壶、釜等；有一定数量的彩陶，一般是在红色或黄白色陶衣上绘红色或黑色花纹，花纹母题有棋盘

---

① 陈戈：《新疆察吾乎沟口文化略论》，《考古与文物》1993年第5期，第42～50页。陈戈：《再论察吾乎沟口文化》，《吐鲁番学研究》2001年第2期，第18～27页。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察吾乎》，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年。

格纹、网格纹、菱形纹、云雷纹、三角纹、折线纹、竖条纹、线点纹、井点纹、锯齿纹等。根据许多碳-14年代数据和其他有关资料分析，这种文化的绝对年代约为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前后。

察吾乎沟口文化本身还可划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型,[①] 即察吾乎沟口类型、群巴克类型和扎滚鲁克类型。这三种类型在时间上基本是平行的，也看不出有什么先后发展演变关系，所以它们应是察吾乎沟口文化中的不同的地域类型。

2. 焉不拉克文化。

这种文化是因哈密市焉不拉克墓地而得名。[②] 它分布于新疆东部，范围较小，仅集中于哈密地区。已发现近十处遗存，主要的有焉不拉克墓地、五堡水库墓地、寒气沟墓地、艾斯克霞尔墓地等。其主要特征是：墓葬表面一般无标志，但也有石堆标志者；墓室结构为竖穴土坑和竖穴土坯墓，少数为竖穴石室，有的墓口棚盖木头和芦苇或片石；单人葬和多人葬并行，骨架较完整者多为屈肢葬；随葬品有陶、铜、铁、石、骨、木器和毛织品及毛皮衣物，其中陶器为夹砂红陶或灰黑陶，均手制，多素面，器形主要是单耳钵、单耳豆、腹耳壶、单耳杯、单耳罐、双耳罐等；有一定数量的彩陶，基本是红衣黑彩，花纹有曲线纹、锯齿纹、水波纹、S纹、网格纹、十字双钩纹、倒三角纹和由倒三角向下延长的竖线纹等。根据碳-14年代数据和其他有关资料判断，这种文化的绝对年代约为公元前1200年至前500年。

3. 苏贝希文化。

这种文化是因鄯善县的苏贝希墓地和遗址较有代表性而得名。[③]

---

① 陈戈：《察吾乎沟口文化的类型划分和分期问题》，《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5期，第30～39页。

② 陈戈：《略论焉不拉克文化》，《西域研究》1991年第1期，第81～96页。陈戈：《焉不拉克文化补说》，《新疆文物》1999年第1期，第48～52页。

③ 陈戈：《新疆史前时期又一种考古学文化——苏贝希文化试析》，《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53～171页。



它分布于新疆中北部天山山脉东段博格达山的南北两侧山前地带和山谷间，北起阜康、奇台县，南到吐鲁番艾丁湖，东自鄯善、木垒县，西至石河子市。已发现遗存较多，共计约50多处，主要的有鄯善县的苏贝希墓地和遗址及洋海墓葬和三个桥墓葬、吐鲁番市的艾丁湖墓葬和交河古城沟北及沟西墓葬、乌鲁木齐市的阿拉沟墓葬和柴窝堡墓葬及乌拉泊墓葬、木垒县的四道沟遗址、吉木萨尔县的大龙口墓葬、石河子市的南山墓葬等等。其主要特征是：房址为半地穴式，房内有灶和炕，房外有灰坑；墓葬表面一般都有石堆或石围标志，墓室基本为竖穴土坑和竖穴偏室，个别的为竖穴石室或石棺，口部多棚架盖木和芦苇杂草；单人葬或几人葬，姿势不一，头向无定；出土遗物有陶、铜、铁、石、木、骨、金器和毛、丝织品及毛皮衣物，其中陶器基本都是夹砂红陶，手制，素面，器形主要是单耳罐、单耳圜底杯、单耳桶状杯、单耳或无耳壶、双耳瓮或釜、双耳或单耳或无耳的钵或盆、双鋬或单鋬或无鋬的盆或碗等；有一定数量的彩陶，一般都是红衣黑彩，个别的是红衣红彩或土黄彩或者是黄白色陶衣上绘黑彩或红彩，花纹有各种三角纹、变形三角纹、涡纹、网格纹、竖条纹、水波纹、锯齿纹、树枝纹、弧线纹、短线纹等。根据许多碳-14年代数据和其他资料分析，这种文化的绝对年代约为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前后，其上限也可能还会再早一些。

4. 伊犁河流域文化。

这种文化是因为大多数遗存分布于伊犁河流域而得名。① 它的分布范围，除了新疆西部的伊犁河流域和帕米尔高原外，还包括新疆境外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几国内的伊犁河流域和中部天山及帕米尔地区，是一种跨国的考古学文化。新疆境内的遗存已发现十多处，主要的有昭苏县的夏台和波马墓葬、新源

① 陈戈：《新疆伊犁河流域文化初论》，《欧亚学刊》第二辑，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35页。

县的铁木里克和巩乃斯种羊场墓葬及七十一团一连渔塘遗址、尼勒克县的哈拉图拜墓葬、特克斯县的一牧场墓葬、察布查尔县的索墩布拉克墓葬、乌苏县的安集海墓葬、塔什库尔干县的香宝宝墓葬等。其主要特征是：房址为半地穴式，内有灶坑，周围有灰坑；墓葬表面有土墩或石堆、石围标志，有的土墩非常高大，多呈南北向链状分布，封堆之下有一或几个墓室；墓室结构主要是竖穴土坑和竖穴偏洞室，也有竖穴石室，口部多棚架盖木，有的墓室中有木椁葬具；流行单人或二人葬，骨架较完整者多为仰身或侧身直肢，头东足西；出土遗物比较贫乏，有陶、铜、铁、石、木、骨、金器等，其中陶器均夹砂红陶或红褐陶，手制或轮制，基本素面，器形主要是釜、壶、钵、碗、罐、杯等，无耳器占绝对优势；有少量彩陶、红色或橙黄色陶衣上绘黑色或红色花纹，纹饰较简单，主要有三角纹、棋格纹、折线纹、网格纹、杉针纹、山脉纹、横条纹等。根据许多碳-14年代数据和有关资料分析，这种文化的绝对年代约为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后。

上述几种文化都普遍使用铁器，其种类有刀、锥、钉、镰、斧、铧、剑、镞、簪、镯、戒指、带钩、带扣、牌、泡、马衔、马镳等，虽然绝大部分因为锈蚀严重，未能进行科学鉴定，但个别的铁器经过检测，已属人工炼铁；它们的年代基本上都在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前后，而在这一年代范围内，新疆境外的许多地方都已进入早期铁器时代，因此，将它们划归为早期铁器时代应是合适的。但是，也有不同意见，有人将这些文化中的许多遗存仍然归属于青铜时代，[①]

① 水涛：《新疆青铜时代诸文化比较研究》，《国学研究》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47～489页。安志敏：《塔里木盆地及其周围的青铜文化遗存》，《考古》1996年，第70～77页。吕恩国、常喜恩、王炳华：《新疆青铜时代考古文化浅论》，《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72～193页。



对此也展开了一些讨论。① 由于新疆地区早期铁器时代的概念刚刚提出，而我国考古学界长期以来都是以中原地区为中心，很少或没有早期铁器时代这一概念，而是以春秋战国时代取而代之，再加上近些年来新疆地区发现的一些铁器年代较早，往往早出传统认为的中原春秋中晚期三四百年，因此对新疆早期铁器时代的概念产生怀疑或进行讨论是很自然的。不过，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新疆地区与中原地区相距较远，这里根本没有什么春秋战国时期的王朝更替，若按其地理位置、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以及文化特征等都基本属于中亚范畴之内，而在中亚和世界其他各地都早已存在早期铁器时代文化的概念且已研究得相当深入。因此，在新疆地区承认和确立早期铁器时代文化的概念及其内容既是新疆客观实际情况的具体反映，也是与世界考古学研究接轨的必然趋势。另外，在早期铁器时代文化的划分和研究中，铁器的存在是最关键的因素，必须以客观真实的考古资料为基础，实事求是，即不能因为其时间较早而轻易隐瞒或否定，也不能随意提早或扩大。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考古资料的不断增加积累，特别是中国考古学研究的不断开放和国际化，对新疆早期铁器时代文化的研究和认识必将逐渐统一并取得更大的成绩。

上述早期铁器时代的察吾乎沟口文化、焉不拉克文化、苏贝希文化和伊犁河流域文化也是刚刚提出来的最新认识和概念，它基本上改变了整个 20 世纪中新疆史前时期考古研究只见一处处遗址或墓葬但却没有文化共同体亦即考古学文化的零散混沌局面，从而使新疆史前时期的考古研究迈入了新的阶段，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 21 世纪新疆史前时期考古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

① 陈戈：《关于如何认识和界定新疆早期铁器时代文化的讨论》，《中国文物报》1997 年 6 月 8 日，第三版。水涛：《对新疆早期文化定性问题的基本认识》，《中国文物报》1998 年 6 月 17 日第三版。陈戈：《关于新疆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文化的再讨论》，《中国文物报》1998 年 10 月 21 日第三版。

二、历史时期

从汉代开始，新疆地区有了正式明确的文献记载，从此进入了历史时期。新疆地区历史时期的文化遗存是很多的，主要是聚落遗址、城址、墓葬、寺庙和石窟寺等，分布于全疆各地，其时代从汉代直至元代各有差别。这些遗存绝大部分都进行过多次的考古调查，但经过考古发掘的却为数不多，而在这些考古发掘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外国人在20世纪初年进行的，国人进行的发掘为数更少，而且主要集中在墓葬方面。由于篇幅所限，不可能对许多遗存一一俱到，只能择其研究较多较好或较为重要者予以介绍。又由于多数遗存延续时间较长，跨越好几个朝代，如按朝代顺序叙述，必然会前后重复，故兹以各个不同的考古遗存为序予以简介，同时指出其具体年代。

1. 楼兰古城及其附近墓葬。

楼兰古城位于罗布淖尔西北岸边，略呈正方形，城墙夯土版筑，东墙长333.5米，南墙长329米，西墙和北墙各长327米。南墙和北墙中段各有一缺口，似为城门，西墙中段似有一瓮城门。城内有一条从西北角流向东南角的水道，宽16.8米，深4.5米，将城区分割为东北区和西南区两大部分。东北区的主要建筑是一座九层佛塔，残高约10.4米，用夯土和土块夹杂红柳树枝筑成；佛塔附近有一些房屋建筑，多已残毁。西南区的主要建筑是一座三间房址，东西长12.5米，南北宽8.5米，用土坯砌成，可能是官署遗迹；三间房周围和附近，分布有较多的房屋和院落，其墙体或用土坯砌垒，或用红柳树枝夹芦苇捆绑在木框架上外涂草泥而成。城外东北郊有一座残高约6.28米的小佛塔，残存有佛教壁画和佛像残块；西北郊有一座残高约10.2米的烽燧，北郊有建筑遗迹，其构筑方法与城内相同。在古城内外出土和采集的遗物有石器、陶器、木器、铜器、铁器、铅器、玻璃器、骨器、贝蚌器、丝织品和五铢铜钱等，而尤其重要和有价值的是数百件汉文和佉卢文木简及纸文书，其内容涉及



政治、军事、农田水利、商业贸易、户口名籍、交通、法律、往来信件等等方面，其明确纪年最早的是曹魏嘉平四年即公元252年，最晚的为前凉建兴十八年即公元330年。① 根据这些文字资料及其他有关文献记载，该古城为魏晋时期的西域长史所在地，已为学术界所公认。古城内一座大宅院的门槛朽木经碳-14年代测定为距今1865±80年，相当于东汉时期，但它究竟是不是西汉时期楼兰国的都城遗址却是争论了整整一个世纪仍未解决的国际热点问题。② 而这一问题的最终解决，只有靠对楼兰古城进行更深一步的考古发掘方有可能。

在楼兰古城东北约5～7公里处发现两片墓地，墓葬表面无封土标志，墓室结构有两种，一种是长方形竖穴土坑，另一种为带斜坡墓道的方形竖穴土坑，有的口部棚架盖木，底部有苇床。或单人葬，或数人合葬，基本为仰身直肢，头向不一。随葬品有陶器、木器、铜器、铁器、漆器、骨器、铜钱、皮革制品和毛、丝棉织物等，其中以织有各种汉字吉祥语如“延年益寿大宜子孙”、“长乐明光”、“望四海富贵寿为国庆”、“登高富贵”、“永昌”、“续世”等色彩艳丽的织锦最为精湛，个别的织锦上还有佉卢文题记，意为“频婆·室利诃陀之锦，一百钱”。两个碳-14年代数据分别为距今2040±90和1880±85年，再佐以“长宜子孙”和“家常富贵”铭文铜镜残块及五铢铜钱的形制特点等，其时代约为西汉晚期至东汉前期。③

---

① 新疆楼兰考古队：《楼兰古城址调查与试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7期，第1～22页。侯灿：《楼兰新发现木简纸文书考释》，《文物》1988年第7期，第40～55页。林梅村：《楼兰尾雅出土文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27～86页。林梅村：《沙海古卷》，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

② 黄盛璋：《楼兰始都争论症结解难与LA城为西汉楼兰城新论证》，《吐鲁番学研究》2001年第1期，第61～75页；第2期，第72～89页。

③ 新疆楼兰考古队：《楼兰城郊古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7期，第23～39页。

2. 尼雅遗址。

该遗址位于民丰县城北约100公里的尼雅河间尾地带，是一处大范围的群落遗存，在南北长约30公里、东西宽约5公里的区域内分布有民居院落、官署、佛塔寺庙、田地渠道、畜舍园林、手工业作坊、道路、城址、墓葬等愈百处遗址，呈大分散小聚集状态。一座佛塔位于整个遗址的中心部位，残高约5.85米，下方上圆，用土坯和泥砌成。佛寺平面呈方形“回”字状，长5.3米，宽5.2米，中间是方形土台，四周是回廊，其墙体是在地栿上竖立的木柱之间捆扎芦苇和红柳树枝再涂草泥的木骨泥墙，上刷白粉绘壁画，西回廊墙中置双扇转轴门，门轴宽0.98米。民居院落和官署的房屋建筑一般都是多间组合，墙体亦是木骨泥墙，但也有用土坯砌垒者，官署建筑较一般民居要宏伟高大；房屋内有灶坑和土炕，房屋周围有篱笆栅栏院墙和畜舍及果园，果园内有葡萄和杏树、沙枣等。院落之间有道路相通，道路两旁设有篱笆栅栏或种植树木。作坊遗迹有炼炉和烧窑，其中炼炉平面呈方形，边长1.4～1.6米，炉壁用土坯和黏土砌成，厚度0.3米，炉内烧成红色并堆积有碳层和金属小块；烧窑平面呈长圆形，长5.7～6米，宽2～2.2米，亦用土坯和黏土砌成，前有烧火口，后有烟道，窑内有残陶片。在建筑群体之间及其附近，分布有水渠、池塘和农田。在整个遗址的南部有一座城址，略呈椭圆形，周长约530米，城墙用白色淤泥垛积而成；南墙中部有一城门，系在地栿上立柱架木构成，似为过樑式单门道双开门。墓葬以集聚而葬的墓地形式分布于不同的居住区附近，墓葬表面立有木桩标志，墓室基本为竖穴沙室，葬具有四腿箱式木棺和船形树棺，单人葬或数人合葬，仰身直肢，头向不一。整个遗址和墓葬中出土和采集的遗物很多，计有木器、陶器、铜器、铁器、骨器、漆器、玻璃器、铜钱、皮革制品、毛丝棉织物、壁画、农作物等等，而特别重要和有价值的是千余件佉卢文和汉文木简、木牍、皮革和纸质文书，其内容非常广泛，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法律等



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另外还有织以汉字吉祥语如“万世如意”、“延年益寿大宜子孙”、“世毋极锦宜二亲传子孙”、“王侯合昏千秋万岁宜子孙”、“长乐大明光”、“安乐如意长寿无极”、“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等各种艳丽多彩的织锦。① 根据出土文书资料和其他遗物以及十多个碳-14 年代数据，尼雅遗址的时代应为汉晋时期，且有从北向南逐渐晚后的趋势。一般认为，该遗址是汉代的精绝国故地和鄯善国的凯度多州，但是否为精绝国的都城却还不能论定。虽然在遗址南部发现一座古城，但仅发掘了城门，未见任何遗物可与精绝国都城相关。这一问题的解决仍有待于以后的考古调查和发掘。

3. 营盘墓地。

该墓地位于尉犁县城东南约 150 公里处的孔雀河干河床北岸附近，东距楼兰古城约 200 公里。墓葬表面有木桩标志，墓室结构有两种，一种是竖穴土坑，有的有二层台，台上棚盖胡杨木棍和芦苇草席、麦草、骆驼刺等，葬具有槽形或船形树棺和四足箱式木棺；另一种是竖穴偏室墓，偏室口用木柱、木板、柳条栅栏和芦苇草等封堵，内无葬具。流行单人葬，个别的为二或三人合葬，主要是仰身直肢，少数是俯身葬和屈肢葬，头向东或东北或东南。尸体多用丝、毛、棉布和毡、毯包裹。随葬品主要是各种毛、丝、棉织衣物和木器，另外还有陶器、铜器、铁器、漆器、石器、骨器、玻璃器、金银器、皮革制品、粮食作物和面食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15 号墓，系一四足箱式木棺，棺壁和棺盖上彩绘圆圈、卷草、花卉、树叶纹样，棺外覆盖彩色狮纹栽绒毯。棺内仰卧一男性青年，头枕对禽对兽兽面纹绮上锁绣蔓草纹样的鸡鸣枕，面罩用硬物和墨线刻划

---

① 中日共同尼雅遗迹学术考察队：《中日共同尼雅遗迹学术考察报告书》第一卷和第二卷，1996 年和 1999 年。林梅村：《楼兰尼雅出土文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年，第 86～89 页。林梅村：《沙海古卷》，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年。

勾勒出五官形象的白色麻质面具，身穿红地对人对兽对树纹罽袍和淡黄色绢内袍及锁绣联珠花卉纹样的绛紫色毛绣长裤，足穿淡黄色绢面贴金毡袜，腰系绢带，上掛绢质香囊和鱼帛，左臂肘部系扎刺绣护膊，胸前和左手腕处各置一件绢质冥衣。装殓豪华，实属罕见，尤其是对人对兽对树纹罽袍上的人物形象是裸体、卷发、高鼻、大眼，肌内隆突发达，明显是西方风格。根据墓葬中出土的陶器、铜镜、五铢钱和丝织品的特征纹样判断，该墓地的年代当为汉晋时期。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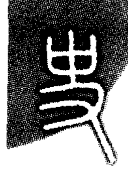
4. 扎滚鲁克墓地。

该墓地位于且末县托格拉克勒克乡扎滚鲁克村西约 2 公里的戈壁地带，其墓葬有一部分属于史前时期早期铁器时代的察吾乎沟口文化中的扎滚鲁克类型，另一部分则属于历史时期。这部分墓葬的形制结构有两种，一种是竖穴土坑，有的口部棚架盖木和芦苇杂草，底部有残木棺葬具，有焚烧现象；另一种是竖穴偏洞室，或为竖穴一侧单洞室，或为竖穴两侧双洞室。由于盗扰严重，葬式和人数不清。随葬品主要是日用木器如盘、碗、罐、杯、匕、耜等，另外还有陶器、铜勺、铁针、玻璃杯、谷物、食品和丝、毛、棉织物及一件汉文纸文书。纸文书仅残存数字，内容不明，丝织物中有织以汉字吉祥语“延年益寿大宜子孙”的织锦和鸟纹刺绣。根据陶器形制和丝织品的纹样特征，这些墓葬的年代大致为汉晋时期，也可能会晚到北朝之时。②

---

①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尉犁县因半古墓调查》，《文物》1994 年第 10 期，第 19～30 页。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尉犁县营盘墓地 15 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99 年第 1 期，第 4～16 页。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尉犁营盘墓地 1995 年发掘报告》，《新疆文物》2001 年第 1～2 期合刊，第 3～46 页。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尉犁县营盘墓地 1999 年的发掘》，《新疆文物》2001 年 3～4 期合刊，第 23～46 页。

② 新疆博物馆、巴州文管所、且末县文管所：《新疆且末扎滚鲁克一号墓地》，《新疆文物》1998 年第 4 期，第 1～53 页。



5. 山普拉墓地。

该墓地位于洛浦县西南约14公里的昆仑山山前戈壁台地上。墓葬形制有两种，一种是长方形竖穴土坑，有的有木棚架；另一种是有墓道的刀形竖穴土坑，墓道位于竖穴土坑的一角，墓室中部和四壁及墓道两壁立有木柱，其上棚架盖木和芦苇杂草，墓室四壁和墓道两壁又有细木棍和芦苇组成的护壁栅栏，有的墓室中部还有榫卯结构的“井”字形木框架，多有焚烧现象。葬具式样较多，计有木架尸床、桶形或半桶形树棺、平底或四足式箱形木棺、木盆、柳条编席或芦苇蒲草、毛毡或毛毯等。主要是单人葬，也有多人合葬，最多者一墓葬100多人甚至200多人，姿势主要是仰身直肢，也有俯身屈肢或直肢、侧身屈肢或直肢、仰身交肢等，头向不一。墓地中还有个别殉马坑，坑内埋一匹整马。随葬品主要是日用木器和陶器及毛织品，另外还有铜器、铁器、石器、漆器、玻璃器、骨角器、丝棉织物、皮革制品、粮食作物和水果食品等，特别是毛织物种类繁多，花纹多样，色彩鲜艳，其中一件“人首马身”和“武士头像”纹样显系西方风格。根据碳-14年代数据和“见日之光”、“宜家常贵”铭纹铜镜及织有汉字吉祥语“长孙”、“宜吉”织锦和绢书于阗文字等，该墓地的年代应为汉晋时期。由于有些墓葬有叠压打破关系，再结合墓葬形制、葬具、葬式和随葬木器、陶器的不同变化以及碳-14年代数据的早晚差别，综合分析，可以将这些墓葬划分为早晚两期，早期的主要特征是：竖穴土坑墓与带墓道的刀形竖穴土坑墓同时并存，以小孩单人葬和成人百多人合葬为主，葬具主要是木架尸床、桶形或半桶形树棺和毡草类，陶器均手制，以黑衣陶为主，红陶较少，木器多为手工制作，有一定的旋切技术，其年代大约为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晚期的主要特征是：均为竖穴土坑墓，带墓道的刀形墓消失，以成人单人葬和数人合葬为主，葬具主要是平底或四足式箱形木棺和半桶形树棺，陶器出现轮制，红陶较多，木器旋制技术明显提高，木瓶是典型代表，其年代大约为东汉早期至东晋

时期。[①]

6. 察吾乎沟口三号墓地。

该墓地位于和静县城西约30多公里的天山南麓山前地带，与前述史前时期察吾乎沟口文化中的察吾乎沟口一、二号墓地紧邻。墓葬表面有石堆和石围标志，其下有一至两个墓室，墓室形制结构主要是竖穴土坑和竖穴偏室，另外还有个别的竖穴石室和竖穴土坯墓室。竖穴土坑墓在口部棚盖木头，其上再覆芨芨草席；竖穴偏室墓有单侧室和双侧室之分，侧室口部用土坯或立木及草席或石头封堵；竖穴石室口部棚盖大石板，竖穴土坯室口部覆盖土坯。葬具有用木头榫卯构成的木框架和用木板组成的木棺以及用树干掏成的槽形树棺。每墓室葬一或二人，均仰身直肢，头东足西。随葬品有陶器、铜器、铁器、木器、骨器、石器、金银器、丝织物残块等，另外还有马头、马腿、羊头和羊椎骨，个别的还见完整马匹。墓葬中有人工变形头颅，值得注意。根据陶器形制和一枚规矩禽兽纹铜镜及碳-14年代数据，该墓地的时代应为东汉时期。[②]

7. 交河古城及其附近墓葬。

交河古城位于吐鲁番市西约10公里的雅尔乃孜沟两河交汇之间的一处狭长台地上，文献记载是汉代车师前国之都城，以后一直延续至元代，但现存遗迹多为麴氏高昌至唐、元时期。该古城建筑独特，以深沟断崖为险，故无高大城垣，仅在断崖边上挖筑高约1.4～

①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洛浦县山普拉古墓发掘报告》，《新疆文物》1989年第2期，第1～48页。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洛普县山普拉Ⅱ号墓地发掘简报》，《新疆文物》2000年第1～2合刊，第11～35页。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新疆山普拉》，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年。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队、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文管所：《新疆和静县察吾乎沟口三号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第10期，第882～889页。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和静县文化馆：《和静县察吾乎沟三号墓地发掘简报》，《新疆文物》1990年第1期，第1～19页。



1.6、厚约0.5～1.5米的低矮胸墙以防城内人畜跌入深渊或阻挡城外敌人远射之箭。所有建筑基本采用"减地留墙"法即从原生地面向下挖掘构成，墙体下部为生土，上部则系版筑夯土泥墙，有的是两层楼房式，有的则是窑洞式。整座城市布局清楚，设计有序，以一条北起北部的中心大佛塔、中经南部的大佛塔略向东拐然后再直通南城门的总长约750米、宽约8～11米和4～6米的南北向中央大道为界，将整个城区分割为四个部分即东城区、西城区、南城区和北城区。东城区的北半部是繁华的居民区，保存最好，房舍栉比，院落相连，街巷交错；南半部是官署区，建筑宏伟森严，有高大的围墙、地下庭院和窑洞及广场，但破坏较甚。西城区是一般居民区和手工业作坊区，建筑较小，比较简陋。南城区是大型住宅区，庭院宽阔，规模宏大，但破坏严重。北城区是寺庙比较集中的寺院区，全城最大的总面积约5192平方米的大佛寺和全城最高的高度约20米的中心大佛塔以及由101座小塔组成的宏伟壮观的方阵塔林均在此区，另外还有仅次于大佛寺的东北佛寺和西北小寺以及其他一些佛殿、佛堂或佛坛等佛教遗迹。与中央大道相平行，还有三条大道，一条是南起中央大道南段向西折拐处、中经东城区向北直达北城区东北佛寺前的东大街，另两条是分别环绕东、西崖岸的东环路和西环路。与上述四条南北向大道相垂直，又有四条东西向大道，其中主要的一条位于整个城市的中部，与中央大道相交成十字街口，向西经过西城区与西环路相接，向东经过东城区与东大街相交并向东北直达东城门；另外两条分别位于北城区大佛寺门前和院后，前者向西与西环路相连，向东与东大街相接，后者向东和向西分别与东环路和西环路相连。在这些纵横交错相连的主要大道之间，又有许多细小的巷道相互沟通。全城有三个主要城门，南城门位于南城区南端中部，瓮城结构，有两个门道；东城门位于东城区崖边中段，亦为瓮城结构，有前后两重门，每重门又各有主门道和侧门道；西门位于北城区北部的西崖边上，门道较窄，仅可行人。城内各处凿有许多水井，最深者可达20多米。在北城区塔林之北，有一条东西

向壕沟，或称“阴阳界”，其北是墓葬区，埋有不同形制的墓葬。城内出土和采集遗物有陶器、石器、木器、铜器、铁器、佛像和壁画残块、唐代钱币、汉文和回鹘文写本或佛书等等。① 交河古城是新疆地区保存最好的一座城址，最近几年来的考古工作取得了较大的进展，测绘了比较翔实的平面图，发掘了西北小寺和一座地下寺院以及东城门和两处民居，从而使我们对这座古城的整体布局和建筑特征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但是这仅仅是个良好的开端，要想真正从考古学的角度对其始建年代、不同时代的建筑遗存和特点、各类遗存的功能和性质、总体布局的时代变化和规律、废弃年代和原因等主要问题研究清楚，还需要继续不断地努力，特别是对一些关键性的重要遗存进行有计划地考古发掘，这是需要耐心和毅力的。

在古城内的墓葬区和古城外的沟北、沟西和沟南台地上分布有许多墓葬，其中有一小部分属于史前时期的苏贝希文化，其余大部分大致可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为汉晋时期，墓葬表面无封土或有封石土堆，有的墓口边缘有圆形土坯围墙，有的较大的主墓室周围分布有较小的墓室和马坑及骆驼坑。墓室形制有两种，一种是竖穴土坑，有的在口部或底部有二层台，口部棚架盖木；另一种是竖穴偏室墓，多为一侧单室，个别的是两侧双室，偏室口用土块或木棍封堵。葬具有木框架尸床、木板木棺、芦苇草席和木棍等，每墓葬一至三人，主要是仰身直肢，个别的为仰身屈肢或俯身直肢，头向不一，有火葬现象。随葬品有陶器、金器、铁器、铜器、骨器、木器、漆器、木俑、毛丝织物等。其中有些陶器的形制和五铢钱、星云纹铜镜以及碳-14 年代数据是其断代的主要依据。第二期为麴氏

① 黄文弼：《吐鲁番考古记》，北京：中国科学院印行，1954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中国代表处、新疆文物事业管理局、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交河古城——1993、1994 年度考古发掘报告》第三至第七章，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 年，第 75～199 页。谢耀华主编：《交河古城保护与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 年。



高昌时期，墓葬表面都有用小砾石围成的带有门道标识的方形或长方形茔院，茔院内聚埋数座至十多座墓葬，每座墓葬都有封堆，墓葬形制均为斜坡墓道洞室墓，洞室口多用土块封堵。每墓葬一至三人，仰身直肢，头向不定，多无葬具，但也有木棺和苇席。随葬品主要是陶器，另外还有铜器、铁器、金器和墓表等，陶器多用黑、红、白色彩绘出仰府莲瓣和圆点纹，最有特征，墓表为砖质或土质，其上墨书或朱书高昌国年号和死者的丧日、官职、年龄、姓名等，是研究高昌国历史的珍贵文字资料。第三期为唐代前期，数量较少，其茔院、墓葬形制、葬俗和随葬陶器及墓表等情况与上一期基本一样，所变化者仅是该期开始随葬泥俑、泥马和墓表中的年号均为唐代而已。①

8. 高昌古城及其附近墓葬。

高昌古城位于吐鲁番市东南约40公里的哈拉和卓与阿斯塔那村之间，文献记载始于汉代，曾是高昌王国和高昌回鹘的都城，但现存地面遗迹多为唐元时期。该古城有内外两重，外城略呈方形，周长约5公里，城墙夯筑，间有土坯砌垒，屈曲不直，残存最高度达11.5米，有很多马面，但具体数目不清，西城墙中部有一座保存较完好的瓮城门，其他门址不易确定；内城略呈长方形，保存较差，仅有南墙和西墙有断续残垣，周长约3.3公里，构筑方法与外城相同，但无马面，门址也不清。在外城的西南部有较大的寺院遗址，内有一座佛殿，殿中有塔柱，柱上有多层佛龛；寺院旁有许多房屋建筑和广场，可能是坊市。在外城的东南部亦有一处寺院遗迹，仅

① 黄文弼：《高昌陶集》，西北科学考察团理事会印行，1933年。黄文弼：《高昌砖集》，北京：中国科学院印行，195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中国代表处、新疆文物事业管理局、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交河古城——1993、1994年度考古发掘报告》第二章，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15～74页。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交河沟西——1994～1996年度考古发掘报告》，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年。

残存一个塔基和一个支提式窟，窟内有残壁画和汉文与回鹘文题记。在外城的北部有较多较大的建筑遗迹，但仅存残基，内容难辨。在内城中部偏北处有一不规则圆形小堡，堡墙周长 700 米，内有一座残高约 15 米的土坯塔，其旁有凹入地下的正方形建筑，有土台阶可通上下，俗称“可汗堡”。古城内出土和采集遗物很多，最重要最著名的是佛教和摩尼教及景教壁画、泥塑和木雕及石雕佛像残块、佛教和摩尼教及景教经典写本、汉文和回鹘文等不同文种的文书及碑刻等等。① 高昌古城是新疆境内最大的古城，过去外国人曾进行过发掘，但重在掠取文物，而国人仅有地面调查而无发掘，所以该古城的总体布局和各时代的建筑遗存及其特征均不清楚，究竟有没有宫城，位在何处，有几座城门，道路如何分布，官署区何在，居民区何在等等一些最基本的问题都还需要今后长期的考古发掘才能解决。

在古城外西北约 5 公里的阿斯塔那和哈拉和卓村北戈壁地带，分布有许多古代墓葬，它们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为晋至十六国时期，其墓葬形制有两种，即竖穴偏室墓和斜坡墓道洞室墓，偏室或洞室口用土坯或生土块封堵，多有木棺或木框架葬具，每墓葬一至三人，均仰身直肢，有的墓室后壁绘有表现地主庄园生活的壁画。随葬品主要是陶器、木器、各种织物和纸鞋上的纸文书，另外还有漆器、铁器、干果、面食、五铢铜钱等，其中陶器以素面灰陶为主，木器种类较多，但制作粗糙，织物以麻类较多，纸文书中有前凉、北凉、西凉等十六国时期的年号。第二期为麴氏高昌时期，其墓葬表面有用小砾石围成的茔院标志，每一茔院内有数座至数十座墓葬，其形制均为斜坡墓道洞室墓，洞口用土坯封堵，葬具多为苇席，木棺少见，单人葬或二、三人合葬，均为仰身直肢。随葬品

① 闫文儒：《吐鲁番的高昌古城》，《文物》1962 年 7、8 期合刊，第 28～31 页。侯灿：《高昌古城址》，《新疆文物》1989 年第 3 期，第 1～11 页。黄文弼：《吐鲁番考古记》，北京：中国科学院印行，1954 年。



主要有陶器、木器、各类织物、纸鞋和纸帽上的纸文书及墓表，同时还有铜镜、波斯银币、东罗马金币、人首蛇身伏羲女娲画像、泥俑、面食点心等，其中陶器以黑、红、白色彩绘仰俯莲瓣和圆点纹最有特征，木器比上一期减少，制作较好，织物中绢、锦等丝织品显著增加，纸文书和墓表中记有高昌王国年号，墓表内容较简单。第三期为唐西州时期，墓地茔院和墓葬形制及葬俗与上一期基本一样，但墓道内出现天井和甬道，墓室中出现耳室，有的有木棺或纸棺葬具，有的墓室后壁绘条幅式人物飞禽壁画。随葬品也与上一期相若，但木器多变为明器，丝织品的品种和数量及花纹图案大大增加，出现大量的彩塑泥俑和木俑及精美的绢画，除砖质墓表外，还有重大的青石墓志，内容长而丰富，纸文书和墓表及墓志中记有唐代年号。① 这些墓葬中最重要和最有价值的莫过于其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法律、交通、民族等社会各个方面的大量的文书资料和种类繁多、色彩绚丽、花纹精美的丝织品，它们是其他地区很难见到的。不过，遗憾的是，建国以来已经发掘的数百座墓葬的完整、系统、全面的发掘报告未能整理出版，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研究的深入和进展，是一个很大的教训。

9. 北庭古城及其附近的佛寺。

北庭古城位于吉木萨尔县城北约 12 公里的西上湖村，是唐代北庭都护府和高昌回鹘的陪都所在。该城分内外两重，均呈不规则长方形，外城周长 4596 米，内城周长 3003 米。内外城墙均夯筑，均有角楼、敌台和较密集的马面，但外城墙夯层较薄，夯窝明显，有

---

① 建国以来十多次的发掘简报见于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考古三十年》，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 年，第 70～124 页。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文物考古新收获》（1990～1996），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7 年，第 577～609 页。《新疆文物》2000 年第 3～4 期合刊（吐鲁番阿斯塔那和哈拉和卓墓葬专辑）。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吐鲁番出土文书》（全十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1991 年。

的墙段有土坯修补痕迹，而内城墙夯层较厚，不见夯窝，无修补现象。内外两城各有四座城门，分居各墙中部，北门保存较好，外城北门为瓮城结构，内城北门两侧壁残存竖立柱槽。内外两城墙外侧均有宽深的护城壕，外城北门外还有一座羊马城建构。在内城中部有一条横贯东西的大沟槽，分通东、西城门；在外城南部中心亦有一条大沟槽，南通外城南门，北至内城南门东侧，它们可能是城内的主要道路。在内城东部有一条南北向沟槽和一条东西向沟槽相连且都与城墙外的护城壕相通，同时又与城内的几个大深坑相连，它们可能与水系有关。古城内的其他地面和建筑破坏严重，具体情况不明。在城内采集的遗物有陶器、砖瓦、铜镜、佛像残块、残碑、蒲类州之印、开元通宝等。根据城墙的夯筑结构和修补情况、城内采集的遗物及有关的文献记载，该古城的外城可能始建于唐朝初年，内城建于高昌回鹘时期，废弃于元末明初。① 这座古城是新疆北部地区最重要的一座城址，虽然进行过比较详细的调查，但未进行考古发掘，所以除了耸立于地面之上的城墙形制比较清楚外，城内的建筑布局和时代特征均不知晓，而汉代的金满城与其有无关系亦是问题。

在古城西门外约 700 米处有一座佛教寺庙，其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 70.5 米，东西宽 43.8 米，残高 14.3 米。全部用土坯砌成，可分南北两大部分，南面部分是较低矮的庭院、配殿、僧房、库房等建筑，庭院居中，前有院门通月台，后有踏道通正殿，配殿和僧房及库房呈对称状分居庭院两侧；北面部分是高耸的正殿，其北、东、西三面外侧各有上下两层洞窟。正殿内有一尊大型塑像，胸部以上残缺，下部未发掘不清，配殿和洞窟中均有塑像和壁画。塑像种类有佛、菩萨、罗汉、天王、狮子等，其中以交脚菩萨最有特点。壁画内容有经变画、故事画、供养画、供养菩萨和比丘及护法像、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工作队：《新疆吉木萨尔北庭古城调查》，《考古》1982 年第 2 期，第 165～175 页。

千佛画、供养人像等，其中以一幅分舍利图及其下方的男女供养人像和另一幅可能是弥勒上生经变最为精美。在塑像和壁画之间有许多回鹘文和汉文题记，其中以回鹘文“象日月神一样的……持有国家的……阿斯兰毗加神圣亦都护之像”和“这是长史巴尔楚克·托呼邻之像”及“这是依婷盖赤公主之像”最为重要。出土遗物有陶器、玉石器、铜铁器、建筑木构件、木板画、塑像和壁画残块、“开元通宝”和“日光月金”铜钱等。根据建筑的规模和特点、塑像和壁画的题材及内容、题记和有关的文献记载及碳-14年代数据，这座佛寺应是公元10至13世纪时高昌回鹘的皇家寺院。① 由于只进行了部分发掘，最重要的正殿及其北、西两外侧的洞窟尚未发掘，故其完整的面貌和内涵还不完全清楚，其始建年代是在何时，它与文献中曾经提到的唐代僧人悟空寄藏佛经的龙兴寺和宋代使臣王延德游观的应运大宁寺有无关系等都还是些未解之谜。

10. 苏巴什佛教寺院。

该佛寺位于库车县城西北约23公里处的铜厂河两岸小山岗上，应是文献记载中龟兹地区有名的昭怙釐寺或雀梨大寺。寺院范围很大，河西区南北长约685米，东西宽约170米，河东区南北长约535米，东西宽约146米。河西区的北、中、南部各有一座用土坯砌成的佛塔，残高约11～13米；北端有佛洞遗迹，洞内墙壁上有刻划少数民族古文字和汉文僧人题名；南端有一座保存较好的方形寺院，院墙用土坯砌垒，周长约318米，四角有角楼，南墙中部有一瓮城门，院内中心是一座24米见方的大殿，其东侧是一座残高约12.3米的下方上圆并绕有围墙的大塔，另外还有两座较小的佛殿和僧房等建筑遗迹；在上述佛塔、洞窟和寺院之间及其周围还散布有一些建筑遗存，但都残毁严重。河东区的北、中、南部亦各有一座用土坯砌成的佛塔，残高近10米；在北部有一段残长约78米的南北向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庭高昌回鹘佛寺遗址》，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1991年。

土坯墙，墙内侧有房屋建筑；在南部残存有丁字形的土坯墙，其附近有佛洞及其他房屋建筑；在佛塔和土墙之间及其周围还散布有许多庙宇和房屋残迹。整个佛寺中出土和采集的遗物有陶器、铜器、铁器、玉石器、骨木器、玻璃残器、毛丝织物、塑像和壁画残块、汉文和民族古文字残纸及木板、各种铜钱、彩绘舍利盒等。[①] 另外，在寺院内还发现有墓葬，其中一座位于河西区的中部佛塔之下，已遭盗扰破坏，其墓室结构比较特殊，似用木框架围成墓室，其外再砌土坯，墓室内置四腿木棺床，棺床上放彩绘木棺，棺内葬一人，随葬品有彩绘莲瓣纹陶罐、木雕龙头、铁刀、绢袋各一件。[②] 根据陶器特征、五铢铜钱、龟兹铜钱、波斯银币和唐代铜钱等判断，苏巴什佛寺的年代大致为东汉至唐代，这与文献记载的昭怙釐大寺存在的年代是吻合的。这处佛寺是新疆地区最大的一处佛教寺院遗址，虽经多次调查，并进行过某些局部发掘，但因毁坏严重，整个寺院比较详细的总体布局并不清楚，不同时代的建筑位置及其特点亦难以确定，这些问题的解决都恐非易事。

11. 克孜尔石窟。

新疆地区的石窟寺较多，共有十多处，保存洞窟较多和较好者主要有克孜尔石窟、库木吐喇石窟和柏孜克里克石窟。这些石窟中，真正用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研究并取得初步成果的是克孜尔石窟。

克孜尔石窟位于拜城县东南约60公里的木扎提河北岸，已编号洞窟236个，估计总窟数可能在270～300个之间。根据洞窟形制、组合关系、壁画内容和风格，特别是洞窟本身的改建和相互打破关

① 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年，第28～30页。黄文弼：《新疆考古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年，第71～93页。

② 新疆博物馆、库车县文管所：《库车昭怙釐西大寺塔葬墓清理简报》，《新疆文物》1987年第1期，第10～12页。

系以及碳-14年代数据，可划分为三个阶段亦即早、中、晚三期。第一阶段即早期，约为公元4世纪，其洞窟类型主要是中心柱窟、大像窟和僧房窟，而以僧房窟数量较多，大像窟数量较少，各类型窟多单独存在，组合情况不甚显著；洞窟壁、顶连接处的结构线脚简洁，塑绘中作为主要礼拜对象的有释迦坐像、倚坐像、立像和弥勒交脚坐像，其次有坐或立的列像，壁画内容有天象图、以菱格山峦为背景的本生故事或因缘故事画、交脚菩萨说法图、涅槃像或荼毗焚棺图、舍利塔、伎乐飞天等。第二阶段即中期，约为公元5～6世纪前期，其洞窟类型与第一阶段情况相似，但方形窟发展很快，不同类型窟的成组情况流行起来；洞窟壁、顶接连处的结构线脚逐渐复杂，顶部形式多样，塑绘内容与第一阶段变化不大，但某些细部趋向图案化，出现了山峰为平顶和以塔为主要背景的新构图形式以及须摩提女请佛、降六师外道、鹿野苑初转法轮、八王分舍利等本生、因缘、佛传故事新题材。第三阶段即晚期，约为公元6世纪后期至8世纪，其洞窟类型略同第二阶段，但洞窟形制和塑绘内容都有简化的趋势，同时出现了前两个阶段未见的小型窟，而洞窟组合亦多为小型窟；主像立佛逐渐多于坐佛，壁画流行千佛题材，又出现了联珠纹饰。上述三个阶段反映了克孜尔石窟由兴盛到衰落的变化，在第一阶段之前，似乎还应有一个初期阶段。[①] 克孜尔石窟的考古学研究为整个新疆石窟寺的研究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但仅是个开端，进展也比较缓慢，仍需长期不懈的努力。

第三节 21世纪新疆考古学研究展望

从上一节20世纪新疆考古学研究概况可以看到，成绩是巨大

①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克孜尔千佛洞文物保管所：《新疆克孜尔石窟考古报告》第一卷，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年。

的，但也有很多缺陷和不足。这些成绩自然会是本世纪新疆考古学研究继续进步的良好基础，那些缺陷和不足则应是这个世纪新疆考古学研究必须吸取的经验教训并努力补充和克服。根据新疆的实际情况以及现阶段考古学研究的水平和视野，21 世纪的新疆考古学研究应该主要在下述几个方面有所作为。

1. 填补和充实史前时期的时代空白和遗址空白。

如前所述，新疆地区真正像样的准确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尚未发现，这是一个很大的时代空白，而这个空白可以说是新疆史前时期考古学研究的致命缺陷。新石器时代是史前时期最重要的一个时代，其内涵也是史前时期最重要的内容，它向上经过中石器时代与旧石器时代相接，向下经过铜石并用时代与青铜时代相连，缺了它，史前时期就被拦腰截断，考古学的编年体例也就无从建立，而这也正是整个 20 世纪新疆史前时期考古学研究基本上处于混沌状态的关键所在。因此，21 世纪新疆考古学研究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努力探索和发现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如何探索和发现，我们认为，一方面应对已经发现的一些细石器遗址进行重点考察和发掘，另一方面应在河流的最下游特别是已经干涸了的三角洲和天山北麓的山前地带去寻找。可以预料，一旦经过正式考古发掘、真正像样准确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被发现，新疆史前时期考古学研究面貌即会立即改观。另外，由于新疆旧石器时代文化和青铜时代文化发现得都还不多，有的尚似是而非，所以继续发现和充实这两个时代的考古文化同样应是 21 世纪新疆考古学研究的努力方向。需要指出的是，在探索旧石器时代文化时，应该多注意洞穴遗址。

主要发掘墓葬而很少或不发掘遗址，这是 20 世纪新疆史前时期考古学研究的又一个重大空白和缺陷。墓葬是人们死后的遗留，遗址则是人们生前的活动场所，它们都是研究古代人类社会生活面貌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遗址所包含的信息量诸如房屋建筑、仓库窖穴、村落布局、保卫设施乃至社会组织结构等等都远远大过墓葬资料。另外，遗址是反映和贯彻实践考古地



层学方法和原理的主要载体，许多决定年代早晚和分期变化的地层依据都来自于遗址发掘，而遗址发掘的水平高低也直接影响和决定着整个考古学研究的质量和水平。新疆史前时期的考古学研究之所以长期滞后，不进行遗址发掘应是一个主要原因。我国其他一些省区的史前考古学研究都已进入到了聚落形态研究阶段，可是新疆地区至今连个别的房屋居室是什么样子都不大清楚。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讲，21世纪的新疆考古学研究都应该填补遗址发掘的空白并要大力开展。当然，遗址发掘要比墓葬发掘困难许多，但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科学研究应该向困难挺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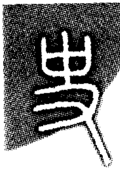
2. 继续并不断深化史前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划分和研究。

考古学文化的划分并对其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是史前时期考古学研究的中心内容，它既能从宏观上把握不同时期的人类集团的分布状况，同时也能从微观方面了解不同地域人类集团的生活特点及其发展变化。新疆地区史前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划分和研究起步很晚，直到20世纪结束时才刚刚提出了四种考古学文化即察吾乎沟口文化、焉不拉克文化、苏贝希文化和伊犁河流域文化，而且还都仅限于早期铁器时代，对它们的深入研究远远不够，因此，21世纪将应是新疆史前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划分和研究取得重大进展的重要时期。首先，要继续划分和确认不同时代的考古学文化，例如青铜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有些已经发现的可能属于青铜时代的资料似乎显示出了可以划分考古学文化的趋势，只是尚未进行全面整理和公布；新石器时代虽然至今还没有发现真正像样的准确的遗存资料，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肯定会有新的重要资料出现，跟着而来的必然会是考古学文化的划分和确认。不过，需要强调的是，考古学文化的划分和确认必须遵循三要素的基本原则，即有一定的分布范围、有一定的年代界线、至少有几处遗存所具有的共同的文化特征，这样就会避免失之过滥；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定名，一般应取最初发现的小地名，而不宜采用古族名或古国名，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混乱，因为新疆地区的古族或古国的地域界线、年代跨度

和风俗特征等并未研究清楚。其次，对已经划分和确认的考古学文化要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包括其分布地域和界线、不同的类型、年代的上下限、文化内涵和特征、发展阶段和分期、起源与流向、与其他各文化的相互关系、它所反映的经济形态和社会性质以及可能的族属推测等等各个方面。只有当每一种考古学文化的基本情况研究清楚之后，新疆史前时期的总体社会面貌才有可能呈现出来。然而，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根据不断出现的新资料对已有的结论随时进行补充或修订，更需要不同学术观点的热烈争鸣和讨论。可以预料，史前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划分和研究将会是21世纪新疆考古学研究的主要课题和方向。

3. 开展历史时期城址的考古学研究。

城市是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古代城址也不例外，其遗迹和遗物是研究和恢复当时社会面貌的重要实物资料，因此它是考古学研究的主要领域和内容。新疆地区历史时期的城址是很多的，但基本上都处于地面调查阶段，考古发掘进行得很少，具体详细情况并不十分清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整个20世纪，以考古发掘为基础、以探究城址的总体布局设计和建筑形制结构特点并恢复其面貌为目的、有组织有计划并连续不断的城址考古学研究并未真正开展，实乃新疆历史时期考古学研究的重大空白和缺陷。不过，可喜的是这种景况在20世纪的最后几年开始有所改变，例如交河古城和尼雅遗址的调查发掘。在新的21世纪，应该以此为良好的开端，将城址考古学研究列入正式的议事日程。由于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的限制，不可能对诸多城址同时都进行发掘研究，而只能首先选择比较重要和有代表意义并且具有一定工作条件或基础的城址开展工作。我们认为，前面曾经介绍过的几座古城即楼兰古城、尼雅古城、交河古城、高昌古城、北庭古城应是重点对象，另外，西汉时西域都护府的所在地乌垒城址也应列入其中。由于城址范围较大，内涵丰富复杂，要想将其城墙、城门、道路、街巷、宫殿、衙署、民居、寺庙、作坊等一一发掘研究清楚并区分出不同的时代



特征，绝非短时期内所能完成，因此，城址考古学研究必须要有长远打算和计划，要有几代人连续不断的努力和贡献。为了能够保证这一工作的顺利开展，在古城附近建立永久性的考古工作站应是较好的一种举措。如果21世纪以考古发掘为主要手段的城址考古学研究能够正式启动，那将意味着新疆历史时期的考古学研究迈入新的阶段，否则，恐怕仍会裹足不前。

4. 继续开展和加强历史时期的墓葬考古学研究并填补其某些空白。

新疆地区历史时期的墓葬已经有了一些发现和研究，但其广度和深度都还远远不够。从地域分布看，主要发现于新疆东部和塔里木盆地东南缘的少量地点，而新疆西部和塔里木盆地北缘及天山以北的大部分地区则少有发现；从时代看，主要是汉晋至唐代时期，唐代以后基本不见；从规模看，主要是中下层普通墓葬，而巨大陵墓未见。这些空白和不足使新疆历史时期的墓葬研究只能局限于个别墓地的分析而难以总结出不同地区和不同时代及不同类别墓葬的埋葬制度的变化特征和规律，即是单个墓地的分析研究，也由于全部发掘资料未能整理公布，其深度和价值亦大受影响。因此，21世纪的新疆考古学研究还必须在历史时期的墓葬方面下更大的功夫，以便在不同地区发现并发掘更多的墓葬。值得深思的是，新疆史前时期的墓葬发现很多，遍布全疆各地，可是在汉晋以后，除了在汉族人聚居的吐鲁番地区发现有唐代墓葬外，其他地区却很少发现有唐代及其前后的墓葬，是因为田野调查力度不够，抑或有其他什么原因，21世纪也许会解开此谜。

5. 继续开展和加强石窟寺考古学研究。

新疆地区的石窟寺遗存较多，但过去的研究多是侧重于壁画的题材内容等艺术方面，真正用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其进行全面的研究是从20世纪结束时在克孜尔石窟正式开始的。这种理论和方法是北京大学宿白先生创立并带领学生实践的，其要旨是将地层学和类型学原理应用于石窟寺中，对每一座洞窟进行清理发掘，准确测

绘，详细记录描述，再对洞窟形制、组合关系、造像题材、壁画内容等进行综合分析比较研究，分期断代，最后再结合有关的文献记载对整个石窟所反映的社会历史、佛教史、艺术史等等方面进行研究讨论，同时编写石窟考古报告并公诸于世。这样做，既是对石窟寺的全面系统研究，也是对石窟资料最好的保护和保存，即使以后可能由于某些原因使石窟遭到破坏或毁灭，但考古报告中所记述的详细资料依然可供人们继续使用和研究。因此，21 世纪应该在已经启动的良好开端下，继续开展这样的石窟寺考古学研究，首先是将克孜尔石窟的所有洞窟研究完毕，然后再扩及其他石窟。这是一项非常浩大的工程，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我们盼望在《新疆克孜尔石窟考古报告》第一卷之后，能够有第二卷、第三卷……以及其他石窟寺如库木吐喇和柏孜克里克等的考古报告不断问世。

6. 大力加强和促进考古发掘报告的整理、编写和出版工作。

20 世纪新疆考古学研究中存在一个很大的人为方面的问题，这就是考古发掘资料的整理和发掘报告的编写出版严重滞后。本来比较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就比较少，但就是这些数量不多的发掘，有的仅有简报而无完整的报告，有的连简报也没有，有的甚至原来的发掘人员已经谢世或有所调动而很难再整理出来，即是勉强整理出报告，其科学性也会大打折扣。凡此种种，都极大地影响和阻碍着新疆考古学研究的深入和进步。这种情况虽然到 20 世纪结束时开始有所改善，但是作为经验教训在新的世纪更应大力克服。首先应该对过去已经发掘的资料加紧进行整理，编写完整的报告，予以发表或出版，以还旧账。其次是对新的考古发掘一定要严格要求，发掘结束后应立即进行整理，先出简报，再出全面系统的发掘报告，不得积压。考古发掘报告的主要目的是向学术界全面如实地公布和介绍所有的发掘资料，同时提出考古学方面的研究意见或结论。由于考古资料丰富多彩，包罗万象，需要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从各个方面进行研究，而这些研究成果又会对考古学研究产生影响和促进作用。因此，考古发掘报告的编写和出版既是考古工作者的责任，也是考

古学研究水平不断提高和进步的反映和保证。我们希望21世纪能有更多的质量较高的考古发掘报告出版问世。

7. 继续开展田野考古发掘工作。

田野考古发掘是考古学的基础，离开考古发掘，古代的遗迹遗物就难以获得，考古学研究也就无从进行。上面所说的填补史前时期的时代空白和遗址空白、开展历史时期的城址和墓葬的考古学研究等等都需要通过考古发掘才能实现，而决定时代早晚和分期变化的最重要的地层根据也只有在田野发掘中才能获见。因此，要想使考古学研究取得发展和进步，继续开展并做好田野考古发掘是首要的决定性因素和保证。根据20世纪新疆田野考古发掘工作的经验和教训，21世纪应该注意其目的性和计划性，同时要提高其数量和质量。所谓目的性就是考古发掘要有比较明确的学术任务，要解决具体的学术问题；计划性就是既要有比较长久的远期目标，也要有切实可行的短期实施方案，要持之以恒，不能半途而废。提高数量就是一方面要有较多的发掘项目，另一方面则是要在具体的发掘中应有一定的规模，一片墓地不应只发掘很少一部分，一处遗址也不应只开挖很少的几个探方，否则就很难了解其全貌；提高质量就是在每一次考古发掘中都要严格遵守科学的操作程序，详细记录和收集各种发掘资料，同时不断总结改进和提高适合于新疆地区的田野发掘技术水平。另外，还必须再重复强调的是，田野考古发掘结束后，必须立即进行资料整理并编写出版考古发掘报告，否则田野发掘将失去意义并成为浪费，再严重一点说，即是破坏。如果这些要求能够得到贯彻和实现，21世纪的新疆考古学研究必将更上一层楼。

8. 开展并加强对新疆周围地区考古学研究现状的认识和了解。

新疆地区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古代文化与周围地区有着密切的交往和联系，而它本身又属于中亚范畴，其文化特点也脱离不了中亚的大背景。因此，将新疆地区的考古遗存与周围地区诸如印度、巴基斯坦、中亚各国、南西伯利亚和我国的内蒙古、甘肃、青海、西藏等的考古遗存进行比较研究是非常必要的，这也是继续深化新

疆考古学研究的重要方面，而要进行这种比较研究，首先必须对这些地区的考古学研究现状有所了解和认识。然而在过去的20世纪里，研究新疆考古的国人们对这些了解和认识是非常不够的，尤其是对国外如印度、巴基斯坦、中亚各国、南西伯利亚的考古学研究现状更是知之甚少，而这也是局限和影响新疆考古学研究进步的一个重要因素。例如，在上述这些地区，彩陶既存在于新石器时代，也存在于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可是在新疆地区，长期以来仅将其当作是新石器时代的产物，而不知它也可以属于青铜时代甚至是早期铁器时代。另外，这些地区的古城发掘研究也很多，对新疆同样有很大的借鉴作用。因此，21世纪的新疆考古学研究除了作好本地区的考古工作外，还应将视野扩大至周围地区，最重要的是要花大力气基本了解和掌握这些地区的考古资料和研究现状，在此基础上进行相互间的比较研究，从而揭示古代文化交流和中西交通的真谛。这既是新疆考古学研究自身的需要，更是新疆考古学研究与国际接轨、走向世界的需要。

9. 继续加强与其他各学科的联系与合作。

考古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但由于它所研究的对象和内容包括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所以它又是一门涉及面极其广泛的边缘性学科。要想做好考古学研究，无论是在田野调查发掘阶段，还是在室内整理研究阶段，抑或是考古发掘报告中公布的科学研究资料，都必须或应该有其他各类不同学科的参与、配合和支持。在20世纪的新疆考古学研究中，已经有不少学科参加进来，如体质人类学、动物学、植物学、年代测定学、冶金学、纺织学、历史学、语言文字学、历史地理学、宗教学等等，而且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在新的21世纪应该继续保持这种联系和合作。不但如此，还应该继续有所扩大，力争更多的学科参加到考古学研究中来，如第四纪地质学、环境生态学、天文学、遥感学、矿冶学、岩石学、物理学、化学、建筑学、陶瓷学、遗传学、民族学、社会学、艺术学等等。总之，凡是与新疆考古学的遗迹遗物和环境研究有关的各门学科都应成为



新疆考古学的朋友和伙伴。只有各学科的密切配合研究，新疆考古学研究才有可能较好地完成自己的各项任务，同时也能使各种考古学资料发挥出更多更大更好的社会效用。我们相信，这种跨学科的合作研究，在21世纪将会更加普遍。

第二章　北亚考古发现和研究综述

我国北亚考古研究涉及的地理范围，目前主要是内蒙古地区。内蒙古以北地区的考古研究尚未形成规模和整体影响，故本文的介绍亦以内蒙古考古研究为主。

内蒙古自治区地处我国北部边疆，以首府呼和浩特为中心，北有东西走向的阴山山脉；在鄂尔多斯西部北上黄河西岸有南北走向的贺兰山山脉；由东北至西南走向的大兴安岭山脉纵贯内蒙古东北部；在赤峰地区南部又有东西走向的燕山山脉。这样就将内蒙古自治区分割为与甘、青和蒙古戈壁相毗邻的西部，与陕、晋、冀接境的中南部，与冀、辽接壤的东南部，和以大草原为背景的东北部四大块，大体形成了四个自然文化区。另外，在内蒙古地区，由西南向东北，沿北纬 38°～45°的燕山南北长城地带，自古以来是农牧经济交错分布地域，也就是农牧民族杂居、农牧文化交汇地带。这种特殊的自然地理、经济、政治环境，产生了丰富多彩的、独具特征的北亚地区古代文化。在这一广阔的空间范围内，据 1989 年全区文物普查结果的初步统计，发现文物点约 15000 处，采集各时期文物标本约 50 万件，无论各时期文物点分布的空间布局，还是各时期遗址点的文化内涵，均从不同角度一定程度展示了该地区的历史面貌。

一

1949 年以前，内蒙古地区文物曾多次遭到列强探险队（家）的



盗掘和掠夺，我国学者到该地区进行过考古调查和发掘的人数较少。内蒙古的文物考古事业是在建国后逐步发展起来的。因此内蒙古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可以分为建国前后两大阶段，建国前可以分做外国人和我国学者的活动两部分；建国以后可以分为“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后两个时期，或者称为文物考古事业的肇创期和发展期。①

（一）外国人的探险考察

19 世纪中叶，即鸦片战争之后，许多外国旅行家、探险家和学者来到我国西北边地肆无忌惮地进行所谓考察活动。这期间古代遗迹成为其重要考察内容，古代文物则成为重点关注和大肆劫掠的对象。

最早进入我国西北边地活动的是俄国人。1858 年中俄《天津条约》签订之后的近 50 年中，进入我国西北地区的俄国考察队就有30～40 支之多，其中，1876、1887、1889 这三个年份每年多有 4～5 支考察队来我国蒙古、新疆、青海和西藏等地活动。他们带往西方的大量野生动植物标本和珍贵的古代文物，一经展示，立即引起轰动。

1892 年，俄国外交部奉沙皇之命，派遣一个蒙古学者波兹涅耶夫（А. М. Лозднее вым）来到我国蒙古地区，调査蒙古的行政制度和现状。他在中国的 15 个月期间，曾到过张家口、北京、归化城（呼和浩特）、承德、多伦诺尔、克什克腾、巴林旗、乌珠穆沁旗等地，调查过元上都遗址、元应昌路遗址、辽庆州遗址、辽金元丰州遗留址等多处古迹，带走汗、蒙、满文的手抄和刊印本历史文献 130

---

① 本文在观点和资料等方面，对李逸友：《论内蒙古文物考古》、《内蒙古历史考古学的发现与研究综述》（刊于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 年，第 385～415、461～472 页。）以及田广金：《内蒙古石器时代——青铜时代考古发现与研究》（《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 431～445 页）多有借鉴，特此说明。

部，计720册之多，著有《蒙古及蒙古人》一书。[①] 俄人克兹洛夫（П. К. Козлов）早在1899年就开始在我国西藏、青海和蒙古等地进行“考察”活动，1908年终于弄清了额济纳旗哈拉浩特（黑城）的方位，在1908年和1909年两次大规模盗掘了黑城，盗走西夏文和汗文文书2000余卷，绢画（唐卡）300余幅，以及一大批文物。1926年他在今蒙古国的诺颜乌拉挖掘匈奴墓之后，最后一次扫荡了哈拉浩特。此外，苏俄人于1922年在哈尔滨市建立过东北省文物研究会，在我国东北三省内调查发掘古文化遗址，并曾到内蒙古呼伦贝尔一带活动，曾发表有《海拉尔附近新石器时代遗址》、《满州最初发现之旧石器时代文化》等文章。

英国籍匈牙利人斯坦因（M · Aurel Stein）于1901年开始在我国西藏、新疆和甘肃一带进行“探险”活动。1914年，他来到额济纳旗哈拉浩特，继科兹洛夫之后又一次盗掘了该城，将获取的西夏文和汗文文书运回英国。另一英国人卡布别尔（W · Cambell）于1902年曾到过克什克腾旗元应昌路遗址。

美国人拉铁摩尔（O · Lattimore）在1933年作横穿中亚的旅行时，来到了今达茂联合旗鄂沦斯木元德宁路遗址，辨识出古城中有十字纹的墓石是景教寺院遗迹，著有《蒙古人的一座景教城市遗址》一文。1936年海涅士（Haenisch）和马丁（D · Mortin）根据拉铁摩尔提供的线索，在鄂伦斯木及其附近调查，又找到了一批景教徒墓石和古城址，著有《关于归化城北的景教遗迹的初步调查报告》。还在王墓梁发现了汗文铭刻“管领诸路也里可温（景教徒）”耶律子成的神道碑。

早在清康熙年间，法国耶稣会士张诚（Gerbillon）即来到中国，1689年中国与俄罗斯缔结《尼布楚条约》时，康熙帝命张诚作为中国代表的译员。他在随行日记中就曾记载考察克什克腾旗元应昌路

① 阿·马·波兹德涅耶夫：《蒙古及蒙古人》，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12页。



遗址的情况，著文刊载于法文《中华帝国全志》上。法国天主教神父闵宣化（Jos Mullie）在巴林旗境内传教时，广泛调查了这一带的辽代遗迹，于1902年编著了《东蒙古辽代旧城探考记》一书。他得知辽庆陵被掘消息后，便去庆陵进行调查，将此消息发表在《通报》上。1922年法国天主教传教教士梅岭蕊（Louis Maric Kervyn）挖开了庆陵的中陵，找到了兴宗和仁懿皇后的汗文和契丹小字哀册，将契丹小字抄录发表在北京出版的《天主教会公报》上，从而引起了世界上东洋学者们的极大兴趣，至今这两方哀册仍下落不明。1923年法国天主教神父德日进（Teilhard de Chardin）和桑志华（Licenl）在乌审旗萨拉乌素河畔发现了河套人化石及一批古脊椎动物化石，成为新中国成立以前我国境内发现的3处旧石器地点之一；后来他俩又在林西教区活动中，发现了锅撑子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并考察了扎赉诺尔的中石器时代文化。

日本人在内蒙古境内的考古活动更为频繁。早在1908年，桑原骘藏就曾考察过克什克腾旗元应昌路遗址和正蓝旗元上都遗址，出版《考史游记》书。鸟居龙藏在中日甲午战争后，来到我国东北及内蒙古一带活动，曾多次深入到赤峰市和哲里木盟地方，著有《蒙古纪行》、《满蒙古迹记》、《辽之文化》、《辽文化再探》等书。辽庆陵被掘后，鸟居龙藏曾前往调查，并于1931年著文在《国华》杂志上发表。同年，日本东亚考古学会组织内蒙古调查团到庆陵调查，团员有江上波夫、田村实造等人。1933年鸟居龙藏再次到辽庆州和庆陵调查。1934年关野贞到庆陵调查。1935年日满文化协会派黑田源次、竹岛卓一等调查庆陵，著有《林东古迹踏查记》一书。1939年东亚考古学会又派田村实造、小林行雄等人到庆陵，掘开墓室进行测绘、摄影，并临摹了壁画。1953年日本出版了田村实造等编著的《庆陵—关于东蒙古辽代帝王陵墓的研究报告》两卷本。1935年由东亚考古学会组织滨田耕作、赤崛英三、岛田彦贞、三上次男、三宅宗悦、水野清一等发掘了赤峰红山遗址及墓葬，刊印了《赤峰红山后》一书，红山文化由此得名。1936年，江上波夫、赤崛英三

等人组成的调查班，在内蒙古东部至中部的大青山前后，广泛进行考古调查，涉及遗址包括巴林左旗辽上京遗址、巴林右旗白塔子辽庆州遗址、正蓝旗元上都遗址、达茂联合旗鄂伦斯木古城等处，出版有《蒙古高原横断记》一书。1939 年，江上波夫、阪田须贺斯等再次调查了鄂伦斯木古城，1942 年江上波夫又考察了鄂伦斯木古城。江上波夫曾著有《汪古部的景教系统及其墓石》、《发现百灵庙鄂伦苏木元代汪古部王府遗址的调查》等一系列文章，他还与水野清一合作，将历年在内蒙古及我国北方收集的青铜器，编著了《内蒙古长城地带》一书。1933 年至 1938 年间，原藤隆次、德永重康、赤崛英三、加纳金三郎等人，曾多次调查扎赉诺尔中石器时代文化。1944 年岛田正郎等人发掘了巴林左旗辽祖州城遗址，1955 年出版了《祖州城》一书。1939 年日本东亚考古学会组织原田淑人等调查了正蓝旗元上都遗址，出版了《上都一蒙古多伦诺尔元代都址调查》一书。1944 年小山富士夫等人发掘了巴林左旗辽上京遗址内的白瓷窑址，并调查了赤峰缸瓦窑、巴林左旗白音戈勒窑址等。

瑞典人斯文赫定（Sven Hedin）自 1890 年起，在我国新疆、西藏境内多次进行探险活动。1926 年冬，他再次来华，希望作一次横贯中国内陆的考察活动，但遭到了北京学术界一致反对，经过 6 个月的谈判后，终于与中方达成协议，中瑞双方共同组成中瑞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1927 年 5 月，考察团在瑞方团长斯文赫定、中方团长徐炳昶率领下，自北京启程，经内蒙古包头、达茂旗、阿拉善旗、额济纳旗等地进入新疆。团员、瑞典人贝格曼（Folke Bergman）等，在额济纳河流域发现了汗代居延边塞遗址，发掘了若干汗代烽燧和亭障遗址，获得了大批汉简，并广泛调查这一地区的西夏至元代遗迹和墓葬，著有《内蒙古额济纳河流域考古报告》、《蒙新探险日记》等书。斯文赫定等人的考察活动一直延续到 1935 年。斯文赫定主持编撰出版的《中瑞科学报告》多达 55 卷，其中斯文赫定的日记《亚洲腹地探险八年》一书，记载了他在内蒙古、新疆的科学考察活动情况。



（二）20世纪上半叶我国学者在内蒙古的考古活动

进入内蒙古地区进行人文科学考察的中国学者，首推中瑞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中方团长、北京大学教授徐炳昶，他著有《徐旭生西游日记》一书，其中部分章节记载了内蒙古考察情况。该团成员黄文弼1927年6月在内蒙古达茂联合旗找到了元代汪古部主世代居住的赵王城，即今鄂伦斯木古城，在城内发现了“王傅德风堂碑记”石碑。这一重要发现经《燕京学报》报导后，立即引起海内外的广泛注意。同年9月黄文弼到达额济纳旗黑城，在城内及附近一带进行考察，并沿河上溯到甘肃毛目附近，考察了额济纳河两岸的汉代居延边塞、烽燧和城障等遗迹。

1930年，梁思永来到内蒙古调查，在赤峰、林西及阿鲁科尔沁等地采集了一批新石器时代遗物，著有《热河查不干庙、林西、双井、赤峰等处所采集之新石器时代石器与陶片》[①] 一文，这是我国学者在内蒙古东部地区考古工作的开端。

抗日战争之后，佟柱臣到赤峰市郊一带进行系列考古调查，发现了若干新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以及秦汉时代的遗迹，后发表了《赤峰东八家石城址勘察记》、《考古学上汉代及汉代以前的东北疆域》等文章。

抗日战争时期，李文信曾在内蒙古巴林左旗进行过考古工作，后发表《林东辽上京临潢府故城内瓷窑址》[②] 一文。

1946年，考古学者裴文中曾到内蒙古扎赉诺尔调查中石器时代的扎赉诺尔人及其文化遗物，他在《中国旧石器时代的文化》一书中，力主扎赉诺尔人及其文化为中石器时代，否定其为旧石器时代文化。

辽庆陵石雕哀册文出土后，国内学者纷纷对其中的契丹小字进

---

① 梁思永：《热河查布干庙、林西、双井、赤峰等处所采集之新石器时代石器与陶片》，《梁思永考古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45～52页。

② 《考古学报》1958年第2期，第68页。

行研究，主要有厉鼎奎、罗福成、王静如、谢国桢等。金毓黻将所有存世的庆陵出土的哀册铭文拓本汇集在一起，编成《辽陵石刻集录》一书，奉天图书馆于1933年刊印。

（三）内蒙古文物考古工作的肇创期

1949年至“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多年里，内蒙古的文物考古事业形成规模发展。内蒙古文物考古的肇创时期，工作方式上可分为调查、清理、配合生产建设发掘和科研课题的发掘等四种。在全区开展的文物调查，包括复查一些建国以前国内外人员调查或发掘过的遗迹。调查中有许多重要发现，如：1952年和1956年两次调查察右后旗二兰虎沟墓地，征集到一批鲜卑文物；1956年在伊克昭盟萨拉乌素河大沟湾和滴哨沟湾发现了河套人化石及旧石器文化遗物；1958年在宁城县南山根调查到夏家店上层文化墓地，并征集到一批青铜器；1962年辽祖陵陵园调查搞清祖陵的具体位置等等。在对配合工农业生产建设发现的古墓葬和遗址进行清理发掘中，也有一些重要发现，如：1953年热河省博物馆筹备组清理发掘的赤峰大营子辽驸马赠卫国王墓，是首次发现辽代初期典型的契丹贵族墓；1958年清理发掘的察右前旗土城子元代集宁路遗址及墓葬；1950年和1960年清理发掘的满洲里市扎赉诺尔古墓群，是首次正式发掘的鲜卑人遗迹；1960年春重点发掘了和林格尔县土城子古城，发现了战国、汗、北魏和唐代的遗迹。[①] 配合生产建设开展的考古发掘，规模最大和发掘时间较长的是两座古城，一是1959年至1961年间发掘的呼和浩特市郊二十家子汉代古城，并发掘了城内外的唐代、辽代和金代遗址；二是1959年至1960年间发掘的宁城县大明城辽中京遗址，在城址中发现了辽、金、元、明各代的遗迹和遗物。自治区文化局在1961年国务院公布辽上京遗址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

① 发掘工作由前热河省博物馆筹备组负责，相关报告见《考古学报》1956年第3期，第1～27页。



后，曾派员重点勘查了辽上京的皇城部分，基本搞清了建筑遗迹的分布及地下文化层堆积情况。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自1960年开始，在昭乌达盟范围内，重点发掘了宁城南山根、赤峰市郊夏家店、药王庙、西水地和市区的蜘蛛山，以及巴林左旗富河沟门、南杨家营子等处的遗址和墓葬，重新认识红山文化，提出了富河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内涵和特征，从而为建立西辽河流域考古学文化的谱系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四）内蒙古文物考古的发展期

“文化大革命”期间，内蒙古的文物考古工作陷于停顿，1972年起陆续恢复了一些业务活动，1976年后，全区各地的文物考古机构恢复业务活动，并逐渐步入发展的轨道。

20世纪80～90年代，内蒙古文物考古工作发展迅速。内蒙古文物工作队于1978年起逐渐从博物馆分离出来，1986年起改称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博物馆恢复了旧石器时代考古工作与研究。全区各盟市相继恢复和建立了文物工作机构，组建起文物工作站或文物管理处、站。全区有部分旗县建立了文物管理所或博物馆。内蒙古社科院蒙古史研究所考古室恢复了考古研究工作。同时，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内蒙古工作队又重新开始了在内蒙古境内的田野考古工作，且将活动范围扩大到了内蒙古最西部的额济纳旗，但重点工作范围基本仍在赤峰市所属旗县境内。

二

1956年至1960年在鄂尔多斯南部萨拉乌苏河滴哨沟湾发现了“河套人”顶骨和股化石之后，20世纪80年代又在萨拉乌苏发现了“河套人”化石23件。对这些化石的古人类学研究表明，“河套人”属于晚期智人，与现代蒙古人种接近。已发掘到的石器、人工打碎

的动物骨头和炭屑、石刻品等共 500 多件，时代距今 6～3.5 万年。萨拉乌苏石器的明显特征是器形特别小，是旧石器时代晚期我国北方具有代表性的文化。

通过对萨拉乌苏“河套人”化石产地的环境分析看，当时河湖广布，年均温度 4～7 摄氏度之间，年降水量在 300～500 毫米之间，呈现出森林草原、灌木丛及沼泽草原相交织的自然景观。以此为准，参照鄂尔多斯有关晚第四纪剖面的类似分析，可以推测出，相当于今日年降水量 300 毫米等值线以东地区，在萨拉乌苏河以外的黄河河谷高阶地、浑河高阶地、呼包平原山前台地、岱海外环黄土台地都有萨拉乌苏同期古文化分布的可能。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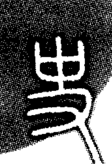
1973 年在呼和浩特市东郊大窑村河前乃莫板村附近发现了大型石器制造场遗址。1976 年，在马兰黄土底部角砾层中出土了大量石器，有石核、砍砸器、尖状器、刮削器、手斧和石球等，其中以刮削器数量最多，又以龟背形刮削器最为典型，时代大体距今 3～1 万年间。根据石器的类型和加工方法所具有的特征，命名为“大窑文化”。② 1979～1983 年间，又在大窑村四道沟发现了大窑遗址的典型剖面，包括中更新世、晚更新世早期和晚期三个不同地质年代，特别是在中更新世地层中发现了许多石制品、石渣和石块以及马和肿骨鹿化石，说明大窑村石器制造场的时代可能早到 35 万年以前。

与此同时，小南沟坡下全新世地层中的试掘，发现了典型的细石器，有锥状石核、石片和刮削器等，但未发现陶片，其时代相当于所谓的“中石器”时代。

根据岱海地区苜花河和鄂尔多斯西南部北大池取得的相当于“中石器”时代大量沉积剖面分析，在距今 9500～8500 年间以冷干

① 田广金、史培军：《内蒙古中南部原始文化的环境考古研究》，《内蒙古中南部原始文化研究文集》，北京：海洋出版社，1991 年，第 132～145 页。

② 内蒙古博物馆、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呼和浩特东郊旧石器时代时期制造场发掘报告》，《文物》1977 年第 5 期，第 56 页。



气候条件为特色，其植被以草原和灌丛草原为主。从而可以推测，中石器时代文化主要分布在沿黄河的二级阶地或三级阶地，以及黄河支流的二级阶地上。

三

内蒙古西部、北部或东北部多为沙漠和草原地区的新石器文化，目前还处于调查阶段。开展工作最多的地区是内蒙古东南部和中南部，也就是内蒙古长城地带。以锡林浩特至张家口一线为界，又把内蒙古长城地带分为东西两段。东段是内蒙古东南部，西段是内蒙古中南部。长城地带历来是农业民族与畜牧业民族文化的交汇地带，它的文化发展规律性突出地表现在：同一时代有不同文化交错存在，不同的群体在这里杂处。所以说长城地带是探索古代不同文化传统南北关系的关节点。①

西拉木伦河流域是连接东北松辽平原和华北平原的重要通道。这一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开展得较早。1935 年日本人在赤峰红山后作过挖掘。1956 年裴文中和吕遵谔先生曾到赤峰红山后和林西锅撑子山工作，指出林西锅撑子山及砂窝子遗物反映出来的性质复杂，不宜作为新石器时代一种文化。② 1962 年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内蒙队对富河沟门、③ 金龟山、南扬家营子进行了发掘。1963 年，又发掘了赤峰市西水泉遗址，④ 识辨出富河文化与红山文化的差别，

---

① 《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年，第 272 页。

② 吕遵谔：《内蒙古林西考古调查》，《考古学报》1960 年第 1 期，第 9～24 页。

③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巴林左旗富河沟门遗址发掘报告》，《考古》1964 年第 1 期，第 1～5 页。

④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赤峰西水泉红山文化遗址》，《考古学报》1982 年第 2 期，第 87 页，第 183～193 页。

命名了“富河文化”，此后又发现了以敖汉旗石羊石虎山、[①] 小河沿白斯朗营子、翁牛特旗石棚山为代表的“小河沿文化”，[②] 以敖汉旗赵宝沟遗址为代表的“赵宝沟文化”。[③]

经过多年的资料积累和研究，初步建立起内蒙古东南部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时空框架，为深入研究这一地区的原始文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以上述各文化的时间先后为序，分述如下：

1. 兴隆洼文化。

以兴隆洼聚落遗址[④]为代表。周围有一圈不规则圆形围沟，在围沟环绕的范围内，房址有计划的成排排列，形成聚族而居的聚落。房址呈近圆角长方形半地穴式建筑，进深略长，有的近方形。

兴隆洼文化有一组特征鲜明的器物群。陶质分两类，一是粗砂陶，胎厚，器表多呈红褐色或黄褐色。二是细砂陶，似粗泥，器表呈灰色或黑灰色，陶胎较薄，未见细泥陶。陶器的主体纹饰大体分两种，一是压印条纹，占大多数。有横人字形，交叉形、网格状纹，“之”字纹和由平行短线组成的席形纹等。二是近圆形和椭圆形的戳点纹。此外，尚有少量划纹。陶器组合简单，绝大多数为深腹筒形罐、还有钵、碗、杯、盅等。陶器均为手制，以圆形泥饼为底，用一泥圈包住其外缘，作为腹部最下段，以上逐段套接泥圈，直到口部，并在近口部接缝处外表贴附加泥条，口外又贴一圈泥条，形成外凸的厚缘唇。这种陶器制法，有别于同期的其他文化。据此，有学者认为兴隆洼文化应是当地的土著文化。

---

① 内蒙古自治区昭乌达盟文物工作站：《内蒙古自治区昭乌达盟石羊石虎山新石器时代墓葬》，《考古》1963 年第 10 期，第 523～524 页。

② 辽宁省博物馆：《辽宁省敖汉旗小河沿三种原始文化的发现》，《文物》1977 年第 12 期，第 1～22 页。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敖汉旗赵宝沟一号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8 年第 1 期，第 1～6 页。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5 年第 10 期，第 865～874 页。



兴隆洼文化的生产工具以石器为主，最有代表性的是掘土工具——锄形器。成型的细石器工具较少，具有代表性的是骨柄石刃的刀或镖形器。磨制石器有斧、锛、凿、刀、盘状器等。其他还有骨镖、骨凿、骨锥和骨匕等。

兴隆洼文化的分布地域广阔，西起沟河，东至医巫闾山，北抵乌尔吉木伦河，南达燕山南麓，其分布中心地域是西拉木伦河流域。根据目前的研究，可分早、中、晚三期。早期陶器表面流行交叉状压印纹，不见“之”字纹；中期交叉纹继续存在，但纹饰整齐具有装饰性，在交叉纹的基础上又流行“之”字压印纹；晚期交叉纹消失，“之”字纹趋于规整，筒形罐一般没有其他纹饰。另外，这个时期的分布地域多集中在西拉木伦河以北，对东北平原有较大的影响，兴隆洼文化早、中期，其年代相当于黄河流域的老官台文化，其晚期相当于老官台文化到半坡文化之间，其年代跨度约距今8000～7000年左右。

2. 赵宝沟文化。

以赤峰敖汉旗赵宝沟遗址为代表，亦发现了与兴隆洼文化相似的聚落址。房址面积大小不一，成排排列，未发现围沟，平面呈长方形、方形或梯形。居住面一般无特殊加工。

赵宝沟文化的陶器，以夹砂陶为主。陶器纹饰以压印的几何纹最多，且多变化。锁印纹压印痕长短不一，浅而密，极不规则，其上往往再压印其他纹饰，似乎具有“地纹”作用。动物纹多不是写实的动物形象，而是以夸张手法表现，有猪首蛇身、鹿形首、鸟形首等形象。个别器底有编织纹、褐条状纹。器形除数量较多的筒形罐外，还有椭圆底罐和尊形器，是该文化的代表性器物。流行小圈足、假圈足和浅凹底器，如盂、碗、器盖等。

赵宝沟文化的生产工具由大型磨制石器和细石器组成，特点突出的是石耜和石斧。

赵宝沟文化主要分布于西拉木伦河以南，目前可分三期。早期的几何纹尚未构成规整有序的图案，似乎刚刚从横压竖排“之”字

纹脱胎出来。中期的几何纹渐趋规整，但图案单元仍然表现为横绕器壁的特点，图案整体显得扁平、拥挤。早、中期的基本器型为筒形罐、盂、平地钵、圈足钵、椭圆底钵、圈足圆腹罐等。晚期器物的几何纹横绕器壁的特点减弱，每个几何纹单元比较清晰，简明易识。新出现了尊形器和器盖。三期的年代分别相当于老官台文化至半坡文化之间以及半坡文化早期和半坡文化晚期。

赵宝沟文化因素不像兴隆洼文化那样单纯。常见的“之”字纹筒形罐继承了兴隆洼文化早期的因素；几何纹可能源于渤海湾西岸一带。中期开始，该文化向北扩展，达西拉木伦河两侧和奈曼附近。

3. 富河文化。

以富河沟门遗址为代表。在两个相邻的山冈南坡分布有 150 余座房址，东西排列有序，与上述两个文化的聚落址近似。

富河文化的陶器，几乎全是夹砂陶。器形几乎均为筒形罐，陶器表面普遍印有横压“之”字蓖点纹，有的口下绕以条状附加堆纹，上有指甲压印文。此外，尚有斜口器和圈足器等。大型石器多数是打制的，只有少数斧、凿、锛等磨过刃部。细石器制作精致，多柳叶形镞。

富河文化大都分布在西拉木伦河以北。根据与富河文化分布地域相同的兴隆洼文化“白音长汗类型”的比较研究，富河文化与白音长汗类型的继承关系比较清楚，时代至少不晚于红山文化。

4. 红山文化。

红山文化发现的较早，研究较深入，但目前对红山文化的遗迹了解不够全面。红山文化分早、中、晚三期，早期以夹砂陶为主，泥质陶开始占一定比重。饰横压竖排或竖压横排“之”字纹的筒形罐为常见器物，罐底多有印纹，有一定数量的泥质红陶钵、斜口器和红顶钵，并有简单的单直线的红或黑彩，个别彩陶图案与后岗一期彩陶几乎一致。中期仍大量使用夹砂筒形罐，但泥质陶显著增多。筒形罐上的“之”字纹非常规整。口沿外多经磨光，呈黑色，唇沿作折棱明显的斜方状。斜口器矮壁的一侧更矮，并常呈凹弧。器盖



流行。泥质陶中新增加了重腹罐、双耳敛口罐、瓮、器座和钵类。还有一种上腹较高的折腹钵，上腹往往有彩绘花纹。这个时期的彩陶最为繁盛，有黑、红两种颜色，其花纹有宽带或数行平行宽带，横向或斜向、斜向蝌蚪状及横向长山角状平行线，钩形、鳞形、弧形三角，错叠菱形、鳞状格、棋盘格等。从大量的弧线三角花纹来看，主要接受了庙底沟文化的影响。晚期发现的几乎都是与祭祀有关的遗址。夹砂陶“之”字纹筒形罐和饰彩陶花纹的各种泥质陶器仍是此期文化的主要特征，筒形罐只见到含砂量小饰竖压横排“之”字纹一种。祭祀用的筒形器甚为流行。彩陶纺饰较中期有些变化，如流行的错叠菱形纹、菱格纹、错叠三角纹等。早期的年代相当半坡文化阶段，中期应与庙底沟文化相当，晚期流行的错叠三角纹与内蒙古中南部海生不浪文化二期彩陶近似，大体相当半坡四期阶段。

5. 小河沿文化。

以敖汗旗石羊石虎山、小河沿白斯朗营子、翁牛特旗石棚山遗址为代表。其文化因素比较复杂。以红山文化晚期与小河沿文化陶器作类型学比较，小河沿文化的敛口钵、深折腹钵、直领双耳壶和筒形罐等典型器类，可以在红山文化内找到原型；而红山文化晚期开始出现的黑陶豆、镂孔和朱绘等新器类、新纹饰在小河沿文化中得到了发展。两种文化的彩陶纹饰也有一定联系，小河沿文化的半圆形垂环纹应是红山文化晚期鳞纹简化而成，平行线组成的三角纹亦当脱胎于红山晚期的同类纹饰。陶尊的祖型可以追溯到赵宝沟的尊形器。但是这里的夹砂陶器广泛使用拍印技术加固器壁，如筒形罐和盂的器表常见交叉状线纹，便是拍印工具留下的痕迹。这种拍印线纹是黄河流域传统的制陶工艺。在内蒙古中南部稍晚于庙底沟文化的岱海红台坡上遗址亦出现相似的交叉线纹，而且和晚于红台坡上的东滩遗址出土的口沿下有附加堆纹筒形罐完全一致，显然小河沿文化的某些文化因素与西部有联系。同时，小河沿文化流行的侧洞室墓，其源头亦应在西部探寻。小河沿文化应该是继承红山文化而发展起来的，并受到西部和南部同期文化影响的、由多种文化

因素形成的一处比较发达的文化。

内蒙古东南部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时代最早的是兴隆洼文化，距今约8000年前后。在此之前是否存在陶器文化的阶段，是学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只是目前还没有答案。兴隆洼文化生命力旺盛，先后衍生出赵宝沟文化、富河文化和红山文化。其中赵宝沟文化和红山文化受到了来自南部的仰韶时代文化的影响，进一步发展出以坛、冢、庙为标志的红山晚期文化。这时，吸收多种文化因素的小河沿文化，也得到充分的发展。这种情况，与全国各地丰富多彩的多种文化林立的局面相一致。而西拉木伦河以北的富河文化，其粗糙的夹砂筒形罐和精致的细石器工艺，表现了与上述文化的不同经济形态。这与其北部锡林郭勒草原和呼伦贝尔草原以细石器和篦纹陶为主的文化背景直接相关。

内蒙古中南部正处于黄河河曲的地理位置，西通甘青，南联中原，是古文化相互传播交汇的重要区域。这一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基本上还处于调查阶段。70年代以后，先后发掘了准格尔旗大口遗址①和伊金霍洛旗朱开沟遗址②，对这一地区的龙山时期遗存有了初步认识。进入80年代，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有了突破性的进展。经过较大规模发掘的遗址有：包头市阿善③、西园遗址④，清水河县白泥窑子遗址⑤、察右前旗庙子沟和

① 吉发习、马耀圻：《内蒙古准格尔旗大口遗址的调查与试掘》，《考古》1979年第4期，第308～319页。

②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朱开沟遗址》，《考古学报》1988年第3期，第301～332页。

③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内蒙古包头市阿善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第2期，第98～108页。

④ 西园遗址发掘组：《包头西园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第4期，第295～306页。

⑤ 崔璇：《内蒙古清水河白泥窑子C、J点发掘简报》、《内蒙古清水河白泥窑子L点发掘简报》，《考古》1988年第2期，第79～108、109～120页。



大坝沟遗址，凉城县老虎山、园子沟遗址，为搞清岱海地区原始文化的发展序列和谱系，在普查的基础上，又清理和试掘了红台坡、狐子山、东滩和王墓山等仰韶时期遗址以及西白玉、面坡和板城诸龙山时期遗址。

现在岱海地区仰韶时代和龙山早期文化编年和谱系的框架已初步建立。以此为准，再对其他地区的遗存进行对比分析，也初步确立了内蒙古中南部原始文化的编年和谱系。另外，根据这一地区不同区域的文化特征，提出了岱海地区、鄂尔多斯东部及黄河两岸地区和包头地区的亚文化区概念。

四

内蒙古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与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所反映的情况一样，在内蒙古长城地带仍分为东、西两大文化体系。如果说新石器时代这两大文化体系的文化，各自与中原地区交往密切的话，那么，至青铜时代这两大体系的文化，则以东西方向流动为主。

（一）内蒙古东南部的青铜时代考古工作的现状及问题

内蒙古东南部的青铜时代考古工作开展得较早。1935 年日本学者对赤峰红山后的发掘，提出了“赤峰第二期文化”的概念。我国学者在 20 世纪 50 年代提出了“赤峰第二期文化”实际上还包含了几个性质面貌不同的阶段。[①] 1960 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队在试掘了赤峰药王庙、夏家店遗址后指出：“‘赤峰第二期文化’实际上是两种性质年代不同的青铜文化。”[②] 并以“夏家店下层文

① 吕遵谔：《内蒙古赤峰红山考古调查》，《考古学报》1958 年第 3 期，第 25～40 页。

②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考古队：《赤峰药王庙、夏家店遗址试掘报告》，《考古学报》1974 年第 1 期，第 111～144 页。

化”和“夏家店上层文化”分别命名了两种青铜文化，从而使这一地区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的研究进入了新阶段。

随着这一地区青铜时代考古遗存发现的逐年增多，对各种文化的类型、分期和源流的讨论也随之出现。归纳目前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主要有夏家店下层文化、魏营子类型和夏家店上层文化。

1. 夏家店下层文化。

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分布范围比较广泛，集中分布在西拉木伦河以南老哈河、大、小凌河流域。已发掘的遗址有赤峰药王庙、夏家店、蜘蛛山①、新店、西山根、敖汉旗大甸子②、小河沿、范杖子、宁城南山根③、小榆树林子④以及克什克腾旗龙头山等。

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遗迹，以石城最富特征，这是一种有大石块垒砌围墙等防御设施的居址。石城依山势营建，有方形、圆形和三角形等，均不规则。石城成群分布，组合和大小不一，显示了层次分明的社会结构。这种石城址群，在敖汉旗文物普查中，无论是数量或规模都相当可观，一般多集中在战国燕长城沿线。

在城址内房屋依山势层层成排分布，有半地穴型和地上型两种。在建筑技术上，垒石砌墙早晚并见，土坯墙只在晚期发现。晚期房址还发现了“白灰面”建筑。

墓葬虽然各地有零星发现，但以大甸子墓地的大面积揭露最为重要。墓地紧靠遗址东北部，墓葬分布密集，排列有序，大都是长

---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赤峰蜘蛛山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2期，第215～244页。

②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辽宁工作队：《敖汉旗大甸子1974年试掘简报》，《考古》1975年第2期，第99～101页。

③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宁城南山根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年第1期，第117～140页。

④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内蒙古宁城县小榆树林子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65年第12期，第619～621页。



方形土坑竖穴墓。部分有木质葬具。多为单人葬。葬式主要为侧身直肢，仰身或俯身的极少，头向多为西北。随葬陶器大都放在脚端，部分墓放在脚端的壁龛里。陶器为鬲、罐、鼎和鬲罐、钵两套基本组合，数量有多有少，部分墓有陶爵、盉、斝。大型墓的陶器涂绘红、白、黄色彩绘图案。有随葬猪、狗头或整体的葬俗。

陶器以灰陶为主，制法以泥条盘制为主，兼有磨制，部分陶器使用轮制。陶器的火候高，造型整齐，胎质较硬。绳纹和绳纹加划纹为两种常见的纹饰，还有蓝纹和附加堆纹等，并流行磨光黑陶上绘制类似“云雷纹”的卷云纹和变形动物图案。基本器物结合中，鬲为多见。其中筒式鬲是最有代表性的器物。甗作为炊具在遗址内大量存在，还有鼓腹罐、尊、罐、壶等。值得注意的是，大甸子墓地陶器中有一种是夹砂磨光红陶，有的有桥形耳和瘤状纽。器类有罐、碗、钵、钵口壶等。这组器物与“高台山类型”比较近似。

石器以磨制的扁平石铲、柳叶形石刀和打制石锄最有代表性。

根据蔚县诸遗址的地层关系，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存叠压在当地龙山时期遗存之上、商时期遗存之下。本地区较早单位蜘蛛山 H42 碳-14 测定的年代为距今 3965±90 年。其时代下限相当于早商晚期，至迟不会晚于武丁时期。

2. 魏营子类型。

以朝阳魏营子遗址命名的“魏营子类型”，是一种介于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夏家店上层文化之间的文化遗存。其分布地域主要在大、小凌河，西拉木伦河，老哈河流域。

“魏营子类型”的陶器，以夹砂红褐陶为主，也有灰褐陶。主要器形有鼓腹鬲、筒腹鬲、宽折沿圜底鼎、矮圈足粗把豆、敞口罐、小口双耳罐、盆、壶、钵等。炊器主要是鬲。

魏营子类型的年代，根据南沟门遗址和魏营子遗址的层位关系，现可以推测出相当于晚商时期。

3. 夏家店上层文化。

夏家店上层文化是一种多文化层次结构的北方青铜文化。目前

已发表的资料有：夏家店、蜘蛛山、南山根、林西大井铜矿、赤峰红山后、敖汉周家地、翁牛特大泡子[①]等遗址和墓地，近年还清理发掘了小黑石沟墓地。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分布范围，北面已越过西拉木伦河，东界在努鲁儿虎山东北麓，南界可达冀北滦河流域，西界从目前所掌握的资料看，未越过大兴安岭。其分布中心地域，是以赤峰地区为中心的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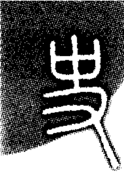
房址按建筑形式，分为窖穴式、半地穴式和地面建筑三种。墓葬以石块垒砌的长方形葬具最有特色。头向多朝东，仰身直肢为主，侧身葬很少。有少量的和葬墓。流行殉狗的习俗。根据随葬品的多少和葬具的形式，可分大型石椁木棺墓、小型石椁木棺墓、石棺墓和木棺墓四种。

陶器均为夹砂陶，多为炊器，有鬲、甗、鼎。也有食器和盛贮器，有罐、豆、盆、钵、碗等。制法皆为手制，大型陶器分段制作，然后套接成器。用榫、铆法结合足、耳，豆柄用泥片卷合而成。小型器则用手捏成，一般制作较粗糙。铜器有柄式短剑、齿柄刀子、扇形铜斧、仿陶器的铜容器，以及各种小件铜饰品。石器有半月形弧背双孔石刀，穿孔锤斧等。

根据目前的发现和研究看，夏家店上层文化可分为四期。在夏家店遗址试掘中，发现了夏家店上层文化的两层文化堆积；在龙头山遗址的发掘中获得了三层文化堆积。夏家店遗址的二层为晚期文化层，其时代不晚于春秋中期。三层的年代相当于西周中期偏晚。龙头山遗址二层相当于西周早期偏晚。龙头山遗址三层相当于西周早期。

从上述内蒙古南部青铜文化的研究现状看，仍存在着学界所普遍关心两个问题：一、夏家店下层文化与新石器时代晚期所存在的文化空缺问题；二、“魏子营类型”文化来源及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关

① 贾鸿恩：《翁牛特旗大泡子青铜短剑墓》，《文物》1984年第2期，第50～54页。



系。魏子营类型的发现填补了夏家店下层文化与上层文化之间时代上的空缺。但是，关于魏子营类型与这两种文化的关系，目前学术界还没有统一认识。

夏家店上层文化所固有的青铜器，代表性器物是銎柄式直刃剑。可能是接受晚商鄂尔多斯式青铜短剑影响的发展形式，其他器物，尤其是装饰品，均与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相似。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铜器，可能是以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为主体，又接受了东部曲刃剑系统和中原的青铜器文化传统而形成的。夏家店上层文化的晚期，像宁城 M101 和小黑石沟墓地出土的仿陶器的青铜容器，代表了这一文化的精华。

鄂尔多斯青铜器远在中国近现代考古学起步之前，在古董市场上就是抢手货，而且很早就引起学术界的高度关注。20 世纪 70 年代之前一直处于调查阶段，当鄂尔多斯地区发现与山西保德、石楼等出土的商代晚期铜器相当的器物以后，改变了以往北方青铜器出现时代较晚的传统观点。1974 年发现的朱开沟遗址至 1984 年先后进行了四次发掘，获得重大成果。

自 1973 年发掘了桃红巴拉青铜器墓地以后，[①] 验证了以往在范家窑子[②]、水涧沟门、瓦尔吐沟和速机沟[③]等地发现的几批资料均是墓葬出土。后来发现的墓葬资料有：阿鲁柴登[④]、西沟畔[⑤]、呼鲁斯

---

① 田广金：《桃红巴拉匈奴墓》，《考古学报》1976 年第 1 期，第 131～143 页。

② 李逸友：《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出土的铜器》，《文物》1959 年第 6 期，第 79 页。

③ 盖山林：《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速机沟出土一批铜器》，《文物》1965 年第 2 期，第 44～46 页。

④ 田广金、郭素新：《内蒙古阿鲁柴登发现的匈奴遗物》，《考古》1980 年第 4 期，第 333～338 页。

⑤ 内蒙古文物工作队：《西沟畔匈奴墓》，《文物》1980 年第 7 期，第 1～10 页。

太[①]、毛庆沟和西园等墓地。根据这些发现，结合在鄂尔多斯收集的大批器物，经过系统的整理和研究，有关这一文化代表性器物的演变序列、分期、编年已建立起一个初步的框架。同时，对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起源和族属问题，也进行了初步的探讨。这样，对史籍记载的“狄－匈奴系统”的文化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

五

内蒙古的战国文化遗存经考古发掘的有：1960 年发掘的和林格尔县土城子古城和凉城县双古城，1973～1974 年发掘的奈曼旗沙巴营子古城。先后调查过的战国城址有托克托县哈拉板申古城、奈曼旗西土城子古城、敖汉旗新惠镇古城等处，它们都与已发掘过的城址同属于县治一级的小城，出土遗物与中原地区所见的战国时期遗物相同，无显著的地方特色。战国时期的墓葬，在赤峰市初头郎等地都曾发现过小型墓，出土器物亦与其他地方发现的燕国墓葬无显著差异。在战国城址附近先后发现有多处窑藏铜币，其中以凉城县新堂镇[②]及土默特左旗二十家子发现的品种和数量居多，包括有赵国布币、燕国明刀和齐国刀币等多种。

战国时期长城遗迹，在准格尔旗黑戴沟乡阳窑子村境内发现有一段南北走向约 2.5 公里，全用石块垒砌，距黄河西岸约 3 公里，调查者曾推定这一段长城为魏长城。鄂尔多斯高原东部分布的秦长城遗迹，以准格尔旗点素敖包以南的各段连接脉络比较清楚，向西经德胜西、神树沟、敖包梁，折南经铧尖、纳林塔、新庙等地，与

① 塔拉、梁京明：《呼鲁斯太匈奴墓》，《文物》1980 年第 7 期，第 11～12 页。

② 曾庸：《凉城县出土一批战国古钱》，《文物》1965 年第 4 期，第 57～62 页。



陕西境内的秦长城相接，其间有土筑和石砌两种结构，其分布走向大致可与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所载秦国长城相吻合。阴山南麓分布的赵长城，有些地段的遗迹尚有绵延数十公里的，至今还未弄清其东端如何与河北蔚县境内赵国长城相连，西端又如何绵延至高阙（今临河狼山口）一带。现今地表遗迹清楚的段落是：察右前旗黄旗之北，元代集宁路遗址以北的山坡上，现存有一段遗迹，其间呼和乌素段保存较好，用石块垒筑。自卓资县三道营乡土城子村北面的山岭向西，经旗下营，出陶卜齐的山口，长城一直沿着大青山南麓蜿蜒向西延伸，除沟豁冲毁及现代人为破坏之外，基本上断断续续可见。长城在呼和浩特市北郊大青山南麓分布遗迹较为清楚，除一些山口地带用石筑外，其余都是夯筑，向西经土默特左旗境，至土默特右旗水涧沟门，折而向北溯水涧沟而上，穿越大青山至包头市石拐区南部，再折向西南，经大庙村而南，至昆都伦沟口而止。自昆都伦沟而西，沿乌拉山南麓分布的长城，至今还未确证其为战国遗迹。燕国的长城遗迹，分布在锡林郭勒盟、赤峰市及哲里木盟的南部山岳地带，西起至太仆寺旗，经正蓝旗、多伦县进入河北省围场县境，再东经赤峰市郊，敖汉旗，再东经奈曼旗，而伸入辽宁省阜新市境内。在赵、燕长城沿线，还分布有许多亭、障、烽燧遗址。

秦朝在今内蒙古南部一带设置过一些郡县。汉承秦制，继续沿用了其中的大部分城郭，并又新置了一些郡县。这些秦汉古城，较难于区别出其初建的年代，对其原名的考证，更是历史、考古学界引人注目的课题，内蒙古境内的数十座秦汉古城，其中新确定的秦代兴筑的城郭，属于县城的有准格尔旗窝尔吐沟的广衍县城址[①]和托克托县哈拉板申村西古城，后者即《史记·匈奴列传》所载秦始皇时“因河塞，筑四十四县城”中的一座县城。

---

① 崔璇：《秦汉广衍县故城及其附近的墓葬》《文物》1977 年第 5 期。

秦代墓葬发现不多，在广衍城址附近发现的14座小型墓葬，其中有10座为屈肢葬，随葬品中的小口陶瓮、罐形陶釜、双耳铜釜，以及罐、壶、甑、盒等，都是日常生活中的实用器物，这些都与关中地区秦墓的基本特征相同。

秦始皇时修筑的直道，南起秦都咸阳，北至九原（今包头市西南，乌拉特前旗三顶帐房村），1974年在东胜市西南45公里漫赖乡二顷附近发现了一段残迹，路面宽约22米，路基断面极为明显，其段路基的南北的4座山冈都有人工开凿的痕迹，可以想见直道“堑山堙谷”的巨大工程。① 秦代文物中铸引有秦始皇诏版的也有所发现，在赤峰市区内北大桥蜘蛛山遗址出土有印秦始皇诏书的陶量器。② 在奈曼旗沙巴营子亦曾发现有相同的残片。在赤峰市三眼井和敖汉旗老虎山都曾出土有秦代铁权，重量都在30公斤以上，三眼井出土的铁权上铸有秦始皇诏书的铭文。

内蒙古境内分布的汉代城址有数十座之多，它们分别属于上郡、西河郡、云中郡、定湘郡、五原郡、雁门郡、朔方郡、右北平郡和辽西郡管辖。这些汉城的形制，大致可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平面呈回字形，即有内外两城，子城位于全城中央，外城每面约1000米以上，这种古城为郡治及都尉治所，如托克托县古城村古城、呼和浩特市郊塔布陀罗海古城、宁城县黑城子古城等等。又一种为子城在城内一隅，城垣规模亦小于回字形古城，每面城墙长500～600米间，如托克托县哈拉板申村东古城、呼和浩特市郊二十家子古城等，这种古城往往设置在重要通道上，具有军事据点的重要作用。再一种为仅有四墙，平面呈方形或长方形，不设子城，每面长420～600米，即合于汉代一里或一里半的小城，都是县治所在，如磴口县布

① 史念海：《秦始皇直道遗迹的探索》《文物》1975年第10期，第44～54页。

②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赤峰蜘蛛山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79年第2期，第215～244页。



隆淖尔古城、喀喇沁旗西桥乡古城等等。汉代的城郭，有的是沿用了战国和秦代古城，有的则是汉代新筑，根据新近出土的文物，考订出其中一些原有名称。属于郡治方面的有：1976 年在宁城县黑城子古城内发现“渔阳太守章”和“白狼之丞”两块封泥，因而断定该城为右北平郡治平刚所在。属于县治所在的有：磴口县保尔浩特古城为窳浑县城，磴口县麻弥图庙古城为三封县城，磴口县布隆淖尔古城为临戎县城，准格尔旗纳林古城为美稷县城，准格尔旗窝尔吐沟古城为广衍县城，托克托县哈拉板申东古城为沙陵县城，和林格尔县新店子乡榆林城为武成县城清水河县上城湾古城为桐过县城，清水泥县古城坡城为骆县城，以及呼和浩特市郊塔布陀罗海古城为北舆县城、呼和浩特市郊八拜古城为原阳县城、包头市麻池古城为临沃县城等等。

汉代古城附近分布有众多的汉墓，经清理发掘出土遗物数以万计。这些汉墓中包括有西汉至东汉的各种类型，有积石积炭木椁墓、木椁墓、多室砖墓、单室砖墓、竖穴土坑墓等，其中壁画墓有两个重要的发现，即托克托县古城村的西汉闵氏壁画墓和林格尔县新店子的东汉壁画墓。

汉长城，基本上是将秦长城修葺加固而继续利用。汉代还另行兴筑了 3 条长城，在长城沿线附近兴筑的亭、障、塞、烽燧等系列的军事建筑物，至今仍有不少保存下来，大都难于考定原名。1976 年发掘的乌拉特后旗（原潮格旗）朝鲁库伦石城，可能是一座障的遗迹。[①] 1973 年发掘的额济纳旗破城子汉代居延都尉所辖甲渠侯官遗址（A8），有障和坞两部分，障坞外面还有烽燧和灰堆等遗迹。遗址内共出土有“塞上烽火品约”等简牍 7000 余枚，出土有弓箭、铁甲、货币、仓印等实物 881 件。同时发掘的甲渠侯官遗址南 5.3

① 盖山林，陆思贤：《潮格旗朝鲁库伦汉代石城及其附近的长城》，《中国长城遗迹调查报告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 年，第 87～92 页。

公里的第四燧遗址（P1），出土有木简 95 枚，实物 105 件。[①] 这是继 1930～1931 年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之后在居延地区发现的又一大批汉代简牍，对于研究汉代的简牍制度、边塞军事设施以及经济文化史等都有极其重大的科学价值。

六

匈奴、鲜卑、乌桓等北方各族遗迹，一直不为人们所认识。经过长期的考古研究，已初步区别出匈奴与鲜卑遗迹的差别，而史籍记载乌桓与鲜卑习俗相近，因而至今只能以鲜卑考古来包括乌桓考古。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就在阴山以北的察右后旗二蓝虎沟发现了鲜卑墓群，但当时认为是东汉的匈奴遗迹。[②] 1958～1960 年在呼伦湖（达赖湖）畔的扎赉诺尔发现了一处古代墓群，其中有些典型的东汉时期的汉族文物，而其特殊的葬俗及与二蓝虎沟出土物相近的遗物，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于是有学者认为这批墓葬是鲜卑遗迹。[③] 后来又先后在陈巴尔虎旗完工[④]、鄂温克旗伊敏河、额尔古纳右旗拉布达林[⑤]等兴安岭西北地带发现过多次相当于东汉时期的鲜卑遗迹。60 年代在

---

① 甘肃居延考古队：《居延汉代遗址的发掘和新出土的简册文物》，《文物》1978 年第 1 期，第 1～25 页。

② 内蒙古文物工作：《内蒙古文物资料选辑》，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64 年，第 58 页。

③ 郑隆：《内蒙古扎赉诺尔古墓群调查记》，《文物》1961 年第 9 期，第 16～19页。又《扎赉诺尔古墓群发掘简报》，《考古》1961 年第 12 期，第 673～680页。

④ 潘行荣：《内蒙古陈巴尔虎旗》，《考古》1962 年第 11 期，第 590 页。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内蒙古陈巴尔虎旗完工古墓群清理简报》，《考古》1965 年第 6 期，第 273～283 页。

⑤ 赵越：《内蒙古额右旗拉布达林发现鲜卑墓》，《考古》1990 年第 10 期，第 690～693 页。



赤峰市北部的巴林左旗南杨家营子①、察右后旗南二海子等地，也发现了与之相近的鲜卑遗迹。70年代后期宿白先生根据其中部分鲜卑遗迹，指出了拓跋鲜卑南迁的文化发展规律。②

西晋时，拓跋鲜卑部已移居到阴山南北地带，属于这段期间的文化面貌还处于探索阶段。1956年在凉城县小坝子滩的沙虎子沟出土的一批窑藏金银器，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还不能代表其全貌。沙虎子沟窑藏物中有“晋鲜卑甩山中郎将”银印、神兽形金饰牌、神兽形金饰件、神兽形金戒指等等。其中的一件四兽形金饰牌的背面錾刻有“猗也金”三字，得知其为西晋时拓跋鲜卑部大人猗也所有，金银印为西晋王朝所赐予。1980年，在鄂伦春自治旗嘎仙洞发现了北魏太平真君四年（443年）的摩崖刻石，为世祖拓跋焘派遣中侍郎李敞到乌洛侯国祭祀鲜卑远祖石室的祝文，铭文与《魏书·礼志》所载的祝文基本相同。③

内蒙古境内的北魏城址，经过考古调查的有：武川县乌兰不浪土城梁、乌拉特前旗苏独仑乡根场、固阳县百灵淖乡城库伦、四子王旗库伦图村城卜子、四子王旗乌兰花镇城卜子、察右后旗白音查干镇和准格尔旗石子湾等处。其中新考定城名的有：武川镇城址大致可定为武川县土城梁、④ 沃野镇城址可定为乌拉特前旗苏独仑乡根场、怀朔镇城可定为固阳县城库伦。⑤ 这些北魏城址中，都曾发

①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巴林左旗南杨家营子的遗址和墓葬》，《考古》1964年第1期，第36～43页。

② 宿白：《东北、内蒙古地区的鲜卑遗迹——鲜卑遗迹辑录之一》，《文物》1977年第5期，第8～14页。

③ 米文平：《鲜卑石室的发现与初步研究》，《文物》1981年第2期，第1～9页。

④ 张郁：《内蒙古大青山后东汉北魏古城遗址调查记》，《考古通讯》1958年第3期，第14～21页。

⑤ 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内蒙古文物古迹简述》，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43页。

现过具有典型特征的文物，如楔形曲前沿大板瓦、“万岁富贵”文字瓦当、简化纹瓦当以及莲瓣纹瓦当等物。在托克托县古城村北魏云中镇城址内曾出土过太和十二年铭文的鎏金铜佛像。1979～1980年间曾试掘了固阳县城库伦村的怀朔镇城址，发现有覆盆式石柱础、三角形莲化纹砖、楔形曲前大板瓦、莲化纹瓦当、鸱吻等建筑材料，有佛、菩萨、弟子、供养人等塑像，以及铁车辖、铁犁铧和石兽等物。[①]

北魏时期的鲜卑墓葬已有多处发现，1955年和1961年在呼和浩特市郊美岱村南宝贝梁发现的带有长墓道的单室券顶砖墓中，出土有双耳镂空高足铜镀、鸟兽相斗纹铜饰牌、铜羊矩骨、铜虎符、铜斗、铜勺、兽形饰金戒指、陶壶、陶罐、铁剑、“大泉五十”铜钱等物，其中两件铜虎符上分别镌刻有“皇帝与河内太守铜虎符第三”和“皇帝与河内太守铜虎符第五”等铭文，证实了这处墓地为鲜卑贵族墓。[②] 1975年在呼和浩特市内大学路发现的一座单室砖墓内，随葬器物有男女俑、武士俑、女舞乐俑、马牛羊驼猪犬鸡等畜禽俑、仓灶井磨碓和牛车等模型，其形制与河南洛阳市发现的北魏墓出土的相同，反映了当时这一带已流行中原地区的墓葬制度，其时代当在孝文帝都洛阳以后。[③] 1985年在怀朔镇城址附近清理的7座北魏墓，其中有北魏时期的土坑墓和晚期的砖室墓，随葬物品的陶壶和罐，也是与呼和浩特市美岱村墓葬出土的相近。[④]

北魏时期的鲜卑文化遗存，还有一些重要的发现。1980年土默特右旗讨合气村发现的一组文物，有金带饰、铁剑、铁刀、铁镞、

① 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内蒙古百灵淖城库伦北魏古城址的调查与试掘》，《考古》1984年第2期，第145～152页。

② 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呼和浩特美岱村北魏墓》，《考古》1962年第2期，第86～87页。

③ 郭素新：《内蒙古呼和浩特北魏墓》，《文物》1977年第5期，第43～48页。

④ 包头市文物管理处：《包头固阳县发现北魏墓群》，《考古》1987年第1期，第38～41页。

铜和骨镞等物，其中金带扣共10件，都是包金、铁芯、铁钮，上面还残存有丝织品痕迹，应为钉缀在丝绦带上，上蹄形带銙饰以神兽纹，扁蹄形带銙饰以云纹，长方形带銙饰以火焰纹。1981年在达茂联合旗前村发现的一组窑藏金器，有龙形金带1条和鹿角枝状金饰4件。① 1983年商都县大库伦乡石豁子村发现的一处窖藏中，出土有铜壶、铜盘、铜镂孔器、铁犁铧和铁犁镜等物，其中铜壶为短颈、鼓腹、平底，肩部有对称辅首衔环，肩部阴刻"大员"二字。② 近年来在哲里木盟及其邻近的赤峰市部分旗县境内，逐步区分出了一些东部鲜卑的文化遗存，它们的共同特点是：陶器包含夹砂手制陶和细泥轮制陶两个系统。夹砂手制陶表面有竖向压磨的暗条纹；细泥轮制陶除有压磨暗条纹组成的菱形网状纹外，其余为轮压法印出的八字纹、重菱纹、篦点纹和几何纹饰，还有压印马纹图案的，其器形有罐和壶两大类。同时共存的有铁马具、青铜饰件等物。这一类型的文化遗存，至今还未经过正式发掘，尚不明白其内涵及渊源关系，仅从科左后旗根舍发现的一组石棺葬内出土物看来，其时代应属于北朝时期。③

七

内蒙古境内隋、唐时代的遗迹较多，经过调查并结合考古资料考定出不少原来城名，如：准格尔旗十二连城为隋唐胜州城址，④

---

① 陆思贤、陈棠栋：《达茂旗出土的古代北方民族金饰件》，《文物》1984年第1期，第81～83页。

② 乌兰察布盟文物工作站：《内蒙古商都县发现北魏窖藏》，《文物》1989年第12期，第93页。

③ 张柏忠：《哲里木盟发现的鲜卑遗存》，《文物》1981年第2期，第9～15页。

④ 李作智：《隋唐胜州城址的发现》，《文物》1976年第2期，第73～82页。

乌拉特前旗额尔登布拉格苏木（阿拉奔）已被乌梁素海淹没多半的古城为唐天德军城址，其西南80公里的西土城古城为唐丰州城址，[①] 托克托县托克托城中的“大皇城”为唐东受降城，[②] 鄂托克前旗城川古城为唐长泽县城址，元和十五年新宥州移治于此，[③] 鄂托克前旗大池古城为唐白池县城址，其北约35公里的巴拉庙古城为唐兰池都督府城址，包头市郊敖陶窑子古城为唐中受降城址，乌拉特前旗库伦补隆村北古城为唐西受降城址，林西县樱桃沟古城为唐饶乐都督府城址，辽代修葺后沿用改名为饶州等等。

在唐胜州、单于都护府、天德军、东受降城及乌审旗白城子的唐夏州城外地区曾先后发现了一批唐墓，其中以天德军城址附近发现的王逆修墓较为典型，为单室穹庐顶砖墓，葬尸4具，均头东脚西、仰身直肢，随葬器物有三彩瓷盂、白瓷碗及唾壶、陶罐等，墓志铭记王逆修为天德军等军州都防御马步都虞侯。1960年在单于都护府城址北城墙外发现的墓群，其墓室结构同于王逆修墓，墓内出土酱褐釉穿带瓶，其形制为典型的晚唐器形；同时出土有黄绿釉鹦鹉形提壶、塔形陶器等物，[④] 用多件陶器组成塔形，是一种地方性葬俗，并见于山西雁北地区。

唐代遗物在内蒙古境内有多次重要的发现，在阿鲁科尔沁乌兰斯木发现的“大唐营州都督许公德政之碑”碑额，是研究唐代与北方契丹等族关系史的重要史料，唐代营州在今辽宁省朝阳市，而为其都督歌功颂德的德政碑，却出现在营州城址北约400公里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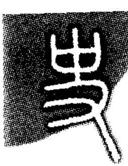
---

① 张郁：《唐王逆修墓志铭考释》，《内蒙古文物考古》创刊号，第23～28页。

② 李逸友：《内蒙古托克托城的考古发掘》，《文物资料丛刊》第4期，第40～48页。

③ 侯仁之：《从红柳河上的古城废墟看毛乌素沙漠的变迁》，《文物》1973年第1期，第35～41页。

④ 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和林格尔县土城子古墓发掘简介》，《文物》1961年第9期，第30～33页。



引人深思。[1] 在喀喇沁旗哈达沟门发现的鎏金银器6件中，有錾花鎏金银盘4件，直径47厘米左，其上錾有花卉、火焰宝珠、狮、鹿和双鱼等图案花纹，背底錾刻有铭文1行55字，得知其为地方官员向朝廷进贡之物；圆罐1件，器身也錾刻有花卉和鹿纹；双鱼形壶1件，壶身为双鱼腹部相连而成，这是唐代金花银器中甚为少见的精品。[2] 在敖汉旗李家营子1号墓出土的5件银器中，有波斯萨珊朝带柄银壶1件，口部有短流，执柄安在口部至腹中部，柄与口相接处饰以鎏金人头像1个，高鼻深目，八字胡须，短发后披，扁圆腹，高圈足外侈，圈足底连沿饰联珠纹一周。小银壶1件，大口，短喇叭状无唇口沿，腹部安环形把手，圈足外侈，形似今漱口杯。执壶与小壶都是典型的波斯银器，在国内甚为少见。同时出土的鎏金银盘1件，带有圈足，盘内中心錾野豹1只，盘口和豹纹均鎏金。此外，还有椭圆身银杯和小勺各1件。这批银器对于研究中西交通史具有重要价值。[3] 以上这些重要发现，都在今赤峰市所辖各旗境内，唐代时期为契丹、奚等民族活动地方，由于这些贵重器物未与具有当地民族特色的器物共存，因而还难于推断占用它们的主人究竟是何民族和身份。

近年来逐渐识别出了一些契丹人在建立辽国以前的文化遗存，但器形不同于经常见的辽代篦纹陶器，而是沿袭了东部鲜卑印纹陶器的一些因素，成为探索早期契丹文化的重要线索。1977年在科左后旗呼斯淖清理的墓葬中，出土有双耳、扁平、平底的马镫壶。它不同于辽代的鸡冠壶形制。同时出土的盘口壶，是直口大盘，与中

---

① 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几年来的内蒙古文物工作》，《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4期。苏赫：《内蒙古昭盟发现"大唐营州都督许公德政之碑"碑额》，《考古》1964年第2期，第103页。

② 喀喇沁旗文化馆：《辽宁昭盟喀喇沁旗发现唐代鎏金银器》，《考古》1977年第5期，第327～334页。

③ 敖汉旗文化馆：《敖汉旗李家营子出土的金银器》，《考古》1978年第2期，第117～118页。

原地区晚唐地区时期的盘口壶相近同，因而可以确定这是唐代晚期契丹人墓葬。[①] 在通辽市乌斯图清理的土坑墓、扎鲁特旗乌根塔拉清理的土坑墓、扎鲁特旗荷叶哈达清理的石棺墓以及库伦旗厂家沟出土的陶器，都共存有盘口瓜棱腹陶壶和夹砂凸弦纹陶罐，都是压印有篦纹，而这种陶器在辽代已很少见，因此它们的时代可能要偏早些，应是契丹人在建立辽国以前的文化遗存。[②] 在赤峰市所辖旗县境内分布甚多的契丹早期文化，目前也正逐步认识和区别出来。赤峰市郊洞山发现的窖藏银器中，有鱼龙提梁壶 2 件，较喀喇沁旗哈达沟门出土的双鱼形壶细高，长颈细口，器身稍圆，而与陕西西安附近晚唐墓葬出土的瓷质鱼龙提梁壶相同。并有马镫壶 1 件，为扁身、平底，提梁为花式拱形小孔，与呼斯淖尔出土的陶器马镫壶相近。[③] 因此，可以断定这批银器为晚唐时期契丹人所使用之物，但还不能确定就是契丹人所生产。

在呼和浩特附近地区，还先后发现有几批与中西交通有关的文物，主要是波斯萨珊朝的银币和东罗马帝国的拜占庭金币。近年呼和浩特市郊又发现了一枚拜占庭金币，图案铭文与水磨沟口出土的不完全相同，时代可能略早于前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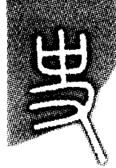
八

内蒙古境内的辽代城址数量较多，其中多数分别属于上京道和中京道管辖，少量属于东京和西京道管辖；按其功能作用来看，有

① 张柏忠：《科左后旗呼斯淖尔契丹墓》，《文物》1983 年第 9 期，第 18～22页。

② 哲里木盟博物馆：《内蒙古哲里木盟发现的几座契丹墓》，《考古》1984 年第 2 期，第 153～156 页。

③ 项春松：《赤峰发现的契丹鎏金银器》，《文物》1985 年第 2 期，第94～96 页。



都城、州县城、头下州城、奉陵邑和边防城等几种类型，经多年考古调查研究后，大都可以确定其原来名称，且考证出一些《辽史·地理志》未曾明确记载的城名，如突泉县双城子古城为辽代春州城址。辽代都城即今内蒙古境内的上京和中京遗址，都曾进行过钻探和测量，并曾在中京遗址内进行过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城垣规模、城市布局都已基本搞清。如：1959～1969 年间勘测发掘的宁城县大明城辽中京遗址；1962 年勘测的巴林左旗林东镇辽上京遗址；1980 年发掘呼和浩特市东郊白塔村西南的丰州城址。辽代遗址的发掘不多，主要发现了辽代祭祀死人灵魂的黑山，即《契丹国志》“岁时杂记”冬至条所记的黑山。

辽代墓葬有契丹人和汉人墓葬两大系列。契丹人墓葬可分为皇帝陵墓、大贵族墓、一般贵族墓、平民百姓墓等类别。汉人墓葬可分为高级官员墓、一般官员墓、平民百姓墓等类别。除契丹皇帝墓未曾清理发掘过外，其余各种类型墓葬都已有过发掘，以其中有明确纪年墓为依据，可以初步归纳出它们分期的规律。

墓中出土的辽代文物异常丰富，1986 年发掘的奈曼旗青龙山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是清理发掘的所有辽墓中保存最完整、出土文物最精彩的一座。从墓志铭得知陈国公主为圣宗弟秦晋国王耶律隆庆的次女，驸马萧绍矩为圣宗之仁德皇后之兄，即萧隗因之子。公主驸马下葬时全身穿着金、银质的葬衣，头枕金花银枕，头侧放置鎏金银冠，腰着以银皮代替革鞓的金蹀 X 带、颈上挂有琥珀瓔珞，公主颈上还挂珍珠项链，手带 11 枚金戒指和两腕戴金镯两对，完整地保留着契丹大贵族的葬制。随葬物品有马具、金银花银器皿、金蹀 X 带、木弓檠和鸡冠壶、玻璃器皿、玛瑙器皿、水晶器皿、玉器、定窑白瓷器、越窑青瓷器及辽瓷器等物约千件。[①] 1970 年在翁牛特

①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辽陈公主驸马合葬墓发掘简报》，《文物》1987 年第 11 期，第 14～23 页。张郁：《辽陈国公王夫妇殡葬服饰小记》、《辽代带式考实》。孙机：《一枚辽代刺鹅椎》。以上均载《文物》1987 年第 11 期，第 4～24 页。

旗解放营子墓内发现的木椁室，全用柏木构成，平面呈八角形，每面用木枋垒筑椁壁，自 1.6 米以上叠涩收顶，壁面及顶部满彩绘，分别绘出侍女图、宴饮图、毡车出行图、门神图、花鸟蜂蝶图及各种装饰图案花纹，是保存最完整的契丹贵族墓的木椁室。1972 年发掘出土的库伦旗前勿力布格一号墓的壁画，分布在墓门、天井及墓道两侧壁上，绘出门神图、湖石牡丹图、竹林仙鹤图、侍从女婢图、出行图、归来图及装饰花纹等，其内容之丰富，技巧的娴熟，人物的众多及保存面积的广大等，为其他契丹贵族墓所不及的。

有契丹文字的文物也相继发现，契丹大字的有北大王墓志、祖陵前残碑、翁牛特旗桥头出土的鎏金铜印和辽庆州遗址出土的铜印。辽上京遗址出土的银印①等。契丹小字有翁牛特旗山咀耶律氏墓志和敖汉旗英凤沟辽墓出土铜器铭文等。

赤峰市境内陆续出土的几批窖藏铜钱中，发现了“天禄通宝”、“统和元宝”、“重熙通宝”、“清宁通宝”、“咸雍通宝”、“大康元宝”、“大康通宝”、“大安元宝”、“寿昌元宝”、“天庆元宝”、“乾统元宝”等稀有的辽代纪元铜钱。

辽瓷方面陆续发现了许多前所未见的器形，经整理研究归纳出了辽瓷的基本特征，并调查和试掘了赤峰市猴头沟缸瓦窑，这是辽国境内最大规模及烧造时间最久的瓷窑。

1966 年在辽庆州城址砖塔内发现了释迦如来佛舍利塔，建于重熙十八年（1049 年）。1989 年在修缮该塔工程中，于塔刹铜体内发现有木板箱 4 个，十字形陈放，箱内盛放小塔百余个，大多为木制，并有铜、瓷质。每个塔内均有精印佛经 1 卷，为上京、南京等地寺敬送的；木箱旁侧并散置有大量经卷，这是继山西应县木塔佛像内发现契丹藏经之后的重大发现。1986 年在上京北约 3 公里的 1 座已毁墓葬中，发现了辽代晚期佛学大师鲜演墓碑。

---

① 刘凤翥、王晴：《辽上京出土契丹大字银币》，《文物》1981 年第 10 期，第 24 页。

九

1983～1984年间勘测发掘的额济纳旗黑城，解决了西夏黑水城和元代亦集乃路城址的地层叠压关系，查明了西夏黑水城的形制布局。① 1978年在准格尔旗黑岱沟城坡调查了位于黄河陡壁上的西夏城堡，与对岸的金、元宁边州城址遥遥相望，宁边州是金与西夏交往的榷场所在，西夏城堡的作用自然明白，但尚未考证出原名。在此城堡不远的大沙塔，清理了5座小型砖室墓，壁内砌有仿木结构的柱、门、窗、檐、斗拱，墓门也砌成仿木结构，墓内彩绘壁画有夫妇对饮图、奴仆、牵驼图及怪兽咬斗图等。②

临河县高油坊西夏城址内，1958年在东门内发现有大批铁钱，均已锈损过甚，仅可辨识出为“乾祐通宝”；1959年在城内东北隅出土金银器约27公斤；1966年又在其附近发现一清白瓷小罐，罐内藏金器约250克。征集到的有金佛像、莲化形金盏托，凤凰纹碗、金指剔、镂空人物纹金耳坠、金环及饰件等物。③ 在伊克昭盟境内多次发现西夏文物，1956年秋在伊金霍洛旗敏盖乡发现了褐釉剔花瓶及铁钱；④ 1982年在准格尔旗准格尔召乡敖包渠发现一处窑藏，在1个大口瓮内盛放瓷器，瓮口覆盖铁锅1口，瓮周围堆放着铁器。出土瓷器有浅酱油瓷瓮，酱釉剔花瓶，白釉盆、钵、碟、碗、瓶等。

---

① 内蒙古考古研究所等：《内蒙古黑城考古发掘纪要》，《文物》1987年第7期，第1～23页。

② 郑隆：《准格尔旗大沙塔壁画墓及附近古城》，《内蒙古文物考古》创刊号，第13～21页。

③ 陆思贤、郑隆：《内蒙古临河县高油房出土的西夏金器》，《文物》1987年第11期，第65～6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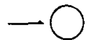
④ 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准格尔旗发现西夏窖藏》，《文物》1987年第8期，第91～96页。

铁器有镀、锅、釜、火盘、镬、铛、火撑、臼、杵箅、熨斗、勺、锁、剪刀、直刃刀、箕、箍、弓形器、錾、锹、铲刀、铲、锄、镰、铧、犁镜、马衔、马镫、铐等。1985年和1986年，又先后在伊金霍洛旗白圪针，瓦尔吐沟、牛其圪台、陶家圪楞、根皮庙等地发现一批窑藏，出土器物除在敖包渠所见外，增加了酱釉剔花罐、酱釉壶和盆、石磨、羊首铁灯、铁锯等物。此外，在达拉特旗盐店和包头市郊先后发现过窑藏铁钱，都有大量“天盛元宝”和“乾祐元宝”西夏铁钱。在内蒙古境内出现大量铁钱，而在西夏都城附近及其以西地方却不出土铁钱，均为古钱币研究重要资料。

金代界壕边堡经过多次反复调查，肯定了金代界壕有三条主线。分布在今大兴安岭北面的那条，东起内蒙古额尔古纳右旗拉布达林镇东北方的上库力村，沿根河南迤逦而西，至根河河口折而向南，沿额尔古纳河东岸蜿蜒南行，到红山嘴北越过额尔古纳河，在前苏联境内沿额尔古纳河北岸向西南延伸，在满洲里市又进入我国境内，经新巴尔虎旗北部伸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沿克鲁伦河与乌勒吉河之间的草原伸向西南，西端止于乌勒河河源处之北。这条界壕当年仓促筑成，使用时间不久便废弃，留下的遗物不多，现今沿线多为风沙湮没，与原来壕沟浅与壕墙低有关。分布在今大兴安岭南面的界壕，金代分别属于东北路、临潢路、西北路和西南路管辖，它的东西两端都只有一条主线，而中间有很长的一些段落有支线。在大兴安岭南面的界壕，东端起自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尼尔基附近，经阿荣旗、扎兰屯市南境，进入扎赉特旗，再西至科右前旗境内分出北线和南线；北线经突泉县北部，于科右中旗北部穿越大兴安岭，进入东乌珠穆沁旗，走向西北而伸入蒙古国境内，再于阿巴嘎旗北部地入我国境内；南线自科右前旗经突泉县、科右中旗、扎鲁特旗、巴林左旗、巴林右旗、林西县、克什克腾旗，经达里诺尔西南方进入正蓝旗，再西经正镶白旗、化德县、商都县、察右后旗，在四子王旗敖包苏木与北线相合；自查干敖包走向西南，经达茂联合旗而达武川县境内，消失于大青山北部的山麓。从建筑形制来看，

北线界壕无副壕副堤，壕墙上边未筑有马面；而南线都是双壕双堤，且加筑有马面。可知北线为大定年间修筑，而南线是明昌年间所筑。在界壕沿线都筑有戍堡、关隘、边堡等一系列的屯戍官军的驻所。金代界壕边堡主要分布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境内，东西分布水平长度约 5000 公里，加上南北两线及支线长度，以及在山岭上实际曲折和斜坡的长度，总计实有长度在 1.5 万公里以上，较秦汉长城长得多，是我国最长的古长城遗迹。1981 年发掘了霍林郭勒市的两座边堡。1978 年在科右中旗吐列毛杜调查试掘了两座古城。

宋代文物在今内蒙古境内也大量发现，包括陶瓷、铜印、铜镜、银铤、铜钱等多种器物。经调查和研究确定今准格尔旗伍字湾乡土墩墕古城为北宋时期的丰州城址。



一〇

内蒙古境内的元代文物也很丰富。先后调查和发现元代城址 30 余座，包括都、府、路、州、县城。其中已考定城名的 18 座，计有：四子王旗大庙古城为砂井总管府遗址，托克托县古城村东北古城为云内州遗址，凉城县淤泥滩古城为宣宁县遗址，察右前旗苏南古城为平地县遗址，正蓝旗黑城子为新桓州遗址，赤峰市郊哈拉木头古城为高州城址，敖汉旗白塔子古城为武平县遗址，敖汉旗五十家子古城为宁昌路遗址等。经过详细调查并测出较详细平面图的，首推正蓝旗五一牧场的上都遗址，比较准确地弄清了城垣、街道、宫殿、官署、园囿、寺院、仓廒、兵营、作坊、店肆、民居的布局和结构情况。经过考古发掘的元代城址有：1958 年发掘的察右前旗土城子集宁路遗址，1959～1960 年发掘的宁城县大明城辽中京城址上叠压的大宁路遗址，1983～1984 年发掘的额济纳旗黑城亦集乃路遗址等。亦集乃路遗址的考古工作规模最大，查清了城垣的布局和结构，测绘了详尽的街道和房舍的分布图，对于总管府、官司、寺

院、坊铺和民居的具体布局和结构有了明确的认识，总计揭露面积1.1万余平方米，清理出房屋基址280余处。出土遗物中以文书为主，其中以元代为主，北元次之，西夏时代的最少，包括世俗文书和宗教信仰两个方面。世俗文书中以公文为主，包括有民籍、人事、礼仪、军政事物、律令、钱粮、票据、词讼、卷宗、封签等类，私人文书包括典籍、历书、契约、书信、账目、医药、习字等类。宗教信仰方面有佛教经典、道教符箓、占卜地理秘术等。使用有汉文、蒙文、西夏文、藏文和阿拉伯文等多种民族文字。此外，还出土有大量“中统元宝交钞”和“至元通行宝钞”，均为元末粗制滥造之物，行用不久即成为昏钞的不少。在城址内发现了一方天元元年（1376年）铸造的铜官印，足证当时北元政权仍统治着该城。

元代贵族的墓葬，先后在赤峰市三眼井和元宝山发现三座砖室墓。其中三眼井二号墓，男女合葬于一具木棺内，随葬物品仅有铁锈花白瓷碗、黑釉瓷瓶、海兽葡萄镜等。但墓内壁画保存较为完整，后壁绘墓主人“开芳宴”，西壁绘出猎图，东壁绘归来图，前壁绘门神图，穹庐顶四角各绘飞凤牡丹。全墓共绘人物像28人，包括墓主、侍婢、奴仆、伎乐等。两处墓内所绘墓主和男仆都为蒙古装束，头戴宽沿圆顶帽，饰有帽缨，服装有左衽和对襟诸款式，是了解元代服饰制度的重要资料。在阴山前后的元代汪古部管辖地区内，多次发现有汪古人墓葬，其中主要有：兴和县五甲地墓、达茂旗明水墓地和四子王旗王墓梁墓地等。元代汉人墓葬普遍发现于城址附近，经清理发掘的有集宁路遗址附近及上都遗址附近的数十座，其中有不少随葬金银饰品和银器等贵重物品。

元代文物有多起重要发现，其中已发表资料的有：1974年在武川县东土城村发现的“监国公主行宣差河北都总管之印”铜印，印文四周为九迭篆汉字，中心为畏兀儿体蒙古文两行，可能释为“总管之印”。其时限是在未建立元朝以前蒙古汗国时期，监国公主即成吉思汗三女儿阿剌海别吉。1976年和1977年先后在集宁路遗址内发现两大瓮窖藏文物，包括有漆器、银器、钧器、龙泉瓷、白瓷、铜

镜及纺织物等，纺织物中有织锦、素罗、提花罗、提花菱、绢和纱等质地。有保持完好的双羊图案织锦被面、印金被面、紫罗绣花夹袍、印金夹衫等等，这批衣物中曾见有墨书反体字迹上有“集宁路达鲁花赤总管府”等字迹，表明物主是该城中的首领及其眷属。1970年在呼和浩特市东郊元丰州遗址内发现的两大瓮窑藏瓷器，有钧窑香炉和镂空高座双螭耳瓶、龙泉窑缠枝牡丹纹瓶等物。这批精美的瓷器，都是不可多得的工艺美术品，从钧窑香炉上模印“已酉年九月十五日小宋自造香炉一个”铭文得知，制造时间当在武宗至大二年（1309年）。1979年在包头市郊燕家梁出土的一批元代瓷器中，有缠枝牡丹青花瓷罐1件，器形硕大，纹饰繁密，色泽悦目，是景德镇青花瓷器的珍品。1982年修缮呼和浩特市万部华严经塔时，清扫塔内积土，于第二层东门洞靠近回廊处的积土底部，出土“中统元宝交钞”1张，面额为壹拾文，此钞面与正年间印造的中统钞不同，面文两旁的“中统元宝”、“诸路通行”均只有九叠篆汉文，尚无八思巴字译写的汉字并列，可知其印造时间是在元代初年，中书省未改尚书省之前，即在1276年以前印造的。这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一张纸币，是在纸币发展史上最为珍贵的实物史料。万部华严经塔内有不少金、元、明各代的题记，其中尤以元代题记为多，主要用汉文书写，并有用畏兀儿体蒙古文、八思巴字、古叙利亚字书写的，题署者中除丰州在城官吏和百姓外，亦有城外附近居住的百姓；更多的是来自附近州县，以及远道来自榆次县、大都、中兴府、般阳路、和林的游览者，可以看到丰州在联系大于山前后各路、府、州、县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方面，起着重要的枢纽作用。

第三章　东北亚考古回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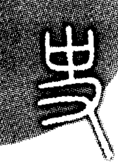
第一节　旧石器考古

一、发现与研究的回顾

东北地区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发现与研究，最早始于上个世纪的30年代，1932～1949年间，主要是由俄罗斯和日本学者来华做了零星的考古调查和发掘。有规模、系统性发现和研究则是在1949年以后由我国考古工作者担当的。辽宁喀左鸽子洞旧石器遗址的发现等为该地区旧石器考古文化的研究揭开了序幕。之后辽宁省境内的考古，基本建立起了从早到晚的旧石器文化发展序列。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旧石器考古的发现与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丰硕成果。重大的发现有辽宁的金牛山遗址、小孤山遗址；黑龙江的阎家岗房址遗迹、阿城交界早期洞穴遗址；吉林的寿山仙人洞遗址等。出版了《庙后山》、《阎家岗》等发掘报告以及专题研究文章。开展了旧石器文化、古人类化石、古环境和年代学等方面的综合研究，尤其在模拟实验考古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果。

二、旧石器早期文化遗存

该遗存在东北地区发现的比较少，仅有四处，均为洞穴类型遗址。



1. 金牛山人遗址（下层）。

该遗址位于辽宁省营口县永安乡西田村西侧金牛山的洞穴内，地理坐标为北纬40°34′，东经122°30′。该遗址发现于1942年，1974～1994年进行了九次发掘。知金牛山人已懂得用封火法保存火种。在6层发现人类化石54件，有头骨、脊椎骨和部分肢骨。① 共发现石制品237件，以脉石英为主要原料，工具类型简单，以小型为主，加工粗糙。遗址年代经铀系法测定为距今23万年至30万年。

2. 庙后山遗址（下层）。

位于辽宁省本溪县山城子乡山城子村东庙后山南坡的洞穴内。1978年发现，1979年和1980年进行了系统的发掘，1982年和1983年开展了多学科综合研究，出版了《庙后山》专著报告。② 地层从下至上分为八层，4～7层有文化遗存，其中7层属于更新世晚期，属于早期的4～6层有丰富的动物化石，文化遗存有灰烬层、石制品、骨制品，还有人类化石。石制品独具特色，以石英砂岩砾石为主要原料，碰砧法打片为主，工具类型简单，以砍砸器为主，无小工具等，是以大工具为主体的石器工业。

三、旧石器中期文化遗存

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的分布范围已经到达北纬41°15′～43°48′，东经119°50′～127°20′，由于工作开展得不够，发现的遗址或地点不多。

1. 鸽子洞遗址。

位于辽宁省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水泉乡瓦房村，大凌河西岸的洞穴内。地理坐标为北纬40°15′，东经119°50′。该遗址经过

① 吕遵谔：《金牛山猿人的发现和意义》，《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2期，第109～111页。

② 辽宁省博物馆等：《庙后山——辽宁本溪市旧石器文化遗址》，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

1965年、1973年和1975年三次发掘，[①] 共获得石制品270余件，工具类型简单，以刮削器为主，还有少量的尖状器、雕刻器和砍砸器等，工具以中小型为主，属于小石器工业类型。还有人工打击的碎骨片以及用火遗迹等。除此之外，还发现有人类化石，经研究认为是晚期智人。其文化年代应属于中期的晚期或者更晚。有动物化石22种，有部分绝灭种属，以羊为狩猎对象，由于岩羊和披毛犀的存在，当时气候比较寒冷。

2. 蛟河砖厂地点。

位于吉林省蛟河市北约6公里的拉法河二级阶地上，埋藏在红褐色的黏土层中。地理坐标为北纬43°48′，东经127°20′。1991年发现，并获得石制品6件，均为大型，最具特色的是两面加工的手斧。出有大量的动物化石，但是种类单一，最多的种类有松花江猛犸象。

四、旧石器晚期文化遗存

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存较前两期有了较大的发展，已经分布到北纬39°41′～53°20′，东经119°15′～127°33′。基本囊括了整个东北地区。遗址或地点32处，经过正式发掘的地点16处，在石器的加工方面，出现了间接打击技术和特殊的细石器；骨器出现了磨制的骨针和鱼鳔等；还出现装饰品和钻孔技术。旧石器晚期遗存相对较多，这里仅举若干例。

1. 前阳人遗址。

遗址位于辽宁省丹东市东沟县前阳乡白家堡村附近的洞穴内，坐标为北纬32°15′，东经124°0′。1982年发现并在同年进行了试掘。[②] 洞内堆积自上而下共分为四层，动物化石以及文化遗存均埋

① 鸽子洞发掘队：《辽宁鸽子洞旧石器遗址发掘报告》，《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5年第13卷第2期，第122～136页。

② 林一璞等：《辽宁省丹东地区旧石器末期人类化石的发现》，见《辽宁省本溪地区考古学术讨论文集》，1985年。



藏在第三层黄褐色亚黏土含角砾层中。石制品仅有两件。人类化石有头盖骨、下颌骨各一具，还有部分牙齿，最少代表两个青少年女性个体，属于晚期智人。

2. 寿山仙人洞遗址（上层）。

仙人洞位于吉林省桦甸市榆木桥子镇寿山村的寿山上，地理坐标为北纬43°9′，东经126°37′。1991年发现并试掘，[①] 1993年正式发掘。属于上文化层的层位只有第二层，发现有磨制骨锥1件，黑曜石的舌形器1件，还有少量的石制品和动物化石等。经年代测试距今为34290±510年。

3. 昂昂溪遗址。

该地点位于齐齐哈尔市东南18公里。地理坐标为北纬47°02′，东经123°53′。1981年发现，1982年发掘，1986年调查时又发现两处新地点。文化遗存均出在同一层位，因时代相同而合并研究。共获石制品128件。该文化是以小石器为主体兼有细石器。还发现有一件骨制品，以及少量灰烬、烧骨和动物化石。经碳-14测定结果为距今11800±150年。[②]

4. 小孤山遗址。

洞穴遗址位于海城市孤山乡村东南海城河右岸的山坡脚的洞穴内，地理坐标为北纬40°34′，东经122°58′。1981年发现，1983和1990年进行了两次正式发掘，[③] 发现的石制品1万多件，几乎全部以脉石英为原料，工具类型较多，其中刮削器数量最多，存在较多的钻具的是其一大特色，更引人关注的是出土磨制的骨器和装饰品，

---

① 陈全家等：《吉林桦甸寿山仙人洞遗址试掘报告》，《人类学学报》1994年第13卷第1期，第12～19页。

② 高星：《昂昂溪新发现的旧石器》，《人类学学报》1988年第7卷第1期，第84～88页。

③ 张镇洪等：《辽宁海城小孤山遗址发掘简报》，《人类学学报》1985年第4卷第1期，第70～79页。

在东北还是首次发现，整个文化与北京猿人遗址和山顶洞遗址的关系密切。

此外还有金牛山遗址、古龙山遗址、抚松仙人洞遗址、闫家岗遗址、呼玛十八站地点等。

五、文化类型及发展关系

从目前东北地区旧石器文化遗存的总体特征和分布规律来看，可将该地区的旧石器文化遗存分成三个大的工业类型：一是以庙后山遗址为代表的大石器为主体工业类型。主要地点有蛟河新乡砖厂、抚松仙人洞遗址、饶河小南山等。该工业类型最突出的特点是：打片技术除采用锤击法外，还使用碰砧法；工具修理简单，加工粗糙，砍砸器在工具组合中所占比例较高，整体器型较大。二是以金牛山遗址为代表的小石器为主体的工业类型。主要分布在中部的丘陵地带。重要的遗址或地点有小孤山、榆树周家油坊、鸽子洞和闫家岗等。打片以锤击法为主，偶尔使用砸击法，而不见碰砧法。工具以刮削器为主，其次是尖状器，而砍砸器数量极少，工具修理较精致，以中小型为主，并出现了磨制骨器和装饰品。三是以大布苏地点为代表的细石器工业类型。主要分布在西部草原地带。重要地点有昂昂溪大兴屯、呼玛十八站等。打片技术除了锤击法和砸击法外，还使用了间接打片技术。出现了楔性石核等。工具采用了压制修理法。在工具类型上以刮削器和尖状器为主，出现了复合工具，整个器型加工规整，大部分工具非常细小。

从上述三种工业类型的发展关系看，第一和第二工业类型从旧石器时代早期至晚期末就一直存在并行发展，而第三工业类型从旧石器时代晚期才开始出现，可能是从第二种工业类型中派生出来，并同时发展。在二、三种工业类型之间还存在着中间的过渡类型。比如凌源西八间房，主要以小石器工业为主，但也有细石器工业的因素等。三种工业类型的存在，可能与当时的地理环境有关，由于环境的不同而产生了不同的经济类型，从而产生了不同的石器工业。



东北地区与华北地区的旧石器文化特征相比，有许多相同。例如，石片加工技术多采用锤击法，偶尔使用砸击法和碰砧法；工具以片状毛坯为主；其修理多采用锤击法；修理方式以劈裂面向背面加工为主等。证明二者在文化上有一定的渊源关系。（陈全家）

第二节　东北新石器时代考古

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的调查和发掘始于解放前，重要的考古发现是1930年梁思永在齐齐哈尔昂昂溪五福地点发掘的墓葬。其后把以墓葬为代表的新石器考古遗存称为昂昂溪文化。[①] 1935年，日本人在赤峰红山后第二住地进行发掘，被原报告称之为赤峰第一期文化的遗存，后来我国学者命名为红山文化。

解放后，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有了较大发展，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和发掘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这期间在辽西地区发现小河沿文化；在辽东地区发现小珠山下、中、上三个考古文化；在下辽河地区发现新乐下层文化；在黑龙江省三江平原地区发现新开流文化。80年代以后发现的考古文化有辽西地区的兴隆洼文化[②]和赵宝沟文化[③]等。其中对兴隆洼聚落遗址的大面积揭露和红山文化女神庙、祭坛、积石冢的重大考古发现，进一步证实了东北是我国远古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并为探讨我国古代文明起源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

① 梁思永：《昂昂溪史前遗址》，《梁思永考古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58～90页。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5年第10期，第865～874页。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敖汉旗赵宝沟一号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8年第1期，第1～6页。

一、各地文化遗存概况

辽河沿岸的辽西地区文化遗存较多。

1. 兴隆洼文化。

陶器以深腹筒形罐和钵为主，有少量盆、圈足碗、小杯和盅等。筒形罐数量最多。骨器种类较多，常见的有锥、匕形器和单排倒刺镖等。见有一种复合工具，系用长条形小石片嵌粘在骨一侧的凹槽内，使之成为骨柄石刃刀或镖。玉器发现有数十件之多，种类有玦、匕形器、管、斧和锛等。这是迄今我国所见年代最早的玉器。聚落址一般保存比较完整，规模大，房址发现数量多。房址为半地穴式建筑，在有的房址内还挖有窖穴或墓葬。

在查海遗址[①]聚落中心有一小广场，广场内用较均等的红褐色石块堆塑一龙形，是为中国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石龙，距今约七千年以前。

2. 赵宝沟文化。

陶器以深腹筒形罐为主，其他器类有碗、钵、尊形器、盘、盂、盆和陶塑人头等。最具特色的是在尊形器上所施纹饰分别为猪、鹿和鸟首。[②] 石器有磨制、打制和压削三种，以磨制石器为主。骨、蚌器发现较少，仅见骨锥及骨或蚌质的陶器纹饰压印工具。房址发现数量不多，都是半地穴式建筑，平面呈方形、长方形或梯形。室内中部或偏向一侧设有方形或圆形灶，有的房屋居住面呈二级阶梯状，灶位在高居住面上。不见门道。

3. 红山文化。

陶器主要有夹砂陶和泥质陶，极少量灰陶和黑陶。器类有筒形

---

①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阜新查海遗址 1987—1990 年三次发掘》，《文物》1994 年第 11 期，第 4～19 页。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敖汉旗小山遗址》，《考古》1987 年第 6 期，第 481～506 页。



罐、鼓腹罐、钵、红顶碗、碗、壶、斜口器、盆、瓮、镂孔瓶形器、器盖、器座和筒型器等。

玉器的确认是红山文化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不仅数量多，种类丰富，且造型独特，在北方地区的诸新石器考古文化中，红山文化的玉器独树一帜。玉器种类极多，从以上玉器的功能看：既有生产工具和纺织用具，亦有陪饰、装饰品和各类鸟兽，而尤重要的是玉璧和玉龙的发现，玉璧当是用于祭天礼地的礼器，玉龙则可能是当时人们的最高崇拜物。

牛河梁第二地点①积石冢内共发现16座墓，第三地点积石冢内发现10座墓，这些墓的特点是排列密集，见有两墓相连共用一壁的现象，墓室均为石板或石块垒砌而成，室内侧较平整，盖由大石板或石块多层覆盖，有的在墓底铺板石，室内葬一人或多人二次葬成堆放置。随葬品中不见陶器，只随葬玉器。

在东山嘴遗址②发现有大型祭坛，其中心部分为一座大型方形基址，基址四边均砌石墙基，外侧较平整。基址内有三堆石块，最大者略呈椭圆形，由密排立置的长条石组成。基址内发现有玉璜、双龙首玉璜、石弹丸和骨器。遗址内发现陶塑人像肢体20余块。整个遗址是一个公共活动的场所；祭坛的建筑规模，不会是一般的宗教活动场所，它很可能是属于整个部落或若干村寨居民的祭祀活动场所；妇女是作为崇拜的神像，和当时人们祈求生育和丰收的原始宗教信仰有密切的关系。③

牛河梁女神庙位于辽宁陵源、建平两县交界处。女神庙是由一

---

①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第8期，第1～17页。

② 郭大顺、张克举：《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建筑群址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11期，第1～11页。

③ 俞伟超、严文明等：《座谈东山嘴遗址》，《文物》1984年第11期，第12～21页。

个多室和一个单室两组建筑组成。头部残块高 22.5 厘米、脸面宽 16.5 厘米，相当于真人大小，额顶发髻起棱，耳长圆，眼内嵌圆形玉片为睛，炯炯有神，面涂红彩。有研究指出，女性塑像的性质与东山嘴祭坛的妇女塑像一样，是以女神为主要祭祀对象，是已被神化了的祖先的形象。①

红山文化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冢的发现，反映出这一时期的宗教信仰和祖神崇拜在人们的心灵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辽河下游地区有新乐下层文化。② 陶器以夹砂红陶、红褐陶、灰褐陶为主，器类有深腹筒形罐、圈足钵、碗和斜口器等。木器发现有鸟形木雕和墓雕制品，原报告认为鸟形木雕器很像是权杖，直柄以上的雕饰可能是图腾徽帜。

辽东地区则可举小珠山下、中、上层文化。小珠山下层文化的陶器以夹砂红褐陶为主，以直口深腹筒形罐为主，其次为侈口深腹筒形罐和小口鼓腹罐，个别筒形罐腹上安有对称耳。小珠山中层文化③陶器以夹砂红褐陶和红陶为主，陶器种类较多。小珠山上层文化④陶器以夹砂黑褐陶为主，陶器种类繁多。

第二松花江流域及周邻地区。有以夹砂灰褐陶为主的左家山一、二、三期文化，⑤ 有分别以砂质红褐陶器和黑褐陶器为主的断梁山一、二期文化遗存。此外还有腰井子遗址、靶山墓地等文化遗存。

---

① 孙守道、郭大顺：《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头像的发现与研究》，《文物》1986 年第 8 期，第 18～24 页。

② 沈阳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沈阳新乐遗址试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 年第 4 期，第 449～466 页。

③ 辽宁省博物馆等：《大连市郭家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4 年第 3 期，第 287～330 页。

④ 辽宁省博物馆等：《长海县广鹿岛大长山岛贝丘遗址》，《考古学报》1981 年第 1 期，第 63～110 页。

⑤ 吉林大学考古教研室：《农安左家山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9 年第 2 期，第 187～212 页。



嫩江中下游地区昂昂溪文化,[①] 陶器有夹砂陶和泥制陶两种,器类有罐、钵、带流钵、盘、杯和瓮等。罐多为筒形罐,也见有小口罐腹罐或圆底罐。

三江平原地区新开流文化,[②] 陶器质料主要是夹砂褐陶。陶器种类少,仅见罐、钵。这里的考古学特色是鱼窖共发现10个,有圆形和椭圆形两种。从窑穴内排列整齐层层相叠的鱼骨和成片相连的鱼鳞判断,窑穴是用于储藏鲜鱼的。

牡丹江地区则有亚布力遗址、莺歌岭遗址下层文化遗存。

二、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的发展阶段与文化区系

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的发展阶段在各地区是不尽相同的,从目前的考古发掘资料看,辽西地区、辽东地区和吉林省境内第二松花江流域的考古文化的序列较清楚。依据各地区考古文化的序列,结合碳-14测定年代数据,大体上可将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分成早、中、晚三个发展阶段。

早期阶段包括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新乐下层文化、校长山下层文化、后瓦下层文化及左家山一、二期文化,年代上大体相当于距今6000～8000年前后。

中期阶段包括红山文化、富河文化、小珠山中层文化、后洼上层文化、左家山三期文化、昂昂溪文化和新开流文化,年代约在距今5000～6000年前后。

晚期阶段包括小河沿文化、偏堡子文化、小珠山上层文化和莺歌岭遗址下层、年代大体上相当于距今4000～5000年前后。

---

① 属于该文化的遗址目前较多,但较大规模的发掘是滕岗子遗址。见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黑龙江省考古工作近十年的主要收获》,《文物考古工作十年》,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84～90页。

②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队:《密山县新开流遗址》,《考古学报》1979年第4期,第491～518页。

早中晚三个阶段的诸考古学文化，在同一发展阶段的不同区域内，既存在着共性，有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而同一区域内的不同考古文化之间都保持着某种发展演变关系，由此构成东北，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的框架体系。(陈国庆)

第三节　东北青铜时代考古

一、东北青铜时代考古概况

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对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的探索，首先是能够把一些广泛使用石器生产工具并已出现青铜冶铸技术的考古遗存，从过去认识的“石器时代之文化”中分离出来；[①] 同时，战国以前墓葬中出土的不同于中原式的青铜器，以及野外调查采集标本所显现出的复杂文化内涵，也提示人们这里可能存在着年代更为久远的金属文明。[②] 60年代初，由于赤峰附近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发现，使这项探索性的工作取得了重大突破。[③] 其后，东北地区青铜时代考古工作的全面展开。随着区域考古文化研究的深入，已初步建立起了东北青铜文化的年代框架与谱系结构。

根据对青铜器铸造工艺、技术水平和生产规模的衡量及对考古

① 贾兰坡：《吉林西团山古墓之发掘》，《科学通报》1950年第1卷第8期，第573～575页。东北考古发掘团：《吉林西团山石棺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4年第1期，第29～50页。

② 李逸友：《内蒙昭乌达盟出土的铜器调查》，《考古》1959年第6期，第276～277页。朱贵：《辽宁朝阳十二台营子青铜短剑墓》，《考古学报》1960年第1期，第63～72页。锦州市博物馆：《辽宁锦西县乌金塘东周墓调查记》，《考古》1960年第5期，第7～9页。

③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发掘队：《内蒙古赤峰药王庙、夏家店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2期，第77～81页。



文化发展规模的认识，可将东北青铜时代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夏至早商的初始阶段、商末周初至春秋时期的全盛阶段和战国时期的终末阶段。

考古资料证明，东北冶铜术的发明可追溯到距今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晚期，夏至早商时期，在辽河以西到燕山山地以南的农业聚居区首先发育形成了东北最早的青铜文化。稍后，在下辽河北部和辽东半岛南端沿海地区，也出现了使用金属铜和掌握冶铜技术的考古学文化。

辽西区，分布的是夏家店下层文化，根据同一时期不同地域遗存的差异，可分为西辽河、海河北和壶流河三个地方类型。已测定的碳-14年代数据有近80%的几率落在距今3400～3900年之间，[①]相当于中原夏至早商阶段。辽北区的高台山文化，以柳河为分布中心。早期受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影响，晚期则表现出向辽西地区拓展的趋势。辽东半岛基本以碧流河为界分成南北两个亚区。北部的庙后山文化集中分布于太子河上游，年代上限可追溯到商代之前。半岛南端，约从距今3500～4000年间出现的是双砣子下、中层文化，它们分别与山东半岛的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有密切的交往关系。东北是我国最早发明冶铜术的地区之一，但东北地区的早期青铜文化尚欠发达。

商末周初时期，来自河套及鄂尔多斯高原的牧业及半农半畜牧部族，对分布于渤海西北沿岸的农业文化造成了很大的破坏。辽西地区曾一度发达的夏家店下层文化被中断，兴起于下辽河北部的高台山文化也在迁徙和分化中消亡。目前已识别的考古学文化有魏营子类型、新乐上层文化、顺山屯类型。辽东地区北部的庙后山后期文化和半岛南端的双砣子上层文化，则因较少受到东渐畜牧文化流的冲击，在各自区域内按自身的文化轨迹得以平稳的发展。这一时

① 《中国考古学中碳十四年代数据集（1965—1991）》，第25～28、55、56、66～68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

期东北青铜时代发展阶段的主要特点是，辽西地区包括下辽河北部在激烈冲突中的文化变异和辽东地区在平稳过渡中的协调发展共存，并由此呈现出错综复杂、谱系多元化的考古学文化分布格局。

这一时期，集中发现在喀左境内的商周式窖藏青铜器和分布于辽西地区的北方式青铜武器、工具、装饰品等，除属于商周和北方畜牧部族传入或携带的舶来品外，也不乏一定数量具有地方特征的青铜制品。① 此期东北青铜铸造业有了迅速的发展，重要标志是工艺水平的普遍提高和对青铜容器铸造技术的掌握。

西周中至春秋时期，至少存在四支已确认的考古学文化，即：在上一阶段以北方式青铜器代表的文化流悄然退去后，重新占据辽西地区的以定居农业为主要生活方式兼有相当畜牧业成分的夏家店上层文化；覆盖于下辽河以东到辽东半岛南端广大地区，至西周晚期进入大小凌河流域的以曲刃青铜短剑为特征的文化；形成于第二松花江流域的西团山文化和分布在松嫩平原的白金宝文化。这一时期的考古文化既在区域性特征方面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又在文化的渊源上反映出内在的联系与亲缘性，由此构成较先前阶段不同的东西两大文化系统的基本分布格局。

自上一阶段在北方式青铜器为代表文化的冲击与作用下，最迟从商代晚期起又直接或间接地接受了中原制铜工艺的影响，进而迅速地推进了本地青铜铸造业的发展。这一时期在林西大井发现了集开采、冶炼、铸造于一体的大型铜矿场，并使用多种形式的炼炉和鼓风设备，② 此间青铜器的种类和数量明显增加，尤其是一批仿陶

---

① 集中发现于辽宁喀左县境内的商周窖藏青铜器，先后出土 6 批，计 65 件。1941 年咕噜村出土 1 件；1955 年马厂沟出土 16 件；1973 年北洞村同一地点先后发现 2 批，共 12 件；1974 年山湾子村出土 22 件；1979 年小波汰村出土 14 件。

② 辽宁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辽宁林西县大井古铜矿 1976 年试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7)。



铜容器的出土代表了当时东北青铜铸造的最高水平，特征鲜明的青铜器已成为各区域考古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冶铜术和青铜器向北传播，除早期青铜文化传统分布区域外，第二松花江流域、松嫩平原等地区已孕育形成了新的青铜文化。这一时期无论是从青铜器的铸造技术、生产规模或是时空所涵盖的文化内容而言，都是东北青铜文化发展的全盛时期。

战国时期（上限一般不会早于春秋晚期），除辽西地区的夏家店上层文化被重新占据这一地区的北方游牧部族所取代，其他区域的考古文化仍得以继续发展。辽河以东以分体式曲刃短剑为代表的文化进一步发展，其势力范围除大小凌河流域外，还扩展到吉林东南部和朝鲜半岛。在东北北部地区，西团山文化可延续到战国中晚期，但受中原文化影响，西团山文化的传统习俗正在发生改变。嫩江流域继白金宝文化之后出现的是汉书文化。通过对松嫩平原陶鬲的类型学研究，可以认定汉书文化主要是继承白金宝文化发展而来的，同时有迹象表明，还有部分文化因素来自大兴安岭西侧。

战国晚期，燕在东北南部地区建立政治统治及其势力的发展，对东北古代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东北铁器的出现，铁器时代的到来是与这一历史背景相联系的。虽然从第一件铁质生产工具铸造到推广使用，还要经历不短的时间。但从严格意义上讲，它已预示着铁器作为反映人类物质文化进程中一个时代的到来。

二、东北青铜时代考古区域系统

东北青铜文化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区域间考古文化的扩张收缩、消长变异及相互关系是错综复杂的。

辽西地区，在东北青铜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始终起着领先和突出的作用。考古发现与研究表明，该地区的青铜文化至少可以区分为两个以上的文化谱系。夏家店下层文化是在本地区新石器文化基础上形成，并吸收了包括二里头、先商、岳石等多种文化成分

而发展起来的一种青铜文化。[1] 由于其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又不断地把周邻较发达青铜文化的精华汇聚于一体，所以成为当时东北发展水平最高，并首先进入青铜文明的考古文化。继夏家店下层文化之后，依努鲁儿虎山为界，辽西地区存在着两个文化发展系统。西部的夏家店上层文化主体成分来自下辽河北部的高台山文化，在形成中又明显吸收了北方草原游牧文化的因素，并呈现出沿大兴安岭一侧向南北两个方向发展的趋势。[2] 西周晚至春秋早期，进入宁城附近的一支出现了显著的权力与财富集中的现象。随着与中原文化的不断接触，一个凌驾于氏族组织之上的权力机构业已产生，由此成为夏家店上层文化的中心地区。东部见于大小凌河流域的魏营子类型和曲刃短剑墓遗存，通过文化因素分析共有成分表明，其间存在着内在的文化联系。最新的研究认为，它们是独立于夏家店上层文化，并与夏家店上层文化有着平行发展关系的另一个文化系统。[3]

辽东地区的早期青铜文化首先发生于半岛的沿海南部地区。伴随双砣子系统文化沿黄、渤海沿岸向辽东纵深地带推进并与庙后山文化汇聚，加速了辽东青铜文化发展的“一体化”进程。正是在这一文化背景和谱系关系基础上，产生的以柱脊曲刃剑身，丁字形剑柄和分体组装为特点的青铜短剑，是东北青铜时代最具特征的考古遗存。这种短剑所代表的文化，最初兴起于辽东北部的山地区。全面发展后，向西占据了大小凌河流域并越过努鲁儿虎山渗透到辽西

---

① 王立新等：《夏家店下层文化渊源刍论》，《北方文物》1993 年第 2 期，第 5～16 页。

② 朱永刚：《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初步研究》，见《考古学文化论集》（第一辑），第 99～128 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 年。朱永刚：《论高台山文化及其与辽西青铜文化的关系》，见《中国考古学会第八次年会论文集》，第 139～156 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 年。

③ 朱永刚：《大、小凌河流域含曲刃短剑遗存的考古学文化及其相关问题》，见《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二辑），第 362～374 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 年。



腹地；向北进入到吉林东南部的长白山地及延伸地带；向东在鸭绿江上游及相毗邻的朝鲜西北部地区亦有发现。从这种短剑的分布与发展趋势可以看出，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前后，其向东北方面的扩展要大于向西的流布。

位于辽西与辽东两大文化区块接触地带的下辽河流域，考古学文化面貌往往呈现出既此既彼的特点。然而就主要发展阶段的区系特征来看，魏营子类型以前与辽西文化区块的联系较为紧密；魏营子类型之后，由于以曲刃青铜短剑为代表文化的西渐，而成为辽东文化区块的有机组成部分。事实上包括辽西大小凌河在内的这样一些中介地区，还因受到中原商周文化的影响和来自内蒙古长城地带文化流的反复撞击，而使考古学文化面貌表现得更为错综复杂。

分布于第二松花江流域的西团山文化和松嫩平原的白金宝文化和汉书文化，是东北地区较晚形成的青铜文化，年代下限可能已进入早期铁器时代。它们在各自显示出区域性文化特征的同时，还表现出文化渊源和谱系方面的内在联系。具体地说，前者与辽东青铜文化存在着相承袭的文化传统和亲缘性；后者与辽西青铜文化有着更多的共同点和相近似的文化成分，由此构成东北青铜时代考古文化东西两大文化区系。

东北青铜文化自身的发展过程表明，它不是在一个地区一次发生的，而是在不同地区先后形成的，不是单元一体的连续发展不断外延的向心体系，而是多元异体根植于不同区域文化相互作用与激发的多重结构。这一结构体系的形成从内容和形式上揭示了东北古代民族的历史进程，也奠定了战国秦汉时期东北古代民族分布的基本格局。（朱永刚）

第四节　战国秦汉时期考古

战国秦汉时期的东北地区存在着以燕文化、秦文化、汉文化为

代表的中原文化和包括秽貊、夫余、乌桓、鲜卑、沃沮、挹娄、高句丽等民族在内的土著文化。本节着重就土著文化部分进行叙述，其中秽貊、鲜卑、高句丽另有章节介绍。

中国东北地区战国秦汉时期土著文化的考古工作基本是在建国以后开展起来的。20 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主要是对土著文化遗存的发掘报道，其中西岔沟墓地是比较重要的发现。进入 80 年代以后，续有泡子沿前山遗址、老河深中层墓地、东宁团结遗址、蜿蜒河类型、滚兔岭类型的重要发现报道，而且族属问题引起了学者的特别关注，目前学界对于夫余遗存、沃沮遗存、挹娄遗存在已经有了倾向性认识。同时在境外地区亦有俄罗斯滨海地区的克罗乌诺夫卡文化、波尔采文化和朝鲜咸镜北道的会宁五洞遗址等重要发现。

一、夫余文化遗存

夫余在西汉初年出现于史籍，西汉后进入全盛时期，东晋时期西迁，势力逐渐衰落，北魏太和八年（494 年）被勿吉所逐而降于高句丽。目前考古文化比较清楚的是汉魏时期立国于“秽城”的夫余本部。

约在西汉初年西团山文化衰落之后，吉长地区出现了泡子沿类型、汉陶遗存、田家坨子类型、黄鱼圈珠山 1 号墓等几类考古遗存。[①] 一般认为泡子沿类型和汉陶遗存是夫余的考古遗存。

泡子沿类型以吉林市泡子沿前山遗址的上层遗存[②]而得名，其分布区基本可以与西团山文化相重合。陶器多为红褐色的夹砂粗陶，器壁厚重，基本为素面，手制，多采用泥圈套接的方式，流行横桥状耳和瘤状耳，以壶、罐、豆、瓮等为主。年代约在战国晚期至

① 乔梁：《吉长地区西团山文化之后的几种古代遗存》，《辽海文物学刊》1993 年第 2 期，第 64～73 页。

② 吉林市博物馆：《吉林市泡子沿前山遗址和墓葬》，《考古》1985 年第 6 期，第 497～507 页。



西汉。

老河深中层墓葬①是泡子沿类型的墓地，位于吉林省榆树县老河深村南的第二松花江北岸。以单人葬为主，其他多为男女异穴合葬。下葬时有轻度火烧的现象，有些墓葬的填土中有马牙，还有放置马头的葬坑。随葬品有壶、豆、罐等陶器，剑、矛、环首刀等兵器，铁工具、马具和铜镜、神兽牌饰等装饰品，年代约在西汉末年至东汉。

泡子沿类型直接继承西团山文化，有一定范围的分布地域，以吉林市郊分布最为密集，年代在两汉时期，因此最有可能是汉代夫余的遗存。至于汉陶遗存或者是流入夫余境内汉人的遗存，或者更有可能是夫余受到汉文化的强烈影响，是从汉人地区流入或仿制的产品，是夫余有机吸收的外来文化因素。

多数学者认为汉魏夫余的中心秽城在吉林市郊的东团山、龙潭山一带，这里遗物分布比较密集，并且多次发现过汉式墓葬和汉式遗物。在东团山的东南缓坡台地上座落着“南城子”城址，② 城垣略近圆形，正西面利用团山东麓，东南部分残垣尚存，城外有护城沟堑，城垣周长（除西壁利用团山东麓外）1050 米。城址有南北两门，城内地势不平，散布花纹砖和汉式灰陶的瓮、罐、豆残片和土著式粗褐陶的瓮、豆、甑、鼎、鬲残片。

二、沃沮文化遗存

沃沮是战国秦汉时期东北地区的土著民族，在文献记载中出现过沃沮、东沃沮、北沃沮、南沃沮等名目，有些学者认为东沃沮是沃沮别称，包括北、南两部分沃沮，有时又仅指南沃沮。目前学术

---

①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榆树老河深》，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 年第 1 版。

② 武国勋：《夫余王城新考》，《黑龙江文物丛刊》1983 年第 4 期，第 35～42 页。

界一般认为团结—克罗马诺夫卡文化是沃沮的考古遗存。①

团结遗址位于黑龙江东宁县大肚川公社，以团结遗址下层为代表的一类遗存称为团结文化，典型遗址还包括黑龙江东宁大城子、吉林珲春一松亭、汪清新安间上层等。同类遗存在俄罗斯境内被称为“克罗乌诺夫卡文化”，在朝鲜东北部亦有发现。团结—克罗乌诺夫卡文化大致分布在绥芬河流域和图们江流域以及这两条河流入海口两翼的海岸地带。

团结文化的陶器以夹砂褐陶为主，火候不高，颜色斑驳，手制，多是泥圈套接成型，造型规整，多为素面。高圈足豆、柱把豆、圆柱耳深腹小底瓮、圆柱耳小底罐、甑等是最有特点的陶器，敞口或微敛口的罐、盆、碗、钵、杯比较流行。磨制石器包括刀、斧、锛、镰、镞、矛等，铁制工具包括斧、镰、锥等。房址为长方形或方形半地穴式，分布密集，排列有序。一般为南北向，有的有斜坡门道，居住面和四壁均用火烧烤，有些四壁镶有木板，面积从三、五十平方米至近百平方米不等。在俄国的克罗乌诺夫卡文化遗址中发现有陶鼓风管、陶坩埚和猪、牛、狗、马等家畜骨骼。年代约在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1世纪。

另外在牡丹江中上游地区分布着以黑龙江宁安县东康遗址为代表的东康类型，有些学者称其为团结文化东康类型，另外有些学者则认为东康类型应该明确与团结文化相区别。

汉代曾经在团结—克罗乌诺夫卡文化的分布区内设置过郡县。元封四年（前107年）设置朝鲜四郡，其中玄菟郡最初的郡治即在沃沮县。昭帝始元五年（前82年）以后乐浪郡东部都尉所属岭东七县中的夫租县就是前玄菟郡首县沃沮县。朝鲜平壤贞柏洞1号墓出有“夫租薉君”银印，2号墓出有“夫租长印”和“高常贤印”两颗银印，随葬器物包括细形铜剑、细形铜矛、铜车马器、铜铃、铁剑、

① 林沄：《论团结文化》，《北方文物》1985年第1期，第8～22页。



铁矛、铁刀、漆案、陶壶等。[①] 这些遗物对研究与沃沮有关的历史地理和民族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三、挹娄文化遗存

先秦时期屡见于史籍的肃慎至汉魏时期被称为挹娄。

俄罗斯境内的波尔采文化分布在黑龙江中游以下沿岸，直达海口，并向南到达滨海边区。这类遗存在我国黑龙江省三江平原，以绥滨县新城镇东蜿蜒河西岸台地上的典型遗址而称为蜿蜒河类型，[②] 同类遗址还有黑龙江中游萝北县三马架，乌苏里江下游抚远县海青等，其分布区北抵黑龙江中游沿岸，西至佳木斯以东，南达友谊县以北。中国学者认为铁器相当发达的波尔采文化的年代大体相当于汉晋时期。

波尔采文化的房址为半地穴式，普遍发现储藏的粟，有家畜，有纺织业，仍有石镞等石器，陶器中始终未发现豆类器，与《三国志》有关记载相符。因此有些学者提出波尔采文化—蜿蜒河类型是挹娄的考古遗存。[③] 另有学者认为挹娄"所在多山险"，与波尔采文化—蜿蜒河类型主要分布在平原地区不尽相符，提出黑龙江中游三江平原西南部的滚兔岭类型是文献记载中的挹娄遗存，但同时承认滚兔岭类型与波尔采文化—蜿蜒河类型陶器有较多的相似性，它们应该是广义上挹娄民族的考古遗存。[④]

蜿蜒河类型的陶器以夹砂红褐陶居多，陶质粗糙，火候不高，手制。纹饰以方格纹、指捺纹、凸弦纹、波浪纹、附加堆纹最为突

---

① 佟柱臣：《"夫租薉君墓"银印考》，见《中国考古学会第六次年会论文集》，第128～135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

② 谭英杰等：《黑龙江区域考古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

③ 林沄：《肃慎、挹娄和沃沮》，《辽海文物学刊》1986年第1期，第54～57页。

④ 贾伟明等：《论挹娄的考古学文化》，《北方文物》1989年第3期，第24～28页。

出。主要器类有附加堆纹盘口罐、敞口短颈罐、喇叭口碗、红衣壶等。房址为方形半地穴式，门道东南向，坑底铺草拌泥，烧烤成硬面，有柱洞和灶坑。波尔采文化的陶器与蜿蜒河类型相近，出土有角状把手罐，铁器包括镞、锛、鱼钩、刀、剑及甲片等，发现有以30～40座房子组成的村落。

以双鸭山市与集贤县交界的滚兔岭遗址而得名的滚兔岭类型分布在张广才岭以东，南达鸡西、林口，北至桦川、友谊。城堡分布密集，一般呈圆形或椭圆形，不甚规整，有些选择在险要地势的最高处筑城，掘壕起墙成为城垣，其内密布半地穴居址；有的在城堡中心筑高土台，其上有半地穴居址。居址多数为圆角方形，面积为约10米、8米、5米见方几种。陶器分为夹砂黄褐陶和夹砂红褐陶两类，手制，素面为主，以角状把手罐为突出特征。铁器有刀、镞、甲片等，不见用于农业。石器有石刀、磨盘、砺石等。

在上述夫余、沃沮、挹娄文化遗存之外，学界对其他一些重要文化遗存的族属尚有不同认识。这里面比较重要的是位于辽宁西丰县的西岔沟墓地。① 有些学者认为它是乌桓的遗存，另外有些学者认为它是匈奴统治下的部族，或即鲜卑的遗存。

战国秦汉时期的东北地区，在中原政权郡县广泛设置和土著民族先后兴起的历史背景下，中原文化与土著文化均得到迅速发展，其间的相互影响和交流促进了民族间的融合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

第五节 鲜卑考古

东北地区是东部鲜卑和早期北部鲜卑的主要活动地区，从20世

① 孙守道：《“匈奴西岔沟文化”古墓群的发现》，《文物》1960年第8～9期，第25～36页。



纪50年代末以来对鲜卑遗存的发掘和研究工作逐渐展开。

1959年和1961年报道了对内蒙古呼伦贝尔盟扎赉诺尔300余座墓葬的调查和发掘情况,[①] 其族属开始存在匈奴和鲜卑两种意见。1977年宿白将扎赉诺尔、南杨家营子、二兰虎沟、百灵庙等处地点勾连成线,推测其为拓跋鲜卑的南迁遗迹。[②] 1980年在大兴安岭北段嘎仙洞发现北魏李敞刻石祝文,[③] 证明大兴安岭北部一带确是早期拓跋鲜卑的活动地区,由此认为扎赉诺尔墓地属于东汉时期早期拓跋鲜卑遗存的认识逐渐趋于统一。

1957年在辽宁北票房身村发掘3座石椁墓,1960年发表的简报注意到其中存在的鲜卑文化因素。[④] 1975年在内蒙古哲里木盟发现舍根墓地,1981年发表的报告中明确提出属于东部鲜卑遗存。[⑤] 其后在内蒙哲盟、赤峰地区和辽宁朝阳地区陆续有相似墓葬被发现的报道,多数学者认为这些墓葬属于东汉曹魏西晋时期的东部鲜卑遗存。

朝阳历史上曾是三燕政权的都城龙城,以朝阳为中心的辽西地区三燕墓葬分布比较密集。自1965年在北票西官营子发掘北燕勋贵冯素弗墓[⑥]以来,已经发现三燕墓葬数十座。目前对于三燕时期东部鲜卑墓葬形制、随葬陶器、马具、都城宫殿和体质人类学等方面

---

① 郑隆:《扎赉诺尔古墓群调查记》,《文物》1961年第9期,第16~19页。

② 宿白:《东北、内蒙古地区的鲜卑遗迹》(辑录之一),《文物》1977年第5期,第42~54页。

③ 米文平:《鲜卑石室的发现与初步研究》,《文物》1981年第2期,第1~7页。

④ 陈大为:《辽宁北票房身村晋墓发掘简报》,《考古》1960年第1期,第24~25页。

⑤ 张柏忠:《哲里木盟发现的鲜卑遗存》,《文物》1981年第2期,第430~438页。

⑥ 黎瑶渤:《辽宁北票县西官营子北燕冯素弗墓》,《文物》1973年第3期,第2~28页。

的研究正在深入。近年来对于北魏时期的墓葬、石窟寺、塔基、墓志等也有报道和研究。

根据地域、时代和文化面貌的差别，可将东北地区鲜卑遗存划分成早期东部鲜卑、三燕时期东部鲜卑、早期拓跋鲜卑和北魏时期鲜卑等几组。

一、早期东部鲜卑遗存

早期东部鲜卑是指从西汉初年东胡一支退保鲜卑山至东部鲜卑建立三燕政权这一历史阶段，大至相当于两汉曹魏西晋时期。

早期东部鲜卑遗存的认识始自房身村墓地和舍根墓地。房身村墓地位于辽宁北票县城西南 35 公里，共发现 3 座石板墓，年代约在西晋。舍根墓地位于内蒙哲盟科左后旗茂道吐乡的沙丘中，均为东西向的石椁墓，一般长 1.8～2 米，宽 0.6 米左右，多数为单人葬，头向朝东。随葬陶器、马具、青铜管饰等。陶器以夹砂灰陶的大口鼓腹罐和泥质灰陶的侈口展沿壶为主。舍根墓地文化特征比较鲜明，年代约在东汉时期。继舍根墓地之后，在内蒙哲盟、赤峰地区和辽宁朝阳地区相继发现一批与其文化面貌相似的墓地，其中位于哲盟科左中旗西辽河支流新开河畔的沙丘地带的六家子墓地，① 和位于北票市南八家乡的喇嘛洞墓地②是比较重要的发现。六家子墓地整体面貌与舍根等墓地有所差别，有学者认为可能是源出南匈奴的东部鲜卑宇文部遗存。

早期东部鲜卑的考古学文化特征可以概括为：土坑墓数量较多，石棺墓也有一定数量；墓葬平面多数为长方形，亦有前宽后窄的梯形；部分墓葬中发现木棺或木质葬具；多数墓葬成排分布，但是不

① 张柏忠：《内蒙古科左中旗六家子鲜卑墓群》，《考古》1989 年第 5 期，430～438 页。

② 张克举等：《辽宁发掘北票喇嘛洞墓地》，《中国文物报》1996 年 12 月 22 日。



同墓地的墓向不统一，有的同一墓地墓向亦不统一；陶器以大口弧腹罐、大口鼓腹罐、侈口舌唇壶、侈口束颈壶等为主；殉牲不发达，种类见有羊矩骨、狗头骨、牛腿骨等；动物牌饰不发达。

二、三燕遗存

东部鲜卑建立的三燕政权大部分时间以龙城（辽宁朝阳）为都城，根基在辽西地区，朝阳附近发现的三燕遗存是有代表性的东部鲜卑文化。

已经发现的三燕墓葬约有 40 座，主要包括前燕时期的袁台子壁画墓，李廆墓、奉车都尉墓、大平房村壁画墓和八宝村 1 号墓等，后燕时期的崔遹墓，北燕时期的冯素弗墓、北庙村 1 号壁画墓、北庙村 2 号墓、袁台子墓等。

袁台子壁画墓①位于朝阳市区以南 12 公里。墓室用石板、石条构筑，设置墓道、墓门、耳室和壁龛。主体部分呈长方形，原有木棺。该墓早年被盗。出土有整套马具。墓室壁画内容包括门吏图、奉食图、庭院图、狩猎图、牛车图等。

冯素弗墓位于北票市西北 21 公里的西官营子。石椁结构，墓圹西壁设有龛台，上置陶壶、陶罐，装有牛肋骨、腿骨等。椁室长 4.25 米，宽 1.34～1.53 米，高 1.7～1.75 米。椁盖和四壁绘有彩画，顶部为星象图，壁面仅残存一黑狗图像和一人物头像。墓内有柏木画棺一具，残存有羽人、建筑、人物等彩画。随葬器物达 470 余件，包括釉陶壶、直口罐、侈口罐等陶器，釜、甑、盆、提梁锅、圆案、盒等铜容器，鸭形水注等玻璃器，斧、扁铲、凿等铁工具，剑、刀、矛、镞、甲片等铁兵甲具，出有马镫一副两件。墓内附葬一名儿童。该墓附近还有两座墓葬，其中 3 号墓石椁内绘有壁画，墓主为冯素弗妻妾。这处家族墓地所在的长大山谷应该就是北燕冯

---

① 辽宁省文物工作队等：《朝阳袁台子东晋壁画墓》，《文物》1984 年第 6 期，第 29～45 页。

氏家族的祖茔“长谷”。

三燕墓葬以石椁墓为主，墓向基本朝南，石椁和木棺呈前大后小的梯形。墓圹前设龛，或椁内设祭台。随葬以马具、冠饰和其他装饰品为多，其中三燕马具在中国马具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殉牲中常见有牛腿骨，偶见马骨，狗是殉牲和墓葬绘画中常见的动物。辽西地区发现的东部鲜卑墓葬一般笼统地称为鲜卑墓葬，这其中也可能包括汉族和其他民族的墓葬，但是都受到了东部鲜卑墓葬制度的影响。

三、早期拓跋鲜卑遗存

研究拓跋鲜卑的早期历史主要根据《魏书·序纪》的简略记载，其中提到大鲜卑山是拓跋鲜卑的发源地，推寅皇帝时曾南迁“大泽”，诘汾皇帝时再次南迁至“匈奴故地”。

1980年在内蒙呼盟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西北10公里发现铭刻李敞祝文的嘎仙洞。嘎仙洞位于大兴安岭北段东麓一道高达百米的花岗岩峭壁上，面积约2000平方米。祝文刻在洞内距洞口15米的西侧一处经过修琢的平整石壁上，全文201字，汉字魏书。刻石祝文与《魏书礼志》的记载仅有个别字句不同。嘎仙洞刻石祝文的发现证明早期拓跋鲜卑确实在大兴安岭北部地区活动过，第一次南迁的大泽就是呼伦湖。

扎赉诺尔墓地位于呼伦贝尔盟木图那雅河畔。[①] 均为土坑墓，墓向一般朝北。一般长度在2米左右，宽度不超过1米。绝大多数为单人仰身直肢葬。木棺一般略呈梯形，有些在木棺外四角等处加

① 郑隆：《扎赉诺尔古墓群调查记》，《文物》1961年第9期，第16～19页。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内蒙古扎赉诺尔古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61年第12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扎赉诺尔古墓群1986年清理发掘报告》，《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一），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第223～240页。



插木柱，形成椁架。殉牲现象极为普遍。陶器以夹砂粗陶为主，泥质陶很少，均为手制，多数素面。骨器发达，桦皮盒、桦皮箭袋、桦皮圆盒等制品颇有特点。铁器包括剑、刀、矛、镞等。出有飞马纹、鹿纹、羊纹等北方系青铜牌饰和铜釜。

在呼伦贝尔一带的克尔伦河、伊敏河、海拉尔河、辉河、根河、额尔古纳河流域以及大兴安岭东侧的阿伦河流域发现有十余处文化面貌与扎赉诺尔相似的墓地；在从呼伦贝尔草原向西南至河套阴山地区的广阔地带上，发现有南杨家营子、苏泗汰等可能与拓跋鲜卑第二次南迁有关的属于东汉时期的北方游牧民族的遗迹，如巴林左旗南杨家营子遗址和墓地。①

四、北魏时期鲜卑遗存

北魏太和二年（436 年）灭亡北燕，先以和龙为镇，旋改营州。营州地区长期人烟稀少，遗留的考古遗存也不丰富。

北魏佛教兴盛，万佛堂石窟即是北魏时期开凿的石窟寺。万佛堂石窟位于辽宁义县西北 9 公里的万佛堂村，坐落在大凌河北岸。分为东、西两区，东区 7 窟，西区 9 窟。西区石窟于太和二十三年（499 年）建造，分为上下两层。东区是北魏景明三年（502 年）营造的私窟，在第 5 窟内有韩贞等人造窟题记，其中题名的刘都都、刘初勿丹等似是鲜卑名字。②

辽西地区发现的北魏时期墓葬数量较少，仍然保持着三燕时期东部鲜卑的葬俗，又由于受到中原地区两晋至北朝墓葬制度的影响，砖室墓增加，出现方形墓室、墓顶叠涩内收和长斜坡墓道的石椁墓。

---

① 社科院考古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巴林左旗南杨家营子的遗址和墓葬》，《考古》1964 年第 1 期，第 36～43 页。

② 曹汛：《万佛堂石窟两方北魏题记中的若干问题》，《文物》1980 年第 6 期，第 63～69 页。

其中刘贤墓[1]砖室结构，平面呈梯形，早年被盗。出土碑状墓志，碑首圆雕四螭，阳面天宫题“刘戍主墓志”，龟趺座，志文隶书，从志文推测刘贤是改用汉姓的北方边地民族。刘贤墓志是地面大碑形制，是较早自称墓志的实例，对研究墓志的演变发展有重要意义。

这一时期的墓葬在继承三燕墓葬制度的基础上吸收了汉族和拓跋鲜卑的文化因素，墓葬制度发生了某些变化，墓主应该包括东部鲜卑、拓跋鲜卑、汉族和其他北方边地民族。

东北地区早期东部鲜卑遗存和早期拓跋鲜卑遗存在考古学文化面貌上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而区别显示了两部分鲜卑不同的起源和发展轨迹。鲜卑文化吸收了其他民族的文化成分，尤其以汉族文化对鲜卑文化的影响最为持久和强烈。至北魏统一北方以后，随着鲜卑的汉化和民族融合，东北地区鲜卑文化的特色也在逐渐消失，鲜卑文化最终与中原和其他地区的考古文化统一起来。（郑君雷）

第六节　高句丽考古

高句丽是我国东北地区一古老的少数民族，其活动中心在浑江流域和鸭绿江中游地区。汉武帝灭卫氏朝鲜，置乐浪、玄菟、临屯、真番四郡，高句丽属玄菟郡管辖。公元前 37 年，高句丽建立民族地方政权，自称为王，接受中原王朝的册封，一直到公元 668 年灭于唐的七百年间连续不断，与中原地区始终保持着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密切联系。

20 世纪初开始，一些日本人多次到我国辽宁、吉林和朝鲜平壤地区，调查和发掘了多处高句丽墓葬和城址，但对于我国境内高句

[1] 曹汛：《北魏刘贤墓志》，《考古》1984 年第 7 期，第 615～621 页。

丽遗迹进行大量而有计划的调查、发掘、研究，还是解放后由我国学者逐步实现的。迄今，已有大量的调查、发掘报告和专题研究文章面世，综合研究也已经开始，① 其内容包括都城、山城、墓葬和重要遗物几方面，因而使我们对高句丽文化的内容、特点和演变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

二次大战后，朝鲜对其境内的高句丽重要遗迹先后进行了调查和发掘，并发表了相关报告和研究论著。② 另外，日本学者主要是利用原有材料和中国、朝鲜新发现的材料也进行了专题研究和综合研究。③

一、都城址

高句丽初都桓仁，公元3年一迁集安，427年再迁平壤。文献记高句丽5世纪以后的都城是山城与平原城相结合，经考察，这种整体布局在高句丽迁都平壤之前，以集安为都的时期已经具备，而且在以桓仁为都的初期可能就开始了。

高句丽初都桓仁，经调查、发掘，五女山城已被确认。五女山城位于桓仁县城东北8.5公里浑江对岸的五女山上，南北长约1000米，东西宽约300米，西、南、北三面以悬崖为壁，只有东侧和东南侧山势稍缓，在半山腰石筑城墙。而距五女山城不远，还有一座

①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三国——宋元考古》〔讲义（上）〕，1974年2月。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第五章，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554～557页。王健群：《好太王碑研究》，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魏存成：《高句丽考古》，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4年。

② 朱荣宪：《高句丽的壁画古坟》，日译本，永岛晖臣慎译，东京：学生社，昭和47年。朝鲜社科院考古研究所：《高句丽文化》，日译本，吕南喆、金洪圭译，东京：同朋舍出版，昭和57年。

③ 东潮、田中俊明：《高句丽的历史和遗迹》，东京：中央公论社，1995年4月。

土筑的平原城下古城子古城，据有关文献记载，高句丽始祖朱蒙刚来之时，此地原有一城，有可能是下古城子古城，但该城的具体情况还有待于详细调查和发掘。

集安现存两座高句丽城址，一是集安市区所在的平原城，另一座是市区西北 2.5 公里的山城子山城，前者即文献记载中的国内城，后者即文献记载中的尉那岩城和丸都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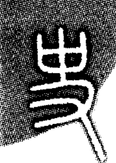
高句丽迁都平壤后，经一百多年，552 年又开始兴建一座新的都城长安城，586 年迁都于此。该城址学术界认定为今平壤市区内古城，周长 23 公里。城内依北高南低之地势，依次分隔为内城、中城和外城，内城置王室，中城置衙署，外城置居民，而且在外城还规划、修建了整齐的内有十字街道的里坊。为加强内城防御，在内城之北的山峰上又另筑北城。这一变化是在高句丽原有都城布局的基础上又接受了北魏洛阳城的规划影响的结果。

与中期都城和下边部分山城有关，高句丽中期都城通往辽河流域有南、北两条通道，对此，近年学术界提出了几种不同的看法，主要分歧是在进入今集安境内之前，而进入集安境内之后，多数看法是一致的，即南道顺新开河谷而行，北道顺苇沙河谷而行，迄今在此南北两道上皆发现了关隘和城堡。

二、山城

分布广、数量多的山城是高句丽城址的突出特点。山城的规模大小不一，周长 3000 米以上大型山城多位于高句丽的西部防线、辽东至平壤的交通沿线和平壤以南的地区，修筑的时间大都在四五世纪之后。1000 米以内的小型山城多是大中型重要山城的卫城或交通沿线上的关隘哨卡。从功能方面看，小型山城应更多一些。

山城依形状和功能分为四种，其中簸箕型的占山城总数的一半以上，且多为大中型，其城墙大都修在三面高、一面低的环形山脊上，主要城门开于山势低平之处，城内有纵深的山谷和开阔的坡地，便于兵民驻防和储藏器备。城墙以石筑为主。土石混筑和土筑的多



分布高句丽中后期的西部防线和朝鲜半岛地区。城墙和城内都修建了了望高台、蓄水池等必要的防御性设施。

与都城布局相似，在几处重要山城附近还发现了平原城，而这些平原城多是原汉代的城址。与山城有关，高句丽晚期在西部修建的“千里长城”，近年也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但认识有别，尚需进一步工作。

三、墓葬

高句丽墓葬分布广，数量多，其类型大体上可分为积石墓（分石圹墓和石室墓）和封土墓两大类。积石墓的时代早，主要分布在我国境内，以集安最为集中，自 3 世纪末、4 世纪初开始，封土石室墓也开始出现了。积石石室墓是积石石圹墓向封土石室墓演变进程中的过渡形式。从这种墓葬类型的演变中，同样反映出周邻地区、特别是中原地区的文化对高句丽的影响。

在集安积石墓中有数座规模巨大、砌造考究，属于高句丽王的陵墓，如太王陵、将军坟、千秋墓等，近年又有学者主要就太王陵、将军坟的墓主人发表文章，倾向性观点认为太王陵是好太王的陵墓，将军坟是长寿王的陵墓；又因为长寿王在位时迁都平壤，死后应葬于平壤，所以将军坟实际上并未使用。

高句丽封土石室墓在我国和朝鲜都有大量分布，目前，发掘和研究的重点还是封土石室壁画墓。迄今集安共发现高句丽壁画墓 29 座，桓仁发现 1 座。朝鲜发现封土石室壁画墓 68 座。集安、桓仁壁画墓的起止年代，多数学者认为是从 4 世纪中叶到 7 世纪初，壁画开始以家内、出行等生活场面为主，后来莲花纹饰逐渐突出，最后四神图像占据主要画面，而且壁画由原来绘在石壁的白灰面上而变为直接绘在平整的石壁上。

朝鲜境内壁画墓的年代跨度与集安的壁画墓相同，壁画的内容、变化与集安的也相同。其中安岳三号墓的墓主人，虽然近年又有不同说法，但国内外多数学者仍同意我国学者 50 年代初提出的为冬寿

墓的正确观点。[①] 另外还有德兴里壁画墓和传东明王陵，也是近年学术界讨论较多的壁画墓，德兴里壁画墓题记中的墓主人幽州刺史，已有中国学者考证为十六国时期后燕的幽州刺史慕容镇，[②] 真坡里10号（传东明王陵）也被中日学者推定为葬于平壤的长寿王陵，而并非东明王陵。

四、重要遗物

对高句丽重要遗物的研究，首推关于好太王碑的考证，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学者对以往好太王碑的发现和研究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对多处碑文重新作了识读和考释，90年代后在北京又发现了几种重要的碑文拓本，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注目。80年代开始了陶器分期的综合研究，其中包括对典型器物四耳展沿壶的演变分析。建筑瓦件中的典型遗物是瓦当，其花纹有卷云纹、莲花纹、忍冬纹、兽面纹。高句丽出土的遗物，从工艺、纹饰多方面可看出中原的强烈影响，其中有的器物本来就是从中原传入的。另外，高句丽长期与鲜卑为邻，高句丽马具的发展直接受到了鲜卑的影响，然后又传到了朝鲜半岛南部和日本。（魏存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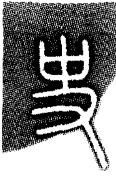
第七节　渤海考古

渤海是唐至五代期间由靺鞨族为主体在以我国东北地区为主、并包括朝鲜半岛东北部和俄罗斯滨海边区在内的广大区域里建立的民族地方政权。迄今，在上述区域内陆续发现了大量的渤海遗迹，为研究渤海的历史提供了重要资料。

---

① 宿白：《朝鲜安岳所发现的冬寿墓》，《文物参考资料》1952年第1期。

② 康捷：《朝鲜德兴里壁画墓及其有关问题》，《博物馆研究》1986年第1期，第62～79页。



清代流人最早对渤海上京所在的宁古塔统辖区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考察、考证。19世纪末开始，一些俄国人，主要是日本人利用当时特有的历史条件，多次到牡丹江和海兰江—图们江流域等地调查发掘，并陆续编写发表了一些报告和论著。渤海考古的大量工作是解放后由我国学者进行的。自1949年敦化六顶山贞惠公主墓清理开始，在普遍调查的基础上，先后在以渤海“旧国”和上京为中心的牡丹江流域，以中京、东京为中心的图们江流域，以及第二松花江流域、绥芬流域和渤海的交通沿线上，进行了多处重要的发掘，发表了多项报告，开展了多项专题研究。[①] 在综合研究方面，我国先后出版的《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②]、《黑龙江区域考古学》[③] 和《东北古代民族、考古与疆域》[④] 著作中都专门列入了渤海考古的章节。

俄罗斯滨海边疆区的渤海考古工作，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即比较频繁地开展起来，其主要成果见于沙弗库诺夫主编的《渤海国及其俄罗斯远东部落》一书。[⑤]

朝鲜的渤海考古工作起步于60年代，迄今在朝鲜东北部先后发现了多处城址、建筑址和墓葬，有的已作了发掘。在综合研究方面，其代表著作是1971年出版的朱荣宪编著的《渤海文化》。

一、都城址

渤海政权在其存在的229年当中，先后以“旧国”敦化、中京

---

①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编著：《六顶山与渤海镇》，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

②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编著，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

③ 谭英杰、孙秀仁、赵虹光、干志耿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

④ 张博泉、魏存成主编，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8年。

⑤ 沙弗库诺夫等著、宋玉彬译：《渤海及其俄罗斯远东部落》，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

西古城、上京渤海镇、东京八连城、上京为都。其中上京城两次为都，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布局和建筑也最为完备，在都城和建筑方面集中代表了“海东盛国”的文化面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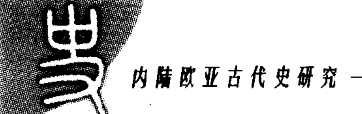
渤海“旧国”位于牡丹江上游之敦化。目前候选推定地有三个：平原城敖东城、城山子山城和永胜遗址。敖东城位于敦化市区东南部之牡丹江左岸。城山子山城位于敦化市区西南的一座孤山上。江的对岸平地上有永胜遗址。到目前为止，三处都仅限于地面调查，具体情况还有待于今后的发掘。

中京西古城位于吉林省和龙县之海兰江上游平原，西南距和龙县城五六十里。城址分内外两城，土筑墙垣。

东京八连城位于吉林省珲春县之珲春河与图们江冲积盆地上，内外两城结构，土筑墙垣。外城周长 2894 米。内城位于外城中部偏北处，东西 218 米，南北 318 米，城中分布有宫殿遗址。

上京城址位于黑龙江省宁安县之县城西南 30 余公里处，背靠牡丹江。城址分为郭城、皇城和宫城三部分。皇城和宫城位于郭城北部中间稍偏西，皇城在前，宫城在后，中以横街相隔。皇城也呈横长方形。宫城呈规整长方形。宫城东侧区域内有禁苑。宫城门道开于两侧，非常独特，但建筑仍是中原流行的过梁式结构。宫城正门之内南北中轴线上座落着 5 座宫殿，其布局与唐长安城原宫城太极宫和大明宫基本相似，而每座宫殿的作用则更接近于大明宫。郭城内有南北向和东西向街道各 5 条，其中直对皇城正门的南北中轴大街宽达 110 米。郭城被街道分割成若干整齐并基本对称的居民区里坊。城内发现 10 余座中轴对称的佛寺。内部也都与中原盛唐寺院和石窟的布局相同。

以上京城址为代表的渤海都城，被认为是模仿于隋唐长安城（隋大兴—唐长安城）。这种模仿是有一个发展和完备的过程的。上京城宫城、西古城、八连城的大小之所以相当接近，说明它们开始都是以宫城来规划的，只是后两者因为建都时间太短，未完成整体规划。



二、交通遗迹

《新唐书·渤海传》记渤海对外有五条交通道路，以下逐一略述。

营州道。以第二松花江上游支流辉发河畔的桦甸苏密城展开。“安史之乱”及契丹兴起之后，该道多次受阻。朝贡道地位开始突出。

朝贡道。即《新唐书·地理志》中记载的登州道。这条道路首先自山东半岛越海至旅顺，有名的唐鸿胪井刻石即在此发现；然后沿海至鸭绿江口，逆江而上，抵神州后才改为陆行。

日本道。是中外学者历来讨论较多的课题。其陆路部分，起初是从敦化“旧国”或自上京出发南下，越哈尔巴岭，通过嘎呀河谷进入图们、珲春，到俄罗斯滨海边区南端的克拉斯基诺古城，出海通过南北不同航线抵达日本。

新罗道。先从渤海上京到东京，然后沿朝鲜半岛东海岸南行，到达南京南海府北青土城（又名青海土城），继续向南则是新罗。这一段正是文献所记自新罗泉井郡至渤海栅城府的道路。

契丹道。目前工作较少，1990 年在吉林省蛟河县天岗镇七道河村附近发掘的一处渤海建筑址，应与契丹道有关。

《新唐书·地理志》记渤海上京“其北经德理镇，至南黑水靺鞨千里”，说明渤海另有“黑水道”。这条道路是自上京沿牡丹江向北而去的，迄今在此交通线上发现了多处渤海城址、遗址和墓葬。其中位于牡丹江市北边、牡丹江东侧的南城子古城和对岸的“牡丹江边墙”，被认为是渤海初期为防御黑水靺鞨而修建的。

与交通有关的还有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发现的 11 处形制特殊的 24 块石建筑址，分布于渤海交通沿线上。现学术界基本同意此属驿站性质的建筑。

三、墓葬

墓葬是渤海的主要遗存之一，自 1949 年开始，迄今已发掘的渤海墓葬，据不完全统计有 700 座以上，其他没有发掘和没有发现的

则更多。墓葬的分布大致可分为第二松花江中游、牡丹江上游、牡丹江中下游、海兰江—图们江流域等几个大的地区。

第二松花江中游地区已发掘的墓葬分别位于永吉县扬屯大海猛、榆树县老河深和永吉县查里巴 3 处 150 多座，该处墓葬大部分是原粟末靺鞨的墓葬，少部分可到渤海初期。

牡丹江上游的渤海墓葬，迄今发掘的只是六顶山墓群，其中包括出土墓碑和石狮的文王大钦茂二女儿贞惠公主墓，据贞惠公主墓碑记载，这里有王陵。牡丹江中游发掘最多的是在上京附近。发现有壁画墓，还出土有精美的三彩炉的三陵屯一带被推定为渤海以上京为都时期的王陵区。上京城址之西、牡丹江对岸还有大朱屯和虹鳟鱼场多座墓葬，等级较低。上京城址以北的地区，发掘的有南城子古城旁边的石场沟、海林县山咀子、哈达屯、头道、二道、三道等处墓葬。这一线正是上京通往黑水靺鞨的道路。

海兰江—图们江流域的渤海墓葬，在中京西古城附近。这里有贞孝公主墓所在的龙头山墓群、和龙北大墓群及河南屯古墓等。贞孝公主墓中不仅出土了文字完整的墓碑，而且还有保存较好的精美壁画。壁画中人物的体态、服饰与中原唐墓无别。龙头山墓群是一处高等级的墓葬区，但在山脚下也发现有小型墓。和龙北大墓群数量多，墓葬的规模多属中小型，但出土的精美三彩、成副的带具和中原输入的铜镜，很引人注意。河南屯古墓的时代较晚，可到渤海后期，墓中出土的精致的金带具，发掘者认为这是由唐王朝赠给渤海王室贵族的。

1973 年在珲春县马滴达乡附近珲春河旁的山坡上清理了一座方形砖塔基，塔基的地宫内发现了人骨，说明它和贞孝公主墓一样，属塔墓相结合的建筑。

以上发掘的渤海墓葬，其类型分为土坑、石圹、石室、砖室、石棺几种。土坑墓时代最早，是勿吉—靺鞨族古老的墓葬类型。而土坑墓经石圹墓演变为石室墓，应该是勿吉族南下后接受了高句丽石室墓的影响。但是高句丽的石室墓的石室多在地上，渤海石室墓



多在地下，二者是有区别的。渤海的砖室墓是在中原的影响下于8世纪后半叶逐步形成的。渤海墓葬的等级与上述类型不构成明确的对应关系。渤海墓葬流行多人葬和二人葬，火烧迹象也较常见，少数墓葬地表还有建筑遗迹或在封土上铺瓦，这些多属靺鞨族的古老葬俗。而在墓上建塔，则是受到了佛教的影响，其源头在中原。

四、重要遗物

在以上不同遗迹的调查发掘中，发现了多种重要遗物。陶、石建筑部件有板瓦、筒瓦、莲花瓦当、砖、柱座、鸱尾和础石、石螭首等，其纹饰、造型，有的表现出自己的独特风格，有的则可看出中原地区的明显影响。在有的板瓦、筒瓦上还发现了不少戳印的文字和符号，据考证这些文字出于制瓦工匠之手，分属于汉字、汉字别体和误写字。

陶器多出于墓葬，可分夹砂和泥质两个体系，夹砂陶的典型器物是深腹筒形罐，又称靺鞨罐，它是自松花江下游原勿吉族的同类器物发展而来。三彩器和搅胎器在渤海上京和中京附近的墓葬中也屡有发现，搅胎器是中原产品，三彩器尚难辨别，但其工艺仿自唐三彩无疑。

金属中值得注意的是带具，前面已经提到。中原的铜镜在渤海墓葬中也发现几例。

碑志、石刻有贞惠公主和贞孝公主两墓碑、贞惠公主墓石狮和现存于上京城址内的石灯塔、石佛等，其碑志文字、文体和石刻之雕刻艺术与当时中原无别。另外，唐鸿胪井刻石、张建章墓志对研究渤海历史也有着重要的作用。（魏存成）

第八节　东北辽金元明考古

东北辽金元明考古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经开始。解放前的

工作基本是由法国、日本、俄国人进行的，发现了一些城址和墓葬，个别墓葬被发掘。新中国成立后，对辽金元明考古遗存进行了大规模、系统的调查与发掘。辽金考古遗存丰富，而元明两代则相对较少。

一、辽代考古

1. 城址。

辽代城址考古主要是勘察并发掘了上京城、中京城、祖州城，发现了大量的州县和头下军州的城址。

上京城①位于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镇南。地表可见南北两城。北城是皇城，平面呈不规则的六边形，城墙设马面，有角楼。大内城曾经以东向为正方向，这是契丹的国俗。南城是汉城，设施较北城简陋，没有马面，主要居民是汉人。上京城体现了辽早期都城特点。

中京城②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大明城。三重城相套。外城和内城为长方形，最里层的宫城为正方形，这是仿照北宋东京城的布局，是汉化加深的表现。发掘表明，外城以纵横大街为界，构成里坊，是继承汉唐里坊制度。

祖州是辽太祖祖陵的奉陵邑，位于林东镇西南。为不规则的五边形。前部是两个县的衙属、市肆、居民里坊，建筑密集。后部中轴是祭祀太祖的宫殿，西侧是神秘的石房子，东侧是隶书宫廷的手工业作坊。以祭祀宫殿为主是奉陵邑的主要特点。

辽代一般的州县城在平坦地区建城，方形为主，城内北部中央有衙属建筑遗址。头下军州是辽代大贵族的私城，规模较小，方形，

---

①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辽上京城址勘察报告》，《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第510～536页，1994年。

② 辽中京发掘委员会：《辽中京城址发掘的重要收获》，《文物》1961年第9期，第34～39页。



土筑。多位于草原与平原农耕区的接触地带，既利于游牧，又利于农耕。

2. 墓葬。

早期的祖陵、怀陵属于山谷型。陵区选择三面环山的绝谷，在谷口建陵门，在山脊缓坡建围墙，形成封闭的陵区。陵区内有祭祀建筑遗迹。皇陵丘位于谷内西侧的向阳山坡上。中、晚期的庆陵属于山坡型。庆陵由永庆陵、永兴陵、永福陵组成，在庆云山的南坡一字排开，各有陵门，没有围墙，是仿照北宋皇陵植树为陵区边界做法。陵丘前各有祭祀建筑遗迹。

契丹墓葬以砖（或石）室墓为主。早期是平面方形或圆形，受佛塔平面由方形变六边形、八边形的影响，圣宗晚期开始出现六角形、八角形墓葬。既有多室墓又有单室墓。大贵族墓葬的墓门是仿木构门楼建筑，早期简单，晚期复杂宏伟。墓道和墓室内壁画流行，以反映契丹民族生活的狩猎、放牧、山林野景和出行、归来的内容为特色。墓室内常有木椁室。葬具以陶瓷器为多。大贵族使用墓志随葬越晚越多，体现了汉化的加深。

辽代汉人的墓葬，一般是规模较小的单室墓，流行火葬，这是受佛教的影响。在墓葬习俗上，也存在部分汉人契丹化的现象。

3. 陶瓷窑址。

辽代陶瓷窑址较多，其中科学发掘的是赤峰的缸瓦窑。该窑是大型综合性陶瓷窑，延续到元代，是东北最重要的陶瓷窑场。以白瓷为主，兼烧三彩、单色釉陶瓷。有的有“官”款。而上京城内发现的瓷窑，是女真占领辽上京后开始烧制瓷器的窑场。

二、金代考古

金代考古遗存主要是城址、界壕址和墓葬。

金上京城位于黑龙江省阿城市，俗称白城子。由南北两城组成，平面呈曲尺形。北城城墙有马面，有城门 5 座，城门带瓮城。南城内有皇城。皇城内中轴线分布着 5 座宫殿遗址，前 4 座宫殿各带左

右廊。黑龙江省考古普查发现金代城以上京为中心，周围城址林立，构成放射状的布局。城址多位于河流沿岸的交通线上。平面以长方形和方形为主，也有不规则的城，城墙多马面。

界壕就是金代的长城，是金朝在边界地带修筑的防止蒙古进攻的大型防御工事，由壕、墙、边堡构成。发现两条，一条是“岭北长城”,① 为早期修筑；一条是中晚期修筑的，东起嫩江，西到大青山。

女真墓有 4 种类型。第一种是土坑木质葬具或无葬具墓。随葬品丰富，有女真传统的马具、瓜楞陶器、海东青捕鹅腰带牌饰。第二种是土坑石椁墓，以阿城齐国王墓为代表。第三种是土坑石函墓，石函内装骨灰，佛教影响较大。第四种是砖室墓和石室墓，本属于汉俗，金中晚期的女真人也使用。金代大贵族墓葬的地面石刻像常见，一般有虎、羊、武士、文臣，排列顺序与唐宋墓同。

三、元明考古

元代考古遗存主要是城址与墓葬。

元代新修的城为方形城，马面变少或无马面。

赤峰、朝阳等地发现的蒙古人墓葬均为砖室墓，单室，方形，夫妇合葬，木棺。随葬品较简单，有铜镜、瓷器、钱币、马镫等。蒙古人深受汉风影响，喜欢于室内床档上布置山水画。赤峰三眼井墓和辽宁富家屯墓壁画反映蒙古民族的习俗更多一些。前者有出猎、狩猎、归来图，后者有牛羊马驼和射雁等壁画。

明代考古遗存主要是边墙、城址和墓葬。

辽东镇边墙是明代长城的东段。已经查明实际走向和结构。分为辽河东边墙、辽河套边墙、辽河西边墙。东端起点在丹东市宽甸县虎山乡虎山村的鸭绿江边的夯土台。

① 冯永谦：《岭北长城考》，《辽海文物学刊》1990 年第 1 期，第 99～118 页。



赫图阿拉城址是明代建州女真修建，努尔哈赤在此建都，称兴京，国号后金。地点在辽宁新宾县永陵镇。苏子河从城北流过，为护城河。城分内外两重，规模很小。

明代女真墓葬发现较少。一般为土坑墓，单人葬。吉林省夫余等地发现的墓葬可能是海西女真的墓葬，有瓷器、马具、连环牌饰、兵器。而龙井县发现的墓葬是土坑独木棺，有瓷器陶器、兵器，可能是兀良哈部的墓葬。

明代一个重要考古发现是在俄罗斯的黑龙江下游的特林，发现了奴尔干城遗迹和《永宁寺记》碑、《重建永宁寺记》碑。碑文记录了明朝官员到奴儿干视察的时间与经过。（冯恩学）

第四章 古代中亚史研究

一

从现代意义的历史学来说，我国中亚史研究的起步，应当追溯到清朝中后期的西北舆地之学。

从乾隆年间清朝征服占领天山南北的准噶尔部和回部，到光绪十年（1884 年）建新疆省，有关新疆地区的山川地貌、行政建置、民族宗教等方面的情况，渐次记录到清朝的官书和地图中，使内地的学人初步掌握了有关的知识。另一方面，鸦片战争前后，欧洲殖民主义者东来，对清朝构成威胁，中国的边疆问题日益严重。一些知识分子开始特别注意了解外国的情况，探讨边疆问题。乾嘉朴学考据的方法和西洋制图学的传入，为边疆史地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工具。而一批优秀的知识分子由于种种原因而亲身到了新疆，为清朝的西北舆地之学在此时产生一批重要的著述提供了机遇。这些著作中可举以下几种为代表作：祁韵士（1751～1815 年）的《皇朝藩部要略》、张穆（1805～1849 年）的《蒙古游牧记》、徐松（1781～1848 年）的《西域水道记》、何秋涛（1824～1862 年）的《朔方备乘》、陶保廉的《辛卯侍行记》。其中尤以徐松的《西域水道记》和陶保廉的《辛卯侍行记》对后人影响最大。

徐松于嘉庆十七年（1812 年）因科场案流放伊犁，他把祁韵士编《伊犁总统事略》加以增删修订，编成《新疆识略》十二卷。在



新疆期间，徐松有机会遍访天山南北各地，做实地考察。他于道光元年（1821 年），仿《水经注》的体例，撰成《西域水道记》五卷，以哈喇淖尔、罗布淖尔等十一大湖为纲，记述嘉峪关以西和新疆境内的水系湖泊，释文中参考史籍和亲历考察的结果，详记沿河的城邑、村庄、军台、卡伦、厂矿、交通、古迹、民族、史事等，对当地留存的碑志材料，也做了辑录。此外，徐松还撰有《新疆赋》二卷，用韵文体记述了新疆的山川形势和民族物产等情况。他还著有《汉书西域传补注》二卷，不仅比勘史料，多所订正，而且结合实地考察，指出今地所在，较前人高出一筹。

陶保廉在光绪十七年（1891 年）随父赴新疆任官，一路从山东、天津、北京，经陕西、甘肃，入新疆，由哈密，经吐鲁番，到迪化（今乌鲁木齐）。所著《辛卯侍行记》对沿途城镇沿革、山川道路、古迹名胜、人物风俗均有记述，特别是对古今地名的比定，为今人所重。

清朝各级官府组织学者编纂的一些地理志书，也反映了当时西北舆地之学的盛行。这类书主要有：《皇舆西域图志》五十二卷，乾隆二十一年至四十七年（1756～1782 年）修成；《新疆图志》一百六十卷，王树枏、袁大化编，光绪元年至宣统三年（1909～1911 年）修成。两书都是既参考了历史文献，又有实地考察成果的大型地方通志，为中亚史特别是清代新疆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以上述成果为代表的清朝西北舆地之学，开创了中亚史研究的新天地。虽然大多数学者的主要研究对象是蒙古史，并由此带动了重修元史的热潮，而且多数学者的著作仍是以记述为主。但是，像徐松这样的学者，除了史籍的严密考订外，还亲身做了实地调查，而且注意到了当地保存的碑志材料，代表了新史学的方向。

在同时代的欧洲，也正在成长起一批区别于传教士和殖民主义者的汉学家。他们研究的一个重点，即有关中亚的史料。以法国为例，雷慕沙（J. P. A. Remusat），著有《于阗城史》（巴黎，1820 年），利用《古今图书集成·边裔典》，整理了于阗的历史资料。他还翻译了法显的《佛国记》（巴黎，1836 年）。雷氏的弟子儒莲（S.

Julien)，也翻译了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巴黎，1857～1858年）和慧立、彦悰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巴黎，1853年）。1893年，沙畹（Ed. Chavannes）继任法兰西学院教授职位，他研究的重点更偏重于中亚史。他译出一些不同时代的重要史料，并附以注释或研究，如《魏略西戎传笺注》、《宋云行纪笺注》等，其中尤以《西突厥史料》（圣彼得堡，1903年）一书最为世所重。此书译出有关西突厥的大量汉文史料，证以西文史料，对隋唐时期占领中亚广大领土的西突厥汗国，及其在东西交往史上的作用，做了详细的考述。

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西方，对于中亚史研究更为重要的是中国西北地区考古时代的到来。在中亚的历史上，由于民族的迁徙、战争、同化较为频繁，本地留存的史料不多，上述东西方的研究成果，主要是依赖于周边较大的文明所遗留下来的文字材料，如汉文、阿拉伯文、波斯文、希腊拉丁文史料。自从1890年英军中尉鲍威尔（H. Bower）在库车获得梵文写本后，英、俄外交人员开始在新疆攫取古物。随后，西欧各国争先恐后地派考察队前往新疆、甘肃、蒙古、西藏等地，发掘古代城堡、寺院、石窟、墓葬，其中以英国斯坦因（A. Stein）所率三次中亚考察队，德国格伦威德尔（A. Grünwedel）和勒寇克（A. von Le Coq）所率四次吐鲁番考察队，日本大谷光瑞所派三次中亚探险队，法国伯希和（P. Pelliot）所率中亚考察队，俄国科兹洛夫（P. K. Kozlov）和奥登堡（S. F. Oldenburg）所率中亚考察队的收获最大。新疆和田、楼兰、库车、焉耆、吐鲁番出土的艺术品，揭示了该地区伊斯兰化以前的文化面貌，各处遗址特别是敦煌藏经洞和吐鲁番石窟与墓葬出土的各种语言的文献材料，为中亚历史、语言、宗教、民族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第一手材料。

在西方列强到来之前，当地的一些学者已经看到过这类材料。祁韵士《西陲竹枝词》中题为《龟兹》的一首有这样的诗句："轮回经写唐人笔，佛洞穷宠石壁奇。"说的就是库车出土的唐人写经。但这些写经当时只是作为书法作品而被士大夫们赏玩，没有人留意它



们的学术价值。在各国考察队纷纷来挖宝的清末民初，有不少清朝官人手中都有多少不等的出土文献材料，但只有王树枏（1851～1936年）曾把自己所见所藏，从金石学的角度辑为《新疆访古录》二卷。当时的中国，考古学还没有起步，因此更难有人能认清这些古物特别是古写本在学术研究上的分量了。

二

清朝末年，腐朽的清王朝连自家的皇宫禁苑都无法保全，更何况远在边陲的古物了。大量的古代中亚文献和文物流失国外，是必然的历史悲剧。国力衰落，学术必受影响。乾隆征服新疆后，促成一批优秀的西北舆地著作的产生。清末新疆文物的流失，使得中国的学术失去的不仅仅是文物，而是20世纪相当长时间里中亚研究的竞争力。1915年《浙江图书馆丛书》收录丁谦对先秦至明清有关中亚地理文献的考证文字，因为没有参考出土文献和实地考察报告，所取得的成果就显得十分有限。

而此时早已形成组织的西方学术界，一下子获得了数以万计的新资料，马上全力以赴。现在看来，几乎所有有成就的东方学家当时都投身于中亚出土资料的研究工作。斯坦因写出了一册比一册厚重的考古报告：《古代和田》二册①、《西域考古记》四册②、《亚洲腹地考古记》五册③，除了详尽的考古调查记录外，还有大量的考

① M. A. Stein, *Ancient Khotan. Detailed report of archaeological explorations in Chinese Turkestan*, 2 vols., Oxford, 1907.

② M. A. Stein, *Serindia. 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and Westernmost China*, 5 vol., Oxford, 1921.

③ M. A. Stein, *Innermost Asia. 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Kan-su and Eastern Iran*, 4 vol., Oxford, 1928.

证和分析研究，远远超出了一直为西人所重视的徐松《西域水道记》的水平。在这三部考古报告的最后，都附录有各科专家对斯坦因收集品的分类研究，也体现了欧洲学术的集体力量。当时欧洲最有成就的东方学家，很快就投入到这些新材料的解读工作中。其中与中亚史关系较为密切的方面有：沙畹、马伯乐（H. Maspero）的汉文，吕德斯（H. Lüders）的梵文，西格（E. Sieg）、西格林（W. Siegling）、列维（S. Lévi）的吐火罗文，缪勒（F. W. K. Müller）的回鹘文、粟特文，柯诺夫（S. Konow）的于阗文等新疆、敦煌出土文书的研究，阐明了中亚历史上的许多问题，成为今天研究中亚史所不可或缺的参考文献。

相对于硕果累累的西方中亚史研究成果，一些中国学者也没有等闲视之。1909年罗振玉（1866～1940年）等人在北京见到伯希和带来的部分敦煌写本后，立刻抄写影印。罗振玉陆续编撰了《敦煌石室遗书》[①]、《鸣沙石室佚书》[②] 等，刊布并考释了一些有关中亚的重要敦煌文书，如《沙州图经》、《西州图经》、《慧超往五天竺传》、《景教三威蒙度赞》和摩尼教残经。蒋斧编《沙州文录》[③]，专门抄录有关敦煌史地的官私文书，其所抄碑文，多为徐松《水道记》所录原碑之缺。他还撰有《摩尼教流行中国考略》[④]，是第一篇讨论这个问题的专文。

王国维（1877～1927年）可以作为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他和罗振玉在接到沙畹寄送的《斯坦因在东突厥斯坦沙漠中发现的汉文文书》稿本后，即着手考释这些敦煌、罗布泊、尼雅等地出土的汉晋简牍，最后辑成《流沙坠简》。[⑤] 他还撰写了一系列敦煌文书跋文

---

① 宣统元年（1909年）十二月诵芬室刊行。

② 京都宸翰楼，1913年9月。

③ 收入《敦煌石室遗书》，1909年。

④ 同上。

⑤ 京都宸翰楼，1914年。增订本，1934年。



(1919年)；并且在沙畹和伯希和关于摩尼教长文的启发下，撰《摩尼教流行中国考》[①]，于前人论说有所补正。由这些新史料出发，王国维利用他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写出了一系列重要的中亚史论文，如《西胡考》(1919年)、《西域井渠考》(1919年)、《西辽都城虎思斡耳朵考》(1925年)、《鞑靼考》(1925年)、《辽金时代蒙古考》(1925年)，并著《古行记校注》(1925年)、《蒙古史料校注四种》(1926年)。[②] 从两汉到元明，中亚史上许多重要的问题王国维都接触到了。王国维的中亚史研究，既直接继承了清朝以来西北舆地之学的传统，又吸收了西人在新疆、甘肃等的考古学成绩，因此较徐松为代表的清朝学者更高一筹。他的成果不仅为国人奉为经典，而且也受到伯希和这样的海外中亚学者的重视。

另一位开风气的学者是陈寅恪(1890～1969年)。他早年长期游学欧美，除通晓西方现代语言外，又遍读与中国相关的各种东方语言，加上他对中国古籍的深厚功底，使他在回国后的1926～1930年的一段时间里，也为中亚史研究做出了贡献。在此期间，陈寅恪发表的有关文章如下：《大乘稻芊经随听疏跋》(1927年)、《有相夫人生天因缘曲跋》(1927年)、《童受〈喻鬘论〉梵文残本跋》(1927年)、《忏悔灭罪金光明经冥报传跋》(1928年)、《须达起精舍因缘曲跋》(1928年)、《敦煌本十诵比丘尼波罗提木叉跋》(1929年)、《元代汉人译名考》(1929年)、《大乘义章书后》(1930年)、《敦煌本维摩诘经文殊师利问疾品演义跋》(1930年)、《灵州宁夏榆林三城译名考》(1930年)、《吐蕃彝泰赞普名号年代考》(1930年)、《敦煌本唐梵翻对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跋》(1930年)。[③]

---

① 《亚洲学术杂志》1921年第11期，收入《观堂别集》卷一，见王国维《观堂集林》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167～1190页。

② 以上均收入《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40年。部分论文收入《观堂集林》和《观堂别集》，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③ 现均收入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在王国维和陈寅恪的史学研究中，中亚史研究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但他们综合中外史料、胡汉文献以及考古材料的研究方法，给与以后的中亚史研究以强烈的影响。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是近代中国学术发展的一个高潮阶段，中亚史研究也同样产生了一批重要的成果。陈垣（1880～1971 年）对中西交通史的研究，特别是外来宗教的讨论，也澄清了许多外来宗教在中亚的流行以及中亚人来华等问题。他的主要论著有《元也里可温教考》①、《火祆教入中国考》②、《摩尼教入中国考》③、《元西域人华化考》④、《回回教入中国史略》⑤。另一位中西交通史专家张星烺（1888～1951 年），分类汇辑了中外史籍中的有关材料，编成六册《中西交通史料汇编》⑥，其中中亚一册，实为中亚史料的一次系统整理。冯承钧（1887～1946 年）除在翻译法人中亚史研究论著中附加大量自己的考证外，还写有《鄯善事辑》⑦、《高昌事辑》⑧、《高昌

① 《东方杂志》1918 年第 15 期，收入《陈垣学术论文集》第 1 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 年，第 1～56 页。

② 《国学季刊》1923 年第 1 卷第 1 期，收入《陈垣学术论文集》第 1 集，第 303～328 页。

③ 《国学季刊》1923 年第 1 卷第 2 期，收入《陈垣学术论文集》第 1 集，第 329～397 页。

④ 《国学季刊》1923 年第 1 卷第 4 期，《燕京学报》第 2 期，1927 年。单行本有《励耘书屋丛刻》第 1 集第 1 种，1934 年。陈智超导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

⑤ 《东方杂志》1928 年第 29 卷第 1 期，收入《陈垣学术论文集》第 1 集，第 542～561 页。

⑥ 北京：辅仁大学图书馆，1930 年。

⑦ 《辅仁学志》1932 年第 8 卷第 1 期，收入《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丛汇辑》，北京：中华书局，1957 年，第 1～24 页。

⑧ 《国立华北编译馆馆刊》1943 年第 2 卷第 9 期，收入《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丛汇辑》，第 48～83 页。

城镇与唐代蒲昌》[1] 等论文，特别为鄯善和高昌国史的研究，奠定了史料基础。向达（1900～1966 年）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2]，系统探讨了中亚文明对中原文化的影响。他还有《汉唐间西域及海南诸国古地理书叙录》，实为其后来整理中亚史书的先声。此外，张凤《汉晋西陲木简》[3]，考释了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所获敦煌和尼雅等地的简牍文书。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4]，则从中原王朝的角度，全面考察了中亚史，但重在近现代史。还值得一提的是，40 年代，邵循正（1909～1973 年）据布洛舍（E. Blochet）刊剌失德丁波斯文《集史》，译出若干篇，兼做考释，[5] 惜未能继续。

总体来看，这一阶段的研究取得不少成绩，但不少有分量的论著主要的着眼点是中西交通史，中亚的史事只是连带的论及。对某些汉籍做了专题整理，但于出土文献利用不多。由于那个时期的研究者专业还没有严格的确定，所以对中亚史的研究尚不系统全面，但其突出的一个成就是把中文史料做了许多分类整理。

值得一提的是，1927～1935 年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中方成员黄文弼（1893～1966 年），在此期间曾先后三次前往新疆做考古调查和发掘，足迹遍及塔里木盆地周边重要的遗址，而重点发掘了罗布泊地区、吐鲁番盆地，以及库车、和田的一些墓葬、城址、寺院、石窟等。在野外考古工作结束后，黄文弼先后出版了考古报告《高昌》[6]、《罗布淖尔考古记》[7]，但对于中亚史研究更为重要的发现，

---

① 《中央亚细亚》1942 年第 1 卷第 1 期，收入《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丛汇辑》，第 84～95 页。

② 《燕京学报》专刊，1933 年。

③ 上海：有正书局，1931 年。

④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年。

⑤ 后收入《邵循正历史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年，第 8～85 页。

⑥ 北京：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与西北科学考察团，1931 年。

⑦ 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与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理事会，1948 年。

则由于种种原因而迟到解放后才整理出版，即《吐鲁番考古记》[1]、《塔里木盆地考古记》[2]。因此，除高昌外，他的考古学成果没能很快反映在同时代的中亚史研究中。黄文弼还根据考察所得，撰写过一些专题研究论文，尤其重在一些考古遗址和古籍记录的对证上。这些文章已汇辑为《西北史地论丛》[3] 和《黄文弼历史考古论集》[4]。

在20世纪前半叶的中亚史研究中，翻译西方和日本学者中亚史研究的优秀著作占有很大的比重，其中尤以冯承钧的贡献最多。有的译著，如冯承钧译沙畹《西突厥史料》[5]、贺昌群译羽溪了谛《西域之佛教》[6]、向达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7] 等，对以后的中国中亚史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且有不少译著包含了译者的许多订补，甚至较原著更具参考价值。我国学者翻译外国同行中亚史著作的传统迄今仍存，但像冯承钧那样精心选择、校订原著、间加己见者，实不多见。

由于受日本侵华和内战的影响，30年代后半期到40年代，我国中亚史研究一度沉寂下来。但欧美、日本仍然有相当有分量的成果出版，如巴托尔德（W. Barthold）《中亚突厥史十二讲》（1935年）、米诺尔斯基（V. Minorsky）译注《世界境域志》（1937年）、恒宁（W. B. Henning）译释的吐鲁番伊朗语文书，托玛斯（F. W. Thomas）整理的敦煌新疆出土古藏文文书，以及桑原骘藏、藤田丰八、羽田亨等人的著作。

---

① 北京：中国科学院，1954年。
② 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年。
③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④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
⑤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
⑥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
⑦ 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

三

从新中国成立，到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特别是 50 年代后半期到 60 年代前半期，中亚史研究取了可喜的成果。一些对中亚史研究有过贡献的学者，出版了他们的研究专集，如冯承钧的《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丛汇辑》[①]，向达的论文集《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②]，黄文弼出版了他的考古报告。岑仲勉（1886～1961 年）汇集已有的研究成果，编成《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③]，补充了沙畹《西突厥史料》所辑资料之不足，并就某些专题做了考证。他还编著《突厥集史》二册[④]，专门辑录东突厥史料。汉文之外，还利用西人的译本转译了古突厥碑铭。马长寿（1906～1971 年）撰写了《突厥人和突厥汗国》[⑤]、《论突厥人和突厥汗国的社会变革》[⑥]、《乌桓与鲜卑》[⑦]、《北狄与匈奴》[⑧] 等，对中亚史上一些重要的北方民族做了系统的考证研究。这些著作，代表了中亚史研究的水平，而分散在学术刊物上的许多文章，也表明研究的范围正在扩大。

因为受时代思潮的影响，50 年代的研究成果中，有不少中原与西域或中国与中亚诸国的关系史研究，如贺昌群（1903～1973 年）《古代西域交通与法显印度巡礼》[⑨]、季羡林《中印文化关系史论

---

① 北京：中华书局，1957 年。

② 北京：三联书店，1957 年。

③ 北京：中华书局，1958 年。

④ 北京：中华书局，1958 年。

⑤ 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年。

⑥ 《历史研究》1958 年第 3～4 期，收入林干编：《突厥与回纥历史论文选集》上，北京：中华书局，1987 年，第 132～187 页。

⑦ 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 年。

⑧ 北京：三联书店，1962 年。

⑨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 年。

丛》[1]、陈竺同《两汉与西域等地的经济文化交流》[2]、安作璋《两汉与西域关系史》[3] 等等，也是中亚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相对而言，50 年代的研究成果并不算多，但解放后西北交通的进步，使得学者们到新疆地区考察变得较从前方便多了。特别是建国初期，为弄清全国各民族的分布状况，国家组织大批专家学者赴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综合调查，并在此基础上编纂各民族简史和简志，其成果大多数是“文化大革命”以后才得以出版的。然而，在民族调查研究热潮的鼓舞下，50 年代已经产生了一些初步成果。冯家昇（1904～1970 年）、程溯洛（1913～1992 年）、穆广文合编的《维吾尔族史料简编》尽管只出版了上册，[4] 但对此后的维吾尔族历史研究起了推动作用。此外，还有翦伯赞等编《历代各民族传记汇编》[5]、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史料编纂组编《柔然资料辑录》[6] 等。

除了民族调查外，解放后新疆地区随着基础建设而进行的考古发掘，也为“文化大革命”后的研究准备了素材。在众多的考古发掘中，尼雅遗址特别是吐鲁番墓葬的发掘陆续刊布了考古简报，有些精美的图版还刊布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7]、《丝绸之路——汉唐织物》[8]、《新疆出土文物》[9] 等上。但除了少数文章外，“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中亚史研究几近停顿。

如果说在 20 世纪 40 年代，东西方学者同样受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那么，当 50 年代西方和日本学术重新起步，而六七十

①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年。
② 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年。
③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59 年。
④ 北京：民族出版社，1958 年。
⑤ 北京：中华书局，1958～1959 年。
⑥ 北京：中华书局，1962 年。
⑦ 北京：文物出版社，1972 年。
⑧ 北京：文物出版社，1973 年。
⑨ 北京：文物出版社，1975 年。



年代突飞猛进的时候，中国的中亚史研究却停滞不前。在欧美，有葛玛丽（A. von Gabain）的突厥回鹘研究，贝利（H. W. Bailey）的于阗文解读，乌瑞（G. Uray）的古藏文考释，普里察克（O. Pritsak）对黑韩王朝的研究等；在日本，贡献较多的学者有江上波夫、护雅夫、山田信夫、嶋崎昌、榎一雄、山口瑞凤等。“文化大革命”以后，当人们意识到这一点时，中国的中亚史研究已经大大落后于西方和日本。

四

“文化大革命”以后，中亚史研究和其他学科一样，经过 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初的复苏后，从 80 年代中期以来，进入迅猛发展的阶段，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是此前所不能比拟的，而且专业化越来越强。这一方面是因为高等院校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培养出一大批专业人才，另一方面是由于与中亚史相关的各断代史、专题史，特别是中西交通史、敦煌吐鲁番研究、考古学等学科的发展，发掘出不少新资料。而改革开放使得许多研究者得以亲身到欧美、日本，或收集资料，或与外国同行切磋。此外，80 年代初以来，成立了中亚文化研究协会、敦煌吐鲁番学会等学术团体，有关中亚史、敦煌吐鲁番学、丝绸之路、中外关系史等方面的学术会议，几乎每年都在不同地方召开。同时出版了一些的学术刊物，如《中亚学刊》、《新疆社会科学》、《西域研究》、《新疆文物》、《敦煌学辑刊》、《敦煌研究》、《西北史地》、《西北民族研究》、《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敦煌吐鲁番研究》、《欧亚学刊》等，还陆续出版一些中亚史的论文集，如《向达先生纪念论文集》① 等，也极大地推动了中亚

①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 年。

史的研究。以下略按新研究的时代和主题，分专题对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做一初步总结。

对于史前时期的中亚，全疆各地已经发现了许多分别属于旧石器、中石器、新石器、铜石并用、青铜、铁器时代的遗址，但对其年代和性质的判断，各位研究者之间尚有不同的看法，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和论著有：王炳华《新疆细石器遗存初步研究》①、《新疆地区青铜时代考古文化试析》②，安志敏《中国西部的新石器时代》③，陈戈《关于新疆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新认识》④、《关于新疆地区的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文化》⑤，水涛《新疆青铜时代诸文化的比较研究》⑥ 等，这些根据众多考古资料而做出的初步总结，代表了目前以考古材料所能认识的史前中亚史。

中亚自古以来是多民族的聚居地，种族十分复杂。对中亚人种的认识，将有助于我们对考古资料和历史文献的解释。韩康信研究了新疆出土的大部分人骨材料，指出古代中亚的各种人种分布情况，他的研究成果已汇集为《丝绸之路古代居民种族人类学研究》⑦。目前，使用DNA等科学手段来研究古尸的方法已经提出，徐文堪《新疆古尸的新发现与吐火罗人起源研究》⑧，提示了这一研究方法在判断中亚史学界争论已久的“吐火罗人”问题上的价值。

---

① 《于旱地区新疆第四纪研究论文集》，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收入作者《丝绸之路考古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29～145页。

② 《新疆社会科学》1985年第4期，收入作者《丝绸之路考古研究》，第146～163页。

③ 《考古学报》1987年第2期，第133～152页。

④ 《考古》1987年第4期，第343～351页。

⑤ 《考古》1990年第4期，第366～374页。

⑥ 北京大学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编：《国学研究》1993年第1卷，第447～490页。

⑦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

⑧ 《学术集林》卷5，1995年，第304～314页。

利用考古材料来研究史籍中所记载的古代民族，取得了一些成果，如马雍、王炳华《公元前七至二世纪的中国新疆地区》①、王明哲、王炳华的《乌孙研究》②、王炳华《古代新疆塞人历史钩沉》③、王明哲《伊犁河流域塞人文化初探》④。张广达与荣新江《上古于阗的塞种居民》⑤，结合考古和语言学资料来考察于阗等地的塞种。饶宗颐《上古塞种史若干问题》⑥，从整个亚洲大陆更广阔的视野，来看塞种、胡、瓜州之戎等问题。余太山《塞种史研究》⑦，则是利用东西方文献来全面讨论塞种人的著作，内容涉及贵霜兴起前的各主要中亚民族。他又在此基础上，著《古族新考》⑧，提出西方文献中塞人四部落 Asii、Tochari、Gasiani、Sacarauli 可能是中国先秦史籍所记允姓之戎、大夏、禺知（禺氏）、莎车的假说。

对公元前后中亚史上的重要民族月氏及其所建立的贵霜王朝的研究，主要有黄靖《大月氏的西迁及其影响》⑨、《贵霜帝国的年代体系》⑩ 和余太山《第一贵霜考》⑪。至于塔里木盆地及其以东地区

---

① 《中亚学刊》1990 年第 3 辑，第 1～16 页。

②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 年。

③ 《新疆社会科学》1985 年第 1 期，收入作者《丝绸之路考古研究》，第 210～230 页。

④ 《新疆社会科学》1985 年第 1 期，第 59～64 页。

⑤ 《西北民族研究》1989 年第 1 期，收入作者《于阗史丛考》，上海书店，1993 年，第 191～211 页。

⑥ 此文系为《于阗史丛考》所写序言，见该书第 1～13 页；又载《中国文化》第 8 期，1993 年，第 165～170 页。

⑦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年。此书有英文本：*A Study of Saka History*, *Sino-Platonic Papers*, Philadelphia, July 1998.

⑧ 北京：中华书局，2000 年。此书亦有英文本：*A Hypothesis about the Source of the Sai Tribes*, *Sino-Platonic Papers*, Philadelphia, September 2000.

⑨ 《新疆社会科学》1985 年第 2 期，第 96～99 页。

⑩ 《中亚学刊》1987 年第 2 辑，第 16～50 页。

⑪ 《中亚学刊》1995 年第 4 辑，第 73～96 页。

汉代以后的月氏人记录，荣新江《小月氏考》有详细论述。[①]

匈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曾统治过中亚，匈奴的制度和文化都对中亚绿洲王国产生过影响。林干著《匈奴通史》[②]，并编《匈奴历史年表》[③]，对匈奴及其对中亚的统治做了全面的叙述。他编有二册《匈奴史料汇编》[④]，广辑汉文文献中的匈奴资料，极便学人。他还把学者们研究匈奴的主要论文辑为《匈奴史论文选集：1919～1979 年》[⑤]。

从汉武帝时始，中原王朝或短或长地统治过中亚诸绿洲王国，更增强了双方的联系。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与西域关系史研究》[⑥]，上编重新检讨关系史，下编研究相关的一些问题，如张骞、甘英的出使以及地理、职官、年代等问题。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敦煌地区出土的汉简，对两汉魏晋的西域与中原交往史有一定的补充，其中马圈湾出土者，有吴礽骧《新获敦煌马圈湾汉简中的西域资料》[⑦] 和胡平生《敦煌马圈湾简中关于西域史料的辨证》[⑧]。对于包含中亚史料更多的悬泉置出土汉简，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已发表了《甘肃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发掘简报》、《敦煌悬泉汉简内容概述》和《敦煌悬泉汉简文选》，[⑨] 其中有不少关于中亚的资料，我们期待着这批汉简的全部整理公布。

从本世纪初叶以来，尼雅和楼兰两地出土了大批汉文和佉卢文

---

① 《中亚学刊》1990 年第 3 辑，第 47～62 页。

②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年。

③ 北京：中华书局，1984 年。

④ 北京：中华书局，1988 年。

⑤ 北京：中华书局，1983 年。

⑥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年。

⑦ 《西北史地》1991 年第 1 期，第 1～11 页。

⑧ 《尽心集——张政烺先生八十庆寿论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年，第 273～297 页。

⑨ 《文物》2000 年第 5 期，第 4～45 页。

简牍，为研究公元2世纪到4世纪的楼兰鄯善王国提供了中原汉文史籍之外的当地材料，已经产生了一批中外学者的优秀研究成果。5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新疆考古工作者又在尼雅和楼兰两地有新收获，这些材料推动了人们对楼兰鄯善的研究，其中侯灿对考古资料和新出汉文简牍做了整理，并讨论了一些相关问题，他的文章已汇入《高昌楼兰研究论集》①。林梅村重新翻译了国外出版的部分佉卢文简牍，编为《沙海古卷——中国所出佉卢文书初集》②，并解读了几件新出佉卢文书，利用这些新旧资料，重新讨论鄯善王国的世系、地理等问题。③ 孟凡人先后出版《楼兰新史》④ 和《楼兰鄯善简牍年代学研究》⑤，提出许多与上述两位学者不同的观点。其他零散发表的重要论文，多收入穆舜英与张平合编《楼兰文化研究论集》⑥。1988～1997年之间，中日组成"共同尼雅遗迹学术考察队"，对尼雅遗址进行多次考古调查和发掘，获得许多新的考古资料，考察队已出版《中日·日中共同尼雅遗迹学术调查报告书》第一、二卷⑦，除调查报告外，第二卷有一组研究论文，讨论尼雅遗址的历史地理、聚落形态和各种出土文物及其反映的问题。

公元4至6世纪，中原分裂为南北朝，势力不强，中亚北部或西部的游牧民族异常活跃，其中嚈哒是我国前辈学者很少涉及的领域。余太山在一系列研究论文基础上汇成专著《嚈哒史研究》⑧，填

---

①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

②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

③ 其相关论文收入作者三本论文集：《西域文明》，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年；《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古道西风——考古新发现所见中西文化交流》，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

④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年。

⑤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

⑥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

⑦ 共同尼雅遗迹学术考察队编印，1996、1999年，非卖品。

⑧ 济南：齐鲁书社，1986年。

补了我国中亚史研究的一项空白。周伟洲《敕勒与柔然》[①]，概述了这两个曾经入主西域的北方游牧民族。段连勤《丁零、高车与铁勒》[②]，通盘叙述了这三个北方游牧民族发展演变的历史脉络。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③]，则利用新出吐鲁番文书，比较全面的阐述了麴氏高昌与东西突厥以及铁勒的关系。

从北朝到隋唐，以青海为根据地的吐谷浑，也把势力扩大到西域南道。周伟洲《吐谷浑史》[④]，是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吐谷浑的著作。另外，他还就吐谷浑人的墓志、文物和藏文材料中的吐谷浑记事发表了专题研究，[⑤] 并编成《吐谷浑资料辑录》[⑥]。周伟洲还著有《中国中世西北民族关系史研究》[⑦]，主要是探讨北朝隋唐时期西北各民族间的关系问题。

由于吐鲁番出土了大量属于高昌郡和高昌国时期的文书，使人们对魏晋南北朝时期高昌的认识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唐长孺对高昌郡军政制度的研究，[⑧] 陈仲安、吴震、王炳华、侯灿、陈国灿、朱雷、姜伯勤、卢开万、王素、孟宪实、张铭心、荣新江等对麴氏高昌政治、经济、制度、宗教、文化、对外关系等方面的深入研究，[⑨] 展现了高昌历史的许多真相，填补了中亚史研究的一项空白，也是我国学术界可以夸耀于世界学林的一个方面。近年来，王

①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年。

②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

③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 年。

④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 年。

⑤ 已收入作者《西北民族史研究》，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 年。

⑥ 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2 年。

⑦ 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 年。

⑧ 收入作者《山居丛稿》，北京：中华书局，1989 年。

⑨ 有关论文主要发表于《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及《二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1990 年）、《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文物》、《出土文献研究》及《续集》、《新疆文物》、《敦煌吐鲁番研究》等书刊中，其中《敦煌吐鲁番研究》第 4 卷（1999 年）为吐鲁番研究专号。

素《高昌史稿·统治编》、《高昌史稿·交通编》出版，[①] 他计划中的五编《高昌史稿》，将全面系统阐述唐朝征服以前的高昌历史的各个方面。

魏晋以降，中亚粟特地区的昭武九姓粟特人大批东来，从事商业贸易外，也把西亚的文化传入西域和中原。蔡鸿生对昭武九姓的城邦制度、东方聚落、礼俗、贡物以及唐朝与粟特的关系做了深入的探讨，他有关粟特和突厥的论文已经汇集为《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②]，其中包括对中亚物种和文化东传问题。马小鹤《七一二年的粟特》[③]、《米国钵息德城考》[④]、《公元七世纪初年的粟特》[⑤]，利用当地出土文书，结合汉文史籍，对唐朝时期粟特本土做了的深入探讨。许序雅《唐代丝绸之路与中亚历史地理研究》[⑥]，重新检讨了《大唐西域记》、《新唐书·地理志》、《新唐书·西域传》、《册府元龟》的有关昭武九姓的史地记载。姜伯勤利用新出吐鲁番文书，研究了粟特人在高昌王国的情形。[⑦] 荣新江则揭示了粟特人在塔里木盆地绿洲王国的广泛存在。[⑧]

北朝隋唐与中亚关系更为密切的北方游牧民族是突厥。林干《突厥史》[⑨]，所述比较简略，但后附耿世民对古突厥语碑铭的重新翻译，却为历史研究者提供了比较全面的突厥碑铭资料。芮传明参

---

①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2000年。

② 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参看拙撰书评，载《唐研究》第5卷，1999年，第518～522页。

③ 《新疆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第72～81页。

④ 《中亚学刊》1987年第2辑，第65～75页。

⑤ 《中亚学刊》1990年第3辑，第109～138页。

⑥ 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

⑦ 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第150～263页。

⑧ 《西域粟特移民考》，《西域考察与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57～172页。

⑨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8年。

考耿译和西方学者的成果，在《古突厥碑铭研究》[①] 中做了翻译和注释，他还专题探讨了东突厥进兵中亚的几次重要事件。至于汉文史料，虽然已有《突厥集史》，但仍有不少工作要做，杨圣敏《资治通鉴突厥回纥史料校注》[②]，即是方便学人的工作之一。在突厥史的研究方面，薛宗正有《突厥史》[③]，比较全面地论述了东西突厥的历史。吴玉贵则从突厥分裂前后与中原王朝的关系上着眼，他的《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④]，系统阐述了自己的观点，间有深入的考证结果。吴景山《突厥社会性质研究》[⑤]，则重点分析东西突厥的社会性质。林干还编有两册《突厥与回纥历史论文选集：1919～1981 年》[⑥]，选录了比较重要的论文，对一些未能选入的论文做了提要。

唐朝是中原王朝直接控制中亚大片领土的又一个重要时期，前人的研究成果也相对较多。这一阶段唐代西域史研究的进步，更主要是得力于唐长孺主编的《吐鲁番出土文书》[⑦] 公布的新史料。唐长孺《敦煌吐鲁番史料中有关伊西庭节度使留后问题》[⑧]、《唐西州差兵文书跋》[⑨]，张广达《唐灭高昌后的西州》[⑩]、黄惠贤《从西州高昌县征镇名籍看垂拱年间西域政局之变化》[⑪]、姜伯勤《吐鲁番文书

---

①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原为复旦大学博士论文，1990 年。

② 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 年。

③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年。

④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年。详参拙撰书评，载《唐研究》第 5 卷，1999 年，第 499～504 页。

⑤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 年。

⑥ 北京：中华书局，1987 年。

⑦ 共十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1992 年。

⑧ 《中国史研究》1980 年第 3 期，收入《山居丛稿》，第 411～428 页。

⑨ 《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 年，第 439～454 页。

⑩ 《东洋文化》第 68 号，东京大学，1988 年，收入《西域史地丛稿初编》，第 113～174 页。

⑪ 《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第 396～438 页。

所见的“波斯军”》①、陈国灿《安史乱后的唐二庭四镇》②、荣新江《新出吐鲁番文书所见西域史事二题》③，都是利用文书材料写成的较为重要的专题研究。新出墓志也是唐代西域史的重要史源，陈国灿《跋〈武周张怀寂墓志〉》④、郭平梁《阿史那忠在西域》⑤、鲁才全《跋武周〈袁公瑜墓志〉》⑥、《武周〈匹娄焕德墓志〉跋》⑦，吴震《唐〈高耀墓志〉补考》⑧，则利用墓志材料来补证中亚史事。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⑨，在森安孝夫、白桂思（C. I. Beckwith）等人近年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全面讨论了唐朝与吐蕃、大食对中亚的争夺，特别是系统地把藏文史料引入到唐代西域史的研究中。他的《七八世纪之交吐蕃入西域之路》⑩，是对上书的补充。

对安西四镇的个案研究，也是这一阶段的进步。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由于中苏论战和对李白出生地的追寻，碎叶镇及其与焉耆镇的交替问题，一时间成为热门话题。关于碎叶的地理位置，张广达《碎叶城今地考》强有力地论证其当在中亚阿克·贝希姆城。⑪

---

① 《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1期，改订稿收入《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第37～50页。

② 《唐研究》1996年第2卷，第415～436页。

③ 《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5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339～354页。

④ 《文物》1981年第1期，第47～50页。

⑤ 《新疆历史论文续集》，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82～193页。

⑥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8期，1986年，第32～40页。

⑦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9～10期，1988年，第49～56页。

⑧ 《新疆社会科学》1988年第4期，第61～67页。

⑨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详参拙撰书评，《北京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第122～123页。

⑩ 《庆祝邓广铭教授九十华诞论文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74～85页。

⑪ 《北京大学学报》1979年第5期，收入《西域史地丛稿初编》，第1～30页。

这一结论得到近年发表的出自该城的杜怀宝造像碑的印证，周伟洲《吉尔吉斯斯坦阿克别希姆遗址出土唐杜怀宝造像题铭考》[①]，据此新材料做了申论。而比较合理的碎叶、焉耆交替说，见王小甫《论安西四镇焉耆与碎叶的交替》[②]。近代以来，和田地区出土了一些唐朝时期的官私文书，张广达与荣新江合著《于阗史丛考》[③]，即以出土文书为主要史料来研究于阗历史。他们根据新发表的俄藏和田出土文书和 Hedin 24 号文书的新图版，撰《八世纪下半至九世纪初的于阗》[④]，澄清了唐朝统治于阗末期的情况，并提出新的陷蕃年代。荣新江《于阗在唐朝安西四镇中的地位》[⑤]、《关于唐宋时期中原文化对于阗影响的几个问题》[⑥]，殷晴《唐代于阗的社会经济生活》[⑦]，结合史籍和文书，对唐代于阗史进行了深入研究。孟凡人探讨了从汉魏到五代宋初的于阗王统，[⑧] 但推测较多。关于另一绿洲大国——龟兹，刘锡淦与陈良伟《龟兹古国史》[⑨]、苏北海《丝绸之路与龟兹历史文化》[⑩]，都有一定篇幅叙述唐朝时期的龟兹。吴平凡与朱英荣《龟兹史料》[⑪]，则辑录了史籍中的龟兹史料。王炳华《唐安西柘厥关故址并有关问题研究》[⑫]，是利用库车出土文书研究安西镇的成果。

---

① 《唐研究》2000 年第 6 卷，第 383～394 页。

② 《北京大学学报》1991 年第 6 期，第 95～104 页。

③ 上海书店，1993 年。

④ 《唐研究》1997 年第 3 卷，第 339～361 页。

⑤ 《西域研究》1992 年第 3 期，第 56～64 页。

⑥ 《国学研究》第 1 卷，1993 年，第 401～424 页。

⑦ 《新疆社会科学》1989 年第 6 期，第 67～80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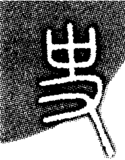
⑧ 有关的三篇文章收入作者《新疆考古与史地论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 年，第 197～231 页。

⑨ 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1992 年。

⑩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 年。

⑪ 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1996 年。

⑫ 《西北史地》1987 年第 3 期，收入作者《丝绸之路考古研究》，第 82～105 页，改题为《新疆库车玉其土尔遗址与唐安西柘厥关》。



与安西具有同样作用的北庭，是唐朝经营西域北部的基地，前人着意不多。孟凡人《北庭史地研究》①，主要是对唐朝时期的北庭史事的研究，涉及交通、地理、职官、年代、史料解说等。孟氏之撰作此书，当与他参与发掘北庭故城外佛寺遗址有关。此寺规模壮观，是西州回鹘王家曾经供奉之寺，因之可以说这一新发现是吐鲁番盆地所存西州回鹘王国之外的最重要的遗迹了，现已出版了考古报告《北庭高昌回鹘佛寺遗址》② 和《北庭高昌回鹘佛寺壁画》③，唯从历史学的角度加以探讨的论著尚不多见。

7 世纪上半叶兴起于青藏高原的吐蕃王朝，一直与唐朝争夺中亚，并在 8 世纪末到 9 世纪中叶唐朝受安史之乱的影响而无力据守中亚时，占领了中亚广大地区。汉文史料对吐蕃之经营中亚记载，散见于大部头的汉文史籍中。苏晋仁与肖练子《册府元龟吐蕃史料校正》④、苏晋仁《通鉴吐蕃史料》⑤、范学宗等《全唐文全唐诗吐蕃史料》⑥、汤开建与刘建丽《宋代吐蕃史料集（一）》、《宋代吐蕃史料集（二）》⑦，极便学人检索。王尧与陈践《吐蕃简牍综录》⑧，译释了斯坦因所获及解放后新出土的于阗、鄯善藏文简牍文书。他们两位还单独或合作发表过一些有关吐蕃统治敦煌或中亚的论文。⑨杨铭《吐蕃统治敦煌研究》⑩，也包括对吐蕃统治于阗史事的探讨。

---

①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 年。

② 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1991 年。

③ 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1990 年。

④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年。

⑤ 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 年。

⑥ 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 年。

⑦ 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6 年。

⑧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 年。

⑨ 这些文章主要收入两位作者的《敦煌吐蕃文书论文集》，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 年。

⑩ 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 年。

此外，荣新江、张云、殷晴，利用了前人译出的藏文文书，初步研究了吐蕃统治中亚的情况。

回纥（后改称回鹘）与吐蕃南北相对，自唐中叶以后成为制约西域北道的强大势力。840 年漠北回鹘汗国破灭后，部众西迁，在天山东部建立西州回鹘王国，元代称作畏兀儿王国。有关回鹘的研究前人已做了不少工作，有较好的基础。冯家昇、程溯洛、穆广文的《维吾尔族史料简编》增订出版，① 冯氏还刊布了一些新发现的回鹘文材料。② 程氏则主要利用汉文史料，研讨了西州回鹘的世系及与中原王朝的关系等问题。③ 杨圣敏在编纂上述《资治通鉴突厥回纥史料校注》的基础上，撰写了以回纥汗国为中心的通史《回纥史》④。与此书同名的林干与高自厚《回纥史》⑤，却与维吾尔族简史编写组所编《维吾尔族简史》⑥ 相似，是维吾尔民族古代通史，从回鹘汗国到清朝维吾尔，均在叙述范围。编年体的则有冯志文与吴平凡《回鹘史编年》⑦。刘美崧《两唐书回纥回鹘传疏证》⑧，对有关回鹘的汉文史料做了精细的注疏。陈高华《元代维吾尔哈剌鲁资料辑录》⑨，把散在史籍中的资料按编年、记传和散存分别辑录出来，是兼通元史和中亚史的专家所做的极便学人的资料集。张广达与荣新江《有关西州回鹘的一篇敦煌汉文文献》⑩，用敦煌文书中保存的

① 北京：民族出版社，1981 年。

② 收入《冯家昇论著辑粹》，北京：中华书局，1987 年。

③ 其论文均收入《唐宋回鹘史论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

④ 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 年。

⑤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4 年。

⑥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 年。

⑦ 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1992 年。

⑧ 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 年。

⑨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 年。

⑩ 《北京大学学报》1989 年第 2 期，收入张广达：《西域史地丛稿初编》，第 217～248 页。



一篇西州回鹘讲经文，全面地补充了10世纪时西州回鹘官制、僧官制、宗教信仰和所统部族的情况。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①]，系统勾勒出9、10世纪西州回鹘与沙州归义军的争战与交往，大多为史籍所缺。

有关西州回鹘的更重要的材料，是本世纪初以来大量出土的回鹘人自身的回鹘文文献。耿世民发表了许多新发现的回鹘文文献的译释，贡献最多，其中与西州回鹘史关系密切的文章有：《回鹘文摩尼教寺院文书初释》[②]、《回鹘文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研究》[③]，为西州回鹘或畏兀儿王国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本民族资料。[④] 前者是研究西州回鹘摩尼教所不可或缺的史料，而后者是复原西州回鹘可汗世系表时所必须参考的。这些社会经济类文书是研究元代畏兀儿社会的主要材料，已有不少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张承志《元代畏兀尔人内部状况》[⑤] 做过初步探索。尚衍斌除发表《元代畏兀儿地区社会经济生活探究》以外，[⑥] 又出版《元代畏兀儿研究》[⑦]，系统阐述了当地的经济制度、农奴制度和经济生活。刘迎胜《蒙元时代中亚社会经济研究》[⑧]，所讨论的不仅是畏兀儿地区，还包括河中和塔里木盆地等地区。

8世纪以来突厥语诸部的西迁，特别是回鹘西迁，对中亚历史有

---

①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② 《考古学报》1978年第4期，修订本载《新疆考古三十年》，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收入作者《新疆文史论集》，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54～382页。

③ 《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收入作者《新疆文史论集》，第400～447页。

④ 其他相关论文，均收入作者《新疆文史论集》。

⑤ 《民族研究》1983年第5期，第13～23页。

⑥ 《民大史学》第1辑，1996年，第327～346页。

⑦ 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年。

⑧ 《中亚学刊》第4辑，1995年，第184～217页。

着深远的影响。华涛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出版《西域历史研究（8至10世纪）》[①]，利用阿拉伯文材料与中文资料相印证，论述葛逻禄、回鹘西迁引起的中亚地区政治、民族、宗教等方面的变化，包括回鹘在天山东部的发展、西州回鹘疆域、黑韩王朝的兴起等问题。荣新江《龙家考》[②]，则是利用敦煌史料，来说明回鹘西迁引起的焉耆地区民族的再迁徙。

回鹘的西迁，使得天山以南塔里木盆地周边也渐渐进入突厥化的过程，但位于盆地西南边的于阗，在9世纪中叶吐蕃统治结束之后至1006年灭于黑韩王朝之前，曾独立兴盛了一百多年。上述张广达与荣新江《于阗史丛考》，整理了敦煌文书中所存的有关于阗的史料，并探讨了于阗王家世系和于阗人在敦煌的活动。

以喀什噶尔为首都的黑韩王朝，由于在公元10世纪第一个接受了伊斯兰教而开创了中亚史的新时代。张广达《关于马合木·喀什噶里的〈突厥语词汇〉与见于此书的圆形地图》[③]，介绍了这位黑韩王朝的学者及其著作中有关中亚的记载，特别是关于黑韩王朝的记载引起了许多学者的注意，由此产生了研究喀什噶里及其著作的一阵热潮。魏良弢在一系列论文的基础上，完成我国第一部《喀喇汗王朝史稿》[④]。蒋其祥《新疆黑汗朝钱币》[⑤]，以新疆新发现的大量钱币资料，对黑韩王朝史做了订补。

辽朝与西北民族关系密切，陈得芝、黄时鉴、周良霄、王治来、余大钧都对西辽史有所贡献。魏良弢《西辽史研究》[⑥]，对西辽的政治、疆域、民族、社会经济、宗教文化、纪年等，做了全面的研究。

---

①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② 《中亚学刊》第4辑，1995年，第144～160页。

③ 《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8年第2期，收入作者《西域史地丛稿初编》，第57～82页。

④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

⑤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

⑥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



他又有《西辽史纲》[1]，是在《研究》的基础上，阐述西辽历史发展进程及社会经济文化的总体面貌。

蒙古的兴起及其西征，对中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除畏兀儿王国在蒙元时期一度保存其独立国家外，大多数中亚王国为蒙古所灭，而分由察合台、窝阔台汗国或元朝直接统治，其中察合台汗国占据的中亚领地最多。另外，各汗国间对中亚之地的争夺，也构成蒙元時期中亚史的重要篇章。陈高华在辑录史料的同时，对畏兀儿、哈密里、哈剌鲁等中亚王国的史事及与中原的关系做了研究。[2] 杨志玖《元史三论》[3] 及一些文章，讨论了中亚的一些民族。刘迎胜发表一系列文章和《西北民族史与察合台汗国史研究》专著，[4] 对察合台汗国统治中亚及其与元朝、窝阔台汗国的关系做了深入细致的研究。

明代与中亚的交往相对要少，但明代史料却汗牛充栋。陈高华《明代哈密吐鲁番资料汇编》[5]，汇辑了传记、编年及其他史籍共 35 种中的有关哈密和吐鲁番两地的史料，极便学人。他还撰有《关于明代土鲁番的几个问题》[6]，讨论吐鲁番地面的土地和人口、速檀的世系、与明朝的关系。

1514 年，东察合台汗国秃黑鲁帖木儿汗后裔萨亦德汗创建叶尔羌汗国，都叶尔羌（莎车），领有中亚大部分地区，1680 年并入准噶尔汗国。由于史料较缺，过去人们对此研究不多。魏良弢《叶尔羌

---

①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

② 《元代新疆史事杂考》，《新疆历史论文续集》，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 年，第 274～294 页。《元代的哈剌鲁人》，《西北民族研究》1988 年第 1 期，第 145～154 页。

③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年。

④ 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 年。

⑤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4 年。

⑥ 《民族研究》1983 年第 2 期，第 26～34 页。

汗国史纲》[①] 首次系统地论述了汗国的创建、发展、昌盛、衰落和覆亡的历史，并分析概括了汗国内部体制、官制以及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情况。

以天山北麓为主要游牧地的西蒙古各部，在明、清时期分别建立过瓦剌、准噶尔等强大的政权，后者曾占领天山南北，势力强大，其各部间既有分合，又有离徙。郭平梁与纪大椿编《清实录新疆资料辑录》十二辑[②]、准噶尔史略编写组编《〈明实录〉瓦剌资料摘编》[③]、《〈清实录〉准噶尔史料摘编》[④]，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有关西蒙古各部的研究，成果很多，形成专书的就有新疆民族研究所《土尔扈特部回归祖国》[⑤]、准噶尔史略编写组《准噶尔史论文集》[⑥]、马汝珩与马大正《厄鲁特蒙古史论集》[⑦]、准噶尔史略编写组《准噶尔史略》[⑧]、杜荣坤与白翠琴《西蒙古史研究》[⑨]、王辅仁与陈庆英《蒙藏民族关系史略》[⑩]、白翠琴《瓦剌史》[⑪] 等等，代表了对明清时期中亚史的研究成果。

在准噶尔兴起以前，南疆地区分裂的察合台后裔，渐渐被白山派和黑山派和卓控制。准部兴起后，白山派勾结准部进入南疆，成为准噶尔汗国的附庸。关于和卓家族，刘正寅、魏良弢《西域和卓家族研究》[⑫]，系统地阐述了其来历、世系、相互斗争以及与叶尔羌

---

① 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4 年。
② 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78 年。
③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 年。
④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 年。
⑤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 年。
⑥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 年。
⑦ 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4 年。
⑧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年。
⑨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 年。
⑩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年。
⑪ 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 年。
⑫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年。

汗国、准噶尔汗国的关系，说明了清朝灭准噶尔汗国，大小和卓起兵抵抗，最后被清朝平定的历程。程溯洛《论大小和卓木》[1]，也有所论述。

清朝统一新疆后，设官立职，并广泛推行屯田制度，以期牢固控制。王希隆《清代西北屯田研究》[2]，分兵屯、旗屯、犯屯、民屯、回屯、牧厂几类，叙述了清朝在新疆等西北地区的屯田及其作用。另外，华立《清代新疆农业开发史》[3]、齐清顺《试论清代新疆兵屯的发展和演变》[4]，也探讨了兵屯等问题。

中亚浩罕汗国对清朝新疆的侵扰，是19世纪中叶中亚史的重要篇章。潘志平《中亚浩罕国与清代新疆》[5]，对浩罕汗国做了全面的探讨。而平定浩罕入侵势力的清朝名将左宗棠，则是杜经国《左宗棠与新疆》[6] 一书的主题。此外，北京大学历史系《沙皇俄国侵略扩张史》[7]、郭绳武编《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史》[8]、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沙俄侵华史》第3卷[9]等，也有相当篇幅叙述沙俄蚕食中亚领土的过程。

与专题研究相比，通史的编纂相对薄弱。新疆民族研究所《新疆简史》第1册为古代部分，[10] 但篇幅不长。王治来的《中亚史》只出版了第一卷，[11] 内容从原始文化到阿拉伯的入侵，较前者为详，

---

① 《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1期，第18～21页。
② 兰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
③ 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
④ 《新疆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第56～62页。
⑤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
⑥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
⑦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
⑧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
⑨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
⑩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
⑪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

但未能继续下去。他后来改写《中亚史纲》[①]和《中亚近代史（16～19世纪）》[②]，仍是纲要性通史，较《简史》略详。项英杰《中亚：马背上的文化》[③]，侧重中亚游牧民族文化的叙述。余太山主编《西域通史》[④]，是目前集体撰作的最佳通史。他还编有《西域文化史》[⑤]，可视作《通史》的姊妹篇。

翻译西方和日本学者的中亚史研究著作，在此期间也取得相当多的成果，特别是附有译注的一些蒙元史外文史籍的翻译，对中亚史研究起了推进作用。史籍类有何高济译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⑥]、吕浦译道森编《出使蒙古记》[⑦]、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译海答儿《中亚蒙兀儿史》1～2编[⑧]、余大钧与周建奇译拉施特《史集》1～3卷[⑨]、耿升与何高济译《柏朗嘉宾蒙古行纪·鲁布鲁克东行纪》[⑩]、耿升译戈岱司《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⑪]、耿升译费琅《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文献辑注》[⑫]、宋岘译注伊本·胡尔达兹比赫《道里邦国志》[⑬]；研究著作有耿升译哈密顿《五代回鹘史料》[⑭]、罗致平译巴托尔德《中亚突厥史十二讲》[⑮]、陈俊谋译松田寿

---

①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
② 兰州大学出版社，1989年。
③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
④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
⑤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社，1995年。
⑥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
⑦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⑧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
⑨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1986年。
⑩ 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⑪ 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
⑫ 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⑬ 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
⑭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
⑮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男《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①]、吴玉贵译汉布里《中亚史纲要》[②]。其中尤以耿升的贡献最多。

最近20年来，我国学者也陆续把一些研究成果发表在西方和日本的学术书刊上，由于中亚史是一门极富国际性的学科，所以这对于国际同行了解我们的研究成果是很有助益的。此外，已出版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组织编写的《中亚文明史》（*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of Central Asia*），有我国学者吕遵锷、安志敏、马雍、王炳华、孙毓棠、张广达、穆舜英、王尧、耿世民、王甫仁、刘迎胜等撰写的章节，张广达还是第三卷两位副主编之一，我国学者也常常应邀参加有关中亚史的国际学术会议，反映了国际同行对我国学者中亚史研究的成果给予的关注。

总之，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我国的中亚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研究范围全面展开，在某些课题上较此前的研究深入一步，如中亚古人种、高昌国史、中亚的粟特聚落、安西四镇、察合台汗国、叶尔羌汗国等等。而且，开始了一些新课题的系统研究，如考古所见的塞种和吐火罗人、哌哒史等等。新发现文物以及相关学科如敦煌学的进步，也推动了中亚史的研究。而国际交往的扩大，极大地加快了吸收国外同行成果的速度。

五

我国的中亚史研究，主要集中在帕米尔以东，这既是我们的长处，又是我们的短处。长处在于汉文史料对这一地区记载较多，而在此范围内新发现的考古材料，可以较快地为我国学者运用到中亚史研究中去。我们的短处在于上述以外的中亚地区研究十分薄弱，

① 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年。

②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

如在中亚史上影响深远的贵霜王朝，我们目前所拥有的研究成果，不能与西方学者的成果同日而语，甚至我们还没有全面地吸收他们的研究成果。

我国学者对汉文史料的熟悉和运用，是我们研究某些中亚史课题之所以能够做出些成就的原因所在，特别是目前西方和日本年青一代中亚史研究者大多不具备伯希和那样的汉文水平，更是我们应当发挥所长的时候。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知道，非汉语的资料在中亚史的许多领域里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而我国治中亚史的学者虽然大多通晓一两门现代外语，但却没有像陈寅恪那样的能运用多种胡语材料的史学家。当然，随着每一种语言资料的不断增加，目前已经不可能再产生像伯希和和陈寅恪那样的通才了。但我们应当充分掌握中亚胡语资料的研究成果。与欧美、日本相比，目前我国中亚史研究队伍中，较好地掌握和运用民族语言材料者并不多见。

国际学术交往的频繁，便于我国中亚史研究者获取国外同行的成果，并使得一些人有机会到国外的学术研究中心，与同行切磋讨论，这当然极大地推动了我国中亚史研究的进步。但我国中亚史研究者的数量过于庞大，一些不具备研究条件的人也混迹其中，不时有抄袭国内外同行的事情发生。甚至一些颇富成果的研究者，由于不注意严格的学术规范，或因为某些杂志的编辑擅自删改，也使得作者自己陷入抄袭的指责中。学术规范的严格建立，是健全发展中亚史研究，扩大国际学术交流的一项重要任务。

不断出土的考古新资料，极大地促进了我国中亚史研究的进展。加之汉文史料对新疆伊斯兰化以前的记载比较明确，使得研究伊斯兰化以前的人较多，成果也相对多一些。这就造成了我国中亚史研究越来越形成一种重古轻近的倾向。虽然这一现象近年有所改观，但不论是从史学作为一种中华民族文化的积累着眼，还是从史学应当为国家现实经济建设服务来看，我们都需要更多一些研究伊斯兰化以后的中亚史的专家，来填补中亚史上的许多空白。

翻译外国同行的优秀中亚史研究论著，是促进我们自身发展的




一个重要手段，也是我国中亚史研究从一开始就有的优良学术传统，应当继续发扬。但中亚史论著的翻译，不同于一般的外文转译，需要在精通外语的同时，掌握一些专业知识。近年来的一些译著，往往附有出自专业人员之手的校注或补注，使得译著在某些方面较原作更胜一筹，这是值得称赞的。但同时也应指出，仍有不少西方、日本的中亚史名著没有译出，如伯希和与穆尔合译的《马可波罗游记》和伯希和的《注释》，因而目前还在不断翻印冯承钧的译本。有些优秀著作已经译出，但中亚史著作因大量涉及各种类型的外文，排版不易，尚未出版，如巴托尔德的《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相对而言，最重要的也是最难译的应属原始文献，我们期待着这方面的成果陆续出版。

第五章　北亚史研究回顾

20世纪是我国北亚历史研究从传统走向现代的世纪，也是我国学者在本领域研究中取得巨大进展的世纪。

北亚历史研究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我国先秦文献中对北亚民族，如荤粥、鬼方、猃狁等部落的记载虽然不多，但却几乎是这一时代记载亚洲北部民族的仅存史料。西汉司马迁修《史记》著《匈奴列传》以后，北部亚洲各族的历史文化成了我国历代史家关注的领域。

我国史家记录、编修北亚历史时，历来所依据的主要是汉文官私文册。这一传统在清末开始变化。19世纪80年代末清政府派洪钧为驻德俄奥荷四国公使。洪钧本人熟悉西北史地，他到达欧洲后在洋文参赞金凯利的协助之下，了解到俄国学者贝勒津对波斯史家拉施都丁《史集》的翻译和出版工作，得知蒙古史与西北史地研究除汉文史料之外，尚有丰富的域外史料可资利用，归国后遂著《元史译文证补》一书，向国内同仁介绍自己的发现。①

15世纪葡萄牙人渡洋闯入远东以后，许多西方传教士将欧洲的新科学介绍到中国。但这些科学新知始终停留在社会上层。从统治者到士大夫中的多数人一直以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其余各国不过

① 参见韩儒林：《元史研究之回顾与前瞻》，初刊于《责善半月刊》，1940年第2卷第7期。《关于洪钧》，初刊于《边政公论》，1942年第1卷第9期。上述两文皆收于韩儒林：《穹庐集——元史及西北民族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68、136～139页。



是些蛮夷之邦。鸦片战争之败，举国为之震惊。国人皆知西洋科学昌盛，于是有向欧美派遣留学生之举措。严复译《天演论》可谓社会科学师法西洋的代表，而洪氏之《元史译文证补》可谓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我国北亚史研究从传统走向现代的里程碑式之作。至20世纪，除利用书面资料以外，现代学者考古、碑铭与古文字学的成果亦先后成为学者们研究北亚历史的资料。

以下拟按专题，且以时代先后为序，分别综述近百年来我国有关北亚历史研究的发展状况。

一、史前北亚及匈奴研究

现代意义上的北亚考古学在我国始于上世纪20年代。随着内外蒙古及其周边地区史前遗址及文物发现日见增多，我国学者中有人开始将北亚历史研究上推至远古时代，并试图将先秦文献中有关北亚民族的记载与考古发现成果相联系。这一研究的代表作是内蒙古大学已故亦邻真教授写于20世纪60年代的论文《从远古至唐代的我国蒙古地区》。①

匈奴是我国历史文献中第一个留有丰富记载的北亚草原民族。近百年来其研究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即：1900～1949年、1950～1979年及1980～2000年。内容极为广阔，涉及族源、社会性质、民族关系、语言风俗、西迁南迁等各方面。以下试分别予以评述。

(一) 匈奴的族源、族属问题

匈奴的族源问题，是百年不衰的研究热点之一。司马迁在《史

---

① 收于《亦邻真蒙古学论文集》，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47～510页。据文后附注，此文写于1966年，1976年作为蒙古史专题讲座稿印发。

记·匈奴列传》曾提出，匈奴为夏后氏苗裔，即与汉人同源。此说不足为凭。国内以科学态度与方法开启这一研究的首推王国维。他在《鬼方昆夷猃狁考》一文中认为商周间的鬼方、昆夷、獯；宗周时猃狁；春秋时代的戎、狄，战国时的胡，皆为匈奴同族。后梁启超、冯家昇等赞同此说。而蒙文通、黄文弼、岑仲勉等不同意上述看法。蒙文通认为其族源包括荤粥、鬼方、猃狁、戎、胡在内的所有原先活动于大漠南北的各族。何震亚、吕思勉等人继承司马迁旧说，坚持认为匈奴源于夏族。也有一些学者提出匈奴西来说。[①] 20世纪80年代以后，夏族说、西来说基本上被否定。但是匈奴族源问题仍无定论。就族属问题而言，我国学者主张蒙古说、突厥说者各有其人。还有一些学者曾主张斯拉夫说，[②] 但这种说法当今已经无人支持。

识辨族源是带有综合性的研究工作，通常须分析研究历史文献并借助语言学、人类学、民族学和考古学手段。语言的共同性是民族特征的第一要素，故而中外学者们在匈奴族属问题上的研究多集中于匈奴语言研究。有关匈奴语言的资料多为汉文文献中所记的一些匈奴语的只言片语或词汇，学者们所使用的主要方法是将这些词语汇集起来，与现存的某种北亚语言相比较，故其结论的可信度是有疑问的。

这一研究领域中较有影响的是方壮猷。他1930年12月发表的《匈奴语言考》（刊于《国学季刊》第2期第2号）及《匈奴王号考》（《燕京学报》第8期）两文，考释匈奴的国号、王号、官名、人名、地名、物名等词汇，认为匈奴语更接近于蒙古语。其研究并未比其先驱日本学者白鸟库吉有太多进展（1923年巴黎《亚洲杂志》第

---

① 参见林干：《试论匈奴的族源族属及其与蒙古族的关系》，《匈奴史论文选集（1919—1979）》（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75～87页）及收入此论文集的其他几篇论文，如黄文弼：《论匈奴之起源》（1943年6月）等。

② 同上。



202卷刊载《匈奴起源考》，汉译为《匈奴民族考》，何健民译）。1945年3月，徐复撰有《阏氏读音考》（刊于《东方杂志》第41卷第5号）。作者依据中国文献、国外研究、音韵学资料，对“阏氏”读音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考证。较有影响的还有岑仲勉的《冒顿之语源及其音读》（刊于1948年7月《西北通讯》第3卷第1期）。涉猎匈奴官号研究的还有冯家昇、马长寿、欧阳熙、林斡等学者。

20世纪80年代后，一些学者将匈奴官号与行政统治方式挂钩。1985年王宗维在《内蒙古大学学报》第2期发表了《匈奴诸王考述》，对各王沿袭作了比较全面的考证和分析。值得提及的还有刘文性的《漫议匈奴研究中的若干问题》（《西北民族研究》1990年第2期）一文。1990年龚荫在《西北民族研究》第2期发表了《匈奴单于疏证考》一文，对匈奴单于、南匈奴单于、北匈奴单于的驻地、承袭、纪事进行较为全面的梳理。

若将我国的研究置于世界学术发展的潮流中观察，可发现1949年以后我国研究匈奴语言的学者与世界同行学者的研究脱节较大。20世纪60年代初，加拿大学者蒲立本（E. G. Pulleyblank）发表《上古汉语的语音辅音系统》一文时，曾附有一节，专论匈奴的语言，提出匈奴语乃叶尼塞语之一种。但其研究未引起我国学者的重视。①

亦邻真教授曾评论道：“我们至今还无法十分确凿地断定匈奴人的语言究竟是什么样的语言。人们习惯于从现代各语言中寻找匈奴语的后裔，而常常忘记另一种可能性：匈奴语已经全然死灭。”此外“在对待匈奴的语言资料的时候，必须分清匈奴人和匈奴国”。在处理考古学和人类学材料时，亦邻真教授认为“也有同样的情况。从匈奴时期墓葬中发掘出来的，并不一定就是匈奴人的骨殖”。而“匈奴最主要的统治集团人物的人类学资料，更有助于说明匈奴人的族

---

① 潘悟云、徐文堪汉译本：《上古汉语的辅音系统》，世界汉学论丛，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163～201页。

属，因为他们是地道的匈奴人”。诺颜乌拉遗址的主要发掘人之一P. 科兹洛夫曾经表示，与其说其墓主是蒙古人种（即“黄种人”），勿宁说是雅利安人种（即欧罗巴人种，“白种人”）。[①]

研究我国匈奴人族源族属的学者虽然一直关注着国外同行的研究进展，但其信息主要借助于日本学者著述。这一缺陷造成西方一些较有影响的有关匈奴族属问题的研究成果，在我国的相关研究著作中几乎毫无反响。其中最明显的例子为荷兰莱顿大学夏伦（G. Haloun）教授1937年所提出之汉文史料中之匈奴与希腊史料中之Phryni部的比定勘同问题。[②] 20世纪60年代加拿大学者蒲立本教授在其著名论文《上古汉语的辅音系统》中对此作了充分发挥，提出汉字“匈奴”的汉代读音可拟为* flong-nah，匈奴的中心“茏”城地名的汉代读音可还原为* vlong，匈奴单于家族的姓氏虚连提氏的读音可拟为* vlan-teh（vlon-teh），上述诸字当即希腊史家所提到的Phryni。[③] 仅有余太山先生提及并作驳议。[④]

周一良先生有关宇文鲜卑部乃鲜卑化的匈奴人的研究亦为本领域最有影响的成果之一。[⑤]

（二）社会性质与文化习俗

匈奴社会性质问题的研究，始于1949年以后。这一研究深受苏

① 亦邻真：《中国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族源》，初刊于《内蒙古大学学报》，1979年第3～4期，收入《亦邻真蒙古学论文集》，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44～582页。

② 夏伦：《关于月氏问题》，刊于《德国东方学会学刊》，第91辑，1937年，第243～318页。

③ 潘悟云、徐文堪汉译本：《上古汉语的辅音系统》，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76、112、164～165页。

④ 余太山：《古族新考》，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02～103页。

⑤ 周一良：《论宇文周之种族》，初刊于《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本第4期，1939年。收入林干编：《匈奴史论文集》（1919－1979），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54～68页。



联史学影响，争论焦点集中在奴隶制与封建制的问题上。马长寿坚持部落奴隶制社会。他认为古代匈奴部落国家便是亚洲草原上最典型的一个奴隶所有者的社会。其特点是以家畜和牧奴私有的奴隶主之畜牧经济为基础的，土地和牧场属于部落的或国家公有制。这种社会中氏族仍起很大作用，自从成立了国家以后，遂在家族奴隶的基础上实行被征服的异族部落奴隶制。他还提出匈奴的奴隶制是家族奴隶制演进为部落奴隶制。[①] 欧阳熙对此提出质疑。他认为匈奴为封建制。单于是全国最高的统治者，以下实行分封制。[②] 而林干则不同意上述两种看法，他提出匈奴为贵族奴隶制社会。这个制度的特点是世袭制。[③] 匈奴社会性质研究对北亚史研究领域的拓展有很大的意义。

1933 年胡君泊在《西北研究》第 8 期发表《匈奴源流考》，是较早研究匈奴文化的论文，文中言及游牧、尚武、贵壮贱老、婚俗、岁有三龙祠、姓氏习俗等。1935 年 6 月吕思勉在《国学论衡》第 5 期发表了《匈奴文化索引》认为，匈奴许多习俗同于中原。1935 年 5 月冯家昇在《禹贡》半月刊第 7 卷第 5 期发表了《匈奴民族及其文化》一文，文中利用文献与借助考古资料，较全面地研究了匈奴的文化，得出结论说：匈奴最初之文化为纯北方草原式；其后，受两汉之影响，而加入两汉之文化；西破月氏、征服西域诸国后，又加入西域之文化。当代论述匈奴文化的主要著作是林干的《匈奴史》与《匈奴通史》。

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原匈奴统治区的考古工作开始进行，并取得成果。1954 年在包头市召湾汉墓出土了匈奴的文物。[④]

---

① 马长寿：《匈奴部落国家的奴隶制》，载《历史研究》1954 年第 5 期，第 99～118 页。

② 欧阳熙：《匈奴社会的发展》，《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58 年第 4 期。

③ 《匈奴社会制度初探》，收入《匈奴史论文选集》，第 278～321 页。

④ 内蒙古文物工作组：《1954 年包头市西郊墓清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5 年 10 月第 10 期，第 59～62 页。

1957年在内蒙古伊盟准格尔旗出土了大量的铜器、陶器、瓦当等。[①]内蒙古和林格尔范家窑子出土了一批铜器。考古工作者认为这批铜器的出土，为研究内蒙古地区斯基泰式铜器，提供了极为可贵的材料。[②] 1960年孙守道的《“匈奴西岔沟文化”古墓群的发现》一文，分析研究了辽宁西丰县乐善乡西岔沟匈奴墓群的出土文物（共出土13580件），认为匈奴文化包含本族和汉文化两大部分组成，而且匈奴过着农牧兼有的生活。[③] 田广金在《考古学报》1976年第1期发表了《桃红巴拉的匈奴墓》一文，文中对匈奴的分布、形制、文化遗物作了描述和分析，有助于了解匈奴人的社会生活。

（三）民族关系与匈奴迁移研究

匈奴与周边民族的关系，尤其是匈奴同两汉关系是匈奴研究的另一个热点课题，但这一课题研究难度一般不高，学术性不是很强，介入者较多。限于篇幅，本文只能从略。关于匈奴迁徙问题中，最具学术意义的是匈奴的西迁问题，读者可以参看本书欧洲与内陆亚洲关系一章。

二、丁零、鲜卑、高车、铁勒与柔然研究

研究丁零的学者相对较为集中。王日蔚开始此项研究较早，他在其《丁零民族考》[④] 中提出汉魏时代的丁零和十六国时的高车、敕勒为同族。有关丁零最重要的学术专著是段连勤的《丁零、高车

---

① 内蒙古文物工作组：《几年来的内蒙古文物工作》，《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4月第4期，第12～17页。

② 《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出土的铜器》，《文物》1959年6月第6期，封3。

③ 《文物》1960年12月第8、9合期，第25～36页。

④ 始载于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集刊》第2期，1935年；又载林幹编：《突厥与回纥历史论文选集》，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5～54页。



与铁勒》一书。作者继承了王国维在《鬼方、昆夷、猃狁考》（收于《观堂集林》）中提出的观点，即丁零为鬼方的苗裔。

在鲜卑研究中最重要的论著当属马长寿的《乌桓与鲜卑》①、唐长孺的《魏晋南北朝史论丛》② 与姚薇元的《北朝胡姓考》。

“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发现的嘎仙洞及鲜卑祭祖铭文，③ 可称1949年以来有关鲜卑的最重大的考古成果。它不但证明了史籍所记大兴安岭北部是鲜卑族的起源地的可靠性，而且佐证了鲜卑人与后来的蒙古人有着同一起源。

20世纪80年代后，鲜卑研究取得许多进展，与北亚史有关的较为重要的论文有：《魏晋十六国时期鲜卑族向西北地区的迁徙及其分布》④、《东胡族系的覆面葬俗及其相关问题》⑤、《早期鲜卑史初探》⑥、《鲜卑段部世系考略》⑦、《乌桓、鲜卑、丁零诸王述略》⑧、《鲜卑髡发习俗考述》⑨、《试论慕容鲜卑的形成》⑩、《鲜卑文化渊源考略》⑪ 等。从上述论题不难发现，20世纪80年代以前，学界主要关注的课题是鲜卑人的发展史，而90年代以后研究的思路有所拓宽。

高车（敕勒）与柔然是突厥史、回纥史中不可回避的课题。较

---

① 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

② 北京：三联书店，1955年。

③ 米文平：《鲜卑石室的发现与初步研究》，《文物》1981年第2期，第1～7页。

④ 作者周伟洲，刊于《西北民族史研究》，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81～88页。

⑤ 作者安路，刊于《北方文物》1985年第1期，第42～46页。

⑥ 作者曹熙，刊于《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第1期，第47～54页。

⑦ 作者邱久荣，刊于《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第1期，第159～164页。

⑧ 作者龚荫，刊于《文史杂志》1999年第3期，第67～70页。

⑨ 作者赵斌，刊于《青海社会科学》1997年第5期，第90～93页。

⑩ 作者金盛淑，刊于《辽宁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第24～26页。

⑪ 作者张碧波，刊于《黑龙江社会科学》1998年第3期，第40～46页。

早的研究有冯承钧的《高车西徙与车师鄯善国人之分散》[1] 等。1949年以后较为重要的研究论著有岑仲勉的《敕勒与铁敕、高车与回纥之别》[2]、周伟洲的《铁勒与柔然》[3]、陈仲安的《乞伏氏出于高车补正》[4] 与姜伯勤的《高昌文书中所见的铁勒人》[5]、余太山的《柔然、阿瓦尔同族论质疑—兼论阿瓦尔即悦般》[6] 与《柔然与西域关系述考》[7] 等。

我国鲜卑、敕勒、柔然史研究的主要问题是对西方同行研究关注不足。40～60年代，法国学者巴赞（Bazin）与匈牙利学者李盖提（L. Ligeti）均研究过建立北魏王朝的民族——拓跋鲜卑的语言，并得出相反的结论。法国学者伯希和（P. Pelliot）等人亦研究过柔然的语言。他们的研究在世界上有较大的影响，但未引起我国学术界的重视。

三、突厥及漠北回鹘研究[8]

（一）突厥研究

我国较早研究突厥族源问题是王日蔚先生。他在1936年10月发表了《丁零民族考》一文，[9] 认为突厥的族源是丁零。并认为丁

---

① 原刊于《辅仁学刊》，1942年12月第11卷第1～2期。又载《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着汇辑》，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76年，第36～47页。

② 见《突厥集史》（下），第1059页，中华书局1958年。

③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④ 刊于《文史》，1985年第25辑。

⑤ 刊于《文物》，1986年第12期，第53～57页。

⑥ 《文史》1985年第24辑，第97～113页。

⑦ 刊于《新疆社会科学》，1985年第4期，第67～77、80～81页。

⑧ 本综述限于阿尔泰以东的突厥，即传统上所说的东突厥的范围。

⑨ 始刊于《史学集刊》，1936年第1期。又载林幹编：《突厥与回纥历史论文选集》，中华书局，1987年，第25～54页。

零（丁灵）、铁勒、狄历、特勒、敕勒“实均一音之异译”。他的这一观点对后世学者有较大的影响。支持王先生观点的较有影响的学者有谭其骧①、马长寿②等人。但也有些学者不同意此说，其主要代表人物就是周连宽先生。③

其实丁零为突厥族与丁零和突厥是同名异译乃两个不同的问题。王日蔚等人未注意到，丁零（丁灵）、铁勒、狄历、特勒、敕勒这些译名最重要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其词中缺乏“圆唇元音（即合口元音）”，而突厥的不同译名如突厥、图鲁吉（《元史》中的《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与《经世大典图》）与“图鲁克”（明《回回馆杂字》）等的共同之处即均含有“圆唇元音”。这说明丁零等一系列译名所对的原名不可能是突厥（Turk）。对突厥族源族属还有其他一些说法，需要进一步的探索。

10世纪初辽太祖耶律阿保机西征时曾途经古回鹘城，并发现突厥碑文。我国现代学者对漠北的突厥碑铭的关注始于20世纪初。30年代中期以前，学者们研究集中在对碑文的汉文部分上。1936年韩儒林先生在国外学者研究基础上，把突厥碑文译成汉文并加注释发表，④ 使我国北亚史研究学界越出单纯依赖汉文史料的阶段。继韩儒林先生之后，岑仲勉先生与王静如先生亦发表了他们的研究成果。

---

① 谭其骧：《论五胡元魏时之丁零》，《益世报（重庆）文史副刊》第16期，1942年10月4日。又载《长水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34～239页。

② 马长寿：《突厥人与突厥汗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

③ 《丁零的人种语言及其与漠北诸族的关系》，《中山大学学报》1957年第2期，第49～73页。

④ 韩先生先后发表的译注有：《阙特勤碑文》译注（初刊于《国立北平研究院院务汇报》，1935年8月第6卷第6期），《苾伽可汗碑文》译注与《暾欲谷碑》译注（初刊于《禹贡》半月刊1936年11月第6卷第6期），全部收于林幹编：《突厥与回纥历史论文选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

20世纪30年代，随着对突厥碑文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开始注意研究突厥碑文中的职掌问题。韩儒林先生发表的《突厥官号考释》（上下两篇）是一篇里程碑式的作品。据研究："唐代突厥官号，多非其所固有，徒以记录简略，文献寡证，人名官号，往往难于辨识，故欲求突厥官号前后因袭之迹，一一解说，殊非易事。"韩儒林先生在文中"或介绍前人所说，或申述个人意见"，用汉文与突厥语对照研究的方法考释了许多突厥官号，包括始波罗（沙波罗、沙钵略、乙失铁）、三大罗、哥利达于、贺兰苏尼阙，珂罗啜、索葛吐屯（匐你）热汗、安禅具泥、附邻可汗、遗可汗、汗、俟斤（大俟斤）、亦都护、特勤、设、匐、梅录、啜、颉利发、吐屯等。[①] 50年代后期岑仲勉在其《突厥文碑注释》中对突厥官号亦有考证，[②] 有不少的创见，但是猜测成分较多。

1949年以后我国新一代突厥学家成长起来，逐渐摆脱了依赖外文译文进行研究的状况，开始直接研究突厥原文。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翻译碑文的多是语言学家，而考释碑文的则多为历史学家。培养既懂突厥语，又掌握西方学术语言的突厥、回鹘史新一代研究者，应当是今后我国学术界的任务。

突厥与隋、唐等内地政权的关系，及与东北的契丹、室韦、西北的高昌、北边的回纥、薛延陀、黠戛斯等民族的关系，限于篇幅兹不一一列举。

（二）回鹘与黠戛斯

有关回鹘研究始自30年代，主要学者有王日蔚等，研究深度略显不足。1949年以后的研究多集中在几个热点问题上。最大的热点当属回纥、漠北回鹘与现代维吾尔族的关系，这方面的论著为数极

① 原刊于华西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1940年第1卷第1期，收于《穹庐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04～325页。

② 《突厥集史》（下），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857页。

多，无法一一列数，多数缺乏新意。因此论题与北亚史关系不大，兹从略。另一个热点是回纥社会性质问题。这一问题基本同于匈奴社会性质的讨论，学者们所使用的方法多为从史料中搜寻资料，再套用奴隶社会或封建社会的定义，教条主义的色彩较浓，殊不知在欧洲历史条件下概括出来的“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概念，与所讨论的北亚草原游牧民族的社会现实并不完全吻合。

将回纥碑铭与汉文文献对照研究的发展类似于我国突厥史研究的历程。这一研究的开山之作是1938年发表的王静如的《突厥文回纥英武威远毗伽可汗碑译释》一文，[1] 这是一篇是我国漠北回鹘史研究划时代的力作。唯其译文非从突厥文直接翻译，个别考证亦有疑问。当代我国学者所利用的是耿世民等人依据突厥文直接译成的译文，其可靠性大大提高。

较早研究黠戛斯历史的是韩儒林先生。他在1943年撰写了《唐努都波》一文，[2] 后又撰写了《唐代都波新探》[3]，作为前文的补充。1950年开始编写，1986年出版的《柯尔克孜族简史》比较全面的研究了黠戛斯的先祖鬲昆在公元前3世纪活动于漠北的状况、社会经济和6世纪受突厥的统治及以后的历史。[4]

四、契丹与女真

（一）契丹（辽）研究

我国学者冯家昇与西方学者魏特夫合著的《中国社会史：辽

① 见前引林幹编：《突厥与回纥历史论文选集》，第669～705页。

② 刊于《中国边疆》1943年第3卷第4期，收于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编：《韩儒林文集》，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第557～560页。

③ 收于《韩儒林文集》，第561～569页。

④ 《柯尔克孜族简史》，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6页。

(907－1125 年)》[1] 是我国学者在辽研究领域在世界上影响最大的学术专著，它不仅对辽代社会组织、经济生活、管理制度和机构设置等方面进行了系统分析和详细论述，还提供了大量的原始资料的译文，并列出了至该书出版时用各种文字发表的研究成果的全部目录。该书不足之处在于固定的结构难以描绘出不断发展的社会全景，而且这种固定的结构使读者难以把握和阅读，尽管如此，该书还是治辽（契丹）史的学者必读书目之一。此外，冯家昇还撰有《太阳契丹考释》、《契丹祀天之俗与其宗教神话风俗之关系》、《契丹名号考释》[2] 等，分别就契丹人信仰及其名号之起源、释义等内容进行了考证和论述。

自 20 世纪 30～40 年代起，学界开始注意契丹国号、宫名、王号、官号、地名、习俗。随着庆陵哀册的发现，契丹字的专门研究也着手进行。

此后，在契丹史研究中取得重要成绩的有大陆学者傅乐焕[3]、台湾学者姚从吾[4]、大陆学者陈述等[5]。陈氏的分析与魏特夫、冯家昇的有所不同，他比较注重有条理地叙述，不大重视薄弱和零碎的考释，可称得上我国契丹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开拓之作和政治史研究的汇集。张正明的《契丹史略》[6] 是这方面另一部引人注目的著作，

① Wittfogel, Karl A. and Feng Chia-sheng. *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Liao* (907－1125), *Transactions of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n. s., vol. 36. Philadelphia: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949.

② 分别载《史学年报》1931 年第 3 期，第 163～170 页；《史学年报》1932 年第 4 期，第 105～117 页；《燕京学报》1933 年第 13 期，第 1～48 页。

③ 傅乐焕：《辽史丛考》，中华书局，1984 年。

④ 姚从吾：《辽金元史讲义（甲）：辽朝史》，重版载《姚从吾先生全集》第二卷，台北：正中书局，1972 年。

⑤ 陈述：《契丹社会经济史稿》，北京：三联书店，1963 年初版，1978 年重版；《契丹政治史稿》，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年。

⑥ 张正明：《契丹史略》，北京：中华书局，1979 年。

主要内容亦是关于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的描述，其长处在于更加完整并对历史演变给予更多关注。60年代受政治思潮影响，许多学者投入有关契丹、女真社会性质的讨论，其中不乏名家，但从总体上说，这类讨论学术意义不大。

政治制度方面的研究主要涉及的是契丹皇位继承、国体政体及官职的讨论。漆侠、蔡美彪等人对此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①] 唐统天对契丹官职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②] 此外，杨若薇在其著作《契丹王朝政治军事制度研究》[③] 中对这一问题也有研究。1999年，李桂芝发表《契丹贵族大会钩沉》，通过对辽代有限而又不连贯的史料的梳理，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贵族大会的召集者与参加者、大会的内容与程序两方面对之进行了详尽合理地探讨，认为契丹人贵族大会来源于原始氏族部落时期的贵族议事会，在契丹史发展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但在其建国后则发生了重大变化，成为实力派人物夺取政权的工具。随着国家政权的中央集权化，它的选汗和决定军国大事的两项职能逐渐削弱，以至在辽景宗与圣宗时期渐被官僚的朝议所取代，但其某些特点仍得以在朝议中保留。[④] 该文是近年来有契丹政治制度方面较有深度的一篇学术论文。张国庆在契丹习俗研究上用力甚勤，成果较多，他撰写的《辽代契丹习俗史》[⑤] 全面叙述了辽代契丹人习俗并揭示出构成这些习俗的文化渊源，展示了这些习俗在中国古代少数民族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另外，陈

---

① 漆侠：《从辽史列传的分析看辽国家体制》，载《历史研究》1994年第1期，第75～88页。蔡美彪：《辽代后族与辽季后妃案》，载《历史研究》1994年第2期，第43～61页。

② 唐统天：《关于契丹北、南宰相府的几个问题》，载《民族研究》1988年第5期，第74～81页。

③ 杨若薇：《契丹王朝政治军事制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

④ 李桂芝：《契丹贵族大会钩沉》，载《历史研究》1999年第6期，第68～88页。

⑤ 张国庆：《辽代契丹习俗史》，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97年。

述、贾敬颜及宋德金等人还深入研究了契丹人的“烧饭”习俗。[①]关于契丹文字的研究，近期取得了较大突破。最有代表性的成果是清格尔泰等人的《关于契丹小字研究》，已整理成书出版。[②]

陈得芝的《辽代的西北路招讨司》是有关这一时期北亚研究的一篇力作。[③]

（二）女真研究

关于女真民族的研究，20世纪上半叶并没有充分展开，相关成果不多，学者们主要对其姓氏、汉化及其文字做了初步探讨。主要学者有朱希祖、宋文炳、陈述等。而陈氏的《金史拾补五种》[④]列出了不同史料的各种版本中女真姓名的各种写法，是研究女真部落、女真人姓名和女真家系历史的必备书。上世纪我国学者对于女真文字的研究始于三四十年代，罗福成、王静如等人都对此作出了贡献，尤以罗福成成就显著。[⑤]

建国后，史学界对女真民族的社会性质与经济、制度与文化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于志耿、孙秀仁所著的《黑龙江古代民族史纲》[⑥]，用较大篇幅叙述了辽金时期女真族的历

① 陈述：《谈辽金元“烧饭”之俗》，载《历史研究》1980年第5期，第131～140页。贾敬颜：《“烧饭”之俗小议》，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1期，第92～93页。宋德金：《“烧饭”琐议》，载《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2期，第143～145页。

② 清格尔泰等：《契丹小字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③ 刊于南京大学历史系编：《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2），1978年，第7～15页。

④ 陈述：《金史拾补五种》，北京：科学出版社，1960年。

⑤ 罗福成：《宴台金源国书碑考》，载《国学季刊》1923年第1卷第4期，第687～691页；《宴台金源国书碑释文》，载《考古》1923年第5期，第179～208页。

⑥ 于志耿、孙秀仁：《黑龙江古代民族史纲》，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



史。孙进己等人的《女真史》[①] 叙述了从女真先人肃慎至辽金元明女真的发展历史。蒋秀松则撰文指出女真族的主源不是黑水部或狭义的黑水靺鞨，而是源于渤海统治下的靺鞨部落。[②] 王禹浪则对女真称号与民族关系进行了探讨，认为“海东青”是女真称号的真正含义，女真称号就是其民族精神的体现。[③]

猛安谋克制度是女真社会特有的一种制度，在其民族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张博泉对此作了大量有意义的研究，发表论文多篇，探讨了这一制度的形成、发展及其与民族的关系与作用等，全部收入《金史论稿》一书中。[④] 程妮娜、赵冬晖对女真称号“勃极烈”进行了研究。张碧波等主编的《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专辟一章叙述女真文化，内容涉及其语言文字、生活习俗、伦理宗教、科学技术、文学艺术以及体育游艺等。[⑤]

五、元代蒙古

洪钧自欧洲归国后于20世纪初叶著《元史译文证补》，对我国北方民族史及元史的影响，前已述及。二三十年代，王国维作为一代国学大师，涉猎广泛，著作等身，他在蒙古史方面亦有突出的贡献。其《鞑靼考》[⑥] 依据对宋辽金和蒙古史籍记载的对比分析与地

---

① 孙进己等人：《女真史》，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

② 蒋秀松：《女真与靺鞨》，载《民族研究》1992年第3期，第40～46页。

③ 王禹浪：《“女真”称号的含义与民族精神》，载《北方文物》1992年第3期，第57～63页。

④ 《金史论稿》第1卷，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

⑤ 张碧波、董国尧主编：《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

⑥ 王国维：《鞑靼考》，《观堂集林》第14卷，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重印本，第634～686页。

理考证，精辟地论证了辽金史所载之“阻卜”即是鞑靼。《萌古考》[①] 一文在广泛搜集汉、蒙及域外史料的基础上，对唐代至成吉思汗建国前蒙古部落晦暗不明的历史活动进行了梳理，指出蒙古部（唐蒙兀室韦）早先所居之地望建河即额尔古纳河，《金史》对用兵蒙古多有忌讳，而所征之广吉剌、合底忻、山只昆乃蒙古部落之弘吉剌、合答斤、散只兀之异译。他《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一文[②]对“主因亦儿坚”名称进行了考释，认为此名即是金朝之乣军，并列举大量史料对金元时期的乣军的情况及“乣”字的读音作了缜密的分析，将这一问题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陈寅恪有关蒙古的论述虽着笔不多，但影响甚大，尤其是《彰所知论与蒙古源流》[③]一文，考察了蒙古先世历史传说的演变及其来源，揭示出其“逐层向上增建之历史”的实质。

继王国维、陈寅恪后，又一批杰出学者涌现，从而将蒙古史研究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其中最著名、对后世影响巨大的有姚从吾、韩儒林、翁独健和邵循正等。

姚从吾的研究成果见于其学生汇编的《姚从吾先生全集》[④] 中，其专题分为两类：蒙古人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与蒙古统治中原的政策。前者如《说旧元史太祖纪中“布浑察儿”和它引起的王汗与成吉思汗的决战》、《成吉思汗时代的沙曼教》、《成吉思汗、窝阔台汗时代蒙古人的军事组织与游猎文化》、《十三世纪蒙古人的军事组织、游牧生活、伦常观念和宗教信仰》、《说元朝秘史中的篾儿乞》、《旧元史中达鲁花赤初期本义为“宣差”说》、《说蒙古秘史中的推选可汗与选立太子》等。

韩儒林早年留学欧洲，曾师从伯希和，长于蒙元史中的名物考

---

① 王国维：《萌古考》，《观堂集林》第 15 卷，第 687～712 页。

② 《观堂集林》第 15 卷，第 768～795 页。

③ 收入《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第 115～125 页。

④ 《姚从吾先生全集》，台北：正中书局，1972 年。

证。如《成吉思汗十三翼考》、《蒙古答剌罕考》、《蒙古氏族札记二则》及《蒙古的名称》等都是依据多种史料互证互补的方法从语言学和历史学两方面进行的考释，订正了中外史料和前人著述中的许多错误。此外韩氏还撰有《元代阔端赤考》、《成都蒙文圣旨碑考释》、《论成吉思汗》和《元代的吉利吉思及其邻近诸部》。他的这些研究成果大部收入《穹庐集》。① 邵循正与韩儒林为留法先后同学，在蒙古史研究方面亦有独到之处。他的《元史、拉施特史集蒙古帝室世系所记世祖后妃考》② 是我国学者直接利用波斯文史料研究蒙古史的力作。另一篇《蒙古的名称与渊源》③ 也是他利用历史学和语言学所作的精辟考释。

新中国成立后，在老学者的培养之下，一批基础扎实、学风端正的新一代学者成长起来，为蒙古史的研究注入了一股新鲜血液，研究领域更加系统化，主要涉及族源与名称、早期蒙古社会性质、历史人物和政治事件、政治制度、军事制度、经济、婚姻以及风俗文化等课题。下面即对这一时期的研究概况分类介绍。

蒙古族源问题历来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匈奴说、突厥说、丁零说、吐蕃说及东胡说等提法。我国学者多持东胡说，其中最具代表性与影响的是亦邻真的《中国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族源》④ 一文。作者在广泛利用语言学、人类学、民族学与考古学方面资料的基础上，否定了匈奴人与蒙古同源的说法，论证形成蒙古民族的核心部落是东胡后裔室韦一鞑靼人，接着又指出属于室韦一鞑靼人的原蒙

① 韩儒林：《穹庐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年 12 月第 1 版，2001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

② 邵循正：《元史、拉施特史集蒙古帝室世系所记世祖后妃考》，载《清华学报》1936 年第 11 卷第 4 期，第 969～976 页。

③ 邵循正：《元史论丛》，1982 年第 1 辑，第 218～221 页。

④ 亦邻真：《中国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族源》，载《内蒙古大学学报》1979 年第 3～4 期，收入《亦邻真蒙古学文集》，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544～582 页。

古人主要是尼鲁温氏蒙古人和迭列列斤蒙古人，而室韦——鞑靼人以外的原蒙古人诸部，则是构成蒙古民族的基本成员。源于东胡室韦的蒙古人并非与突厥人全无关系，在9～12世纪，原蒙古人从东胡后裔历史民族区向整个蒙古高原扩散，同突厥、铁勒及其他民族结合，因而经历了深浅不同的突厥化过程，终于形成了蒙古民族共同体和古蒙古语言。

关于蒙古名称，前代学者多有研究，韩儒林在此基础上撰成《蒙古的名称》①，将蒙古一词在宋辽金元明的二十余种异译分组研究，剖析蒙古一词因时代、民族等条件而造成的译音差别，纠正了洪钧、屠寄的错误判断。关于阻卜与鞑靼的关系，蔡美彪的《辽金石刻中的“鞑靼”》一文②，运用石刻资料补充完善了王国维的观点，并为其说提供了有力佐证。之后又有学者对阻卜达旦、术不姑、九姓达靼、兴安岭西达靼进行了更为详细的考证研究。③ 余大钧则对阻卜与鞑靼的异同、阻卜的对音语源与语义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阻卜虽是鞑靼的代称，但二者并不完全相同，前者是后者的一部分，而后者的范围更为广泛，并给出了阻卜的拟音，其义为蒙语“主不儿”，意为原野、草原，阻卜是10～13世纪蒙古语族牧民的自称。④

对于部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乞颜、弘吉剌、吉尔吉思、斡亦剌、汪古和克烈等部族上。

---

① 韩儒林：《蒙古的名称》，收入《穹庐集》，第153～165页。

② 《北京大学国学季刊》1952年第7卷第3期，第377～387页。

③ 周良霄：《鞑靼杂考》，载《文史》第8辑，第73～84页。孟广耀：《术不姑考》，载《内蒙古社会科学》1982年第4期，第74～89页。张久和：《九姓达怛考索》，载《内蒙古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第21～29页。

④ 余大钧：《论阻卜与鞑靼之异同》，载《历史研究》1981年第6期，第43～58页；《关于阻卜的语源对音及语义》，载《内蒙古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第27～36页。此说的缺点是对穆斯林史料和对辽金时代漠北民族记载检索不够。

邵循正根据《秘史》的记载对乞颜部作了有意义的考证，认为以孛儿只斤乞颜部为中心的蒙古人原为混合部族。这一部族采取母系的氏作为部族名，以父系的特点为氏。另外，作者还提出蒙古乞颜部可能是室韦与突厥的混合。[①] 郝时远的《主儿乞部及几点问题的探讨》[②] 通过对12世纪蒙古乞颜氏族的由来、性质、氏族构成等方面的考察，认为当时主儿乞之类的氏族血缘纯洁性已不复存在，草原贵族领属关系正在完成。白拉都格其在王国维等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成吉思汗家族世代通婚对象——弘吉剌部从婚姻方面给予考察，还指出12世纪末弘吉剌部已形成拥有许多分支的大胞族，特薛禅仅是其中一分部的首领，它正式成为弘吉剌部的首领应当是1203年后的事。[③] 关于吉里吉思部，值得一提的力作有两篇：一是周清澍的《元朝对唐努乌梁海地区及其周围地区的统治》。该文研究了成吉思汗对唐努乌梁海地区的征服和治理，并就元朝在该地的行政机构、统治情况以及叛王海都对该地的争夺进行了新的阐述。[④] 另一篇是韩儒林的《元代的吉利吉思及其邻近诸部》，考察了吉尔吉思诸部的方位、诸王贵族分地，元朝政府对这一地区的管辖和开发。[⑤]

80年代初，杜荣坤、白翠琴对斡亦剌部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均认为斡亦剌部作为林中百姓在归附成吉思汗后与其建立了世代姻亲关系，故有着较高的政治地位，同时原有的森林民氏族制度逐渐

---

① 邵循正：《蒙古的名称和渊源》，载《元史论丛》1982年第1辑，第218～221页。

② 载《中国蒙古史学会成立大会纪念集刊》，第279～285页。

③ 白拉都格其：《弘吉剌部与特薛禅》，载《中国蒙古史学会成立大会纪念集刊》，第270～278页。

④ 周清澍：《元朝对唐努乌梁海及其周围地区的统治》，载《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3期，收入作者《元蒙史札》，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90～313页。

⑤ 韩儒林：《元代的吉尔吉思及其邻近诸部》，载《穹庐集》，第388～436页。

被分封制所代替，促使其社会性质向早期封建关系转化。[1] 汪古部的族属向来存在争议，元人陶宗仪将其列入色目人中。周清澍根据有关史料，结合碑刻记载，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该部族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考察。[2] 此外，盖山林依据考古资料对汪古部的社会制度和经济生活进行了探讨。[3] 关于克烈部则有陈得芝的《十三世纪以前的克烈王国》[4]。该文认为克烈部应是突厥化程度最高的原蒙古人，其族源是辽金时代的鞑靼、阻卜。除此之外，作者还就克烈王国的统治区域及其扩张进行了考察，是研究克烈部重要的参考论文。周清澍还研究了元朝时期的蒙古族，在占有中外史料的基础上，作者从畜牧业、渔猎业、农业、城市、手工业、封建化过程、阶级等级、赋役负担诸方面论证了元朝的蒙古族社会结构与经济生活的变化，生产力的提高，各族人民的经济文化交流，以及元政府在蒙古族地区扶持畜牧业、农业生产，加强直接统治的种种措施，不失为一篇较有分量的探讨元代蒙古民族问题的方章。[5] 此外，刘迎胜还就蒙古征服前操蒙古语部落的西迁运动作了专题研究，指出公元 840 年漠北回鹘汗国瓦解后，原先在蒙古高原占据优势的操突厥语诸部

---

① 杜荣坤：《试论斡亦剌十三、四世纪政治经济的变化》，载《民族研究》1980 年第 6 期，第 50～56 页。白翠琴：《斡亦剌贵族与成吉思汗联姻考述》，载《民族研究》1984 年第 1 期，第 46～59 页。

② 周清澍：《汪古部统治家族》、《汪古部的族源》、《汪古部首领封王事迹》、《汪古部与成吉思汗家族世代通婚关系》、《汪古总后领地及其统治制度》，均收入作者《元蒙史札》，分别见第 48～80、90～119、120～129、130～153、154～184 页。

③ 洪用斌：《汪古族社会制度初探》，盖山林：《从内蒙古考古发现看元代汪古部社会经济生活》，载《中国蒙古史学会成立大会纪念集刊》，第 207～229、230～240 页。

④ 陈得芝：《十三世纪以前的克烈王国》，载《元史论丛》1986 年第 3 辑，第 1～22 页。

⑤ 周清澍：《元朝的蒙古族》，载《中国蒙古史学论文选集》，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 年，收入《元蒙史札》，第 27～47 页。



逐渐让位于操蒙古语民族。至辽金时代蒙古高原已基本蒙古化。西辽的建立标志着操蒙古语部落的活动范围向欧亚草原延伸。成吉思汗用其子孙领导蒙古西征可视为自东向西的蒙古化运动的高潮。张莉莉则讨论了聂斯脱里派在早期蒙古部落汪古、克烈和乃蛮部中的传播问题，认为其对三部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影响并不大，占主要地位的还是萨满教。①

关于蒙古国时期的中央官制，李涵进行过研究，着眼点主要放在蒙古前期的断事官和必者赤上，就其来历、地位与作用作了进一步考察，认为蒙古国政权中央政务机构的首脑是大断事官，必者赤是协助大断事官处理一般国务的班子，二者共同组成了蒙古游牧帝国的中枢机构。该文澄清了中央大断事官和三行省大断事官的区别和联系，提出札鲁忽赤不属于怯薛执事官系统的新观点，颇有启发意义。② 对于地方官制，韩儒林在苏联学者弗拉基米尔佐夫研究的基础上对千户等那颜的身份和权利进行了新的阐发，认为其身份和权利是相对的，就大汗、诸王而言，他们是处于从属地位的地方军政官员；就蒙古牧民而言，他们是领主。③

蒙古军制也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之一。我国学者较早对此研究的有杨志玖④、蔡美彪⑤、贾敬颜⑥等人。此后，史卫民等撰写的

---

① 张莉莉：《基督教在早期蒙古部落中的传播》，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9 年第 1 期，第 61～66 页。

② 李涵：《蒙古前期的断事官、必者赤、中书省和燕京行省》，载《武汉大学学报》1963 年第 3 期，第 43～62 页。

③ 韩儒林主编：《元朝史》（上），第 86～87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年。

④ 杨志玖：《探马赤军问题三探》，载《元史三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年，第 43～59 页。

⑤ 蔡美彪：《 乣与乣军之演变》，载《元史论丛》第 2 辑，1983 年，第 1～22页。

⑥ 贾敬颜：《纠军问题刍议》，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0 年第 1 期，第 6～15 页。

《元朝秘史九十五千户考》在日本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对九十五千户之说法进行了考辨，认为《秘史》中的九十五千户实是一个功臣表，并指出其遗漏错载之处，故九十五千户之说不可靠，而《元史》所载六十五千户说更为接近事实。[①] 陈得芝则对蒙古国时期斡亦剌诸部千户及速不台等千户的牧地方位作了详细探讨。[②] 史卫民撰写的《蒙古汗国时期左、右翼千户沿袭归属考》就蒙古国左、右翼军诸千户的沿袭繁衍进行了论述，纠正和补充了《史集》第一卷对蒙古军队记载的若干遗漏之处。[③] 与千户军制有关的另一篇较有分量的论文是黄时鉴的《木华黎国王麾下诸军考》，该文对1217年成吉思汗交付木华黎攻金的蒙古军、契丹、女真、汉军、探马赤军等名目、数量及其机构进行了详细考述，对了解蒙古国东部军队布局乃至元朝军队的种类、归属，都有重要参考价值。[④] 另外，叶新民运用新史料，对四怯薛进行了新的研究，认为也可怯薛应是第一怯薛，否定了日本学者箭内亘的相关推测，还考察了四怯薛长的世系和轮番日次，最后指出，世祖以后四怯薛番直顺序无大变化。[⑤]

史卫民的专著《元代军事史》，有关章节对大蒙古国与元朝时期的军事制度进行了介绍，被认为是迄今为止有关元代军事史方面最为系统的一部著作。[⑥]

畜牧业是游牧民族的经济支柱，是其主要的经济形态，我国学

---

① 史卫民、晓克、王湘云：《元朝秘史九十五千户考》，载《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9辑，1985年，第24～30页。

② 陈得芝《元岭北行省建置考（上）》，载《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9辑，1985年，第31～44页。

③ 《西北民族研究》，1986年试刊号，第64～76页。

④ 黄时鉴：《木华黎国王麾下诸军考》，载《元史论丛》第1辑，1980年，第57～71页。

⑤ 叶新民：《关于元代的四怯薛》，载《元史论丛》第2辑，1983年，第77～86页。

⑥ 史卫民：《元代军事史》，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4卷。



者在这方面亦有较为深入的研究。高文德撰文从当时游牧方式、养畜方法、马匹驯养保护、牧人分工、草场选择诸方面探讨了畜牧业生产水平不断提高的原因，认为畜牧业在10～13世纪蒙古民族经济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成为生产的主要部门和生活的根本来源。[①]王路《蒙古汗国及其前期蒙古族的畜牧经济》一文，[②] 对大蒙古国时期的畜牧业进行了研究，他指出，蒙古国建立后以法律保护牲畜等私有财产，以千户制划分牧民的牧场疆界，还规定马牛羊的抽分制，采取打井、四季移场、置畜市等措施，从而为蒙古畜牧业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蔡美彪、周清澍则专门研究了元朝蒙古地区的畜牧业发展状况，指出13～14世纪蒙古的畜牧总数和各个牧户平均拥有的牲畜头数比12世纪有了明显增加。元政府通过国家力量促进并改善了畜牧业的发展与生产条件。[③]

蒙古人的风俗也是学者们所感兴趣的一个课题。白翠琴则对此进行了具体细化的研究，通过撰文考察了成吉思汗系与斡亦剌贵族保持世婚关系的历史背景、历史事实与意义，并对其原因作了详尽分析。[④] 此外，学者们还就蒙古风俗中的“烧饭”问题进行了研究。贾敬颜吸收并发展了王国维有关“烧饭”的研究成果，认为“烧饭”中还包括了车马有时甚至是奴婢的殉葬，“殉”与“祭”并无绝对的差别，反对“烧饭”与“燔柴”有联系。[⑤] 陈述则持相反看法，他认为烧饭既不是殉葬，也不是火葬，而是指祭祀天和祖先，烧饭必

---

① 高文德：《十至十三世纪初期蒙古畜牧业经济的发展》，载《文史哲》1979年第2期，第76～83页。

② 《内蒙古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第36～43页。

③ 蔡美彪等主编：《中国通史》第七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19～321页。

④ 白翠琴：《斡亦剌贵族与成吉思汗系联姻考述》，载《民族研究》1984年第1期，第46～59页。

⑤ 贾敬颜：《“烧饭”习俗小议》，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1期，第92～93页。

须燔柴，此乃烧饭的开始动作。[1]

漠北是蒙古起源之地，元代曾置岭北行省。南京大学的学者对元代漠北地区作出了杰出的研究，其中最重要的研究成果有：陈得芝的《元岭北行省驿路考》、《元和林城及其周围》、《元称海城考》、《元北方测景所地理略述》、《元岭北行省建置考》（上、中、下）[2] 及姚大力的《乃颜之乱杂考》[3] 和刘迎胜的《失必儿与亦必儿》[4] 等。

综上所述，蒙元史研究是我国北亚史研究中一个成果较为突出的领域。有理由相信，随着科学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方法的不断更新，在新世纪里，我们一定还会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六、明代蒙古研究

（一）1911～1978 年间的研究

20 世纪前叶中国的明代蒙古研究是随着学人对明代蒙古著名史书《蒙古源流》的研究而开始受到关注的。由于沈曾植、王国维和陈寅恪等著名学者的参与，中国的明代蒙古研究从开始便有了很高的起点。

《蒙古源流》是鄂尔多斯人萨冈彻辰于康熙元年（1662 年）写成的蒙古文史书。20 世纪 30 年代，著名蒙古史学者沈曾植引用大量汉文文献对《蒙古源流》进行笺证，后由张尔田整理笺证并综合王国

① 陈述：《论辽、金、元的“烧饭”之俗》，载《历史研究》1980 年第 5 期，第 131～140 页。

② 分别刊于南京大学历史系编：《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 1、3、4、5、9、11、13 辑。

③ 刊于南京大学历史系编：《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 7 辑，1983 年，第 74～82 页。

④ 刊于《历史地理》，第 4 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 62～74 页。



维对该书所做的眉批，于1932年出版《蒙古源流笺证八卷》①。由于不谙蒙古文，笺证存在很多问题。但是“这书主要涉及明代蒙古史事，前人研究很少涉及这一领域，故笺证实有开创明代蒙古史研究的功劳”②。最早利用《蒙古源流》进行科学研究的当属陈寅恪，他在30年代初先后写了四篇文章。其中《彰所知论与蒙古源流》③，是探讨《蒙古源流》的佛教世界观的来源。而在《灵州、宁夏、榆林三城地名考》④ 中，陈寅恪先生运用历史语言学的方法，根据满、蒙、汉不同版本的《蒙古源流》对长城沿线三处地名的记录，对其相应的地点进行了分别考订。马市贸易是有关明蒙关系研究的重要课题，早在20世纪30年代，这一课题就引起中国学者的浓厚兴趣，侯仁之《明代宣大山西三镇马市》是国内学者讨论明蒙之间的马市贸易的最早的论文。⑤

建国后的最初三十年中，大陆学者明代蒙古史研究相对薄弱。“文化大革命”期间编绘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可以说是一个重要成果。值得一提的只有胡钟达的《呼和浩特旧城（归化）建城年初探》，《丰州滩上出现了青色的城——阿勒坦汗和三娘子·古丰州经济的恢复和归化城的诞生》等少数几篇文章。

（二）1978以后的明代蒙古研究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明代蒙古史研究伴随着中国历史学的繁荣而焕发出勃勃生机。主要表现在研究队伍的扩大、蒙汉文史籍的整理出版，专著译注的大量出版和发表，专题论文更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明代蒙古史研究的面貌得到彻底的改观。

---

① 1933年沈曾植、张尔田木刻本。

② 周清澍：《蒙古史学者沈曾植及其手迹》，《内蒙古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收入《元蒙史札》，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590页。

③ 《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70～80页。

④ 《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第63～69页。

⑤ 《燕京学报》1938年，第二十三期，第183～236页。

1. 史料的汇编、整理及译注。

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明代蒙古史研究的主要史料有汉文史料和蒙文史料。明代汉籍浩若烟海，其中包含着大量有关蒙古的纪录，他们散见于《明实录》、官私修史书、奏疏书牍、方志以及笔记杂说中，丰富而零散。王雄、薄音湖撰写《明代蒙古汉籍史料述略》系统讨论了明代蒙古汉籍的特点、蕴藏、存佚等问题，为学者整体把握明代蒙古汉籍提供了指导。[①]

80 年代初以后，国内学者从明代汉籍中分专题辑录有关蒙古的史料，成果丰硕。《准噶尔史略》编写组于 1982 年出版《明实录瓦剌资料摘编》。[②] 薄音湖、王雄在校勘整理汉籍基础上，在 1994 年和 2000 年先后出版了《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一辑[③]和第二辑[④]，为相关学者利用明代蒙古汉籍提供了极大方便。90 年代末，国内先后出版的大型丛书《四库存目丛书》（齐鲁书社）和《四库禁毁书丛刊》（北京出版社）使大量明代稀见史料得以推广普及，对于推动明代蒙古史研究具有深远的意义。然而，还有相当一部分明代汉籍没有被上述类书所收录。正如王雄、薄音湖二人所说："许多包含有丰富的明代蒙古史料的孤本秘笈、佳刊名钞，或束之高阁，酣然大睡……学人难得使用，诚为至憾。"因此，有关明代蒙古的汉籍"依然是一方必须继续精心巡游的胜地"[⑤]。其对于明代蒙古史，特别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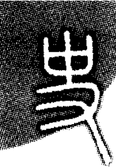
① 《内蒙古大学纪念校庆二十五周年学术论文集》，1982 年。收入呼和浩特市蒙古语文历史学会编印：《蒙古史论文选集》第 3 辑，1983 年，第 382～400 页。

②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 年。

③ 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4 年。

④ 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0 年。

⑤ 张锡彤、张广达在《试论俄国东方学家瓦·弗·巴托尔德对蒙古史的研究及其〈突厥斯坦〉一书》中说："要想更加全面地与蒙古史有关的资料，中国史籍依然是一方必须精心巡游的胜地。"此论断同样适用于明代汉籍对明代蒙古史研究的意义。详参元史研究会编：《元史论丛》第一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年，第 200～213 页。



1600 年以前的明代蒙古史研究的史料价值和发掘余地仍然不可低估。

蒙文史书对于明代蒙古史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蒙文史籍的整理、校勘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1979 年留金锁出版《十三——十七世纪蒙古历史编纂学》①，书中就明代蒙古史书的特点，版本等问题进行了系统论述。佚名所著《阿勒坦汗传》，即《名为宝汇集之书》是明代蒙古史书中最早的一部。珠荣嘎在 1984 年和 1990 年先后出版了此书的校注本和译注本，② 是目前学界通行的本子。17 世纪初成书的《黄金史纲》又名为《诸汗源流黄金史纲》，是明代蒙古史的另一部重要史书。留金锁《黄金史纲注》（蒙文）1980 年出版。③ 朱风、贾敬颜译注本《汉译蒙古黄金史纲》1985 年出版。④ 1926 年札姆扬公从喀尔喀车臣汗部三贝子旗一名旧贵族手中得到一部藏式贝叶装《黄金史》，这就是著名的罗藏丹津《黄金史》，成书于 17 世纪中叶。1937 年蒙古科学委员会将此抄本出版，学界习称为库仑版《黄金史》。1952 年哈佛大学柯立夫教授将此书在美国影印出版。扎奇斯钦《蒙古黄金史译注》1979 年在台湾出版。1983 年乔吉根据哈佛影印本对此书进行校注，在呼和浩特出版。有关《蒙古源流》的校勘和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1980 年周清澍和额尔德尼·巴雅尔合著《蒙古源流初探》就《蒙古源流》成书的历史背景、本书的作者、内容、史学文学价值、史料来源、版本流传等诸多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论述。1981 年，根据乌兰巴托校勘本翻印的《蒙古源流》在呼和浩特出版。2000 年，乌兰在她博士论文基础上，经过修订增补，出版了《〈蒙古源流〉研究》，“这是我国蒙文古籍首次得到全面科学的整理……《蒙古源流》有了一个可

---

①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②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③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 年。

④ 同上。

以信赖的定本和译本”①。另外，《黄金史》乌力吉图校注本 1983 年出版。②《阿萨拉格齐史》巴·巴根校注本 1984 年出版。③《金轮千辐》乔吉校注本在 1987 年出版。④

蒙文史书校注、译注本的大量出版为繁荣明代蒙古史研究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在明代蒙古史书的相当数量的底本收藏于中国的情况下，未能出现像《黄金史》乌兰巴托影印本这样的版本，不能不说是遗憾。只有珠荣嘎 1984 年校注的《阿拉坦汗传》后附有此书模糊的影印件。学界呼唤像《阿拉坦汗传》这样珍贵的蒙文史书能够尽快出现高质量的影印本，以佳惠学林。

20 世纪末，学者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明清蒙、满文档案的发掘和利用对于明末清初蒙古史的研究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由李保文编辑整理转写，1997 年影印出版的《十七世纪蒙古文文书档案》⑤，使得这一珍贵文献在学界广为利用。

2. 大批论著的出版发表。

20 世纪的最后 20 年，中国明代蒙古史研究进入空前繁荣的阶段。出现了一大批论文和专著。课题不仅仅局限于部落变迁，明代蒙古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有学者涉足，其中相当一批论文在和田清等人的基础上取得了新的进步。80 年代初出版的《蒙古族简史》是简明通史性的著作。⑥ 瓦剌是明代蒙古本部之外庞大的部落集团，15 世纪中期一度统一了蒙古，杜荣坤、白翠琴合著的《西蒙古史研究》是国内有关瓦剌研究的重要著作，书中收录了作者有

---

① 周清澍：《乌兰著〈蒙古源流研究〉序》，乌兰：《〈蒙古源流〉研究》，民族出版社，2000 年；周清澍《元蒙史札》，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1 年，第 684～688 页。

② 北京：民族出版社，1983 年。

③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④ 同上。

⑤ 通辽：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⑥ 《蒙古族简史》编写组，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 年。

关明代瓦剌研究的近十篇论文。[①]《蒙古民族通史》第三卷[②]是明代蒙古史，由曹永年撰稿。作者在广泛吸收胡钟达、白翠琴、薄音湖、乌兰、和田清、塞瑞斯等国内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自己20余年的研究心得，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明代蒙古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作者对爱猷识理达剌领导的和林保卫战、明蒙南北朝对峙关系等问题的论述中提出许多独到见解。是中国明代蒙古史研究的阶段性成果。达力扎布《明代漠南蒙古历史研究》[③] 是作者在他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增补而成的专著。作者运用大量蒙、汉文史料，论证蒙古各部"南迁"并形成明代漠南蒙古的观点。有关乌济叶特、河套、星胡剌等部落名、地名的考订都是作者的创新。

关于明蒙关系，胡钟达著《明与北元—蒙古关系之探讨》论证了明蒙对峙的二百余年是中国历史上第三次南北朝。[④] 可以说是明代蒙古史在中国史上定位准确的观点。部落变迁研究是明代蒙古史研究的重点课题。关于喀喇沁部，主要研究有曹永年的《关于喀喇沁的变迁》[⑤]、奥登的《喀喇沁源流研究》[⑥] 等。关于土默特部，主要有晓克的《明代蒙古土默特万户出现的历史过程》[⑦]、薄音湖的《关于明代土默特的几个问题》[⑧]、留金锁的《满官真部及其东迁》[⑨]、宝音德力根的《满官嗔——土默特的变迁》[⑩] 等。关于察哈尔部的

---

①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 年。

② 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1 年。

③ 海拉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8 年。

④ 《内蒙古社会科学》1984 年第 5 期，第 44 页。

⑤ 《蒙古史研究》第四辑，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7 年，第58～68 页。

⑥ 《蒙古史文集》，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2 年，第 56～98 页。

⑦ 《内蒙古社会科学》1986 年第 5 期，第 61～64 页。

⑧ 《内蒙古社会科学》1986 年第 6 期，第 54～58 页。

⑨ 《内蒙古社会科学》1989 年第 2 期，第 41～44 页。

⑩ 《蒙古史研究》第五辑，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7 年，第177 页。

变迁，主要有袁森坡的《察哈尔蒙古初探——兼论察哈尔于明朝的关系》①、王雄《察哈尔西迁的有关问题》②、宝音德力根《好陈察罕儿、察罕儿五大营、八鄂托克察罕儿——十七世纪前察罕儿历史研究》③、薄音湖《关于察哈尔史的若干问题》④ 等。关于科尔沁部的变迁，留金锁有《科尔沁部及其东迁小议》⑤，胡日查则撰写了《科尔沁部牧地考》等四篇文章，讨论该部的牧地、来源和所属鄂托克等问题。

明代蒙古人物的研究也是学界关注的一个焦点。关于也先，有曹永年的《土木之变与也先称汗》⑥、《也先与“大元”》⑦。白翠琴的《关于也先的几个问题》⑧；关于达延汗，有乌兰的《Dayan 与大元——关于达延汗的汗号》⑨、《“右翼之战”与达延汗统治的最终确立》⑩、《关于达延汗史实方面几个有争论的问题》⑪、珠荣嘎的《达延汗西征命令新释——兼索 altan humurge 词的本义》⑫。由于“隆庆封贡”及以后明蒙和平贸易关系的持续，俺答汗及其妃子三娘子长期以来颇受关注，国内学者的主要论文有杨绍猷的《试论俺答汗》⑬，

---

① 《中国民族史研究》第一辑，1987 年，第 89～118 页。

② 《内蒙古大学学报》1989 年第 1 期，第 1～11 页。

③ 《内蒙古大学学报》1998 年第 3 期，第 1～18 页。

④ 《蒙古史研究》第五辑，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7 年，第 198～218 页。

⑤ 《黑龙江民族丛刊》1988 年第 2 期，第 69～72 页。

⑥ 《内蒙古师大学报》1991 年第 1 期，第 41～49 页。

⑦ 《蒙古史研究》第五辑，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7 年，第 169～176 页。

⑧ 《新疆师大学报》1993 年第 1 期，第 32～40 页。

⑨ 《内蒙古大学学报》1990 年第 1 期，第 10～14 页。

⑩ 《内蒙古大学学报三十周年论文选》，第 55～69 页。

⑪ 《内蒙古社会科学》1983 年第 3 期

⑫ 收入《中国蒙古史学会论文选集（1981）》，第 210～214 页。

⑬ 《辽宁师大学报》1981 年第 1 期，第 39 页。

曹永年的《阿勒坦汗和丰州川的再度半农半牧化》①，薄音胡的《俺答汗征兀良哈史实》②，珠荣嘎的《从〈俺答汗传〉看三娘子的名字和母家》③，《三娘子考》，薄音湖《三娘子在明代蒙汉关系中的作用》，李漪云《三娘子史事证误》④ 等。关于林丹汗，有希都日古《明朝、蒙古、后金三方鼎峙中的林丹汗》⑤。

板升是明代土默特地区从事定居农业的汉族人群。关于板升的研究引起了学者浓厚兴趣。李漪云的《大板升城考》⑥、薄音胡的《从板升到库库和屯的建立》⑦ 分别讨论了板升城的方位、建成时间与呼和浩特建成的关系。曹永年的《嘉靖隆庆间板升自然灾害及其与"俺答封贡"的关系》⑧通过讨论板升自然灾害，探索了促成"俺答封贡"的内在因素。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20 世纪的最后几年中，明清蒙满文档案被发现并用于明代蒙古史研究，17 世纪初的明代蒙古史的许多课题因此而取得重要进展。乌云毕力格《从十七世纪初蒙古文和满文"遗留性"史料内蒙古历史的若干问题——（一）"昭之战"》⑨，《17 世纪 20～30 年代喀喇沁部的台吉和塔布囊》⑩ 等篇就代表了这种进步。

---

① 《内蒙古大学学报》1980 年第 2、3 合期，第 132 页。

② 《内蒙古大学纪念校庆二十五周年学术论文集》，第 93 页。

③ 《中国蒙古史学会论文选集》，第 253 页。

④ 《内蒙古师大学报》1983 年第 3 期，第 31 页。

⑤ 《内蒙古大学学报》1998 年第 3 期，第 32～42 页。

⑥ 收入《中国蒙古史学会论文选集（1981）》，第 67 页。

⑦ 《中国民族史研究》，1987 年，第 220～230 页。

⑧ 《内蒙古社会科学》1986 年第 1 期，第 63～71 页。

⑨ 《内蒙古大学学报》（蒙文版）1999 年第 3 期，第 1～24 页。

⑩ 中国蒙古史学会编：《蒙古史研究》第六辑，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0 年，第 167 页。

七、清代蒙古研究

近代中国受列强的侵扰，边疆危机日益严重，引起学者对边疆史地的关心，纷纷著书，道、咸间张穆（1805～1849 年）的《蒙古游牧记》就是其中非常著名的一种，张穆此书详细地记载了清代蒙古各部的情况，成为清代蒙古研究的发端之作。稍晚于张穆的何秋涛（1824～1862 年），也是张氏《蒙古游牧记》的整理者，著《北徼汇编》[①]，对近世的中俄关系有许多警策之论，乃是注意当时北亚国际关系之先声。当然，此时的研究是以记述为主的，尚非近代史学研究的思路。因有关清代蒙古的研究成果数量较多，本文以介绍漠北蒙古研究为主。

（一）1911～1949 年间的清代蒙古研究

清朝灭亡后，中国社会有了很大的进步，但边疆危机仍旧存在，有时较清朝时更为严重，因为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蒙古地区虎视眈眈，而蒙古地区要求独立或自治的呼声自晚清以来又逐渐高涨。因而，中华民国政府对蒙古问题也非常关心，成立了蒙藏委员会，[②]在中央大学设立了边政学系。另外，在近代民族思潮的感染下，蒙古民族的上层人士和知识分子对本族的历史也表现出很大的关心。这些都促成了清代蒙古研究呈现出一派很繁荣的景象。而清代蒙古的历史与当时的现状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最初的研究大都是与边疆实务联系在一起的。

在西方办理报刊之风的影响下，出现了《蒙古旬刊》、《蒙古周

① 咸丰帝颇赏识此书，赐名《朔方备乘》。

② 最初为蒙藏事务局，1914 年改为蒙藏院，1927 年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设蒙藏委员会，隶行政院。

刊》、《蒙旗旬刊》、《蒙藏日报》、《蒙藏旬刊》、《蒙藏月刊》、《蒙藏周报》①、《新蒙古》、《边政公论》、《中国边疆》、《边疆》、《西北论衡》、《边声月刊》、《开发西北》、《边疆通讯》、《边事研究》、《益世报·边疆副刊》等一批关注边疆问题的刊物，一些研究、探讨清代蒙古问题的论文在这些刊物上得以发表。

三四十年代在上述刊物发表论文的有杨秉离、征夫、郑延禧、关震华、札奇斯钦、吴勃冈、王文萱、曾崇慧、黎圣伦、楚全、曹万化等人，内容主要是清朝和蒙古的关系、清代治蒙政策、清代蒙古政治制度这些政治史内容的研究。

其他与清代蒙古研究相关内容有 1914～1928 年间《清史稿》的编撰，以及与蒙古相关的地方志的编纂等。

（二）1949～1978 年间中国大陆的清代蒙古研究

从 1949 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近 30 年间，有关清代蒙古问题发表的论文很少。这期间最具影响的学术成果当属《中国历史地图集》中的清代蒙古部分，蒙古地区的编绘由著名的蒙古史学家韩儒林先生主持。直到今天，《图集》还为学者所利用。

就研究范围而言，我国许多研究者将内蒙古作为主要研究的对象，因为不能兼顾整个蒙古地区，其研究的视野受到一定的限制。

王钟翰先生《清初八旗蒙古考》一文，② 研究了蒙古八旗的建立过程和建制，指出凡编入八旗的蒙古（指早期归附后金的蒙古人）、汉军与八旗满洲一样都是旗人，这一部分蒙古人严格讲应该属于满族共同体的一部分，并指出所谓蒙古八旗这样的说法是不正确的。但后来的不少清代蒙古研究的学者并不注意王钟翰先生的这一见解。到了八九十年代，还有学者继续讨论这一问题，论文有郑玉

① 1931 年 1 月更名为《蒙藏旬报》，1933 年 3 月更名为《蒙藏半月刊》，1934 年更名为《蒙藏月报》。

② 王钟翰：《清史杂考》，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年，第 117～146 页。

英《试论清初八旗蒙古问题》[1]、郭成康《清初蒙古八旗考释》[2]、姚念慈《略论八旗蒙古和八旗汉军的建立》[3]、赵琦《试论后金时期蒙古八旗的形成》[4] 等。在50年代内蒙古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调查成果基础上写作的《蒙古族简史》[5] 一书的相关部分可以看成是50～70年代中国大陆清代蒙古研究成果的一个综合体现。

（三）1978～2000年间中国大陆的清代蒙古研究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清代蒙古研究，论著的数量远远超过了过去的60年，研究的内容也更为广泛。这20年总述清代蒙古的专著有卢明辉的《清代蒙古史》[6]，是在作者20余年的研究成果和国内外其他学者的研究新成果的基础上的综合叙述，是第一部清代蒙古断代史，但也有学者批评其核校有粗疏之处，有不少史实错误和于史无证的臆测之处。[7]

综合研究清朝统治蒙古的制度的有赵云田《清代蒙古政教制度》[8] 一书，从九个方面阐述和分析清代蒙古政教制度：清朝主管蒙古事务的中央机构理藩院、盟旗制度、军府制度、刑法制度、卡台制度、朝觐制度、备指额附制度、宗教和经济政策措施，资料丰富，其中有一些珍贵的新资料，如乾隆三十一年殿刻本《蒙古律例》、抄本《百廿老人语录》等，前者此前国内尚未有人引用过。[9]

---

① 《辽宁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第60～63页。

② 《民族研究》1986年第3期，第51～58页。

③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5年第6期，第26～31页。

④ 《内蒙古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第3～11页。

⑤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年。

⑥ 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

⑦ 白拉都格其：《近年问世的蒙古近现代史论著、资料概要》，《蒙古学信息》1995年第3期，第44～49页。

⑧ 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⑨ 鲁波：《〈清代蒙古政教制度〉即将出版》，《蒙古学信息》1989年第2期，第44页。



1. 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开拓与繁荣。

1978年，黄时鉴先生发表了论文《清代内蒙古社会经济史概述》①、《清代包头地区土地问题上的租与典——包头契约的研究之一》②。从此以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的研究成为清代蒙古以后的一个重要方向。可以看出，70年代末、80年代初仍有不少学者是以内蒙古为清代蒙古研究的对象，研究的惯性和延续性是不会一下子消失的。应该承认，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兴趣是和1949年以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在中国取得主导地位有关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学者们发表的论文，基本上建立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积累的基础之上。当然，在传统政治史研究模式之外的开拓是有利于史学发展的。

在80～90年代对北亚社会经济史研究最为关注的是内蒙古社会科学院的几位学者，如卢明辉的《清代内蒙古地区与中原地区的经济贸易关系》③ 等论文。

从人口史、移民史角度作的研究有：王龙耿、沈斌华《蒙古族历史人口初探（17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④ 一文研究所得是清初蒙古族人口约217万，较明末稍有回升，但由于清朝统治者长期实行削弱蒙古族力量的政策，加之1840年以后我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清末蒙古族人口降为172万。另外，人口的升降还存在各地区不平衡的特点。其他的论文有成崇德《清代前期对蒙古的封禁政策与人口、开发及生态环境的关系》⑤ 等。80年代，关于蒙古地区社会关系的论文较经济研究的论文还很少，90年代则大大增加。

---

① 《蒙古史文稿》，第2期，1978年。呼和浩特市蒙古语文历史学会编印：《蒙古史论文选集》第3辑，1983年，第181～222页。

② 《内蒙古大学学报》1978年第1期，第2～10页。呼和浩特市蒙古语文历史学会编印：《蒙古史论文选集》第3辑，1983年，第281～299页。

③ 《内蒙古社会科学》1982年第5期，第21～29、33页。

④ 《内蒙古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第30～41页。

⑤ 《清史研究》1991年第2期，第26～31页。

2. 传统的政治史研究的继续。

80～90 年代的主要研究成果仍集中在满蒙关系、清朝对蒙古的政策（盟旗制度、满蒙联姻、立法、宗教政策、经济政策）方面，清朝对蒙政策也可以说是满蒙关系的一部分。

蒙古各部归附后金乃至清的历史过程是满蒙关系研究的主要内容。张永江的《试论 17～18 世纪蒙古各部成为清朝藩部的途径与方式》① 将蒙古各部成为清朝藩部的途径归纳为四种方式：联姻—同盟—藩部、通使—册封—归附—藩部、招抚—册封—反叛—征服—藩部、通使—对抗—征服—藩部。其他的论文如魏鉴勋、袁闾琨的《试论入关前的满蒙关系》②、蒙林的《清太祖时期的满蒙关系》③、陈安丽《康熙对蒙古的政策与措施》④ 等均集中讨论清前期，尤其是满清入关前的满蒙关系。此外还有华立《清代的满蒙联姻》⑤、杜家骥《清代皇族与蒙汉贵族联姻的制度和作用》⑥、刘潞《清太祖太宗时期满蒙联姻考》⑦ 等关于满蒙联姻的论文。

在对理藩院及《理藩院则例》的研究中，王钟翰先生《试论理藩院与蒙古》⑧ 一文与徐晓光、陈光国的《清朝对"蒙古例"、〈理藩院则例〉的制定与修订》⑨ 是较为出色的成果。邢亦尘《清代北方边政（政治制度）》⑩ 从政治制度的角度考察清代治蒙政策的各个方

---

① 《蒙古史研究》第六辑，2000 年，第 200～207 页。

② 《北方论丛》1982 年第 5 期，第 23～28 页。

③ 《内蒙古师大学报》1989 年第 1 期，第 77～81 页。

④ 《内蒙古社会科学》1989 年第 2 期，第 55～58 页。

⑤ 《民族研究》1983 年第 2 期，第 45～54、79 页。

⑥ 《南开学报》1990 年 4 期，第 21～29 页。

⑦ 《故宫博物院院刊》1995 年第 3 期，第 67～91 页。

⑧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清史研究集》第 3 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 166～179 页。后收入王钟翰：《清史新考》，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 年。

⑨ 《内蒙古社会科学》1994 年第 3 期，第 54～57 页。

⑩ 《蒙古学信息》1996 年第 1 期，第 17～22 页。



面。此外还有陈安丽《论康熙对蒙古政策产生的历史背景和作用》① 等。

有关盟旗制度的研究成果为数众多，有：陈国干《清代蒙古盟旗制度的来源和性质》②、郑玉英《试论清初八旗蒙古问题》③、王湘云《内扎萨克旗的建立问题》④、袁森坡《喀尔喀蒙古扎萨克的设置与演变》⑤ 等。

有关法律制度的研究有：徐晓光《清朝对蒙古的司法审判制度》⑥、《清朝政府对蒙古的行政立法初探》⑦、《明清之际蒙古地方政权法制概述》⑧，廖扬《论清代蒙古地区的民族立法》⑨，吴振平、海棠《清朝对蒙古地区的立法原则探微》⑩ 等。

3. 蒙古与北亚国际关系。

唐努乌梁海研究是近代中俄关系研究的重要内容。樊明方近来发表的论文《19 世纪 60 年代唐努乌梁海西部中俄边界的划定与阿穆哈河地区割归俄国》⑪ 叙述了 19 世纪 60 年代中俄签订《勘分西北界约记》、《乌里雅苏台界约》划定唐努乌梁海西部中俄边界的经过，指出俄国通过这两个不平等条约侵占了唐努乌梁海西北端阿穆哈河地区，并对嘉庆年间游牧于阿穆哈河一带归定边左副将军直辖的唐努乌梁海十佐领的下落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在划界之前就已经迁

---

① 《内蒙古大学学报》1999 年第 3 期，第 17～25 页。
② 《内蒙古社会科学》1981 年第 1 期，第 63～66 页。
③ 《辽宁大学学报》1983 年第 1 期，第 60～63 页。
④ 《社会科学辑刊》1986 年第 1 期，第 58～64 页。
⑤ 《清史研究通讯》1988 年第 2 期，第 1～10 页。
⑥ 《内蒙古大学学报》1989 年第 1 期，第 68～75 页。
⑦ 《内蒙古社会科学》1989 年第 1 期，第 65～70 页。
⑧ 《内蒙古大学学报》1996 年第 1 期，第 19～27 页。
⑨ 《社会科学辑刊》1998 年第 3 期，第 108～112 页。
⑩ 《内蒙古大学学报》1999 年第 3 期，第 86～89 页。
⑪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7 年第 1 期，第 55～67 页。

入克穆克齐河一带；《19世纪60年代以后俄国对唐努乌梁海盆地的渗透》[①] 从掠夺性贸易、非法采金、非法移民三个方面研究了俄国对唐努乌梁海盆地的渗透，论及19世纪后半叶漠北蒙古唐努乌梁海地区与俄国的关系以及最终并入苏联的历史过程。

关于满清、俄国、蒙古的三角关系，白拉都格其《1840年之前蒙古在中俄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②]、孟和套格套《德勒克多尔济与道咸之际中俄边境交涉》[③] 都做了有益的探讨。也有从经济的角度来探讨蒙古与俄国的关系的，如石楠《辛亥革命前沙俄对蒙古地区的经济扩张》[④]、李易文《清中后期蒙古地区的对俄茶叶贸易》[⑤]。90年代初《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创刊很好地推动了这一类研究的进行。

4. 清代蒙古历史地理及蒙古历史文献、档案的收集、整理、出版。

韩儒林先生有《清代蒙古驿站》一文，[⑥] 是韩先生承担《中国历史地图集》清代蒙古驿站考证和定位的文字稿，依据了康熙朝《满汉合璧内府一统舆地秘图》、嘉庆朝《大清会典事例》卷五五九《兵部·邮政·驿程》、《口北三厅志》卷六《台站》这三种主要材料以及近代中文各种图籍、蒙古行程记和部分方志材料，对于康熙中叶设立的以北京为起点，经由喜峰口、古北口、独石口、张家口、

---

①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年第1期，第62～79页。

②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6年第1期，第57～70页。

③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年第2期，第83～88页。

④ 《西北史地》1988年第3期，第109～113页。

⑤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6年第4期，第49～56页。

⑥ 文章分为四个部分：（一）绪言，（二）内蒙古驿站的方位，（三）阿尔泰军台的方位，（四）巡查卡伦站。其中（一）、（二）部分以《清代蒙古驿站的方位》为名刊于《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5辑，第1～14页。全文收入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编：《韩儒林文集》，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570～616页。



杀虎口通往蒙古各盟旗、各卡伦的五路驿站（出喜峰口、古北口、独石口、杀虎口四口的驿站只达内蒙古各旗，其驿站称为站；从张家口通往西北的驿站称为台，这条线路史称阿尔泰军台）各点的满、蒙、汉名称及今地都作了详细考证。关于蒙古地区驿站的研究，还有金峰《清代内蒙古五路驿站》①、《清代外蒙古北路驿站》②、《清代蒙古台站的管理机构》③、《清代蒙古台站通名的产生与命名（上、下）》④，赵云田《清代蒙古台站考述》⑤，邢亦尘《清代蒙古驿站》⑥ 等论文，通过对清代蒙古地区驿站的设置、管理机构、站名、里程、作用及其变化情况的论述，勾勒出清代北亚交通和地理状况。

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史料的发掘、整理工作是促进研究深入的必要途径，而史料发掘、整理工作的良好进行又必然是建立在研究的基础上的，是能够反映研究水平高下的一个标志。

20 世纪 60 年代，已有研究单位将清代历朝实录中有关蒙古地区的部分辑为《清实录蒙古史料钞》。1982 年内蒙古蒙文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刊行了《蒙文文献丛书》，其中《蒙古史文献史料九种》中的一种《呼伦贝尔总统事略》为清代蒙古族学者以满文写成，根据

---

① 《内蒙古师范学院学报》1979 年第 1 期。呼和浩特市蒙古语文历史学会编印：《蒙古史论文选集》第 3 辑，1983 年，第 333～355 页。

② 《内蒙古大学学报》1979 年第 3、4 期。《中国蒙古史学会成立大会纪念集刊》，第 502～529 页。呼和浩特市蒙古语文历史学会编印：《蒙古史论文选集》第 3 辑，1983 年，第 356～408 页。

③ 《内蒙古大学学报》1979 年第 1、2 期，《中国蒙古史学会成立大会纪念集刊》，第 530～548 页。呼和浩特市蒙古语文历史学会编印：《蒙古史论文选集》第 3 辑，1983 年，第 451～473 页。

④ 《内蒙古地名》第 1、2 期，1981 年。呼和浩特市蒙古语文历史学会编印：《蒙古史论文选集》第 3 辑，1983 年，第 300～309 页。

⑤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清史研究集》第 5 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 年，第 362～380 页。

⑥ 《内蒙古社会科学》1993 年第 2 期，第 65～70 页。

此书有关卡伦的资料，可以纠正《中国历史地图集》（清代部分）中个别卡伦的方位错误。①

道光年间撰成的蒙文编年体事迹《水晶鉴》，是明末、清代蒙古研究的重要资料，经过内蒙古社会科学院留金锁的校注，于1984年出版。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有蒙文《清实录》稿本3758册，在内蒙古社会科学院朱风研究员的倡导、联系下，由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整理，从1990年开始影印出版。③

总的说来，清代漠北蒙古的史料要远远少于漠南蒙古的史料，中央民族大学吴丰培先生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清代边疆史料的收集、整理，于史料较少的漠北蒙古尤为关心，编有《科布多史料辑存》、《清末蒙古史地资料荟萃》。《科布多史料辑存》收集了《桂祥科布多奏稿》、《连魁科布多奏稿》、《科布多巡边日记》、《科布多政务总册》共四种有关漠北蒙古科布多地区历史的原始资料，《清末蒙古史地资料荟萃》收集了《定边纪略》、《乌里雅苏台志略》、《库伦志》、《三多库伦奏稿》、《奉使喀尔喀纪程》、《朔漠纪程》、《游蒙日记》共七种有关清末漠北蒙古的地志、奏稿、游记。④

也有一些文献整理工作因整理质量的问题受到的批评，如新近

① 宝日吉根：《清代蒙古研究评述》，《内蒙古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第65～71页。

② 北京：民族出版社，1984年。关于《水晶鉴》，参考吉日嘎拉：《清代蒙文史籍〈水晶鉴〉》，《内蒙古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第34～39页。

③ 纳古单夫：《近年来内蒙古历史文献学研究概况》，《内蒙古社会科学》1998年第2期，第54～59页。

④ 《清末蒙古史地资料荟萃》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所编的《中国边疆史地资料丛刊·蒙古卷》的一种，1990年由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出版。经吴丰培先生整理的诸种文献，吴氏均作跋语，以介绍其来源、价值等问题，这些题跋又集中于马大正、吴锡祺、叶于敏整理《吴丰培边事题跋集》一书（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30～241页），其中《清末蒙古史地资料荟萃》作《清季蒙古史料汇萃》。



出版的校注《理藩院则例》①，被有的学者讥为“《理藩院则例》问世以来最糟糕的本子”②。

相关史料还可进一步发掘，如西方人以及日本人的见闻录及调查材料，这种换了一个角度和立场的材料有助于比较和发现问题。

现在，利用档案来研究清代蒙古历史已经蔚然成风，典型的论文如内蒙古大学的蒙古史学者齐木德道尔吉《外喀尔喀车臣汗硕垒的两封信及其流传》③ 一文，研究了 1634 年外喀尔喀蒙古车臣汗致后金天聪皇帝皇太极及蒙古林丹汗遗众的两封信，这两封信反映了当时蒙古内部的关系和外喀尔喀车臣汗等人对后金政权的态度，但这两封以蒙文写成的信在翻译和流传的过程中出现了颇多讹误，影响了其史料价值，齐木德道尔吉利用了两信的蒙文原件（载《旧满洲档》，不见于《满文老档》）和满文译文（载《旧满洲档》，又载《国史院档》）、汉文译文（载《清太宗实录》，又载《皇清开国方略》、《皇朝藩部要略》）的对照，作了完整的转写、注释和新译。齐木德道尔吉的另一篇文章《1640 年以后的清朝和喀尔喀的关系》④是论述 1640 年以后十多年间清朝和喀尔喀的关系的，也利用了满、蒙文的档案。

对有关明末、清代蒙古的汉、满、蒙文档案的发掘和研究，这必将会成为今后很长一个时期清代蒙古研究的一条道路，也会使清代蒙古的研究出现不同于元明时期蒙古研究的方法和旨趣。

（四）小　结

1. 就北亚史研究（作为一种颇具特色的地区史研究）而言，清

---

① 海拉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8 年。

② 忒莫勒：《点校注释本〈理藩院则例〉评述》，《蒙古学信息》2000 年第 1 期，第 31～36 页。

③ 《内蒙古大学学报》1994 年第 4 期，第 1～16 页。

④ 《内蒙古大学学报》1998 年第 4 期，第 12～20 页。

朝这一阶段几乎可以等同于蒙古（漠南、漠北）研究，就研究水平来说，不比前面的阶段差，但研究成果不如前面的阶段精彩，可能是许多学术大家并未将研究的触角下延到清代的缘故。

2. 因历史研究对史料的依赖性，而明末清初时期的材料又足资发掘，近十多年来，中国蒙古史学界中的不少学者都将研究集中到这一段。这可能会成为以后蒙古史研究的大趋势。

3. 以后可能的研究方向：以区域史的角度，从社会经济方面研究清晚期以来内蒙古地区的历史。这一研究，除了在档案一类材料的发掘之外，还应辅以人类学的调查，以促进其深入。

第六章　古代东北亚史研究概览

一

所称东北亚，文中采纳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所通用的地理范畴，涵今中国黑龙江、吉林、辽宁等三省及内蒙呼伦贝尔、兴安、哲里木、昭乌达等四盟，俄罗斯阿穆尔、犹太、哈巴罗夫斯克、符拉迪沃斯托克、萨哈林、马加丹、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等五州、二边区，朝鲜、韩、日本等三国；所称“古代”，既以国人研究为叙述对象，不妨截止于 1860 年——近代史的开始。

中国古代东北亚史研究之所涉，是一个面积辽阔、民族成分复杂，兼之年代漫长久远、文明丰富多彩的宇域。不仅如此，这段延续 5000 年以上的历史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无论从政治、经济还是文化史的角度考察，整个地块除人烟稀少的极北部外，大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与之毗连的东亚文明的影响，构成了所称“中华文化圈”的东北部。换言之，在整个欧亚大陆的历史上，只有东北亚具有以上的特点。正因为这种状况，该区域古代史的研究较早地引起了中国学术界的关注。自进入 20 世纪以来，东北亚史的研究在中国蓬勃发展、方兴未艾，由局部发端到全面推开，高潮迭起，终于成为拥有作者百数、文著千数的学术领域。人气之旺、文气之旺，为欧亚大陆各区域历史研究中首屈一指。

与其他世纪一样，20 世纪也是一个由 100 年构成的时段。然而，

正是在这100年中，大陆中国由封建专制政治步入中华民国、步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就占据一半时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又前后经历了新中国初创、社会主义改造以及改革开放等不同阶段。而这样的一个社会，免不了会在文化上体现不同阶段、因时而异的“一体化”倾向。政治既决定着文化的内涵，当然也影响着学术的方向、研究的感观。30年代前后，面临日本军国主义吞并和长久占据东北的危险，学者们多以研究东北地区悠久的中华文明来激发爱国热情、揭露侵略行径。50年代中，研究的课题很少涉及中苏、中朝接壤地区的历史，因为在当时来说，那是有关现代边界的“敏感”问题，即使那些邻国的出版物一再“误解”典籍、声称中世纪中国的领土不出辽河以东。70年代前后，又缘中苏边境上的武装冲突，课题着重于重现17世纪以来俄国的东方扩张，作品中充满着火药味极浓的批判和谴责。而到八九十年代，又缘中日、中韩的外交关系的改善和发展，掀起了以日本史、韩国史、中日关系史、中韩关系史为热点的研究浪潮。

仅据笔者的不完全辑录：整个20世纪，泛东北亚古代史方面的研究成果，计有著作141种（含论文集），文章2686篇。其中，大概有60%，所涉内容与“欧亚大陆”发生关系。著作，绝大部分出版于1980年以后。文章，则1948年前210篇，1949年至1979年间324篇，1980年至2000年间2152篇。在文章类型上，研究文章、争鸣文章占50%，普及文章占30%，其余为介绍文章、翻译文章。在文章篇幅上，不足8000字者占60%，而其中40%以上不足4000字。在研究方法上，则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从“民族史”的角度切入，这样的研究常常打破时间、空间概念，而以民族的动态作为探索的主要对象。二是由“国别史”的角度展开，以古代日本列岛、朝鲜半岛的政权为主要目标，成为“世界国别史”研究的一部分。三是站在“中外交往史”的立场，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整个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相互影响上加以讨论，而以中国的中央王朝作为考察问题的“本位”。除第二种类型与“欧亚大陆”关系不大外，第



一种、第三种类型的研究都在不同程度上牵涉到中国、蒙古，偶尔也会牵涉到中、西亚各国。

研究东北亚古代史的人员，大致可分作“专门从事”与“偶然涉足”二类。“偶然涉足”者中，有的是相关断代史、方面史研究的延续，有的才是完全的“偶然”。其中，不乏文质并茂的作品，而作者有隋唐史学者韩国磐、荣新江，宋元史学者冯家昇、李学智、陈高华、梁太济、黄宽重，明清史学者王崇武，中西交通史学者方豪、黄时鉴，历史地理学者王文楚等。“专门从事”者中，大多数以“地方史”或“国别史”为依托。一是以“东北史”为依托，有金毓黻、张博泉、王承礼、朴真奭、孙进己、魏存诚、李健才、杨旸、蒋秀松等人。一是以“朝鲜（韩国）史”为依托，有杨通方、杨渭生、杨昭全、陈尚胜、王颋、叶泉宏、魏志江等人。一是以“日本史”为依托，有周一良、汪向荣、梁容若、李光涛、沈仁安、王晓秋、王金林、严绍璗、王勇、刘毅、韩昇等人。三者在研究方法上也有所区别，大抵前者由“民族史”，后者由“国别史”，中者则多从“中外交往史”深入。此外，还有日、韩籍学者的作品和具有“介绍”性质的翻译作品，前一类见松浦章《明代末期中国商船的日本贸易》① 等文，而后一类的作者，其中不少为该研究领域的名家，如李丙焘、三上次男、全海宗、朴元熇等。

二

在追溯东北亚居民、特别是“东夷”各支的“源流”时，现有的研究大多有试图证明其系出自黄河、长江流域为中心的东亚的倾向。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方纪生《关于中日同种之考察》② 等

① 《中国史研究动态》1990年第4期，第22～25页。

② 《日本研究》第2卷第1期，1944年，第26～29页。

文首开问题的端倪。进入80年代，更有不少明确结论的文章相继问世。认定朝鲜、句骊、韩来自山东、河北者，有李德山《高句丽族称及其族属考辨》① 等文。于倭，既有主张来自浙江、福建者，也有主张来自湖南、贵州、云南者。前者有王金林《古代中国的沿海文化与日本文化》②、肖平《日本史前社会习俗中的我国古代南方少数民族文化要素》③ 等文，后者则有沈汇《哀牢文化新探——倭奴即哀牢说》④ 等。由于追溯年代久远、现存资料严重不足，许多这样的文章缺少立论必需的直接依据、严密逻辑。在成说的方法上，或由相关名称的“音转”勘同，或由文化“特点”的类比。上古音韵的研究，迄今尚无形成完整体系，更谈不上准确复原各个汉字辅音、元音的音质，因此，所谓的“一音之转”大都信口道来，并不具备真正依据。而风尚、习俗等内容，在各民族演化的过程中异源同质、殊途同归的现象，也非人类文明史上所罕见。所以，相关各说的成立，仍然需要更多的证明、更多的校勘。

除环海区域的“原始”居民外，秦、汉时代大陆迁往东北亚诸半岛、群岛的移民，也是许多学人予以“非常”关注的方面。而以秦代方士徐福东渡为中心的讨论，又是其中特别的“热点”。即在20世纪的前半叶，以汪向荣《徐福东渡考》⑤ 为代表的诸专题论文，实际上已经形成了相关资料收集和问题讨论的规模。到了80年代中，又缘徐福的籍贯的争执形成研究的高潮。当此时期，光以文章统计，本专题除收编60篇以上的3本专门论文集外，尚有数十篇见刊于各种杂志。意见相同者，认为带有传说性质的相关记载乃真实历史的反映，即徐福有其人、其事，而东渡所止系今日本本州岛。

---

① 《社会科学战线》1992年第1期，第224～229页。

② 《天津社会科学》1990年第6期，第70～75页。

③ 《东北师大学报》1995年第1期，第68～71页。

④ 《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第3期，第130～139页。

⑤ 《政治月刊》第5卷第2期，1943年，第116～118页。

意见不同者，徐福的籍贯有山东龙口（黄县）和江苏赣榆二说，而以赣榆说赞成者为多数。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为罗其湘《徐福村的发现和徐福东渡》①、王颋《徐福东渡新考》② 等文。前者专门论证徐福乡里所在的今地，而沈嘉荣《谈徐福研究与史学方法论的几个问题》③ 一文已提出研究方法的质疑，特别是对写作年代相去历史年代久远的家谱资料的使用。后者有传说性记载“隐涵”内容的发掘，如将徐福遇见的“海中大神”当是崇奉“海神”部落的首领，而其东渡动因所找的“三神山”，盖为北冰洋向南漂出的冰山等。

与朝鲜、韩国学者普遍所持观点不同，奠都于大同江畔的古朝鲜系因殷商贤臣箕子引进更高的文明，乃是中国大部分学人的意见。这一观点的表述，早先有蒋逸雪《殷商拓地朝鲜考》④、汪诒荪《箕子朝鲜考》⑤、缪寄虎《箕子入朝鲜真象及早期中韩关系》⑥ 等文，20 世纪 90 年代后又有张碧波、喻全中《朝鲜箕氏考》⑦、施存龙《箕子走立朝鲜析》⑧ 等文。相关的历史地理问题，也是进行辨析的对象，如：李健才《公元前 3 至公元前 2 世纪古朝鲜西部边界的探讨》⑨ 等文。而毗邻地区的各民族，同样也是予以渊源、沿革等考订的问题。“秽貊”有公孙燕《论濊貉之貉非胡人——兼考汉初濊貉地望》⑩、许宪范《濊貊迁徙考》⑪、刘子敏、金荣国《山海经貊国考》⑫、

① 《从徐福到黄宗宪》，1985 年，第 24～51 页。
② 《复旦大学学报》1995 年第 3 期，第 65～71 页。
③ 《学海》1994 年第 1 期，第 74～76 页。
④ 《东方杂志》第 41 卷第 21 期，1945 年，第 42～45 页。
⑤ 《学原》第 1 卷第 4 期，1947 年，第 64～69 页。
⑥ 《大陆杂志》第 38 卷第 3 期，1969 年，第 86～90 页。
⑦ 《社会科学战线》1997 年第 6 期，第 174～183 页。
⑧ 《韩国研究》第 4 辑，学苑出版社，2000 年，第 54～69 页。
⑨ 《社会科学战线》1998 年第 5 期，第 192～201 页。
⑩ 《考古》1962 年第 10 期，第 548～552 页。
⑪ 《民族研究》1985 年第 4 期，第 35～41、26 页。
⑫ 《北方文物》1995 年第 4 期，第 53～55 页。

李德山《貊族的族源及其发展演变》① 等文，“肃慎”有何光岳《肃慎族的起源与北迁》② 等文，“夫余”、“句骊”有李德山《夫余起源新论》③、耿铁华《高句骊起源和建国问题探索》④、刘子敏《高夷考辨》⑤ 等文，而“综合”者则干志耿、孙进己《从民族与种族、语族的相互关系看黑龙江各民族的归属》⑥、傅朗云《东北亚土著民族源流考》⑦ 等文。披览以上文章，有的结论过大而相关资料匮乏，随意勘同而可信程度降低。

地跨今中、朝、俄三国的高句骊王朝及其近邻夫余政权的研究，系从《好太王碑》的校释展开。罗振玉、刘节等先生20世纪初的撰文即是这个开始时期的作品。随着70年代末以来考古上的不断发现，相关的研究日益增多，进后扩展为夫余、句骊历史的全面考述。相关的作品计有著作2种，论文集1种，文章110篇。具有代表性的成果，盖王健群《好太王碑》⑧ 和李健才《夫余的疆域与王城》⑨，李殿福《集安高句丽壁画初探》⑩，王存礼《吉林、辽宁的高句丽遗迹》⑪，孙玉良《高句丽社会性质浅析》⑫、《公元五世纪前后高句丽的发展》⑬，耿铁华《高句丽民俗概述》⑭，魏存诚《高句丽积石墓的

① 《社会科学战线》1998年第1期，第191～196页。
② 《黑河学刊》1991年第2期，第97～102页。
③ 《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2期，第203～208页。
④ 《求是学刊》1986年第1期，第79～85页。
⑤ 《延边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第75～79页。
⑥ 《北方论丛》1983年第5期，第108～111页。
⑦ 《外国问题研究》1990年第1期，第62～67页。
⑧ 东方书店，1985年。
⑨ 《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4期，第170～173页。
⑩ 《社会科学辑刊》1980年第4期，第120～125页。
⑪ 《考古文物》1984年第6期，第31～33页。
⑫ 《博物馆研究》1984年第1期，第36～41页。
⑬ 《北方文物》1985年第3期，第80～87页。
⑭ 《求是学刊》1986年第5期，第77～81页。



类型和演变》①，朴真奭《关于高句丽存在山上王与否的问题——与杨通方同志商榷》②，李健才《关于高句丽南北道的探讨》③，张甫白《高句丽五部与统一的民族和国家》④，王纯信《高句丽民族艺术遗存中的生殖崇拜》⑤，张博泉《高句丽社会性质研究》⑥ 等文。这些文章的基本精神：夫余、高句丽与中国中央王朝有着密切的关系，从而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有着不同一般的影响。而略感遗憾的是，上涉文章大都字数不多，论述欠深，读者难以对专题有非常清晰的印象。

三

属于大陆的华夏文明在东北亚环海地区的传播，一直是学人普遍关心的话题。而所称的传播，又主要发生在中世前期的隋、唐及稍早时期。20 世纪 40 年代，即有贺昌群《唐代文化之东渐与日本文明之开发》⑦ 等文发表。兹后，作者迭出，一批颇有创意的作品应时而生。总论方面有杨泓《从考古学看唐代中日文化交往》⑧、方亚光《从中外文化交往看唐代中国的历史地位》⑨、韩昇《唐朝对日本的移民》⑩ 等文，文学艺术方面有常任侠《日本绘画艺术的发展与

---

① 《考古学报》1987 年第 3 期，第 321～338 页。
② 《世界历史》1989 年第 2 期，第 138～147 页。
③ 《历史地理》第 8 辑，1990 年，第 142～149 页。
④ 《黑龙江社会科学》1996 年第 1 期，第 60～65 页。
⑤ 《社会科学战线》1996 年第 4 期，第 199～205 页。
⑥ 《黑龙江社会科学》1997 年第 4 期，第 57～62 页。
⑦ 《文史杂志》第 1 卷第 12 期，1941 年，第 27～46 页。
⑧ 《考古》1988 年第 4 期，第 358～365 页。
⑨ 《社会科学战线》1990 年第 1 期，第 168～173 页。
⑩ 《社会科学战线》1993 年第 6 期，第 153～158 页。

中国的关系》[①]、王秀文《古代中日交往与日本文字的形成》[②] 等文，宗教信仰方面有黄心川《隋唐时期中国与佛教交流—新罗来华佛教僧侣考》[③]、杨曾文《奈良佛教六宗及早期的中日佛教文化交流》[④]、荣新江《唐与新罗文化交往史证——以海州大云寺禅院碑为中心》[⑤] 等文。文物典籍方面有武陵子《唐代文物典籍对日本的传播》[⑥]、林家骊《日本影弘仁本文馆词林与我国先唐遗文》[⑦] 等文。上列作品中的大部分，搜罗广博，发掘精深，同时体现了隋唐断代史和中日韩关系专门史的特点。而在著作方面，梁容若《中日文化交流史论》[⑧]、严绍璗《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⑨] 等书，或以言词精美擅长，或以功力蕴厚见称，特别是后者，可说是不可多得的佳作。

作为华夏文化传播媒介的"遣隋使"、"遣唐使"和"留学生"、"留学僧"，当然也是研究的热点。20 世纪 50 年代，已有朱梓荣《唐代的日本留学生》[⑩] 等文涉及。逮至 80 年代，3 年里出版了 3 本选题相同的著作：池步洲《日本遣唐使简史》[⑪]、姚嶂剑《遣唐使——唐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略》[⑫]、武安隆《遣唐使》[⑬]。比较起来，研究有深度的还得算相关的论文，如戴禾、张英莉《中日史籍中的日使来

---

① 《中日文化交流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 年，第 7～19 页。
②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89 年第 2 期，第 56～60 页。
③ 《世界宗教研究》1989 年第 1 期，第 54～75 页。
④ 《世界宗教研究》1989 年第 1 期，第 76～84 页。
⑤ 《韩国研究》第 3 辑，1990 年，第 14～34 页。
⑥ 《史学月刊》1987 年第 6 期，第 21～23 页。
⑦ 《文献》1989 年第 2 期，第 17～32 页。
⑧ 台北：商务印书馆，1985 年。
⑨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 年。
⑩ 《史学月刊》1958 年第 4 期，第 26～30 页。
⑪ 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83 年。
⑫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 年。
⑬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 年。

唐事异同考》[①]、陈志贵《日本遣唐使初探》[②]、苏渊雷《略论入唐八家及中国高僧对于沟通中日文化的卓越贡献》[③]、黄约瑟《日本留唐学生橘逸势事迹考》[④]、徐琛《圆仁入唐求法通如之旅路线考》[⑤]、陈尚胜《唐代的新罗侨民社区》[⑥]、贾云《宾贡进士崔致远和他的桂苑笔耕集》[⑦]、樊文礼、梁太济《崔致远再次踏上唐土的时间和地点》[⑧]、孙光圻《公元八—九世纪新罗与唐代的海上交通》[⑨]、韩昇《空海与日本国书》[⑩]、王金林《遣唐使的使命》[⑪]、金宪镛、李健超《陕西新发现的高句丽人、新罗人遗迹》[⑫]、王仲殊《关于日本第七次遣唐使的始末》[⑬] 等都是值得认真阅读的作品。上涉文章，大都以对照中、日二国“正史”记载为手段，从各个侧面进行考察。有的还将关注点转到了当时的文集、笔记和今天的考古、文物，从而加深了学术的深度。

自从黄维翰《渤海国记》[⑭]、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⑮] 等著作于20世纪30年代相继问世，相关渤海国基本资料的辑录、编纂工作已粗具规模。在考古获得进展的前提下，70年代末后又出现了研

---

① 《文史》第20辑，1983年，第75～87页。
② 《中日关系史论文集》，1985年，第1～11页。
③ 《学术月刊》1988年第5期，第65～68页。
④ 《第二届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台北，1993年，第21～43页。
⑤ 《东南文化》1995年第4期，第25～33页。
⑥ 《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第161～166页。
⑦ 载《东南文化》1997年第4期，第84～87页。
⑧ 载《韩国研究》第4辑，2000年，第96～109页。
⑨ 《海交史研究》1997年第1期，第30～42页。
⑩ 《空海研究》第3辑，1996年，第165～188页。
⑪ 《日本研究》1998年第3期，第64～69页。
⑫ 《考古与文物》1999年第6期，第59～71页。
⑬ 《考古与文物》2000年第3期，第21～27页。
⑭ 辽海书社，1931年。
⑮ 辽阳金氏千叶山馆，1934年。

究的高峰，付梓的专题著作3种、论文集1种、文章149篇。尽管相关的资料严重不足，学人们仍在尽可能地发挥，将研究的选题铺开到大氏政权的各个方面。部族、社会有姜守鹏《从古代文献看渤海国的族属》①、刘振华《渤海大氏王室族属新证》②、魏国忠、朱国忱《渤海国政治制度述略》③、刘毅《论渤海国社会性质》④等文；文艺、习俗有朱国忱、张泰湘、吴文衔、魏国忠《关于唐代渤海国的文学艺术》⑤、李殿福的《从考古学上看唐代渤海文化》⑥、宋德胤《渤海民俗论》⑦、齐红深《唐代渤海教育文化刍论》⑧等文；农工、商贸有方学凤《渤海国农业生产发展资料的辑述》⑨、《关于渤海植棉问题》⑩、陈显昌《渤海国经济试探》⑪、刘晓东、郝思德、杨志军《渤海国货币经济初探》⑫等文；历史地理有陈显昌《唐代长安通往渤海的交通要道》⑬、刘晓东、魏存诚《渤海上京城主体格局的演变—兼谈主要宫殿建筑的年代》⑭等文。值得提到的是，上涉大部分作品都持大氏系唐朝的藩属，而渤海史则为中国史一部分的观点。

隋唐时期东北亚民族区域、地方政权与东亚王朝间的关系，也

① 《求是学刊》1980年第3期，第46～50页。
② 《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3期，第208～215页。
③ 《求是学刊》1981年第3期，第42～49页。
④ 《日本研究》1995年第2期，第14～24页。
⑤ 《求是学刊》1980年第3期，第51～55页。
⑥ 《学习与探索》1981年第4期，第130～137页。
⑦ 《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第1期，第165～171页。
⑧ 《社会科学辑刊》1997年第1期，第102～106页。
⑨ 《延边大学学报》1981年第3期，第83～85页。
⑩ 《学习与探索》1984年第6期，第144～145页。
⑪ 《北方论丛》1982年第3期，第93～97页。
⑫ 《历史研究》1991年第2期，第107～121页。
⑬ 《学习与探索》1983年第2期，第134～137页。
⑭ 《北方文物》1991年第1期，第46～50页。



是研究的重要部分。前一部分，研究范围广阔。关系到与隋、唐王朝有交涉的粟末靺鞨以外的黑水靺鞨，有李学智《黑龙江与隋唐两代之黑水靺鞨》①、杨保隆《黑水部与黑水靺鞨地域考》②、干志耿、孙进己《通古斯与通古斯起源》③、干志耿《靺鞨族及黑龙江流域的靺鞨遗存》④、魏国忠、孙正甲《唐与黑水靺鞨之战》⑤ 等文。而王颋《圣王肇业——韩日中交涉史考》的第六章《耽罗更化》、第七章《虾夷偕朝》、第十一章《斡拙安抚》，则是关于远在今济州岛的耽罗、北海道岛南部的虾夷、库页岛北部的窟说相关论文的中心编排。⑥ 后一部分，以新罗、日本等为中心者有黄约瑟《武则天与日本关系初探》⑦，韩国磐《南北朝、隋唐与百济、新罗的往来》⑧，韩昇《唐平百济前后的东亚国际形势》⑨、《论隋倭交往的形式及其实质》⑩ 等文，以渤海为中心者有徐琳《从唐代渤海和日本诗人之间的往来谈历史上的中日文化交流》⑪、武安隆《七二七—九二六年渤日关系述论》⑫、禹硕基《安史之乱与日本联渤攻罗战略》⑬、魏国忠《论渤日关系中的对等外交》⑭ 等文。这些文章，部分比照现代的外交战略分析问题，令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

---

① 《大陆杂志》13卷8期，1956年，第16～21页。
② 《北方论丛》1984年第3期，第92～98页。
③ 《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第3期，第188～195页。
④ 《北方文物》1985年第1期，第23～29、112页。
⑤ 《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第3期，第196～202页。
⑥ 北京：学林出版社，1998年，第93～110、111～128、185～202页。
⑦ 《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1989年。
⑧ 《历史研究》1994年第2期，第21～42页。
⑨ 《唐研究》第1辑，1995年，第224～227页。
⑩ 《厦门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第115～122页。
⑪ 《北方论丛》1981年第3期，第103～104页。
⑫ 《世界历史》1985年第10期，第28～36页。
⑬ 《日本研究》1995年第2期，第1～5页。
⑭ 《日本研究》1996年第1期，第58～65页。

四

辽、金二朝东北亚的研究，集中在民族、外交等二个方面。涉及的民族主要为已经地域迁移的渤海和女真，相关的文章有杨保隆《辽代渤海人的逃亡与迁徙》①、董万伦《关于辽代长白山女真几个问题的探讨》②、蒋秀松《东女真与西女真》③ 等。涉及的外交主要是战和不一的辽、金与高丽的关系，相关的文章有蒋秀松《女真与高丽间的曷懒甸之战》④、魏志江《论辽与高丽关系的分析及其发展》⑤、《辽金与高丽的经济文化交流》⑥ 等。上列文章多以对相关记载的字句含义辨析见长，而不太引用除了正史和也属于正史的《高丽史》以外的典籍，如中、韩两国现存的当时文集、笔记。引用资料的范围狭小，也往往会使读者产生行文、结论的“雷同”感觉。另外，介于金末元初的蒲鲜氏东夏国，也颇受学界关注。尽管资料和证物严重不足，学人们仍进行了近似“少米之炊”的积极探讨，有的甚至是意见不同、谁也说服不了谁的争论。相关的作品有景爱《关于东夏国都城的再探讨》⑦、朴真奭《东夏国开元位置考》⑧、董万伦《关于东真国几个问题的探讨》⑨、郑铭《论王浍》⑩、魏国忠

① 《民族研究》1990年第4期，第93～103页。
② 《民族研究》1989年第1期，第78～82，61页。
③ 《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4期，第167～176页。
④ 《民族研究》1994年第1期，第83～89页。
⑤ 《扬州师院学报》1996年第1期，第87～93页。
⑥ 《社会科学战线》2000年第5期，第181～188页。
⑦ 《延边大学学报》1981年第4期，第86～91页。
⑧ 《社会科学战线》1988年第3期，第193～198页。
⑨ 《蒲峪学刊》1988年第1期，第24～28页。
⑩ 《社会科学战线》1988年第3期，第175～184页。

《东夏史事再辨》[①]、刘长海《东夏史事辨析》[②]、《蒲鲜万奴有异志辨析》[③] 等文。

两宋之与东北亚区域关系的研究，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已展开，张家驹、汪向荣的相关撰文即是其中的代表。进入80年代后，讨论乃在贸易、佛教、理学、邦交等多个方面进行。其重要作品，有杨渭生《宋丽经济文化交流述略》[④]、朴玉杰《宋代商人来航高丽与丽宋贸易政策》[⑤]、安淑珍《北宋中日僧侣的文化交流》[⑥]、鲍志成《高丽寺寺址和沿革考述》[⑦]、杨志诚、曹厚德《古代明州与高丽的佛教禅宗交流》[⑧]、包伟民《大觉国师入宋求法史事杂考》[⑨]、方祖猷《宋明州高丽宝云义通大师事迹考：兼论其在佛教史上的作用》[⑩]、李甦平《中日朱子学理范畴比较》[⑪]、吴熊和《高丽史乐志中宋人词曲的传入时间与两国的文化交流》[⑫]、祁庆富《宋代奉使高丽考》[⑬]、黄时鉴《宋丽蒙关系史事一瞥——收剌丽国送还人考述》[⑭]、樊文礼《宋代高丽宾贡进士杂考》[⑮] 等文。以上列举的作品，大多有厚实的史料功夫，不少作者擅长考据，层层展开，揭示了许多鲜为人知的

---

① 《北方文物》1992年第3期，第67～71页。
② 《北方文物》1994年第3期，第67～74页。
③ 《文史》第49辑，1999年，第181～190页。
④ 《韩国研究》第1辑，1994年，第80～121页。
⑤ 《韩国传统文化——历史卷》，2000年，第47～70页。
⑥ 《河南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第41～44页。
⑦ 《韩国研究》第1辑，1994年，第168～199页。
⑧ 《韩国研究》第4辑，2000年，第137～142页。
⑨ 《韩国研究》第4辑，2000年，第143～155页。
⑩ 《宁波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第35～44页。
⑪ 《哲学研究》1991年第9期，第69～75页。
⑫ 《韩国研究》第1辑，1994年，第8～25页。
⑬ 《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2期，第145～154页。
⑭ 《东西交通史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367～379页。
⑮ 《韩国传统文化——历史卷》，2000年，第71～85页。

历史篇段。而在“辨伪”方面，朱瑞熙、刘学峰《朱熹之曾孙朱潜及其父朱巨考》[①] 一文论证了朱熹曾孙朱潜不曾像家谱中所说的那样曾经东渡高丽，可说是值得称道的好文章。

元代大陆与东北亚地方的关系研究，始自蒙古东征日本战役的考述。刘熹亭《元朝忽必烈汗征倭之研究》[②]、汪诒荪《元世祖东征日本考》[③] 等文，肇端于40年代初。此后，学人关心的点面又相继转到元与高丽、日本关系的各个方面。关于战争者，有王启宗《元世祖诏谕日本始末—元军第一次征日考》[④]、范寿琨《试论十三世纪蒙古对高丽的入侵》[⑤]、郝时远《蒙古东征高丽概述》[⑥] 等文。关于贸易者，有方安发《元代中日贸易简论》[⑦] 等文。关于民族者，有杨茂盛《关于元代兀者的名称、分布与族属问题》[⑧]、丛佩远《元代库页岛的诸民族》[⑨]、《元代辽阳行省境内的契丹、高丽、色目与蒙古》[⑩]、王崇实《元代入居中国的高丽人》[⑪]、桂栖鹏《高丽人入仕元朝考论》[⑫] 等文。关于事件者，有李学智《元代设于辽东行省之开元路》[⑬]、丛佩远《元初乃颜哈丹之乱》[⑭]、王颋《高丽忠宣王西谪事

① 《韩国研究》第4辑，2000年，第156～168页。

② 《西北论衡》第8卷第8、9期，1940年，第19～22页。

③ 《文哲季刊》第7卷第1期，1941年，第78～95页。

④ 《大陆杂志》第32卷第5、7期，1966年，第144～150页。

⑤ 《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4期，第148～152页。

⑥ 《蒙古史研究》1987年第2期，第15～20页。

⑦ 《江西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第60～64页。

⑧ 《中央民院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第26～32页。

⑨ 《民族研究》1989年第4期，第92～100页。

⑩ 《史学集刊》1993年第1期，第7～14页。

⑪ 《东北师大学报》1991年第6期，第46～49页。

⑫ 《韩国传统文化——历史卷》，2000年，第96～118页。

⑬ 《大陆杂志》第18卷第2、3、4期，1959年，第42～44、88～92、120～124页。

⑭ 《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3期，第156～162页。



件考辩》[1] 等文。关于科技、理学、宗教、风俗，则有朴真奭《十三世纪后半期——十四世纪元与高丽的科技交流》[2]、孙国珍《元代中日文化交流及宋学在日本的传播和研究》[3]、有丛佩远《元代辽阳行省境内的宗教》[4]、王崇实《元代蒙古族习俗对高丽的影响》[5]等文。

宋、元代乃至后世书文、金石之流播于东北亚者，仍是学人关注的方面。早在三四十年代，梁盛志《元代日僧邵元在华所撰碑》[6]等文开始了这一方面的考索。进入70年代以后，研究向着更广的范围开展。周彦文《宋代以来中国书籍的外传与禁令》[7]、张升《明代朝鲜的求书》[8]、陈东辉《从古籍丛书看中日典籍交流》[9] 等文，于各个时期进行概观的考述。而王绵厚《张成墓碑与元代水达达路》[10]、贺次君《日本史记会注考证增补史记正义的真伪问题》[11]、杨旸《明代辽东都司治所辽阳碑志初探》[12]、杨平《考明刻广舆图中所附日本图的作者》[13]、陈高华《从老乞大、朴通事看元与高丽的经济文化交流》[14]、杨渭生《孙穆鸡林类事的史料价值》[15]、王政尧、赫晓

① 《韩国研究论丛》第3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28～244页。
② 《延边大学学报》1981年第4期，第80～85页。
③ 《内蒙古师大学报》1984年第4期，第22～28页。
④ 《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3期，第206～214页。
⑤ 《中国典籍与文化》1993年第3期，第24～28页。
⑥ 《中和》第3卷第11期，1942年，第15～21页。
⑦ 《韩国学论文集》第3辑，1994年，第22～28页。
⑧ 《文献》1996年第4期，第140～151页。
⑨ 《日本研究》1996年第4期，第59～61页。
⑩ 《社会科学辑刊》1981年第3期，第99～105页。
⑪ 《文史》第14辑，1982年，第31页。
⑫ 《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第2期，第210～214页。
⑬ 《文物》1989年第6期，第57页。
⑭ 《历史研究》1995年第3期，第45～60页。
⑮ 《宋丽关系史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42～48页。

林《简论燕行录与清代中朝文化交流》[①]、黄时鉴《朝鲜燕行录所记的北京天主堂》[②]、祁庆富《关于明末两种高丽图经版本》[③] 等文，则是对具体典籍或碑铭的详证。除外，还应特别提到的是，为曾经游历过高丽的印度高僧指空相关讨论奠定资料基础的陈高华《元代来华僧人指空事辑》[④] 一文。

五

关于明、清东北及其周边地区的经营，除少数文章外，重要作品大多问世于20世纪80年代前后。建置有郑天挺《明代在东北黑龙江的地方行政组织——奴儿干都司》[⑤]，蒋秀松、王兆兰《关于奴儿干都司的问题》[⑥]，杨旸、傅朗云《明代松花江流域卫所设置考略》[⑦]、《明代亦儿古里卫的设置与管辖》[⑧]，李健才《禾屯吉卫和奴儿干都司》[⑨]，刘如仲《关于特林地形图和囊哈儿卫指挥使司印》[⑩]，徐健竹《再论明代必里卫》[⑪] 等文，重心在于明代的奴儿干都司及下属卫、所等；民族有董万崙《明代建州女真迁徙新证》[⑫]、蒋秀松《从兀良哈与兀狄哈的比较中看女真各部发展的不平

① 《韩国学论文集》第7辑，1998年，第121～132页。
② 《东西交流史文稿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405～432页。
③ 《韩国传统文化——历史卷》，2000年，第92～104页。
④ 《南亚研究》1979年第1期，第63～68页。
⑤ 《史学集刊》1982年第3期，第28～33页。
⑥ 《民族研究》1990年第6期，第85～95页。
⑦ 《求是学刊》1983年第1期，第99～108页。
⑧ 《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1期，第198～202页。
⑨ 《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1期，第226～230页。
⑩ 《社会科学辑刊》1981年第4期，第108～109页。
⑪ 《文史》第14辑，1982年，第195～207页。
⑫ 《求是学刊》1985年第3期，第90～96页。



衡性》[①] 等文，重心在于明代的建州女真、兀良哈、兀狄哈等；边界有胡宝林《试论清代黑龙江的边防》[②]、李治亭《论清太宗对黑龙江流域的统一》[③]、佟永功、关嘉录《乾隆朝对黑龙江下游及库页岛地区管辖一例》[④]、杨昭全《清代穆克登查边及中朝两次勘界》[⑤]、张旋如、李光《帝俄出兵侵占东北与血洗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义和团运动史的一节》[⑥] 等文，重心在于清代的黑龙江中下游辖域变迁。除外，经济有董玉瑛《明代海西女真的经济生活》[⑦]、李健才《明代东北驿站考》[⑧] 等文；人物有丛佩远《亦失哈考略》[⑨]、吕光天《清乾隆时期鄂温克族的勇将海兰察》[⑩] 等文。

明、清与高丽、朝鲜关系的研究，关注点主要集中在二个方面。一是明前期的外交，包括高丽由亲北元转向亲明的过程、朝鲜初期的"朝贡"关系，以及朝鲜前中期派军队进入女真地面等。其代表作有薛篁《明洪武间明朝与高丽王朝关系略论》[⑪]、姜龙范《洪武至永乐初年围绕女真问题所展开的中朝交涉》[⑫]、陈尚胜《偰长寿与高丽朝鲜王朝的对明外交》[⑬]、王兆兰《十五世纪三十年代朝鲜两次入侵建州》[⑭] 等文。二是"壬辰倭乱"，特别是中国军队进入鸭绿江以

---

① 《社会科学战线》1984 年第 1 期，第 207～213 页。
② 《北方论丛》1985 年第 5 期，第 41～46、63 页。
③ 《北方论丛》1983 年第 4 期，第 103～108 页。
④ 《历史档案》1984 年第 1 期，第 88～90，114 页。
⑤ 《社会科学战线》1991 年第 3 期，第 215～223 页。
⑥ 《社会科学战线》1978 年第 1 期，第 203～208 页。
⑦ 《社会科学战线》1980 年第 4 期，第 187～191 页。
⑧ 《社会科学战线》1981 年第 2 期，第 182～188 页。
⑨ 《中国史研究》1980 年第 4 期，第 153～167 页。
⑩ 《北方论丛》1983 年第 5 期，第 103～107 页。
⑪ 《社会科学战线》1997 年第 4 期，第 165～169 页。
⑫ 《延边大学学报》1998 年第 4 期，第 52～56 页。
⑬ 《韩国传统文化——历史卷》，2000 年，第 119～134 页。
⑭ 《社会科学战线》1990 年第 1 期，第 199～204 页。

东帮助朝鲜抗击入侵者的事实。其代表作有李树桐《明代中日朝鲜战争》[①]，王崇武《李如松征东考》[②]，李光涛《朝鲜壬辰倭祸酿衅史实》、《朝鲜壬辰倭患与李如松之东征》[③]、《明人援韩与杨镐蔚山大捷》[④]，汪向荣《丰臣秀吉侵朝期间日本军民的反战斗争》[⑤]，张庆洲《抗倭援朝战争中的明日和谈内幕》[⑥]，武寅《论壬辰战争在中日关系史上的地位》[⑦] 等文。统而论之，以上各文，大部分作者用心于理论多于考证，而于史料如韩国文集的引用明显不够。除外，以李光涛《记朝鲜国表文》[⑧]、《记清代的朝鲜国表笺程式》[⑨] 等文为代表的朝鲜"表文"的讨论，题目虽小，却也因剖析的深入、细致而令人不能不赞叹。

日本之与明、清王朝关系的研究，学人们主要着眼于经济、文化、人物等三个方面。前者着力于贸易，特别是郑氏集团的海上经济活动，如朱亚非《从中日勘合贸易看明朝对外政策》[⑩]、《略论明中后期的中日贸易》[⑪]、林仁川《明代私人海上贸易商人与倭寇》[⑫]、陈柯云《从朝鲜李朝文献看郑氏集团的海外贸易》[⑬]、任鸿章《明末清初郑氏集团与日本贸易》[⑭]、韩昇《清初福建与日本的

---

① 《文史杂志》第 1 卷第 6 期，1941 年，第 31～36 页。
② 《史语所集刊》第 16 辑，1947 年，第 343～374 页。
③ 《史语所集刊》第 22 辑，1950 年，第 267～295 页。
④ 《史语所集刊》第 41 辑第 4 分册，1971 年，第 55～68 页。
⑤ 《辽宁大学学报》1986 年第 6 期，第 83～85 页。
⑥ 《辽宁大学学报》1989 年第 1 期，第 101～104 页。
⑦ 《日本问题研究》1990 年第 2 期，第 32～38 页。
⑧ 《大陆杂志》第 11 卷第 11 期，1955 年，第 5～10 页。
⑨ 《大陆杂志》第 12 卷第 4、5 期，1956 年，第 1～3，26～32 页。
⑩ 《山东师大学报》1989 年第 4 期，第 35～40 页。
⑪ 《东岳论丛》1985 年第 4 期，第 97～104 页。
⑫ 《中国史研究》1980 年第 4 期，第 94～108 页。
⑬ 《安徽师大学报》1985 年第 1 期，第 92～100 页。
⑭ 《日本研究》1988 年第 4 期，第 42～50 页。



贸易》[①]、陈东林《康、雍、乾三帝对日本的认识及贸易政策比较》[②]、魏能涛《明清时期中日长崎商船贸易》[③]、高洪《浅谈丝割符与江户前期对外贸易—以中国生丝输入为中心》[④] 等文。中者放眼到各个部分，并以华侨的活动的考察侧面，含冯佐哲《明清及其前后中日饮食文化交流述论》[⑤]、童家洲《明末清初日本长崎福建籍华侨述略》[⑥]、欧阳跃峰《晚清中日文化交流概况》[⑦] 等文。而后者所涉，集中在朱舜水、黄宗羲、黄遵宪等人，分别有梁容若《朱舜水与日本文化》[⑧]，韦祖辉《朱舜水与日本德川时代惺窝学派分化》[⑨]，周桂钿《朱舜水杂著杂议》[⑩]，钱明《黄梨洲朱舜水关系考辨》[⑪]，陈祖武《从〈避地赋〉看黄宗羲的东渡日本》[⑫]、《黄宗羲东渡日本史事考》[⑬]，盛邦和《黄遵宪与日本明治史学》[⑭] 等文。

以明、清代为中心考察时期的中国、琉球关系，也是20世纪30年代就引起广泛注意的课题。到80年代后，二度出现研究高潮。该方面的代表作：属于总论者有姚枏《中国与琉球的关系》[⑮] 等文，属

---

①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2期，第59～64页。
② 《故宫博物院院刊》1988年第1期，第12～20页。
③ 《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2期，第49～64页。
④ 《齐齐哈尔师院学报》1987年第3期，第75～80页。
⑤ 《北方论丛》1991年第5期，第34～40页。
⑥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第115～121页。
⑦ 《日本学刊》1994年第3期，第137～148页。
⑧ 《大陆杂志》第8卷第4期，1954年，第102～109页。
⑨ 《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第88～96页。
⑩ 《孔子研究》1998年第1期，第116～120页。
⑪ 《杭州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第28～34页。
⑫ 《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1期，第135～139页。
⑬ 《浙江学刊》1988年第1期，第73～75页。
⑭ 《华东师大学报》1984年第5期，第52～57页。
⑮ 《学原》第1卷第3期，1948年，第8～11页。

于明代部分有米庆余《明代中琉之间的册封关系》[①]，赵建群、陈铿《明代使琉球封舟考述》[②]、《从明代中琉关系的发展中看福建造船业》[③]，林仁川《明代中琉贸易的特点与福建市舶司的衰亡》[④]，罗振玉《明封琉球国王尚丰敕跋》[⑤]，胡汝明、姜于凤《兰溪琉球国使墓考略》[⑥]，徐恭生《从浦添碑刻看中琉文化交流》[⑦] 等文，属于清代部分有朱淑媛《清代琉球国贡使官生的病故及茔葬考》[⑧]、戈斌《清代琉球贡使居京馆舍研究》[⑨]、吴元丰《清初册封琉球国王尚质始末》[⑩] 等文。

六

综观 20 世纪后期中国东北亚古代史研究文章，突出问题之一是课题的选择。相当部分文章关注“宏观”问题讨论，甚至“终极”理论的探求。可是，临到披阅，又不得不为书写的“言简意赅”感到惊愕。仅 1991 年里，就见周炎辉《中日文化的同与异》[⑪]、焦润明《中日两国文化交往的历史追思》[⑫] 等文以 1 万字左右的篇幅讨论连 10 万字都说不清楚、跨越数千年进行中日“文化”比较的问题；而

① 《日本学刊》1997 年第 4 期，第 120～130 页。
② 《福建师大学报》1987 年第 2 期，第 85～90，107 页。
③ 《福建史志》1988 年第 1 期，第 26～29 页。
④ 《海交史研究》1988 年第 1 期，第 163～171 页。
⑤ 《浙江学刊》1985 年第 1 期，第 98～99 页。
⑥ 《世界历史》1997 年第 2 期，第 123～125 页。
⑦ 《海交史研究》1989 年第 1 期，第 68～72 页。
⑧ 《历史档案》1994 年第 2 期，第 80～88 页。
⑨ 《历史档案》1994 年第 3 期，第 84～92 页。
⑩ 《历史档案》1996 年第 4 期，第 75～83 页。
⑪ 《湖南大学学报》1991 年第 3 期，第 69～77 页。
⑫ 《世界历史》1991 年第 2 期，第 74～83 页。

李乃扬《朱子学说在日本的发展》[1]、武玉环《试论日本封建时代儒学的发展及其历史作用》等文均以不足6000字的篇幅阐发日本儒学的最重要方面。后者更是包含了中国儒学“在日本的传播与发展”、“对日本社会的影响”以及“日本儒学的特点及其历史作用”等众多方面。[2] 宏观构架的建立，需要以微观分析为基础；而在理论上有真正突破的人，必然也是在此以前作过长时间个案考察的人。没有基础论述宏观的作品，有可能会是完全的因袭或变相的剽窃。

历史是空间和时间的结合，因此，在涉及区域历史比较时，极应把握好这种限定。除外，研究者还得有深厚的学术底蕴，对所涉方面同时有足够的掌握。否则，作出的成果或是无法深入，或是所指甚少。沈其新《孔子、天皇、上帝：日中西传统文化之比较》[3]、骆兆伦、刘念慈《试比较中国士、日本武士和西方骑士》[4]、辜燮高《苏格兰、日本、英格兰和中国的兄终弟及制》[5] 等文，题目架构庞大，只是行文纰漏时见。而钱澄《日本历史上的重大改革与吸收外来文化》[6]、乙三《试述我国古代帝王称号兼及日本天皇名称的来源》[7]、姜文清《佛教影响与中日审美意识》[8]、朱卫新、徐虹、陈宏力《东亚佛教的由来与发展》[9]、陈蒲清《三千年延续不断的文学因缘：古代朝鲜与中国的文学交流说略》[10] 等，都是“不读也罢”的文章。因为，若要相信作者的论证，首先得做许多史实的“补正”工作。

---

① 《吉林师院学报》1991年第2期，第77～79页。
② 《西北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第48～56页。
③ 《广州研究》1988年第11期，第40～44页。
④ 《重庆师院学报》1988年第1期，第50～51页。
⑤ 《世界历史》1983年第1期，第17～25页。
⑥ 《扬州师院学报》1994年第2期，第100～106页。
⑦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第90～96页。
⑧ 《日本学刊》1997年第4期，第96～109页。
⑨ 《东北亚论坛》2000年第4期，第69～71页。
⑩ 《益阳师专学报》1998年第2期，第64～68页。

发表文章主题的相似，在东北亚史研究学界十分普遍。数量众多的同一方面作品，当然难以避免文章内容的雷同，特别是当引用资料、讨论基点并没有更新的时候。在这类作品中，部分就是同一个人的手笔。如“好太王碑”的研究，仅王健群先生即有《好太王碑研究》① 等一本著作、《好太王碑乙未年纪事考释—公元五世纪高句丽》②、《好太王碑的发现和捶拓》③、《好太王碑六年丙申、八年戊戌条考释》④、《好太王碑原石拓本的新发现及其研究》⑤、《关于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好太王碑原石拓本》⑥ 等十余篇文章。仔细阅读，其中文字的貌似、内容的重叠，比比皆是。有些内容可认为是属于“同类”，为什么不合而为一以给读者清晰的全貌？实际上，如果仅摭拾其中的精言萃旨，恐怕只要三分之一的篇幅就足够表述清楚了。

出现在东北亚地域内的诸民族、国家的社会分期、政权性质、生产力等问题，大都由于现存资料的局限性，特别是在上古、中古时代，几乎不可能清楚地评判和定性。正是这种原因，就是一些学术功力极其深厚的老资格学者，也仍然免不了圆此缺彼的情况。如汪向荣先生《邪马台国》⑦ 一书中的相关论述，就曾被林隐《评邪马台国》一文指摘：“书中的有些观点互相矛盾，第 152 页说：魏志《倭人传》中所描述的一些国应该是生产力比较发达的地区，已经进入奴隶社会的地区。第 161 页却说：可以认为当时日本列岛上，虽然已经进入阶级社会，但仍残存着很深的原始社会的痕迹，还不能目为已完全进入奴隶社会。”⑧

① 《东北亚论坛》1993 年第 3 期，第 92～96 页。
②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 年。
③ 《社会科学战线》1983 年第 4 期，第 171～180 页。
④ 《学习与探索》1983 年第 4 期，第 131～135 页。
⑤ 《世界历史》1993 年第 2 期，第 3～19 页。
⑥ 《世界历史》1995 年第 2 期，第 2～11 页。
⑦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年。
⑧ 《世界历史》1983 年第 2 期，第 95 页。



尽管，也许“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演化模式就是古代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但是，在研究具体社会对象的性质时，不能以简单又牵强地套用，来形成“想当然”的“反引证”。张博泉《高句丽与中原文明》称：“高句丽的奴隶制含有大量的中原奴隶制内容，也受到箕子之后朝鲜遗制的直接影响，与中原的田蚕织作和礼义是相通的。高句丽在奴隶制解体和向封建制变革中，由于接受中原封建制的影响，其旧有的政体结构就变革为新的政体结构”。“高句丽奴隶制是城邑制，把它同中原郡县制结合进行新的改造，便形成具有高句丽特点的以山城为主的新的郡邑、州邑制度，并以长安城为模式建立新都城”。① 仔细检验所列资料，何尝有丁点“奴隶”或“奴隶制”的内容。又，孙进己、干振玮、庄严《肃慎、挹娄、勿吉、黑水靺鞨的经济和社会性质》一文：“《晋书》虽记载父子世为君长，但这应属于习惯地由同一家庭选出他们的后继者的办法，因此这是一种世选制而不是世袭制，不能据此认为挹娄在当时已进入了原始社会末期。”② 但是，问题的症结不在后部分，而在前部分：作者凭什么认定“世选制”而不是“世袭制”呢？

七

20 世纪后期东北亚古代史研究文章，突出问题之二是忽视资料的“到位”。

依照中国史学研究的“传统”，无出处不引，无根据不言。可是，不少文章、著作，或者只见少量引书，或者将今人的著述当作原始资料，或者直接照搬他处的“参考书目”。蒋秀松《试论李

---

① 《社会科学战线》1985 年第 5 期，第 186～191 页。

② 《北方论丛》1985 年第 5 期，第 36～40 页。

满住》[①]、姜龙范、刘子敏《李朝太祖在位时期中朝关系述论》[②] 等文忽视朝鲜文集中有大量相关的资料，只依靠《明实录》、《明史》、《高丽史》、《朝鲜王朝实录》等少数资料进行论述。

王家骅《安藤益昌与儒学》一文后注中唯见《安藤益昌全集》及作者“拙作”《儒家思想与日本文化》、《西周的启蒙思想与儒学》等二种。[③] 孟宪仁《风土记与中国方志的渊源管窥》一文于文末列“主要参考书”，而在文中进行比较的“中国方志”仅仅是《越绝书》和原书已佚的周处《风土记》、李泰《括地志》。[④] 丛佩远《元初乃颜哈丹之乱》一文所引用的也只是《元史》、《新元史》、《多桑蒙古史》、《续资治通鉴》、《秋涧集》等。[⑤] 对于资料确实匮乏的课题，自然以“阙如”为好，因为那才是科学的态度。赵鸣岐《东夏国经济状况概述》一文似乎很完整地勾勒了资料极其缺乏的东夏国的经济状况，可是，引用的绝大部分根本不是蒲鲜氏统治时间内的情形，甚至以《新唐书·渤海传》中三百年前大氏的记载类推。

引书不标明版本和页码，乃是许多东北亚史研究从事者的“习惯”。这样的做法，令读者难以对引文进行查照和核对。实际上，相当多的典籍，因刻印年代、地点不同，而出现所涵内容的差别。尤其是罕见的本子，甚至应该说明如何发现、现在哪里。孙文良先生《明代援朝逐倭探微》一文正是以“稀见”的《思庵实纪》中的资料作为主干进行讨论的，然而，文中除了“此书总分为上下两篇，每篇又分上下两部分，共四卷”外，并不涉及所见书的版本。[⑥] 对于晚出的原书中所引的早出书文字，应该首先搞清二者的关系以及早

① 《求是学刊》1983 年第 3 期，第 94～100 页。

② 《延边大学学报》1998 年第 3 期，第 54～57 页。

③ 《日本研究》1992 年第 4 期，第 50～56 页。

④ 《日本研究》1992 年第 2 期，第 66～70 页。

⑤ 《社会科学战线》1993 年第 3 期，第 156～162、222 页。

⑥ 《社会科学辑刊》1994 年第 3 期，第 94～99 页。



出书是否尚存。王勇《日本折扇的起源及在中国的流播》文中将《初学记》中所引葛洪《西京杂记》的文字当作北宋后资料来证明，正是由此而来的谬误。① 又因时去当代甚远而有“窜易”现象，一些书籍不能当成原始资料使用。如清中叶成编的《续资治通鉴》、清末民初竟稿的《蒙兀儿史记》、《新元史》以及全藉《高丽史》删削而成的《东国通鉴》。然而，刘长海《东夏史事辨析》一文当进入讨论初即云：“金、元文献中，记载有关的文字有四处，以时间为序摘录如下：《蒙兀儿史记》、《蒲鲜万奴传》、《新元史》、《蒲鲜万奴传》……”②

由于年代的久远，对于考古来说，在判断没有确切时代和文字叙述的实物时，应该谨慎对待，必须结合历史背景，结合现有典籍，多做相反的“假设”进行验证。高句骊的最早都城、亦东明圣王的始居地，检证《魏书》、《三国史记》，盖在源头在南、干流向北、名为“掩滞”的大河之上。可是，陈大为《桓仁县考古调查发掘简报》仅凭“据我国史书记载，桓仁县是早期高句丽族长期居住过的中心地区之一，从浑、富尔两江流域的大批高句丽墓葬的存在和五女山高句丽城址的保存，以及高句丽文化遗物的出土”等三言两语，就使之确定为完全不符合条件的“南北长约一千米、东西宽约三百米”的五女山古城。③ 又如据《旧唐书》作为高句骊“长城”起点的“扶馀城”，只缘旧说农安县古城位于今有遗迹可寻的“边岗”外三十里，径被李健才《唐代高丽长城和扶余城》一文予以否定，而改比附于距“边岗”连线最近点也有四百里路的“吉林市龙潭山高句丽山城”。④ 实际上，金代的净州城，就设在类似的“边墙”之外不远，更何况现存的“边岗”并不完整。

不少学者著文时很少查阅与自己文章相关主题的作品，费力得

---

① 《日本学刊》1995 年第 1 期，第 115～130 页。

② 《北方文物》1994 年第 3 期，第 67～74 页。

③ 《考古》1965 年第 1 期，第 5～10 页。

④ 《民族研究》1991 年第 4 期，第 49～55 页。

出的结论其实他人早已有了详尽的论述。马骏骐《试论元帝国对日本的征伐》一文称："国内外专文研究不多，拙文拟就此作些粗浅探索。"姑不论在此前中国国内即有不少相关文章，即在日本，专门介绍这方面研究的川添昭二《蒙古袭来研究史论》一书，就已指出："蒙古袭来"的研究早就是学者经久不衰的热点，作者过百，作品过千。① 尤其是池内宏的专著《元寇の新研究》篇幅宏大，汇聚中、日、韩三方面的资料论述，蔚为大观。② 而作者所分析的"忽略了元军不习水战，不惯海战的弱点"，"征伐将领矛盾重重"，"日本举国上下，团结一致，保卫家国"，"中朝两国人民的反元斗争，有力地支持了反侵略斗争"等原因也成了无用功。③ 同样的情况出现在苗威的《高丽忠宣王在中国》④ 一文，作者并没有注意到王颋《高丽忠宣王西谪事件考辨》一文已揭示：高丽忠宣王之被流放吐蕃，乃是元英宗发生旨在使高丽"中土化"计划实施的一部分。⑤

闭门造车的另一个结果就是"各说各的"。只不过不少"各说各的"，实在是没有太多的依据。这对于暂还没有把注意力投入该方面的人来说，几乎很难直接借用相关的结论。魏国忠、朱国忱《渤海人口考略》写道："渤海灭亡时就有兵数十万之众，较之初年增加了几倍之多，按最保守的估计，人口可达三百万以上。"⑥ 而时隔二年，同杂志所刊登的刘含若、谷风《金代以前黑龙江历史人口探索》一文却论道："渤海灭亡时，有兵数十万，依五口一兵例推算，似可达到一百五十万人左右。"⑦ 上二者估计数字竟然相差了一倍。

---

① 东京，雄山阁《中世史选书》本，昭和 52 年。

② 东京，东洋文库《东洋文库论丛》本，昭和 6 年。

③ 《贵州文史丛刊》2000 年第 5 期，第 19～22 页。

④ 《东疆学刊》2000 年第 2 期，第 45 页。

⑤ 《韩国史论丛》第 3 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年，第 228～244 页。

⑥ 《求是学刊》1983 年第 2 期，第 85～93 页。

⑦ 《求是学刊》1995 年第 4 期，第 91～96 页。

八

由于疏于引书、懒于读书，不少文章的作者缺乏研究应具的学术“常识”。杨昭全《渤海是我国唐王朝辖属下的少数民族地方政权》一文认为：“唐时渤海王国之领域系古代肃慎族之故地，而周时的肃慎领域即为周王朝管辖之领土”。“渤海在接受唐王朝册封的同时，向唐王朝朝贡”。“唐将渤海全境划为唐之州级行政区忽汗州”。“唐可任命渤海的官吏，渤海人可到唐为官。唐文化广泛传入渤海，渤海深刻吸收中原文化”。[①] 前二条不成其为理由，后二条纯粹就是误会：忽汗州只是唐的“羁縻”建置，渤海自有自己的行政划分。而所任命的官吏，也不过是犒劳前来使者的辛劳的一种“待遇”罢了。

王金炉《兀良哈族族源初探》一文云：“兀良哈亦称乌梁海、兀良哈、斡良改、骨利干等，有十余种称谓”。又云：“至元中徙兀连、撼合纳、吉利吉思人于肇州，为后来的兀良哈民族奠定了有力的基础。兀连与兀良，兀字不变，连字译成良字，撼合纳，取其字头撼字，撼译成哈字，即合译为兀良哈”。“兀良哈族可上溯至秦汉时期的丁零族”。[②] “骨利干”难从比附，“斡朗改”即“斡亦剌”，也就是与“兀良哈”并列的蒙古三部之一瓦剌。其实，“兀良哈”意为“森林中百姓”，系元代东道诸王属民继续东迁入大兴安岭以东的部民。而他所说“兀良哈”一词的前半部“兀连”应作“兀速”，乃与之风牛马不相及的“吉利吉思”诸部之一。“吉利吉思”族人大部在15世纪后迁居天山南北，成为今天的“吉尔吉斯”和“柯尔克孜”族，留居在原地的部裔，则是与“黠嘎斯”近似的“哈卡斯”族。

---

① 《求是学刊》1982年第2期，第81～87页。

② 《北方论丛》1987年第5期，第59～62页。

古音韵经历了上古、中古、近古三个阶段，后二个阶段的情况基本清楚，而前一个阶段迄今所知仍然甚少。可是，一些作者就是凭着所谓上古音的“勘同”，将几乎很难证明相关的地名、族名“有机”地串联起来，构成解释“体系”。李德山《高句丽族称及其族属考辨》一文中循着“介莱—句骊”、“蕃莱—沸流”、“番介—沃沮”、“莱莱—乐浪”一线断言：“高句丽民族自山东而来，为炎帝族系的一支”。其实，“乐浪”之“乐”，中古音读“lak”，与平声韵的“莱”相去甚远。而“貉”，现存记载可以确知其早先的方位乃今河北、山西北部和内蒙古中南部，但作者却因与夷并称，说在山东。“玄菟”明明是“黑虎”，作者却说“玄即黑，菟音头转，义为头裹黑巾之族。炎帝族系初皆尚黑，以黑为美，遂用黑巾缠头”①。周向永《夫余名义考释》一文云：“娄，古读余，段玉裁将娄字列在虞字韵目下。诗山有枢：山有枢，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娄，可证娄读余音不误。夫娄也就是夫余的化身。漱与余古音相近，前者为屋部心母，后者为鱼部喻母，喻心邻纽，鱼屋旁对转，所以，解慕漱意即北冥之鱼。”② 殊不知同韵部的字未必同音，而入声字“漱”与平声字“鱼”，古代译写非华夏民族名词时尤其加以区分，如何可以随便攀连？

李威周《东方文化与现代化论文集中有关日本的一些问题》一文曾直率地批评过以日本史为基础研究东北亚史的人（原在注中点明作品与作者，兹略）：“有的论文，记错了一些日本历史。大化革新的内容有废除皇族和豪族的私有地、私有民，而不是废除族长制度；建立京师、国、郡、里等组织，而非开始建立郡县制。又如说：前后派出了十九次遣唐使。日本虽任命遣唐使十九次，到唐实为十五次，其中一次迎入唐大使，一次为送唐客大使，作为外交使节事实上只有十三次”。“有的论文说：德川幕府实行了宽政改革，并不

① 《社会科学战线》1992年第1期，第228页。

② 《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1期，第185页。



能挽救儒学的衰败，也不能禁止新思想的产生。与此同时，通过荷兰语言学习西欧学术和文化的兰学即洋学，在日本滴油满地地传播开了。兰学和洋学前后衔接，既相联系又有区别，论者错把两者当一回事了”。①

在学术上寻求创新，当然值得赞扬。但是，在没有掌握相关资料、知识时，就刻意立异，其结果往往是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施存龙《玛雅文化是中国连云港市先民航海去创造的吗》一文指出了玛雅文化的内涵，与某些主张上古中国居民到过美洲的人所理解和勘对的内容大相径庭。② 又，本来没有关联的各个民族间存在着相同或相似的文化内容，其实不是罕见的事情。崔羲秀《朝鲜族与瑶族文化比较》一文就曾发现朝鲜族与瑶族间在文化上的共同点。③所以，绝不能像嵇立群《云南一倭族之源》一文，光凭西南民族与日本民族文化上可能的“异途同归”就声称前者就是后者的“源流”。④ 对于不甚清楚的历史，应该以相应“模糊”的语言来叙述，而不该人为地增添“清晰”的“轮廓”甚至所谓的“构架”。高立保《中日蚕丝文化关系溯源》一文论道：“日本国蚕丝业和稻作大量兴起之时，正是徐福东渡之时。因之，蚕丝和稻作文化传至日本，应是同一条路线。秦汉初期可安全航行至日本者只能是北路，唯徐福东渡大集团才是日本稻作、蚕丝业长足发展规律的直接动力。”⑤ 作者所说的“日本国蚕丝业和稻作大量兴起”，基础在于相关的考古发现。可是，考古所发现的实物远不足以达到“大量”，也不能把遗址的时代精确地指为“徐福东渡之时”呀。

中国人向来有“讳言”的习惯，所以，现有的研究“总结”几

---

① 《日本学》第八辑，1997年，第396、398页。

② 《世界历史》1998年第3期，第120～128页。

③ 《延边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第114～118页。

④ 《日本学刊》1997年第5期，第24～36页。

⑤ 《日本研究》1993年第1期，第43～47页。

乎大部分以“肯定”作为主旋律。这种作法为非科学的写作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特别是所谓“空白”的“填补”，正在不断地制造“泡沫”般的成果。东丹国的真正享年一共只有3年，相关资料也就是屈指可数的十余条，分布在《辽史》、《契丹国志》少许的几个纪、传及发现的一二残碑。然而，杨雨舒《近15年来国内东丹史研究概述》一文专门介绍研究，声称：“自1980年起至1994年止，国内出版设有专门章节介绍东丹史内容的著作5部，资料1部，译著作2部；共发表东丹史方面的论文、考古报告及资料等50余篇”。“某些方面还有所突破，涌现了一批见解独到、颇有说服力的佳作”。[①] 东夏史的资料情况相似，可李健才《东夏史评介》一文在“评介”赵鸣岐《东夏史》时，说是“填补了空白”，“特别是有关东夏经济、东夏的城市等问题，都是过去没有涉及到的问题”，“以丰富的史料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论述”。[②]

沈安仁《近年来中国的日本古代史研究动态——1992年1月11日在日本明治大学的讲演》一文，曾当着日本的学术同仁之面，委婉地提到这个时代作品中的“研究的局限性”，那就是“语言的局限性，视野的局限性，资料的局限性”[③]。说来，在自认为从事东北亚史研究的人中，这样的情况还不少：以日本史为主攻，不懂日语，以韩国史为主攻，不懂韩语，以东北史为主攻，既不懂满语、蒙语，也不懂古汉语。而在掌握部分语言工具的人中，也有许多极不愿在阅读上下工夫。粗粗地看一二种原始的典籍，草草地读四五篇今版的文作，套上一个“构架”，攀上一个“联想”，忽忽立说，匆匆成文。而以这种程序“制造”出来的“成果”，仍被作为正面的东西介绍。为了让真正优秀的作品传给后人，学术界是不是到了该“区分”、“清理”的时候？

---

① 《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3期，第251、256页。

② 《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1期，第214页。

③ 《日本学》第5辑，1995年，第307页。

第七章　欧洲与内陆亚洲关系研究

自公元前一千年草原丝绸之路开辟以来，在欧洲与内陆亚洲的广袤地区，众多民族繁衍生息，不断迁徙，不断交往。自塞人伊始，欧洲与内陆亚洲也是交流不绝。近百年来，对于"欧洲与内陆亚洲"这一课题，我国学者也有所涉猎，兹述其梗概。

一

欧洲与内陆亚洲的交往，最早可以追溯到斯基泰人。斯基泰人游牧于广袤的欧亚草原，成为欧亚之间各种交流的担当者。学界对斯基泰人的研究，大致集中在"斯基泰人的种属和构成"、"斯基泰人的分布和活动"两个课题上。

早期欧亚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希罗多德《历史》记为"斯基泰人"(Scythae)，《汉书·西域传》记为"塞种"。塞种在西方史料中则多称为 Sakā（或 Sacae，即萨迦）。波斯大流士一世（公元前521～486年）时期所刻"贝希斯敦铭文"，即把塞种称为 Sakā。对于斯基泰人与塞人的关系、两者的族属和分布地区，学者们有不同的说法。

王治来认为，斯基泰与萨迦（塞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他们的种族和语言属于同类，但对其社会经济和文化应加区别。斯基泰是指里海以北南俄草原一带的游牧人而言。根据波斯纳黑希鲁斯塔姆石刻，萨迦人分为三个集团：一是豪玛瓦尔格·萨迦人（意为牧地塞人，或带着所崇拜的植物叶子的萨迦人），分布在费尔干纳盆地

及帕米尔、阿赖岭等地；二是提格拉豪达·萨迦人（意为戴尖帽子的萨迦人），分布在吉尔吉斯与南哈萨克斯坦的草原地带，即从帕米尔、阿赖岭以北，包括塔什干、天山以至巴尔喀什湖以南及西南的楚河、塔拉斯河流域；三是提艾伊·塔拉·达拉伊雅·萨迦人（意为海那边或河那边的萨迦人），分布于阿姆河以北、威海东南索格底亚那地带。①

余太山在其《塞种史研究》中，② 首次在国内集中译介了古波斯、希腊和罗马关于塞种的载录，并给出了自己的考释。他认为，塞人（Sakā）主要包括 Asii（异译为 Isse）、Gasiani、Tochari 和 Sacarauli 四个部落。公元前 7 世纪末叶，这四个部族出现于伊犁河、楚河流域；此后，他们逐渐向西扩张到锡尔河、向东进入塔里木盆地诸绿洲。以 Tochari 为主的塞人建立了大宛和大夏，Asii 人建立了奄蔡，Sacarauli 人建康居，Gasiani 人的后裔建立了贵霜帝国。塞人诸部可能迁自东方。《史记·大宛列传》、《汉书·西域传》所记“大夏”包括 Asii、Gasiani、Tochari、Sacarauli 四部。③ 至于塞人与斯基泰人的关系，余太山似没有给出解释。

芮传明则认为，奄蔡相当于西史记载中的阿奥西（Aorsi），阿奥西人居住在里海北半部的沿岸及顿河下游，奄蔡不完全等同于“阿兰”（Alani）；公元 1 世纪中叶，据有俄罗斯中部的阿兰人强盛，征服了阿奥西人，后者遂改名“阿兰”；奄蔡和阿兰是属于印欧人种的萨尔马提安（亚）人，即为白种人。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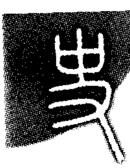
项英杰、项焱认为，锡尔河以北、南西伯利亚以南广大的草原

① 王治来：《中亚史纲》，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 年，第 25～26 页。

② 余太山：《塞种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年，第 1～2、39～40 页。

③ 余太山：《大夏与大月氏综考》，《中亚学刊》第 3 辑，北京：中华书局，1990 年，第 17～46 页。

④ 芮传明：《奄蔡和阿兰》，载《苏州铁道师院学报》1986 年第 1 期，第 111～117 页。



地带，是塞种人的主要起源地。后来，塞种人东边分布到中国河西地区，西到第聂伯河流域。塞种人的绝大多数属于高加索人种（欧罗巴人种），其语言属印欧语系。塞西安和萨尔马提亚人的语言属印欧语系印度伊朗语族东伊朗语支。①

黄时鉴认为，斯基泰人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斯基泰人是希罗多德时代（公元前5～4世纪）欧亚草原上主要的居民，其构成包括希罗多德《历史》第4卷中提到的狭义斯基泰人、撒罗马泰人（Sauromathae）、布迪诺伊人（Budinoi）和斯基泰别部，他们实际上就是波斯人所称的塞迦人（Sakā），汉籍中的塞人（Sek），在体质形态和面貌方面属于欧罗巴种。②

在有关塞人的研究基础上，学者们进而讨论连接欧洲与内陆亚洲的草原之路的开辟、走向和丝绸之路上的民族等课题。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著述，除了前面提到的余太山、黄时鉴文以外，还有莫任南《从〈穆天子传〉和希罗多德〈历史〉看春秋战国时期的中西交通》③、孙培良《斯基泰贸易之路和古代中亚的传说》④。

上述有关塞人、斯基泰人等民族的讨论，有助于我们了解先秦时期游牧民族的分布、迁徙，以及中国与欧洲的交往的时间和内容，有助于我们理解希罗多德《历史》的记述。

关于中国通过欧亚草原与欧洲的早期交流，戴禾、张英莉《中国丝绢的输出与西方的“野蚕”丝》结合中外研究成果指出，⑤ 中

---

① 项英杰等：《中亚：马背上的文化》，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9～21页。

② 黄时鉴：《希罗多德笔下的欧亚草原居民与草原之路的开辟》，收于黄时鉴：《东西交流史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③ 兰州大学编：《西北史地》1984年第4期，第50～58页。

④ 中外关系史学会编：《中外关系史论丛》第1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第3～25页。

⑤ 《西北史地》1986年第1期，第7～14页。此文后以《先汉时期的欧亚草原丝路》之名，收于张志尧主编：《草原丝绸之路与中亚文明》，第9～21页。

国丝绸早在公元前 6～4 世纪时已传到西南亚，甚至欧洲；同一时期在欧洲出现的丝织物是中国丝织品，或是把中国丝绸“解而重织”的复制品，而不是所谓的“野蚕丝”织品；中国丝绸主要是通过欧亚草原输入希腊、罗马的。其他重要的著述有苏北海《汉、唐时期的草原丝绸之路》①，徐勤《丝绸之路与欧亚大陆桥的地理基础》②，王震亚《先秦传疑时期的中西经济文化交流》③ 等文，探讨了先秦至汉唐各个时期中国与中亚、西亚和欧洲的丝绸贸易。

郭物《青铜锼在欧亚大陆的初传》④ 认为，青铜锼很可能是商末周初陕北李家崖文化人群发明的；青铜锼发明后，很快就由月氏人沿草原丝绸之路传入新疆，然后在公元前 5 世纪传入叶尼塞河上游，形成塔加尔铜锼系列；斯基泰人、萨尔马泰人（公元前 4 世纪以前称萨夫罗马泰人）、塞人等都广泛使用铜锼；耳部带单乳突铜锼（A 系）从中国北方一直传播到南西伯利亚、西伯利亚、卡马河流域、中亚和库班草原；从铜锼的形制可以看出，塞人（生活在欧亚草原的东部）与斯基泰人（生活在欧亚草原的西部）的确存在着差异。郭物的铜锼研究，为我们揭示出在公元前 8～3 世纪，新疆北疆地区与南西伯利亚、西伯利亚、卡马河流域、中亚、南俄草原和库班草原之间的确切联系。

二

两汉时期内陆亚洲的诸民族交往，主要有匈奴西迁以及汉朝与

---

① 张志尧主编：《草原丝绸之路与中亚文明》，第 22～33 页。

② 收于李明伟主编：《丝绸之路贸易史研究》（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16～28 页。

③ 李明伟主编：《丝绸之路贸易史研究》，第 29～38 页。

④ 余太山主编：《欧亚学刊》第一辑，北京：中华书局，1999 年，第 122～150 页。



罗马的交往等热点课题。

匈奴西迁，横扫欧亚草原，对世界上古历史的发展造成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关于此课题的研究，长期为学界所注目。

关于匈奴西迁史实的考辨，有丁谦《汉以后匈奴事迹考》①，金元宪《北匈奴西迁考》②，肖之兴《关于匈奴西迁过程的探讨》③，丘克、王建中《关于匈奴西迁欧洲的质疑》④，林幹《北匈奴西迁考略》⑤，舒顺林《略论北匈奴西迁的原因》⑥，郭平梁《匈奴西迁及其一些相关问题》⑦。丁谦、金元宪是国内较早详述匈奴西迁历程的学者。丁谦在文章中，考论了北匈奴在公元 90 年（东汉和帝永元二年）后西迁的历程，匈奴人之侵入欧洲，并提出了康居悦般国为北匈奴人所建，悦般本匈奴贵族，悦般王在公元 508 年率众入居黑海以北之地，成为斯拉夫族，俄罗斯的斯拉夫族为匈奴之真种等观点。金元宪详述了北匈奴单于在公元 3 世纪末率众横扫乌拉尔河、伏尔加河、多瑙河、来因（莱茵）河的历史过程，以及匈奴西迁的历史影响，并认为《后汉书·西域传》所记粟戈、奄蔡属康居，此康居即匈奴新建之悦般，粟戈、奄蔡即东哥德。金元宪在文章中还讨论了白匈奴西入俄境之事。⑧

对于匈奴西迁的原因，学者们意见有分歧。林幹认为，北匈奴与汉为敌，经常入侵汉地；公元 91 年（永元三年），汉出击，北单

---

① 《地学杂志》1919 年第 7、8 合期。此文摘要见林幹编：《匈奴史论文选集》，北京：中华书局，1983 年，第 580～581 页。

② 《国学论衡》第 5 期（上），1935 年 6 月，第 37～42 页。

③ 《历史研究》1978 年第 7 期，第 83～87 页。

④ 《西北民族文丛》1984 年第 2 期，第 58～67 页。

⑤ 《内蒙古社会科学》1984 年第 1 期，第 59～65 页。

⑥ 《内蒙古师大学报》1986 年第 3 期，第 51～59 页。

⑦ 《民族史论丛》第 1 辑，1987 年 1 月，第 103～113 页。

⑧ 金元宪：《北匈奴西迁考》提要，见林幹编：《匈奴史论文选集》，第 581～582 页。

于率众向西逃遁。舒顺林则认为，我们不能将北匈奴的西迁完全归之于北匈奴单于的与汉为敌；北匈奴的西迁，汉朝负有不可推卸之责；北匈奴西迁的主要原因，应是东汉政府联合南匈奴、乌桓、鲜卑、丁零进击北匈奴的结果。①

关于匈奴与欧亚草原上诸民族的关系，有何震亚《匈奴与匈牙利》②，佟柱臣《匈奴西迁与欧洲民族之移动》③，岑仲勉《伊兰之胡与匈奴之胡》④。何震亚认为，北匈奴离开蒙古地区，至公元 374 年踞有里海以北之地，建立昏国，其后匈奴酋长阿鞮（提）拉在公元 436 年占据多瑙河，其后裔于 596 年建立匈牙利国，其第一任国王即阿鞮拉的曾孙阿巴鞮（Abad）；匈牙利即匈人之地。何震亚在文中列举匈奴人与匈牙利人在祭祀天地鬼神、崇拜日月、习俗尚左、致谢则脱帽等风俗习惯相同，以及对父母子女伯叔、骡、马、狗等称谓的相同以证实他的观点。佟柱臣在文章中首先介绍了国外学者关于匈奴的族属及匈奴是否即匈人的诸家学说。在文章的第四部分，他引用《魏书·西域传》悦般国条的记载及德人夏特（F. Hirth）、法人得几内（J. Deguignes）、英人巴克尔（E. H. Parker）和吉本（Gibbons）等人的学说，证明北匈奴被窦宪击败后，西越乌孙，抵康居，更由康居至阿兰、哥德之地，其后深入欧洲腹地，故匈奴与欧洲的匈人实为一族。匈奴人侵入欧洲，引起了欧洲民族大迁徙。岑仲勉则考论，“胡”字是当日伊兰民族之称，并无贬义，匈奴称胡与波斯称胡同是一义。

关于匈奴西迁的历史影响，有阎宗临《匈奴西迁与西罗马帝国

---

① 参见林幹：《北匈奴西迁考略》，舒顺林：《略论北匈奴西迁的原因》。出处见注第 28、29 页。

② 《中外文化》第 1 卷第 1 期，1937 年 2 月，第 39～48 页。

③ 《学艺》第 2 辑，1942 年 1 月。该文摘要见林幹编：《匈奴史论文选集》，第 582～583 页。

④ 《真理杂志》第 1 卷第 3 期，1944 年 5 月。又载林幹编：《匈奴史论文选集》，第 29～36 页。

的灭亡》①，齐思和《匈奴西迁及其在欧洲的活动》②。齐思和在文章中，讨论了“匈奴的历史发展”、“北匈奴西迁的过程”、“匈奴在欧洲的活动”、“关于匈人来源的争论”4个问题。德·揆尼（即得几内）和吉本无力考证出匈奴西迁的具体过程，而齐思和第一次详细勾勒了北匈奴西迁的过程，把这一过程分为4个阶段：悦般时期、康居时期、粟特时期和阿兰时期。他驳斥了英国汤普生“匈人非匈奴”、“匈人的来源不可知”的观点（《阿提拉与匈人的历史》，牛津，1948年），证明匈人的主体即是匈奴，并论述了匈奴在欧洲的活动和它的历史意义。他还指出，现在匈牙利国人的主体是公元9世纪末来自西亚的马札尔人，西迁的匈奴人早已与马札尔人及其他民族融合在一起了。余太山《匈奴、Huns同族论质疑》③、《关于Huns族源的臆测》④，则力主西迁欧洲者并非中国历史上的匈奴人，很可能是鲜卑人。

有关匈人的讨论，又引出了有关匈牙利人来源的讨论。龚方震《十世纪前突厥与匈牙利的关系》⑤，探讨了“匈牙利语中的突厥辞汇”、“匈牙利名称的由来”、“东罗马皇帝康斯坦丁七世（905～959）所记Magyar人与Sabar人的关系”、“Khazar人、Pecheneg人、Bashgīr人的族属和迁徙”等问题。他考证说，匈牙利人自称马札尔人（Magyar），马札尔人原居突厥可萨地（Khazaria），由Sabìr人中的一支发展而来；Sabìr人即为鲜卑人；鲜卑人种不仅限于拓跋氏，还包括匈奴人等。朱学渊《Magyar人的远东祖源》⑥，通过语

① 《学术通讯》1962年第2期。收于《阎宗临史学文集》，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93～305页。

② 《历史研究》1977年第3期，第126～141页。

③ 《文史》第33辑，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57～73页。

④ 《文史》第34辑，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286～288页。

⑤ 中外关系史学会编：《中外关系史论丛》第1辑，1985年，第34～48页。

⑥ 余太山主编：《欧亚学刊》第一辑，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86～117页。

辞比较、姓氏分析、历史记述等方面，考辨了 Magyar 人（即匈牙利人）的族源，认为 Magyar 人除了与蒙古语族、突厥语族有血缘关系以外，他们与女真—满族的祖先靺鞨人有着更为重要的祖源关系。

对于欧洲学者的研究成果，我国学者也很早就给予关注。早在 1930 年，姚从吾就发表了《欧洲学者对于匈奴的研究》一文，[①] 着重介绍了法国学者得几内的《匈奴、土耳其（突厥）、蒙古与西方鞑靼通史》，德国学者夏特的《窝耳迦（伏尔加）河的匈人与匈奴》，荷兰学者底哥柔提（J. J. M. DeGroot）的《纪元前的匈人》三书，并加以评说。英国巴克尔《匈奴史》，也由向达译为中文，于 1934 年出版。[②] 此书原系《文献通考·四裔考》编译而成，疏漏甚多，亦无考订。

关于汉朝与罗马的交往，主要集中在中国境内罗马战俘城和公元 100 年罗马商团到洛阳两个问题的讨论上。

1940 年，英国牛津大学的德效骞（H. H. Dubs）在《通报》第 36 期发表《公元前 36 年中国人与罗马人的一次军事接触》[③]，随后又加以补充，写成《古代中国境内的一座罗马城》一书。他从考察公元前 53 年罗马与安息的卡雷战役中的 1 万名罗马战俘的下落入手，依据《汉书·陈汤传》的记载，认为这些战俘中的一些人向东逃到都赖水畔的郅支城，并在公元前 36 年被汉将陈汤等俘虏了 145 人。这些罗马战俘后被安置在甘肃永昌地区一个特设的边境城

---

① 《国学季刊》第 2 卷第 3 期，1930 年 9 月，第 437～540 页。

② （英）巴克尔著，向达译：《匈奴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年 4 月。

③ H. H. Dubs, "A Military Contact between Chinese and Romans in 36 B. C.", *T'oung Pao*, 36 (1940), pp. 64～81. 此文的中文摘译，见德效骞著，丘进译：《古代中国的一座罗马城市》（H. H. Dubs, *A Roman City in Ancient China*, London, 1957），《中外关系史译丛》第 4 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年，第 364～373 页。



市，该城根据中国对罗马帝国的称呼命名为“骊靬”。英国著名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①、中国学者沈福伟②，都采信了德效骞的研究成果。

自1989年始，“骊靬是否为罗马战俘城”这一学术问题，为许多报纸所渲染，并被认作是学术新发现。③ 一时间，德效骞在1940年提出的观点成为一些人的学术新观点，永昌为罗马战俘城之说被许多人视为史实。

但是，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莫任南《汉代有罗马人迁来河西吗?》认为，德效骞的考证“虽然详尽，然多穿凿附会”，以所谓操练“鱼鳞阵”法和城外筑木城之法为罗马人所独有而断言匈奴单于军队中有罗马士兵存在的观点，只不过是“猜测之辞”。④

邢义田在《汉代中国与罗马帝国关系的再检讨（1985～1995）》一文中，⑤ 通过文物资料和文献资料（如托勒密《地理学》）的再检讨，认为罗马俘虏在甘肃永昌县建骊靬城和罗马商团在公元100年抵洛阳这两件事例，都是基于浪漫联想多余坚实论据；罗马与汉朝中国仅有间接且间断的联系。

徐苹芳也认为，没有罗马帝国与中国汉朝直接交往的史料证据；

---

①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第二分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75年，第538～539页。

② 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7页。

③ 例如：香港《明报》1989年1月10日；台湾《民生报》1989年9月29日；《参考消息》1989年9月30日；《人民日报》1989年12月15日；《人民日报》（海外版）1993年7月12日；《安徽日报》1993年7月26日；《羊城晚报》1998年11月10日。

④ 《中外关系史论丛》第三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第231～238页。

⑤ 《汉学研究》（台湾）第十五卷第一期，1997年6月。又载《学术集林》第12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第169～202页。

中国境内出土的罗马遗物很少（仅在广州、扬州、洛阳有发现），不能说明罗马与汉朝中国有直接交往；公元100年罗马商团到洛阳一事是“一件捏造的伪史”。[①]

关于汉朝与罗马帝国的交往，《后汉书·和帝纪》、古罗马推罗城地理学家马林（Marinus of Tyre）的《地理学导论》都记载了永和十二年（公元100年）一个罗马“使团”的中国之行。莫任南在其《中国和欧洲的直接交往始于何时》中认为，[②] 上述记载是可信的，中国和欧洲的直接交往始于东汉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是年，蒙奇（马其顿）、兜勒（色雷斯）商人充任使节来华。杨共乐《中西交往史上的一件大事》[③]，也认定罗马商人于公元100～101年间到过中国洛阳。林梅村在《公元100年罗马商团的中国之行》中，[④]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中亚古代语言的研究成果，结合汉文史籍，认为该使团实际上是一支冒充罗马使者的商团，商团由马其顿巨商梅斯委托代理人组成；兜勒应对音为推罗（Tyre），而不是色雷斯；他还探讨了该商团入华时间和详细的旅程。

丘进《中国与罗马——汉代中西关系研究》一书，[⑤] 结合中西文献记述，探讨了汉代中国与罗马的交往，是这个专题研究少见的著述。丘进还翻译了美国F.J.梯加特（F.J.Teggart）的《罗马与中国——历史事件的关系研究》一书。[⑥] 梯加特在是书中，通过大量的中西史料，将与公元前58年到公元107年的中国、罗马相关的历史事件的资料详加罗列。

---

① 徐苹芳：《关于中国境内“丝绸之路”考古的新发现和研究》，周伟洲、王欣主编：《西北大学史学丛刊》第2辑，第1～8页。

② 《中外关系史论丛》第1辑，1985年，第26～33页。

③ 《光明日报》1996年5月14日第5版。

④ 《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4期，第71～84页。

⑤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

⑥ F.J.梯加特著，丘进译：《罗马与中国——历史事件的关系研究》，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94年。

三

在欧亚内陆地区，宗教文化交流不断，内容丰富，源远流长。在宗教史研究方面，陈垣有开创之功。他的《元也里可温教考》①，仅用一周时间写成，这是他的第一篇史学论著，也是中国宗教史研究的奠基之作。该著特点，即专用汉文史料。全书除充分利用《元史》材料外，还利用了地方志、金石录、书画谱等60多种书，考辨了“也里可温”之义、也里可温教士之东来、也里可温与景教之异同等。他的《开封一赐乐业教考》②，从考辨3篇碑刻文字（两篇《重建清真寺记》，《尊崇道经寺记》）入手，研究了犹太教在开封及中国其他地方的流传史事，对犹太教与回教（伊斯兰教）的异同，教中人物的大略，寺之沿革，经书之源流和内容，一一考证，并证明开封犹太族非宋以前所至，最早记述犹太族的汉籍文献是《元史》。这两篇论著，影响极大。

周良霄《元和元以前中国的基督教》③，探讨了“唐宋以来基督教的传布”、“十一至十二世纪中基督教在我国北方和西北少数民族中的传播”、“从成吉思汗到蒙哥时期基督教徒的活动”、“元代基督教的分布”、“政府的管理和待遇”、“宗教矛盾与政治斗争”诸问题。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基督教传入中国最早的文字资料。300多年来，中外学者对该碑的研究，主旨大体有两大方面：其一是根据该碑的外形，从文物的角度，除一般性地考察该

---

① 1917年5月出单行本时，名为《元也里可温考》。1918年，该著又在《东方杂志》第15卷3、4、5号连载。1934年，续有修订，改题目为《元也里可温教考》。

② 《东方杂志》，第17卷5、6、7号，1920年。

③ 元史研究会编：《元史论丛》第1辑，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37～163页。

碑的形制、书法等外，重点辨别该碑的真伪、性质，出土的时间、地点等；二是根据碑文，从语言学、神学，特别是宗教史学的角度，解读该碑的内涵，并结合文献资料，揭示唐代基督教在华流播的历史真面目。

在欧洲，学者们对该碑作了大量研究：刊布拓片，释读碑文，编制各种文字的译注本，考证史实。他们的主要研究成果不下 40 余种。法国来华耶稣会士夏鸣雷（Henri Havret，1848～1901 年）神父所撰的《西安府基督碑》凡三卷，出版于 19、20 世纪之交，该书总结了西人既往之研究，且将唐宋汉籍有关唐代景教的记录，明清儒家有关景教碑的考述，多行收录，集 20 世纪前中西景教碑研究之大成。① 20 世纪以来，西人更着力于碑文注译的精确，包括其中的汉文音译词汇及古叙利亚文字，新的注译本时有出现。1910 年，英国汉学家穆尔（A. C. Moule，1873～1957 年）在《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学报》发表其英文注译本。② 著名的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 年）早就倾注该碑，1911 年便发表了《景教所用之二佛教称谓》③，从语言学角度，考证景教碑的叙利亚文借用了“法师”和“上座”这两个汉语佛教称谓。此后，伯希和写出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在他去世后多年才被陆续整理出版。他有关该碑的研究成果被整理为两卷，分别在 1984 年、1996 年由多维

① H. Haveret, *La Stèle Chrétienne de Si-ngan-fou. Imprimèrie de la Mission Catholique*, Changhai1895, 1897, 1902. (*Varivétés Sinologiques nos.* 7, 12 and 20).

② A. C. Moule, "The Christian Monument at Si An Fu", *The Journal of 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XII, Shanghai, 1910. 在其名著 *Christians in China before the Year* 1550 中，也包含了他对该碑的新注译。

③ P. Pelliot, "Deux Titres Bouddhiques Portés par des Religieux Nestoriens", *T'oung Pao*, vol. XII, 1911, pp. 664～670. 马幼垣中译本，刊香港《景风》第 14 期，1967 年 8 月，第 49～58 页。



利埃（J. Dauvillier）及富安敦（A. Forte）整理增补出版，[①] 代表了20世纪国外学者对此碑研究的最高水平。

国人对该碑的研究，最早可溯至耶稣会的信徒李之藻（1565～1630年）。他得到碑文的拓本后，即于1625年6月10日出版一小册该碑刊本，对碑文做了一些解读和肤浅的注释，是书于1878年与阳玛诺的汉文注释本同时再版。[②]

20世纪初叶，国人对景教碑的研究，跳出以往金石学的窠臼，尽量摆脱宗教或排外的偏见，着眼学术，重新解读碑文。这方面，以潘绅的《景教碑文注释》最有代表性。[③] 80年代以来，至少出版了3个注译本，首先是江文汉《中国古代基督教及开封犹太人》一书中的注译本。[④] 其次是1995年，刘小枫主编的《道与言——华夏文化与基督文化相遇》，收入了徐谦信的注释本，[⑤] 徐本其实早在1979年就在台湾发表了。[⑥] 1996年，北京又出版翁绍军的诠释本。[⑦]

---

① 参见耿昇：《中外学者对大秦景教碑的研究综述》，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编：《中西初识》，郑州：大象出版社，1999年，第155～166。林悟殊：《西安景教碑研究述评》，刘东主编：《中国学术》第四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239～260页。P. Pelliot, *Recherches sur les Chrétiens d'Asie Centrale et d'Extrême-Orient*, *II*, 1 : *La Stèle de Si-ngan-fou*, Oeuves posthumes de Paul Pelliot, Paris 1984. P. Pelliot, *L'inscription Nestorienne de Si-ngan-fou*, edited with supplements by Antonino Forte , Kyoto, Paris 1996.

② 耿昇：《中外学者对大秦景教碑的研究综述》，见《中西初识》，第167～200页。

③ 潘绅：《景教碑文注释》，1919年刻印，1925铅印本。

④ 江文汉：《中国古代基督教及开封犹太人》，上海知识出版社，1982年12月，第38～56页。

⑤ 徐谦信：《唐朝景教碑文注释》，见刘小枫主编：《道与言——华夏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相遇》，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第1版，第1～42页。（原刊《台湾神学论坛》第1期，1979年，第125～166。）

⑥ 《台湾神学论坛》第1期，1979年，第125～166页。

⑦ 翁绍军：《汉语景教文典诠释》，香港：卓越书楼，1995年；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第43～81页。

这三个注译本多为综合部分前贤的成果。

对景教碑文字的解释，岑仲勉写有《景教碑之SARAGH为"洛师"音译》、《景教碑内好几个没有彻底解决的问题》[①] 以及《景教碑书人吕秀岩非吕岩》等文。齐思和《中国和拜占庭帝国的关系》[②]，讨论了拜占庭传入中国的宗教信仰，认为西安景教碑文所云的"大秦"，当指拜占庭，否定了叙利亚的说法。另有龚方震《唐代大秦景教碑古叙利亚文字考释》[③]，周祯祥《浅识景教碑几个叙利亚文字考释之歧异》，就碑中的叙利亚文做出讨论。[④] 此外，荣新江《一个入仕唐朝的波斯景教家族》[⑤]，据1980年西安出土的《大唐故李府君墓志铭》，与古籍史料互证，考出了墓主李素即为"镌刻在《景教碑》侧叙利亚文和汉文对照书写的僧侣名单左侧第三栏"的"僧文贞"。发人未发之覆，颇具功力。

20世纪80年代开始，许多西方的研究著作也被汉译出版。例如，郝镇华翻译了英国穆尔《一五五〇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⑥]，耿昇、郑德弟翻译了法国沙伯里（J. Charbonnier）著的《中国基督教徒史》[⑦]。早

---

① 《景教碑之SARAGH为"洛师"音译》，原载《东方杂志》第42卷第11期，1946年，第24～26页。收入岑氏著：《金石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323～327页。《景教碑内好几个没有彻底解决的问题》，1951年写，收入岑氏著：《金石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302～322页。对岑氏的观点也有提出商榷者，见李承祥：《景教碑之Kumdan与Sarag音译商兑》，《新中华》（复刊）第6卷第23期，1948年，第45、2页。

② 齐思和：《中国和拜占庭帝国的关系》，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

③ 《中华文史论丛》第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25页。

④ 《文博》1996年第6期，第16～26页。

⑤ 荣新江：《一个入仕唐朝的波斯景教家族》，载叶奕良编：《伊朗学在中国论文集》第2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82～90页。

⑥ （英）穆尔著，郝镇华译：《一五五〇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⑦ （法）沙伯里著，耿昇、郑德弟译：《中国基督教徒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期葡萄牙耶稣会士曾德昭著的《大中国志》第31章《许多世纪前基督教已移植中国，近期发现一块可作为证明的古碑石》①，专述西安景教碑，是有关该碑研究的最早资料之一。

在新世纪的研究中，除了从历史学、语言学、宗教学等角度更深入地解读碑文内涵外，更加艰巨的任务是，根据碑文所记述的景教在华流行状况，吸收伯希和等的研究成果，深入发掘新的资料，揭示景教在中国社会的影响。

四

拜占庭帝国（330～1453年）地处欧洲与亚洲的结合部、东西方交流的陆路孔道，对中古欧洲和内陆亚洲产生过深远的历史影响。在国际学术界，从16世纪末开始兴起了一门专门研究拜占庭历史与文化的学科——拜占庭学。②

我国的拜占庭学研究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当时陆续引入了苏联学术界的拜占庭研究成果。其中，以齐思和《苏联历史学家对拜占庭研究的卓越贡献》③ 和一些翻译著述④为代表。据统计，

---

① （葡）曾德昭著，何高济译：《大中国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87～204页。

② 关于国外“拜占庭学”研究史的全面论述，可参见A. A. Vasilie,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Wisconsin, 1970, pp. 3～42; G. Ostrogorsky,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State*, Oxford, 1956, pp. 1～20. 另参见张连芳、马细谱编译：《世界各国对拜占庭学的研究状况》，《世界历史研究动态》，1979年第1期，第22～26页；郑玮：《中国学者对拜占庭史研究综述》，《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1期，第151～157页。

③ 《历史研究》1957年第11期，第98～100页。

④ 乌达里曹娃：《论十五世纪拜占庭帝国灭亡的内在原因》，《史学译丛》，1955年第1期，第93～126页。

至80年代中期，我国各类刊物上发表的关于拜占庭史的文章约30余篇，其中学术论文10余篇，其余为翻译作品和介绍性的通俗读物。[①] 这个时期拜占庭研究的中心问题是拜占庭封建制度的一般性和特殊性，研究的特点表现为偏重理论探讨和关注苏联拜占庭学研究的动态。齐思和的《中国和拜占庭帝国的关系》[②]，是极少数有创见的论文之一。他以张星烺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收录的史料为主要依据，分析前代学者的观点，提出极具说服力的结论，即中国与拜占庭的关系在南北朝隋唐时期是相当密切的，而拜占庭帝国在东西商品交换和文化交流方面起了桥梁作用。阎宗临《拜占庭与中国的关系》，主要根据中文史料研究拜占庭与中国的关系。[③] 夏鼐《咸阳底张湾隋墓出土的东罗马金币》[④]，通过研究中国出土的拜占庭金币来研究中国与拜占庭的关系。关于底张湾出土的拜占庭金币的雕像和铭文的意义，陈志强又进一步提出讨论。[⑤] 1980年，夏鼐向第15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提交了一份英文发言，该文不久以《中世纪中国和拜占庭的关系》为题发表。[⑥] 该文从研究20世纪50至70年代初我国境内发现的拜占庭金币入手，探讨了中古时期拜占庭与中国的关系。该文提出的诸多问题，诸如死者口含金、银币的葬俗之起源，北周时期河西走廊流通拜占庭金币和波斯萨珊朝银币的原因，公元7～9世纪拜占庭与中国交往中断的原因，尚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

① 陈志强：《拜占庭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2～33页。

② 《北京大学学报》，1955年第1期，第119～138页。

③ 收于《阎宗临史学文集》，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322～333页。

④ 《考古学报》1959年第3期，第67～74页。

⑤ 陈志强：《咸阳底张湾隋墓出土的拜占庭金币的两个问题》，《考古》1996年第6期，第78～81页。

⑥ 《世界历史》，1980年第4期，第3～4页。



20世纪80年代中叶以来，学者们拓宽了研究的视野，开始把拜占庭与中国的关系，放在欧亚内陆历史发展和各民族的关系之大背景下进行研究。余太山《嚈哒史研究》[1]，涉及了嚈哒（白匈奴）与拜占庭的关系。他在此书"附录"中，还就拜占庭史料所记阿瓦尔（Abaroi，Avari，Avares）与柔然是否同族，进行了考辨。他反对德经（M. Deguignes，即得几内）、马伽特（J. Markwart）、沙畹（E. Chavannes）、内田吟风等人把阿瓦尔与柔然视作同族的观点，认为同族论者没有令人信服地说明柔然在何时、通过什么途径西迁，认为两者并非同族。他认为，柔然最初是由拓跋鲜卑的"逋逃"（多为拓跋鲜卑的异族奴隶）组成，并不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原始氏族或部落的自然发展；而阿瓦尔即《魏书·西域传》所记之"悦般"，"悦般"应即（j）a-par的音译，古音v，b，p可转，悦般与"阿瓦尔"（Avar，Abar）对音完全相同；悦般则为匈奴之一部。[2]

关于伪阿瓦尔人，岑仲勉认为即《隋书·铁勒传》的"嗢昏"。[3]余太山则以为，由于资料不足，目前还不能指出伪阿瓦尔人确切的族属和具体的迁徙过程；他们当起源于东亚，或为东胡系统的部族。[4]

对于中国与拜占庭的交往，李明伟《隋唐丝绸之路——中世纪的中国西北社会与文明》多有涉及。[5]是书第一章第二部分"中古以来拜占庭、伊朗、印度和阿拉伯商业影响及国际贸易的形势"、第二章第三部分"隋代中国与西方各国的贸易关系"、第八章第一部分"唐朝与东罗马帝国的贸易关系"较集中地探讨了隋唐时期中国通过欧亚草原与东罗马帝国的交往。

姜伯勤在其《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第一章《拜占庭通

---

① 齐鲁书社，1986年。

② 余太山：《嚈哒史研究》，第181～188页。

③ 岑仲勉：《突厥集史》，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676页。

④ 余太山：《嚈哒史研究》，第188页。

⑤ 李明伟：《隋唐丝绸之路》，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

往敦煌吐鲁番之路》中，[①] 依据吐鲁番所出拜占庭“金钱”、阿兰（Alan，即奄蔡）所出汉文文书和敦煌文书等资料，揭示了从拜占庭出发，经过北高加索、里海北岸、中亚，到吐鲁番、敦煌的通道，并指出在公元 4 至 7 世纪，在凉州（武威）以西到吐鲁番地区，曾经存在着一个允许西域通货（包括拜占庭“金钱”、萨珊波斯“银钱”和粟特“银钱”）流行的货币特区。

张绪山在 1991～1998 年留学希腊，专攻拜占庭学和古希腊、罗马与中国的交往诸课题。他的《三世纪以前希腊—罗马世界与中国在欧亚草原之路上的交流》[②]，《罗马帝国沿海路向东方的探索》[③]，《6～7 世纪拜占庭帝国与西突厥汗国的交往》[④]，代表了我国学者在这一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

此外，蓝琪《拜占庭帝国与塞尔柱突厥人在小亚细亚的争夺》[⑤]，探讨了拜占庭与塞尔柱突厥人关系的演进。芮传明《突厥第一汗国时期粟特人对东西交通的贡献》[⑥]，讨论了粟特人在突厥、波斯、拜占庭和中国之间交往中的作用，粟特人对突厥文化发展的影响，以及粟特人向东方的移民活动。

对于犁轩、犁靬、大秦、拂菻（拂林、蒲林）、普岚等名的考证，由来已久。沈福伟在其《中西文化交流史》中作了考证，其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⑦]

---

① 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 年，第 6～28 页。

② 《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 年第 5 期，第 67～71 页。

③ 《史学月刊》2001 年第 1 期，第 87～92 页。

④ 《世界历史》2002 年第 1 期，第 81～89 页。

⑤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91 年第 4 期，第 6～8 页。

⑥ 新疆社科院中亚研究所编：《中亚研究资料》，1984 年第 2 期，第 1～11 页。

⑦ 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年，第 51～52 页，第 87～88 页。关于“拂菻”一名的考证，可参见 P. Pelliot，“Sur l'origine du nom de Fu-lin”，*Journal Asiaique*，vol12，1912，pp. 497～500.

五

元代中国与欧洲的交往，内容丰富，其中以“马可·波罗研究”最为研究热点。该课题研究起步于《马可·波罗游记》的汉译。

据向达考证，[①] 中国第一篇介绍马可·波罗的文章是映堂居士所写的《元代西人入中国述》[②]。中国的“马可·波罗研究”，起步于20世纪初。1909～1913年，魏易据马斯敦（Marsden）《马可·波罗游记》英译本〔据赖麦锡（Ramusio）的意大利文本英译〕，译出中国第一本《马可·波罗游记》中文本——《元代客卿马哥博罗游记》[③]。该书出版时，梁启超题写封面书名。该译本为二册，三卷，二百零五章。译文中的人物、地名均未与《元史》对证考释。对此译本，冯承钧评价说：魏氏译文“可以说是一种翻译匠的事业，而不是一种考据家的成绩”[④]。

1913～1923年，张星烺据英国亨利·玉尔（H. Yule，1820～1889年）、法国考狄（H. Cordier，1849～1925年）合订的英文译注本，译出《〈马哥孛罗游记〉导言》和第一卷，[⑤] 但此本始终没有再

---

① 向达：《马可波罗与马可波罗游记》，载《旅行家》1956年第4期。收于余士雄主编：《马可·波罗介绍与研究》，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第3～14页。

② 原载《中西闻见录》，1874年第21号。又收于余士雄主编：《马可·波罗介绍与研究》，第1～2页。

③ 译文最初连载发表1909年的《京报》上。同年11月，《京报》停刊，魏易的翻译也一度中断。1913年7月，正蒙印书局印刷出版该书全文。

④ 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序言》，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

⑤ 张星烺：《〈马哥孛罗游记〉导言》，载《地学杂志》14卷（1923年）1～6期，第1～176页。张星烺：《〈马哥孛罗游记〉导言》，中华印刷局，1924年，中国地学会发行。张星烺：《马哥孛罗游记》第一册，北美印刷局，1929年，燕京大学图书馆发行。此译本仅译《游记》序言18章，第1卷30章。

续译完成。该《导言》用文言文写成，介绍了马可·波罗个人的历史及其书之暗晦，赖麦锡的考证，《游记》笔录者罗斯梯谦的传记，《游记》历次刊行版本考，马可·波罗对地理学的影响，书中还附有近20副珍贵的照片、地图。《导言》是我国翻译出版的第一部介绍、研究《马可·波罗游记》的专著。

1933年，李季据美国科姆诺夫（M. Komroff）编定的英译本，译出《马可·波罗游记》全书，共4卷，223章。[①] 1936年11月19日《天津益世报·读书75》刊发孟榭《评李季译马可·波罗游记》一文，对李季《译者序言》论述元代社会经济状况的观点提出商榷，对译文不妥之处，列举13条加以驳正。

1936年，冯承钧译出法国沙海昂（A. H. Charigon，1872～1930年）注刊本《马可·波罗行记》[②]，共4卷，229章，分上、中、下三册。冯承钧对沙海昂所注，详加考辨，取其长，弃其短，删削沙海昂的牵合附会之文。此译本成为国内流传最广的本子，在解放前曾三版。解放后，又有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上海书店出版社等再版。这是目前国内最好的中译本。

1936年，张星烺又据意大利拜内戴拖（Benedetto）刊本的英译本，译出《马哥孛罗游记》[③]。此书不分卷次，也不列目次，凡256节，译注多取英人玉尔的考定，间取沙海昂法文本注。从原刊本看，拜内戴拖本比沙海昂本略胜一筹。但此译本没有再版，影响不及冯译本。

1981年，陈开俊、戴树英等又新译《马可·波罗游记》[④]，分4卷，凡223章。关于此译本的得失，余士雄有评价。[⑤] 此译本所据

---

① 1936年4月出版，上海亚东图书馆发行。

②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

③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

④ 《马可·波罗游记》，陈开俊、戴树英等合译，福州：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年。

⑤ 余士雄：《评新译〈马可波罗游记〉》，载《读书》1982年第10期。



刊本与李季本相同，但此本所据为1930年版，而李季本所据是1932年第9版。此本之瑕历然。

目前，国际上《马可·波罗游记》的最佳版本是摩勒（A. C. Moule）、伯希和（P. Pelliot）编定的《马可·波罗寰宇记》①，有143种版本对照表。伯希和遗著《〈马可·波罗游记〉诠释》②，在1973年已由法国国家出版社出齐，凡1190页，卷帙浩繁，史料丰富，考释全面。③

中国学者关于马可·波罗的研究，④ 除了《游记》的翻译、考释外，主要集中在以下5个课题：

（1）对中国史书上马哥·孛罗的考证。魏易、张星烺、李季沿袭法国鲍梯（Pautheir）的观点，认为马可·波罗即忽必烈时代的枢密副使孛罗。⑤ 冯承钧详加考辨，认定马可·波罗不是孛罗。⑥ 此说已为学者接受。

（2）关于马可·波罗在华活动时间的考证。关于马可·波罗在扬州的时间，彭海在《关于马可波罗在扬州的时间》一文中，⑦ 认

---

① A. C. Moule、P. Pelliot，*Marco Polo*：*The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London，1938.

② P. Pelliot，*Note on Marco Polo*. 关于此书，可参考江辛眉：《伯希和〈马可波罗游记诠释〉简介》，载《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2期，第155页。

③ 关于马可·波罗书的抄本和刊本，可参见黄时鉴：《略谈马可波罗书的抄本与刊本》，载《学林漫录》第8集，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16～220页。该文又收于黄时鉴：《东西交流史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21～126页。

④ 可参见张跃铭：《〈马可波罗游记〉在中国的翻译与研究》，载《江淮论坛》1981年第3期。顾卫民：《中国的马可·波罗介绍与研究（1874～1990）》，载陆国俊等主编：《中西文化交流先驱——马可·波罗》，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362～375页。

⑤ 张星烺：《〈马可波罗游记〉导言》之第三章《中国史书上之马哥孛罗》，载《地学杂志》1923年第1～4期，第48～91页。

⑥ 冯承钧：《马可波罗行记·序言》。

⑦ 载《历史研究》1980年第2期，第160～162页。

为其事发生在1282～1284年。至于马可·波罗在扬州的任职，由于史料的缺乏，至今没有定论。关于马可·波罗离华时间，杨志玖在《关于马可·波罗离华的一段汉文记载》中,[①] 根据《永乐大典》卷19418元朝《经世大典·站赤门》的一条资料，断定马可·波罗启程离华（泉州）时间在1291年初。这条材料提到合赞汗迎娶阔阔真公主的三位使者的名字与马可·波罗提到的三位波斯使者的名字完全吻合。杨志玖《关于马可·波罗的研究》，进一步论证其观点。[②] 此观点得到海内外学者的高度重视。[③] 黄时鉴《关于马可·波罗的三个年代问题》[④]，提出伯希和、英国波斯学家波义尔（J. A. Boyle）的研究成果，进一步支持杨志玖的观点，并对马可·波罗离泉州、抵忽里模子、到阿八哈耳的行程作出推断，还考证了马可·波罗离开威尼斯和归国后被俘的年代日期。陈得芝《马可·波罗在中国的旅程及其年代》[⑤]，详细考辨了马可·波罗在中国期间历次旅行的年代及其所历地方，澄清了许多模糊的问题。

（3）关于《游记》中的地名、史实的考证。任荣康的《元初的元—伊联盟与中亚交通——兼考马可·波罗忽炭三地之年代》[⑥]，专题讨论了马可·波罗来华时从波斯起儿曼（今伊朗克尔曼）至中国忽炭（和田）一段行程，分析了马可·波罗如此行程的原因。这是国内少见的研究马可·波罗境外历程的专文。

---

① 《文史杂志》第1卷第12期，1941年。重刊于《南开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第77～8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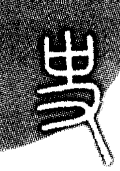
② 《南开大学学报（哲社版）》，1979年第3期，第73～76页。

③ F. W. Cleaves, "A Chinese Source Bearing on Marco Polo's Departure from China and a Persian on His Arrival in Persi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976, Vol. 36, pp. 181～203.

④ 载《中外关系史论丛》第1辑，第59～67页。

⑤ 南京大学历史系编：《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0期，1986年，第1～9页。

⑥ 《中亚学刊》第3辑，1990年，第184～198页。



（4）对《马可·波罗游记》的史料价值之研究。向达《马可·波罗与马可·波罗游记》[①]，邵循正《语言与历史——附论〈马可·波罗游记〉的史料价值》[②]，唐锡仁《马可·波罗和他的游记》[③]，杨志玖《关于马可·波罗的研究》[④]，等文均有论述。

（5）关于马可·波罗是否到过中国的讨论。长期以来，我国学者很少有人怀疑马可·波罗是否到过中国。1982年，英国维多利亚和艾尔伯特博物馆远东部的克雷格·克鲁纳斯在4月14日的《泰晤士报》上发表《马可·波罗到过中国没有?》一文，[⑤] 和英国伦敦不列颠图书馆中国部主任弗朗西斯·伍德在1995年出版《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一书，[⑥] 引发了我国学者对此问题的大讨论。方如金《〈马可·波罗游记〉质疑——马可·波罗没有到过浙闽地区考辨》[⑦]，只依据陈开俊等所译《马可·波罗游记》，认为马可·波罗所记元代杭州、福州情况失实，因而断定马可·波罗没有到过浙江和福建，实际上，陈开俊等所译《马可·波罗游记》（福建版）有版本上的问题，不足凭信。例如，关于杭州城的面积，亨利·玉尔本和沙海昂本均作"方圆百哩"，[⑧] 而科姆诺夫本作"方圆一百七十公里"。王育民《关于〈马可·波罗游记〉的真伪问题》[⑨]，认为《站赤门》这段材料并不能确切表明马可一家与阔阔真公主下嫁伊利汗一事"有任

---

① 《旅行家》1956年第4期，第7～10页。

② 《元史论丛》第一辑，中华书局，1982年，第214～225页。

③ 《世界历史》1979年第3期，第89～92页。

④ 《南开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第73～76页。

⑤ 中译文载余士雄：《马可·波罗介绍与研究》，第58～60页。

⑥ Frances Wood, *Did Maeco Polo Go to China*? London, 1995.

⑦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未定稿》1985年第16期，第10～14页。

⑧ 玉尔本译文，有向达：《元代马哥孛罗所见之杭州》，《东方杂志》第26卷第10号，1929年5月。收于余士雄：《马可·波罗介绍与研究》，第142～156页。沙海昂本译文，见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355页。

⑨ 《史林》1988年第4期，第36～41页。

何直接联系”。杨志玖《马可·波罗与中国》①，专门批驳了克雷格·克鲁纳斯的文章。杨志玖《关于马可·波罗在中国的几个问题》②，《马可·波罗足迹遍中国——与海格尔先生商榷》③，《再论马可·波罗书的真伪问题》④，《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对〈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的回答》⑤，针对怀疑论者的论据，进一步展开反驳。蔡美彪《试论马可·波罗在中国》⑥，韦培春、吴献中《从扬州地方志印证马可·波罗在扬州的踪迹》⑦，黄时鉴《关于茶在北亚和西域的早期传播——兼说马可·波罗未有记茶》⑧，黄时鉴、龚缨晏《马可·波罗与万里长城》等文发表后，⑨ 基本上解决了“马可·波罗是否到过中国”这一问题。

六

清代内陆欧亚与欧洲的关系，主要有厄鲁特史研究、俄国与远东的关系、东干学等课题。前两个课题的研究可分为三个时期：⑩

1949 年前为研究的沉寂期。

这一时期，有关厄鲁特蒙古历史的研究只是在研究清史、西北边疆史、中俄关系史的专题著述中有所涉及。在专著方面，如萧一

---

① 《环球》1982 年第 10 期，第 33～34 页。

② 《中国史研究》1982 年第 2 期，第 160～165 页。

③ 《南开学报》1982 年第 6 期，第 33～39 页。

④ 《中西文化交流先驱——马可·波罗》，第 25～35 页。

⑤ 《历史研究》1997 年第 3 期，第 107～123 页。

⑥ 《中西文化交流先驱——马可·波罗》，第 297～314 页。

⑦ 《中西文化交流先驱——马可·波罗》，第 70～78 页。

⑧ 《中西文化交流先驱——马可·波罗》，第 83～91 页。

⑨ 《中国社会科学》1998 年第 4 期，第 169～184 页。

⑩ 参见马大正：《厄鲁特蒙古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84 年第 8 期，第 6～11 页。



山《清代通史》、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陈复光《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等，均在论述各自研究主体时，列有专章论述了厄鲁特蒙古的历史。此时发表的有关论文，据已见的约有60余篇，除与上述专著有共同的特点外，有相当一些是在边疆调查中，特别是蒙藏民族调查时涉及居住在新疆、青海、甘肃等地的厄鲁特蒙古的历史与现状的论文。

1949年后为研究的复苏期。从研究的广度与深度言，又可以1976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1949～1976年，从总体上言，厄鲁特蒙古史尚未引起史学界的重视。50～60年代初，有关这一课题的论文有10篇。1976年前后有论文10篇。

1977年以后，随着我国学术研究的复苏和发展，在蒙古史、清代史、中亚史、中俄关系史研究逐步深入的基础上，厄鲁特蒙古史的研究也有了明显的进展。

1977年以来发展的有关论文，其内容几乎涉及到厄鲁特蒙古历史的各个方面，与本章论题相关的有：

1. 厄鲁特蒙古的族源、分布与系谱研究。史学界对厄鲁特蒙古的族源历来有突厥说、蒙古说、突厥蒙古融合和兀鲁里塔格说四种。杜荣坤《厄鲁特族源初探》[①] 通过对厄鲁特蒙古历史、语言、社会经济生活、地理分布以及与周围各部族关系等方面的研究，指出四说中蒙古说较为可靠，为进一步研究厄鲁特蒙古族源作了努力。

对厄鲁特蒙古诸部王公系谱的整理，当首推高文德、蔡志纯编著《蒙古世系》[②]。该书第35～48表即为厄鲁特蒙古诸部王公系谱。在系谱研究中，土尔扈特王公系谱更引起研究者的兴趣。冯锡时《我国厄鲁特蒙古土尔扈特部世系考订》[③]，对清代记述和当代研究

---

① 《新疆大学学报》1981年第2期，第56～63页。

②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

③ 《新疆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第80～92页。

中一些不确之处进行了考订和探索。马汝珩、马大正《土尔扈特蒙古系谱考述》[①]，结合满文土尔扈特档和托忒文资料，以及中外史载，特别是俄国的资料，对翁军至渥巴锡之间系谱中的缺遗作了考证，并对有关历史人物的活动，略作补叙，从中阐述了阿玉奇汗时期土尔扈特部与准噶尔部策妄阿拉布坦关系的变化，同时反映出阿玉奇汗死后，土尔扈特贵族争夺汗位的斗争，以及沙俄利用土尔扈特内争混乱，加强其控制的进程。

2. 厄鲁特蒙古土尔扈特部与清政府的关系。马汝衍、王思治《土尔扈特蒙古西迁及其反抗沙俄压迫、重返祖国的斗争》[②]，马曼丽《我国蒙古族土尔扈特部的西迁及其重返祖国的斗争》[③] 和张平一《土尔扈特蒙古万里归国记》[④] 对这一时期土尔扈特的历史作了较为详尽的阐述。18 世纪 70 年代土尔扈特蒙古历尽艰险重返祖国，是当时国内民族关系的一件大事，马汝珩、马大正《跋涉数千里，一心向祖国——渥巴锡与土尔扈特蒙古重返祖国的斗争》[⑤] 和任世江《试析土尔扈特回归祖国的原因》[⑥] 对土尔扈特蒙古东返的原因、性质及意义，分别进行了研究，批驳了封建史家和资产阶级学者在这些问题上的错误观点。而马大正《土尔扈特蒙古东返人户数考析》[⑦]、《土尔扈特蒙古东返始于何时》[⑧]、蔡家艺《土尔扈特东返经

① 《民族研究》1982 年第 1 期，第 28～35 页。

② 《社会科学战线》1978 年第 3 期，第 169～189 页。收于甘肃省民族研究所等编：《中国民族关系史论文选集》，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83 年，第 456～500 页。

③ 《新疆历史论文集》，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77 年，第 305～320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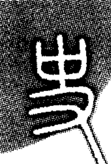
④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1 年。

⑤ 《光明日报》1980 年 11 月 4 日。

⑥ 《社会科学》1983 年第 2 期，第 107～111 页。

⑦ 《历史档案》1983 年第 1 期，第 84～87 页。

⑧ 《新疆社会科学》1985 年第 1 期，第 89～91 页。



由何路进入沙喇伯勒》[①] 和蒋其祥《新发现的土尔扈特北右旗札萨克印》[②]，分别对各自命题作了细致的考释，并取得了令人信服的结论。

3. 厄鲁特蒙古与俄国关系的研究。厄鲁特蒙古由于长期游牧在祖国西北边陲，是我国最早与俄国侵略势力发生交往的少数民族之一。厄鲁特蒙古与俄国关系的研究是早期中俄关系史中一项重要内容。西北大学、兰州大学等编写的《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史》[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沙俄侵华史》第3卷，[④] 均对厄鲁特蒙古与俄国关系作了较为详尽的阐述。[⑤] 这方面论文主要有：马大正、蔡家艺《试论僧格时期准噶尔人民的抗俄斗争》[⑥]，蔡家艺、马大正《十八世纪初准噶尔人民抗俄斗争的重要一页》[⑦]，李绍明《清初平定准部扰藏和抵御沙俄侵略的斗争》[⑧]，郭蕴华《从阿睦尔撒纳叛乱看沙俄对准噶尔部的侵略》[⑨]，以及张广达《沙俄侵藏考略》[⑩]。这些文章对各阶段厄鲁特蒙古与俄关系进行了研究。

4. 厄鲁特蒙古历史人物研究。有关人物的专题研究，几乎涉及到厄鲁特蒙古历史上所有有影响的人物。这方面论文颇多。其中，研究准噶尔部的巴图尔浑台吉的文章有：马曼丽《巴图尔浑台吉与俄国》[⑪]，

---

① 《西北史地》1983年3期，第58～63页。

② 《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1期，第63页。

③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

④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

⑤ 关于这两本书的评介，参见樊明方：《两部关于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史的力作》，载《西北史地》1984年第1期，第100～106页。

⑥ 《新疆大学学报》1979年第1～2合期，第38～43页。

⑦ 《中俄关系史论文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29～337页。

⑧ 《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79年第1期，第24～29页。

⑨ 《西北史地》1981年第1期，第46～53页。

⑩ 《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8年第1期，第21～50页。

⑪ 《民族研究》1980年第4期，第26～31页。

马曼丽《评噶尔丹与俄国的关系》[1]，马大正《噶尔丹与沙俄》[2]。上述这些论文依据大量中外文资料，对所论人物的历史功过作了评述。

有关土尔扈特的综合研究，当推张体先《土尔扈特部落史》[3]。他在是书中，详尽论述了土尔扈特"部落的来源"、"元明时代的土尔扈特部"、"西迁伏尔加"、"东归祖国"等论题，最后还附系谱表。

1861～1877年，陕甘地区回民举行反清起义。起义失败后，许多回民在1878～1884年间分几批移居中亚避难。这些人在中亚发展成为"东干族"（Dungan），总人口已过10万。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苏联形成研究东干人历史、文化、习俗的专门学问——东干学。重要的著述有吉尔吉斯斯坦学者M.Я.苏三洛（1923～1998年）《中亚东干人的历史与文化》[4]。我国的东干学研究起步很晚，在90年代才形成学科研究。中央民族大学成立了东干学研究所。陕西师范大学王国杰对我国东干学研究贡献很大，曾于1991、1993年两次访问中亚的陕甘回民村，发表了20余篇（部）论著，其中重要的有：《中亚东干族与中国传统礼俗》[5]，《1877～1917年中亚陕甘回族移民的经济活动》[6]，《中亚东干族与苏联卫国战争》[7]，《1877年移民中亚陕甘回族的地理分布》[8]，《东干族形成发展史——中亚陕甘回族移民研究》[9]，《论东干学与中国回族学》[10]。另外，丁宏对中亚东干族聚居地进行了田野调查，结合大量的中外文献资料，写成博

① 《内蒙古社会科学》1980年第4期，第75～80页。
② 《西北史地》1981年第2期，第28～38页。
③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
④ 郝苏民、高永久译，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年。
⑤ 《回族研究》1994年第4期，第74～84页。
⑥ 《陕西师大学报》1996年第4期，第146～150页。
⑦ 《东欧中亚研究》1997年第4期，第93～97页。
⑧ 《宁夏社会科学》1997年第4期，第76～80页。
⑨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
⑩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第44～48页。

士论文《东干文化研究》①。他对东干族的历史、语言、文化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探讨了在不同生态环境及多民族交往过程中，东干人的文化变迁等问题。

综观我国20世纪“欧洲与内陆亚洲”课题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发现，学者们主要依赖汉文史料和中国境内的考古材料进行研究，对境外资料很少利用。而且，他们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一些热点问题上。在许多领域，如可萨突厥人研究，琥珀之路、皮毛之路研究，东北亚地区的民族迁徙和交往，欧亚草原对古代欧亚大陆历史发展的影响，我们目前所拥有的研究成果，不能与西方学者的成果同日而语，甚至我们还没有全面地吸收他们的研究成果。我们需要更多一些学者和专家，来填补研究的空白。

非汉语的资料在西域史的许多领域里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我国学者虽然大多通晓一两门现代外语，但却没有像陈寅恪那样的能运用多种胡语材料的史学家。与欧美、日本相比，目前我国欧亚内陆史研究队伍中，较好地掌握和运用西域胡语资料和希腊文、拉丁文材料者并不多见。这些都有待我国学者努力。

---

①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

第八章　南亚与内陆欧亚关系研究

按传统的地理区域划分，南亚包括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国、尼泊尔、锡金、不丹和克什米尔地区以及印度洋中的岛国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今天的南亚次大陆除北部的尼泊尔、锡金、不丹外，古代统称印度，换言之，古代印度的地理范围几乎包括整个南亚次大陆（亦称印度次大陆或印巴次大陆）。

南亚是喜马拉雅山脉以南亚欧大陆的南延部分，东临孟加拉湾，西有阿拉伯海，南濒印度洋，面积比洲小，自成一个相对独立的自然地理单元，故称“次大陆”。南亚次大陆分为如下地理区域：位于喜马拉雅山脉和温德亚山脉之间的印度河、恒河流域平原，习惯上被称为北印度；温德亚山脉以南地区为南印度；地处温德亚山脉与克里希纳河之间的是德干高原。古代南亚次大陆与内陆欧亚交往的主要通道是西北部连接阿富汗的几个山口，较重要的有苏来曼山脉上的开伯尔山口和古马尔山口，基尔塔山脉上的波兰山口，以及沟通印度河与阿姆河流域的兴都库什山脉上的一些山口。历史上南亚与内陆欧亚之间所发生的移民、贸易、军事入侵等活动均经由这些山口。古代南北印度之间交通颇为不便，德干高原与次大陆南端以及北部的联系也并不容易。南亚次大陆三面环海，因此海外交通条件较好。

从地理环境角度来看，南亚与内陆欧亚之间存在着天然的联系；再从历史上看，不同时期的交往有不同的特点。本文所涉及的古代南亚与内陆欧亚关系史研究实际上主要指古代印度、尼泊尔等地与内陆欧亚之间的关系。由于所涉及的研究对象不仅成分颇为复杂，



研究内容涵盖历史、地理、考古、民族、语言、宗教等诸多方面，而且相关史料记载却比较稀少，因此有关古代南亚与内陆欧亚关系史研究确实可以称为“历史难题”，具有突破性进展的研究成果不容易出现也有其必然性。目前中国学术界尚无专门致力于古代南亚与内陆欧亚关系史研究者，与此相关的研究成果主要从三方面进行筛选，一是世界古代史尤其是印度古代史研究领域，二是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领域，三是佛教史研究领域。遗憾的是，三个研究领域不仅视角不同，而且方法和关注的重点内容也相去甚远，少有交叉研究和互相借鉴。当然，如上所述，研究古代南亚与内陆欧亚关系史需要多学科的知识储备，对研究者的语言（包括外语和一些死语言）和历史功底要求较高，又兼史料的匮乏，因此，能自如地在汲取中外学术界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殊非易事。

古代南亚与内陆欧亚关系史研究由于各历史时期的交往侧重点不同，史料多寡各异，相关研究成果的数量不一而同。故分政治史、文化交流（以佛教传播及其影响为主）、史料的整理和研究、地理（以古地、丝绸之路研究为主）、重要历史人物、商贸往来等若干专题进行叙述。

一、政 治 史

古代南亚次大陆在大多数时间里处于四分五裂状态，只在印度孔雀帝国、笈多帝国、德里苏丹国和莫卧儿帝国时期出现过局部统一局面。孔雀帝国和莫卧儿帝国极盛时期，领土不仅包括南亚次大陆的绝大部分，而且西北部疆界甚至超出了次大陆的界限，深入到今天的阿富汗地区。

历史上南亚与内陆欧亚在政治、军事等方面关系较为密切的时期最早可溯至吠陀时期，其后又经历希腊人、塞人、安息人、大月氏人、哌哒人以及突厥人的入侵。这些外族入侵时期往往正是南亚

次大陆在政治上处于四分五裂之时。正如有关专家指出的："直到近代以来，南亚地区始终缺乏记载详细的历史。至于古代，则连内容简括的史料也难以找到。以印度为例，凭借考古、碑铭、游记、传说以及文学、哲学、宗教重建历史，不过是近两个世纪的事。因此，年代不明或者估算不一，事实模糊或者互相矛盾，成了这里的历史现象。"① 限于史料的匮乏以及语言文字的复杂，中国学界对南亚与内陆欧亚政治关系史方面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涉及上述历史内容的有关论著，主要也是从两个角度入手进行研究，一是世界古代史尤其是印度古代史角度，二是中国民族史角度。为叙述方便，可归纳为以下几类：

（一）通史类论著

见于各种通史类著作中的政治史方面的研究因所撰写时间先后不同，叙述的侧重点也各不相同，并随着新的研究成果的出现，不断对原有的结论予以修订。

1. 世界通史、亚洲通史类论著。

可资参考的论著颇多，目前可见到的各种版本的世界通史古代、中古部分均有涉及。其中新近出版的较重要的有：朱寰主编《世界上古中古史》（上下册）②、崔连仲主编《世界通史》（古代卷、中世纪卷）③、齐涛主编《世界通史教程·古代卷》④。

有关亚洲通史方面的著作中，程度不同地涉及到与古代南亚和内陆欧亚相关的内容。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有周一良著《亚洲各国古代史》⑤，朱杰勤编著《亚洲各国史》⑥ 等。另外，有关南亚近邻

---

① 黄心川：《南亚大辞典·前言》，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年。
②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 年。
③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年。
④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 年。
⑤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 年。
⑥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58 年。



诸国的历史著作中，也有少量篇幅与本文相关。如彭树智主编《阿富汗史》[①] 一书中的第二章《东西文明在阿富汗的交融》，涉及希腊人的巴克特里亚国家以及塞种部落和贵霜王朝等在阿富汗的统治，东西方文明相互交融的诸种表象、特点和性质等。李铁匠《伊朗古代历史文化》[②]，是我国第一部有关伊朗古代史的著作，其中也有一些内容与本文议题相关。此外，还有通史方面的译著，如伊朗阿宝斯·艾克巴尔·奥希悌扬尼著，叶奕良译《伊朗通史》[③] 等均有可资参考的内容。

应该指出的是，通史类著作中的观点为阶段性研究成果之总结，在参考国内外阶段性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采用通说，并以政治史为主，兼涉经济、文化交流史。

此外，还有一些从世界史角度进行研究的相关论文，较重要的有：雷海宗《上古中晚期亚欧大草原的游牧世界与土著世界（公元前 1000～公元 570）》[④]，着重论述上古时代中期以后游牧世界及游牧土著之间的关系。陈唯声《古代印欧语系各族的起源、迁徙及其对世界历史发展的影响》[⑤]，对自公元前三千年代末开始迁居西亚、南亚、欧洲各地并相继建立赫梯、波斯、印度、希腊、罗马等国家的操印欧语系的各族人的起源、迁徙、建国及其对世界历史发展的影响进行了探讨。刘欣如《古代印度的共和国》[⑥] 对存在于古代印度的共和政体进行了探讨。邓兵《印度国名考略》[⑦] 对古今中外“印度”国名的演变进行了考证。李利安《依据汉文资料对阿育王即位

---

① 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1993 年。

②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 年。

③ 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 年。

④ 《南开大学学报》1956 年第 1 期，第 88～104 页。

⑤ 《北方论丛》1988 年第 5 期，第 61～70 页。

⑥ 《世界历史》1996 年第 3 期，第 42～50 页。

⑦ 《南亚研究》1999 年第 2 期，第 91～93 页。

前几件重大史实的考证》[①]，依据汉文史料，对阿育王的身世、青少年时代的经历、对外征伐、夺取政权等史实进行了考证。

2. 南亚国别史（以印度史为主）类论著。

如本文开篇所述，古代印度的地理范围几乎包括整个南亚次大陆，因此，学界着力最多的仍是印度。自二十世纪初期以来，就有印度通史方面的著作出现。如王本祥《印度史》[②]、刘炳荣《印度史纲》[③]、李志纯《印度史纲要》[④] 等。建国后至“文化大革命”前，有季羡林《印度简史》[⑤]、周祥光《印度通史》[⑥] 等。

“文化大革命”后，随着国内外新的科研成果的出现，重新编写印度古代史成为必要。有关论著在数量和质量上均胜过以前。主要有：

陈翰笙编著的《印度莫卧儿王朝》[⑦]，对莫卧儿王朝的建立及兴衰过程作了比较具体的叙述，并对该王朝的政治、经济制度作了简要的介绍。崔连仲著《古代印度》[⑧] 对古代印度哈拉巴文化和印度奴隶社会的产生、发展和衰亡，作了较详细的介绍。此两部书系“断代”性质的史书。

涂厚善著《古代印度河流域的文化》[⑨]，对古代印度河流域的文化的产生、发展及其他各方面的成就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

刘国楠、王树英编著的《印度各邦历史文化》[⑩] 简要介绍了印

---

① 《南亚研究》1999 年第 2 期，第 61～71 页。

② 上海启文社，1903 年。

③ 上海太平洋书店，1926 年。

④ 正中书局，1947 年。

⑤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 年。

⑥ 九龙自由出版社，1957 年。

⑦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年。

⑧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年。

⑨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年。

⑩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年。



度17个邦和克什米尔地区的历史、文化概况。

刘欣如著《印度古代社会史》①，从社会史的角度全面系统地考察了古代印度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结构、政治事件、经济形态及宗教文化等方面的状况，并通过对各历史时期突出的社会现象的论述，着重分析阐述其产生、发展的原因及其深远影响。同时，作者将历史学、考古学和人类学的资料与方法有机结合，加以运用，不仅总结了国外学者的最新成果，而且展示出作者本人多年来研究的新观点与新成就，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培伦主编《印度通史》②，系由吉林大学历史系印度史教研室培伦、董本建等5位学者编著，全书分四编40章，按时代顺序记述了印度4500年的历史。本书既是一部教材，又是国内编写的第一部印度通史。在叙述方法上，先介绍经济发展和政治变迁，然后叙述科学文化、宗教及印度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既照顾到历史发展线索的连续性，又兼及某些重要历史问题。全书脉络清楚、重点突出。

从印度史角度进行研究，还有一些论文涉及南亚与内陆欧亚关系史，其中比较重要的有：

刘欣如《商人阶级在印度恒河流域早期国家的历史作用》③ 从商人阶级这一角度探索，指出经济因素、政治因素和宗教因素相互作用，从而影响了城市化的进程。

方广锠《试论印度河文明衰落的原因》④ 从分析考古发掘所见印章入手，探讨了印度河文明的内部矛盾，即各城邦奴隶主之间的矛盾，以及各城邦内部奴隶与奴隶主之间的矛盾，指出正是上述两种矛盾导致该文明的衰落，从而否定了“外族入侵”和“天灾”引起印度河文明衰落的两种说法。

---

①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② 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1990年。

③ 《南亚研究》1984年第4期，第23～30页。

④ 《南亚研究》1986年第3期，第21～27页。

张荫桐《莫卧儿帝国的曼沙布达尔制度》（上、下）[①] 对阿克巴创立的曼沙布达尔制度的基本史料、由来、内容、性质进行探讨，有助于我们了解该历史时期南亚、中亚与内陆欧亚政治军事等方面的一些情况。

张玉兰《德里苏丹时期印度穆斯林文化的发展》[②] 从语言、音乐、建筑、舞蹈、文学、艺术等方面进行分析，指出穆斯林没有被印度社会和文化同化，穆斯林文化与印度文化兼收并蓄、相得益彰。

3. 中外关系史类论著。

在中外关系史的通史类著作中，都有关于南亚经由内陆欧亚与中国发生联系的内容。早年主要有向达编《中西交通史》[③] 和《中外交通小史》[④]，方豪著《中西文化交通史》[⑤]。建国后的专著主要有：周一良《中国与亚洲各国和平友好关系史》[⑥]，刘伯骥《中西文化交通史》[⑦]，方豪《中西交通史》（上下册）[⑧]，陈佳荣《中外交通史》[⑨]，张维华主编《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⑩]，李云泉《中西文化关系史》[⑪] 等。有关中外关系史方面的论文集和译文集有：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自 1985 年以来编辑的《中外关系史论丛》（1－5 辑）[⑫]

---

① 《南亚研究》1986 年第 2 期，第 15～22 页；《南亚研究》1986 年第 3 期，第 12～20 页。

② 《南亚研究》1989 年第 1 期，第 54～65 页。

③ 上海：中华书局，1934 年。

④ 上海：商务印书馆，1920 年。

⑤ 独立出版社，1943 年。

⑥ 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 年。

⑦ 正中书局，1953 年。

⑧ 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77 年；长沙：岳麓书社，1987 年。

⑨ 香港学津出版社，1987 年。

⑩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 年。

⑪ 济南：泰山出版社，1997 年。

⑫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书目文献出版社等，1985～1996 年。



和《中外关系史译丛》(1—5辑)[①]；朱杰勤《中外关系史论文集》[②]和《中外关系史译丛》[③] 等。朱杰勤还主编了《中外关系史辞典》[④]，其中均有与本文议题相关的内容可供参考。

此外，还有一些论文，概括叙述中国与南亚各国的友好关系，内容主要包括使臣互访、僧侣往来、科技文化交流、商贸活动等。如黄道立《中古时期中印人民的友好交往》[⑤]、耿引曾《中国与南亚的友好关系源远流长》[⑥]、李开物《中国同南亚各国的传统友好关系》[⑦] 等。

4. 西域史、中亚史、中国民族史类论著。

西域史类著作20世纪50年代以前有张西曼《西域史族新考》[⑧]。90年代以后，有余太山主编的《西域通史》[⑨] 和《西域文化史》[⑩]，都是以历史上新疆地区为主要描述对象的地域史论著。

中亚史类著作主要有：王治来《中亚史》(第一卷)[⑪]，王治来、丁笃本《中亚国际关系史》[⑫]，马大正《中亚五国史纲》(第一编)[⑬]，其中均有相当篇幅涉及古代中亚和南亚地区民族关系史。

中国民族史类可供参考的著作主要有：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

---

①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1989年。

②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

③ 北京：海洋出版社，1984年。

④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

⑤ 《青海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4期，第76～86页。

⑥ 《南亚研究》1982年第2辑，第15～20页。

⑦ 北京大学历史系亚非拉史教研室、东语系亚非历史组编著：《中国与亚非国家关系史论丛》，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24～147页。

⑧ 南京中国边疆学术研究会，1947年。

⑨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

⑩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社，1995年。

⑪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

⑫ 长沙：湖南出版社，1997年。

⑬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

究所编著的《新疆简史》（第一册）①，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②，《中国北方民族关系史》编写组编《中国北方民族关系史》③，杨建新《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④，杨建新、马曼丽《西北民族关系史》⑤，江应梁主编《中国民族史》⑥ 等。

（二）关于古族研究的学术论著

如前文所述，由于所涉及的民族成分颇为复杂，可靠的史料记载稀缺，要求研究者掌握的语言（尤其是吐火罗语、佉卢语等诸多死语言）难度较大，因此在有关内陆欧亚古族研究方面，中国学术界的学术专著屈指可数。

1. 对哌哒史的研究。

哌哒人曾在公元 5 世纪 20 年代左右至 6 世纪上半叶统治过康居、大月氏国、印度西北部和塔里木盆地部分地区，是曾经对中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有过重要影响的民族。由于有关哌哒的史料极其稀少，因此致力于哌哒史研究者寥寥无几。研究哌哒史最重要的成果是余太山的《哌哒史研究》⑦。是书对哌哒人的族名、族源、族属，西徙索格底亚那的过程，对吐火罗斯坦、萨珊波斯和笈多印度的侵占，覆亡的原因及其社会经济、统治方式、对外交往、宗教信仰状况等进行了考证。

此外，论文有苏北海《哌哒国在中亚的统治》⑧。史料有宋岘

①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 年。
②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年。
③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年。
④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 年。
⑤ 北京：民族出版社，1990 年。
⑥ 北京：民族出版社，1990 年。
⑦ 济南：齐鲁书社，1986 年。
⑧ 《西北史地》1985 年第 3 期，第 1～9 页。



译、余太山笺证《〈太伯里史〉所载哌哒史料笺证》①。

2. 对塞种的研究。

塞种是上古亚洲史上最活跃的游牧部落联盟之一，自19世纪以来，塞种史一直是中亚学、印度学和伊朗学的重要课题。

有关塞种研究的专著有余太山《塞种史研究》② 是书对塞种的族源、族属、语言、迁徙过程等一系列学术界长期争论未决的问题提出了与众不同的见解，其说自成体系。

论文中比较重要的有：王明哲《伊犁河流域塞人文化初探》③，本文首先根据文献对战国两汉时期北疆游牧民族活动的基本状况作了简略分析，然后在此基础上根据考古资料对有关考古文化，特别是古塞人文化作一些探讨。王炳华《古代新疆塞人历史钩沉》④ 对有关古代新疆塞人的历史资料加以搜集并予以分析，结合考古资料，揭示塞人的历史。马国荣《新疆古代塞人的社会生活》⑤ 结合新疆各地发现的岩画和出土文物，对新疆古代塞人的社会生活诸方面做了简要探讨。尤得文《塞人游牧文明与南亚中东农耕文明的交融》⑥ 对塞种的社会经济生活等方面的发展、变化进行探讨。韩康信《塞、乌孙、匈奴和突厥之种类人类学特征》⑦，则从体质人类学角度对塞种进行研究。此外，彭树智《一个游牧民族的兴亡——古代塞人在中亚和南亚的历史交往》⑧ 也值得一读。

---

① 《中亚学刊》第二辑，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51～64页。

②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③ 《新疆社会科学》1985年第1期，第59～64页。

④ 《新疆社会科学》1985年第1期，第48～58转64页。

⑤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第47～51页。

⑥ 《西北大学史学丛刊》第3辑（中东南亚研究），王铁铮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00年，第280～286页。

⑦ 《西域研究》1992年第2期，第3～23页，见韩康信著：《丝绸之路古代居民种族人类学研究》附录一，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

⑧ 《西北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第44～52页。

3. 对贵霜帝国的研究。

贵霜帝国是由我国甘肃境内的古老民族月氏西迁中亚后建立的。在公元1～3世纪，大月氏贵霜帝国国势臻于极盛，统治包括今中亚五国以及阿富汗、巴基斯坦、北印度在内的广大地区，成为一个地跨中亚、南亚的大帝国，与汉、安息、罗马构成古代世界“四大帝国”的格局，控制着陆上丝绸之路，对中亚、南亚及其周邻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史产生深远的影响。

目前国内尚无专著出现，主要的论文有余太山《贵霜的族名、族源和族属》①、《第一贵霜考》②、黄靖《贵霜帝国的年代体系》③以及阎宗临《贵霜王朝的形成》④、罗碧云《“迦腻色迦纪元”和贵霜王系考——兼述贵霜帝国兴衰史》⑤、水长天《略论大月氏贵霜帝国的建立及其族系关系》⑥、王炳华《贵霜王朝与古代新疆》⑦、孟凡人《贵霜统治鄯善之说纯属虚构》⑧ 等。

此外，韩康信从体质人类学角度对古代民族进行研究，著有《丝绸之路古代居民种族人类学研究》⑨ 一书，以及《新疆古代居民种族人类学的初步研究》⑩ 等一系列论文，运用考古和体质人类学知识阐明新疆古代居民种系和人类学特征，对于研究古代新疆、中亚历史民族文化乃至古希腊、伊朗、印度和中国的经济文化交流等方面均有帮助。

---

① 《文史》1994年第38辑，第19～28页。
② 《中亚学刊》第四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73～96页。
③ 《中亚学刊》第二辑，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6～50页。
④ 《山西师范学院学报》1960年第1期，第79～86页。
⑤ 《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1982年第3期，第59～72页。
⑥ 《西北师院学报》1985年第4期，第32～36页。
⑦ 《西域研究》1991年第1期，第35～38页。
⑧ 《西域研究》1991年第2期，第29～39页。
⑨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
⑩ 《新疆社会科学》1956年第6期，第61～71页。

二、思想文化交流

南亚与内陆欧亚由于天然的密切的地缘关系，在历代政治军事纠葛不休的同时，思想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也绵延不绝。

（一）佛教的传播及其影响

在南亚与内陆欧亚文化交流史中，佛教的传播及其影响是一个“重头戏”。在研究南亚与内陆欧亚由佛教引发的关系中，中国学界主要关注如下几方面内容：早期佛教东渐问题、西域佛教的兴衰、西域等地的佛教艺术以及印度佛教史和佛教艺术。

1. 关于早期佛教东渐问题。

对这一问题，中国许多著名学者都进行过探讨。重点是佛教传入汉地的时间、所经由的途径与地区等。目前，有关佛教传入中国汉地所经由的路径的观点有西域陆路传入说、海路传入说和川滇缅印道传入说三种。与本文相关的是西域陆路传播说，即印度佛教最早经中亚陆路向中国传播，在当时中亚诸国人口稀少，不足以支持佛教寺院存在的情况下，遂假途而过，继续向东传入人口相对密集的汉地，并扎下根来。这是迄今为止大多数学者认同的观点。

在有关中国佛教史的诸多论著中，都谈到了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早年较重要的有：梁启超在其名著《佛学研究十八篇》中，有《佛教之初输入》、《佛教与西域》、《又佛教与西域》三篇文章对佛教在西域诸国的传播、发展状况进行考证，梁启超在文章中否定了西域陆路传播说，提出佛教从海路传入中国内地之说。①

① 参见《佛学研究十八篇》，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第19～30、79～88、89～102页。

黄文弼《佛教传入鄯善与西方文化输入问题》[①] 对佛教传入疏勒、于阗等广大西域地区的年代问题进行了考证，认为佛教传入西域较内地晚。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对佛教入华诸传说、永平求法的传说、《四十二章经》进行考证，认为佛教东渐，首先经由西域之大月氏、康居、安息诸国，其交通多由陆路。[②]

季羡林最初在其著名论文《浮屠与佛》[③] 中提出佛教没有经过西域小国的媒介，而直接从印度传入中国的见解，但并未明确指出传入路径为陆路还是海道。后来在《再谈浮屠与佛》[④] 一文中对自己以前所持观点进行修订，认为印度佛教分两阶段，经由大夏（大月氏）和中亚新疆小国传入中国。

随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内学界对西域开展历史、语言、民族、宗教、艺术、考古等多学科综合研究以来，早期佛教东渐问题的研究又取得新的进展。

吴焯《佛教东传与中国佛教艺术》[⑤] 一书从文化传播学角度论述佛教的传入，其论文《从考古遗存看佛教传入西域的时间》[⑥] 则从考古学角度进行论证，认为佛教传入西域较内地晚，佛教最初在西域只是“过路”，并未停留，至少在公元2世纪上半叶后，佛教才逐渐扎根。持相同观点的还有宋肃瀛，他在《试论佛教在新疆的始传》[⑦] 从文献角度进行论证。陈戈《汉唐时期新疆佛教流行情况

---

① 原载于《罗布淖尔考古记》，后收入《西北史地论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40～260页。

② 参见该书上册“汉代之佛教”，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重印，第1～83页。

③ 《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323～336页。

④ 《季羡林文集》第七卷，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345～360页。

⑤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

⑥ 《敦煌学辑刊》第八辑，1985年，第62～72页。

⑦ 阎文儒、陈玉龙编：《向达先生纪念文集》，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96～424页。



述略》①，探讨了佛教传入新疆的时间问题、佛教在新疆的流行情况、新疆各地流行不同教派及其原因等方面的内容。陈恩志《佛教自有秦传入中国说》② 提出了与众不同的说法，主张印度佛教文化的东渐，至迟到了秦代就已经发生，对佛教传入中国之标准、印度佛教东渐的时代背景、佛教在塔里木盆地的兴起，佛教自新疆传入中国内地的时间、途径诸问题阐明了自己的看法。朱锡强《印度佛教的传播对古代亚洲国际交往的影响》③ 探讨了印度佛教的传播对古代亚洲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所产生的影响。陈世良《关于佛教初传龟兹》④ 认为佛教初传龟兹应在汉武帝在位期间。

刘欣如《贵霜时期东渐佛教的特色》⑤ 谈及佛教向中国的早期移植。一方面简述早期佛教的传播方式和变异形态，同时着重分析促使佛的故国的传法人克服千难万险东来传法的动力，试图从一个侧面了解和分析在佛教东传这个宏伟历史进程中的一些奇特现象。

晁华山《从古代遗存看贵霜王朝佛教放射状外传的四重环带——兼论中国早期佛教遗存》⑥ 一文结合古代遗存特点，论证了贵霜王朝时期佛教呈放射状向周围传播的“四重环带说”，即以犍陀罗和迦湿弥罗为中心，按照传播地区的远近形成了同心圆式的四重佛教文化环带，处于不同佛教文化环带的地区的佛教文化呈现一定的差异。本文对中国早期佛教遗存亦有论及。李海波《试论阿育王在佛教史上的地位》⑦ 对阿育王在佛教传播与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

---

① 《新疆社会科学》1984年第2期，第103～112页。

② 《宁夏社会科学》1988年第5期，第71～79页。

③ 《南亚研究》1990年第1期，第68～74页。

④ 《西域研究》1991年第4期，第80～81页。

⑤ 《南亚研究》1993年第3期，第40～48页。

⑥ 四川联合大学西藏考古与历史文化研究中心、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编：《西藏考古》第1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65～177页。

⑦ 《西北大学史学丛刊》第三辑（中东南亚研究），王铁铮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00年，第378～400页。

作用进行探讨。

2. 西域佛教的兴衰。

西域佛教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颇为重要，地处东西方交通枢纽的西域不仅在早期佛教传播过程中起过特殊的作用，而且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断汲取各种民族文化影响，形成极富特色的西域佛教艺术，从石窟的开凿、寺庙的建立，到音乐舞蹈、绘画雕塑等等，在许多方面都对中国汉地佛教、藏传佛教产生巨大影响。

对于西域佛教的研究，如贺昌群在《西域之佛教·译者序》中所说："西域诸国和古代印度一样，都没有什么历史记载遗留下来，只有中国和古代希腊的文献中有些记录，中国正史的外国传和汉、晋、南北朝、唐、宋的西行求法僧徒的游记，这些正史记载和僧徒记行与近百年来在印度、中亚和新疆一带新发现的资料和遗物互相参证，古代西域史以及西域的佛教活动，才得渐次明了。"①

20世纪早年中国学术界有关西域佛教史的研究成果较少，远不及日本学界。中国学界研究专著有蒋维乔《佛学史纲》②、《中国佛教史》③ 和黄忏华《中国佛教史》④，但均以日本人的著作为蓝本。

20世纪下半叶，尤其是8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佛教史研究取得较大进展，作为中国佛教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西域佛教史的研究也受到应有的重视。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⑤ 和《隋唐佛教史稿》⑥、任继愈的《中国佛教史》⑦、吕澂的《中国佛学源流

---

① （日）羽溪了谛著，贺昌群译《西域之佛教》，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5月初版，1999年再版。

② 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

③ 长沙：商务印书馆，1940年。

④ 长沙：商务印书馆，1940年。

⑤ 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⑥ 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收入《汤用彤全集》（第二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

⑦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1988年。



略讲》①、郭朋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② 和《隋唐佛教》③ 等中，均有相当篇幅论及西域佛教兴衰史以及西域等地的佛教艺术，对西域佛教不同于汉地佛教的特点，受域外诸种文化因素影响，以及以独特状貌流传下来的西域佛教艺术均发表各自的见解。

西域佛教史研究专著有：杨富学《回鹘之佛教》④，探讨了佛教在回鹘中的传播及其特点、回鹘佛典的翻译、回鹘佛教的功德思想、寺庙的兴建、佛教寺院经济、佛教对回鹘文化的影响等内容。魏长洪《西域佛教史》⑤ 着重阐述了佛教在西域的传播与发展，侧重考察西域佛教自身的内在变动，也就是西域佛教在不同的时代和民族中的特点及其消灭状况、形成的多中心、多层次的布局和结构。

有关西域佛教史方面的论文，研究角度各异，有侧重于佛教传播路线，也有关注佛教自身发展情况的。如宫静《五至七世纪中叶西域佛教之变迁》⑥ 对 5 至 7 世纪中叶西域佛教变迁状况及原因进行了概括分析。羊毅勇《佛教在新疆南部传播路线之管见》⑦ 就当时发现的文物考古资料，结合文献，特别是唐代前后来往于中国与印度的佛教徒行记，对唐以前和唐宋时期佛教自印度传入新疆的路线问题进行阐述。

3. 西域、中亚等地的佛教艺术遗存。

佛教艺术随着佛教的传播传入内陆欧亚，所到之处的绘画、雕刻、建筑、文学艺术等方面都明显受到佛教的影响，并在汲取外来文化的基础上融合本土特点，经过长时间的演变，逐渐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

---

① 北京：中华书局，1979 年。
② 济南：齐鲁书社，1986 年。
③ 济南：齐鲁书社，1979 年。
④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 年。
⑤ 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8 年。
⑥ 《南亚研究》1990 年第 4 期，第 10～19 页。
⑦ 《西北史地》1992 年第 3 期，第 57～63 页。

中国学术界对西域、中亚等地的佛教艺术研究关注的重点有以下内容：佛教寺庙、石窟建筑、佛像、雕刻、壁画等佛教艺术遗存及其与各种文化的关系，主要涉及与印度、犍陀罗、希腊、伊朗乃至中国中原地区等诸文化因素的关系。早年成果很少，自80年代起取得较大进展。研究佛教艺术的专著主要有：

常任侠《丝绸之路与西域文化艺术》[①] 共分四编，一编总论丝路的开拓、西域的交通、经济文化交流概貌，二、三、四编分别专论音乐、舞蹈、杂技艺术的东渐，并穷本溯源，一一勾勒了各类艺术的渊源、演变、发展和影响。

韩翔、朱英荣《龟兹石窟》[②]，探讨了龟兹石窟的诞生、形成的历史条件、分期以及龟兹石窟建筑、雕塑、绘画和文字等内容，对龟兹石窟与中原、希腊、伊朗、犍陀罗、印度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

吴焯前引书对中国佛教艺术特别是西域佛教艺术的研究循佛教产生、演变、逐渐东渐以及最终与中国本土文化相融合的主线展开论述，并介绍了对中国产生影响的印度佛教思想和艺术流派、中国佛教和佛教艺术与印度及佛教传播路线上其他外来文化的联系。全书资料丰富，论证充分，对学界未有定评的一些论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马德《敦煌莫高窟史研究》[③] 在深入研究敦煌文献中的造像功德记及其他有关文书的基础上，运用石窟考古学上的崖面使用理论，结合供养人题记及史籍等多方面的相关资料，考出了一批洞窟的年代和施主，并对佛教石窟建筑的起源、莫高窟佛教活动的社会性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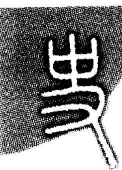
有关西域、中亚等地佛教艺术方面的论文很多，其中大多为80

---

① 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

② 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1990年。

③ 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96年。



年代以后的成果：

关于龟兹佛教文化的性质问题，中外学界说法不一。外国学者认为龟兹只是犍陀罗文化的翻版，中国有的学者也认为龟兹文化基本上是中原汉文化在龟兹地区的移植。朱英荣《龟兹文化与犍陀罗文化》[①] 通过对龟兹文化的比较，指出虽然龟兹文化受到过犍陀罗文化的影响，其许多艺术观念、风格、技巧、艺术处理方法来自犍陀罗，但龟兹文化融合并改造了它们，将其与本地区的文化传统与艺术风格结合起来，从而造就了一种新的龟兹文化。

宁强《从印度到中国——某些本生故事构图形式的比较》[②]，对某些本生故事构图形式在印度和新疆的不同特点进行比较，指出一种艺术类型，无论影响有多大，都会在其传播伸展过程中，受当地自然条件限制、被当地文化传统改造，逐步走向本地化。朱云宝《丝绸之路上的佛塔》[③]，论及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佛塔的形制及功用的演变，从中可见印度佛教对西域的影响。欧阳友徽《古代中印文化交流的一个例证——目连传说的演变》[④] 对随着佛教的传入而流传到西域及中原地区的印度目连传说的演变进行探讨。侯灿《新疆在汉魏时期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地位的几个问题》[⑤] 着重就丝绸之路开通后汉魏时期帕米尔以西的文化在新疆绿洲地区的传播、影响以及发展作了论述，涉及贵霜时期佉卢文的影响、婆罗迷文的东传及其发展、犍陀罗艺术的影响与传播等内容。邱陵《新疆米兰佛寺壁画："有翼天使"》[⑥]，对于新疆米兰佛寺"有翼天使"壁画的发现与再发现，内容、表现形式和艺术风格、成画年代及人文背景进行分

---

① 《新疆大学学报》（哲社版）1988 年第 1 期，第 15～25 页。

② 《敦煌研究》1991 年第 3 期，第 3～7 页。

③ 《西域研究》1992 年第 2 期，第 63～68 页。

④ 《西域研究》1992 年第 2 期，第 84～90 页。

⑤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 年第 3 期，第 1～5 页。

⑥ 《西域研究》1995 年第 3 期，第 105～112 页。

析。认为希腊化的佛教艺术通过贵霜人传入塔里木盆地，集中反映了古代塔里木盆地的人文荟萃现象。刘永增《敦煌莫高窟隋代涅槃变相图与古代印度、中亚涅槃图像之比较研究》①，通过分析、比较古代印度、中亚以及隋代莫高窟涅槃图的特点，指出莫高窟隋代的涅槃图的基本形式继承了犍陀罗以及中亚地区的基本特征。羊毅勇《尼雅遗址所反映的中外文化交流》② 从尼雅所受到的汉文化的影响、尼雅遗址所反映的西域土著文化的因素、尼雅遗址反映的佛教文化等三方面进行探讨。

4. 印度佛教史及印度佛教艺术

中国学者有关印度佛教史的研究不太多。主要有：吕澂《印度佛教史略》③ 和《佛教史表》④、《印度佛学源流略讲》⑤。周叔迦有关印度佛教史的论著见于《周叔迦佛学论著集》（上册）⑥。

此外，还应提到一部为藏文汉译本印度佛教史，多罗那它著、张建木译《印度佛教史》⑦，本书成书于1603年，作者觉囊巴·多罗那它（1575～1634）为西藏佛教觉囊派大德。此书自问世后一直被推崇为研究印度佛教历史的权威著作。

关于印度佛教艺术方面的专著，有常任侠编著的《印度与东南亚美术发展史》⑧，对印度史前及上古艺术、古代和中世纪的佛教艺术等方面进行探讨。论文主要有：常任侠、罗照辉《从中国典籍看印度阿育王时期的艺术》⑨ 运用有关汉文史料记载，对印度阿育王

① 《敦煌研究》1995年第1期，第16～35页。
② 《西域研究》1999年第2期，第58～63页。
③ 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年。
④ 上海佛学书局铅印本。
⑤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
⑥ 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
⑦ 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年。
⑧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0年。
⑨ 《南亚研究》1984年第1期，第1～6页。



时期的佛教艺术及其特点等进行探讨。罗照辉《印度犍陀罗艺术对中国审美观念的影响》① 从绘画、雕塑、发髻、崇尚莲花的佛教象征意义等方面探讨印度犍陀罗艺术对中国审美观念的影响。张玉兰《巴基斯坦部落地区的佛教文化古迹》② 对向以“佛教艺术殿堂”闻名于世的巴基斯坦西北部喀布尔河流域（古称犍陀罗）的佛教文化古迹及其所表现的文化特征进行了探讨。王钺《印度造型艺术的外来因素问题》③ 从欧亚大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角度，探讨印度造型艺术的外来因素问题，其中包括巴比伦、波斯、希腊、塞人等在不同时期对其造成的影响，指出印度造型艺术尤其是佛教造型艺术渗透了大量的外来因素，其辉煌成就是亚欧大陆东西文化交流的硕果。

（二）中印文化和科学技术等方面的交流

中印文化和科学技术等方面的交流是中印关系史的重要内容。由于在唐中叶海路交通地位日益突出以前，中印联系的通道大多要经由陆上丝绸之路，因此，经由陆上丝绸之路所发生的中国与印度的文化和科学技术等方面的交流与南亚和内陆欧亚关系史也有一定的关系。

在这一方面研究成果最多的是季羡林，自 20 世纪 40 年代开始，季羡林在中印文化交流史方面发表一系列论文，关于造纸术的传播，季羡林先后发表《中国纸和造纸法输入印度的时间地点问题》、《关于中国纸和造纸法输入印度问题的补遗》、《中国纸和造纸最初是否由海路传到印度去的?》三篇论文④，认为中国纸和造纸法先由内地传到西域，再从西域传到印度。否定有关伊斯兰教徒 12 世纪左右才

---

① 《南亚研究》1984 年第 4 期，第 9～17 页。

② 《西域研究》1991 年第 4 期，第 91～96 页。

③ 《敦煌学辑刊》1994 年第 2 期，第 112～117 页。

④ 收入季羡林著：《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北京：三联书店，1982 年，第 11～50 页。

把纸带到印度的说法，认为中国纸至迟在 7 世纪末叶就已经到了印度。关于蚕丝输入印度问题，季羡林有《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① 一文，对中国蚕丝输入印度的时间和路线进行考证，认为最早不会超过公元前 4 世纪，中国蚕丝经由南海、西域、西藏、缅甸、安南五条道路传入印度。有关这一方面的论文大多数收入作者的《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②、《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③、《佛教与中印文化交流》④ 等书中。季羡林多年从事糖史研究，这一专题已经超出了中印文化关系史的范畴，涉及中、印、波斯和埃及乃至世界其他地域之间的文化交流史。《糖史》全书分三编，其中第二编（国际编）第一章中“唐太宗与摩羯陀——唐代印度制糖术传入中国问题”⑤ 对唐代印度制糖术传入中国的时代背景、交通路线进行了探讨。此外，他还写过《中印文化交流史》⑥，从文化交流史这一角度做了全面的概说。

在研究中印文化关系史方面，金克木也有较重要的论著，文章大多数收入在《印度文化论集》⑦、《比较文化论集》⑧。

此外，薛克翘《中印文化交流史话》⑨ 一书，对自古以来中印之间的文化交流进行研究，内容涉及宗教、贸易往来、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诸多方面。

---

① 收入季羡林著：《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北京：三联书店，1982 年，第 51～96 页。

②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年。

③ 北京：三联书店，1982 年。

④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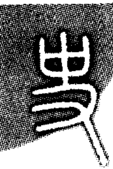
⑤ 《季羡林文集》第十卷，《糖史》（二），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 年，第 78～115 页。

⑥ 北京：新华出版社，1991 年。

⑦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年。

⑧ 北京：三联书店，1984 年。

⑨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年。



中国人与南亚人尤其是印度人积累了丰富的科学知识，在频繁的交往过程中，互相学习，互相借鉴，交流天文、历数、医学等方面的成果。薛克翘《中国与南亚文化交流志》① 对秦汉至当代的中国与南亚各国文化交流的史实作了详尽而全面的概括，大略追溯了中国与南亚文化交流的历史沿革，总结了中国在不同历史时期与南亚各国文化交流的特点。记录了中国与南亚诸国的物质文明、科学技术、社会科学、宗教哲学、文学艺术、民俗文化诸方面的交流。

关于医学交流方面，耿刘同、耿引循合著《佛学与中医学》②探讨了印度佛教及其汉化、佛教的传播与中医学发展、佛理与医理的异同、渗入中医学的佛学与印度医学等方面内容。房定亚、耿引循、耿引曾合撰论文《从〈外台秘要〉看印度医学对我国医学的影响》③，也讨论了有关中印医学交流问题。

三、史料的翻译、汇编与研究

有关南亚与内陆欧亚关系史方面的史料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是南亚方面，主要是对印度古典文献的译介和研究。二是对中国各种载籍包括佛经、史籍、笔记乃至科技、医学著作中有关南亚方面的史料进行搜集整理，对其中重要史料进行校注和研究。

1. 南亚史料翻译与研究。

主要是古代和中古时期印度的古典文献。中国学界对此类文献进行译介与研究始于建国后，以北京大学季羡林、金克木成果最多。

季羡林翻译的印度古典文献有：《沙恭达罗》④ 和《优哩婆湿》⑤，

---

①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年 10 月。

② 福州：福建科技出版社，1993 年。

③ 《南亚研究》1984 年第 2 期，第 68～73 页。

④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 年。

⑤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年。

这是笈多王朝著名诗人和学者迦梨陀娑的两部梵语文学作品；印度古代最著名、影响最大的民间文学总集《五卷书》[①]；印度古代两大史诗之一《罗摩衍那》[②] 共七部八册（另一部为《摩诃婆罗多》）。季羡林在翻译这些作品的同时，还对其进行研究，如研究《罗摩衍那》的专著《〈罗摩衍那〉初探》[③]，以及论文《〈罗摩衍那〉在中国》[④]、《罗摩衍那》[⑤] 等等。

金克木的译著主要有：迦梨陀娑的长篇抒情诗《云使》[⑥]、诗集《伐致呵利三百咏》[⑦] 和《印度古诗选》[⑧]、与赵国华等合译的《摩诃婆罗多插话选》[⑨]。

蒋忠新将梵文写本《妙法莲华经》转写成拉丁语字母转写本[⑩]，并翻译《摩奴法论》[⑪]，这是关于印度教伦理规范的一部书。郭良鋆与黄宝生合译《佛本生故事选》[⑫]，是佛教经典中的小故事集。郭良鋆还翻译了《经集》[⑬]。张保胜所译《薄伽梵歌》[⑭]，是印度古代宗教和文学名著，也是《摩诃婆罗多》中最精彩的哲理插话和印度教最负盛名的经典。黄宝生译《摩诃婆罗多》(毗湿摩篇)[⑮]。

①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年。
②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1984 年。
③ 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79 年。
④ 《季羡林文集》第八卷，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 年，第 289～324 页。
⑤ 《季羡林文集》第八卷，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 年，第 360～407 页。
⑥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 年。
⑦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年。
⑧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 年。
⑨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年。
⑩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年。
⑪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年。
⑫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年。
⑬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年。
⑭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年。
⑮ 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 年。



上述译著虽然均作为文学作品进行译介和研究，但对于缺乏史料的古代印度来说，也是进行历史研究时不可或缺的参考资料。

此外，崔连仲等人在史料选译方面也有一定贡献，有《古印度帝国时代史料选辑》① 和《古印度吠陀时代和列国时代史料选辑》② 两种，收入《世界史（上古部分）资料丛刊》。其中汇编的资料集中反映古印度从孔雀帝国的建立至笈多帝国兴起以及吠陀时代和列国时代的历史情况。

有关文献辑注方面的译著主要是法国两位学者的著作：戈岱司编、耿昇译《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③ 和费瑯编、耿昇、穆根来译《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文献辑录》④，其中均有一些内容与南亚有关，可供研究南亚与内陆欧亚关系史参考。

2. 中国载籍中的相关史料汇编。

中国载籍中有关南亚的史料可谓“举世无双”。这对于历史资料极端匮乏，向以寓言、神话、传说来代替历史的南亚来说实在是极为珍贵的。在研究南亚历史文化、内陆欧亚史、中国与南亚关系史等领域具有重要价值。

早年张星烺和冯承钧在史料汇编方面有较大贡献。张星烺《中国交通史料汇编》共六册⑤，主要内容是17世纪中叶（明末）以前我国与欧洲、非洲、亚洲西部、中亚、印度半岛等国家和地区往来关系的史料摘录。编注者从中外史籍中辑录了大量有关资料，以地区和国家分类，按时间顺序先后排列，并对其中的地名和史事作了一些考释。本书共分八编，其中与南亚和内陆欧亚关系史研究关系尤为密切的是第三、六、七、八编。冯承钧《历代求法翻经录》⑥

---

①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

②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

③ 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

④ 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⑤ 原版于1930年，中华书局加以增补校订，于1977年重新出版。

⑥ 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年。

对散见于释藏传记谱录中的关于求法翻经之事的记载，撮录汇编，便于学人翻检，有助于解决汉译西译不相连续难以对照的问题。

20世纪后期，有关汉文南亚史料汇编与研究方面，耿引曾用力最勤。她的《汉文南亚史料学》① 集西汉至明清时期载籍中的南亚史料，按正史、别史、杂史等各类进行考订、分类、阐述和评介。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编《中国载籍中南亚史料汇编》（上下册）② 也是由耿引曾负责查阅资料和编辑工作。该史料汇编辑录了汉代至清朝（1840年以前）中国载籍中有关南亚史料原文。这两部书可作为史料指南来使用，为研究者提供有关线索，具有重要价值。

此外，杨建新主编了《古西行记选注》③。它收集了我国古代（下限至清）官吏、僧侣、学者等西行的游记、日记等共29篇（一部分为节录）。篇目有《穆天子传》、《法显传》、《宋云行记》、《大唐西域记》、《往五天竺国传》、《悟空入竺记》、《杜环经行记》、《贾耽四道记》等，编者对每篇行记及其作者作了介绍，加上必要的注释，并附有地名索引。

3. 重要汉文史料研究。

中国历代正史、别史、杂史中均有相关资料，中国学术界的研究成果颇多。现仅列举其中最重要者。

（1）法显《佛国记》。

此书又称《法显传》、《天竺国记》、《历游天竺记传》、《东晋沙门法显自记游天竺事》等，是东晋高僧法显（约公元342～423年）赴印度求取佛经归国后写成的游记。20世纪中国学界比较重视对《佛国记》的研究。早年研究著作有丁谦《晋释法显佛国记地理考证》④，

---

①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

②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③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

④ 丹徒陈氏横山草堂丛书本，1915年。



岑仲勉《佛游天竺记考释》[1] 对欧洲人、日本人的研究进行订补。汤用彤在其《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册）[2] 对法显的评价颇为精当。

目前国内最好的版本是章巽《法显传校注》[3]，依据的版本比较全，校勘水平较高，其注释在参考中外各家观点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见解，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涂厚善《〈佛国记〉与古代印度史的研究》一文[4]对《佛国记》一书的可靠性以及它所提供的研究古代印度的重要资料及其对古代印度史研究的意义做了专门论述。

（2）慧皎《高僧传》。

这是一部中国佛教史籍，是东汉至梁初僧人事迹的综合性传记。全书共分 10 门，计 14 卷。记述了从东汉明帝永平十年至梁武帝天监十八年（67～519）共 453 年之间，经历了魏吴晋宋北魏后秦共 9 个朝代 257 位中外僧人事迹，附见者 200 多人。此书为僧传的体例树立了典范，对于研究南亚东来弘法与中国到南亚巡礼僧人以及佛教传播等方面提供了资料。

汤用彤《〈高僧传初集〉按语选录》[5] 辑录了历代有关《高僧传》的著录，并对《高僧传》作了校注[6]。

（3）杨衒之《洛阳伽蓝记》。

以记京师洛阳 40 年间著名寺庙的兴废为纲，涉及到当时的政治和人物，同时对当时的民情风俗、传闻轶事，也有所载录。各卷中散见有关西域及南亚史料。尤其是卷五所载“宋云惠生行纪”对于

---

①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年。

② 北京：中华书局 1983 重印，第 270～274 页。

③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

④ 《华中师范学院学报》1981 年第 3 期，第 71～78 页。

⑤ 《文献》1980 年第 2 辑，第 183～204 页。

⑥ 北京：中华书局，1992 年。

研究佛教史、中国与南亚交通史具有重要价值。

20世纪下半叶关于此书的校释和研究论著有：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①] 注释详尽，校勘认真，对成书的背景及书的内容进行了恰当的评价。书后附“历代著录及序跋题识”，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参考资料。周祖谟《洛阳伽蓝记校释》[②] 也用力颇深。

其他专就《宋云惠生使西域记》进行注释和研究的成果有：丁谦《后魏宋云西域求经记地理考证》[③]，冯承钧《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6编[④]，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6册）[⑤] 等。

（4）玄奘、辩机著《大唐西域记》。

全书共12卷，记述了玄奘赴印度留学的经历，对途经地区的地理、农业、商业、风俗、宗教、语言文字、文学艺术等方面叙述也颇为详细。这部书实际上也是7世纪以前有关南亚史地等方面的专著，对当时中亚、西亚等地的记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迄今为止，它仍是研究中亚、南亚史地以及中外关系史的极其重要的文献。

目前中国学界对此书的研究集大成者为季羡林等人的《大唐西域记校注》[⑥]。校注在吸收中外学者研究成果基础上，对原著进行全面校勘，对书中涉及到的地名、人名、族名、典章、名物等进行了注释和考证，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季羡林在《校注〈大唐西域记〉前言》中，对中印时代背景、玄奘的家世、西行求法的动机、在印度活动情况、归国后所从事译经弘法活动及其影响等方面作了全面的研究，对《大唐西域记》一书作了客观评价。此校注本的唯一缺陷是对有些新的考古发掘和语言学研究成果吸收不够，但瑕不掩瑜，

---

①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修订本。

② 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年。

③ 《浙江图书馆丛书》第2集，1915年。

④ 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

⑤ 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6册，第228～246页。

⑥ 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目前它仍被学界视为最佳版本。

其他校注、导读及研究论著有：丁谦著《释辩机〈大唐西域记〉地理考证》二卷、《五印度疆域风俗制度考略》一卷[①]以及《〈大唐西域记〉地理考证》二卷附录一卷、《印度风俗总记》一卷[②]，章巽校点《大唐西域记》[③]；向达辑《〈大唐西域记〉古本三种》[④]，周连宽《〈大唐西域记〉史地研究丛稿》[⑤]，章巽、芮传明《〈大唐西域记〉导读》[⑥]，季羡林等译注《〈大唐西域记〉今译》[⑦]，芮传明译注《〈大唐西域记〉全译》[⑧]，周国林注译《大唐西域记》[⑨] 等。为更多的人了解这部著作提供了方便。

此外，葛定华《〈大唐西域记〉所记第七世纪印度历史概观》[⑩]探讨了玄奘往来印度行程、7世纪印度农业生产和工商业、戒日王国家的建立和它的邻国、戒日王国家的政治、戒日王国家的农村公社和封建制度、印度种姓等级制度、七世纪时印度宗教文化等方面内容。黄盛璋《回鹘译本〈玄奘传〉残卷五玄奘回程之地望与对音研究》[⑪] 对于《大唐西域记》史地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林承节《〈大唐西域记〉对印度历史学的贡献》[⑫] 阐述了《大唐西域记》对于研究7世纪上半叶印度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方面的重要价值进行了评估。

---

① 丹徒陈氏横山草堂丛书本，1913年。
② 蓬莱轩地理学丛书本，1915年。
③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
④ 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⑤ 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⑥ 成都：巴蜀书社，1990年。
⑦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
⑧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
⑨ 长沙：岳麓书社，1999年。
⑩ 《河北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第127～141页。
⑪ 《西北史地》1984年第3期，第9～32页。
⑫ 《南亚研究》1994年第4期，第1～7页。

（6）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和《南海寄归内法传》。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述了包括作者在内的唐初赴印度求法僧人的经历，反映了公元7世纪南亚、南海的历史、地理、文化、宗教等方面情况，是研究佛教史、中国与南亚交通史的宝贵资料。

《南海寄归内法传》是义净写于归国途中的一部作品，主要记述印度和南海诸国僧人的律仪。此书对于了解7世纪印度、南海等地的佛教状况以及印度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情况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王邦维《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① 和《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② 对两部书进行全面校勘、注释和研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他还著有《唐高僧义净生平及其著作论考》③ 及一系列相关论文，广泛参证古代佛教和非佛教典籍及近现代中外研究成果，对义净的籍贯、生平事迹、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地位等进行考述，并从社会史角度描述了古代印度佛教寺院的组织结构、经济活动、宗教生活、教育制度等，对义净著作的价值作了客观的评价。

四、地　　理

（一）历史地理研究

专门研究南亚与内陆欧亚古代地理的著作尚属空白。但从有关中外关系史、中亚史、西域史、陆上“丝绸之路”研究等方面的论著中，可找到与此密切相关的参考资料。

黄文弼自20世纪20年代起先后四次率考古队去新疆考察，发

---

① 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

② 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

③ 重庆出版社，1996年。



表了《塔里木盆地考古记》、《吐鲁番考古记》、《罗布淖尔考古记》等著作。他从解放前至60年代所写的西北史地方面的论文收入《西北史地论丛》[①]，将考古实践与史料结合，详细地考证了两汉通西域路线和对西域的经营、塔里木盆地、罗布泊北岸出土的旱井以及新疆古民族的演变等问题，并提出了有价值的论点。向达《汉唐间西域及海南诸国古地理书叙录》一文[②]亦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60年代以来的相关成果主要有：

岑仲勉两部重要的专著，其一是《中外史地考证》（全二册）[③]其中对古地名的还原、交通路线的探索及史事的论证，多有创获，虽亦间有可商之处，但均可供进一步研究的参考。其二是《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④]，本书是作者在1930～1959年间陆续完成的。主要针对《汉书·西域传》中的地理、里距两个问题进行详细的校勘与考释，指出前人研究的错误及不周之处，提出自己的见解。

周连宽《大唐西域记史地研究丛稿》[⑤]结合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对《大唐西域记》进行梳理，就玄奘事迹和行程方面详细展开研讨，对有关古籍记载中有差异或互相抵牾的地方予以厘清。

苏北海《西域历史地理》[⑥]运用历史学、地理学和地名学的研究方法对西域历史地理进行探究，全书收论文24篇，都是独立的专题研究，内容广泛，材料丰富，不仅兼及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而且各专题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

张广达《西域史地丛稿初编》[⑦]收录作者1978年以来关于中古时期西域史地与中西文化交流方面的文章。

---

①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② 《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第565～578页。

③ 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④ 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⑤ 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⑥ 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1988年。

⑦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相关的工具书主要有冯承钧《西域地名》[1]，是一部小型历史地名辞典，收录了古籍中有关西域（包括我国新疆和从中亚细亚向西到地中海，向南到印度洋的广大地区）的地名，每条均附以简要说明，时至今日，仍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黄心川主编《南亚大辞典》[2] 由中国南亚学界数十位学者协力编撰，是目前我国第一部有关南亚各国情况的中型综合性工具书。所涉及的学科包含政治、经济、军事、历史、文化、哲学、科学、医学、宗教、神话、地理、社会、民族、语言、文学、艺术以及中国与南亚关系等等。

（二）陆上“丝绸之路”研究

陆上“丝绸之路”是南亚和内陆欧亚关系史研究的重要内容，故单独列出加以叙述。

一般所说的陆上“丝绸之路”，是指以古代中国长安为起点，经河西走廊到达新疆，然后分北、中、南路西行，进而连接中亚、南亚和欧洲、非洲的陆上交通路线。这条贯通亚、欧、非三洲的陆上“丝绸之路”自古以来就是东西文化交流的支脉，也是沿途地区古代各国各民族发生政治、经济交往的必经之路。

中国学界论及陆上“丝绸之路”的交通，多止于唐代。唐代以后，随着海上交通线的开辟与发展，陆上“丝路”在沟通亚欧大陆交通方面的作用相对降低，但它依然存在并继续发挥作用。元朝的亚欧陆路交通又形成一次高潮。明朝海上交通路线颇为发达，但运输茶叶、大黄等商品的路线，仍使用传统的陆上“丝路”。可见，唐以后的陆上“丝路”并未完全废止，而是适应政治、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呈现新的特征。

---

① 编于 1930 年，1955 年经宿白和陆峻岭整理后，由中华书局出版，后又经陆峻岭增订，中华书局 1982 年出版增订第 2 版。

②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年。



研究南亚与内陆欧亚关系史时，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陆上“丝绸之路”。因为正是这条重要的交通路线将南亚与内陆欧亚紧紧地联系起来，古代的军事征伐、商贸往来、使臣互访、僧侣传教求法、文化交流等活动，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都需经由陆上“丝路”。

国内学者对陆上“丝路”的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步升温，至90年代可谓盛况空前。从研究成果的数量上就可以对研究的规模和潜在力量略知一二。中国学界关注的重点是丝路在中国境内的具体走向以及丝路的开通、历代的发展变迁等问题，起初涉及的年代多集中在丝路兴盛的汉唐时期，地段则集中在河西走廊和西域两地。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出现了对陆上丝路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论著。

陈振江编著《丝绸之路》① 介绍了“丝绸之路”的由来、变迁及它在历史上的作用、盛衰与概况。杨建新、卢苇著《丝绸之路》②全面探讨了丝路开辟、发展和变化，介绍了古代中国与亚、欧地区，内地和边疆地区通过丝路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齐涛著《丝绸之路探源》③ 论述了丝绸之路在不同时代的兴衰变迁，丝绸之路各段路线的具体走向，丝绸之路上的丝绸运销方式与管理制度及丝绸的来源及丝绸之路的源头等问题。

新疆人民出版社于1994年陆续出版周菁葆、陈重秋主编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丝绸之路考察合作项目《丝绸之路研究丛书》，是国内第一套大型专题研究丝路文化的丛书，按三大系列介绍有关“丝绸之路”研究的最新成果，以专著系列为主，兼顾译著和普及著作，力图对丝绸之路进行全方面、多学科、多角度的研究。已经出版的著作有：周菁葆、邱陵《丝绸之路宗教文化》④，周菁葆主编论文集

---

① 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②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年。

③ 济南：齐鲁书社，1992年。

④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

《丝绸之路岩画艺术》[①]，王孝克《丝绸之路医药学交流研究》[②]，周菁葆《丝绸之路艺术研究》[③]，田卫疆《丝绸之路与东察合汗国史研究》[④]，盖山林《丝绸之路草原民族文化》[⑤] 等。

此外，赵汝清主编《丝绸之路西段历史研究——兼论沿途民族迁徙及国家关系》[⑥]，王炳华《从考古资料看丝路开拓及路线变迁》[⑦]，殷睛《古代于阗的南北交通》[⑧]，杨建新《论丝绸之路的产生、发展和运行机制》[⑨] 等也有一定参考价值。

五、历史人物研究

在南亚与内陆欧亚关系史研究中，不可避免地涉及一些历史人物。主要包括由历朝中国政府和南亚各国之间互派的使臣以及致力于传教求法的僧侣。其中一些使臣和僧侣经过陆上"丝绸之路"达到其目的地，在古代交通极为不便的状况下，要耗费很长时间，经历漫长的旅程。但正是由于漫长的旅程，使得这些使臣和僧侣对沿途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地理、民族、文化习俗、宗教信仰等各方面有了较深的了解，他们之中有的留下了撰述，成为后世不可多得的宝贵史料。除前面已经涉及的法显、玄奘、义净等外，主要有：

①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 年。
②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 年。
③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 年。
④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 年。
⑤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 年。
⑥ 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 年。
⑦ 《西域研究》1991 年第 3 期，第 13～24 页。
⑧ 《历史研究》1992 年第 3 期，第 85～99 页。
⑨ 《西北史地》1995 年第 2 期，第 1～11 页。



1. 对王玄策的研究。

中国和南亚既为近邻，往来颇为密切。其互派使臣的历史最早可追溯至西汉时期。到唐代达到高峰，宋代以后仍比较频繁。中国学界研究较多的使臣有西汉时期的张骞、唐代的王玄策、明代的郑和。其中张骞本人并未到达南亚，明代的郑和走的是海路，因此与南亚和内陆欧亚交通最相关的中国使臣中，中国学界着力最多的是王玄策。

王玄策是唐朝初年由唐政府派往印度的使节，是中印文化交流史上重要人物。20 世纪以来中外学界对他的生平及史迹给予高度评价。早年研究著作有冯承钧《王玄策事辑》[①]。50 年代以后，关于王玄策研究方面的论文，主要有陆庆夫《论王玄策对中印交通的贡献》[②] 和《关于王玄策史迹研究的几点商榷》[③]，莫任南《王玄策第二次奉使印度考》[④] 等。阴松生《王玄策出使印度、尼泊尔诸问题》[⑤] 等。

孙修身对王玄策的研究最为全面，有专著《王玄策事迹钩沉》[⑥]，以时间为序，按照事件分类，对王玄策的事迹及其贡献进行详尽的考证、评价。

有关王玄策研究方面的史料，孙修身《〈大唐天竺使出铭〉的研究》[⑦] 对 1990 年 6 月发现于西藏的《大唐天竺使出铭》进行了考释。林梅村结合考古材料和语言研究成果对《大唐天竺使出铭》进行校释，

---

① 国立清华大学清华学报单行本，1932 年。

② 《敦煌学辑刊》1984 年第 1 期，第 100～109 页。

③ 《敦煌研究》，1995 年，第 171～178 页。

④ 《南亚研究》1991 年第 3 期，第 38～44 页。

⑤ 《南亚研究》1990 年第 2 期，第 55～61 页。

⑥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 年。

⑦ 周伟洲、王欣主编：《西北大学史学丛刊》第二辑，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 年，第 123～136 页。

著有《〈大唐天竺使出铭〉校释》[①]。

2. 对鸠摩罗什的研究。

鸠摩罗什生于龟兹，其父为印度人，母为龟兹人，被称为中国佛教史上的“四大译师”之一，同时也是一位宣扬般若三论的思想家。年少时曾随其母到罽宾等地学习佛法，后来回到龟兹，成为著名的大乘学者。对于他的研究，许多中国佛教史研究的论著都给予了相当多的篇幅，如任继愈《中国佛教史》（第二卷第二章第五节）[②]、郭朋《隋唐佛教》（第二章第三节）[③]、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④]。研究专著有郭朋《鸠摩罗什评传》[⑤]，论文有胡戟《龟兹名僧鸠摩罗什传》[⑥]、丁明夷《鸠摩罗什与龟兹佛教艺术》[⑦]、陈世良《鸠摩罗什年表考略》[⑧] 等。

六、商贸往来

自古以来，南亚与内陆欧亚地区一直存在着密切的商贸往来。中国学术界有关此课题研究特别值得提及的是刘欣如的两部英文著作。一是《公元1～6世纪中国与印度的贸易和宗教往来》[⑨]，近20

---

① 《中亚学刊》第五辑，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39～252页。本文亦收入林梅村：《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420～442页。

②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③ 济南：齐鲁书社，1979年。

④ 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⑤ 收入《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续编二，济南：齐鲁书社，1982年。

⑥ 《敦煌辑刊》1991年第1期，第77～83页。

⑦ 《世界宗教研究》1994年第2期，第46～94页。

⑧ 《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82年第11期，第1～31页专刊此文。

⑨ *Ancient India and Ancient China, Trade and Religious Exchanges, AD* 1-600. Delhi, Oxfoxd University Press, 1988.



万字，是第一部全面探讨公元6世纪前印度与中国之间商业往来及宗教交流的著作。作者将印度与中国的文献资料和田野调查成果与美国的学术研究成果结合起来，考证了公元1～6世纪时东起中国，经中亚、印度，西达罗马这一漫长贸易通道即“丝绸之路”的商业活动，并联系这一背景，着重探讨了该历史时期佛教经中亚传播到中国这一历史事实，对佛教东渐与中印商贸往来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相互影响进行了分析。此书资料翔实，论证严密，见解独到，是一部研究印度古代史、南亚与内陆欧亚关系史等方面的重要著作。

二是《丝绸与宗教：关于公元600～1200年人们的物质生活与思想观念之探究》①。作者对公元600～1200年之间的物质生活与思想观念进行研究，旨在探讨宗教观念及宗教组织对经济贸易活动的影响。作者指出尽管政府垄断从未彻底消失，但自10世纪后，丝织品一度又成为欧亚大陆许多地区易于获取的商品，在这一过程中，宗教观念和宗教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佛教和基督教对丝织品的需求为打破政府控制奢侈品的局面提供了便利条件，而伊斯兰制度实际上在更广大的区域内促进了养蚕业和丝织工艺传播。这部著作就中古时期的宗教、文化以及经济生活等诸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刘欣如还撰有《古代丝绸贸易与宗教活动》②，对历史上横贯欧亚大陆的丝绸贸易与各个时期的宗教运动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指出宗教运动不仅为丝绸贸易造成市场需求，也为长途运输这类奢侈品提供方便条件。

在有关中国古代对外贸易史方面的论著中，也涉及到南亚与内陆欧亚之间的商贸关系。如沈光耀《中国古代对外贸易史》③第十章探讨了中国古代与南亚次大陆和斯里兰卡的经济贸易史。李明伟

---

① *Silk and Religion*, *An Exploration of Material Life and the Thought of People*, *AD* 600-1200, Delhi, Oxfoxd University Press, 1996.

② 《世界历史》1993年第2期，第20～27页。

③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

关于丝绸之路与商贸活动的三部专著《丝绸之路贸易史研究》[①]、《丝绸之路与西北经济社会研究》[②]、《隋唐丝绸之路》[③] 及相关论文，探讨丝路贸易商业制度以及活跃在丝绸之路上的商人等问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七、结　语

就前文所述，不难看出，20 世纪中国学术界在南亚与内陆欧亚关系史研究领域有一定的创获。但总的说来，仍呈零散状态，毕竟不成体系。然筚路蓝缕，其中的艰辛只有研究者能体会。正因为这一领域开垦不易，所以尚留一些空白；目前所出成果中，有一些论点也有待进一步商榷。如本文开篇所述，鉴于这一领域所具有的独特之处，诸多困难，更需要中外学界协作，进行多学科研究，互相借鉴研究成果，或许能攻克那些悬而未决的历史谜题。

---

①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 年。

②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 年。

③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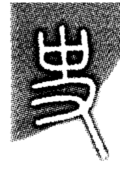
第九章　阿拉伯、波斯（伊斯兰时期）与内陆欧亚关系研究

公元6世纪末、7世纪初，穆罕默德在阿拉伯半岛创立了伊斯兰教，他的四大继承者（哈里发）以及其后的倭马亚王朝和阿巴斯王朝将伊斯兰教势力迅速扩展到西亚、北非、中亚和南亚。新兴的穆斯林不仅有强大的武力和军事，而且很快发展出独特的文化，从而开始了世界历史上的伊斯兰时代。而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研究，即对欧亚草原及其周邻地区诸民族的研究，也从此在相当大程度上与对穆斯林阿拉伯波斯的研究联系在了一起，其中既包括阿拉伯波斯穆斯林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与这些地区的联系和影响，也涉及阿拉伯波斯史料关于这些联系和影响的记载。如果从今天或历史上某一时期伊斯兰教在欧亚草原及其周邻地区的传布看，我们甚至可以说，从公元9世纪开始，阿拉伯波斯已经成为这一地区历史文化中不可或缺的角色。

东亚的中国及时注意到穆斯林阿拉伯在西亚的兴起及其对内陆欧亚的影响。虽然贞观初年穆罕默德的门弟子宛葛素就受派遣来华传播伊斯兰教并在广州建造了怀圣寺的记载尚需更多的史料证实，但永徽二年以后唐朝大概不会漠视大食在唐以西地区的活动了。因为这一年（公元651年），汉文文献记录了唐朝正式接待来自大食的使者。更重要的是唐朝在贞观末年击败西突厥后，又在永徽、显庆年间彻底平定了阿史那贺鲁，将西突厥并入唐朝版图，而此时阿拉伯穆斯林的军队已经完成了对波斯萨珊王朝的征服，东西两大势力开始在中亚河中地区汇合。

唐代中国与大食的关系主要是双方在西域的明争暗斗，其中既有大食灭波斯之后，唐朝对萨珊末代国王伊嗣候之子卑路斯的收留和任用，又有唐朝经营西域与大食东征而引发的间接或直接的冲突，直到最后双方在怛逻斯的战争。同时，作为亚洲甚至是欧亚大陆两端的大国，双方又不断通使通商，即由陆路往来，又经海路交往。在唐朝都城长安和唐代的通商口岸广州、泉州、扬州，都有大食人的遗迹。所以中国的文献史籍对唐代以来的大食并不陌生。但是早期的记载到了近现代，并非就能轻而易举地理解。例如《旧唐书》中谈到："大食国，本在波斯之西。大业中，有波斯胡人牧驼于俱纷摩地那之山，忽有狮子人语谓之曰：'此山西有三穴，穴中有大兵器，汝可取之。穴中并有黑石白文，读之便坐王位。'胡人依言，果见穴中有石及稍刃甚多，上有文，教其反叛"。"一云隋开皇中，大食族中有孤列种代为酋长，孤列种中又有两姓：一号盆泥奚深，一号盆泥末换。其奚深后有摩诃末者，勇健多智，众立为主，东西征伐，开地三千里，兼克夏腊，一名钐城"。这里的短短数语，就给我们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什么是"俱纷摩地那之山"？"穴中并有黑石白文"的记载有什么意义？"孤列种"、"盆泥奚深"、"盆泥末换"等等是什么意思？唐代人称伍麦耶王朝为白衣大食，称阿拔斯王朝为黑衣大食。《旧唐书》比较清楚地记载了黑衣大食上台的过程："有呼罗珊木鹿人並波悉林举义兵，应者悉令著黑衣，旬月间众盈数万，鼓行而西，生擒末换，杀之，随求得悉深种阿蒲罗拔，立之。末换已前谓之曰白衣大食，自阿蒲罗拔后该为黑衣大食。"这些记载到底与阿拉伯波斯自身的记载有什么对应？这些都已经不是一般的史学研究可以解决的问题。

到了蒙古元朝时期，东亚与中亚、西亚的联系又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蒙古军队的铁骑不仅横扫了亚欧大陆，而且蒙古人在西亚的波斯建立起伊利汗国，在俄罗斯建立起金帐汗国。这样一来，不仅蒙古人的历史与波斯阿拉伯甚至欧亚大陆上的许多民族密不可分，而且波斯阿拉伯人关于蒙古民族的许多记载更是研究蒙古元朝历史



不可缺少的史料，换句话说，离开了波斯阿拉伯史料，我们可能对蒙元历史的许多方面一无所知。总之，唐元时期中国历史的发展，唐元时期东亚、中亚、西亚的紧密联系，以及唐元时期东西方自身和相互之间的记载，为日后中国学者的内陆欧亚研究留下了历史性的任务。同时由于这种历史性任务对蒙元历史研究更为重要，近代以来的阿拉伯波斯与内陆亚洲研究的进步很自然地与蒙元历史研究的发展联系在一起。陈得芝先生在《中国通史·元时期》[①] 甲编第三、四、五、六、七章中对中外蒙元历史研究发展史进行了全面研究（其中第四章为陈得芝与丁国范合写）。本文在其基础之上略加补充（本文中加有引号而未加注明出处者均出自其文）。

一、近现代研究的学术基础

近现代中国学者的阿拉伯波斯与内陆亚洲研究有两个重要的学术基础。第一个学术基础是清代的乾嘉考据。清代的乾嘉考据虽然在中国思想史上往往受到不少批评，但当时的学者“竞言训诂音韵”，以仔细尖钻的精神讨论了中国历史上的许多疑难问题，为后代学术的发展奠定了不少基础。就阿拉伯波斯与内陆亚洲研究而言，训诂的方法和音韵学的知识，至今仍然是对不同文字史料进行“审音勘同”的重要方法。钱大昕是乾嘉学派大师。陈得芝先生将这位大师非常突出的元史研究成就概括为三方面：一是史料的发掘，多种重要元史史料的价值都经他慧眼发现、表彰而显于世。如他从《道藏》中发现并抄出了《长春真人西游记》，并写跋指出该史料的重要价值，“从此这部长久湮没无闻的子部附庸之书才一跃成为史部的要籍”。二是《元史》的考订。“他以多方面（音韵、金石、舆地、

① 白寿彝总主编、陈得芝主编：《中国通史》第八卷《中古时代·元时期》（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年。

典制、历算）丰富的学识对原书逐卷审核，或勘同、录异，或纠谬、补缺，所发明者不胜枚举”。三是《元史稿》的编撰。仅从传世的他生前定稿的《元史艺文志》和《元史氏族表》两篇看，他的成就非常难能可贵。同时代的其他乾嘉大师如赵翼、王鸣盛等在这些方面也有相当成绩。

第二个学术基础是嘉道之际兴盛的西北舆地之学。当时西北舆地之学兴盛与发展的基础是康雍乾以来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①] 统一大业的发展要求学者回答与西北有关的各种历史、地理、民俗、宗教等问题，到19世纪中期鸦片战争前后，这种要求更加强烈。虽然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我国的边疆问题，但对本课题关注的阿拉伯波斯与内陆亚洲研究也有促进作用。

二、洪钧《元史译文证补》和清末民初的新研究

鸦片战争后，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致力于边陲史地的研究，希望能起到经世致用的作用。当时一方面由于西方强权入侵而导致边患日益严重，中国学者不能不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因而学术注意力进一步转向危机日重的边陲。而要明确新疆、蒙古及其相邻境外诸地的沿革，自以研究蒙元时代最为重要。另一方面也由于中国学者开始接触到一些西方的著述，学术资源和学术视野有所拓展。“外国史地著作被译成汉文者逐渐增多，中国学者从中了解到前人未详的元代西北宗藩国的历史，并且知道域外还有许多元史史料可补中国史料之缺，于是开始注意搜集和利用，逐渐突破前人所受的局限”，把元史研究和西北史地研究都推进到一个新阶段。

当时主张向西方学习的代表人物魏源（1794～1857年）很注意

① 马大正、刘逖：《二十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57页。



研究西北史地，在他的名著《圣武记》和《海国图志》中都涉及到阿拉伯波斯和内陆亚洲研究的内容。他在许多外国史地著作的基础上，撰写了《元代征西域考》、《元代西北疆域考》，后又在《元史新编》中增立的《太祖平服各国》、《太宗宪宗平服各国》等传记中，“多叙漠北、西域史事”。“虽然魏源所见外国之书都是一般的史地著作，没有什么史料价值，不过他第一个突破中国史料的局限，并首创西北诸传，其‘开榛莽而启津途’之功仍不可没”。

与魏源同时代的有张穆（1805～1849年）和何秋涛（1824～1862年），其后有李文田（1834～1895年）、洪钧、丁谦（1843～1919年）、柯劭忞（1848～1933年）、屠寄（1856～1921年）、沈曾植（1850～1922年）等，其中洪钧在阿拉伯波斯与内陆亚洲研究的学术发展史上的地位最为突出。

洪钧（1839～1893年），江苏吴县（今苏州）人，同治七年（1868年）状元，光绪七年（1881年）任内阁学士，十三年任出使俄、德、奥、荷四国大臣，十六年归国，迁兵部左侍郎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至终。19世纪后期，欧洲东方学特别是其中伊斯兰学的研究，已经有相当的进步，大批穆斯林史料被重新发现并被编辑出版，依靠新史料写出的著述也纷纷问世。到19世纪末，几乎可以说，主要的穆斯林史料都已经被人们使用或正在被使用。① 特别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国学者巴托尔德，在俄国非常发达的伊斯兰学的基础上，非常完整地研究了与中亚有关的穆斯林史料，完成了他的第一部重要的中亚/内陆亚洲研究著述《迄至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使国际内陆亚洲研究的学术水平上至一个空前的高度。洪钧出国前即以对元史和西北史地有研究，在欧洲任职期间（1887～1890年），通过译员接触到当时的一些蒙古史著述，如多桑《蒙古

---

① 关于19世纪末西方学术界对阿拉伯波斯史料的利用，可以参见 *Turkestan, Down to the Mongol Invasion*, by W. Barthold, E. J. W. Gibb Memorial Trust. Porcupine Press Inc., 1977.

史》（法文）、哈木耳《金帐汗国史》和《伊利汗国史》（德文）、哀德蛮《史集·部族志》德文节译本和《不动摇的铁木真》（德文）、华而甫《蒙古人史》（德文）、贝勒津《史集·部族志》和《史集·成吉思汗纪》俄文译本、霍渥士《蒙古史》（英文）等，根据译员的翻译，撰写了《元史译文证补》。回国后，他继续修订整理。遗憾的是直到他去世时，全书未能完成。他去世时，书稿的清本托付给了沈曾植和陆润庠，而稿本交给了儿子洪洛。不久洪洛病故，稿本散失。后陆润庠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 年）将清本刊行。洪钧在《元史译文证补》中补传了金帐汗国、伊利汗国、海都、哲别、西域、报达、木剌夷等，还在后面附有《地理志西北地附录释地》、《西域古地考》、《旧唐书大食传考证》等，可以算是中国学者第一部较系统利用非汉文史料进行波斯阿拉伯与内陆亚洲研究的著述。《元史译文证补》的问世，使中国学者特别是中亚/内亚研究者的眼界大开。前所未有的域外史料展现在人们面前。虽然洪钧本人主要是利用二手史料进行研究，但他开创的“利用域外史料与汉文史料互补互证的方法”成为中国内陆亚洲研究的新潮流，同时也为 20 世纪中国内陆亚洲研究特别是与阿拉伯波斯有关的内陆亚洲研究树立了新的学术标准。

与洪钧同时的柯劭忞和屠寄在利用域外史料进行元史研究方面也有相当成绩。柯劭忞有《新元史》，屠寄有《蒙兀儿史记》，两部书都涉及波斯阿拉伯与内陆亚洲的研究，如《新元史》和《蒙兀儿史记》都根据“西书”资料增补了西域诸国等传。

三、20 世纪上半叶波斯阿拉伯与内陆亚洲研究的进步

洪钧、柯劭忞、屠寄等学者在阿拉伯波斯与内陆亚洲主要是蒙元史研究方面虽然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与当时世界学术界仍然有很大的距离，他们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不仅十分传统，而且基本上



仍然局限在中国史料的范围里，对非汉文史料的了解主要依靠翻译而来的二手甚至三手著述。进入 20 世纪以后，中国学者的阿拉伯波斯与内陆亚洲研究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批青年学者出国学习或通过其他途径而通晓外语，能够直接利用外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同时开始学习与中国和内陆亚洲历史有关的东方语言，开始直接对比研究中外史料，开展专题研究，突破了传统的老路，为中国 20 世纪的学术研究奠定了一个世界水平的起点。“开辟新路径的是史学大师王国维、陈垣和陈寅恪”。

王国维早年学习英、日文，研究哲学、文学，后涉足广泛，成就卓著。他在研究敦煌学、蒙古学时，也涉及到波斯阿拉伯与内陆亚洲的研究。他的《西胡考》、《鞑靼考》、《黑车子室韦考》、《萌古考》虽然主要谈蒙古高原的历史，但对中亚研究以及本研究也有重要意义。他的《西辽都城虎思斡耳朵考》对了解这个著名都城也有积极意义。王国维对史料极为重视，他的《古行纪四种校录》[①] 包括对《杜环经行记》、《王延德使高昌记》、《刘祁北使记》和《刘郁西使记》的校勘和研究，这些行记的校勘，以及他的《蒙鞑备录笺证》、《黑鞑事略笺证》、《圣武亲征录校注》和《长春真人西游记校注》，利用大量的汉文史料进行校勘和研究，“不仅为后学者提供了这些重要史料的完善校本，而且对诸书所载人物、地理、史事、年代、制度、风俗等都有精辟的考释”。王国维还翻译过一些外国著名学者的论文，如伯希和的《近日东方古言语学及史学上之发明与其总结》、箭内亘的《鞑靼考》和斯坦因的《中亚细亚探检谈》等，表现出作者对国际学术进展的关注。

陈垣于 1917 年撰写了《元也里可温教考》[②]。也里可温是元代基

---

① 本文中提及的王国维著述均见《王国维遗书》，上海古籍书店印行，1983 年。

② 《东方杂志》第 15 卷第 1～5 号，1918 年 1～5 月。又见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年，第 1～58 页。

督教的总称，该文专用汉文史料进行研究，发表后受到中外学术界的好评。以后相继发表多篇/部重要的关于中国宗教和东西交通史的著述。《开封一赐乐业教考》① 研究的是传入中国的犹太教；《火祆教入中国考》② 是对波斯古教索罗亚斯德教的研究；《摩尼教入中国考》③ 是对一度在中国传布很广的摩尼教的研究；而《回回教入中国史略》④ 原是他在北京大学演讲的记录稿，是中国学者对伊斯兰教历史的最早的科学研究。《元西域人华化考》⑤ 是陈垣前期的代表作，作于1923年，前4卷发表在北京大学《国学季刊》（1923年），后4卷发表在《燕京学报》（1927年）。作者1964年在回答一位老读者信中说，“此书著于中国被人最看不起之时，又值有人主张全盘西化之日，故其言如此”⑥，表现出作者强烈的爱国之心。该著作广泛搜集汉文史料，研究西域人来华后受汉文化影响的历史，完成后引起热烈反响，并由此奠定了作者作为国际学者的地位。1934年作者将全书木刻出版，1962年修订出版。另外，陈垣的《中西回日历》⑦ 是波斯阿拉伯与内陆亚洲研究不可或缺的工具书。

陈寅恪在外留学时就以语言、文学和佛学为主攻方向。他几乎

---

① 《东方杂志》第17卷第5～7号，1920年2～4月。又见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59～108页。

② 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1卷第1号，1923年。又见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09～14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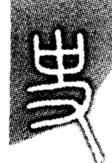
③ 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1卷第2号，1923年。又见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41～209页。

④ 先刊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刊》第1卷第6号，1927年，题为《回回教进中国的源流》，后刊于《东方杂志》第25卷第1号，1928年，改为现名。又见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11～230页（据作者手写的两份讲演提纲校订）。

⑤ 参阅陈智超：《〈元西域人华化考〉导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⑥ 转引自陈智超：《〈元西域人华化考〉导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页。

⑦ 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丛书，1926年；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学遍与中国相关的所有东方语言，如梵文、藏文、蒙文、波斯文等。1925年起他在清华、北大、中央研究院等多处任教、研究，在中国古代史、宗教史、西北民族史、敦煌学等许多领域都有非常重要的贡献。就本文所涉及的专题而言，他于1929年发表《元代汉人译名考》一文，根据《至元译语》的记载，并取波斯文《史集》、蒙文《秘史》和其他汉文资料为证，充分证明了元代蒙古人称汉人为“札忽歹”。他使用“Blochet校本拉施特蒙古史波斯原文和Quartermere拉施特蒙古史波斯法文对译本”，说明他能够借助西方文字的翻译本而使用波斯原文材料。

陈寅恪的学术活动标志中国学者的波斯阿拉伯与内陆亚洲研究，已经开始进入直接利用多种文字史料和运用新方法为特征的新时期。

自洪钧以来，中国学者在波斯阿拉伯与内陆欧亚研究中受益于向西方学者学习。但通过留学来学习毕竟有相当的限制，所以翻译对中国学术界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方面的贡献主要见于张星烺和冯承钧两位学者的工作。

张星烺是与王国维、陈垣、陈寅恪差不多同时代的学者，他曾留学美国和德国。回国后曾任北京大学、辅仁大学教授。他从1913年开始翻译玉尔的英文译注本《马可波罗行纪》，1923年发表了《导言》部分[①]，1929年出版了译本第一册（原书第一卷的大半），但此后未再续出。1937年又出版了他据Benedetto意大利文的英译本重译的行纪全文，书名《马哥孛罗游记》。1930年出版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6册）[②] 是他最重要的著作。该书分载历代中国与世界各主要地区之间的交往，其中许多部分都与穆斯林时期的波斯阿拉伯与内陆亚洲的研究有关，如第3卷。此书的汉文资料搜罗甚广，外

---

① 张星烺：《〈马哥孛罗游记〉导言》，《地学杂志》第14卷第6期，1923年，第1～176页。

② 北京：辅仁大学图书馆，1930年。

文材料主要取材于玉尔的《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①] 等书，玉尔书中所辑资料及其考释大部分被译出编入，甚便读者，虽考证失当不少，但该书至今仍是从事中西交通史研究的入门书。

冯承钧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致力于法国汉学家著作的翻译和中西交通史、蒙元史的研究，二十多年中所译名家专著、论文近百种，其中又以法国学者的著述为多，特别是伯希和的著作。这些翻译文章，有的与阿拉伯波斯和内陆亚洲研究有直接关系，如伯希和的《黑衣大食都城之汉匠》[②]，即便是没有直接关系的文章，也包含与阿拉伯波斯和内陆亚洲研究有关的内容或者有关史料的利用，对中国学者了解西方学术发展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如在《评王国维遗书》一文中，伯希和既充分肯定了王国维在各种游记校注方面的成就，又指出了他的若干缺漏，如他说：王国维的《西辽都城虎思斡耳朵考》"引文甚佳，惜所知西方资料太不充足，至结论讹误；须重再考证"[③]。冯承钧所译都是学术价值很高、专业性极强的研究文献，其译名和考证文字的准确译述需要有许多方面丰富的专业知识，"绝非译书匠所能办到"。可以说，他的译著（还加有不少补充、订正）本身就是一种专门家的研究工作，对我国的学术进步贡献甚大。他的译、作大多数包括在《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一至九编）、《多桑蒙古史》、《马可波罗游记》、《西突厥史料》、《中国南洋交通史》等中，1999年商务印书馆重印冯先生的译作，在《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三卷中收录了当时发表在其他地方的一些文章，与本研究有关的有《帖木儿帝国》（布哇撰）和《中国史乘中未详诸国考》（希勒格撰）[④] 等。

---

① 1916年戈狄埃增订本。

② 《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五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56年，第7～9页。

③ 《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五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56年，第67页。

④ 其中关于女人国的考证与本研究课题有关。

向达的主要工作是中西交通史研究和敦煌学等研究。1934年出版的《中西交通史》[①] 是对中国与广义上的西域交往历史的概括，是研究波斯阿拉伯与内陆亚洲不可缺少的入门书。而在此前一年（1933年）发表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②]，该书的重要不仅在于对唐代西域人华化的研究，而且用了相当篇幅研究唐代长安等地“胡化”，即受西域文化影响的问题，给东西交通历史的研究者很大地启发。

20世纪30年代中国又崛起一批杰出的学者，将中国的阿拉伯波斯与内陆亚洲的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这批学者分为几种类型。一是以蒙元史为主要研究领域的学者，在王国维、陈垣、陈寅恪的基础上，前往欧美学习多种东方语言文字，并使用波斯阿拉伯等文字的史料进行了深入的专题研究。另一种类型是一些回族学者，其中大部分人曾前往阿拉伯国家学习，并利用自己对伊斯兰教的深入了解，开始研究涉及阿拉伯波斯与内陆亚洲有关的课题。

韩儒林先生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得到陈垣、陈寅恪等的指点，开始研读外国东方学家的著作，深为他们用比较语言学方法考释西北史地的成就所吸引。1933年赴欧洲留学，在比利时、德国等地多所大学就读，并曾师从伯希和等著名学者。他学习了波斯、蒙、藏、突厥等东方语言文字，翻译注释西方学者对阙特勤等突厥碑铭的研究。1936年回国后，在辅仁、燕京、中央等多所大学任教。他在1940年发表的《元史研究之回顾与前瞻》[③] 中指出，“柯劭之后，我

---

① 上海：中华书局，1934年。

② 《燕京学报》专号之二，1933年10月。又见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第1～116页。

③ 《责善》半月刊，1940年第2卷第7期，第8～12页。又见韩儒林：《穹庐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1～68页。

国治元史者率皆通习欧洲语文。能直接阅读西人译著，不复再假舌人隔靴搔痒矣……盖域外重要蒙古史料，多为波斯、大食文字，子母与音点，最易错误，若不用中文史料与原文校对，则原文人名、地名，不惟泰西译者不能定其读音，即大食、波斯学者亦莫能定期读写。故我国学人如但凭西人译文研究元史，则西人随意译写之舛误处，吾人必仍旧因袭莫能改正。质言之，即吾人绝不能跳出西人范围而别有所贡献也”。“故吾人今后研究元史，于域外史料，绝不能仍以贩卖西方译文，拾人牙慧为满足。必须直接阅读史料所在之原文，与汉文史料作比较之研究。原文不易了解之处，将见中文材料往往可以解释之，中文材料不可能解释之处，将见域外材料往往可以订正之。如是研究，始可扫荡洪钧以来元史著述上无数谬误，而渐趋于光明之境域”。韩儒林先生 1940 年关于元史研究未来发展的设想，同时是对整个内陆亚洲研究特别是与阿拉伯波斯有关的研究的经典论述。韩先生本人就是这种研究方法的一个范例。他的《成吉思汗十三翼考》①、《蒙古氏族札记二则》② 等就是采用《史集》波斯原文与汉文史料“直接互校”的方法，从历史学和语言学两方面进行考释，订正了中外史料和前人著述中的许多讹误。

翁独健先生和邵循正先生也在 20 世纪 30 年代前往欧美，也都曾师从伯希和，并且都能够使用东方语文史料与汉文史料对比研究。邵先生 20 世纪 30 年代发表的《元史、拉施特集史蒙古帝室世系所记世祖后妃考》，“直接用《史集》(Blochet 刊本)、《贵显世系》(写本) 原文与《元史》比勘，互证互补，是为继陈寅恪之后我国学者直接利用波斯文史料研究元史的第一篇重要论文”。他的《有明初叶与帖

① 华西大学编：《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1940 年第 1 卷第 1 期。又见韩儒林：《穹庐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第 1～17 页。

② 华西大学编：《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1940 年第 1 卷第 2 期。又见韩儒林：《穹庐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第 51～60 页。



木儿帝国之关系》也是用波斯文与汉文史料比较研究的方法写成。[①]《语言与历史——附论〈马可波罗游记〉的史料价值》[②] 是邵先生的遗作，共4篇，从比较语言学的角度，研究了包括波斯语在内的多种语言的史料中关于蒙古史的若干词汇，并由此指出，比较语言知识对史学研究的重要意义。

韩、翁、邵三位出国学习，师从国际东方学大师，通晓多种东西方语言文字，善于借鉴国外东方学的学术成果和研究方法（特别是历史语言比较方法），代表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学者阿拉伯波斯与内陆亚洲研究的最高水平。而当时他们的研究路数，主要是利用各种文字史料进行比勘，着重名物制度的考证。

马坚、纳忠等是中国著名回族学者，1931年受派遣前往埃及爱资哈尔大学学习，开始了中国穆斯林学者直接前往阿拉伯国家学习的先例。他们在埃及学习阿拉伯语言、文化、历史、宗教，回国后在中国著名高等学府教授阿拉伯语言文化，对中国的阿拉伯波斯与内陆亚洲研究的发展有推动意义。他们还翻译了一些与阿拉伯波斯有关的阿拉伯或西方的研究著述，对国内学者从整体上了解阿拉伯波斯的历史文化发展有很大的帮助。马坚翻译的《古兰经》[③] 对与阿拉伯波斯和与伊斯兰教有关的一切研究都是非常重要的学术工作，他翻译的美国学者希提的《阿拉伯通史》[④] 是研究阿拉伯和伊斯兰发展的重要著作，其中也包括阿拉伯穆斯林在中亚的活动，纳忠翻译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⑤] 是阿拉伯世界

① 邵循正：《有明初叶与帖木儿帝国之关系》，《清华社会科学》第2卷第1期，1936年10月。重刊于《邵循正历史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86～98页。

② 《元史论丛》第1辑，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14～225页。

③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④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

⑤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1999年。

重要的伊斯兰文化发展史研究著作。马坚还编著有《回历纲要》[①]等研究著述。[②]

白寿彝没有前往阿拉伯国家学习，他是在国内大学中成长起来的回族学者。30年代中期开始发表涉及阿拉伯波斯与内陆亚洲研究有关的著述。1936年的《从怛逻斯战役说到伊斯兰教之最早的华文记录》[③] 和1937年的《宋时伊斯兰教徒底香料贸易》[④] 是中国学者中较早在西方学者的研究基础上做进一步的研究。前一篇中关于怛逻斯之战后中国唐朝在西域的影响问题的探讨，有独立于西方学者之处。而后一篇关于阿拉伯波斯与中国经由海路交通的研究，有助于了解它们与内陆亚洲的关系。他还发表了《〈新唐书·大食传〉注》[⑤]、《中国回教小史》[⑥]、《中国伊斯兰之发展》[⑦]、《中国伊斯兰史纲要》[⑧]、《中国伊斯兰经师传》[⑨]，对中国回回民族的形成进行了较系统地研究。

---

① 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

② 马坚关于阿拉伯的论文有《阿拉伯文在国际政治上的地位》、《回回天文学对于中国天文学的影响》、《阿拉伯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伊斯兰哲学对于中世纪时期欧洲经验哲学的影响》、《伊斯兰文化的光芒——纪念阿维森纳诞辰一千周年》、《中国与阿拉伯悠久的传统友谊关系》等。

③ 《禹贡》半月刊，第5卷第11期，1936年，第57～77页。

④ 《禹贡》半月刊，第7卷第4期。1942年增删后改题为《宋时大食商人在中国的活动》，收入白寿彝：《中国伊斯兰史存稿》，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04～169页。

⑤ 《史学月刊》第3期，1937年4月，第123～154页。

⑥ 重庆：商务印书馆，1943年。

⑦ 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74～379页。

⑧ 上海文通书局，1946年。又见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92～430页。

⑨ 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34～492页。

四、五六十年代中国的波斯阿拉伯与内陆亚洲研究

五六十年代中国涉及阿拉伯波斯与内陆亚洲研究的学者受到当时时代思潮的影响，发表了一些历史上中原与西域各国友好关系的文章，如周一良《中国与亚洲各国和平友好的历史》①、《史学》双月刊编《中国与亚洲各国友好关系史论丛》②、周一良《中国同亚洲各国和平友好的历史》③、《中国同阿富汗的传统友好关系》④、《中国人民和阿拉伯人民的深情厚意》⑤、《中伊友谊源远流长》⑥、《中阿友好关系源远流长》⑦、谢孝平《中国同阿富汗的传统友谊》⑧、施一揆等《中国和伊拉克两国人民友好的回顾》⑨、张一纯《中国和伊拉克的历史的友谊》⑩ 等。同时这些学者也利用一些机会对历史上阿拉伯波斯与内陆亚洲的关系，作较深入的研究，如阎宗临《古代波斯及其与中国的关系》⑪、阎文儒《从考古发现上看阿拉伯国家与中国的友好关系》⑫、宋大仁《关于"西域""回回""阿维森纳"问题》⑬、

① 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 年。
② 北京：三联书店，1957 年。
③ 《人民日报》，1955 年 10 月 1 日。
④ 《光明日报》，1957 年 10 月 24 日。
⑤ 《北京大学学报》1958 年第 3 期，第 1～4 页。
⑥ 《人民日报》，1973 年 1 月 26 日。
⑦ 《光明日报》，1963 年 11 月 25 日。
⑧ 《人民日报》，1957 年 10 月 24 日。
⑨ 《史学战线》1958 年第 1 期，第 19～21 页。
⑩ 《历史教学和研究》1960 年第 5～6 期，第 60～64 页。
⑪ 《山西师院学报》1958 年第 2 期，第 53～81 页。
⑫ 《文物参考资料》1958 年第 9 期，第 44～45 页。
⑬ 《历史研究》第 59 卷第 12 期，1959 年 12 月，第 89～94 页。

周一良《新发现十二世纪初阿拉伯人关于中国之记载》① 等。但总的讲，由于50年代初中国的恶劣国际环境的限制和五六十年代中国国内不断的政治运动的牵扯，中国学者在本专题上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成就，与国际学术水平的差距明显加大。

五、70年代末以来中国年轻学者的研究

"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开始了中国的阿拉伯波斯与内陆亚洲研究的新时期。当时不少老一辈学者尚健在，他们发表的论文或集结以往成果出版的论文集，都是当时学术界称颂之事。在与本专题有密切关系的文章中，张锡彤、张广达父子发表的《试论俄国东方学家瓦·弗·巴托尔德对蒙古史的研究及其〈突厥斯坦〉一书》② 是一篇影响很大的评论介绍性文章。它评论介绍的《迄至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是俄国著名的中亚学家巴托尔德最著名的著作，其第一部分是史料汇集，搜集了关于中亚突厥人活动的相关穆斯林史料，第二部分正文是对中亚历史地理、特别是穆斯林入侵以后直至被蒙古征服的历史的研究。该书涉及大量穆斯林史料，至今是研究该时期中亚的入门之作和史料指南，据说已经由张锡彤先生翻译完毕，但由于涉及面太广，而译者要求很高，至今未能出版。这篇文章是对巴托尔德该著作的详细介绍和评价，是极少有的书评之作。例如作者指出了各国研究者注意到俄文版和英文版的差别，1963年的俄文版被认为是最好的版本，而英文版不论是较早还是60年代以后的，都有不少误译之处，而我国大多数学者至今使用的仍然是英文版。另外，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由朱杰勤校订③，于1977

① 《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406～418页。

② 《元史论丛》第1辑，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00～213页。

③ 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年出版。朱杰勤在1978年还发表了《中国和伊朗历史上的友好关系》[①]。

在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学者当时也有突出表现。北京大学张广达1978年发表了《关于马合木·喀什噶里的〈突厥语词汇〉与见于此书的圆形地图（上）》[②]，介绍当时国内很少有人了解的《突厥语大辞典》——这部用阿拉伯文解释突厥语词汇的11世纪中亚的重要著述；1984年发表的《出土文书与穆斯林地理著作对研究中亚历史地理的意义》[③]，详细介绍了穆斯林史地著作的情况和西域研究中可资利用的价值。他的文章推动了国内的西域研究和西域研究中对穆斯林文献的利用。张广达后来在季羡林主持的《大唐西域记》的校注[④]中负责中亚部分，广泛利用穆斯林史料、汉文史料和其他史料的相互比勘，体现了80年代我国阿拉伯波斯与内陆亚洲研究的方向。他与王小甫合作的《刘郁〈西使记〉不明地理考》[⑤]则是直接利用阿拉伯文史料对中亚地理进行的研究。张广达的《古代欧亚的内陆交通——兼论山脉、沙漠、绿洲对东西文化交流的影响》[⑥]和《海舶来天方　丝路通大食——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历史联系的回顾》[⑦]是重要的概览性文章，引用史料非常丰富，前者是关于东西交通的

---

① 《历史研究》1978年第7期。

② 《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8年第2期，第29～42页。又见张广达：《西域史地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57～82页。

③ 《新疆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第57～64页，第2期，第55～63页。

④ 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⑤ 见张广达：《西域史地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83～112页。

⑥ 中国史学会编：《第十六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中国学者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53～270页。又见张广达：《西域史地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373～391页。

⑦ 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743～802页。又见张广达：《西域史地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417～485页。

宏观思考，后者是对中国一阿拉伯关系的概览性介绍。他的《伊本·胡尔达兹比赫〈道里邦国志〉中译本序言》① 是为宋岘译作写的序言，其中谈了阿拉伯波斯史料对中国学者研究的重要意义。

王治来的《中亚史纲》② 是国内第一次对中亚进行通惯研究的通史性著作，关于阿拉伯波斯与内陆亚洲的关系是书中的重要内容。他还发表过《公元第十到第十五世纪中国同中亚的关系》③、《中亚文明与中亚研究》④、《成吉思汗和中亚》⑤ 等。

魏良弢曾长期在新疆生活，70 年代以后开始西域历史研究，先后研究了西域历史上与穆斯林有密切关联的喀喇汗王朝、西辽王朝、叶尔羌汗国等历史，除论文之外，他的专著有《喀喇汗王朝史稿》⑥、《西辽史研究》⑦、《西辽史纲》⑧、《叶尔羌汗国史纲》⑨ 和《和卓家族研究》⑩，在国内第一次较系统地研究了 9 世纪中期回鹘西迁以后开始到 17 世纪后期的西域历史，时间跨度很大，其中不仅涉及了这些中亚政权与其以西的穆斯林政权的关系，而且通过俄英等西方文字的翻译，大量使用了穆斯林史料，与汉文史料对比研究，从整体上将伊斯兰时期西域历史的研究推进了一步。

其他发表与本研究有关的文章的学者有卢苇的《唐代中国和大

① 伊本·胡尔达兹比赫著，宋岘译：《道里邦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91 年，第 1～22 页。又见张广达：《西域史地从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第 393～415 页。

②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 年。该书前十章是作者 1980 年出版的《中亚史》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年）的修改稿。

③ 《新疆社会科学研究动态》1981 年 2 月，第 1～25 页。

④ 《中亚研究资料》1983 年第 1 期，第 1～40 页。

⑤ 《新疆社会科学》1981 年第 1 期，第 49～54 页。

⑥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 年。

⑦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 年。

⑧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

⑨ 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4 年。

⑩ 与刘正寅合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年。



食在中亚地区斗争的发展和变化》[①]、赵俪生《明朝的西域关系》[②]、宋岘《七世纪末大食进兵阿姆河北的年代》[③]、王小甫《国外有关东土耳其斯坦古代历史文化的研究》[④]、刘戈《试论中亚伽色尼王朝的兴衰》[⑤]、蒋其祥、周锡娟《九至十三世纪初突厥各部的分布与变迁》[⑥]、秦惠彬的《大食同唐朝的军事接触以及伊斯兰教的东渐》[⑦]。近年来，许序雅在博士论文《唐代文献所记中亚史地考辨》[⑧] 和2000年出版的《唐代丝绸之路与中亚历史地理研究》[⑨] 中，利用穆斯林史料的西方文字译本，重新检讨了《大唐西域记》、《新唐书·地理志》、《新唐书·西域传》、《册府元龟》的有关昭武九姓的史地记载。

同时，国外著名学者作品的翻译也相继问世，如赵俪生翻译了《蒙古察合台汗国历史——〈七河史〉之一章》[⑩]、胡锦州、田卫疆翻译《马卫集论中国》[⑪]、周锡娟翻译《关于阿拉伯文献中有关中亚史料的几点考证》[⑫]、李琪翻译《察合台汗》（巴托尔德著）[⑬]、罗贤佑翻译《察合台后裔的历史》（阿布尔伽齐著）[⑭]、乌力吉图翻译《伊

---

① 《中亚研究资料》1983年第2期；《西域史论丛》第2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89～109页。

② 《东岳论丛》第1期，1980年；《寄陇居论文集》，济南：齐鲁书社，1981年，第263～275页。

③ 《历史研究》1981年第3期，第80页。

④ 《中亚研究资料》1983年第1期，第26～35页。

⑤ 《中亚研究资料》1986年第1期，第34～39页。

⑥ 《新疆社会科学》1983年第4期。

⑦ 《世界宗教研究》1987年第1期，第97～103页。

⑧ 杭州大学，1998年。

⑨ 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

⑩ 《西北史地》1983年第3期，第109～120页。

⑪ 《中亚民族译丛》1985年增刊，第168～179页。

⑫ 《中亚研究资料》1985年增刊，第151～162页。

⑬ 《西域史论丛》第1辑，1985年，第267～274页。

⑭ 《蒙古学资料与情报》1987年第4期，第1～6页。

儿汗国的蒙古人》[①] 等。但在翻译国外作品方面最突出的是耿升。在其翻译的著述中，《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文献辑注》[②]、《印度见闻录》是重要的史料。另外，耿升与何高济译《柏朗嘉宾蒙古行纪·鲁布鲁克东行纪》[③]、耿升译戈岱司《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④]、耿升译哈密顿《五代回鹘史料》[⑤]，以及罗致平译巴托尔德《中亚突厥史十二讲》[⑥] 等，都包含有一些重要的与内陆亚洲有关的对穆斯林史料的研究。

南宋赵汝适的《诸蕃志》主要谈的是南海交通问题，但其中不少内容关系阿拉伯波斯与内陆亚洲的研究。1911 年德国人夏德（F. Hirth）和美国人柔克义（W. Rockhill）合注、英译了这部著作，冯承钧早年校注《诸蕃志》时十之六七用夏德和柔克义的注释。韩振华先生多年关注《诸蕃志》的研究，1957 年开始发表对夏德和柔克义注释的翻译和补注，1993 年去世后出版的《诸蕃志补注》[⑦] 是对《诸蕃志》研究的重要补充。

“文化大革命”后波斯阿拉伯与内陆亚洲研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是能够直接使用波斯阿拉伯史料的青年一代学者的成长。

刘迎胜是我国文革后最早攻读研究生学位的学者之一，初随南京大学韩儒林先生，韩先生早在 1940 年的《元史研究之回顾与前瞻》中就提出直接阅读阿拉伯波斯史料原文，与汉文史料作比较研究的主张，“文化大革命”后招收研究生，培养新一代学者时，便有意识地安排他们学习穆斯林语言。察合台汗国为成吉思汗次子察合

---

① 《蒙古学资料与情报》1987 年第 2 期，第 1～10 页。

② 北京：中华书局，1989 年。

③ 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

④ 北京：中华书局，1987 年。

⑤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 年。

⑥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年。

⑦ 《诸蕃志补注》（韩振华选集之二），香港大学亚洲研究出版中心，2000 年。



台所建，立国于我国新疆与境外周边地区，是元代西北宗藩诸国之一。因为察合台汗国研究涉及多种语言的史料，研究难度较大，故至今世界上尚无有关察合台汗国史的专著问世。刘迎胜在攻读研究生期间，被安排赴北大东语系学习了波斯语，在研究察合台汗国发展的博士论文中和其后的研究中，直接利用多种波斯文原始史料，对比研究汉文史料的记载，充分发挥汉一波斯文献比较研究的长处，解决了察合台汗国史上多处长期未决的问题，取得了突出成绩。他研究的主要问题有：察合台的始封地，早期的察合台汗国在蒙古国中的地位，蒙古国时期中亚的绿洲城廓之地的地位，[①] 西北诸王与朝廷的矛盾的来源，[②] 察合台汗国向半独立化发展的契机，[③] 宪宗朝的中亚，[④] 至元年元廷与西北叛王的争夺，[⑤] 大德年蒙古诸汗国的

---

① 《早期的察合台汗国》，载《新疆社会科学》1984 年第 2 期，第 74～84 页。

② 《元初朝廷与西北诸王关系考略》，载《中国民族史研究》，1985 年，第 118～134 页。

③ 《阿里不哥之乱与察合台汗国的发展》，载《新疆大学学报》1984 年第 2 期，第 29～37 页；《论塔剌思会议》，载《元史论丛》第 4 辑，北京：中华书局，1992 年，第 156～165 页。

④ 《元宪宗朝的察合台兀鲁思》，刊于《西北民族研究》1995 年第 1 期，第 128～136 页。《阿剌脱忽剌兀忽里台大会考》，刊于《西域研究》1995 年第 4 期，第 17～25 页。《蒙哥即位风波中的察合台、窝阔台系诸王》，刊于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编：《内陆亚洲历史文化论集——韩儒林先生纪念文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 年，第 69～96 页。

⑤ 《至元初年的察合台汗国》，载南京大学历史系编：《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 9 期，1985 年，第 45～56 页。《元朝与察合台汗国的关系》，载《元史论丛》第 3 辑，1986 年，第 56～81 页。《至元初年以前的垂河流域及其周围地区》，载《蒙古史研究》第 4 辑，1993 年，第 30～57 页. "Mughultai Ba'atur and his Activities in the Region of Khotan"，载《伊朗学在中国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年，第 39～43 页，原文为英文。《忙古带拔都儿及其在斡端的活动》，刊于《西域考察与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 年 9 月，第 331～342 页。

约和，[①] 元代中期的汉文与波斯文史料的比较问题，[②] 脱火赤丞相与床兀儿的金山驻军与察合台汗国的冲突，[③] 都哇死后的察后台汗国，[④] 察合台汗国的分裂，[⑤] 蒙元时代中亚的地理与社会经济状况等，[⑥] 受到国内外同行的关注。[⑦]

刘迎胜在内陆亚洲的研究中，还非常注意汉文文献一伊朗文献以及汉文文献一穆斯林文献的比较研究。20 世纪 80 年代初，刘迎胜注意到 40 年代岑仲勉先生与杨志玖先生之间有关元代文人袁桷所撰《拜住元帅出使事实》（收于《清容居士集》）中“拜住不敢他引古事为比，维昔定宗皇帝征把秃王，有灭国真薛禅使者谏罢征”一句的理解的讨论。杨志玖教授将“把秃王”释为拔都，而

① 《元代蒙古诸汗国的约和及窝阔台汗国的灭亡》，载《新疆大学学报》1985 年第 2 期，第 31～43 页；《〈史集〉窝阔台汗国末年纪事补证》，载南京大学历史系编：《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 10 期，1986 年，第 48～59 页。

② 《哈沙尼和他的〈完者都史〉》，载《蒙古学情报与资料》1985 年第 3～4 期，第 103～104 页。

③ 《脱火丞相与元金山戍军》，载《南京大学学报》1992 年第 4 期，第 34～42 页；《皇庆、至治年间元朝与察合台汗国和战始末》，载《元史论丛》第 5 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年，第 13～49 页，《床兀儿及其家族的活动》，载《西域研究》1993 年第 13 期，第 81～86 页。

④ 《都哇家族汗位继承权的确立——元武宗时代察合台汗国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6 年第 4 期，第 74～79 页；《都哇家族对察合台汗国的统治》，载《西域史论丛》第 3 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 年，第 201～223 页。

⑤ 《元末的察合台汗国》，载兰州西北民族学院：《西北民族研究》1986 年第 2 期，第 77～88 页。

⑥ 《察合台汗国疆域与历史沿革研究》，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3 年第 3 辑，第 30～44 页；《蒙古时代中亚社会经济研究》，刊于《中亚学刊》第 4 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年，第 184～217 页。

⑦ Michal Biran. *Qaidu and the Rise of the Independent Mongol State in Central Asia*. pp. 188～189，Curzon Press Britain，1997.

岑仲勉教授则认为"把秃"乃指"报达"，即"巴格达"，故"把秃王"指统治巴格达的末代阿巴斯王朝哈里发。刘迎胜对比了14世纪马木路克史家乌马里《眼历诸国记行》中对元定宗与拔都之前斗争的描述与波斯文《史集》和汉文资料的记载，支持杨志玖先生意见。① 这一时期，刘迎胜还结合波斯无名氏地理著作《世界境域志》中有关塔里木河与龟兹的记载，与汉文史料中"曲先塔林"和《元朝秘史》中"古先塔里勒"等地名的描述，论证了"曲先塔林左副元帅"与"曲先塔林都元帅府"所辖军队，在至元末至大德初年驻守于今新疆库车塔里木河流域一带，推翻了美国学者达尔德斯（Dardes）有关至元二十六年以后元政府弃守今中亚东部地区的说法。② 蒙元时代波斯文史籍中因包含大量源于突厥语、蒙古语甚至汉语的人名、地名、部名、官号等专门术语，历来是世界波斯历史文献校勘学界中难度较高的研究领域。既往的校勘研究集中于元初成书的《世界征服者传》（*Tarikh-i Jahangusha*）与《史集》（*Jami' al-Tawarikh*）这两部著作。刘迎胜通过对14世纪初波斯史家哈沙尼的《完者都史》（*Qashani*，*Tarikh-i Uljaitu*）的研究，认识到汉－波斯文献比较研究应扩大到元中期成书的波斯文文献。在此基础上，他撰文评述旅美伊朗学者罕伯莉（Mahim Hambaly）的校勘本《完者都史》，指出其多处不足。③ 作者还在已故邵循正教授研究的基础上，将汉文史料与波斯文文献的对比研究从元代向下扩

① 《读〈定宗征拔都〉》，载《内蒙古社会科学》1984年第4期，第63～66页。

② 《元代曲先塔林考》，载《中亚学刊》第1期，1984年，北京：中华书局，第243～252页。作者使用类似方法研究的论文还有《旭烈兀时代汉地与波斯使臣往来考略》，载《蒙古吏研究》第2期，1986年，第21～30页。

③ 《评罕伯莉校勘本〈完者都吏〉》，载《中亚学刊》第3辑，1990年，第283～290页。

及到明初有关永乐年明与帖木儿帝国往来的课题，[①] 又进一步延及明清西域和桌子家族起源研究；[②] 并运用类似研究方法将领域向上伸及唐代汉籍与中国发现的巴列维文铭文的比较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③] 自清末洪钧以来，中国学者开始认识到，波斯文史料中包含许多有关中国古代内陆亚洲游牧民族的记载，其重要性不低于汉籍所记。刘迎胜的研究相对集中于早期蒙古史与蒙古时代以前漠北操突厥语民族的历史文化等课题，研究风格有明显的东西结合的特色。[④]

刘迎胜还将对波斯文献的研究扩展到对中国的波斯语教学史研究方面，已发表学术论文多篇。[⑤] 有关此课题的另一个重点在明代四夷馆所编《回回馆杂字》。为完成此项研究，他先后数次赴欧洲收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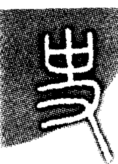
① 《白阿儿忻台及其出使》，刊于叶奕良编：《伊朗学在中国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第 63～75 页。《永乐初明与帖木儿帝国的使节往来》，刊于《庆祝王钟翰教授八十五暨韦庆远教授七十华诞学术论文合集》，合肥：黄山书社，1999 年，第 109～114 页。

② 《沙・马哈木・楚剌思〈寻求真理者之友〉（节选）译注》（上），载《西北民族研究》1993 年第 2 期，第 131～139 页。与刘正寅合作。

③ 《唐苏谅妻马氏汉、巴列维文墓志再研究》，载《考古学报》1990 年第 3 期，第 295～304 页。

④ 参见《9～12 世纪民族迁移浪潮中的一些突厥、达旦部落》，载南京大学历史系编：《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 12～13 辑，1989～1990 年，第 80～106 页，第 19 页；《〈史集，部族志，札剌亦儿传〉研究》，载《蒙古史研究》第 4 辑，1993 年，第 1～10 页（笔名：皮路思）；《蒙古征服前操蒙古语部落的西迁运动》，刊于《欧亚研究》第一辑，北京：中华书局，1999 年，第 29～45 页；并见其学术专著：《西北民族史与察合台汗国史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 年 9 月，第 266 页。

⑤ 主要成果有：《〈米诺哈志〉的作者及其波斯文动词分类原则初探》，载《中亚学刊》第三辑，1990 年，第 258～283 页；《唐元时代中国的伊朗语文与波斯语文教育》，载《新疆大学学报》1991 年第 1 期，第 18～23 页；《明代中国官办波斯语教学教材源流研究》，载《南京大学学报》1991 年第 3 期，第 104～109 页。



集有关资料，已发表论文十余篇，[①] 在日本学者本田实信的基础上，将此项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他近年来对随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穆斯林世俗文化的研究，[②] 也取得了一些成绩。

王小甫利用北京特别是北大东语系的条件，在研究生期间学习了藏文和阿拉伯文，在博士论文《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中直接研究了许多藏文、阿拉伯文原始史料，与汉文史料比勘研究。他仔细考察论证了吐蕃最初进入西域的道路问题，得出吐蕃最初进入塔里木盆地所取的夹在昆仑山和喀喇昆仑山之间的“食盐之路”，再通过“五俟斤路”与突厥诸部连兵；他还较充分地利用阿拉伯文史料，研究了大食对西域的介入，“故此在说明唐朝对葱岭以西诸国的态度

---

① 有关此课题的主要成果有：《〈回回馆杂字〉与〈回回馆译语〉研究》，载南京大学历史系编：《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2～13期，1989～1990年，第145～179页，第180页；《〈回回馆杂字〉与〈回回馆译语〉“天文门”至“时令门”校释与研究》，载《中国回族研究》，第2辑，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25页；《回回字》等百余词条，载《中国回族大辞典》，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回回馆杂字〉与〈回回馆译语〉“花木门”校释》，刊于《中国史论集》，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年7月；《波斯诸语言》，刊于《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第100页；《回回馆译语》，刊于《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第230页；《回回馆杂字》，刊于《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第230～231页；《〈回回馆杂字〉与〈回回馆译语〉“方隅门”“数目门”校释》，刊于《学术集林》卷十一，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第321～341页；《〈回回馆杂字〉与〈回回馆译语〉校释举例》（“器用门”至“文史门”），刊于《中亚学刊》第5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53～299页；《〈回回馆集字诗〉回回文研究》，《文史》1999年第2辑，北京：中华书局，第287～305页。

② 已发表的讨论中国穆斯林世俗文化的论文有：《元代摄思廉、益绵、没塔完里及谟阿津等四回回教职考》，载兰州西北民族学院：《西北民族文丛》第2期，1984年，第176～192页；《13～18世纪回回世俗文化综考》，载《中国回族研究》第1辑，1991年，第93～124页；《对科右中旗夜巡牌阿拉伯字母文字读释的意见》，刊于《民族语文》1995年第3期，第51～55页（与蔡美彪、阿西木，图尔迪、曾延生合作）。

上，执论比较公允”[1]。该书第四章《唐、蕃西域较量的新发展》、第五章《东争唐地、西抗大食的吐蕃帝国》对大食、吐蕃、突骑施和唐朝的关系，都有精彩的研究和对阿拉伯史料的利用。王小甫研究的特别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他同时利用了藏文和阿拉伯文这两种较难使用的文字史料，在当代阿拉伯波斯和内陆亚洲研究中十分突出，能够这样使用史料的学者在当代世界上也仅有两三位。同时他对汉文史料也十分注意，比如对大量敦煌汉文文书的翻检，在数万号杂乱无章的敦煌文书中检出并利用了只有三行的 P. 4698 号敦煌文书，受到敦煌文书研究者的赞扬。[2] 王小甫还发表了《七至十世纪西藏高原通其西北之路》[3]，后又发表《七八世纪之交吐蕃入西域之路》[4]，在论文中，王小甫能够使用穆斯林史料与汉文、藏文史料比勘研究，对当时吐蕃进入西域的通道，提出某些不同于前人的见解。

《西域历史研究（八至十世纪）》[5] 是华涛在其博士论文《突厥语部族在天山地区的活动及其伊斯兰化的开始》[6] 基础上加工整理而成。华涛在博士论文和其他研究中大量利用了阿拉伯文等穆斯林原始史料与汉文等其他史料对比研究，其中关于公元 10 世纪中期天山地区的部族形势的分析，比较精彩，而其中推翻国外学者关于当时中西部天山地区存在一个大葛逻禄政权论断的部分，[7] 表现出对

---

① 荣新江：《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载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北京：三联书店，2001 年。

② 荣新江，上引文。

③ 《春史卞麟锡教授停年纪念论丛》，2000 年，第 305～321 页。

④ 见田余庆主编：《庆祝邓广铭教授九十华诞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 年，第 74～85 页。

⑤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

⑥ 南京大学，1989 年。

⑦ “Central and Western Tainshan on the Eve of Islamization” . *Journal of Asian History*, vol. 27, no. 2, 1993;《文化转型前夕中西部天山地区的政治和经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9 年第 4 期，第 29～38 页；《西域历史研究》第 4 章。



阿拉伯文等穆斯林史料的成功利用。他还先后发表了论文《八至十世纪西部天山地区的葛逻禄部》①、《北庭之战前后的回鹘与大食的关系》②、《北庭之战后的回鹘、吐蕃和葛逻禄》③、《高昌回鹘与{×E“高昌”}契丹的交往》④ 等，都以利用阿拉伯文史料见长。其中关于《九姓回鹘可汗碑》中与大食有关内容的研究，利用阿拉伯文与汉文史料的对比研究，纠正了吉田丰在研究该碑粟特文碑文时对阿拉伯文史料的误用。⑤

波斯阿拉伯文献史料的利用是中国学者特别需要加以重视的问题。除了上述学者对阿拉伯波斯史料的直接利用外，这一方面还有一些较好的研究成果。陈达生在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工作期间，对馆藏的大量阿拉伯文以及少量波斯文碑刻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其成果的集中体现《中国伊斯兰石刻》一书，不仅包括了吴文良较早的研究，而且在国内阿拉伯、波斯文化研究者的帮助下，对新整理的碑刻做了详细译注，对国内外学者了解和利用泉州伊斯兰石刻提供了便利。陈达生在研究碑刻的基础上，还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唐代阿拉伯文献的翻译，宋岘的工作受到国内学者的重视。他译注的伊本·胡尔达兹比赫《道里邦国志》⑥ 是9、10世纪重要的阿拉伯

---

① 与陈得芝合著：《十世纪前的丝绸之路和东西文化交流——沙漠路线考察乌鲁木齐国际讨论会（1990年8月19～21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北京：新世界出版社，1996年，第69～87页。

② 《内陆亚洲历史文化论集一韩儒林先生纪念文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457～465页。

③ 《中亚学刊》第5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41～151页。

④ 《西域研究》2000年1期，第23～30页。

⑤ 林梅村等关于九姓回鹘可汗碑的研究和不同结论见林梅村、陈凌、王海城：《九姓回鹘可汗碑研究》，《欧亚学刊》第1辑，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151～171页；另载林海村：《吉道西风；考古新发现所见中西文化交流》，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第285～320页。

⑥ 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

人文地理著作，对研究唐代西域的历史地理非常又用。宋岘的翻译是中华书局中外交通史丛书中唯一直接从原文（阿拉伯文）翻译成中文的古代域外史籍。宋岘稍后翻译出版的《回回药方》，是中国学者对波斯阿拉伯与中国在自然科学方面交往史的具体研究成果。虽然该书并不是直接与阿拉伯波斯与内陆亚洲的课题有关，但《回回药方》的传入，主要是经由内陆亚洲，并且是元明以来阿拉伯波斯一内陆亚洲一中国三方交通的直接体现。元代的波斯文献的翻译有何高济译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① 和余大钧与周建奇译拉施特《史集》②。这两部书都是研究蒙元历史的重要非汉文史料，虽然汉译是由西方文字译本再次翻译，但它们不仅给对中国学者提供了方便阅读全书的机会，而且提供了西方学者对这两部书的长期研究，具有很重要的意义。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译海答儿《中亚蒙兀儿史》③ 是关于明代内陆亚洲研究的穆斯林史料，对研究当时中亚历史非常重要。但据魏良弢的研究，该书的版本似乎不好。而魏良弢对俄文译本沙·马合木·楚剌思《编年史》的研究和利用，④为他在叶尔羌汗国等方面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六、中国波斯阿拉伯与内陆亚洲研究的前景

中国的波斯阿拉伯与内陆亚洲的研究在20世纪的最后20多年有了相当的发展，这既为20世纪作了很好的结尾，也为21世纪的发展奠定了基础。21世纪中国的波斯阿拉伯与内陆亚洲研究首先必须坚持对非汉文原始史料的研究，如果不能在这一方面有更大的进

---

①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

②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1986年。

③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

④ 《民族研究》，1987年第1期，第99～104页。



展，21世纪的研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进步。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必须重视青年研究者的语言能力的培养，改变目前真正能够直接使用波斯阿拉伯原始史料的学者仅仅为少数几个人的现状。一个便捷的方法是加强与波斯阿拉伯语言院系的联系和合作，吸引波斯阿拉伯语言文化专业的青年学生和教师参与研究，向他们介绍波斯阿拉伯史籍，使他们在从事近现代文学作品的翻译和研究的同时，兼顾与内陆亚洲研究有关的课题。

第二方面的工作是尽快翻译出版与波斯阿拉伯与内陆亚洲有关的史料丛书和史料汇编，使暂时无法直接使用波斯阿拉伯原始史料的学者能够间接利用重要的史料。第三方面的工作是开阔研究领域。至今在波斯阿拉伯与内陆亚洲方面的研究领域还很局限。第四方面的工作是加强与国外学者的交流。

第十章　西藏与内陆亚洲关系研究

研究西藏与内陆亚洲关系史，比较全面和系统地论述唐代吐蕃与周边地区关系的论著是《论藏族文化的起源形成与周围民族的关系》、《麝香之路的西藏宗教文化》、《丝路文化·吐蕃卷》① 等书。此外学术界也从整体上讨论了吐蕃之对外扩张，② 唐宋五代等时期西北和中亚地区吐蕃的部落分布状况，③ 吐蕃对西北地区的经营，以及吐蕃统治下的由各族组成的、以部落为组织形式的特殊群体"通颊"④ 等问题。以下按地区分论如下。

---

① 格勒：《论藏族文化的起源形成与周围民族的关系》，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第 561 页。常霞青：《麝香之路的西藏宗教文化》，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年，第 319 页。张云：《丝路文化·吐蕃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374 页。

② 林冠群：《论唐代吐蕃之对外扩张》，《蒙藏专题研究丛书》，1991 年 4 月，第 73 页。薛宗正：《噶尔家族专国与吐蕃的北部领土扩张——兼论唐蕃间河源、西域争夺》，《西藏研究》1988 年第 4 期，第 17～33 页。

③ 陈庆英主编：《中国藏族部落》，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1 年，第 651 页。另见该书杨铭：《唐代西北吐蕃部落述略》，第 559～570 页。汤开建：《五代宋金时期甘青藏族部落分布》，《中国藏学》1989 年第 4 期，第 50～68 页。

④ 杨铭：《吐蕃经略西北的历史作用》，《民族研究》1997 年第 1 期，第 80～88 页。杨铭：《通颊考》，《敦煌学辑刊》1987 年第 2 期，第 113～117 页。荣新江：《通颊考》，《文史》第 33 期（1990 年），第 119～144 页。

一、古代西藏与青海、甘肃、宁夏及蒙古高原

1. 古代西藏与青海地区及各族的关系。

吐蕃与青海地区各族的关系可以上溯到远古时期，生活在这里的古代羌人和其他民族往来于青海西藏之间，过着游牧的生活。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掘证实了这一事实，西藏地区的昌都卡若文化与黄河上游甘肃、青海地区的仰韶文化、齐家文化等都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吐蕃王朝建立以后，松赞干布和他的后世子孙们很快就通过武力进入今青海地区，吞并了生活在这里的苏毗、白兰、党项、吐谷浑等各族各部，并同唐朝在这里展开了长期的军事争夺，与此同时也发生了密切的经济贸易联系。青海地区的藏族的形成和发展史，以及她与青海各族的交往史就是西藏和青海地区关系史的重要内容之一。在20世纪，学术界对这些问题都程度不同地做了系统和深入的探索。专门探讨这一方面问题的专著有：系统研究青海藏族历史的《安多藏族史略》①、《青海藏族史》②，专门研究青海民族吐谷浑及其与唐代吐蕃关系的《吐谷浑史》③，全面探讨因吐蕃东进而被迫内迁的青海古代民族党项羌活动历史的《唐代党项》④，以及研究青海果洛地区藏族部落问题的《果洛藏族社会》⑤。此外，系统介绍青

---

① 黎宗华、李延恺著：《安多藏族史略》，西宁：青海民族出版社，1992年，第241页。

② 陈光国：《青海藏族史》，西宁：青海民族出版社，1997年，第660页。

③ 周伟洲：《吐谷浑史》，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54页。

④ 周伟洲：《唐代党项》，西安：三秦出版社，1988年，第163页。

⑤ 邢海宁：《果洛藏族社会》，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第260页。

海地方历史的著作，如《青海历史纪要》[①] 等也都涉及到古代青海地区藏族以及藏族和其他兄弟民族关系的历史。

青海藏族是西藏和青海地区之间相互联系的重要中介，在两地的经济文化交流中发挥了十分突出的作用。青海藏族是活动在这一地区的土著民族和部落，与来自西藏的吐蕃军队和部落，以及其他外迁民族共同形成的。关于它的具体内容，便是研究者关心的话题之一，特别是对族源问题进行了探索。[②] 此外，研究者也探讨了吐蕃王朝时期青海地区藏族的社会状况，[③] 白兰部落历史的渊源和周边各族关系问题，[④] 吐谷浑族的来源、迁徙、称谓、地理，以及它同吐蕃的关系问题，[⑤] 活动在青海、西藏交界等广大地区的苏毗人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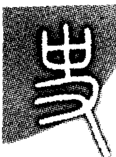
① 青海省志编纂委员会编：《青海历史纪要》，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 681 页。

② 芈一之：《论藏族的来源和形成——兼论青海藏族来源问题》，《青海藏学会论文选辑》（1），1987 年，第 11～27 页。陈光国：《青海藏族族源初探》，《民族学研究》第 2 辑，北京：民族出版社，1982 年，第 37～53 页。李延恺：《从史籍和口碑看看青海藏族的来源及变迁》，《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2 年第 4 期，第 46～55 页。

③ 芈一之：《八至十世纪甘青藏族社会状况述论》，《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6 年第 2 期，第 11～20 页。

④ 周伟洲、黄颢：《白兰考》，《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3 年第 2 期，第 4～12页；聡喆：《白兰国址辨》，《青海社会科学》1982 年第 2 期，第 98～102 页。

⑤ 李文实：《吐谷浑族与吐谷浑国》，《青海社会科学》1981 年第 1 期，第 88～91 页。周伟洲：《关于吐谷浑的来源、迁徙和名称诸问题》，《西北史地》1983 年第 3 期，第 10～17 页。《吐蕃与吐谷浑关系史述略》，《藏族史论文集》，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 年，第 301～319 页。李文实：《吐谷浑国地理考略》，《青海社会科学》1981 年第 2 期，第 94～98、103 页。周伟洲、杨铭：《关于敦煌藏文写本“阿柴纪年”残卷的研究》，《中亚学刊》第 3 期，北京：中华书局，1990 年，第 95～108 页。胡小鹏：《吐谷浑与唐、吐蕃的关系》，《西北史地》1985 年第 4 期，第 47～55 页。邓文科：《试论吐谷浑与吐蕃的关系》，《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7 年第 1 期，第 14～21、31 页。安应民：《略论噶氏家族专权时期唐蕃之间的吐谷浑之争》，《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91 年第 2 期，第 30～36 页。



的历史及其与吐蕃的关系①等问题。

唐朝时期，崛起于西藏雅隆河谷的吐蕃部落建立起强大的王朝，在灭亡吐谷浑国之后，占领青海大部分地区，并在这里与唐朝展开激烈地争夺。对于这一重大历史事实，藏史学界发表了多篇文章进行讨论。② 大非川一战唐朝大败而归，其位置、经过和原因，唐蕃反复争夺的石堡城的位置，③ 唐蕃古道④等，尤其引起人们的注意。改革开放以来，在青海地区的考古发掘有了新的进展，发现了吐蕃时代的一些墓葬遗址，其中都兰吐蕃墓葬的出土引起学者们的巨大兴趣，它充分体现了吐蕃与外界文化交流的广泛和深入。⑤

宋朝时期在今青海等地区影响较大的藏族政权是以青海河湟一带为中心的角厮啰政权，它的祖先据说是来自西藏芒域的高昌（桂仓）。角厮啰在当地贵族的拥戴下强盛起来，成为西北部地区很有实力的一支政治势力，和宋朝、西夏及回鹘等发生了密切的联系，在中西交通史上也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20 世纪 80 年代

---

① 杨正刚：《苏毗大事记》，《西藏研究》1989 年第 1 期，第 23～32 页。杨正刚：《苏毗初探》（1、续），《中国藏学》1989 年第 3 期，第 35～43 页，第 4 期，第 133～142 页。宗喀・杨正刚布：《苏毗与吐蕃及其他邻近政权的关系》，《西藏研究》1992 年第 3 期，第 49～55 页。

② 林冠群：《唐代前期唐蕃竞逐青海地区之研究》，《西藏研究会讯》第 13 期，第 19 页（摘要）。陈楠：《公元七世纪中后期唐、蕃对吐谷浑的争夺》，《海峡两岸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与教学研讨会文集》，1996 年，第 164～174 页。

③ 吴均：《日月山与大非川——佐藤长“西藏历史地理研究”商榷之一》，《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5 年第 1 期，第 13～26 页。黄新亚：《唐蕃石堡城之争辨析》，《青海社会科学》1982 年第 6 期，第 99～105 页。陈小平：《石堡城地理位置考察》，《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7 年第 2 期，第 34～40 页。

④ 陈小平：《唐蕃古道》，西安：三秦出版社，1989 年，第 196 页。青海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青海省志・吐蕃古道志》，合肥：黄山书社，1996 年，第 127 页。

⑤ 许新国：《都兰吐蕃墓中的镀金银器属粟特系统的推定》，《中国藏学》1994 年第 4 期，第 31～45 页。

以后，对这一政权的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出版了系统研究的专著，① 并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分别探讨它的起源、家族世系、主要部落和首领、它同周邻政权的关系，以及它的宗教文化等问题。②

元朝时期，青海的玉树地区是西藏和内地相互联系的驿道的重要关节点，元朝的帝师八思巴就曾经在这里逗留过，对玉树的宗教事业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③ 这里也出现了一些在历史上具有较大影响的人物，一个是元朝的宰相桑哥，另一个是元朝的国师胆巴，关于他们的事迹和功过，学术界进行了探讨。④

明朝时期，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与土默特蒙古汗王俺达汗在青海湖边仰华寺的历史性会见，对藏传佛教北传蒙古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这一事件也受到人们的特别注意，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这一问题，充分肯定它在佛教北传蒙古中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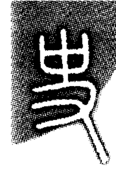
---

① 祝启源：《角厮啰——宋代藏族政权》，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27页；刘建丽：《宋代西北吐蕃研究》，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8年，第438页。

② 李蔚、汤开建：《论角厮啰政权兴起原因及其历史作用》，《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4期，第8～20页。汤开建：《角厮啰家族世系考述》，《青海社会科学》1982年第1期，第76～81页。祝启源：《角厮啰政权形成初探》，《西藏研究》1982年第2期，第68～77页。祝启源：《角厮啰政权主要部落及其首领述略》，中央民族学院编：《藏族研究论文集》，1982年。唐嘉弘：《一个宋代墓志铭的研究——关于角厮啰的历史》，《青海社会科学》1983年第2期，第98～106页。顾吉辰：《角厮啰编年事辑》，《西藏研究》1986年第4期，第54～68页。顾吉辰：《北宋吐蕃政权与同邻的关系》，《西藏研究》1991年第1期，第41～49页。汤开建：《角厮啰统治时期青唐吐蕃政权的历史考察》，《中国藏学》1992年第3期，第97～109页。

③ 周生文、陈庆英：《大元帝师八思巴在玉树的活动》，《西藏研究》1990年第1期，第36～44页。

④ 陈庆英、周生文：《元代藏族名僧胆巴国师考》，《中国藏学》1990年第1期，第58～67页；沈卫荣：《元朝国师胆巴非噶玛巴考》，《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2～13期，第69、70～74页，认为他是萨迦派的弟子。



作用。①

清朝时期西藏与青海地区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其中两个事件引起了人们的研究兴趣，一个是蒙古和硕特部在进入西藏之前先期进入青海地区，一个是罗卜藏丹津之乱。和硕特蒙古进入青海地区，改变了这一地区的历史格局，② 而发生在这里的和硕特蒙古部罗卜藏丹津叛乱事件，同样对当时青海西藏地方的形势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也直接影响到清朝在西藏的政策。清朝政府在坚决平息叛乱事件之后，开始着手改变西藏地方管理体制的努力。探讨这一事件的经过，以及它对青海和西藏局势影响，成为一个热点。③

此外，还有一些论文系统论述青海地区藏族发展的历史。④

2. 古代西藏与甘肃地区及各族的关系。

古代西藏与甘肃河西陇右地区密切的联系始于唐朝“安史之乱”

---

① 蒲文成：《第三世达赖喇嘛来青海活动情况述要》，《藏族史论文集》，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年，第376～392页。芈一之：《达赖、班禅与蒙古汗王的关系——青海历史一桩重大事件》，《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2期，第15～19页。陈玮：《试论仰华寺和青海蒙藏关系——兼谈明王朝治青方略的演变》，《西北史地》1994年第3期，第36～42页。赫吉思：《仰华思与蒙藏关系》《中国藏学》1994年第4期，第114～119页。拉毛措：《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与蒙古的关系》，《中国藏学》1989年第3期，第75～84页。

② 安应民：《浅析和硕特蒙古进据青藏地区的原因》，《兰州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第89～96页。钟福国：《试论清初和硕特蒙古进入青藏高原及其地位和作用》，《甘肃民族研究》1989年第1期，第45～50页。陈光国、王浩勋：《明清时期青海蒙藏关系和中央王朝对蒙藏的政策》，《中国藏学》1989年第1期，第89～101页。

③ 李凤珍：《试论罗卜藏丹津之乱与西藏》，《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2期，第45～55页。蒲文成：《对罗卜藏丹津事件中几个问题的质疑》，《青海史志研究》1987年第1～2期，第5～8页，转16页。芈一之：《论罗卜藏丹津事件》，《青海地方民族史研究文选》第1辑，1986年，第276～287页。

④ 李延恺：《青海藏族古代历史论略》，《青海社会科学》1988年第2期，第96～103页。

以后，当时唐朝大兵东调平叛，河西陇右空虚，吐蕃趁势东进占领原属唐朝管辖的河西陇右地区，直接统治这里达数十年之久。与长期生活在这里的汉族和其他各个民族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本世纪初期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为研究吐蕃人在河西地区的活动，乃至研究唐代吐蕃史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利用敦煌简牍文书来探讨吐蕃进入敦煌地区的相关问题成为学术界十分引人注目的一个热点，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探讨的问题集中在吐蕃攻陷沙州及河西其他地区的时间，① 吐蕃统治这一地区的历史，② 采取包括计口授田、部落组织在内的各项管理措施与制度，③ 在吐蕃统治下生活的各个部落和民族的存在状况，乃至反抗吐蕃

① 苏莹辉：《论唐时敦煌陷蕃的年代》，《大陆杂志》第29卷第7期，第8～11页，1964年。饶宗颐：《论敦煌陷于吐蕃之年代——依顿悟大乘正理决考证》。陈国灿：《唐朝吐蕃陷落沙州的时间问题》，《敦煌学辑刊》1985年第1期，第1～7页。安忠义：《吐蕃攻陷沙州之我见》，《敦煌学辑刊》1992年第1～2期，第21～24页。薛宗正：《乞黎苏笼猎赞在位前期吐蕃盛世与唐朝陇右、河西领疆的陷没》，《甘肃民族研究》1992年第1期，第53～66页。

② 刘进宝：《关于吐蕃经营河西地区的若干问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4年第1期，第13～21页。冯子海、徐丽：《吐蕃统治下的河西走廊》，《西北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5期，第103～114页。马德：《吐蕃统治敦煌的几个问题》，《敦煌研究》1987年第1期，第58～61页。史苇湘：《吐蕃王朝管辖沙州前后》，《敦煌研究》1983年创刊号，第131～141页。

③ 杨铭：《吐蕃统治敦煌研究》，台北新文丰出版，1997年，第1～360页。杨铭：《吐蕃时期敦煌部落设置考——兼及部落的内部组织》，《西北史地》1987年第2期，第34～40页。杨铭、何宁生：《曹（Tshar）——吐蕃统治敦煌及西域的一级基层兵制》，《西域研究》1995年第4期，第49～54页。杨铭：《吐蕃时期河陇军镇机构设置考》，《中亚学刊》第4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13～121页。杨铭：《吐蕃在敦煌计口授田的几个问题》，《西北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5期，第104～115页。金滢坤：《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部落使考》，《民族研究》1999年第2期，第73～77页。谢重光：《吐蕃占领期归义军时期的敦煌僧官制度》，《敦煌研究》1994年第4期，第149～163页。陈庆英、端智嘉：《一份敦煌吐蕃驿递文书》，《社会科学》（甘肃），1981年第3期，第78～81页。



的奴隶起义[①]等。公元861～1015年活动在凉州的六谷部吐蕃政权也引起人们的兴趣，[②]他们与宋朝和西夏都发生了密切的联系。甘肃地区的藏族部落分布及其发展历史，也是学者研究的一个方面。[③]

3. 古代西藏与宁夏地区及党项等各族的关系。

西夏的主体民族党项人原来就生活在青藏高原，与藏族先民在血缘上、宗教信仰上和文化上存在十分密切的联系。吐蕃王朝建立以后直接统治了一部分党项人，他们逐渐地融合到藏族之中了。而不甘吐蕃统治的党项则纷纷内迁今甘肃东部、宁夏、陕西北部和内蒙古南部地区，后来在这里建立了强盛一时的西夏王朝。它与西藏地区依然发生着密切的关系。

学术界重点研究了唐宋时期吐蕃与党项在民族渊源上的密切关系，[④]

---

① 周伟洲：《温末考》，《西北历史资料》1980年第2期，第1～8页。周伟洲：《吐蕃对河陇的统治及归义军前期的河西诸族》，《甘肃民族研究》1990年第2期，第1～10页。郑炳林、王尚达：《吐蕃统治下的敦煌粟特人》，《中国藏学》1996年第4期，第43～53页。杨铭：《吐蕃统治下的河陇少数民族》，《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3期，第56～65页。杨际平：《吐蕃时期沙州经济研究》，《敦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书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357～413页。杨际平：《吐蕃时期敦煌计口授田考》，《社会科学》（甘肃）1983年，第94～100页。王献军：《唐代吐蕃统治河陇地区汉族琐谈》，《西藏研究》1989年第2期，第33～42页。

② 汤开建：《关于公元861年—1015年凉州地方政权的历史考察》（上、下），《西藏研究》1988年第3期，第25～34、88页，第4期，第34～41、58页。杜建录：《潘罗支与河西吐蕃》，《宁夏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第92～98页。

③ 洲塔：《甘肃藏族部落的社会与历史研究》，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96年，第564页。

④ 热贡·多吉卡：《浅析党项的族源问题》，《西藏研究》（藏文版）1987年第3期，第1～11页；张云：《党项名义及族源考证》，《中国藏学》1996年第1期，第58～66页。

藏文史书有关党项和西夏历史的状况,[1] 在吐蕃压力下党项人的内迁及其与各族的关系,[2] 在西夏境内吐蕃人活动地的历史文物,[3] 吐蕃与党项的政治、文化、宗教和民族融合关系,[4] 西夏灭亡以后，西夏的王族是否回迁西藏和其他地区以及双方存在怎么样的关系，也引起学者们的广泛兴趣。[5]

4. 古代西藏与内蒙古地区及各族的关系。

古代西藏与内蒙古地区各族，特别是蒙古族的联系传说开始于成吉思汗时期，据说当时已经有西藏的僧人通过西夏来到蒙古

---

① 黄颢:《藏文史书中的弥药（西夏)》,《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5 年第 4 期，第 56～61 页。杨元芬:《从敦煌藏文翼邦的神话看党项的经济与宗教信仰》,《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5 年第 2 期，第 32～41 页。《简论藏文史籍中关于西夏的记载》,《中国藏学》1996 年第 1 期，第 49～57 页。南色:《浅谈西夏与西夏王朝》,《西藏研究》(藏文版) 1990 年第 3 期，第 31～43 页。

② 周伟洲:《唐代党项》，西安：三秦出版社，1988 年，第 1～163 页。周伟洲:《唐末党项拓跋部割据势力的形成和发展》,《西北民族研究》1988 年第 2 期，第 24～32 页。

③ 王尧:《西夏黑水桥碑考补》,《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8 年第 1 期，第 51～63 页。

④ 黄振华:《略述吐蕃文化对西夏的影响》,《藏族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 260～269 页。史金波:《藏族文化和西夏王朝的历史渊源》,《中国西藏》1989 年第 2 期，第 48～49 页。张云:《论吐蕃与党项的民族融合》,《西北民族研究》1988 年第 2 期，第 49～61 页。张云:《论吐蕃文化对西夏的影响》,《中国藏学》1989 年第 2 期，第 114～131 页。张云:《吐蕃与党项的政治关系初探》,《甘肃民族研究》1988 年第 3～4 期，第 11～24 页。陈庆英:《西夏与藏族的历史、文化、宗教关系初探》,《藏学研究论丛》第 5 辑，1993 年，第 1～55 页。祝启源:《宋代西北地区吐蕃与西夏关系略述》,《甘肃民族研究》1988 年第 3～4 期，第 1～10 页。

⑤ 邓少琴:《西康木雅乡西吴王考》，中国学典馆，1945 年。黄颢:《夏尔巴人族源试探》,《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0 年第 3 期。李范文:《西夏研究论集》，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 年，第 363 页。桑珠:《西夏王族迁入西藏时间献疑》,《甘肃民族研究》1986 年第 4 期，第 62 页转 67 页。卢梅、聂弘音:《藏文史籍中的木雅诸王考》,《民族研究》1996 年第 5 期，第 64～69 页。



地区宣传藏传佛教。而西藏与蒙古的密切联系则开始于窝阔台时期的阔端和萨班凉州会见。也就是在这个时期西藏正式纳入中国中央政府行政管辖之下，从而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作为藏蒙两个民族以及西藏与蒙古两个地区之间的联系也较前有了明显的加强。

20世纪初，学术界已经开始对西藏和蒙古关系进行研究，[①] 40年代，一些学者比较研究了藏族民族英雄松赞干布和蒙古族民族英雄成吉思汗，[②] 通过研究蒙古文史书《蒙古源流》来探讨蒙藏关系中的一些问题，[③] 引发许多新的思考。

20世纪后半期，西藏与蒙古关系史的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70年代可以说是台湾地区蒙藏关系研究的巨大发展时期，80～90年代则是大陆地区在这一领域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就。前期有扎奇斯钦《蒙古与西藏的历史关系》，[④] 后期有王辅仁、陈庆英《蒙藏民族关系史略》、樊保良《蒙藏关系史研究》[⑤] 系统论述两地两族关系。

公元1247年，蒙古汗王和代表西藏地方政教势力的萨迦派法主萨班在凉州（今甘肃武威）会晤，商讨并确立西藏归附大蒙古国的条件，为两个民族，也为西藏历史发展揭开新的一页。对这一事件和相关人物的研究，一直引起大家的兴趣，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绩。

---

① 萧飏曾：《论蒙古与西藏之关系》，《西北杂志》创刊号，第1～18页，1912年1月。

② 陈寅恪：《彰所知论与蒙古源流》，《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卷第3分册，第302～309页，1931年。

③ 黄奋生：《蒙古成吉思汗与西藏松赞刚布》，《蒙藏月刊》第1卷第11期，第16～17页，1941年3月。

④ 扎奇斯钦：《蒙古与西藏的历史关系》，正中书局，1978年，第758页。

⑤ 王辅仁、陈庆英：《蒙藏民族关系史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280页；樊保良：《蒙藏关系史研究》，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73页。

诸如：对双方在凉州会晤，以及对在沟通蒙藏关系中发挥关键作用的历史人物阔端等的研究，① 对大蒙古国对西藏的经略的研究，② 对蒙藏关系在西藏和中原地区关系中作用的研究，③ 对双方早期关系的系统论述，④ 西夏在蒙藏关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⑤等问题都有了新的认识。

元朝时期，西藏与蒙古关系的性质发生巨大变化，成为西藏地方和元朝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其中也涉及地区和民族文化交流的内容。除了蔡美彪等编《中国通史》第7卷⑥，韩儒林主编《元朝史》⑦ 等著作涉及这一方面的内容之外，也出现了一些系统研究这些问题的著作，如《仁庆扎西藏学研究文集》、《元明中央与西

① 周清澍：《蒙藏关系的沟通者——库腾汗》，《内蒙古大学学报》1963年第1期，第103～112页。陈庆英：《关于阔端与萨班会见的几个问题》，《甘肃民族研究》1985年第3～4期，第32～36页。樊保良、水天长主编：《阔端与萨班凉州会谈》，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79页。

② 扎奇斯钦：《蒙古帝国时代对土番的经略》，《边政研究所年报》第2期，第115～154页，1971年7月。张哲诚：《十三世纪蒙古人经略西藏之经过》，《中国边政》第103期，1988年9月。丹林：《多达纳波对蒙藏文化交流和发展的贡献》，《青海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第91～9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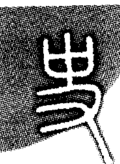
③ 扎奇斯钦：《蒙古与西藏历史上的相互关系和它对中原的影响》，《国立政治大学边政研究所年报》第6期，第25～56页，1975年7月。石硕：《蒙古在连接西藏与中原政治关系中的作用》，《西藏研究》1993年第4期，第87～95页。

④ 张骏逸：《蒙藏早期关系的探讨》，《蒙藏专题研究丛书》，1987年8月。戴发旺：《成吉思汗时期蒙藏关系中两件史实探微》，《青海民族研究》1988年第1期。陈庆英、史卫民：《蒙哥汗时期的蒙藏关系》，《蒙古史研究》第1期，呼和浩特：内蒙古出版社，1985年，第10页。

⑤ 陈庆英：《蒙藏的早期交往及西夏在蒙藏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青海社会科学》1992年第6期，第83～90、39页。

⑥ 蔡美彪等编：《中国通史》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674页。

⑦ 韩儒林主编：《元朝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上册第459页，下册第489页。



藏地方的关系》和《元代吐蕃地方行政体制研究》[①] 等文集和专著。此外，研究重要历史人物八思巴、桑哥等[②]人物，研究元朝在西藏设立乌思藏宣慰使、建立十三万户管理体制和军事政治制度，[③]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元朝在西藏地方采取的一系列措施，诸如建立驿站、进行括户、[④] 西藏地方的帝师制度、白兰王、

---

① 仁庆扎西：《仁庆扎西藏学研究文集》，天津古籍出版社，1989 年，第 267 页。邓锐龄：《元明西藏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关系》，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89 年，第 93 页。张云：《元代吐蕃地方行政体制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年，第 387 页。

② 扎奇斯钦：《忽必烈与八思巴喇嘛》，《史学汇刊》第 2 期，1969 年 6 月。陈庆英：《八思巴传》，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 年，第 197 页。王辅仁、陈庆英：《八思巴传略》，《中国民族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年，第 61～81 页。陈庆英：《元帝师八思巴年谱》，《世界宗教研究》1985 年第 4 期，第 105～123 页。王启龙：《八思巴评传》，北京：民族出版社，1998 年，第 307 页。张羽新：《八思巴事迹考略》，《中国藏学》1997 年第 2 期，第 101～117 页。仁庆扎西：《元朝中央王朝中的藏族宰相桑哥》，《西藏研究》1984 年第 2 期，第 53～59 页。

③ 陈得芝：《元代乌思藏宣慰使的设置年代》，《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 8 集，1984 年，第 1～8 页。沈卫荣：《元朝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统治》，《历史研究》1988 年第 3 期，第 136～148 页。杨仁山：《昔日万户府 今地在何方》，《西藏研究》1985 年第 3 期，第 127～128 页。沈卫荣：《元代乌思藏十三万户行政体制研究》（1、2），《西藏研究》1988 年第 1 期，第 54～61 页，第 2 期，第 38～48 页。沈卫荣：《元代乌思藏十三万户考》，《历史地理》第 7 辑，第 112～125 页。仁庆扎西：《西平王与吐蕃的关系》，《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8 年第 1 期，第 16～18 页。陈庆英：《元朝在藏族地区设置的军政机构》，《西藏研究》1992 年第 3 期，第 38～48 页等；

④ 洛桑群觉、陈庆英：《元朝在藏族地区设置的驿站》，《西北史地》1984 年第 1 期，第 66～75 页。蔡志纯：《元代吐蕃驿站略述》，《西藏研究》1984 年第 4 期，第 52～56 页。张云：《答失蛮其人及其经略吐蕃考实》，《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3 年第 4 期，第 94～98 页。陈庆英：《关于元代西藏的户籍清查》，《海峡两岸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与教学研讨会文集》，第 175～183 页。黄颢：《元初对西藏人口等的普查及其意义》，《中国民族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年，第 135～148 页。

西平王[1]等问题的研究，也有长足的进展。另外，学者们也探讨了这一时期蒙藏关系，元世祖忽必烈与佛教的关系，以及藏传佛教对蒙古地区的影响，双方的文化交流等问题。[2]

明朝时期三世达赖喇嘛和俺达汗的历史性会晤是蒙藏关系的一个重要内容，它对藏传佛教北传蒙古以及密切两个地区和民族之间的关系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也引起学者的特别关注。[3] 明末清初蒙古和硕特部进入并统治西藏地区，则是这一时期蒙藏关系的另一个重要内容，不少论文探讨了和硕特部在西藏的统治问题。[4] 蒙古部在西藏的统治结束后，由于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兴起的缘故，蒙古地区王公百姓到西藏朝佛成为双方关系的新的形式，这就是所谓

---

① 陈庆英：《元代帝师制度及历任帝师》，《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1年第1期，第40～64页，第2期，第8～16页。陈庆英、仁庆扎西：《元朝帝师制度述略》，《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第44～62页。仁庆扎西：《西平王府今地考》，《青海社会科学》1986年第6期，第105～108页。陈庆英：《元朝在西藏所封的白兰王》，《西藏研究》1983年第4期，第29～33页。

② 舒顺林：《元代蒙藏关系论》，《内蒙古社会科学》1991年第3期，第36～40页。陈杭升：《元世祖与吐蕃佛教之关系》，《中国边政》第46期，第10～13页，1974年6月。扎奇斯钦：《蒙古可汗们何以信仰了吐蕃的佛教》，《史料汇刊》第1期，1969年3月。又见扎奇斯钦：《蒙古史论丛》下册，台湾学海出版社，1970年，第937～947页。刘光义：《吐蕃佛教与元世祖》，《大陆杂志》第27卷第5期，第15～19页，1963年9月。

③ 陈杭升：《俺答汗奉佛后对蒙古的影响》，《中国边政》第45期，第6～10页，1974年3月。王美霞：《三辈达赖喇嘛与俺达汗法主关系建立之研究》，台湾西藏研究委员会编《西藏研究论文集》第一辑，台湾文良出版社，1988年，第33～54页。

④ 罗丽达：《明末清初的蒙藏关系和顾实汗入藏事件》，《清史研究集》第5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年，第40～65页。乌云毕力格：《略论和硕特汗廷对西藏的统治》，《西北史地》1988年第3期，第115～123页。赵学东：《蒙古和硕特部统治西藏述论》，《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第4期，第44～51页。



的进藏“熬茶”问题。① 四世达赖喇嘛的认定、五世达赖喇嘛朝清、六世达赖喇嘛真假问题的争论、准噶尔部蒙古扰乱西藏地方等都与蒙古诸部存在密切的关系，②双方的文化交流也不断地趋向密切。③

二、古代西藏与新疆地区及中亚、西亚

作为藏族先民重要来源之一的古代西羌人，很早就往来于西藏和新疆之间，与居住在新疆地区的古代居民过从甚密。吐蕃王朝建立以后，两地的联系开始新的发展时期。这种密切的联系，也与公元7世纪初期吐蕃王朝的军事扩张有关，7世纪中期吐蕃的军事势力已经进入到西域地区，并与唐朝展开了长期激烈的拉锯式争夺战。公元8世纪末期，吐蕃占领今新疆南部广大地区，直接统治这里达数十年之久，到9世纪中期吐蕃王朝瓦解后退出西域地区。吐蕃占领西域地区的历史和它所采取的措施与制度，都受到学者们的关注。

20世纪40年代蒯伯赞发表的《史前羌族与塔里木盆地诸种族的关系》④ 一文，算是比较早研究古代羌人与西域地区关系的论著。直接

① 蔡家艺：《清代中晚期进藏熬茶概述》，《民族研究》1986年第6期，第40～47、61页。蔡家艺：《蒙古进藏熬茶浅议》，《西北史地》1988年第1期，第99～106页。

② 樊保良：《略论四世达赖喇嘛与蒙藏关系》，《中国藏学》1993年第4期，第82～88页。蔡志纯：《论蒙藏封建主围绕真假六世达赖喇嘛展开的争权斗争》，《内蒙古社会科学》1984年第3期，第86～93页。李凤珍：《试论桑结嘉措执政时的蒙藏关系》，《中国民族史研究》，1984年，第1页。

③ 贾晞儒：《藏族文化与蒙古文化的关系》，《西藏研究》1992年第1期，第133～137页。嘎尔迪、闵文义：《十八世纪蒙藏文化关系的确立及其重要意义》，《兰州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第104～111页。

④ 蒯伯赞：《史前羌族与塔里木盆地诸种族的关系》，《中苏文化》第15卷第2期，第32～36页，1944年2月。

而深入地探讨吐蕃与西域地区的关系，则开始于80年代以后。学术界翻译利用藏文文献中有关西域地区宗教文化和民族状况的记载，为西藏和新疆关系史的研究注入新的活力。如对当时吐蕃统治时期于阗地区的佛教流行及其与西藏的关系，[①] 吐蕃人对西域等地各个民族及其分布的认识，[②] 唐朝和吐蕃在西域的争夺[③]及双方的往来交通和密切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④] 吐蕃在占领西域地区后相关的历史人物、[⑤]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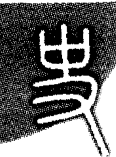
① 王尧、陈践：《于阗教法史——敦煌藏文写卷P. T. 960译解》，《西北史地》1982年第3期，第18～25页。巴桑旺堆：《藏文文献中的若干古于阗史料》，《敦煌学辑刊》1986年第1期，第69～73页。林梅村：《藏文古籍所述于阗王谱系迄始年代》，《新疆社会科学》1985年第5期，第83～90页。

② 王尧、陈践：《敦煌古藏文本“北方若干国君之王统叙记”》，《敦煌学辑刊》第2期，第16～22页。王尧：《P. T. 1188登里回鹘可汗告牒译释》，《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2期，第33～36页。

③ 郭峰：《唐代前期唐、蕃在西域的争夺与唐安西四镇的弃置》，《敦煌学辑刊》1985年第1期，第130～142页。马国荣《唐代吐蕃在新疆的活动及其影响》，《新疆社会科学》1985年第5期，第91～98页。杨建新：《唐代吐蕃在新疆地区的扩张》，《西北史地》1987年第1期，第13～21页。王小甫：《盛唐与吐蕃在西域的较量（720～755年）》，《新疆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第70～77页。

④ 王小甫：《西藏——新疆间最早的交通路线》，北京大学校报《理论副刊》1989年3月12日。殷晴：《古代于阗与吐蕃的交通及其友邻关系》，《民族研究》1994年第5期，第67～72、9页。杨铭：《唐代吐蕃——勃律道考》，西北大学西北历史研究室编：《西北历史研究》1987年号，西安：三秦出版社，1989年，第95～107页。杨明：《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大事纪年”中所记突厥与吐蕃关系考实》，《西北历史资料》1984年第2期，第48～57页。张云：《吐蕃与西域诸族的关系》，《新疆社会科学》1990年第5期，第101～109页。张云：《唐代吐蕃与西域的文化交流》，《甘肃民族研究》1991年第4期，第48～53页。索朗顿珠：《试析古代藏族与属突厥族的北方民族之间的关系》，《西藏研究》（藏文版）1994年第4期。

⑤ 杨铭：《“东叶护可汗”考》，《甘肃民族研究》1986年第3期，第70～74页。又见杨铭著：《吐蕃统治敦煌研究》，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第223～230页。



重要的历史地理问题①以及对这一地区所采取的统治措施与制度②等一系列研究成果的取得，都是与敦煌发现的古代藏文历史文献资料的发掘、翻译和利用密切相关的，尤其不能离开《吐蕃简牍综录》和《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③ 这两部著作。

吐蕃与回鹘的关系，是古代西藏和新疆关系的重要内容，学术界也有不少论著专门探讨他们双方的相互联系，④ 乃至吐蕃、回鹘和其他民族与政权的多方关系。⑤

清朝时期，活动在今新疆境内的蒙古准噶尔部南下进入西藏扰乱地方，并被清朝中央政府平息，这一事件在这一时期两

---

① 杨铭：《吐蕃简牍中所见的西域地名》，《新疆社会科学》1989 年第 1 期，第 87～94 页。高永久：《萨毗考》，《西北史地》1993 年第 3 期，第 46～52 页。

② 张云：《吐蕃在西域的部落及其组织制度》，《甘肃民族研究》1992 年第 2～3 期，第 76～83、31 页。张云：《吐蕃统治西域的各项制度》，《新疆大学学报》1992 年第 4 期，第 78～85 页。张云：《新疆出土简牍所见吐蕃职官考略》，《西域研究》1992 年第 4 期，第 63～72 页。杨铭：《吐蕃统治于阗的若干问题》，《敦煌学研究》1986 年第 5 期，第 39～45 页。杨铭：《吐蕃统治鄯善的若干问题》，《新疆历史研究》1986 年第 2 期，第 20～30 页。高永久、王国华：《吐蕃统治下的于阗》，《西北民族研究》1991 年第 2 期，第 60～66 页。王欣：《吐蕃驿站制度在西域的实施》，《新疆社会科学》1989 年第 5 期，第 119～123 页。

③ 王尧、陈践：《吐蕃简牍综录》，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 年，第 463 页。王尧、陈践译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北京：民族出版社 ，1992 年（增订本），第 212 页。

④ 尹伟先：《840 年之后回鹘与吐蕃的关系》，《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92 年第 2 期，第 50～57 页转 65 页。石羊、明星：《回鹘与吐蕃的文化联系述论》，《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94 年第 3 期，第 90～95、118 页。尹伟先：《畏吾尔族与藏族历史关系研究》，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 年，第 389 页。

⑤ 林冠群：《李唐、回纥、吐蕃三边关系之探讨》，政治大学边政研究所硕士论文，1982 年。樊保良：《回鹘与吐蕃及西夏在丝路上的关系》，《民族研究》1987 年第 4 期，第 63～69 页，等等。

地的关系史上具有突出的位置，受到学者的注意。[①] 黄教在双方的关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新疆的西蒙古部落同样定期去西藏进香“熬茶”，西藏和新疆之间的经济贸易问题也引起人们的关注。[②]

根据藏文史书的记载，早在传说的止贡赞普时期，吐蕃即与“大食”发生了联系，它对西藏的原始宗教本教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唐朝时期，西藏与在中亚和西亚强盛一时的波斯帝国和阿拉伯帝国之间进行了更加密切的接触，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也在20世纪后半期有了新的发展。出现了探讨吐蕃与唐朝、大食三者在中亚地区错综复杂的战和关系的专著[③]以及相关的论述，[④] 对波斯和阿拉伯文献中有关西藏的记载予以分拣，[⑤] 进而也研究了双方之间的交通路线问题[⑥]和往来贸易关系[⑦]。对传说时期的吐蕃和波斯帝国之间的宗教和文化往来关系，学术界也开始予以关注，并取得了初步

① 赵天：《策妄阿拉不坦侵扰西藏的原因》，《西域研究》1996年第2期，第42～45页。

② 马林：《乾隆初年准噶尔部首次入藏熬茶始末》，《西藏研究》1988年第1期，第62～69页。

③ 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357页。

④ 杨明：《唐代吐蕃与大食关系述略》，《历史知识》1986年第4期，第29～30页。

⑤ 杨铭：《8～16世纪阿拉伯波斯文献中的西藏》，《西北民族研究》1996年第2期，第73～87页。

⑥ 霍巍：《从考古材料看吐蕃与中亚、西亚的古代交通——兼论西藏西部在佛教传入吐蕃过程中的历史地位》，《中国藏学》1995年第4期，第48～63页。

⑦ 尹伟先：《青藏高原的麝香与麝香贸易》，《西藏研究》1995年第1期，第108～116页；尹伟先《清代维吾尔族与藏族之间的商业贸易关系》，《中国藏学》1997年第2期，第65～83页。

的成果。[①]

三、古代西藏与南亚

南亚是我国西藏地区的近邻，历史上就存在密切往来，特别是在佛教方面，交往尤其频繁而深入。学术界对唐代吐蕃与南亚各国的关系既有系统的论述，[②] 也有分别的专论，兹就相关问题简要介绍如下。

1. 古代西藏与尼泊尔的关系。

尼泊尔与西藏地区的联系比较早，也比较密切，学术界有关西藏与尼泊尔关系的研究有两个重点，一个是唐朝时期双方联姻，以及当时双方的交通和文化往来关系，一个是清代廓尔喀入侵西藏并被逐出事件。

松赞干布和尼泊尔赤尊公主结亲提升了文化交流的深度与广度，在吐蕃和尼泊尔之间形成了一条经过吉隆县宗喀地方，发挥过巨大作用的交通道路，[③] 通过这条道路，吐蕃和尼泊尔开展了积极而富有成效的文化交流。[④]

---

① 索朗顿珠：《古波斯国与古代西藏关系考》，《西藏研究》藏文版 1992 年第 3 期，第 25～34 页。张云：《本教古史传说与波斯祆教的影响》，《中国藏学》1998 年第 4 期，第 70～80 页。张云：《祆、gshen 与 sanavee 考释》，王尧主编：《贤者新宴》第 1 集，北京出版社，1999 年，第 151～161 页，等等。

② 杨铭：《吐蕃与南亚各国关系史述略》，《西北民族研究》1990 年第 1 期，第 79～101 页。

③ 霍巍：《“大唐天竺使出铭”及相关问题研究》，（日本）《东方学报》第 66 册，1994 年 3 月，第 253～270 页。孙修身：《唐初中尼交通四题》，《中国藏学》2000 年第 4 期，第 64～74 页等。

④ 黄盛璋：《关于古代中国与尼泊尔的文化交流》，《历史研究》1962 年第 1 期，第 92～108 页。霍巍：《吉隆文物古迹与蕃尼道上古代中尼文化交流的若干问题》，《西藏研究》2000 年第 1 期，第 65～77 页。

关于清朝时期廓尔喀入侵西藏并被驱除出境的事件，学术界发表了大批论文予以探讨，[①] 同时也注意到西藏使用尼泊尔银币，以及清朝时期双方的经济往来关系问题，[②] 此外也涉及到西藏和尼泊尔的边界问题。[③]

2. 古代西藏与印度的关系。

西藏与印度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两个时期，一个是吐蕃王朝时期前后印度宗教文化对西藏的影响；一个是1840年以后英国殖民者以印度等地为基地对中国西藏地区所进行的各种侵略活动。

在古代西藏佛教历史文献中比较流行的一种观点认为，藏族族源来自印度。这种说法具有很大的影响。学术界对此给予了认真的研究，探讨这一问题的原委。[④]关于吐蕃王朝时期印度与西藏文化交流、[⑤]

---

① 韩茹：《略论福康安征剿廓尔喀》，《历史档案》1994年第3期，第97～102页。戴逸：《一场未经交锋的战争——乾隆朝第一次廓尔喀之役》，《清史研究》1994年第3期，第1～10页。庄吉发：《廓尔喀的崛起及其入侵西藏的原因》，《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13，1981年5月。庄吉发：《清高宗降服廓尔喀始末》，《大陆杂志》第43卷第2期，1971年8月。张骏逸：《乾隆末年廓尔喀与西藏军事冲突之始末及其影响》，台湾政治大学边政研究所，1977年7月。多嘎次仁：《评析尼藏战争的起因与其过程》，《西藏研究》藏文版1991年第4期，第47～84页。

② 朱祖明：《清代西藏与尼泊尔通商概况》，《经济汇报》第11卷第4期，1945年，第24～27页。肖怀远：《西藏地方货币制度史》，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年。王海燕：《清代在西藏流通的剪碎的尼泊尔银币》，《文物》1985年第11期，第92～95页。

③ 陈乃文、张国英：《唐廓界碑》，《藏族史论文集》，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年，第441～446页。房建昌：《中尼边界初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1992年第3～4合期，第7～21页。

④ 格勒：《关于藏族源于印度说的质疑》，《藏族史论文集》，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年，第320～330页。苏鲁格：《“印、藏、汉同源说”之我见》，《内蒙古社会科学》1987年第6期，第63～67页。

⑤ 星全成：《关于印藏文化交流的几个问题》，《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第1期，第48～55页。



双方的交通道路也引起大家广泛的兴趣。① 这与王玄策出使印度以及汉文史书中的诸多记载有关系，学者们对王玄策这个历史人物也倾注了极大的热情。②

英国统治印度时期对中国西藏地方侵略的问题是西藏与印度关系的另一个热点话题。包括 1840～1841 年森巴侵略西藏阿里地区的战争③和英国在 1888 年和 1904 年先后两次入侵西藏的战争，④ 中国与英印所进行的边界问题交涉和边界划分，⑤ 英国对西藏所采取

① 黄中廑：《中印交通史的考察》，《文化杂志》第 4 期，第 20～26 页，1942 年 6 月。范祥雍：《唐代中印交通吐蕃一道考》，《中华文史论丛》1982 年第 4 期，第 195～227 页。冯汉镛：《唐代西蜀经吐蕃通天竺路线考》，《西藏研究》1985 年第 4 期，第 77～82 页。

② 陆庆夫：《论王玄策对中印交通的贡献》，《敦煌学辑刊》1984 年第 1 期，第 100～109 页。孙修身：《王玄策事迹钩沉》，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 1～281 页。黄盛璋：《中尼边界历史研究》，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编：《边界历史地理研究论丛》，1980 年，第 39～51 页。

③ 陈家琎主编：《西藏森巴战争》，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0 年，第 1～231 页。陆水林：《1840 年～1841 年西藏与森巴在阿里地区之战原委》，《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3 年第 4 期，第 54～63 页。苏发祥：《论森巴战争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西藏研究》1990 年第 4 期，第 45～50 页。

④ 庚年：《文硕筹藏政策及处理隆吐设卡之始末》，《中央亚西亚》第 1 卷第 2 期，第 25～35 页，1942 年 10 月。黄鸿钊：《1904 年英国侵略西藏战争》，《中国藏学》1993 年第 1 期，第 136～145 页。黄鸿钊：《英国侵藏战争和 1890 年“中英会议藏印条约”述略》，《中国藏学》1991 年第 3 期，第 123～133 页。罗荣汇：《1904 年荣赫鹏进军拉萨始末》（上、中、下），《大陆杂志》第 29 卷第 7 期，第 21～27 页；第 8 期，第 23～29 页；第 9 期，第 29～37 页。

⑤ 冯明珠：《析论清季中英西藏交涉中的“主权”问题——兼述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西藏境域及藏印边情》，台湾西藏研究委员会编：《西藏研究论文集》第 2 辑，第 97～154 页，台湾永望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9 年。吴蕤：《清末藏印边界纠纷》，《畅流》第 26 卷第 11 期。周伟洲：《19 世纪前后西藏与拉达克的关系及划界问题》，《中国藏学》1991 年第 1 期，第 54～69 页。黄盛璋、王士鹤：《清代西藏阿里地区中印边界的历史研究》，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编：《边界历史地理研究论丛》，第 7～38 页。

的措施[①]这些方面都出现了系统研究的专著。[②]

3. 古代西藏与不丹、锡金和克什米尔地区的关系。

不丹、锡金和克什米尔地区也都比邻西藏，均与西藏存在密切的交往关系。学者们探讨了1641～1793年之间中国西藏和锡金的关系和双方的边界问题，[③] 探讨了清朝时期中国西藏地方和不丹之间的边界问题。[④]

① 吕秋文：《清季末叶英国对藏政策之研究》，台湾西藏研究委员会编《西藏研究论文集》第2辑，台湾永望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9年，第79～96页。

② 周伟洲：《英俄侵略我国西藏史略》，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69页。杨公素：《中国反对外国侵略西藏地方斗争史》，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第334页。吕昭义：《英属印度与中国西南边疆（1774～1911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355页。王宏伟：《中印边界问题研究》，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8年，第397页。

③ 王文静：《1641～1793年中国西藏与锡金（哲孟雄）的关系》，《中国藏学》1989年第3期，第118～128页。黄盛璋：《清代中锡边界历史研究》，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编：《边界历史地理研究论丛》，第52～61页。房建昌：《中锡边界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1992年第1～2合期，第15～25页。

④ 黄盛璋：《清代中不边界历史研究》，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编：《边界历史地理研究论丛》，第62～69页。

第十一章　中国的内陆欧亚历史语言学研究

内陆欧亚自古以来居住着多种民族，操多种语言和方言。由于中原地区与欧亚大陆各族交往极多，古代中国人很早就已知道在西方和北方的遥远地区生活着语言各异的族群。《山海经》和《穆天子传》等古籍透露了其中的一些消息，先秦文献中也记录了不少人名、地名、族名和其他语汇，但因时间久远，可供参证的资料不足，现在已很难勘同与复原。到了汉代，对包括中国北方和西北地区在内的欧亚大陆的语言状况在汉文史籍中已经有了比较确切的记载，如《史记》、《汉书》中的匈奴语词汇，载于《东观汉记》、《后汉书·西南夷传》用汉字记音的属于藏缅语族语言的《白狼歌》等等。以后历代典籍中都包含有欧亚大陆各民族词语的宝贵资料，古代字书和韵书也搜集了相当数量的这类词语，这对于研究内陆欧亚古代语言的语音、词汇和语法都是非常有用的。

留传至今的内陆欧亚各族的语言学遗产也相当丰富。如突厥语文学家马合木德·喀什噶里于11世纪70年代编写的《突厥语词典》，对突厥语言研究的诸多方面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西夏人（以党项族为主体）自己编写的各种类型的字典、词书如《番汉合时掌中珠》、《文海》、《同音》等等，其种类之多与水平之高足以与中古时期的汉语音韵、文字典籍相媲美。蒙、满、藏族也有悠久的语文学传统和成果。元世祖忽必烈命国师八思巴仿藏文创制的“蒙古新字”（今通称“八思巴字”），除了用于拼写蒙古语之外，也用来拼写汉语、藏语、回鹘语和梵语等。明清时代的四夷馆（清代后改称四译馆）、会同馆等编纂了一大批总称为《华夷译语》的对译辞书，

其中包含许多内陆欧亚的语言资料。明四夷馆中的回回馆和高昌馆是专门负责当时中亚、西亚诸国官方往来文书的翻译和培养译臣的机构，有的学者将明四夷馆称为我国最早的亚洲学院。①

清代中叶以后，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西北边疆问题成为国人注意的焦点之一，西北史地之学由此而兴。徐松、张穆、何秋涛和后来的洪钧、屠寄、柯劭忞等都留下了有价值的著作，其中也有人注意到内陆亚洲的语言，较早的如龚自珍。沈曾植（1850～1922 年）是一位渊博的学者，他承定庵辈之余绪，冶汉宋于一炉，精研西北、南洋史地，辽、金、元史和佛学，在所著《海日楼札丛》等书中对内陆欧亚的古代语言状况时有论述，并对其后的王国维、陈寅恪等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在我国对内陆欧亚历史语言学的真正科学的认识和研究，则始于 20 世纪 20 年代至 30 年代初。本篇的目的，是对中国近百年来的内陆欧亚语言的历史研究的状况（包括理论探索和具体研究成果）作一个简要的回顾。

第一节　对内陆欧亚语言的谱系分类和理论探索

一、历史比较法的运用

众所周知，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兴起是与对印欧语的研究密不可分的。早在 16 世纪，人们就已经察觉欧洲使用的意大利语、凯尔特语、日耳曼语以及波罗的和斯拉夫语与远在印度使用的所谓“雅利安语”存在相似性。英国的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爵士在 1786 年第一个提出这些语言可能有共同祖先，这就是所谓“印欧语

① 刘迎胜：《古代中原与内陆亚洲地区的语言交往》，《学术集林》卷七，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 年，第 191 页。



系假说"。此说对历史语言学的奠基起了重要的激励作用。特别是对梵语的研究将人们引向了广阔的印欧语言学领域。拉斯克（R. C. Rask）、格林（Jacab Grimm）、葆朴（Franz Bopp）、施莱歇尔（A. Schleicher）、本费（Theodor Benfey）、缪勒（M. Müller）、德尔布吕克（B. Delbrück）、保罗（H. Paul）、布鲁格曼（K. Brugmann）等都对此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使历史比较语言学在19世纪下半叶达于极盛。① 除印欧语外，这时对非印欧语系的语言的研究也取得了成果。如克拉普罗特（H. J. Klaproth）研究过满、蒙、汉、藏、日等语言，著有《亚细亚语言手册》(1823年)、《亚细亚论集》(1826～1828年）等。再如顾路柏（W. Grube）早在1896年就发表了名著《女真语言文字考》，并对汉藏语进行历史比较和类型研究，还研究过尼夫赫语（吉尔雅克语）。

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原理和方法何时传入中国，并对中国的语言研究产生影响，目前还无法作出明确的回答。但早在1919年，王国维就从日文转译了伯希和的《近日东方古言语学及史学上之发明与其结论》，在原文谈到我国新疆出土的古代印欧语材料时，王氏加了按语："印度欧罗巴语系亦谓之阿利安语系，即梵语、古波斯语、希腊语、拉丁语、峨特语等之总名，皆自同一母语出，其语昔分十种，皆谓此外更无属此系之言语。至新疆诸古文字出，乃知其不然。"说明他对印欧语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状况，已经有了相当正确的认识和了解。②

至1923年，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创刊号发表了印度学家钢和泰（Baron von Staël Holstein）的《音译梵书与中国古音》。③ 作者虽然并不是汉学家，但这篇文章在中国历史语言学的发展史上有深

① 裴特生著、钱晋华译：《十九世纪欧洲语言学史》，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年。

② 《观堂译稿上》，载《王国维遗书》第14册，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第24页下。

③ 第47～56页。

远影响。该文认为：研究汉语音韵的材料有三个重要的来源：一是汉语方言，二是汉—外语的对音与译音，三是反切与韵表，其中汉—外语的对音与译音尤以梵—汉对音最为重要，“梵咒的音读因为有宗教的性质，故在中国古音学上的价值比一切非宗教的译音格外重要”。反映胡适观点的《国学季刊》发刊词还明确地指出：“在音韵学上，比较的研究最有功效。”这说明了当时中国学术界对语言学中的历史比较法的认同。

也是在 1923 年，陈寅恪在一封信里说：“我今学藏文甚有兴趣，因藏文与中文，系同一系文字。如梵文之于希腊拉丁及英俄德法等之同属一系。以此之故，音韵训诂上，大有发明。因藏文数千年已用梵音字母拼写，其变迁源流，较中文为明显。如以西洋语言科学之法，为中藏文比较之学，则成效当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① 所谓“中藏文比较之学”，实际上就是后来说的汉藏语系的历史比较语言学。但由于作者的主要兴趣是在历史和佛教方面，故未予深论。

1932 年，陈氏在著名的《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文中进一步指出：“欲详知确证一种语言之特殊现相及其性质如何，非综合分析，互相比较以研究之，不能为功。而所与互相比较者，又必须属于同系中大同而小异之语言。盖不如此，则不独不能确定，且常错认其特性之所在。”② 与此同时，他在另一封信里也说：“今日之议论我者，皆痴人说梦、不学无术之徒，未曾梦见世界上有藏缅系比较文法学，及印欧系文法不能适用于中国语言者，因彼等不知有此种语言统系存在，及西洋文法亦有遗传习惯不合于论理，非中国文法之所应取法者也。”③ 这说明中国学者已经注意到在研究汉藏系语

① 刊于《学衡》第 20 期文录（1923 年）。此据《陈寅恪书信集》，北京：三联书店，2001 年，第 1 页。

② 见《金明馆丛稿》第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第 222～223 页。

③ 陈寅恪：《致傅斯年（二十一）》，见《陈寅恪书信集》，北京：三联书店，2001 年，第 42～43 页。



言和其他内陆亚洲语言的历史时，不能机械地照搬印欧语系历史比较语言学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套方法，而必须顾及不同语系语言的各自特点。

在汉藏语方面，中国学者最早用两种语言的数目字以及其他语言的词汇来系统地进行比较的是王静如。他于1927年写成论文《中台藏缅数目字及人称代词语源试探》。[①] 他也是中国学者研究西夏语的开创者之一。1930年发表《西夏文汉藏译音释略》[②]，用古代汉语西北方音和藏文译音解释西夏文字的音韵，并对西夏语音系统及其特点作了说明。1932～1933年，又著《西夏研究》三辑，[③] 对西夏语文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并以汉、藏两种文字对照，对四部西夏文佛经逐字进行对译。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从事汉藏比较语言学研究的主要学者有李方桂、闻宥、罗常培、董同龢、芮逸夫、俞敏、傅懋勣、马学良、严学宭、邢公畹以及周法高等，都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被誉为我国“非汉语”研究之父的李方桂在古代藏语研究方面贡献甚多，晚年在藏文碑刻上用力尤勤，与其弟子柯蔚南（South Coblin）合著的《古藏语碑文研究》于1987年6月著者逝世前两个月出版。[④] 罗常培的《唐五代西北方音》[⑤] 一书是依据敦煌发现的材料，用译音对勘方法研究汉语方言史的代表之作，影响很大。以后日本学者高田时雄又根据罗书未及利用的一些新材料，研究唐五代西北方音，写成《依据敦煌资料的汉语史研究——九、十世纪的河西方言》[⑥]，对罗书所未备者有所补充和订正。

---

① 1931年发表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本第1分，第49～92页。

②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本第2分，第171～184页。

③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甲种之八，1932年；甲种之十一，1933年；甲种之十三，1933年。

④ 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九十一，1987年。

⑤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甲种之十二，1933年。

⑥ 东京：创文社，1988年。

1937年，李方桂在《中国的语言和方言》[①] 里提出了我国汉藏语系的分类表，建立了汉藏语系分类的基本框架。1973年李氏在美国出版的《中国语言学报》又发表了该文的修订稿，坚持认为汉藏语系包括汉语、台语族（也称壮侗语族或侗台语族）、苗瑶语族和藏缅语族。[②] 这一分类法至今还有很大的影响。1972年，美国学者白保罗（Paul K. Benedict）在马提索夫（J. A. Matisoff）的帮助下出版了《汉藏语概论》，把壮侗语和苗瑶语从传统的汉藏语系中清理出去，然后又把苗瑶语族和台语族归入澳台语系，把台语族改称加岱语族。[③] 20世纪90年代以来，法国学者沙加尔（Laurent Sagart）提出汉语和澳台语系有发生学关系，引起中国学者的关注，邢公畹首先表示赞赏，并引用考古学家张光直的意见，认为从新石器时代开始，黄河流域的尚未显现出差别的汉藏南岛综合体开始向中国西南部移民，结果分化出“汉藏群”和“南岛群”，前者仍留在北方，后者则通过一系列的海上迁移活动，更进一步地分化。[④] 另外两位中国学者郑张尚芳和潘悟云则在坚持侗台语和苗瑶语与汉藏语关系密切的基础上，采纳沙氏的意见，提出建立一个包括汉藏语、南亚语和南岛语的上位大语系，称作“华澳语系”。[⑤] 1994年7月，语言学家王士元（William S—Y. Wang）在香港城市大学发起一次专题研讨会，主题是“汉语溯源”，会议论集 *The Ancestry of Chinese Language* 已作为《中国语言学报》的第8号专刊于1995

---

① “Languages and Dialects of China”, *Chinese Year Book*, Shanghai, 1937。此据下注修订稿。

②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Vol. I, 1973, pp. 1～13。

③ *Sino－Tibetan: a conspectus*. Contributing editor, J. A. Matisoff. New York: Camk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2。

④ 邢公畹：《关于汉语南岛语的发生学关系问题》，《民族语文》1991年第3期，第1～14页。

⑤ 潘悟云：《华澳语系假说的若干支持材料》，美国《中国语言学报》专刊8，1995年，第113～144页。



年出版,[①] 收入了白一平（William H. Baxter)、蒲立本（E.G. Pulleyblank)、沙加尔、斯达罗斯廷（Sergai Starostin)、白乐思(Robert Blust)、秦维廉（William Meacham)、帅德乐（Stanley Starosta）和中国学者潘悟云、游汝杰、郑张尚芳、李壬癸、龚煌城等的文章及评注，并附有一个很有用的书目。

现在，由丁邦新和孙宏开共同主持的跨世纪项目“汉藏语同源词研究（1998～2003年)”正在进行，该项目希望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继续前进。项目包括收集汉语、藏缅语、苗瑶语、南亚语、南岛语约100种以上的语言或方言资料，试探采用各种现有的理论与方法以及计算机处理手段，集中研究不同层次的同源词以及相关的各种问题，如各语族之间的关系、适合汉藏语系亲属关系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原始汉藏语的语音系统等等。由于这方面的工作已经超出了内陆欧亚的范围，我们不拟在此再加评述。我国学者在藏缅语的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限于篇幅，这里也从略。有兴趣的读者请参看《汉藏同源词研究（一）——汉藏语研究的历史回顾》[②] 及其所附文献，较详细的书目见黄行、江荻主持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论著文摘数据库》[③]。

中国西北地区特别是今新疆，从远古到中世纪早期的人种状况是欧罗巴型人种占优势，这已为人类学、考古学和语言学研究初步证实。古代印欧系语言，主要是吐火罗语，稍后还有印度—伊朗语族诸语，与汉藏语系也有联系。加拿大汉学家蒲立本从音韵结构和同源词两个方面论证汉藏语和印欧语的关系。[④] 他所构拟的上古汉

---

①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No. 8*, 1995, Berkeley, U.S.A.

② 丁邦新、孙宏开主编，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2000年。

③ http://www.cass.net.cn/s10-mzs/mzshome.htm.

④ E.G. Pulleyblank, “Early Contacts between Indo-Europeans and Chinese”,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Chinese Linguisties*, Vol. I.1, 1996, pp.1～24.

语元音只有两个即 * ə 和 * a，而且它们有“元音交替”的关系。德国华裔学者张聪东也作过这方面的探索。这种两元音系统与原始印欧语是相对应的。在声母方面，他也找出若干对应规律。他还提出汉藏和印欧同源词二十余个，并认为上古汉语里的“马”、“车”和天干地支等名称是从印欧语借入的。根据上述考察，得出汉语和印欧语有亲属关系的结论，两者分化的年代在六千年之前。周及徐最近完成的博士论文《汉语—印欧语词汇比较》[①] 运用历史语言学方法，对上古汉语和古代印欧语词汇进行比较，找出了 700 多组对应关系词，319 组对应的同族词，47 个对应的基本词汇（根据 M. Swadesh 的 100 词基本词表），62 组有对应关系的同音词，以及一些构词成分的对应。这篇学位论文通过归纳比较认为：上古汉语和古代印欧语之间存在着有规律的语音对应，存在着大量的词汇对应，甚至存在着相似的形态因素。结论是：汉语和印欧语在史前时期有过密切关系，至于这种关系是同源还是接触交流，则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欧亚大陆自古生活着大量说阿尔泰语系诸语的部族和民族。对阿尔泰语的历史比较研究也有近二百年的历史，但在整个语系的历史探索上，至今没有取得比较一致的看法。西方学者曾将乌拉尔语（包括乌戈尔·芬兰语族和萨莫耶德语族）与阿尔泰诸语联系起来，合称“乌拉尔—阿尔泰语系”，并且做了大量的比较研究。但到 20 世纪初以后，乌拉尔—阿尔泰假设引起了越来越多学者的怀疑，多数人认为，这两个语系的语言在结构方面的相似大多可以从类型上予以说明，这是由彼此间的相互接触和影响而产生的，不一定可以作为有共同的历史起源的证据。但现在仍有少数学者坚持认为乌拉尔—阿尔泰假设可以成立。在是否存在阿尔泰语系这一基本问题上，学者间也存在很大的意见分歧。有人认为：阿尔泰语系包括突厥、

---

① 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 年。

蒙古、满—通古斯三大语族。另有一种意见认为朝鲜语、日本语也应属该语系，其中主张朝鲜语可归属于阿尔泰语系之说论据较为充分。还有人认为：突厥、蒙古、满—通古斯语是各自独立的语系，并不存在同源关系。非同源论者一般并不否认这些语言之间存在相同或相似成分，但认为这是由于长期以来区域上的相互联系、相互借用，或者是由于类型上的相似、原来各自独立现象的趋同等原因造成的。

一般公认的阿尔泰语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创建者是芬兰学者兰司铁（G. J. Ramstedt），他为阿尔泰系诸语建立了一系列语音对应和演变规律（如"兰司铁—伯希和定律"、"Z音化和S音化问题"、"突厥语与蒙古语词首辅音对应规律"等），以后鲍培（N. Poppe）、科特维奇（W. Kotwicz）等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阿尔泰诸语亲缘关系理论反对者的代表人物是克劳森（J. Clauson），还有多费尔（G. Doerfer）、西诺尔（D. Sinor）、谢尔巴克（A. M . Шербak）等。另一部分学者不否认阿尔泰诸语的亲缘关系，但认为现有证据还不能充分证明这一理论，因此，他们以为目前还不能下结论，代表人物有本青（J. Benzing）、李盖提（L. Ligeti）等。

我国有极其丰富的阿尔泰语古代文献和语言资源，但阿尔泰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开展较晚，至今发表的论著，一般只能说是对语族间关系的某些问题的比较研究，还谈不上母语的构拟、语言发展层次的探索和对借词、同源词的界限与区分原则的深入研究。最早著文介绍阿尔泰系语言的是董同龢，他在《阿尔泰系语言概说》①中，依据J. Deny的研究成果，分别介绍了阿尔泰语民族及其语言的分布、特点和分类等。1949年以后，有关的论文也不很多，可以举出的如清格尔泰、刘照雄的《阿尔泰语文学概述》②、陈乃雄的《阿

① 《边政公论》第2卷第9～10期（1943年），第32～40页。

② 见《民族语文研究文集》，西宁：青海民族出版社，1982年，第353～365页。

尔泰语系概要》[①]、林莲云的《我国阿尔泰语言的谐音词》[②]、金炳喆的《蒙古、突厥、满——通古斯三个语族共有词的探讨——〈五体清文鉴〉研究》[③] 等。有关阿尔泰语系语言的历史比较的通论性著作，除翻译的以外，在我国尚未出现。

自20世纪20年代起，我国历史学家在从事边疆史、西域史、中外交通史和蒙元史的研究时，除利用汉文史料外，也开始积极利用阿尔泰系诸语言的材料进行参证。在王国维以后，其中取得较突出成绩的有冯承钧、张星烺、陈寅恪、岑仲勉、方壮猷、韩儒林、邵循正、王静如、冯家昇、翁独健、张广达等，他们都在考释古文献和审音勘同方面有所贡献。近二十年来，这些方面的研究又有了新的进展，取得了一批新的成果。

在介绍和引进国外的研究成果方面，不能不提到20世纪上半叶对日本学者如白鸟库吉等的论著的译介。大致从白鸟库吉开始，在有关古代非汉族人名、地名及与之联系的史事研究上，往往将古代汉语的译名的发音与各种边疆语言和外族语作对比，以推定其原来的词汇，这就是所谓“对音”方法。这种方法对于历史研究无疑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也取得了不少有意义的成果，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但在早期的研究中，因为汉语古音的重建、构拟和阿尔泰系诸语的历史比较研究都处于幼年时期，缺乏科学基础，所得出的结论有时既不合乎语言学原理，也与历史事实不符。诚如陈寅恪在1937年所说：“白鸟之著作，盖日人当时受西洋东方学影响必然之结果，其所依据之原料、解释，已依时代学术进步发生问题，且日人于此数种语言尚无专门威权者，不过随西人之后，稍采中国材料以补之而已。”[④] 1931年，旅居中国、任教于清华大学的俄国人类学家和民

① 见《语言调查研究讲座》，1986年，第49～75页。

② 《民族语文》1984年第5期，第28～35页。

③ 《民族语文》1990年第4期，第34～41页。

④ 陈寅恪：《致陈述（三）》，见《陈寅恪书信集》，第183页。

族学家史禄国（S. M. Shirokogoroff）在北京出版专著 *Ethnological and Linguistical Aspects of the Ural-Altaic Hypothesis*①，对有关乌拉尔—阿尔泰假设的民族学和语言学问题进行讨论，但没有引起中国学者的任何反响。这种情况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特别是近年来有所改变，兰司铁的《阿尔泰语言学导论》的中译本②和著名阿尔泰语学者如符拉迪米尔佐夫（Б. Я. Впадимирцов）、鲍培、克劳森、李盖提、门格斯（K. H. Menges）、葛玛丽（A. von Gabain）、罗纳塔什（A. Róna-Tas）、服部四郎等的论著的译文相继刊行，对于我国开展阿尔泰语系各族的语言和历史的研究都是非常有益的。

在印欧语系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方面，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我国尚未开展。但有一部分学者从事印度学、伊朗学研究，成绩显著，近年来研究范围还扩展到赫梯语等安纳托里亚语言。东北师大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出版的西文刊物《世界古典文明史杂志》自20世纪80年代中叶创刊以来，以其相当高的学术质量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关注和重视。至于乌拉尔语言和古亚细亚诸语的研究，国内学者很少涉及。但凌纯声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即已指出：在上古时代，“我们可以说，周民族以东，自中国沿海岸，经朝鲜半岛直达亚洲极东北的一带所居的许多民族，非但很有关系，也许是同一民族，这个民族，既非东胡，亦非通古斯，他们是属于古亚洲族”③。当然，古亚细亚语是个语群，并非单一语言。不过凌氏的说法还是很有见地的。李盖提、蒲立本等认为匈奴人很可能说一种属古亚细亚语的语言，如叶尼塞语组的Ket语。蒲氏所著《上古汉语的辅音系统》的附录《匈奴语》一文对此作了论证，已

---

① 刊于《清华学报》第6卷第3期，第199～396页。

② 陈伟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③ 凌纯声：《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1934年原刊本，第41页。原书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甲种之十四。

译为中文[①]。对 Burushaski 语与高加索诸语的研究，在我国也还是有待填补的空缺。

二、研究方法的再检讨

对语言系属关系问题的研究，现在普遍重视同源词的探讨。但是，目前还没有普遍认可的关于同源词的理论与方法。有些学者认为印欧语系历史比较语言学所使用的树形图模式具有局限性，未必适用于世界上各种类型的语言。

主要由德国和意大利学者组成的“新语言学派”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就对“谱系树理论”提出质疑，该派代表人物之一朋芳特（G. Bonfante）认为，不存在某种固定的、神圣的、无可置疑的从“原始母语”中派生出来的语音规律。[②]

日本学者桥本万太郎的著作《语言地理类型学》在 20 世纪 80 年代被译为中文。[③] 作者认为：人类语言随着时地的不同，以不同的方式发展起来，其类型大致分为“牧畜民型”和“农耕民型”。古代印欧人和阿拉伯人，因为畜牧和通商，人口急剧移动，形成了区域集团，所以他们的语言比较容易建立起谱系。相反，以定居农耕为主的东亚大陆，语言的发展是由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渐渐向周围扩展，缓慢同化周围的语言。只有通过语言结构的区域性外貌变化，同时尽可能与纵的演变相对照，才能追溯到这种语言的亲属关系。因此，把谱系关系这一针对印欧语的理论，“轻信为适用于人类语言科学的普遍真理、绝对真理，这就束缚了跟印欧语发展不相同

① 《上古汉语的辅音系统·附录》，见该书第 163～201 页，北京：中华书局，1999 年。

② 朋芳特：《论新语言学的立场》（1947 年），中文节译见《汉语史研究集刊》第四辑。成都：巴蜀书社，2001 年，第 345～362 页。

③ 余志鸿译：《语言地理类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年。



的语言发展的研究”。① 他认为亚洲大陆的语言演变以缓慢的同化和不断借用为基础，不同于印欧语系诸语言有长期独立的过程。

我国学者亦有这方面的论述。如王均认为，把现代诸亲属语言和方言看成是从一个上古完全统一而无方言差异的“原始母语”分化的结果，认为在古代只有语言前后相承的关系，而没有语言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社会变异，这是难以想像的，因此，对印欧语之外的语言谱系树形图的实际意义表示怀疑。② 道布结合中国历史提出，大概从新石器时代以来，语言发展的趋势已经表现为不断的接触与融合，进行比较研究，与其把分化作为基点，不如循着语言接触与融合的思路去具体考察语言之间关系的形成与发展。③ 即以阿尔泰语系而论，越往后族体的名称越少，这种名称的减少意味着族体的合并（融合），族体的融合也意味着语言的接触与融合。

关于语言接触与融合，还可以提到陈保亚的论著《论语言接触与语言联盟》④，他所提出的语言联盟理论的核心，是通过词表分级以及词在不同词集数量上呈现的分布曲线来判断语言之间的关系。另有学者提出语言影响论（如戴庆厦、罗美珍），认为一种语言（甲语言）长期受到另一种语言（乙语言）的影响，慢慢地甲语言只保留了某些特点，大部分已被乙语言同化，导致语言的“质变”；如汉藏语系内部的亲属关系实际上在存在两种类型：一是由原始母语分化出来的亲属语言，二是由语言影响形成亲属关系，这是不同于印欧语系的重要特点之一。王敬骝最近提出“华夏语系说”⑤，认为中

---

① 余志鸿译：《语言地理类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80页。

② 王均：《〈民族语文〉前程似锦——在〈民族语文〉创刊十周年学术交流会上的讲话》，《民族语文》1989年第1期，第4页。

③ 道布：《关于语言比较研究的几点思考》，《民族语文》1997年第3期，第1～5页。

④ 北京：语文出版社，1996年。

⑤ 见王敬骝提交第34届国际汉藏语言暨语言学会议的论文，昆明，2001年。

华民族的主体民族汉族是由古代的越人、夷人、羌人、苗人等融合而成，这些民族的语言可以总称为“华夏语系”，其中古代的越语、夷语、羌语等，本来不是出于一个共同的母语，因此这些语言中的同源词，包括一些基本词汇方面的同源词，乃是长期接触、互相交流的结果。芒・牧林对汉、藏、蒙、满、突厥五种语言进行比较，认为这几种语言之间有着严整的语音对应，在构词规则和语法方面也有相同或相似的痕迹，因此汉藏语系和阿尔泰语系之间极可能存在亲属关系①。他将这两个语系合并为一个语系，也称为“华夏语系”，并强调这种亲属关系不能用接触或借用关系来解释。可见，现今在语言亲属关系的研究方法上已经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但究竟何种方法和理论符合语言发展的实际，则尚有待于大量语言事实的检验。②

研究历史语言学离不开对使用语言的人民的历史和文化史的研究。例如，东北和北方地区的史前文化背景中出现了阿尔泰语系的蒙古语、突厥语、满—通古斯语和朝鲜语，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地区的史前文化背景中出现了汉藏语系的语言，西北地区特别是新疆的史前文化背景中出现了印欧语系的语言。这方面的工作还有待大大加强。邢公畹讨论了汉藏系民族的史前文化，著有《汉藏系语言及其民族史前情况试析》③、《汉藏语系研究和中国考古学》④。吴安其有长篇论文《汉藏文化的历史背景和汉藏语的历史分布》⑤。俞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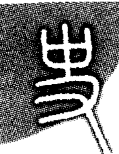
① 芒・牧林：《试探汉藏阿尔泰语系亲缘关系》，第 34 届国际汉藏语言暨语言学会议论文，昆明，2001 年。

② 张琨：《中国境内非汉语研究的方向》，见《中国语言学论集》，台北：台湾幼狮月刊社，1977 年，第 246～265 页。

③ 《语言研究》1984 年第 2 期，第 159～172 页。

④ 《民族语文》1996 年第 4 期，第 18～28 页。

⑤ 见《汉藏语同源词研究（一）》，2000 年，第 309～426 页。



的《汉藏两族人和话同源探索》①、《东汉以前的姜语和西羌语》②、《汉藏文献学互相为用一例》③，都是围绕汉、藏、羌文化史展开讨论的。徐文堪的“The Discovery of the Xinjiang Mummes and Studies of the Origin of the Tocharians”④，则讨论了吐火罗语和吐火罗人的起源问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蒲立本的《上古时代的华夏人和邻族》⑤，有游汝杰中译文⑥。此文对上古时代我国的民族和语言情况作了全面论述，涉及北狄、匈奴、突厥、东胡、鲜卑、貊、秽和印欧等族及其语言。文中认为，中国西北部可能是汉藏人的共同家园；东夷人与南亚人可能有语言学上的联系，并影响了夏和商；周可能出自西部的羌、戎，等等。凡此均自成一家之言。余太山的新著《古族新考》⑦探讨了古代印欧语民族塞种的渊源，认为“似乎还不妨进一步认为少昊氏、陶唐氏和有虞氏同样有欧罗巴种的嫌疑”。饶宗颐的《上古塞种史若干问题——〈于阗史丛考〉序》⑧，对上古时期的东西方语言、文化交流亦有所讨论。

三、三个窗口——考古学、遗传学和语言学

有了人，才有人类语言，才有人类文化。近年来对现代人的起

---

①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1期，第45～53页。

② 《民族语文》1991年第1期，第1～11页。

③ 《语言研究》1991年第1期，第128～132页。

④ *The Journal of Indo-European Studies*，23，3～4，1995，pp. 357～369.

⑤ E. G. Pulleyblank，“Chinese and its neighbors in prehistory times”，见 *The Origin of Chinese Civilzati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3，pp. 411～466.

⑥ 《扬州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第一辑，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第343～376页。

⑦ 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

⑧ 《中国文化》第八期，1993，第165～17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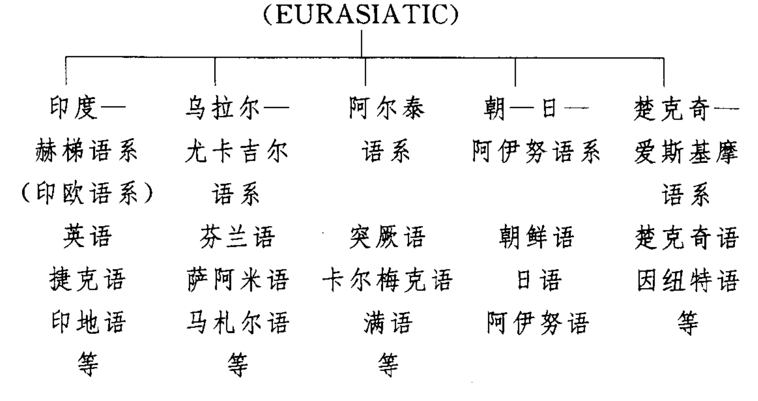
源有许多探索，成为引人关注的科学前沿问题。考古学和遗传学对历史语言学的发展产生了影响，借用王士元的话，考古学、遗传学和语言学是探索历史的三个窗口。①

语言的产生，约可追溯到 10 万年前，但真正的突破可能发生在 5 万至 6 万年之前。与现代人类起源单源说相呼应，近年来在语言学界兴起了“语言起源一元论”。其实，这种理论早在 20 世纪初就由意大利语言学家 A. Trombetti 提出。至于把语言的各种分支追溯到 1.5 万前的新石器时代甚至更早，是在三十多年前由以 V. Illič-Svityč 和 A. Dolgopolsky、Vitaly Shevoroshkin 等为代表的一批前苏联和俄国语言学家提出的，他们认为欧亚大陆的语言同属一个庞大的欧亚超级语系，称之为“诺斯特拉语”。“诺斯特拉”一词源出拉丁语 nostrās，意为“吾（土）”，是由丹麦语言学家裴特生（Holger Pederson）开始使用的，用以指称印欧语系和可能同印欧语系有亲缘关系的其他语系的语言。这个大语系包括了阿非罗—亚细亚语（闪含语）、卡尔特维里语、印欧语、乌拉尔语、达罗毗荼语、阿尔泰语。这一理论引起西方特别是美国学者的兴趣，并且扩大了比较的范围。已故美国语言学家葛林堡（J. Greenberg）在 1987 年提出欧亚超级语系的假说，认为印欧语、乌拉尔语、阿尔泰语、楚克奇—堪察加语、爱斯基摩—阿留申语以及尤卡吉尔语、尼夫赫语（吉尔雅克语）、朝鲜语、日语、阿伊努语彼此之间都有比较密切的亲缘关系，组成一个大的语言集团，如下图所示②：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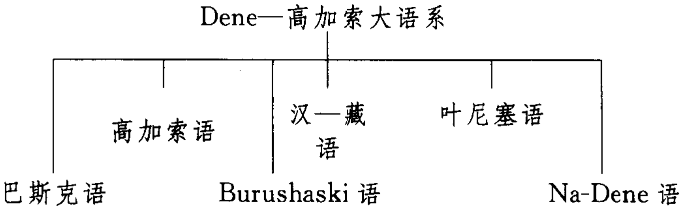
① 王士元：《考察历史的三个窗口》，原载 *The Bronze Age and Early Iron Peoples of Eastern Central Asia*, Ed by Victor H. Mair, Washington-Philadelphia, 1998, pp. 508～534。中译文见石锋等译：《语言的探索——王士元语言学论文选译》，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0 年，第 155～186 页。

② 采自 *Moher Tongue*, *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Language in Prehistory* Ⅳ, December 1998.



至于诺斯特拉大语系，按照 Alan R. Bomhard 的说法，应是一个包括欧亚超级语系在内的更大的语言集团。不属于欧亚超级语系，但仍是诺斯特拉大语系的成员有亚非语系、埃兰—达罗毗荼语、卡尔特维里语和古代两河流域的苏美尔语等，它们同欧亚超级语系的成员在较远的层次上也有亲缘关系。

除上述诺斯特拉语系和欧亚大语系之外，俄国学者斯达罗斯廷在 20 世纪 80 年代提出了“汉—高加索语系”的概念，把汉藏语、北高加索语和叶尼塞语包括在内。这个语系又可能与美洲印第安语的 Na-Dene 语系有关，故被称为“Dene—高加索大语系”。美国学者 D. Bengtson 最近更把法国和西班牙边界地区的巴斯克语、巴基斯坦的 Burushaski 语及古代的苏美尔语等语言的材料加入进去，从而为汉藏语具有更远古的语源关系提供了进一步的线索。葛林堡等赞同和主张的与中国境内语言有关的系属分类如下图：



上述关于超级语系或大语系的研究，虽然在语言学界颇有争议，

但受到一些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和遗传学家的欢迎与支持。在把语言学和考古学的新成果进行整合方面，英国著名考古学家伦弗鲁(Colin Renfrew）的著作最值得注意。在探索基因、语言和民族起源的相互关系方面，意大利裔遗传学家卡瓦里·斯福尔沙（Luigi Luca Cavalli-Sforza）做出了最重要的贡献。

澳大利亚学者 Peter Bellwood 曾指出，从东南亚北部大陆北至黄河流域的农业中心地带，不仅是一个农业的故乡，而且是一个语言的故乡。而汉藏语的形成，一方面受到南方诸语的影响，另一方面又与欧亚大陆北方诸族的语言有某种渊源关系。广袤的欧亚大陆一直是各个说不同语言的民族活动的舞台，随着早期牧人的流动，东西方不同文化的相互交流与传播，至少可以追溯到五六千年之前。如西伯利亚卡拉苏克文化同中国商文化的联系，早已为广大研究者所了解。最近对山东临淄古代人骨的 DNA 测定，也证实存在着高加索人种（欧罗巴人种）的因素，其中 2500 年前的临淄人与现代欧洲人的关系要近于其与东亚人的关系，2000 年前的临淄人与现代中亚、西亚人关系最近。① 至于中亚居民与东亚北部某些居民在遗传学上存在类似性，正说明中亚地区的资料在研究东亚民族和语言的起源问题上具有极端重要性。根据 1997 年的报道，高加索人种的居民可能曾迁移到欧亚大陆极东的地方。在汉藏语和阿尔泰语系诸语之间，似乎也不能排除存在着一定亲缘关系的可能性。内陆欧亚还存在一些相对孤立的语言，如前述匈奴人所说的叶尼塞语，也可能与汉藏语有密切的联系。② 我们不妨把汉藏语看作是连结欧亚大陆北方诸语言和南方诸语言的桥梁。

---

① Wang Li, et al. "Genetic structure of a 2, 500-year-old human population in China and its spatiotemporal changes" . *Mol Biol Evol*, 17 (9), 2000, pp. 1396～1400.

② A. Vovin, "Did the Xiong-nu Speak a Yeniseian Language?" .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44 (1), 2000. pp. 87～104.



总之，通过基因分析，结合群体遗传学和语言学、人类学、考古学的研究，我们将逐步弄清欧亚大陆说同一语系和不同语系语言的族群之间是否存在亲缘关系以及这种关系的性质。[①] 因此对阿尔泰语系的起源问题，对汉藏语系的起源问题，应该在世界范围里，从史前全球语言联系特别是欧亚大陆的语言接触的角度重新审视。

第二节 对内陆欧亚各语系语言的研究

一、汉藏语系语言研究

在汉藏语系的历史比较研究领域，除上文已提及的论著以外，可以举出俞敏的《汉藏同源字谱稿》[②]、瞿霭堂和劲松的《汉藏语言研究的理论和方法》[③]、施向东的《汉语和藏语同源体系的比较研究》[④]、杨光荣的《藏语汉语同源词研究——一种新型的中西合璧的历史比较语言学》[⑤]、薛才德的《汉语藏语同源字研究》[⑥] 等著作。韩国学者全广镇用中文著有《汉藏语同源词综探》[⑦]。美国学者包拟古（N. C. Bodman）有关汉—藏语关系的一些论文已由潘悟云、冯蒸译出。[⑧]

---

① 徐文堪：《一个重大的科学前沿问题》，见《学术集林》卷十四，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第313～323页。《基因、语言和民族起源》，见《辞海新知》第5辑，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第72～75、94页。

② 《民族语文》1989年第1期，第56～77页，第6页；第2期，第49～64页。

③ 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0年。

④ 北京：华语教学出版社，2000年。

⑤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年。

⑥ 上海大学出版社，2001年。

⑦ 台北：学生书局，1996年。

⑧ 《原始汉语与汉藏语》，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

在西夏语研究方面，由李范文主编的《西夏语比较研究》① 是一部较重要的著作。20 世纪初美国学者劳弗尔（B. Laufer）发表《西夏语言—印度支那语文学研究》，提出西夏语属彝语支语言，一直被视为研究西夏语的指南针，我国学者积累经多年实地调查所得与西夏语有关的第一手资料，运用大量语料进行比较，提出西夏语为属羌语支的语言，虽然还不能下定论，但无疑有继往开来的意义。

在藏文、古藏语研究方面，前辈学者如于道泉、金鹏、王森等均有贡献，近年来成果更多，不备述。工具书方面，可以举出法尊、张克强（建木）等翻译的《格西曲礼藏文辞典》② 和张怡荪主编的《藏汉大辞典》③。

有关西夏和吐蕃文献的研究，详见下节“古文献、古文字研究”。

二、阿尔泰语系语言研究

我国至今没有出版过关于阿尔泰系语言历史比较的通论性著作，只有兰司铁的《阿尔泰语言学导论——形态学》的中译本，系据俄译本译出。书前有清格尔泰为译本写的序，俄译者巴斯卡科夫（H·A·Баскаков）所作的注释亦译出。较简略的通论性文章可以举出清格尔泰、刘照雄的《阿尔泰语文学概述》④。值得提到的是，2001 年出版了由力提甫·托乎提主编的《阿尔泰语言学导论》⑤，全书分 9 章，分别论述了突厥语族语言、蒙古语族语言、满—通古斯语言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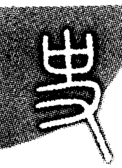
① 孙宏开、马忠建、聂鸿音、李范文撰稿，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 年。

② 北京：民族出版社，1957 年。

③ 北京：民族出版社，1985 年。

④ 见《民族语文研究文集》，西宁：青海民族出版社，1982 年，第 353～365 页。

⑤ 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



朝鲜语，足以反映我国学者在这些领域的最新成就。

（一）突厥语族语言研究

20世纪前期（1900～1949年），我国在突厥语族语言的历史研究方面只发表了零星的几篇文章和译文，没有系统的论述。一些史学论著涉及突厥语或某些突厥语词，如岑仲勉的《揭出中华民族与突厥族之密切关系》[①]、《吐鲁番一带汉回地名对证》[②] 以及《隋唐史》[③] 中有关部分等，有一定意义。韩儒林在其历史研究中，尤擅长审音勘同之学，取得较大成就。

1949年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发表了一些关于突厥语的通论性著作和论文，如李增祥的《突厥语概论》[④]，内容包括突厥语分期、分类、语音系统、国内外研究概况等。巴斯卡科夫的《突厥语》（Тюркские языки，1960年）在1986年出版了维吾尔语译本[⑤]。捷尼舍夫（Э. Р. Тенишев）的《突厥语言研究导论》原是作者于20世纪50年代在中国讲学时的讲义，后又补充修订，出版了中译本，[⑥] 内容涉及族源、民族史、民族关系等问题。王远新的《突厥历史语言学研究》于1995年问世，[⑦] 是以他十余年来关于突厥语语音、语法、词汇及其发展的专题研究为基础写成的。近年出版的专著还有程适良的《突厥比较语言学》[⑧]。台湾学者刘义棠著有《维吾尔语文研究》[⑨]。该书出版后，又先后发表了两篇长文作为补充：

---

① 《东方杂志》第41卷第3号，1945年，第35～43页。

②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2本，第95～115页。

③ 此书是作者多年研究的结晶，解放后于1957年由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对古突厥文化及相关词语的考释散见于全书各处正文和注释中。

④ 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2年。

⑤ 北京：民族出版社。

⑥ 陈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⑦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⑧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

⑨ 台北：正中书局，1978年。

《"维吾尔语文研究"之补充讨论》[①]、《"维吾尔语文研究"之再补充讨论》[②]。

关于突厥语词源和语言影响、语言关系的研究，可以举出的论文有：岑仲勉的《突厥语及其相关外语之汉文译写考定表》[③]、《突厥（回纥）语及伊、印语之汉文译写表》[④]、《楚辞注要翻案的有几十条（一名楚辞中之古突厥语）》[⑤]，朱志宁的《维吾尔语中的汉语借词》[⑥]，陈庆隆的《突厥系族及其语言》[⑦]、《坚昆、黠戛斯与布鲁特考》[⑧]、《"和卓"考释——语源及语义的分析》[⑨]，胡振华的《"卡伦"词源考》[⑩]，魏萃一的《维吾尔语 bywi 一词的源流》[⑪]，陈宗振的《关于维吾尔语中的早期汉语借词的探讨》[⑫]、《西部裕固语中的早期汉语借词》[⑬]，赵相如的《维吾尔语中的古代汉语借词——从语言上看历史上维汉人民的密切关系》[⑭]、《哈萨克语中古代汉语借词初探——兼论 kazak（哈萨克）一词的源流及涵义》[⑮]、《维吾尔语的

---

① 《政治大学边政研究所年报》第 11 期，1980 年，第 1～48 页。

② 《政治大学边政研究所年报》第 17 期，1986 年，第 100～155 页。

③ 见其《突厥集史》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58 年，第 1123～1136 页。

④ 见其《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北京：中华书局，1958 年，第 238～252 页。

⑤ 《中山大学学报》1961 年第 2 期，第 53～72 页。

⑥ 《中国语文》1965 年第 5 期，第 349～355 页。

⑦ 政治大学东语系专刊，台北，1975 年。

⑧ 《大陆杂志》第 51 卷第 5 期，1975 年，第 1～11 页。

⑨ 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40 本下，1969 年，第 825～838 页。

⑩ 《民族语文》1980 年第 3 期，第 57～58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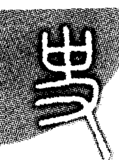
⑪ 《民族语文》1984 年第 4 期，第 60～63 页。

⑫ 见《民族语文研究文集》，1982 年，第 509～530 页

⑬ 《语言研究》1985 年第 1 期，第 206～214 页。

⑭ 《语言与翻译》1986 年第 2 期，第 3～12 页。

⑮ 《伊犁师范学院学报》1986 年第 1 期，第 11～19 页。



音节结构和借词拼写法的关系》①、《汉语“氐”和维吾尔语“tɛg”的关系初探——兼及汉语阴声韵的辅音尾》②，王振忠的《乌兹别克语词汇中的借词》③，等等。其中赵氏的论文着力探讨古汉语与维语的关系，认为现代维语中至今保留着一些具有汉语上古时代声母系统特点的语词，涉及许多重要的理论和方法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

还应提到的是，据赵相如和阿西木合作调查，④ 新疆和田、洛浦、莎车、英吉沙、疏勒和库车等县分布着自称“艾努”（Ejnu）的居民。艾努人之间或家庭内部使用一种为维吾尔族和其他民族所不易懂的语言。这种语言里几乎有三分之二以上与伊朗语同源的语词，而且属基本词汇，但词音系统和语法结构已经受到维语的深刻影响，这究竟是一种伊朗语与维语“混合语”，还是保留了大量伊朗语“底层”的特殊的维吾尔语方言，是很值得研究的课题。

（二）蒙古语族语言研究

我国学者（包括藏族学者）对蒙古语的研究约始于13世纪，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和传统，也取得了相应的成就。1949年之前，国内学者用汉文发表过一些较重要的论文，如翁独健的《元典章译语集释》⑤，王静如的《蒙古语动词之变化》⑥、《蒙古语否定词及句法》⑦ 等。20世纪40年代，在内蒙古出版了额尔敦·陶克陶的《蒙古文新鉴》⑧，这部书可以视为国内蒙语研究从旧的语文学传统向新

① 《民族语文》1984年第4期，第26～38页。

② 《延边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第87～98页。

③ 《突厥语研究通讯》，1992年第3、4期合刊，第1～5页。

④ 请参看赵相如、阿西木：《新疆艾努人的语言》，《语言研究》1982年第1期，第259～279页。

⑤ 《燕京学报》第30期（1946年），第279～288页。

⑥ 北平《华北日报》1947年6月18日。

⑦ 北平《华北日报》1947年7月9日。

⑧ 又名《蒙古语简明语法》，开鲁蒙文学会，1942年，1944年。

的语言学过渡的标志。清格尔泰运用现代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于1949年写成《蒙文文法》[①]，影响较大，曾被译成英文在香港和纽约两度刊行（*A Grammar of the Mongol Language*，Hong Kong，1951；New York，1963）。

1949年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对我国蒙古语族语言的调查和研究有了长足进展。在语音方面，关于元音和谐问题的讨论形成了一个热点。在词汇的综合研究方面，较重要的论文有陈乃雄的《蒙古语族语言的词汇》[②] 等。在文字学研究方面，包祥的《蒙古文字学》[③]、包力高的《蒙古文字简史》[④] 是通论性的专著，除回鹘式蒙文外，还介绍了八思巴字、托忒文、苏永布文、瓦金德拉字、阿利伽力字母等。喻世长的《论蒙古语族的形成和发展》于1984年出版。[⑤] 这是我国学者对蒙古语族语言进行综合研究的第一部专著。桑席叶夫（Я. И. Санжеев）的《蒙古语比较语法》[⑥] 和符拉迪米尔佐夫的重要著作《蒙古书面语和喀尔喀方言比较语法——引言和语音学》[⑦] 分别于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由俄文译成中文刊行。

对中世蒙古语（如《蒙古秘史》的语言、八思巴字文献语言等）的研究详下节。

（三）满—通古斯语族语言研究

对女真语和满语进行研究，我国是世界上最早的国家[⑧]，但现

---

① 内蒙古日报社，1949年；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文教部，1950年。其新版本书名为《蒙古语语法》，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年。

② 《内蒙古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第105～116页。

③ 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84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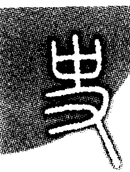
④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年。

⑤ 北京：民族出版社。

⑥ 北京：民族出版社，1959年。

⑦ 陈伟、陈鹏译，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

⑧ 赵志强：《清代的满语研究》，《北京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第132～138页。



代语言科学意义上的研究，则始于20世纪20年代。李德启的《满洲文字之来源及其演变》①、《“儿女英雄传”里的满语释义》②，韩儒林的《女真译名考》③，郑天挺的《清史满语解》④、《释“巴克什”》⑤、《释“巴图鲁”》⑥，邓永龄的《从满洲语对音上论中国音韵问题》⑦，聂崇岐的《满官汉释》⑧，关德栋的《记满汉语混合的子弟书——“螃蟹段儿”》⑨ 等，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凌纯声在《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一书⑩的语言部分，对赫哲语的语音系统和语法进行了介绍，并有分类词语约1000个。

解放后，对满—通古斯语族诸语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和描写研究，出版了各种语言简志和口语词汇，成绩显著。1985年底黑龙江满语研究所还创办了专业刊物《满语研究》。

在语言的历史研究方面，有季永海、白立元的《谈天聪五年〈设立六部档〉》⑪，李树兰的《锡伯语的藻饰词》⑫，贺灵、佟克立的《锡伯族古代语言文字简论》⑬，朝克的《鄂温克语助词结构》⑭，奇

---

① 《北平图书馆馆刊》第5卷第6期，1931年，第4145～4178页。

② 上海《中央日报》1948年12月26日。

③ 《华西协合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第3卷，1943年，第55～64页。

④ 《真理杂志》第1卷第1期（1944年），第107～113页。

⑤ 《真理杂志》第1卷第4期（1944年）。此据郑天挺：《探微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56～159页。

⑥ 《真理杂志》第1卷第3期（1944年）。此据郑天挺：《探微集》，第151～156页。

⑦ 《中央大学半月刊》第1卷第16期（1930年），第155～158页。

⑧ 《燕京学报》第32期（1947年），第97～115页。

⑨ 《文史杂志》第6卷第1期（1948年），第80～88页。

⑩ 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1934年原刊本。

⑪ 见《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第3辑，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65～80页。

⑫ 《民族语文》1991年第1期，第36～42页。

⑬ 《语言与翻译》1992年第4期，第39～42页。

⑭ 《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4期，第67～70页。

车山的《关于锡伯文字母》[①] 等。朝克的《满—通古斯语诸语比较研究》[②] 是我国出版的第一部满—通古斯比较语言学专著。任国英著《满—通古斯语族诸民族物质文化研究》[③] 有专章“关于满—通古斯语诸民族的起源问题”，涉及“通古斯”一词的起源与其他语言方面的问题。

在语音方面，李兵对通古斯语的元音和谐的研究，如其刊行于荷兰阿姆斯特丹的 *Tungusic Vowel Harmony: Description and Analysis*[④] 已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很大关注。在满语语法方面，先后有乌拉熙春的《满语语法》[⑤] 和季永海、刘景宪、屈六生的《满语语法》[⑥] 问世，这两部语法促进了对满语的深入研究。

在语言接触方面，可以提到的论著有张杰的《清代满族语言文字在东北的兴废与影响》[⑦]、滕绍箴的《明清两代满语满文使用情况考》[⑧]、胡增益的《满语 baibi、bai 和汉语副词“白”之间的借贷关系》[⑨]、赵杰的《现代满语与汉语》[⑩] 等。常瀛生的《北京土话中的满语》[⑪] 认为北方汉语的发展与北方少数民族语言的影响分不开，北京话源于幽燕语，清初满族人学汉语，对汉语也有影响，至雍、乾、嘉时代形成早期北京话，道、咸、同时代形成“旗人话”即后期北京话。

---

① 《语言与翻译》1992 年第 1 期，第 52～55 页。

② 北京：民族出版社，1997 年。

③ 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1 年。

④ Amsterdam: University of Amsterdam，1996。

⑤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 年。

⑥ 北京：民族出版社，1986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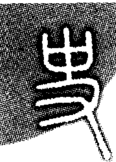
⑦ 《语言文字学》1995 年第 6 期，第 57～62 页。

⑧ 《民族语文》1986 年第 2 期，第 13～28 页。

⑨ 见《满学研究》第 2 辑，北京：民族出版社，1994 年，第 319～345 页。

⑩ 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92 年。

⑪ 北京，燕山出版社，1992 年。



在词典编纂方面，为了配合清史研究的需要，1990年出版了由商鸿逵、刘景宪、季永海、徐凯编纂的《清史满语辞典》①，这是查找清代史籍中满语名称的一部有用的工具书。刘厚生、关克笑、沈微、牛建强编纂，王钟翰审订的《简明满汉辞典》② 也有助于满文文献的翻译和清史研究工作。收词丰富的大型词典有安双成主编的《满汉大辞典》③ 和胡增益主编的《新满汉大词典》④。已出版的锡伯语辞书则有佟玉泉、贺灵等整理的《锡伯语辞典》⑤。

台湾省的满语文研究也取得可观成绩。20世纪50年代后，陆续整理出版了一批满文资料，较著名的满语文和历史研究者有李学智、广禄、陈捷先、庄吉发等，其中李学智、陈捷先等都从事满语研究，如陈氏的专著《满文清实录研究》⑥ 等，论述精当，受到好评。台湾大学、政治大学边政所（后改为民族所）开有满文课程。1981年4月台湾满族协会成立，同年12月开设满文研究班，由广定远任教，并创办《满族文化》杂志，刊登有关满语文和满族文化及清史等方面的文章。

三、朝鲜语研究

我国对朝鲜语的研究，主要是在新中国创建后开始的。据1986年编纂的《中国朝鲜语研究成果目录集（1945～1985）》统计，四十年中共出版专著，发表论文、资料等550篇（部）。

关于朝鲜语的系属，我国学者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宋代孙穆所著《鸡林类事》中“风曰孛缆”这一记载展开讨论。对这个问

①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②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88年。
③ 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93年。
④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
⑤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年。
⑥ 台北：大化书局，1978年。

题，林语堂、罗常培等学者早已注意到。（如罗常培：《语言与文化》，1950 年），[①] 应琳在 1980 年发表短文《“风曰孛缆”考》[②]，提出朝鲜语的“孛缆”（param）一词与阿尔泰语相同的观点。此文刊出后，黄有福和崔虎城（合作）、俞敏、尚玉河、金永哲等都发表论文，或认为与古汉语有关，或认为是朝鲜语固有词，至今尚无结论。关于《鸡林类事》研究的重要成果是安炳浩的《鸡林类事与高丽时期的朝鲜语》[③]。吴安其的论文《论朝鲜语中的南岛语基本成分》[④] 考察了朝鲜语与南岛语的渊源关系。黄晓琴发表了《浅析朝鲜语数词与阿尔泰语系的关系》[⑤]，通过朝鲜语与维吾尔语、西部裕固语为代表的突厥语数词的比较，探索朝鲜语与阿尔泰语的关系。

我国学者正式出版的第一部朝鲜语史研究专著是安炳浩的《朝鲜语发展史》[⑥]。关于朝鲜语断代史的研究，有崔允甲的《中世朝鲜语语法》[⑦]、姜银国的《朝鲜语后缀的历时研究》[⑧]。有关词汇发展史的研究有李得春的《朝鲜语词汇史》[⑨]、金秉运的《李朝后半期朝鲜语汇变化的研究》[⑩]。对训民正音（谚文）的研究也由来已久。早在解放初，吴奉协就发表《韩文河图起源论》[⑪]，认为其起源于河图。以后有一系列论文发表，论述训民正音的创制过程、制字原理、变

① 北京：语文出版社（再版本），1989 年，第 99～100 页。

② 《民族语文》1980 年第 2 期，第 79 页。

③ 哈尔滨：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1985 年。

④ 《民族语文》1994 年第 1 期，第 1～10 页；第 40 页。

⑤ 《语言与翻译》2001 年第 4 期，第 21～24 页。

⑥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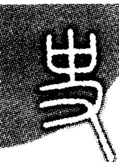
⑦ 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1987 年。

⑧ 汉城：曙光学术资料社，1993 年。

⑨ 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1988 年。

⑩ 平壤：金日成综合大学出版社，1990 年。

⑪ 《教育通讯》1950 年第 2～6 期。原文未查见，此据戴庆厦主编：《二十世纪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太原：书海出版社，1998 年，第 475 页。



迁沿革及历史地位，如宣德五的《朝鲜文字的变迁》①、李得春的《老乞大朴通事谚解朝鲜文注音》②等。关于吏读文字，有崔允甲的论文《吏读的产生及其性质》③。从语言史角度探讨朝鲜语语音演变的较重要论文有宣德五的《中古朝鲜语元音·〔Λ〕的历史演变》，④该文提出由于Λ的消失，促使了朝鲜语元音和谐律的瓦解。

在语言比较方面，李得春对满语和朝鲜语的共同成分作了研究，崔羲秀对女真语和朝鲜语中有对应关系的词汇有所论述。李得春的《汉朝语言文字关系史》⑤论述了汉字在朝鲜的传播、使用及其对朝鲜语文所产生的影响，汉字词体系的形成及其发展过程。对朝鲜语汉字音的研究，一直为国内外学者所关注。国内学者过去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认为源于《切韵》，至20世纪80年代，聂鸿音、李得春、崔羲秀等的论著将其源流追溯到汉语上古音。安炳浩的专著《朝鲜汉字音体系研究》⑥通过对汉字音历史资料的分析，得出在10世纪确立了规范的朝鲜汉字音单一体系的结论。对朝鲜古文献《四声通考》、《四声通解》、《训蒙字会》、《老乞大谚解》、《朴通事谚解》等用谚文所记的汉字音，我国有些学者如胡明扬、陈植藩、孙建元等进行了有价值的探讨。

第三节　古文献、古文字研究

内陆欧亚各种语言遗留下来的古文献、古文字资料也丰富多彩，

---

① 见《中国少数民族古文字研究》，1984年，第407～420页。

② 《延运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第85～93页。

③ 《中国朝鲜语文》1990年第6期。此据前引《二十世纪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第475页。

④ 《民族语文》1985年第4期，第10～14页。

⑤ 东北朝鲜民族教育出版社，1992年。

⑥ 平壤：金日成综合大学出版社，1984年。

下面分别对其研究情况进行概述。

一、汉藏语系古文献古文字研究

（一）吐蕃文献研究

藏学是当今世界范围的显学，我国自20世纪以来，特别是在近年也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涉及历史、地理、经济、政治、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宗教、医药、金石简牍文书、考古等等方面，如陈寅恪之于历史、语言，吕澂之于佛学，法尊之于佛学和藏汉翻译，于道泉之于语言、文学，张建木之于文字学、佛学，王森之于哲学、佛学，黄明信之于天文历算、目录学，李永年之于藏医药学，王沂暖之于文学，陈庆英之于史籍研究等。据统计，从1949～1999年五十年间，国内出版的藏学领域的图书已达1700余种，故无法在此详述。其与内陆欧亚有关的，可以举出王尧的《吐藩金石录》[①]，王尧和陈践的《吐蕃简牍综录》[②]、《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③]、《法藏敦煌藏文文献解题目录》[④] 等。王小甫的《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⑤] 也包含了一些语文学的研究成果，作者还发表了《古藏文 kog (gog) yul 为俱位考》[⑥] 等文。美籍著名学者张琨著有《敦煌本吐蕃纪年之分析》[⑦] 等重要论文。许多国外的藏学论著已译成中文，如荣新江所译匈牙利学者乌瑞（G. Uray）的《有关公元751年以前中亚史的藏文史料概述》[⑧] 等等。

---

①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年。

②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

③ 增订本，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年。

④ 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年。

⑤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

⑥ 《民族语文》1992年第6期，第61～67页。

⑦ 《东方文化》第5卷第1～2期（1959/1960），第122～173页。

⑧ 见《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5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9～81页。



（二）西夏文字和文献研究

1908～1909 年，俄国派遣的柯兹洛夫（П. К. Козлов）探险队在内蒙古发现了西夏遗址——黑水城（哈拉浩特），获得大批西夏文献。1909 年俄国学者伊凤阁（А. И. Иванов）撰文介绍新发现的夏汉对音对义《番汉合时掌中珠》残叶。西夏文材料引起劳弗尔的很大兴趣，于 1916 年在《通报》上发表长文，得出西夏语属彝语支的结论。[①]1914 年，旅居日本的罗福苌刊行《西夏国书略说》，是代表当时研究西夏语言文字水平的开创之作。后来其兄罗福成予以增订，又发表在《亚洲学术杂志》上。[②] 罗氏三兄弟（罗福成、罗福苌、罗福颐）都对西夏语文的研究作出了特殊贡献。1923 年，伊凤阁在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发表《西夏国书说》[③]。1929 年，北平图书馆从宁夏购得西夏文佛经百余册，都是宋元刊本。1930 年，该馆邀请国内外西夏学者撰稿，编译出版《北平图书馆馆刊》第四卷第三号“西夏文专号”，刊载了向达、罗福成、罗福苌、伊凤阁、聂历山（Н. А. Невский）与日本学者石滨纯太郎等的论文和译文，为西夏语言文字的研究提供了非常丰富的资料和成果。

1932～1933 年，王静如完成《西夏研究》1～3 辑（前已述及），1936 年获法国茹莲奖，这是当时西夏研究的一个里程碑。聂历山的论文和手稿集《西夏语文学》也写于 20 世纪 30 年代，但 1960 年才得以出版。《西夏研究》和《西夏语文学》是西夏语言文字研究史上的“双璧”。

此后西夏学的研究处于停顿状态，至 50～60 年代才逐渐恢复。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我国的西夏学研究也有了长足进展。1978

---

① *T'oung Pao*, ser. 2，17. 1，pp. 1～128。

② 第 1 期，第 1～6 页；第 2 期，第 1～6 页；第 3 期，第 1～4 页；第 4 期，第 1～14 页，1921～1922 年。

③ 第 1 卷第 4 期，第 675～686 页。

年李新魁发表《论西夏文的形体结构和造字方式》[①]，1980年发表《西夏语辅音系统研究》[②]。1983年，史金波、白滨、黄振华合著《文海研究》出版[③]。1986年，李范文著《同音研究》出版[④]。十余年来，整理、翻译西夏文文献并用以研究西夏社会、历史、文化的工作进展很大，已有数十种著作相继问世，如陈炳应的《西夏谚语》[⑤]、《贞观玉镜将研究》[⑥]，史金波、黄振华、聂鸿音的《类林研究》[⑦]，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的《西夏天盛律令》[⑧]，大大推动了西夏学的发展。1994年李范文的《宋代西北方音——〈番汉合时掌中珠〉对音研究》出版[⑨]，该书利用《掌中珠》的资料结合吐蕃文、梵文资料拟测宋代汉语西北方音的音系，并将宋代汉语西北方音与唐、五代和近现代汉语西北方音进行比较，从而揭示出汉语西北方音的发展变化情况。李氏还编著了《夏汉字典》[⑩]，是世界上第一部大型的西夏文辞书。

全部黑水城文献由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合作，编为《俄藏黑水城文献》，自1996年开始陆续出版。

台湾学者龚煌城对西夏语和西夏文也有深入的研究，发表了许多论著，如《西夏语的浊塞音与浊塞擦音》[⑪]、《西夏国书〈同音〉

① 《中山大学学报》1978年第5期，第12～20页。
② 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成立大会论文，油印本。
③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④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
⑤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
⑥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
⑦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
⑧ 北京：科学出版社，1994年。
⑨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⑩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⑪ 第12届国际汉藏语言暨语言学会议论文，1979年。



第九类声母的拟测》[①]、《西夏文字衍生过程的重建》[②]、《类林西夏文译本汉夏对音字研究》[③]、《通过考察语音转换构拟西夏音韵》[④]，都有新义。另一位台湾学者林英津著有《夏译〈孙子兵法〉研究》[⑤]。

中国和俄罗斯、日本三国是在西夏语文研究方面领先的国家。中国学者与俄国学者克恰诺夫（E. И. Кычанов）、苏敏（M. B. Софронов）、克平（K. Б. Кепинг）和日本学者西田龙雄等在学术研究上互相合作，如《圣立义海研究》一书就是由克恰诺夫、李范文、罗矛昆合著的。[⑥]

二、阿尔泰语系古文献古文字研究

（一）古突厥文文献研究

我国学者很早就知道和介绍过古突厥文碑铭（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九姓回鹘可汗碑），但截至20世纪30年代，都只限于三碑的汉文部分，最早翻译、考释碑铭突厥文部分的是韩儒林，他在1935年据德译本和英译本发表《突厥文阙特勤碑译注》[⑦]。随后又在1936年发表了《突厥文苾伽可汗碑译释》[⑧]，对碑文所记史实有所考释。同年又据德译本转译发表了《突厥文暾欲谷碑译文》[⑨]。这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1937年韩氏又将汤姆森（V. Thomsen）所著

---

① 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2本第1分，1981年，第17～35页。
② 《政治大学边政研究所年报》第15期，1984年，第63～80页。
③ 见《考古与历史文化》下，1990年，第185～223页。
④ 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0本第1分，1989年，第1～45页。
⑤ 台北《历史语言研所单刊》之28，1994年。
⑥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
⑦ 《国立北平研究院院务汇报》第6卷第6期，1935年，第13～42页。
⑧ 《禹贡》半月刊第6卷第6期，第1～14页。
⑨ 《禹贡》半月刊第6卷第7期，第21～30页。

《蒙古之突厥碑文导言》译出。[①] 此后岑仲勉发表《跋突厥文阙特勤碑》[②]，朱延丰亦有笺证，分别对二碑所记史实、部族、地名等作了考订。后来岑氏又据英译本改译了韩氏翻译的三碑，并对各碑所涉内容详加考释，收入其《突厥集史》下册。[③]

属回鹘汗国的突厥文碑铭，国内早期有王静如从德文转译的《突厥文回纥英武威远毗伽可汗碑译释》。[④]

我国最早直接释读古突厥文、回鹘文的是冯家昇。他的论文主要有《1960年吐鲁番新发现的古突厥文》[⑤]、《一个突骑施的钱币》[⑥]等。至20世纪70年代，古突厥语鲁尼文文献发现的地点已包括蒙古、叶尼塞河流域、阿尔泰地区、新疆和敦煌、吉尔吉斯和哈萨克斯坦北部、费尔干纳及吐火罗斯坦北部、东欧及多瑙河流域等。我国学者对鲁尼文字和文献作过研究的有耿世民、陈宗振、库尔班·外力、阿不都克由木·霍加、吐尔逊·阿尤甫、阿吉牙库甫·玉素甫、吐尔逊·吾守尔、卡哈尔·巴拉提、李经纬、牛汝极等，取得相当大成绩。芮传明的《古突厥碑铭研究》[⑦] 是从历史考证角度对突厥碑文进行研究的综合著作。对碑铭语言进行探讨的专著有耿世民、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的《鄂尔浑—叶尼塞碑铭语言研究》[⑧]。苏联学者克利亚什托尔内（С. Г. Кляшторный）的名著《古代突厥鲁尼文碑铭——中亚细亚史原始文献》在1991年译成中文出版。[⑨]

---

① 刊于《禹贡》第7卷第1～3期合刊，第213～222页。

② 《辅仁学志》第6卷第1～2期合刊，第249～273页。

③ 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857～926页。

④ 《辅仁学志》第7卷第1～2期合刊，1938年，第186～240页。

⑤ 《文史》第3辑，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此据《冯家昇论著集粹》，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491～502页。

⑥ 写成于20世纪60年代，收入《冯家昇论著集粹》，第503～504页。

⑦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⑧ 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1999年。

⑨ 李佩娟译，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法国学者吉罗（R. Giraud）的《东突厥汗国碑铭》亦已译成中文刊出。[①]

台湾学者陈庆隆、林恩显等也研究过古突厥文献，如林恩显著有《突厥研究》[②]，其中收入《古代突厥文献概述》等文。

（二）回鹘文文献

早在20世纪20年代，罗福成就对明代高昌馆编撰的汉文、回鹘文对照分类词汇集《高昌馆译语》作过研究，但真正研究回鹘文则始于冯家昇（20世纪40年代在哥伦比亚大学师从门格斯），他对回鹘文古文献的研究作出了突出贡献。其代表作是《回鹘文写本〈菩萨大唐三藏法师传〉研究报告》[③]。此外，在回鹘文佛典、契约等方面都有考释专文。继冯家昇之后，耿世民在回鹘文文献的研究上享有国际声誉，他对回鹘文佛经（《弥勒会见记》、《八十华严》、《阿毗达磨俱舍论》等）、《玄奘传》、摩尼教寺院文书、回鹘文碑铭都进行了深入探讨，除中文外，还用英、德、法、日、土耳其文在国外刊物上发表论文，并与德国学者H. J. Klimkeit等合作译释刊布关于《弥勒会见记》的专书。他在国内出版的专书主要有《〈乌古斯可汗的传说〉——维吾尔族古代史诗研究》[④]、《古代维吾尔诗歌选》[⑤]、《维吾尔族古代文化和文献概论》[⑥]、《敦煌突厥回鹘文书导论》[⑦]、《新疆文史论集》[⑧]等。著作目录见李增祥、毕桪等编《耿世民先生七十寿辰纪念文集》[⑨]。

---

① 耿昇译，新疆社科院历史所，1984年。
② 台北：商务印书馆，1988年。
③ 《考古学专刊》丙种第1号，北京：中国科学院，1953年。
④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
⑤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
⑥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
⑦ 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
⑧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年。
⑨ 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年，第1～10页。

李经纬是研究回鹘文世俗文书的大家，所著《吐鲁番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①和《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②是世俗文书的集大成之作。他对回鹘文《弥勒会见记》和《摩尼教徒忏悔词》及景教文献等也都有研究。

除冯家昇、耿世民、李经纬外，斯拉菲尔·玉素甫、多鲁坤·阚白尔、克尤木·霍加也致力于《弥勒会见记》的研究，所著《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第1卷于1988年出版。③ 特别重要的是，柏林藏本中在“三唆里迷”一句后残断的文字恰好保存在新疆哈密发现的本子中，这对于史学研究特别重要（参看耿世民和张广达合作的重要论文《唆里迷考》）。④

西部裕固语专家陈宗振著有《回鹘文医书摘译》⑤，史料价值很高。柯尔克孜语专家胡振华与黄润华合著《明代文献〈高昌馆课〉》⑥、《高昌馆杂字》⑦。维吾尔族学者卡哈尔·巴拉提对回鹘文《玄奘传》的研究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在回鹘文献研究上作出成绩的学者还有牛汝极、杨富学、张铁山、张龙群、赵永红、邓浩、刘戈、王叔凯、王菲、沈利元、党宝海等。法国学者哈密顿（J. Hamilton）与杨富学、牛汝极合作发表了安西榆林窟的内容较完整的回鹘文题记。⑧ 牛汝极还与德国学者P. Zieme合作研究回鹘文佛教文献，与哈密顿、英国学者N. Sims-

①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

② 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1996年。

③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④ 载《历史研究》1980年第2期，第147～159页。

⑤ 《中华医史杂志》第14卷第4期，1984年，第233～235页。

⑥ 拉丁字母转写本。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年。

⑦ 北京：民族出版社，1984年。对此书的评论，可参看陈宗振：《关于〈高昌馆杂字〉标音问题的探讨》，《民族语文》2003年第1期，第34～45页。

⑧ 《榆林窟回鹘文题记译释》，《敦煌研究》1998年第2期，第39～54页。



Williams 合作研究叙利亚文和回鹘文景教碑铭。[①]

雅森·吾守尔对敦煌出土回鹘文木活字的形制、材料、制作方法等作了全面研究，首次系统发表了有关回鹘文活字印刷术的材料，很有意义。[②]

魏萃一刊布了《真理的入门》汉文本[③]，并与耿世民合译了《福乐智慧》。[④]新疆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于1984年整理出版了《福乐智慧》的维吾尔文译本[⑤]，郝关中、张宏超和刘宾整理翻译了汉文全译本。[⑥]

在综合性著作方面，牛汝极所著《维吾尔古文字古文献导论》[⑦]内容充实丰富。最近牛氏又出版了《回鹘佛教文献——佛典总论及巴黎所藏敦煌回鹘文佛教文献》，[⑧]以专题形式对敦煌、吐鲁番回鹘文佛教文献进行了介绍与研究。

（三）对《突厥语词典》的研究

问世于11世纪的突厥民族百科全书式的巨著《突厥语词典》在20世纪40年代引起国内学者的注意，60年代初出现了介绍文章，[⑨]我国维吾尔族语言学家伊布拉音·穆提义等对其整理研究和出版作

---

① 牛汝极：《叙利亚文和回鹘文景教碑铭文献在中国的遗存》，《欧亚学利》第一辑，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172～180页。

② 见史金波和雅森·吾守尔：《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早期传播——西夏和回鹘活字印刷术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61～110页。

③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年。

④ 节译本，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79年。

⑤ 北京：民族出版社。

⑥ 北京：民族出版社，1986年。

⑦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

⑧ 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2000年。

⑨ 如胡振华、耿世民的《〈突厥语大辞典〉介绍》，《新疆文学》1963年第5期，第63～65页。《词典》的维吾尔文本于1980～1984年问世，第1～3卷。汉文本第1～3卷亦已出版（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年）。

出了重要贡献。

在《词典》的研究上，张广达的《关于马合木·喀什噶里的〈突厥语词汇〉与见于此书的圆形地图》①是一篇重要文章，引起国内外学者的重视。以后发表的文章还可以举出伊不拉音·穆提义的《〈突厥语词典〉及其作者马合木德·喀什噶里》②，陈宗振的《从〈突厥语词典〉看喀喇汗王朝的文字》③、《〈突厥语词典〉中保留在西部裕固语里的一些古老词语》④等等。张铁山以维吾尔文本《词典》为底本，参照土耳其文本，对《词典》所收动词的构词附加成分进行了分类统计分析。⑤应该提到，赵明鸣著《〈突厥语词典〉语言研究》是我国第一部较全面研究《词典》语言的专著，2001年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近年各种刊物登载的有关《词典》的论文还有不少，涉及领域颇多，范围颇广，数以百计，这里不再列举。

（四）察合台文文献研究

我国对察合台文献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出版工作基本上是解放后开始的。20世纪70年代末起，这些工作开展加快，如维吾尔文学丛刊《源泉》已刊出二十多集，近年还整理出版了《乐师传》、《尼朴里卡诗集》、《则勒力诗集》、《世事记》、《成吉思汗传》、《伊米德史》、《拉失德史》、《巴布尔传》、《两种语言之辨》等几十种。有关察合台语的专著有哈米提·铁木耳和阿布都若夫·波拉提合著的《察合台语》⑥。我国已故突厥语启蒙大家李森曾发表《论察合台文》⑦，

① 《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8年第2期，第29～42页。

② 《百科知识》1984年第1期，第16～18页。还可参看李吟屏的《从〈突厥语大词典〉看古代和田的语言和民族》，《新疆日报》1993年1月15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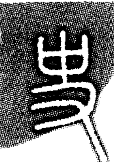
③ 见《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1984年，第127～141页。

④ 《民族语文》，1992年第1期，第33～41页。

⑤ 《〈突厥语词典〉动词附加成分电脑统计分析》，《民族语文》1998年第2期，第63～67页。

⑥ 喀什维文出版社，1987年。

⑦ 《语言与翻译》1989年第2期，第28～30页。



李国香的毕生之作《维吾尔文学史》①中也包含不少有关察合台语文献的材料和论述。阿布都若夫·波拉提的论文集《察合台维吾尔语研究论文集》于1993年出版。② 此外，金炳喆从英文翻译了J. Eckmann的《察合台语手册》③，李增祥从英文翻译了Claus Schöning的《论〈巴布尔传〉中的过去时》④，并发表了《古兰经的中古突厥语译本及其词汇特色》⑤等论文。

（五）契丹文研究

契丹在建国之初曾先后设计了两套文字记录契丹语。第一套文字是公元920年由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授意突吕不和鲁不古创制的，第二套文字则是数年后由太祖之弟耶律迭剌创制的。第一套文字是脱胎于汉字的表意大字，现在称为“契丹大字”。第二套文字有表音文字的性质，现在称为“契丹小字”。契丹文记录的契丹语当属蒙古语族，可能与达斡尔语、蒙古语接近。

对契丹文和契丹文献进行研究的主要是中、日、俄三国学者。我国较早研究契丹语的学者有罗福成、王静如、厉鼎煃、阎万章和陈述等，自20世纪初至70年代取得不少成绩。金毓黻的《辽陵石刻集录》⑥收录了当时中外的主要研究著作和碑拓照片。金光平的《从契丹大小字到女真大小字》⑦根据汉文史书的记载，并通过对现存两种契丹文字的分析，指出庆陵石刻文字应是契丹小字，50年代出土的《萧孝忠墓志》所刻则是契丹大字，这个主张得到学术界的赞同。20世纪70～80年代，内蒙古、北京等地有关学者对契丹文字进行深入研究。1985年出版的清格尔泰、刘凤翥、陈乃雄、于宝林、

---

① 兰州大学出版社，1992年。

② 北京：民族出版社。

③ *Chagatay Manual*, Bloomington, 1966.

④ 《语言与翻译》1989年第2期，第71～77页。

⑤ 《伊犁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第2期，第50～53页。

⑥ 奉天图书馆刊，1934年。

⑦ 《内蒙古大学学报》1962年第2期，第9～14页。

邢复礼合著的《契丹小字研究》[①]是一部划时代的巨著，为契丹文字文献的研究开创了一个新局面。即实的《谜林问津——契丹小字解读新程》[②] 也是一部值得注意的论著。近年国内研究契丹文的学者还有王弘力、高路加、阮廷焯、刘浦江等。

（六）《蒙古秘史》语言研究

国内对《蒙古秘史》的研究已有200多年历史，出现了很多有价值的考证、注释和专题研究。20世纪以来，不少蒙古族和汉族学者在《秘史》的校勘、注释、翻译上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如昌德公、布和贺希格、贺希格巴图、阿拉坦敖其尔、谢再善、道润梯步等人。1934年陈垣写成《〈元秘史〉译音用字考》，是研究《元朝秘史》译例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参考资料。1957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了蒙古策·达木丁苏荣的通俗本《蒙古秘史》。1981年出版了额尔登泰等的《〈蒙古秘史〉校勘本》[③]。同年出版了巴雅尔用拉丁文字母注音并还原为回鹘式蒙文、附现代蒙语的《蒙古秘史》。1985年出版了满昌的现代蒙语还原并加注释的《蒙古秘史》。1989年出版了回鹘蒙文还原本《蒙古秘史》[④]。台湾学者扎奇斯钦的《〈蒙古秘史〉新译并注释》[⑤]，正文前附有姚从吾的长篇代序——《漫谈〈元朝秘史〉》，也值得提及。

对《秘史》从语言角度进行研究的有额尔登泰等的《〈蒙古秘史〉词汇选释》[⑥]。确精扎布、哈斯巴特尔、孟和宝音、恩和巴图等研究过《秘史》语言的语法问题，哈斯巴特尔还利用计算机对《秘史》语言的方位格附加成分从诸方面进行了论述。

---

①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② 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96年。
③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④ 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⑤ 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年。
⑥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



（七）对回鹘式蒙文文献的研究

关于回鹘式蒙文的考释和研究，包祥、道布、双福等都作出了贡献。道布所著《回鹘式蒙古文文献汇编》[①] 收录各类回鹘式蒙文文献 22 种，对推动我国这一学术领域的研究起了良好的作用。有关《华夷译语》、《孝经》、《青史》、《蒙古源流》、《黄金史》、《阿拉坦汗传》和元代文献《十善福白史册》的研究，近年来也积极开展，取得了引起国际学术界关注的成绩。对文学作品《格斯尔》和法律文献《卫拉特法典》及蒙文大藏经（《甘珠尔》、《丹珠尔》）的研究也日益受人重视，在史诗《格斯尔》的出版和研究上成果尤为突出。这些方面论著的信息资料可参看各种蒙古学书目，限于篇幅，此处不再列举。《蒙药正典》是 19 世纪蒙古族的重要医学文献，额尔黑木图对蒙医学家占布拉道尔吉及其著述做过多年研究，有关蒙医学及其文献的研究概况，见策·财吉拉胡的《蒙医学史研究概况》[②] 一文。

（八）对托忒蒙文文献的研究

托忒蒙文文献产生和发展于 17 世纪中叶，最早的一部语言文献是咱雅班第达那木海扎木苏于 1647 年编集的《字母汇编》。托忒文文献是蒙古文献中唯一的方言文献。

国内对托忒蒙文文献的搜集、整理、注释、研究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刊布和出版主要在 80 和 90 年代。民族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内蒙古文化出版社先后出版了《卫拉特历史文献》、《卫拉特史迹》、《卫拉特蒙古史诗选》、《卫拉特蒙古神话故事》、史诗《江格尔》等大型文献汇集。托忒蒙古文刊物《汗腾格里》杂志和以托忒蒙文、汉文两种文字出版的《卫拉特研究》陆续发表文献和研究论文，在国内外都产生了影响。

1984 年在新疆伊犁的查干哈达首次发现了石刻托忒文《金刚

---

① 北京：民族出版社，1983 年。

② 《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第 7 辑，1992 年，第 145～164 页。

经》。1988年，彻·孟和等前往调查，找到直径为70厘米或120厘米左右的大小不同的45块卵石，每块卵石正面刻有50多个托忒蒙古字，并标有页码。经过两年多的辨认和研究，孟和写成《托忒蒙古文石经的发现》①，刊布了石经第58块卵石上的托忒蒙文原文。

（九）八思巴文研究

对八思巴字文献的收集、整理、研究等，罗常培、蔡美彪、照那斯图、杨耐思都做出了重要贡献。罗常培和蔡美彪合编的《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于1959年出版。② 解放后涉及八思巴字蒙古语资料的第一篇论文是已故蒙古学巨匠亦邻真的《读1276年龙门禹王庙八思巴字令旨碑》③。台湾学者郑再发发表的论文有《〈蒙古字韵〉和跟八思巴字有关的韵书》④等，他1976年在美国通过的博士论文是关于八思巴字及相关资料与近代汉语语音的专著。⑤照那斯图和杨耐思编著了《蒙古字韵校本》⑥。陈乃雄有《〈蒙古字韵〉和元代钱币——八思巴字释读》⑦和其他研究八思巴字的论文。松儒布、呼格吉勒图、贾拉森等也发表过相关论文。

照那斯图著有《八思巴字和蒙古文文献》，Ⅰ为“研究文集”⑧，Ⅱ为“文献 汇集”⑨。这部大型文集是八思巴蒙古文文献研究的传

---

① 打印本，1990年。

② 北京：科学出版社。增订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

③ 《内蒙古大学学报》1963年第1期，第113～123页。

④ 台湾大学《文史丛刊》第十五种，196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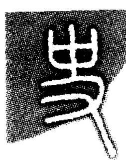
⑤ Cheng Tsai-fa, *Early Mandarin as Revealed in hp'ags-pa Transcription and Related Materials*,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1976.

⑥ 北京：民族出版社，1987年。

⑦ 《元代货币论文选集》，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70～275页。

⑧ 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出版，1990年。

⑨ 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出版，1991年。



世之作。

鲍培的名著《八思巴蒙古文碑铭》经郝苏民译补，由内蒙古文化出版社在1986年出版了汉文本。此外，我国还翻译刊行了国外著名学者如龙果夫（A. A. Драгунов）、服部四郎的关于八思巴字研究的论文。

除了以上这些领域的工作，在我国元、明戏曲中源于蒙语的汉语借词研究方面，方龄贵的《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①是经多年积累的力作。后又增补，改写为《古典戏曲外来语考释词典》，于2001年出版。著名语言学家张清常对汉语里的蒙语借词“胡同”作了深入探讨。亦邻真对元代硬译公牍文体、元代蒙古语音译汉字的惯例作了研究。祖生利于2000年在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通过的博士论文《元代白话碑文研究》利用白话碑文蒙汉对译材料，讨论元代白话碑文和其他直译体文献中出现的特殊语言现象，论证其产生是由于受到蒙古语的影响。

（十）女真文研究

女真语属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金朝建立前没有自己的文字。金朝建立后，太祖完颜阿骨打命完颜希尹创制一套记录本民族语言的文字，习惯上称为“女真大字”，于1119年颁行。大字创制之后，金熙宗完颜亶又于1138年创制了一套“小字”，于1145年正式开始使用。但存世的所有女真文资料都是用一种文字写成的，20世纪上半叶的学者认为这是女真小字，但现在人们越来越倾向于将它看作女真大字。关于这一问题，穆鸿利有论文《女真文研究中不能回避的问题》②予以讨论。

我国研究女真文的学者，早期主要有罗福成、王静如等。解放后有金光平、金启孮等。金光平、金启孮的重要著作《女真语言

---

① 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1年。

② 《北方文物》1994年第3期，第64～66页，第41页。

文字研究》初撰于1964年，于1980年正式出版。[①] 金启孮的《女真文辞典》出版于1984年。[②] 道尔吉、和希格的《女真译语研究》[③] 是对明永乐年间所编《女真译语》的综合研究。此外还发表了一批论文，如黄振华的《明代女真文奴儿干永宁寺记新释》[④]，罗福颐、金启孮、贾敬颜、黄振华的《女真字奥屯良弼诗刻石初释》[⑤]，道尔吉、和希格的《海龙汉文女真文对译摩崖真伪辨》[⑥] 等。此外，韩国学者金东昭的论文集《女真语、满语研究》由黄有福译为中文，北京新世界出版社于1990年出版，也是一部重要著作。

（十一）对满文和锡伯文文献的研究

满文是公元17世纪以后满族用以记录自己的语言的文字，分为"老满文"和"新满文"两种。老满文由额尔德尼和噶盖在1599年创制，又称无圈点满文。新满文由达海在1632年改订，又称有圈点满文。

对满文的研究一开始就集中在文献的整理、编目、刊行方面，近年来更取得了长足进展。整理出版的满文古籍有《满文老档》、《满洲源流考》、《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八旗通志》、《八旗文经》、《八旗艺文编目》、《雍朝雅颂集》和《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清代内阁大库散佚档案选编》、《满文土尔扈特档案译编》等。这些书籍的刊行，对于清史、满族史、满族语文、满族文学的研究都有重要意义。在文学作品方面，举世闻名的《尼山萨满》已有几种汉译本问世，还出版了今人整理的民间神歌本子《满洲萨满神歌译注》[⑦]、

---

① 北京：文物出版社。

② 北京：文物出版社。

③ 《内蒙古大学学报》1983年增刊。

④ 《中国地方史志》1983年第2期，第32～39页。

⑤ 《民族语文》1982年第2期，第26～32页。

⑥ 《内蒙古社会科学》1984年第3期，第47～49页。

⑦ 宋和平译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



《满族萨满跳神研究》① 和《满族古神话》等。对满文大藏经的研究也已开始，发表的论文有春花的《论满文〈大藏经〉的语言学价值》②、朱赛虹的《读乾隆〈清文翻译全藏经序〉》③等。

锡伯文是在满文基础上略加改造的文字。清代以后，东北地区的锡伯族人与满族人一样放弃了满文，但居住在新疆的锡伯人仍继续使用锡伯文。现有文献大体上有历史文献、宗教文献和文学作品等。近年来对锡伯族古籍的整理、出版成绩显著，仅在新疆就先后出版了几十种，如《萨满神歌》《辉番卡伦来信》、《顿吉纳的诗》、《三国之歌》、《喀什噶尔舞春》、《锡伯族情歌》和《清代锡伯族档案史料选编》等。在此基础上，对锡伯文化的研究也提高到了一个新水平。

三、印欧语系古文字古文献研究

关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沿丝绸之路的考古发掘所获印欧语古文献，早在20世纪20～30年代初由王国维、方壮猷、冯承钧等学者作了介绍和讨论，但现在我们可以参考的较好的导论性文章当推吴其昱的《西域古语文献导论（上编）》④，文章概述了西域遗文的语言文字、书写时代、地理分布、内容分类及其价值，西域古语行用地区之过去与命名问题，西域遗文发现经过及现在分藏处所。末附1890年以来西方学者西域古语文献书目选录（原则上只录专书，少数日文著作亦附入），甚便读者进一步查考。

（一）佉卢文文献

佉卢文在公元前3世纪以后广泛流行于今印度西北、巴基斯

---

① 石光伟等编，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

② 《故宫博物院院刊》2001年第6期，第66～69页。

③ 《紫禁城》2001年第4期，第9～11页。

④ 见《政治大学国际中国边疆学术会议论文集》，台北，1985年，第873～913页。

坦、阿富汗、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一带，公元2世纪中叶开始流行于于阗、鄯善等地。所记录的语言是一种古印度西北俗语，被称为“犍陀罗语”（在我国称为“尼雅俗语”）

我国学者研究佉卢文的有马雍、林梅村等。20世纪60年代夏鼐在我国首次对汉—佉二体钱作过考释。[①] 马雍著有《新疆所出佉卢文书的断代问题》[②]、《古代鄯善、于阗地区佉卢文字资料综考》[③]。林氏发表论文最多，并著有专书《沙海古卷》[④]，这是到目前为止对中国境内所出佉卢文文献的最全面的汉译和考释。他的三部文集《西域文明——考古、民族、语言和宗教新论》[⑤]、《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⑥]、《古道西风——考古新发现所见中西文化交流》[⑦]也多涉及佉卢文和其他西域古语文。此外，土登班玛有《鄯善佉卢文书所见王号考》[⑧]等论文。孟凡人将佉卢文书的材料用于西域史地研究，取得不少成果。林梅村还发表了1897～1993年中国所出佉卢文资料的研究书目，[⑨] 可供检索。其实，早在20世纪60年代王广智已据英译文转译了我国所出的佉卢文书，史学界多次予以引用，但未正式出版。

除佉卢文文献外，我国也出土过其他字体（如婆罗谜文等）的梵语和俗语写本，大多是佛典，研究者主要有季羡林、蒋忠新、王

---

① 《“和阗马钱”考》，《文物》1962年第7、8期合刊，第60～63页。

② 《文史》第7辑，1979年，第73～95页。

③ 见《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1984年，第6～49页。

④ 第1卷，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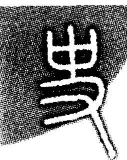
⑤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年。

⑥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

⑦ 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

⑧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第3期，第69～81页。

⑨ Lin Meicun，*Kharoṣṭhī Bibliography*：“The Collections from China (1897～1993)”，*Central Asiatic Journal* 40，2，1996，pp. 188～220.



邦维、陈明（医药文献）、钱文忠等。季氏关于中世印度雅利安语语尾 aṃ>u 的现象的两篇论文尤为重要。[①] 近年蒋氏对《妙法莲华经》写本的研究，如《梵文法华经のテキストた關する若干の问题》[②]，在国际学术界引起关注。

（二）吐火罗语文献

对吐火罗语（焉耆—龟兹语）的命名及相关的历史、地理、民族等问题，冯承钧译出伯希和、烈维（S. Lévi）的论文四篇，译文于 1957 年结集为《吐火罗语考》[③]出版，在学术界很有影响。我国学者在这些方面贡献最大的当推王静如，他在二十多年间共发表论文四篇：《论吐火罗及吐火罗语》[④]、"Arsi and Yan-chi"，"Tokhri and Yüeh-shih"[⑤]，《重论 ārṣi，ārgi 与焉夷、焉耆》[⑥]和《〈吐火罗语考〉序》。黄盛璋在 20 世纪 80 年代曾就此作综合评述，[⑦] 徐文堪亦曾有所讨论。[⑧] 关于吐火罗语和吐火罗人的起源问题，前文已略及，余太山、林梅村、王欣诸氏都曾有所论述。此外，徐文堪、杨继东曾将著名伊朗学家亨宁（W. B. Henning）的《历史上最初的印欧人》、著名语言学家加姆克列利则（T. V. Gamkrelidze）与伊凡诺夫

---

① "Die Umwandlung der Endung—aṃ in o und u im Mittelindischen", *NAWG* Jahrgang 1944 Nr. 6；"Die Verwendung desAorists als Kriterium für Alter und Ursprung buddhistischer Texte", *NAWG* Jahrgang 1949 Nr. 10. 此据季羡林《印度古代语言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 188～222 页和第 228～333 页。

② 《东洋学术研究》第 38 卷第 1 号，1999 年，第 184～170 页。

③ 北京：中华书局。

④ 《中德学志》第 5 卷第 1、2 期合刊，1943 年，第 217～277 页。

⑤ 《华裔学志》第 9 卷，1944 年，第 81～91 页。

⑥ 《史学集刊》第 5 期，1947 年，第 147～158 页。

⑦ 《试论所谓"吐火罗语"及其有关的历史地理问题》，见《西域史论丛》第 2 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 年，第 228～268 页。

⑧ 《从一件婆罗谜字帛书谈我国古代的印欧语和印欧人》，见《季羡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373～403 页。

(Vjač. Vs. Ivanov) 的《历史上最初的印欧人：吐火罗人在古代中东的祖先》、印度学者纳拉扬（A. K. Narain）的《论"最初的"印欧人：吐火罗—月氏人及其中国故乡》三文译为中文，①为吐火罗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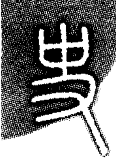
我国学者对吐火罗语的语言研究，季羡林的重要地位是独一无二的。诚如论者所说："虽然也有屈指可数的几位中国学者利用相关的吐火罗文解读、研究成果，在某些领域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创获，但是，从发现吐火罗文至今差不多一个世纪，在拥有十几亿人口的中国，在将吐火罗文研究视做解决其他相邻问题的手段的同时，而又能够从语言学，特别是比较语言学出发，将吐火罗文语言本身作为研究目的的，却仍然只有先生一人而已。"②

季羡林留学德国期间，师从 E. Sieg 教授研治吐火罗语，1943 年用德文发表《吐火罗文本的〈佛说福力太子因缘经〉诸异本》③，首次将汉译异本引入吐火罗文研究，确定了许多词语的意义，为解决吐火罗语词汇含义问题开辟了一条可行之路。以后又陆续发表了《浮屠与佛》、《吐火罗语的发现与考释及其在中印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吐火罗文 A 中的三十二相》、《说"出家"》、《梅呾利耶与弥勒》、《再谈"浮屠"与"佛"》、《龟兹国王金花考》等。特别重要的是，季氏以近 20 年时间，对 1975 年在新疆出土的 44 张甲种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剧本》进行释读，先后在国内外发表论文十余篇，至 1998 年终于与德国学者 Werner Winter、法国学者 Georges-Jean Pinault 合作，以英文出版了《中国新疆博物馆吐火罗文 A〈弥勒会

① 分别刊于《西北民族研究》(1992 年第 2 期，第 23～34 页和 1998 年第 1 期，第 51～78 页）和《学术集林》，卷十七，2000 年，第 259～289 页。

② 钱文忠：《季羡林与吐火罗文研究》，见乐黛云编《季羡林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年，第 33 页。

③ 《德国东方学会会刊》(*ZDMG*) 第 97 卷第 2 期。此据《印度古代语言论集》，第 133～187 页。



见记剧本〉残片译释》[1]，这是吐火罗语研究史上的一件大事。此书全文加上作者专为中文读者所写的长篇导言，被收入《季羡林文集》第11卷，由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与此同时，作者还在1993年出版了专著《敦煌吐鲁番吐火罗语导论》[2]。

此外，G. J. Pinault 的英文论文《论吐火罗语中佛教术语翻译》发表于《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卷，此文已译成中文，载于《鸠摩罗什和中国民族文化——纪念鸠摩罗什诞辰165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3]。他的另一篇重要论文《西域的吐火罗语写本与佛教文献》亦已译出。[4]

吐火罗语属印欧语系 Centum 语组（西支），而我国出土的其他印欧语文献多属印欧语系 satem 语组（东支）。这些语言除前已述及的犍陀罗语外，还有粟特语、中波斯语（钵罗婆语即 Pahlavī）、帕提亚语与于阗语（和田塞语）、图姆舒克语、大夏语（巴克特里亚语）等，大抵属伊朗语。

（三）于阗语文献

我国学者据国外学者的研究最早介绍于阗语的是方壮猷，在史学研究中较早引用于阗语资料的可以举出岑仲勉，如他在《“回回”一词之语源》[5]中认为“回回”来源于于阗人称回纥之名。以后张广达和荣新江系统运用于阗语资料，对于阗史研究作出了突出贡献。[6]留德归来的段晴是我国最主要的于阗语研究者，她已用中文在《民族语文》、《西域研究》、《敦煌吐鲁番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论文多篇，

---

① *Fragments of Tocharian A Maitreyasamiti-Nāṭaka of the Xinjiang Museum, China.*

② 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

③ 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2001年，第171～184页。

④ 载《法国汉学》第五辑“敦煌学专号”，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215～244页。

⑤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2本，第91～94页。

⑥ 见两氏合著《于阗史丛考》，上海书店出版社，1993年。

考释于阗语文书，如《于阗语〈出生无边门陀罗尼经〉残片释读》[①]等等，成绩斐然，并与荣新江合撰《据史德语考》[②]，对图姆舒克语的定名问题详加考证，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重视。此外，黄振华发表了《于阗文研究概述》[③]等。关于于阗文佛经与汉语、梵语的关系，段晴发表了一篇有趣的论文《于阗文中“作茧自缚”的来源》[④]。黄盛璋对敦煌出土于阗文书中的一些地名、族名进行过考释。[⑤]林梅村著有《新疆和田出土汉文于阗文双语文书》。[⑥]

季羡林在1990年撰成《新疆古代民族语言中语尾 aṃ＞u 的现象》，将印度雅利安语的音变现象与伊朗语（于阗语、图姆舒克语）联系起来，进一步阐明这一音变现象的地域包括印度西北至中国西北的广大地区。[⑦]

（四）大夏语、粟特语、帕提亚语、中古波斯语文献

大夏语（巴克特里亚语）文献虽然国内也有发现，但我国学者除在论文中引用一些有关材料（如季羡林、龚方震）外，尚无专门的论著。值得一提的是：夏鼐在《河北定县塔基舍利函中波斯萨珊朝银币》[⑧]中曾谈到铸币上打上了哌哒文字的戳记。[⑨]根据新的研究，这种所谓哌哒文，应该就是大夏文。

粟特语文献和粟特文物在我国发现较多，史学家如蔡鸿生、姜

① 《西域研究》1993年第2期，第46～51页。

② 《中亚学刊》第5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9～21页。

③ 见《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1984年，第64～86页。

④ 《民族语文》1993年第1期，第63～6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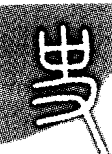
⑤ 《敦煌于阗文书中河西部族考证》，《敦煌学辑刊》1990年第1期，第51～67页，第115页，等等。

⑥ 《考古学报》1993年第1期，第89～107页。

⑦ 《中国文化》第4期（1991年），第171～176页。

⑧ 《考古》1966年第5期，第267～270页。

⑨ 见《夏鼐文集》（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50页。



伯勤、荣新江、芮传明等对其史料价值多有论述，创获甚丰，但基本上没有做过原文的考释工作。黄振华、龚方震、林梅村对栗特文及其文献作过一些介绍和研究，如龚方震的《粟特文》[①]、林梅村的《固原粟特墓所出中古波斯文印章及其相关问题》[②]等。龚方震在《祆教史》[③]和其他论文中还作过一些专名的考释，如认为胡旋舞的"胡旋"是栗特语 xwcyy 的音译，"苏幕遮"源自栗特语 smwtry'，等等。对 1907 年斯坦因（M. A. Stein）在敦煌附近发现的史料价值极高的"栗特古信"的准确年代，我国学者也参加了讨论。近年在我国发表的最重要的栗特文资料，当推由日本学者吉田丰释读的吐鲁番所出摩尼教文书，现已作为专书出版。[④]

帕提亚语和中古波斯语（钵罗婆语），我国也没有专门的研究者。但近年旅美学者马小鹤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摩尼教研究的论文，大量利用栗特语、帕提亚语文献，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准，如《摩尼教宗教符号"明珠"研究——帕提亚文 mwrg'ryd（珍珠）考》[⑤] 等。夏鼐发表过几篇论文 [⑥]，对我国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进行考释，在考古学界享有盛誉。他还首先介绍了唐苏谅妻马氏墓志的钵罗婆文部分[⑦]，并请日本学者伊藤义教释读了全文：《西安出土汉、婆合璧墓志婆文语言学的试释》[⑧]。此后中外学者对此进行过不少探讨，

---

① 载《中国民族古文字图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年，第 54～62 页。

② 收入《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 年，第 198～208 页。

③ 与晏可佳合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 年。

④ 柳洪亮等编：《吐鲁番新出摩尼教文献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 年。

⑤ 见《学术集林》卷十七，上海远东出版社，2000 年，第 290～301 页。

⑥ 都已收入《夏鼐文集》下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年。

⑦ 《考古》1964 年第 9 期，第 458～461 页。

⑧ 《考古学报》1964 年第 2 期，第 195～202 页。

刘迎胜曾发表专文《唐苏谅妻马氏汉、巴列维文墓志再研究》①。龚方震在《摩尼教传入所带来的伊朗文化》②论证了摩尼字体的传入在中伊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此外，在波斯文及其文献的研究方面，我国也取得不少成绩。有不少著名的波斯语古典文学作品已译成中文出版，我国学者还撰写了这方面的专著。叶奕良曾发表论文《关于〈元史〉中“质孙服”等的探讨》③。黄时鉴研究过汉语中的波斯语借词。刘迎胜对《回回馆杂字》与《回回馆译语》进行了细致、全面的考释，刊布论文多篇，并发表了《明代中国官办波斯语言教学教材源流研究》④等文。宋岘对《回回药方》的探讨取得很大成绩，已写成专著《回回药方考释》出版。⑤

四、其他研究

旅法学者吴其昱是对西域语言和宗教有深入研究的学者，在藏文、西夏文、梵文、叙利亚文、希伯来文古文献方面均有著述，如曾撰《景教三威蒙度赞研究》，比较汉文、叙利亚文本，求其异同与关系，⑥ 最近又发表长文《唐代景教之法王与尊经考》⑦，以汉语中古音与希腊文、叙利亚文、希伯来文、梵文、印度中世俗语等进行比勘，并进而推测唐时景教教士与信众的宗教与文化背景，实为具有开创性的力作。饶宗颐对印度河流域哈拉巴、摩亨佐达罗等地所出古文字作过探讨，并进而研究丝绸之路沿线的各种古文字。刘迎

① 《考古学报》1990年第3期，第295～305页。

② 《亚洲文明》第3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83～190页。

③ 见《东方研究论文集》五，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359～367页。

④ 《南京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第104～109页。

⑤ 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

⑥ 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7本第3分，1986年，第411～438页。

⑦ 《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五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3～58页。



胜研究过我国回族使用的“小经”文字（《从回回字到“小经”文字》）①。周有光曾对文字史和比较文字学的理论与相关问题进行研究，写成《世界文字发展史》②和《比较文字学初探》③两部专著，还发表了《文字类型学初探——文字“三相”说》等④多篇论文，涉及欧亚大陆的各种古文字，对比较文字学这门学科的建立、发展也有重要意义。

结　　语

回顾百年以来，我国学者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对内陆欧亚和相邻地区的历史语言学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的探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特别是近20年来，有了长足的进展，不少方面已在世界上占有重要地位。国外刊物如 *Central Asiatic Journal*、《内陆アジア言语の研究》等等经常刊载国内学者的论文，国际性的书目也多著录我国学者的论著，并在我国举办了多次高水平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有的领域，如西夏语研究，如果没有中国学者的努力和贡献，就无法达到今天的高度。所有这些，都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也是令人非常欣慰的。

但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我们在某些领域还是空白；在一些与我国关系最为密切的学科如阿尔泰语系历史比较语言学和西域语文献的释读等方面，目前还相当薄弱；有些基础较好的学科研究范围还局限于境内，缺乏跨境的调查和研究，这些都是亟待填补和加

① 《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4辑，南方出版社，2001年，第153～165页。

②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

③ 北京：语文出版社，1998年。

④ 《民族语文》1987年第6期，第5～19页。

强的。吴其昱先生曾说："希望将来教育当局多方鼓励青年学生研究此类学问，最好先习英、法、德、俄、日诸语次研梵文、波斯文以利其器，同时亦须略读佛教、摩尼教文献，如此计划亦非二十年不能办到。"我们期待在新世纪里，培养出一批既掌握现代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又熟悉历史文献，最好还能文理兼通的"复合型"人才，并将语言学、语文学、考古学、人类学的成果进行整合，开展跨学科研究，以期在不远的未来，使我国的内陆欧亚历史语言学接近以至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主要参考文献：

戴庆厦主编:《二十世纪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太原：书海出版社，1998 年。

江荻:《20 世纪的历史语言学》,《中国社会科学》2000 年第 4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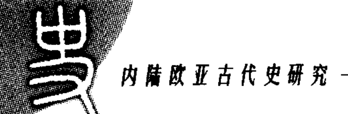
刘坚主编:《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

王士元著、石锋等译:《语言的探索——王士元语言学论文选译》，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0 年。

王远新:《中国民族语言学史》，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 年。

乐黛云编:《季羡林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年。

Joseph H. Greenberg, *Indo-European and Its Closest Relatives: The Eurasiatic Langage Family* (Volume 1. Gramma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民族语文》杂志。

《民族语文研究情报资料集》1～14。

《语言与翻译》杂志。

《中国史研究动态》杂志。

《中国语文》杂志。

《内陆アジア言语の研究》。

Archivum Eurasiae Medii Aevi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第十二章　内陆欧亚祆教研究述评

一、内陆欧亚祆教研究在中国的滥觞

古代汉籍对西域胡人的信仰习俗多有记载，每每提及其祀祆神奉火祆。历代学者，多把其与摩尼教、景教，甚至回教混淆。直到清末，随着西学东渐，中国学者才逐步意识到胡人的火祆崇拜与波斯琐罗亚斯德教的关系。王韬的《王韬日记》和《瓮牖余谈》、文廷式的《纯常子枝语》，对火祆教均有所论及，将其归属波斯宗教；[①]而光绪二十一年（1895 年）出版的杨荣鋕《景教碑文纪事考正》卷一，有《火祆考原》一文，专论火祆教与波斯圣人"祚乐阿士之道"（琐罗亚斯德教）之关系。无疑，上述诸贤对祆教已有粗浅的了解，但谈不上对内陆欧亚地区祆教的真正研究。

至于西方学界，早在 18 世纪中叶，当中国人对于琐罗亚斯德教殆无所知时，其已开始将该教古老的经典《曾德—阿维斯陀经》（*Zend－Avesta*）翻译成现代西方语言。[②]但时至 19 世纪末，西人对于汉籍所记西域祆教与波斯琐罗亚斯德教的关系，也像中国人一样，

---

① 参阅刘方：《〈纯常子枝语〉与祆教研究》，《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北京：中华书局，1995 年，第 413～419 页。

② 详参拙文：《近代琐罗亚斯德教研究的滥觞》，《百科知识》1989 年第 2 期，第 26～27 页。



并不了然。法国汉学大师沙畹（É. Chavannes），就把中国文献中所提到的祆教，与景教、摩尼教以及伊斯兰教都混在一块。[①] 倒是日本学者，在 20 世纪初叶，便明确认识到祆教与波斯宗教的关系，并开始有所研究。[②] 不过，把古汉籍所记的祆教与内陆欧亚的主流宗教作为一体进行考察，并给予明晰的表述者，乃是被陈寅恪先生誉为中国宗教史奠基者的陈垣先生。[③]陈垣先生 1923 年发表的《火祆教入中国考》,[④] 是中国现代学者研究祆教的第一篇。该文第一章题为“火祆之起源”，明确地指出了汉籍祆教与内陆欧亚宗教的内在关系：

> 西历纪元前五六百年，波斯国有圣人，曰苏鲁阿士德 Zoroaster，因波斯国拜火旧俗，特倡善恶二原之说，谓善神清净而光明，恶魔污浊而黑暗，人宜弃恶就善，弃黑暗而趋光明，以火以光表至善之神，崇拜之，故名拜火教。因拜火又拜日月星辰，中国人以为其拜天，故名曰火祆。祆者天神之省文，不称天神而称祆者，明其为外国天神也。四裔编年表于周灵王二十一年波斯条下曰：是时琐罗阿斯得著经立教，为波斯之圣。即指此也。
>
> 西历二百二十六年，波斯国萨珊王朝兴，定火祆为国教，一时盛行于中央亚细亚。南梁北魏间，始名闻于中国，北朝帝后有奉事之者，谓之胡天。六百二十五年，大食国灭波斯，占有中央亚细亚，祆教徒之移往东方者遂众。唐初颇见优礼，两

---

① 见 É. Chavannes , “Le Nestorianisme et l' inscription de kara-Balgassoun”, *Journal Asiatique* Ie ser. , IX, Jan. -Feb. 1897, pp. 43～85.

② 例如，柴谦太郎：《支那史に於けるペルシャ教》，《史学界》第五卷三号，1904 年，第 36～45 页。

③ 陈寅恪：《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序》，见陈氏著：《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第 240 页。

④ 陈垣：《火祆教入中国考》，原刊《国学季刊》第 1 卷第 1 号，1923 年，第 27～46 页；收入《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 年，第 303～328 页；《陈垣史学论著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年，第 109～132 页。

京及碛西诸州皆有祆祠；祆字之由来，即起于此际。会昌五年（西八四五）武宗毁佛，斥外来诸教，火祆与大秦，均受株累。武宗没，禁渐弛，历五代两宋，祆祠犹有存者。①

这段关于祆教与内陆欧亚宗教关系的论述，就现在的认识看来，未必尽善尽美，但在20世纪初叶，国人能有如此认识者，唯陈垣先生一人耳；即便是毗邻的东洋学者，对波斯琐罗亚斯德教与西域祆教的研究，早于中国学者多年，②但在此之前，也鲜见如此明晰的表述。《火》文还把当时已知的古代汉文献中提及西域祆教的纪录，网罗殆尽，后人几乎只能从新发现的文献中才可以找到可资补充者。因此，尽管《火》文以西域祆教在中国内地传播为主要内容，对波斯琐罗亚斯德教史亦未作系统的考察，但现代中国学者之涉及内陆欧亚祆教的研究，实以此篇为发轫。

二、20世纪80年代前的研究概况

根据上述陈垣先生对火祆教起源的论述，当代中国学界一般用“祆教”或“火祆教”的称谓，作为西文 Zoroastrianism 的意译，而用“琐罗亚斯德教”作为其音译。也就是说，一般都把汉籍记载的西域胡人所信奉的祆教，比定为西方学界所指的琐罗亚斯德教。③因此，就内陆欧亚祆教的研究，实际就应包括三个主要内容，即西

① 《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304页。

② 早在1899年，就有高桥重藏在东京帝国大学哲学会的《哲学杂志》，发表长文《波斯教大意》（刊14编146～149号，第258～563页），就波斯琐罗亚斯德教的起源、经典、教理、教徒义务、礼仪，以及该教的沿革作了全面的介绍；至1921年，复有木村鹰太郎将该教的经典《阿维斯陀经》译成日文刊行（见《世界圣典全集》第八、九卷，东京世界圣典全集刊行会印行）。

③ 西方学者实际亦多这样对译，如 A. E. Dien, *A Note on Hsien* 祆 *Zoroastrianism*, Oriens, Vol. 10, No. 1, 1957 Leiden, pp. 284～28.



域胡人祆教、波斯本土的琐罗亚斯德教，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

就这三个内容，自从1923年陈垣先生的《火》文发表之后，直到20世纪70年代结束，实际并无甚进展。中国不仅没有任何讨论或介绍波斯琐罗亚斯德教的专著出版，即便是与祆教有关的文章，也寥寥无几。就笔者所知，不外是下面几篇：1941年刘铭恕先生的《元人杂剧中所见之火祆教》，[①] 1964年《西安发现晚唐祆教徒的汉·婆罗钵文合璧墓志》的报导，[②] 1978年香港中文大学饶宗颐教授的《穆护歌考》[③]。当然，在中国通史、隋唐断代史专著，或有关古代西域的历史著作中，免不了提及祆教，但多是重复陈垣先生的论述，或辞书性的一般介绍；较有新见者，学界惟推向达先生1933年发表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中《西亚新宗教之传入长安》一节。[④] 该等文章，虽然均与西域胡人祆教有关，但其研究空间主要

---

① 刘铭恕：《元人杂剧中所见之火祆教》，《金陵学报》第11卷1期，1941年，第35～50页。该文收集元人杂剧中涉及祆之文字甚多，足补陈垣先生《火》文所未注意者。

②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西安发现晚唐祆教徒的汉·婆罗钵文合璧墓志》，《考古》1964年9月号，第458～461页。其间所说的墓志，无疑是中国内地波斯琐罗亚斯德教的一个重要考古发现，但迟到20世纪90年代初，国人才有相关的研究成果发表，是为刘迎胜教授的《唐苏谅妻马氏汉、巴列维文墓志再研究》(《考古学报》1990年第3期，第295～305页)。在此之前，外国学者已就此墓志的波斯文字进行解读，如伊藤义教《西安出土汉·婆合璧墓志婆文语言学的试释》(《考古学报》1964年第2期，第195～202页)，德国宗德尔曼(W. Sundermann)和蒂洛(Thomas Thilo)合撰的《西安中古波斯文·汉文合璧墓志》(*Zur mittelpersisch-chinesischen Grabinschrift aus Xi'an*, Mitteilungen des Instituts für rientferschung, Band XI 1965 , pp. 437～450)。

③ 饶宗颐：《穆护歌考》，《大公报在港复刊卅周年纪念文集》下卷，1978年，第733～771页。该文已收入饶氏著：《选堂集林》中册，香港：中华书局，1982年。《文辙》(下)，台北：学生书局，1991年。并见《饶宗颐史学论著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401～441页。是文论述火祆教入华的早期史料及其对文学、音乐、绘画之影响。

④ 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第89～95页。

放在中国内地，而不是内陆欧亚。因此，可以说，自《火》文发表后半个世纪时间，中国学界有关内陆欧亚祆教的研究，乃停滞不前。造成这一局面，与社会政治原因固然有关，但不能像其他一些人文学科领域那样，单纯归咎于此。窃以为，其间与该领域研究的特殊难度恐大有关系：缘内陆欧亚祆教的研究，除了需要具备比较宗教学的根底外，更需要古代内陆欧亚史地、民族、文字等知识的深厚积累。因此，即便是海外华人学者，在50年代以后，其学术研究未受政治因素的多大干扰，但于该领域亦无甚建树。

祆教研究低沉状况，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而大为改观。1980年6月，北京中华书局出版了《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集，其中将陈垣先生《火祆教入中国考》收入，使学界在阔别多年之后，得以重温这篇奠基性的文章；次年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主办的《世界宗教研究》，又将国立澳洲大学柳存仁教授的力作《唐前火祆教和摩尼教在中国之遗痕》全文发表。[①]这两件事似乎标志着大陆学界祆教研究热潮的到来。

柳教授的文章原是提交1973年7月巴黎举行的第29届国际东方学研讨会上的论文。该文旁征博引，根据中外史籍和《道藏》文献，论证西域火祆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应早于陈垣先生原来考定的公元6世纪初，而在5世纪初甚至更早些。其推证方法，尽管有日本学者不予认同，[②]但其观点在国际学界中却颇受

① 《世界宗教研究》1981年第3期，第36～61页。原文见：Liu Ts'un-yan, "Traces of Zoroastrian and Manichaean Activities in Pre-T'ang China",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Hall of Harmonious Wind*, Leiden: E. J. Brill 1976, pp. 3～25. 柳教授另以中文撰《"徐直事为"考——并论唐代以前摩尼、拜火教在中国之遗痕》，收入香港中国语文学会编：《王力先生纪念论文集》，香港：三联书店，1986年，第89～130页。是文修订稿《唐代以前拜火教摩尼教在中国之遗痕》，收入柳氏著：《和风堂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495～554页。

② 福井文雅：《柳存仁〈唐以前にゾロアスター教とマニ教の活动の形迹〉についての方法论》，《池田末利博士古稀纪念——东洋学论集》，广岛，1980年，第771～785页。



重视。① 陈垣先生的文章发表长达半个世纪，对其文章中一些重要的观点，包括火祆教入华时间的考定，殆未曾遭到任何挑战或修正，柳教授文章的质疑可说是第一篇。在大陆学术界与国外隔绝多年之后，得到如此新颖的信息，无疑引起了学者们的兴趣。② 尔后，诸多领域的学者，包括历史学、敦煌学、伊朗学、宗教学、考古学、民族学等等，都开始注意祆教的问题。为了认清祆教在中国内地的衍变，就不得不追根溯源，探讨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及其在中亚地区的流播情况。

三、对波斯琐罗亚斯德教的探索

波斯琐罗亚斯德教，因教主琐罗亚斯德（Zoroastre）而得名。琐罗亚斯德，南宋姚宽《西溪丛语》作“苏鲁支”。其本应作查拉图斯特拉（Zarathustra），缘古希腊人讹音而沿袭为琐罗亚斯德。所谓琐罗亚斯德教，即信仰先知查拉图斯特拉启示之宗教，西方学界对其尚有多种别称：因认为该教主张善恶二元论，视善恶二元论为其教义之核心，故名之为二元神教（Dualism）；由于该教所崇拜的最高神为阿胡拉·玛兹达（Ahura Mazda），所以亦多称为玛兹达教（Mazdeism）；由于该教的僧侣曰麻葛（Magi），故或谓之麻葛教

① 香港《明报》1973年第12期，曾刊素兰：《摩尼教和火祆教在唐以前入中国的新考证》（第72～76页），报导报告的主要内容。

② 从公元4世纪中西交通的情况考察，火祆教传入中国西北地区的历史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着的。即使把时间再往前推，也未尝不可。如今，把时间前推已成为主流看法。专门讨论该问题的文章主要有拙文《火祆教始通中国的再认识》，《世界宗教研究》1987年第4期，第13～23页。荣新江：《祆教初传中国年代考》，《国学研究》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35～353页。林梅村：《从考古发现看火祆教在中国的初传》，《西域研究》1996年第4期，第54～60页。

(Magism)；该教认为圣火是最高神的化身，以拜火为其最突出的外部特征，是故又常被教外人称为拜火教（Fire-worship）。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国人对这一宗教的了解，除了少数学者直接得自国外读物之外，多来自辞书的条目解释，或是通过汉译的外国史籍，得到某些一般性的知识。① 1984 年，黄心川先生发表的《琐罗亚斯德教简介》一文，是国人撰写的第一篇较为全面介绍琐罗亚斯德教的文章。② 该文内容包括了该教创立者之生平，该教的经典、教义及其神话体系，该教的礼仪习俗和教阶制度，还有该教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等。至此，国人总算可以通过国内自己的出版物，了解该教的一般知识。继黄先生之后，一般性介绍波斯琐罗亚斯德教的文章不绝如缕，其中较有分量的，当数朱昌颐先生的《琐罗亚斯德教》③和龚方震先生的《祆教：四方宗教融合的一环》。④

除了一般性介绍外，也有一些论文专门探讨琐罗亚斯德教的教义者，其间，以元文琪先生系列性文章⑤最受注目。龚方震先生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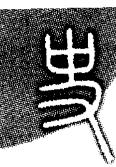
① 30 年代王云五主编的百科小丛书，包括了一本《世界宗教史》（加藤玄智著，铁铮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年），其第六章《波斯之宗教》，对琐罗亚斯德教有较为详细的介绍，篇幅达 16 页之多。国人对该教的较全面了解，最早可能就是通过这类译著。

② 黄心川：《琐罗亚斯德教简介》，《世界宗教资料》1984 年第 4 期，第 25～30、14 页。是文经修订收入作者主编：《世界十大宗教》，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 年，第 30～42 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北京·上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 年）有关的条目，采用了该文相应的内容（见第 382 页）。

③ 朱昌颐：《琐罗亚斯德教》，见罗竹风主编：《宗教通史简编》第七编第一章，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年，第 519～527 页。

④ 龚方震：《祆教：四方宗教融合的一环》，见龚氏著：《融合四方文化的智慧》（中国的智慧丛书），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 年 8 月，第 63～77 页。

⑤ 元文琪：《琐罗亚斯德如是说》，《外国文学研究集刊》第 10 辑，1985 年，第 257～281 页。《波斯古经〈阿维斯塔〉》，《外国文学研究》，1986 年第 1 期，第 55～99 页。《〈阿维斯塔〉神话与琐罗亚斯德教哲理》，《世界宗教研究》1987 年第 4 期，第 1～12 页。《琐罗亚斯德教与摩尼教的比较研究》，《世界宗教研究》1997 年第 3 期，第 58～70 页。



笔者亦有文章讨论。① 毋庸讳言，对琐罗亚斯德教教义的深入研究，需要深厚的伊朗学和比较宗教学的知识，而这方面我国目前与国际的差距尚比较大，有待国人努力。

国际学界对波斯琐罗亚斯德教的研究长达二百多年，中国学界几无所知，陈垣先生的文章局限于本国的资料，对国外的研究情况甚少提及。② 至20世纪80年代末，有关琐罗亚斯德教的研究史，国内始有专文发表。③ 但迄今中国尚未见有国外琐罗亚斯德教专著的译本出版，只有在综合性的宗教译著中，包含了该教的内容，如魏庆征先生译的《世界各民族历史上的宗教》④。令人欣慰的是，一些与琐罗亚斯德教研究密切相关的古典名著，已被汉译印行，如王以铸先生翻译的希罗多德《历史》⑤，耿昇先生翻译的马苏第《黄金草原》等。⑥ 当然，吾人绝不能满足已有的成绩。日后，有计划地把国外该领域研究的杰出的成果，诸如博伊斯（M. Boyce）教授的

---

① 龚方震：《琐罗亚斯德教对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影响》，叶奕良编：《伊朗学在中国论文集》第1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5～20页。《印欧人的密特拉崇拜》，见胡守为主编：《陈寅恪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709～736页。拙文《从一神论及善恶二元思想看唐代三夷教》，见拙著《波斯拜火教与古代中国》，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5年，第165～174页。

② 《火》文仅提到“近日本世界圣典全集刊行会新译有火祆教经名阿威士陀经已出版”（见《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集，第320页）。此处所云，当谓木村鹰太郎译《アヱスタ经》，《世界圣典全集》第八、九卷，东京：世界圣典全集刊行会，1921年。

③ 拙文《近代琐罗亚斯德教研究的滥觞》，《百科知识》1989年第4期，第26～27页；《祆教的原始经典〈伽萨〉》，《世界宗教资料》1989第1期，第10～14页；《〈阿维斯陀经〉及其研究概况》，《西南亚研究》1989年第1期，第46～48页。

④ 魏庆征译，谢·亚·托卡列夫著：《世界各民族历史上的宗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见是书第18章《伊朗的宗教（玛兹达教）》，第368～381页。

⑤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

⑥ 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琐罗亚斯德教史》[①]、德国格尔纳德（Geldner）翻译的《阿维斯陀经》[②] 等权威著作汉译出版，对促进国内的研究显属必要。

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中国出版了三部有关琐罗亚斯德教研究的专著：

1995年台北出版拙著《波斯拜火教与古代中国》，[③] 是书介绍琐罗亚斯德教的原典及礼仪，对国内外有关研究论著目录，收集较为丰富，为国人的进一步探索提供方便。

1997年北京出版元文琪先生《二元神论：古波斯宗教神话研究》。[④] 作者专治波斯文学，谙波斯语，对琐罗亚斯德教的义理有较全面的论述。

1998年，上海出版了龚方震先生和晏可佳先生合撰的《祆教史》。[⑤] 该书以"祆教"对译整个琐罗亚斯德教，论述上自波斯琐罗亚斯德教的起源，下迄该教的现状，地域包括波斯、中亚、中国、印度等。国外部分，多属综合国际的研究成果；中国部分，则不乏作者的研究心得。该书是我国第一部较为系统、全面介绍琐罗亚斯德教历史的著作，信息量较丰富。从书中所征引的国内外诸多文献，可见作者用力之勤。是书至少为国人从事内陆欧亚祆教研究，提供较为全面的基础知识。

在20世纪90年代，有关琐罗亚斯德教的研究甚至像其他宗教研究那样，亦成为学位论文的选题。[⑥] 就笔者所知，目前尚有不少

---

① M. Boyce, *A History of Zoroastrianism*, Vol. I, 1975; Vol. II, 1982; Vol. III, 1991; E, J. Brill, Leid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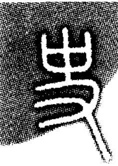
② K. F. Geldner, *Die Zoroastrische Religion* (*Das Avesta*), Tübingen 1926.

③ 《波斯拜火教与古代中国》，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5年。

④ 元文琪：《二元神论：古波斯宗教神话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⑤ 龚方震、晏可佳：《祆教史》，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⑥ 如高永久：《西域古代民族宗教综论》（高校文科博士文库），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该书第二章为《西域琐罗亚斯德教及其考古文化》。



年轻的硕士生和博士生，正从事该课题的研究，跟上国际步伐，当属该辈之使命。

四、对九姓胡祆教入华的考察

根据国外学者的调查研究，迄今尚无法证明古代波斯琐罗亚斯德教的经典，曾被正式翻译成其他民族文字，因而，一般都认为该教不像其他一些世界性宗教那样，热衷于向不同文化圈的民族扩张。其在中国的传播，实际并非通过该教教士的传教活动，而是以信仰祆教的西域移民为载体。活跃在中国内地的祆教徒，尽管不排除来自波斯本土的琐罗亚斯德教徒，[①] 亦不排除内陆欧亚的其他民族，[②] 但乃以九姓胡（粟特人）祆教徒为主体。20 世纪 80 年代后，学界对此已日益取得共识。学者们考察该教的入华传播，首先注意的是西域胡人聚落在西北地区的形成。张广达《唐代六胡州等地的昭武九姓》[③]，芮传明《粟特人在东西交通中的作用》[④]，陈国灿《魏晋至隋唐河西人的聚居与火祆教》[⑤]，荣新江《祆教初传中国年代考》、《西

---

① 拙著《唐季“大秦穆护祆”考(下)》,《文史》第 49 辑,1999 年,第 101～112 页。

② 突厥民族亦有事火祆者，国人有关的研究参阅蔡鸿生：《论突厥事火》，《中亚学刊》第 1 辑，北京：中华书局，1983 年，第 145～149 页。王小甫：《“弓月”名义考》，《季羡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351～363 页。并见王氏著：《唐吐番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年，第 224～242 页。《弓月部落考》，附录于王氏著：《唐吐番大食政治关系史》，第 243～256 页。

③ 张广达：《唐代六胡州等地的昭武九姓》，《北京大学学报》1986 年第 2 期；收入张氏著：《西域史地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第 249～276 页。

④ 芮传明：《粟特人在东西交通中的作用》，《中华文史论丛》1985 年第 1 辑，第 49～67 页。

⑤ 陈国灿：《魏晋至隋唐河西人的聚居与火祆教》，《西北民族研究》1988 年第 1 期，第 198～282 页。

域粟特移民考》、《北朝隋唐粟特聚落的内部形态》[①] 诸文，对该问题都有灼证。当然，对粟特人聚落的系统研究，并非我国首创，60年代，日本池田温先生便已经发表了《八世纪中叶敦煌的粟特人聚落》[②]。国内学者，除了对粟特人进行群体考察，也有进行个案研究者。荣新江教授的《安禄山的种族与宗教信仰》一文,[③] 可谓一个范例。根据该文的考证，改变唐代历史的重要人物胡人安禄山，也是一个祆教徒。

20世纪90年代伊始，姜伯勤教授根据敦煌写本P.4518（24）的白画图像，考证其为粟特的祆教神祇。[④] 尔后，旅法的张广达教授续对该画之神祇名称又重新考证。[⑤] 就神的具体名称，两家的结论虽然不同，但把其属性定为粟特祆教神祇，两家观点则是一致。这幅珍贵的粟特祆神画，作为考古实物，进一步证明了中国流行的祆教与粟特人的内在联系。姜教授在其20世纪末发表的《安阳北齐石床画像石的图像考察与入华粟特人的祆教美术》,[⑥] 虽然主旨是探

① 荣新江：《祆教初传中国年代考》，《国学研究》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35～353页；《西域粟特移民考》，《西域考察与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57～172页；《北朝隋唐粟特聚落的内部形态》，见荣氏著：《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111～168页。

② 池田温：《8世紀中叶における敦煌のソグド人聚落》，《ユーラシア文化研究》一，1965年，第49～92页。已有辛德勇汉译本，见《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九卷，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140～220页。

③ 荣新江：《安禄山的种族与宗教信仰》，载《第三届中国唐代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国唐代学会编辑委员会编，1997年，第231～241页。

④ 姜伯勤：《敦煌白画中的粟特神祇》，《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0年，第296～309页；收入姜氏著：《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北京：中国社科会学出版社，1996年，第179～195页。

⑤ 张广达：《唐代祆教图像再考》，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17页。

⑥ 姜伯勤：《安阳北齐石棺床画像石的图像考察与入华粟特人的祆教美术》，《艺术史研究》第1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51～186页。



讨祆教的美术，依据的是20世纪初叶河南省安阳近郊出土的北齐石棺床的雕刻；但作者把散流国外诸博物馆石棺床图片加以缀合复原，[①] 构造出一幅描绘古代粟特祆教徒举行祭祀仪式和赛祆活动的逼真图像。

当然，笔者也注意到学界仍有人认为"在中国传播祆教的主体是波斯人"，[②] 惜未见论者作出任何学术性的论证，故不敢采信。除了对粟特人聚落的研究，学者们也努力从文献或考古发现中，爬梳钩沉陈垣先生未及注意的资料，寻找胡人祆教在西北地区早期活动的痕迹；或者根据已知的一些资料，力图勾勒祆教在古代中国西北地区的盛行图，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③]笔者注意到，随着祆教研究

---

① 国内学者从祆教角度来考察该安阳出土物的，最早是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施安昌先生，其《北魏冯邕妻元氏墓志纹饰考》一文（《故宫博物院院刊》1997年第2期，第73～85页），把国外有关石棺雕刻的部分照片刊布，并认定其与祆教的关系。施先生续有《北魏苟景墓志及纹饰考》（《故宫博物院院刊》1998年第2期，第21～29页）、《北齐粟特贵族墓石刻考——故宫博物院藏建筑型盛骨瓮初探》（《故宫博物院院刊》，1999年第2期，第70～78页）二文，均涉及该石刻。

② 见彭树智：《唐代长安与祆教文化的交往》，《人文杂志》1999年第1期，第96～103页。

③ 有关文章举要如下：王素《魏晋南朝火祆教钩沉》，《中华文史论丛》1985年第2辑，第225～233页。龚方震：《西域宗教杂考》，《中华文史论丛》1986年第2辑，第258～27页。周菁葆：《西域祆教文明》，《西北民族研究》1991年第1期，第115～124、90页。陈世良：《天山之"天"与祆教之"祆"》，《敦煌研究》1990年第4期，第47～56页。高永久：《西域祆教考述》，《西域研究》，1995年第4期，第77～83页。林梅村：《从考古发现看火祆教在中国的初传》，《西域研究》1996年第4期，第54～60页。勾勒该教东传路线的文章有张乃翥：《中原出土文物与中古祆教之东浸》，《世界宗教研究》1992年第3期，第29～39页。并见北京图书馆敦煌吐鲁番学资料中心、台北《南海》杂志社合编：《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集》，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81～97页。孟宪实：《麴氏高昌祀部班祭诸神及其祭祀制度初探》，《新疆文物》1991年第3期，第71～79页。钱伯泉：《从祀部文书看高昌麴氏王朝时期的祆教及粟特九姓胡人》，《新疆文物》1990年第3期，第93～101页。

热，中国学界中似乎也产生了一种祆教情结，把一些属于伊朗文化的内容都冠以祆教文明，仿佛可以用祆教文明来概括古代伊朗高原的主流文化。当然，对这样一个问题，是需要进行谨慎探索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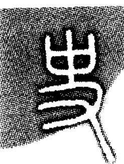
在对九姓胡祆教的研究中，20 世纪末的一大成就是澄清了对“萨宝”一词的认识。长期以来，祆教研究一直为萨宝问题所困扰。唐代开设萨宝府，置有祆正、祆祝之职。很多学者因此而把萨宝目为管理祆教徒的职官，于是对萨宝之研究，长期以来被视为火祆教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学者从其语源、职责、演变等方面，进行了多方面的考察，由于其中疑点甚多，故各家聚讼纷纭，相持不下。整个 20 世纪，中外专门讨论或涉及该问题的论著不绝如缕。① 而在 1998 年同时发表的姜伯勤《萨宝府制度源流论略》② 和罗丰《萨宝：一个唐朝唯一外来官职的再考察》，③ 显然都是企图对这个问题进行终结性的讨论。这两篇文章，都对既往的研究进行了认真的审视和总结，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诸多新的考古资料，提出自己的新结论。就萨宝一词的语源，两篇文章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即该词源自印度佛经，本意为商主。如是，该词本与火祆教无关。两篇文章的研究，表明萨宝一词流经中亚地区，为粟特人所借用，成为粟特人大首领的称呼。两文都把萨宝府定位为管理侨民的机构，排

---

① 专门讨论萨宝的文章主要有：P. Pelliot, *La Sa-pao*, *Bulletin de l'Ecole Francaise d'Extreme-Orient*, III, 1903, pp. 665～671. 藤田丰八：《萨宝について》，《史学杂志》第三十六编第三号，1925 年，第 195～215 页。友松圆谛：《藤田博士の〈萨宝に就いて〉を读む》，《史学》第四卷，1925 年，第 307～310 页。A. E. Dien, *The Sa-pao problem re-examined*, *JAOS*, 82, 1962, pp. 335～346. 杨宪益：《萨宝新考》，收入《译余偶拾》，北京：三联书店，1983 年，第 317～337 页。荒川正晴：《北朝隋・唐代における〈萨宝〉の性格をめぐって》，《东洋史苑》第 50～51 合并号，1998 年 2 月，第 164～186 页。

② 姜伯勤：《萨宝府制度源流论略》，饶宗颐主编：《华学》第 3 辑，1998 年，第 290～308 页。

③ 罗丰：《萨宝：一个唐朝唯一外来官职的再考察》，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 4 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第 215～249 页。



除把萨宝当为祆教官职的传统看法。有趣的是，在20世纪末年发表的芮传明《“萨宝”的再认识》①，所阐明的观点正好与姜、罗二文不谋而合。对上述三文中的某些具体论证和观点，学者也许不尽同意；但否定萨宝为祆教官职，窃以为完全可以成立。以萨宝为名开府，显然是旨在管理监控西域移民，由于移民中祆教徒众多，故府下特设专职官员祆正、祆祝管理之。萨宝府有专职官员管理祆教事务，并不意味着萨宝便是一个宗教官职。迄今未见有任何资料足以证明萨宝是一个宗教职称，是火祆教僧侣的一个等级。因此与其把萨宝当为一个宗教名词，不如把其目为世俗的职务名称。有关萨宝的研究，固然与火祆教研究有关，但并非祆教研究题中之意。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人对九姓胡祆教的礼俗颇为重视。孙培良教授率先发表《祆教杂记》，② 以中国文献和国外资料互证，揭示了祆教在华所保持的一些习俗，为陈垣先生所未注意。学者们的研究，多聚焦于敦煌的祆教礼俗。当年陈垣先生发表《火祆教入中国考》时，对敦煌文书中涉及火祆教的资料，征引甚少。倒是日本学者留意，多所辑录。20世纪最后20年国内对敦煌火祆教的研究，应该说，主要是在日本学者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因为所采用的资料，大部分都见诸日本学者已发表的文章。③ 敦煌遗书涉及祆教的纪录，

---

① 芮传明：《“萨宝”的再认识》，《史林》2000年第3期，第23～39页。

② 孙培良：《祆教杂记》，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会编：《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会首届年会学术论文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5～45页。

③ 如：石田幹之助：《支那に於けるザラトゥーシトラ教に就いて》，《史学杂志》第34编第4号，1923年，第80～90页。神田喜一郎：《燉煌二十咏に就いて》，《史林》第二十四卷第四号，1939年10月，第173～181页。收入《神田喜一郎全集》第一卷，东京，1986年，第104～117页。《素画に就いて》，《东洋史研究》第五卷第三号，1940年。收入《神田喜一郎全集》第一卷，东京，1986年，第85～88页。小川阳一：《敦煌における祆教庙の祭祀》，《东方宗教》27，1967年，第23～34页。那波利贞：《祆庙祭祀小考》，《史窗》第10号，1956年，第1～27页。

多是有关当地的祆教寺庙和赛祆活动。20 世纪 80 年代由我国著名敦煌学家施娉婷先生所披露的敦煌写本《酒帐》，里面多条关于赛祆的记载，为以往日本学者所未知。① 涉及敦煌火祆教研究的论著不少，② 最有分量的当推姜伯勤教授 1993 年发表的《论高昌胡天与敦煌祆寺》③。姜教授 20 世纪末撰写，21 世纪元年发表的《唐敦煌城市的礼仪空间》④，对敦煌地区祆教的礼仪，也有精辟的分析。就现有的研究，我们可以确信唐代以至五代时期，敦煌地区有祆教流行；作为该教活动中心寺庙的存在，便是明证。不过，该教流行的群体，究竟是当地胡人，还是汉人，抑或两者兼有之，这还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至于胡人的身份，是根据姓氏血统来判断，⑤ 还是像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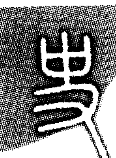
① 施娉婷：《本所藏〈酒帐〉研究》，《敦煌研究》创刊号 1983 年，第 142～155 页。张广达先生与葛乐耐（F. Grenet）合撰在海外发表的《粟特宗教的最后避难地——九、十世纪的敦煌》（F. Grennet & Zhang Guangda, "The Last Refuge of the Sogdian Religion: Dunhuang in the Ninth and Tenth Centuries", *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 new series, 10, *Studies in Honor of Vladimir A. Livshits*, 1996, PP. 175－186.），对该等资料多有介绍。

② 举要如下：姜伯勤：《敦煌与波斯》，《敦煌研究》1990 年第 3 期，第 1～15 页。《论高昌胡天与敦煌祆寺》（见注 3）。《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 年。马德：《〈敦煌廿咏〉写作年代初探》，《敦煌研究》创刊号 1983 年，第 179～186 页。谭蝉雪：《敦煌祈赛风俗》，《敦煌研究》1993 年第 4 期，第 61～67 页。《"君者者状"辨析》，1994 年敦煌国际研讨会论文，敦煌，1994 年 8 月。李正宇：《敦煌傩散论》，《敦煌研究》1993 年第 2 期，第 111～122 页。Zhang Guangda & F. Grennet, "The Last Refuge of the Sogdian Religion: Dunhuang in the Ninth and Tenth Centuries", *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 new series, 10 (*Studies in Honor of Vladimir A. Livshits*), 1996, pp. 175～186.

③ 姜伯勤：《论高昌胡天与敦煌祆寺》，《世界宗教研究》1993 年第 1 期，第 1～18 页。

④ 姜伯勤：《唐敦煌城市的礼仪空间》，《文史》第 55 辑，2001 年 7 月，第 229～244 页。

⑤ 参阅郑炳林：《唐五代敦煌粟特人与归义军政权》，《敦煌研究》1996 年第 4 期，第 80～96 页。



寅恪先生倡导的种族文化观那样，根据文化背景来划分，这也是在考察敦煌地区民族信仰值得注意的问题。池田温先生早就指出："敦煌的祆神尽管还是保留着祆神的名称，但是其实际机能已经完全同中国的礼仪以及民间信仰相融合，与汉人的信仰合为一体。"①池田先生这一观点对于我们确定敦煌祆神崇拜的性质，无疑颇有启示意义。窃以为，对敦煌地区的赛祆活动，与其从宗教传播的角度，毋宁从民俗交流的角度来理解，也许更切合实际。②

五、对中亚地区祆教性质的再认识

对中亚祆教的重新定性，乃是20世纪末叶中国学界对内陆欧亚祆教研究取得的一项炫人成就。以往学界把汉籍所载的祆教简单等同于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随着总体研究水平的提高，已日益认识到在中亚传播及流入中国的祆教与波斯原教旨的琐罗亚斯德教之间，不但存在着量的不同，而且已有质的差异。这可说是认识的飞跃。

就这个问题，苏联学界已经有所注意，其在俄属突厥斯坦的考古发掘中，出土大量中亚火祆教遗址遗物，其学者在此基础上撰写的论著，如：巴托里德《突厥斯坦简史》③、拉波波尔特《火祆教葬仪沿革述略》④、沙里亚尼基《最新考古发现所见的琐罗亚斯德

① 池田温：《8世纪中叶における敦煌のソグド人聚落》，引文见汉译本，《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九卷，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143页。

② 参阅王青：《论西域文化对魏晋南北朝道教的影响》，《世界宗教研究》1999年第2期，第33～42页；拙文《波斯琐罗亚斯德教与中国古代的祆神崇拜》，余太山主编：《欧亚学刊》第1辑，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207～227页。

③ V. V. Barthold, *A Short History of Turkestan*, *Four Studies on the Central Asia*, Leiden 1962.

④ Y. A. Rapoport, *Some Aspects of the Evolution of Zoroastrian Funeral Rites*, Труды дпмкв, Т. Ш., Москва, 1963, pp. 127～132.

教问题》[1]、菲拉诺维奇《粟特和竭石早期中世纪火庙》[2] 等，对流行中亚的火祆教提出独到的见解，认为其与萨珊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有明显的不同，尤其是葬俗，以盛古瓮代替安息塔。这些观点引起了中国学者的重视。[3] 有关九姓胡的一些习俗，尤其是葬俗，各国学者研究很多。[4] 其间虽然有与波斯阿契美尼时期的琐罗亚斯德教相类之处，但与萨珊波斯琐罗亚斯德教经典的规定已大异其趣。蔡鸿生先生在其《论突厥事火》、《唐代九姓胡礼俗丛考》[5] 二文中，都十分注意中亚地区流行的祆教与正宗波斯琐罗亚斯德教的不同。

姜伯勤教授在探讨敦煌吐鲁番的祆神崇拜时，也认为其有别于波斯萨珊王朝的正统琐罗亚斯德教。[6] 1995 年，蔡鸿生先生根据陈寅恪先生有关文化移植发生变异的理论，提出唐宋火祆教“已非波

---

① В. И. Сарианиди, “Зорастрийская проблема и в свете новейших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х открытий”, *Москва*, ВДИ, 2, 1989.

② М. И. Филанович, “К Миполлгий раннесрдневековых свямилищ огня Согда и Чача”, см. *Город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Бактрии — Тохаристана и Согда*, Ташкент, 1987.

③ 参阅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北京：中华书局，1998 年，第 135 页。

④ 参阅拙文《火祆教的葬俗及其在古代中亚的遗痕》，《西北民族研究》1990 年第 1 期，第 61～67 页；又见拙著《波斯拜火教与古代中国》，第 85～104 页。荒木茂：《マヅダ教徒の埋葬に就いて》，《宗教研究》新第六卷第二号，1929 年，第 131～140 页。

⑤ 蔡鸿生：《论突厥事火》，《中亚学刊》第 1 辑，北京：中华书局，1983 年，第 145～149 页；《唐代九姓胡礼俗丛考》，刊《文史》第 35 辑，北京：中华书局，1992 年，第 109～125 页。二文并见蔡氏著《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北京：中华书局，1998 年。

⑥ 姜伯勤：《论高昌胡天与敦煌祆寺》，《世界宗教研究》1993 年第 1 期，第 1～18 页；经修订作《高昌胡天祭祀与敦煌祆祀》，收入蔡氏著《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年，第 477～505 页。

斯本土之正宗，而为昭武九姓之变种”的论断；[①] 亦即明确地指出粟特人所奉祆教并不等同于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而是其变种。这一提法，越来越为学界所认同。北京大学荣新江教授提出了“粟特系祆教”这一概念，[②] 就是对蔡先生观点的呼应。

学界对中亚祆教特色的认识，大体都是出自对其礼俗研究的结果。而这从历史渊源上是可以找到解释的。粟特人曾与波斯琐罗亚斯德教会有过密切的联系。早在波斯的阿契美尼（Achaemenin）王朝时期（前 600～330 年），琐罗亚斯德教便在波斯全境流行。[③] 当时粟特人所居住的中亚地区乃属波斯的一部分，其奉该教也就理所当然。但古波斯在马其顿征服并希腊化时期，琐罗亚斯德教几乎湮灭，直到帕提亚（Parthia）王朝（前 247～公元 224 年）的晚期才复苏，到萨珊王朝才臻鼎盛。这期间，波斯的政治版图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粟特地区已不属于萨珊王朝的统治了。也就是说，当萨珊王朝用政权力量来完善和推行琐罗亚斯德教的时候，粟特人已是波斯帝

① 见拙著《波斯拜火教与古代中国·蔡序》，台北：新文丰出版社，1995 年，第 1 页。是序收入蔡鸿生《学境》，香港：博士苑出版社，2001 年，第 154～155 页。原文如下：“中古三夷教，均经中亚传入中国，由河中而达河西，文化史上属于间接传播一路。陈寅恪先生读《高僧传》，对文化移植发生变异之利弊得失，有如下精辟识语：‘间接传播文化，有利亦有害：利者，如植物移植，因易环境之故，转可发挥其特性而为本土所不能者，如基督教移植欧洲，与希腊哲学接触，而成欧洲中世纪之神学、哲学及文艺是也。其害，则展转间接，致失原来精意，如吾国自日本、美国贩运文化中之不良部分，皆其近例。然其所以致此不良之果者，皆在不能直接研究其文化本原。’据此类推，唐宋火祆教与其文化本原相比，或因‘展转间接’而染上中亚色彩，已非波斯本土之正宗，而为昭武九姓之变种，亦未可知。”

② 见荣新江：《粟特系祆教的流传及其在艺术上的影响》，提交“汉唐之间：文化互动与交融学术研讨会”论文，北京大学考古系，2000 年 7 月 5～9 日。参阅荣氏著《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北京：三联书店，2001 年，第 301～325 页。

③ 详参 Mary Boyce，*Zoroastrians: Their Religious Beliefs and Practices*，Longdon 1979，pp. 48～77.

国“化外”之人了。他们在阿契美尼时期所接受的琐罗亚斯德教，历经几百年外族的征服、外来宗教的摧残，究竟保存了多少呢？其间又吸收糅合了多少其他宗教的成分呢？这些都是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无疑，唐代的粟特人不少流行着火崇拜和天崇拜，但在古代内陆欧亚诸民族中，亦普遍地存在着这些崇拜。既然萨珊王朝无从用政府行为来规范粟特人的宗教信仰，那么，即便萨珊王朝奉为国教的正宗琐罗亚斯德教对粟特人有所影响，我们也很难评估有多少粟特人皈依其正宗。既往的研究（包括笔者本人），由于忽视了这一沧海桑田的历史变迁，因而把萨珊波斯复兴起来的正宗琐罗亚斯德教，与粟特人历经几百年独立形成起来的祆教混为一谈，遂使一些问题无从解释，甚至陷于无谓的争论。尤其是对吐鲁番地区在高昌国时期（443～640年）的天神崇拜问题，其间分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各方对西域胡人信仰与正宗波斯琐罗亚斯德教之间的关系认识有差。①对粟特祆教的重新定性，可说是近20年该领域研究的最大突破。这一新的认识，对于跳脱祆教研究中的某些误区，甄别祆教的原始文物或文献资料，无疑有很大的帮助。对尔后祆教研究，将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引导学者们把更大的注意力投向古代中亚民族，尤其是粟特人的社会历史、经济文化，特别是其民俗、宗教信仰的

① 涉及该问题的论文举要如下：王素：《高昌火祆教论稿》，《历史研究》1986年第3期，第168～177页。《也论高昌“俗事天神”》，《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110～118页。拙文《论高昌“俗事天神”》，《历史研究》1987年第4期，第89～97页。西文见 Lin Wushu, “A Discussion Abou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Heaven-God in the Qoco Kingdom and the High Deity of Zoroastrianism”, *in Zentralasiatische Studien* 23 (1992/1993), Herausgegeben von Walther Heissig und Michael Weiers, Otto Harrassowitz • Wiesbaden 1993, pp. 7～12. 陈国灿：《从葬仪看道教“天神”观在高昌国的流行》，敦煌吐鲁番学新疆研究资料中心编：《吐鲁番学研究专辑》，1990年第1版，第126～139页。姜伯勤：《论高昌胡天与敦煌祆寺》，《世界宗教研究》1993年第1期，第1～18页。对上述文章观点的总结评论见荣新江：《祆教初传中国年代考》（注54）。



研究。

在20世纪末年，由于太原隋代虞弘墓和西安北郊北周安伽墓发掘的重大发现，对于古代中亚民族的习俗、信仰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1]而有关当代伊朗本土残存的琐罗亚斯德教村落的调查研究报告汉译本，[2] 据闻不日也将出版。这些对于我们认识正宗本土琐罗亚斯德教与流行中亚的祆教的差异，无疑必将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相信在21世纪，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将会更加深入，日后学界恐不会无条件地直接把波斯的Zoroastrianism对译为火祆教或祆教。

---

① 最新的发现有西安北郊北周安伽墓、太原隋代虞弘墓，相关的报告和文章有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北郊北周安伽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0年第6期，第28～35页。《西安发现的北周安伽墓》，《文物》2001年第1期，第4～26页。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晋源区文物旅游局：《太原隋代虞弘墓清理简报》，《文物》2001年第1期，第27～52页。张庆捷：《太原隋代虞弘墓石椁浮雕》，提交“汉唐之间：文化互动与交融学术研讨会”论文，北京大学考古系，2000年7月5～9日。《〈虞弘墓志〉中的几个问题》，《文物》2001年第1期，第102～108页。韩伟：《北周安伽墓围屏石榻之相关问题浅见》，《文物》2001年第1期，第90～101页。姜伯勤：《隋检校萨宝代虞弘墓石椁画像程序试探》，提交“汉唐之间：文化互动与交融学术研讨会”论文，北京大学考古系，2000年7月5～9日；收入巫鸿主编《汉唐之间文化艺术的互动与交融》，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29～47页。安伽墓的正式考古报告见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编著：《西安北周安伽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8月。

② Mary Boyce, *A Persian Stronghold of Zoroastrianism*, based on the Ratanbai Katrak Lectures 1975, Oxford 1977, repr. Universities of America Press, 1989.

第十三章　台湾的内陆欧亚史研究

内陆欧亚史在台湾的史学研究中，长期以来一直处于边陲的地位，以内陆欧亚史作为专业领域的历史学者不多，尤其近一二十年来，更面临研究人力逐渐枯竭的窘境，研究人才青黄不接的现象十分严重。本文将先介绍台湾的内陆欧亚史研究机构及其学术传承，① 再依时间先后顺序概述各时期的内陆欧亚史研究成果②（兼及部分港澳地区的研究成果），最后对过去五十余年来台湾的内陆欧亚史研究作一检讨，并展望未来发展的可能性。

一、台湾内陆欧亚史的研究传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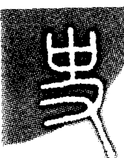
台湾的内陆欧亚史研究重心，早年主要集中在台湾大学及政治大学，当然其他如台湾师范大学、“中国文化大学”、“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等机构也有零星的学者从事研究。在台湾大学历史系早期有几位讲授内陆欧亚史的重要学者，如姚从吾与札奇斯钦两位之专长皆在蒙元史，他们在台大训练出一批优秀的近古内陆欧亚史学者，诸如陶晋生、赵振绩、萧启庆、王民信与洪金富等等。③ 另外如出

---

① 关于这个部分先前马大正已有论及，参见马大正、刘逖：《二十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7 年，第 129～151 页。

② 读者另可参考由高明士所主编之五册《中国史研究指南》（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0 年）中第 1～4 册与内亚史课题相关的部分。

③ 见萧启庆：《姚从吾教授对辽金元史研究的贡献》，第 349 页，收入萧氏著：《元代史新探》，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 年。



身锡伯族的广禄则精通满文，台湾几位精研满洲史的学者多出自其门下，如陈捷先、李学智等。在台大，广禄与其他边疆史同好于1962年组成“中国边疆历史语文学会”，并出版过《西藏研究》、《新疆研究》、《蒙古研究》等论文集。[①] 此外，台大的还有留日的郑钦仁教授专研北朝政治史。

在政治大学则有另一批研究突厥、蒙古族系的学者。1955年政大设边政学系，开设有边疆语文（蒙、维、藏文）、边疆历史、中国民族志等与内陆欧亚史有关的课程，并出版有《边政研究所年报》（现更名为《民族学报》）。[②] 所内教授维吾尔文的有阿不都拉、刘义棠，蒙古文由哈勘处伦教授，今日台湾研究突回、蒙古的学者多属上述诸位先生之门下。另外同校的东语系中亦设有土耳其语组，台湾几位研究突厥系民族的学者如陈庆隆、唐屹、林冠群等，均出自该系。

其他研究单位亦有少数的学者投入内陆欧亚史研究。重要者如早期台湾师范大学李符桐的回鹘史研究，“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陈庆隆的中亚史、突厥史研究，洪金富的蒙古史研究，邢义田的中西交通与胡人形象研究，陈光祖的中亚考古研究，杜正胜的北方民族文物研究，故宫博物院庄吉发的满洲史研究，中兴大学的王明荪的北亚史研究，文化大学王吉林、空中大学张继昊的中古北亚史研究等等。

二、通论部分

虽然台湾一直有学者从事内陆欧亚史研究，但令人遗憾的是，除了方豪先生的名著《中西交通史》[③] 外，台湾目前仍未出现一本

---

① 林恩显：《追忆边政耆老座谈会记录（一）——广禄先生》，《中国边政》第136期，1997年，第47～48页。

② 林恩显：《国内外中国边疆研究》，《边政研究所年报》第14期，1983年，第319页。

③ 台北：“中国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3年；该书1983年由台北的“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重新排印再版。

完整的通论性内陆欧亚史专著。[①] 不过尽管如此，部分的边疆民族史专著中还是包含了内陆欧亚史的内容。关于这方面较早的著作有李符桐的《边疆历史》[②]，以及刘义棠的《中国边疆民族史》[③]。其他如胡耐安的《中国民族志》[④] 亦值得一提，该书将中国境内与内陆欧亚史相关的少数民族分成通古斯族系、蒙古族系与突回族系，这种分类法对日后相同性质的专书影响很大。另外尚有一本理论性的专书是林恩显主编的《中国边疆研究理论与方法》[⑤]，本书为一学术论文集，重点在方法论的检讨。另一本值得注意的专书是札奇斯钦的《北亚游牧民族与中原农业民族间的和平战争与贸易之关系》[⑥]，书中除对双方的和战关系专章论述外，对于彼此间的和亲、通贡、互市等关系的着墨占了全书的主要篇幅，是札奇斯钦重要的著作之一。[⑦]

在通论性的论文方面，有以下几篇值得注意。陶晋生在《历史上汉族与边疆民族关系的几种解释》[⑧] 这篇文章中，将早年西方学

---

① 虽然姚大中曾在1971年出版过《古代北西中国》（台北：志成出版社）一书（该书后来在1981年改由台北的三民书局出版），但全书主要系撷取日本学者的著作内容加以编译而成，严格来说不能算是一本正式的学术著作。然不容否认的是，该书对台湾不谙日文的内陆欧亚史入门者而言，确实发挥了相当程度的启迪之功。

② 台北："蒙藏委员会"，1962。该书现收入于《李符桐论著全集（一）》，台北：学生书局，1992年。

③ 台北：中华书局，1969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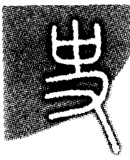
④ 台北：商务印书馆，1974年。

⑤ 台北：渤海堂文化公司，1992年。

⑥ 台北：正中书局，1972年。

⑦ 札奇斯钦先生赴美后又将之改订译为英文出版：Sechin Jagchid & Van Jay Symons, *Peace, War, and Trade Along the Great Wall*.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9. 该书的注释中将近年西方学界相关的研究成果补入，读者可另行参考。

⑧ 《思与言》第4卷第1期，1966年，第1～3页。



界对于中国与北疆游牧民族之间互动关系的几种论点作了简要的介绍；萧启庆的《北亚游牧民族南侵各种原因的检讨》① 一文，在参照东、西洋学者们的讨论后，全面剖析了游牧民族南侵各种原因，是台湾历史系学生必读的文章之一。札奇斯钦的《游牧民族军事行动的动机》② 一文，则可与前述札奇先生的专书互为参照。陈庆隆的《内亚游牧民族的船舟》③，讨论了学界甚少论及的游牧民族船舟问题，其另一篇文章《谈虏学》④，则对近年中外学界的内陆欧亚研究有所简介。

从综论的部分可以看出，台湾在内陆欧亚史通论研究方面仍有努力的空间，不过熟悉内陆欧亚史的研究者都知道，要写出兼具深度与广度的通论性文章其实并非易事，这应是学者望之却步的主要原因。

三、从青铜时代至公元前3世纪

此一时期台湾的内陆欧亚史研究不能不提到高去寻，早年他在《黄河下游的屈肢葬问题》⑤ 一文中，已经点出先秦中国北方与欧亚草原司克泰（斯基泰）一西伯利亚文化之间的关联性。另外他的《西北冈出土的殷代弓形铜器》⑥ 一文，探讨的是弓形器用途的问题，他赞同石璋如的部分说法，⑦ 认为弓形器应属当时“柲”的一

---

① 原刊《食货月刊》复刊第1卷第12期，1972年，第1～11页。后收入萧氏著：《元代史新探》，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

② 《边政研究所年报》第5期，1974年，第21～45页。

③ 《大陆杂志》第85卷第1期，1992年，第26～32页。

④ 收入《学术史与方法学的省思——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0年，第109～124页。

⑤ 《中国考古学报》第二期，1947年，第121～166页。

⑥ 《东吴大学中国艺术史集刊》第2卷，1973年，第1～9页。

⑦ 见石璋如：《小屯殷代的成套兵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2本，1950年，第19～84页。

种，可暂名之为“铜弓柲”。最近《史语所集刊》刊出了高先生完成于1935年的遗稿[①]《李峪出土铜器及其相关之问题》[②]，文中将李峪铜器放在与西北域外所谓“司克泰一西伯利亚”（Sytho－Siberian）文化的关系上去探讨，虽然该文延宕60余年才刊布于世，但在今日读来仍深具参考价值。[③] 高去寻还曾指导过一硕士论文《鄂尔多斯青铜器及其年代问题》[④]，该文认为所谓的“鄂尔多斯青铜器”应在殷末即已出现，其流行年代在纪元前一千三百年到纪元后三四百年之间。

在其他出土器物的研究方面，谭旦冏的《“肥遗”和“龙凤配”》[⑤] 一文，认为中国早期艺术中的“肥遗”和“龙凤配”主题，除了有来自内陆欧亚草原民族的影响外，也不应忽视来自海洋文化的交流。杜正胜在北方民族文物与欧亚草原文化间的交流关系上有两篇重要的文章，一是《周秦民族文化“戎狄性”的考察——兼论关中出土的“北方式”青铜器》[⑥]，文中论证了西周晚期以后关中地区与中亚和阿尔泰地区似乎存有文化交往。另一篇为《欧亚草原动物文饰与中国古代北方民族之考察》[⑦]，该文以一个历史学者的观点，对已出土的中国古代北方动物文饰提出了自己的分类法，并分析其与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欧亚草原民族间的文化交往关系。陈光祖的“The Late Prehistory of Xinjiang in Relation to Its Neighbors”[⑧]

---

① 该文原为高先生的北京大学毕业论文，见杜正胜：《高师“李峪出土铜器及其相关之问题”遗稿整理后记》，《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0本第4分，1999年，第1001～1006页。

②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0本第4分，1999年，第905～1000页。

③ 杜正胜：《高师“李峪出土铜器及其相关之问题”遗稿整理后记》，第1001页。

④ 杜承圆撰，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研究所硕士论文，1978年。

⑤ 《东吴大学中国艺术史集刊》第6卷，1976年，第1～31页。

⑥ 《大陆杂志》第87卷第5期，1993年，第1～25页。

⑦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4本第2分，1993年，第231～408页。

⑧ 见 *Journal of World Prehistory* 9/2 (1995), pp. 243～299. 该文之中文初稿《新疆金属器时代》刊于《新疆文物》1995年1期，第83～97页。



一文（与 Fredrik T. Hiebert 合著），在广泛参考西方及苏联考古学者的研究成果后，分析了金属时代史前新疆与周围邻近文化区的相互关系，他也是台湾目前较熟悉中亚史前考古的研究学者。陈芳妹的《故宫所藏殷至周初的异形兵器及其所反映的文化关系问题》①一文，认为台北故宫所藏的七件“异形兵器”（意即有异于殷周常态形制的兵器），应受到了来自于北方或西北方外来因素的影响。她的另一篇《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北方草原民族的铜兵》② 一文，对已出土的北方草原兵器和欧亚草原的相似器物做了比较研究。

在游牧社会形成的研究方面，王明珂的《华夏边缘》③ 这本专书非常值得注意，书中的《青海河湟地区游牧社会的形成》、《鄂尔多斯及其邻近地区游牧社会的形成》④、《西辽河地区游牧社会的形成》⑤ 这三篇文章论及了所谓“华夏生态边界的形成”，以既有考古材料配合西方人类学新进的研究成果，勾勒出中国古代游牧社会与农业社会分野形成的历史进程。

在东北古民族方面李学智曾有两篇文章，一是《肃慎与挹娄之商榷》⑥，文中考证肃慎至春秋战国时期已同化于华夏，而魏晋时之挹娄则非古代之肃慎，亦非通古斯系统之民族；另一篇为《谈肃慎与东夷》⑦，主张肃慎的原居地在西北而非东北，肃慎与东夷是二非

---

① 收入于《中国艺术文物讨论会论文集·器物（上）》，台北故宫博物院，1992年，第257～306页

② 《故宫文物月刊》第211期（18卷7期），2000年，第4～22页。

③ 台北：允晨文化公司，1997年。

④ 该篇原名《鄂尔多斯及其邻近地区专化游牧业的起源》，刊于《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5本第2分，1994年，第375～434页。

⑤ 该篇原名《辽西地区专化游牧业的起源：兼论华夏边缘的形成》，刊于《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7本第1分，1996年，第195～238页。

⑥ 《大陆杂志》第14卷第6期，1957年，第14～19页。

⑦ 《(政治大学)民族社会学报》第16期，1978年，第113～127页。

一，而夷并不专指古代东方民族。桑秀云女士的《东夷与朝鲜的关系》[①] 一文，则探讨了东夷古民族与朝鲜古代民族在文化上的关联性。

纵观本时期台湾的内陆欧亚史研究，主要以史语所的成员为重心，而欧亚草原与古代中国文明间的文化互动，近年来也渐获台湾史学界的重视，相信未来台湾在此一时期的内陆欧亚史研究还会展现出更多的成果。

三、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2世纪

本时期台湾的内陆欧亚史研究以匈奴的研究成果最为突出。高去寻的《径路神祠》[②] 一文认为：云阳的径路神祠并非某人或某家的宗庙，也与金日磾或休屠王的部众无涉，径路神作为匈奴人战神的风俗与司克泰（斯基泰）人相同。文崇一的《汉代匈奴人的社会组织与文化形态》[③] 成篇时间虽早，但已全面讨论了匈奴史中的几个重要的议题。谢剑则以一个人类学者的角度，透过人类学研究的视野，全面的检讨了匈奴的政治制度、社会组织、宗教信仰及生计基础，他结合历史文献与东、西方学者相关的研究成果，写出了《匈奴社会组织的初步研究》[④]、《匈奴政治制度的研究》[⑤]、《匈奴的宗教信仰及其流变》[⑥] 以及《匈奴的生计基础》[⑦] 等四篇文章，是研

---

① 《边政研究所年报》第14期，1983年，第69～91页。

② 《包遵彭先生纪念论文集》，台北：历史博物馆，1971年，第99～102页。该文曾先以英文“The Ching－Lu Shen Shrines of Han Worship in Hsiung Nu Religion”发表于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Vol. 5 no. 3（19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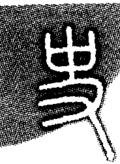
③ 原载于《边疆文化论集（二）》，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3年，第139～186页。后收入文氏著：《中国古文化》，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0年，第183～231页。

④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0本下，1968年，第669～719页。

⑤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1本第2分，1969年，第231～271页。

⑥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2本第4分，1971年，第571～613页。

⑦ 《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第32期，1971年，第163～190页。



究匈奴史者不应忽略的重要研究成果。与谢剑类似，同样结合人类学与历史学的匈奴研究尚有王明珂的《匈奴的游牧经济：兼论游牧经济与游牧社会政治组织的关系》[①] 一文，该文以近年西方人类学界对游牧社会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对文献所载的匈奴政治、社会情况做出了新的解释。在匈奴种属问题上，则有耿振华的《汉代匈奴种族问题》[②] 及李昱东的《早期匈奴帝国核心部落的考证》[③]。

在匈奴语言方面的研究成果有二，一是赵尺子的《史记匈奴传译名新释》[④]，文中认为匈奴语和蒙古语相同，而且中原古代夏、殷时期的语言与匈奴语实为同一系统。另一为徐松石的《匈奴蒙古民族考》[⑤]，徐文论点与赵尺子类似，认为古代汉语的语法与匈奴蒙古语的语法有关，古代汉语原先和通古斯语、突厥蒙古语、日本语，甚至马来语差别不大，并以“鞮”字为例来阐释其观点。徐氏又认为蒙古人为匈奴人之子孙，匈奴族名中的“奴”字，与“鹿”、“陆”等字同义，为“大泽”之义。另外逯耀东的《试释汉匈之间的瓯脱》[⑥] 一文，认为“瓯脱”即 E. C Semple 所谓的“边荒”，为汉匈之间的缓冲地带。在匈奴西迁的研究方面，有江鸿的专书《匈奴兴亡之追踪》[⑦] 以及张哲诚的《匈奴西迁》[⑧]。至于专书方面，有三本可供参考，即林旅之的《匈奴史》[⑨]、左文举的《匈奴史》[⑩] 与刘学

---

①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64 本第 1 分，1993 年，第 9～49 页。

② 《台北市立师范学院学报》第 22 期，1991 年，第 239～253 页。

③ 《中兴史学》第七期，2001 年，第 1～25 页。

④ 原载《中国边政》4、5、7、8 期，1964～1965 年，第 6～8 页、第 10～13 页、第 35～38 页、第 14～18 页。后收入赵氏著：《蒙汉语文比较学举隅》，台北：“中国边疆语文研究会”，1969 年，第 90～140 页。

⑤ 《日本民族的渊源》，香港：东南亚研究所，1966 年，第 144～161 页。

⑥ 《大陆杂志》第 32 卷第 1 期，1966 年，第 21～25 页。

⑦ 台北：商务印书馆，1984 年。

⑧ 《中国边政》第 105 期，1989 年，第 22～31 页。

⑨ 香港：波文书局，1973 年。

⑩ 台北：作者自印，1977 年。

铫的《匈奴史论》[①]。

月氏、贵霜、塞种的相关研究在台湾也有部分成果展现。陈良佐的《从人口推测大月氏、乌孙故地》[②] 一文，以大月氏的人口研究为基础，推测大月氏的故地应在河西地区的额济纳河流域；乌孙之故地则在天山以北，迪化（乌鲁木齐）以东。全文论证严谨，是探讨“月氏、乌孙故地”这个学界老问题时值得参考的一篇文章。杨希枚的《古饕餮民族考》[③]，论证了作为中国古代传说“四凶”之一的饕餮，实与古代活跃于中亚与南俄草原的塞种、匈奴存有种系关系。其另一篇文章《论北海、儋耳地望和月氏、匈奴、晋人劈面之俗》[④]，则是前述文章的一些补证[⑤]。谢黎明的《月氏研究》[⑥]，则主张月氏当为西徐亚（斯基泰）人的一支。赵振绩的《月氏与贺兰氏及与族之关系》[⑦]，考证了作为契丹主要族源之一的贺兰氏（汉译为耶律氏），其渊源与月氏颇有关联。其另一篇相关文章《月氏族系与亚洲氏地之关系》[⑧]，说明了亚洲 Asia 之名，实与月氏有关。在贵霜研究方面，耿振华之《贵霜翕侯与贵霜帝国》[⑨] 及《月氏族的迁徙与贵霜帝国的建立》[⑩] 两篇文章，为其博士论文《贵霜为大月氏考》[⑪] 之精要，主要论证贵霜帝国确为大月氏所建。古正美的《贵

---

① 台北：南天书局，1987 年。

② 《大陆杂志》第 37 卷 3 期，1968 年，第 68～92 页。

③ 《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第 24 期，1967 年，第 1～33 页。

④ 《大陆杂志》第 38 卷第 1 期，1969 年，第 7～10 页。

⑤ 杨希枚先生的作品后来集结于《先秦文化史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年。

⑥ 《屏女学报》第 1 期，1975 年，第 93～112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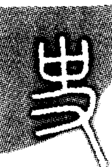
⑦ 《简牍学报》第 5 期，1977 年，第 117～126 页。

⑧ 《边政研究所年报》第 16 期，1985 年，第 159～169 页。

⑨ 《台北市立师范学院学报》第 23 期，1992 年，第 445～471 页。

⑩ 《台北市立师范学院学报》第 24 期，1992 年，第 271～300 页。

⑪ “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 1992 年博士论文。



霜佛教政治传统与大乘佛教》[1] 一书，以佛经为史料论贵霜史，出版之后曾引发争论[2]，读者可自行评判。陈健文的《月氏的名称、族属以及汉代西陲的黑色人问题》[3]，考证了月氏的族属应属高加索种，并论汉简所见的黑色人极可能与月氏有关。在《月氏种属再研究》[4] 一文中，批判了月氏属于突厥种或羌种的说法，再度论证月氏应属印欧语族。其硕士论文《月氏民族及其与早期东西交通的关系》[5]，除探讨月氏与塞种及吐火罗人之间的关系外，还讨论了月氏与古代中国之玉石贸易，以及早期东西人种接触的问题，并认为骑射战术应系透过月氏的中介而传播至中国北方。

其他与本时期有关的研究尚有胡秋原的《秦汉帝国之统一及对外关系：特别是与匈奴西域之关系》[6] 一文，该文是早期台湾学子所能读到唯一较深入的内陆欧亚史论文。另外邢义田在《古代中国及欧亚文献、图像与考古资料中的"胡人"外貌》[7] 的长文中，搜罗了详尽的东西方传统文献及图像数据，并参照东西洋学者的既有研究成果，探讨以往学界鲜少深论的胡人"被发左衽"及"尖帽"

---

① 台北：允晨文化公司，1993年。之前古正美曾将该书绪论发表于《九州学刊》第4卷第4期，1992年，第149～159页。

② 见陆扬先生的《贵霜王朝与大乘佛教史新论平议（上）》，《大陆杂志》第92卷1期，1996年，第20～36页，以及《贵霜王朝与大乘佛教史新论平议（下）》，《大陆杂志》第92卷2期（1996年），第2～12页。古女士的响应见《答辩陆扬之贵霜王朝与大乘佛教史新论平议（上）》，《大陆杂志》第92卷1期，1996年，第37～48页，以及《答辩陆扬之贵霜王朝与大乘佛教史新论平议（下）》，《大陆杂志》第92卷2期，1996年，第13～40页。

③ 《国际简牍学会会刊》第1号，1993年，第111～143页。

④ 原刊《史耘》第1期，1995年，第49～68页。后转载于《学术集林》卷8（1996年），第331～358页。

⑤ 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1996年硕士论文，由马先醒教授指导。

⑥ 收入于《古代中国文化与中国知识分子》，香港：亚洲出版社，1956年，该书在1988年由台北的学术出版社再版。

⑦ 《台湾大学美术史研究所集刊》第9期，2000年，第15～99页。

问题，堪称是一篇开创性的文章。邢先生另一篇较早的文章《汉武帝伐大宛原因之再检讨》[①] 以及另一篇《补遗》[②] 认为：汉武帝伐大宛的动机复杂，但起初尚无征伐之意，待使者被杀，加上欲提高汉使在西域的待遇并维持住汉在西域的威望，始乃愤而发兵。在胡兵的问题上，邢先生先在《东汉的胡兵》[③] 一文中，探讨东汉利用胡兵的情形，并对东汉大规模利用胡兵的背景做了分析，继之又在《汉代的以夷制夷论》[④] 中，详析汉朝利用以夷制夷的方式，维持其在西域的霸权。相近的文章尚有罗独修的《胡兵胡将对汉武帝挞伐匈奴之影响试探》[⑤]，文中分析在汉匈的战争过程中，胡兵胡将实居关键性地位。

在汉与西域的关系上，邵台新曾有专文详述台湾地区 1995 年之前的研究成果[⑥]，邵先生亦有专著《汉代对西域的经营》[⑦] 出版。另外在屯田西域的问题上，有以下几篇文章可供参考：劳干先生的《汉代的西域都护与戊己校尉》[⑧]，管东贵先生的《汉代的屯田与开边》[⑨]，张春树的《试论汉武帝时屯田西仑（轮台）的问题》[⑩] 以及施之勉的《屯田轮台在昭帝时》[⑪]。其他相关的研究尚有于景让的短

① 《食货月刊》复刊第 2 卷第 9 期，1972 年，第 31～35 页。

② 《史绎》第 9 期，1973 年，第 32～37 页。

③ 《政治大学学报》第 28 期，1973 年，第 143～166 页。

④ 《史原》第五期，1974 年，第 9～53 页。

⑤ 《华冈文科学报》第 21 期，1997 年，第 207～224 页。

⑥ 《汉代与西域的关系——台湾地区 1950～1995 相关研究的回顾》，“七十年来中西交通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以辅仁大学为中心”学术研讨会论文，1999 年 5 月 14、15 日。

⑦ 台北：辅仁大学出版社，1995 年。

⑧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8 本上，1956 年，第 485～496 页。

⑨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45 本第 1 分，1973 年，第 27～109 页。

⑩ 《大陆杂志》第 48 卷第 4 期，1974 年，第 1～4 页。后收入张氏著：《汉代边疆史论集》，台北：食货出版社，1977 年，第 122～130 页。

⑪ 《大陆杂志》第 49 卷第 1 期，1974 年，第 2 页。



文《汗血马与苜蓿》①，他依据山根甚幸的意见，说明了汗血马之所以汗血的原因是由于寄生虫的缘故，另一方面也质疑 Laufer 以为古印度无苜蓿之说，认为古印度应早已自罽宾传入苜蓿。陈庆隆的《论大夏与吐火罗》②，论证了中国古籍中的大夏虽与西域之大夏同名，然实则不同；而西域之大夏在古音上也不同于吐火罗，亦非 Dahae，两者虽同属伊兰种，但系两支不同的民族，一定居畏战，一游牧善战〔属西徐亚（斯基泰）之一支〕。

在西域历史地理与文献史料研究方面，刘义棠的《祁连天山考辨》③ 一文，从历史地理与语言学的角度考证后得出：骠骑将军所攻者为甘肃境内之祁连山，贰师将军与窦固所攻者为新疆蒲类附近之天山。王恢的《罗布泊与河源》④，以斯文赫定的考察资料为依据，辟"河源"之谬说。他的另一篇文章《汉书西域传志疑》⑤，探讨了楼兰、扜泥、伊循、赤谷、蓝市城等的地理位置。在史料的考证上，陈文豪的《史记大宛列传与汉书西域传之关系》⑥ 一文认为：《史记·大宛列传》之成篇应在《汉书·西域传》之前，且后者未能脱前者之藩篱。此外，王叔岷先生于其《史记斠证》⑦ 一书中，对《大宛列传》也有专章考证。

总的说来，本时期台湾内陆欧亚史的研究成果较为丰硕，这与早期台湾史学界有不少专精秦汉史的学者有部分关联，但可惜的是，虽然上述学者曾留下不少令人激赏的文章，但最后大多未持续投入内陆欧亚史的研究，这对台湾的欧亚学研究而言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

---

① 《大陆杂志》第 5 卷第 9 期，1952 年，第 24～25 页。
② 1988 年"国科会"补助论文（0103－H－77A－C－110）。
③ 《政治大学民族学报》第 21 期，1994 年，第 1～52 页。
④ 《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第 3 期，1971 年，第 17～38 页。
⑤ 《史学汇刊》第 5 期，1973 年，第 49～63 页。
⑥ 《简牍学报》第 7 期，1980 年，第 399～409 页。
⑦ 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3 年。

三、公元3世纪至公元10世纪

台湾本时期的内陆欧亚史研究多集中在突厥、回鹘的研究上，中亚伊兰地区的研究相较而言几乎没有成果展现，[①] 这应与台湾仅有熟悉突厥语系的学者而缺乏熟悉古印欧语系的学者有关。至于有关"五胡"及北朝史的部分，因较属传统国史的范畴，故不再于正文中介绍。

首先在东北古民族方面，有李学智的《对勿吉、靺鞨种族与名称之管见》[②]，文中主张勿吉即沃沮，属古亚洲族之濊貊系或扶余系，而非肃慎；靺鞨应为东胡苗裔，甚至铁勒亦可能为东胡系统。在柔然研究方面，札奇斯钦曾写过《从北亚史观点看拓跋与柔然对立时代的历史关系》[③]，检讨正在走向汉化中的拓跋魏政权，对尚停留在传统游牧社会中的柔然所采取的政策与态度之渊源演变，并论述二者之间由于不同趋向所造成的和战兴衰之因素与关联。类似的文章还有王吉林的《柔然与北魏关系之探讨》[④]，文中先论柔然源自于河西鲜卑，拓跋氏复国后讨伐刘卫辰及附落于刘氏之柔然，柔然失其凭依后亡入塞外独立建国。王氏相关的文章另有《元魏建国前的拓跋氏》[⑤]、《北魏建国时期与塞外民族之关系》[⑥] 与《统一期间北

---

① 早年杜正胜先生在不知大陆已有译本的情况下，曾独力翻译了Berthold Laufer的名著 *Sino-Iranica*（《中国与伊朗》，台北：中华书局，1975年）。陈庆隆先生亦曾在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指导过一位日本留学生挂田良雄，完成其博士论文《粟特的研究》(1988年)，勉强算是台湾伊朗学的成果。

② 《大陆杂志》第15卷第6期，1957年，第13～16页；第15卷第7期，1957年，第10～14页。

③ 《边政研究所年报》第7期，1976年，第1～24页。后收入札奇斯钦著：《蒙古史论丛》，台北：学海出版社，1980年，第147～178页。

④ 收入于《国际中国边疆学术会议论文集》，台北：政治大学，1985年，第325～345页。

⑤ 《史学汇刊》第8期，1977年，第67～81页。

⑥ 《史学汇刊》第9期，1978年，第47～59页。



魏与塞外民族的关系》[①] 三篇。其他北朝时期的塞外民族研究尚有张继昊的博士论文《北系部落民与北魏政权研究》[②]，论文中详述了塞北诸部（乌桓、鲜卑、匈奴、高车、蠕蠕等）与北魏政权缔造者之间的族系关系。专书方面有以下几本可供参考：林旅之的《鲜卑史》[③] 是一本通论性的鲜卑史。潘国键先生的《北魏与蠕蠕关系研究》[④] 一书，除了阐明北魏与蠕蠕长期的互动关系外，还讨论了部分蠕蠕的族属以及因蠕蠕西迁所牵涉的哌哒西徙与贵霜南移问题。黄辉阳先生的《高昌国》[⑤]，探讨车师至麴氏王朝的高昌国历史发展。另外刘学铫的《鲜卑史论》[⑥]，主述鲜卑族及其后裔契丹之历史。

在突厥系民族的研究方面，台湾有两位精研突、回系民族历史与语言的学者，即陈庆隆先生与刘义棠先生。在突厥语言研究方面，陈庆隆的《从借字看突厥、回纥的汉化》[⑦] 一文，从文字的角度探讨突、回民族与汉族间的文化交流，他指出无论是就佛教用语或政治经济、历法道术及文教语言而言，皆可看出突、回民族无不深受汉文化的影响。刘义棠的学术成就主要集成于他的四本专著：即《维吾尔语文研究》[⑧]、《维吾尔研究》[⑨]、《突回研究》[⑩] 以及《中国西域研究》[⑪]。另一位通晓突回语的学者是林冠群先生，林氏虽素以

---

① 《史学汇刊》第 10 期，1980 年，第 65～86 页。
② 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 1993 年博士论文。
③ 香港：波文书局，1973 年。
④ 台北：商务印书馆，1988 年。
⑤ 屏东：睿煜出版社，1994 年。
⑥ 台北：南天书局，1994 年。
⑦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47 本第 3 分，1976 年，第 433～465 页。
⑧ 台北：正中书局，1978 年。
⑨ 台北：正中书局，1975 年。
⑩ 台北：经世书局，1990 年。
⑪ 台北：正中书局，1997 年。

中古藏学著称学界，[①] 但大家常忽略土耳其语才是他的本行，他有两篇探讨突厥语系的文章，分别为：《中土同音同义字之探讨》[②] 以及《突回字“伊利”释义》[③]。此外毕长朴也写过《释“回纥”》[④] 一文，主张“回纥”的名称是从突厥语“箭（og 或 ok）”加上复数形-uz或-ur 而来。

突厥历史研究方面，陈庆隆在《坚昆、黠戛斯与布鲁特考》[⑤] 一文中，先考其语源及语意，再论其迁徙与分布，全文结合东西方文献，对此“长大、赤色、朱发、绿眼”之族的来源做了详实的考察。在 *Trading Activities of the Turkic Peoples*[⑥] 一文，他考察了突厥族从事贸易的历史背景，究其通商活动与贸易路线，让读者了解突厥除了是个游牧民族外，其实也很早就精于与农业定居民族从事贸易。除了介绍突厥族的贸易活动之外，陈先生还有专文《突厥族的农耕》[⑦] 以及《突厥族系的兵器》[⑧] 论其农业活动与兵器之型制。

另一位专研突厥史的学者是林恩显先生，其研究成果已集结成

---

① 其代表作为《吐蕃赞普墀松德赞之研究》，台北：商务印书馆，1989 年。

② 《中国边政》第 107 期（1989 年），第 14～19 页。

③ 《中国边政》第 73 期（1981 年），第 19～21 页。

④ 《汉学研究》第 8 卷第 2 期（1990 年），第 221～238 页。

⑤ 《大陆杂志》第 51 卷第 5 期（1975 年），第 1～11 页。

⑥ 见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Vol. 25 no. 1－2（1981），pp. 38～53. 该文曾有中译《突厥诸民族在中国的贸易活动》，参见《中国史研究动态》1982 年 9 期，第 26～30 页。

⑦ 《中央研究院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历史与考古组》，台北：“中央研究院”，1981 年，第 795～815 页。

⑧ 《大陆杂志》第 68 卷第 5 期（1984 年），第 40～49 页。该文之前曾以英文发表，见“A study of Turkic weapons”, by Ching-lung Chen, Published in Altaistic Studies, Papers at the 25th Meeting of the Permanent International Altaistic Conference At Uppsala June 7～11 1982, edited by Gunnar Jarring and Staffan Rosen, 1985, pp. 29～35, published by Almqvist & Wiksell International, Stockholm.

《突厥研究》[①] 一书出版，关于该书之内容大陆已有学者专文介绍[②]，此处不再赘述。此外，胡秋原先生的《突厥之始原——狄，丁零，乌揭，坚昆，乌孙，高车》[③] 也是台湾早期突厥研究的重要著作，他将突厥族系分成三种：即“原突厥”（狄、丁零、吉尔吉斯）、“本来突厥”（建立突厥帝国之统治民族）以及“广义突厥”（今分布于西伯利亚、中亚、小亚细亚操突厥语之诸族），文末还兼论了匈奴西迁与阿瓦、柔然问题。其他如傅乐成先生的《突厥的文化和它对邻国的关系》[④] 及《沙陀之汉化》[⑤] 也是重要的文章，相信涉猎隋唐史的读者应不陌生。其他相关的突厥研究尚有吴兴东的《塞尔柱土耳其人之经营小亚细亚与马拉兹吉特大会战》[⑥]，说明此役的经过以及奥斯曼帝国的孕育。

回纥研究方面主要还是以李符桐与刘义棠的成果为主。李符桐的研究成果现均已收入五册的《李符桐论著全集》[⑦] 中，他有两本专书《回鹘史》[⑧] 与《回鹘与辽朝建国之关系》[⑨]（均收入《全集》第二册），前者为一回鹘通史，后者则论证回鹘西迁后，留居大漠的回鹘遗民侨居契丹境内，后与契丹结秦晋之好，为甥舅之盟，共同协力建立契丹国。李符桐其他重要的回鹘相关论文均收入《全集》第三册，读者可自行参考。至于刘义棠的回鹘与维吾尔著作，则收

---

① 台北：商务印书馆，1988 年。

② 见韩香：《近年来新出版的三本突厥史专著评述》，《西域研究》1994 年 2 期，第 97～102、94 页。

③ 《反攻》第 236 期，1961 年，第 5～16 页。

④ 收入胡氏著：《汉唐史论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7 年，第 275～303页。相关的研究尚有任育才先生的《突厥之文化形态及其对唐代之影响》，见《文史学报》第 2 期，1972 年，第 106～133 页。

⑤ 收入胡氏著：《汉唐史论集》，第 319～338 页。

⑥ 《政治大学学报》第 30 期，1974 年，第 171～196 页。

⑦ 台北：学生书局，1992 年。

⑧ 原在 1963 年由台北的文风出版社出版。

⑨ 原在 1968 年由台北的文风出版社出版。

录于前文所提及的四本专著。其他的回纥研究尚有傅乐成的《回纥马与朔方兵》①，文中指出唐朝与回纥外交关系之关键点，实在于其"联回抗吐"政策以及对回纥马的依赖。胡秋原的《突厥与回纥帝国之兴衰》② 与《突厥与回纥之西迁及其文化影响》③，详述了突、回民族自兴起至西迁的历史进程。石万寿的《唐回关系新论》④，点出了唐朝与回纥两大东亚强权，在外交场上表面虽显友好，但实际上却各怀鬼胎，相互猜忌。林冠群的《漠北时期回纥形势之探讨》⑤，分析了回纥兴起时的地理及国际因素，对其游走于唐与吐蕃之间及首鼠两端的民族性有深入探讨。

在专著方面，毕长朴的《回纥与维吾尔》⑥ 一书，对回纥及其后裔维吾尔的源流、语言、图腾等均有探讨。除此之外，苏庆彬的《两汉至五代入居中国之蕃人姓氏研究》⑦，是同姚薇元《北朝胡姓考》性质相近的研究专书，而章群的《唐代降胡安置考》⑧ 和谢海平的《唐代留华外国人生活考述》⑨，都是讨论唐代在华蕃胡的问题，也是读者不应错过的重要专著。

从研究取向来看，台湾在此一时期的内陆欧亚史研究有偏重于民族史与政治史的倾向，较缺乏对西域古文书的研究或解读的工作，而对兴盛于此时的西域宗教如西域佛教、祆教、摩尼教的研究也较缺乏，且除了陈庆隆先生外，多忽略东西洋学者既有的研究成果，

---

① 收入傅氏著：《汉唐史论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7 年，第 305～317页。

② 《反攻》第 237 期，1961 年，第 5～12 页。

③ 《反攻》第 238 期，1962 年，第 6～15 页。

④ 《成功大学历史系历史学报》第 3 号，1976 年，第 175～210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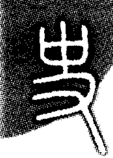
⑤ 《中国边政》78 期，1982 年，第 23～33 页。

⑥ 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 年。

⑦ 香港：新亚研究所，1967 年。

⑧ 《新亚学报》第 1 期，1955 年，第 249～329 页。

⑨ 台北：商务印书馆，1978 年。



这是较令人遗憾的一点。

四、早期东西交通史部分

本节所论的“早期”东西交通，系概指宋元之前的时段，在这方面台湾也有部分的成果展现，且东西交通史似也应归入内陆欧亚史的范畴，故在此一并介绍。①

谈到台湾的东西交通史研究，之前提到的方豪大作《中西交通史》相信大家应不陌生。陈庆隆的《蒲陶新考》②，考订了大宛伊朗方言的 * bow-tak 应才是中文“蒲陶”的正确语源，而其他如“蘡薁”、“末陀”等词语，亦可看出中国与中亚、西亚及印度之间交通的痕迹。在与昆仑相关的议题上，凌纯声在《秦汉时代之畤》③、《中国的封禅与两河流域的昆仑文化》④、《昆仑丘与西王母》⑤ 等论文中均有发覆，其论点主要为：中国古代的台（读持）、畤、祖（读姐）、社等，似皆为同源，都是两河流域 Ziggurat 第一音节的音译。杨希枚的《论殷周时代高层建筑之“京”、昆仑与西亚之 Zikkurat》⑥，则进一步补充认为：殷周以来所谓的“京”即此后所谓之

---

① 早年方豪先生曾撰有《六十年来之中西交通史》一文，读者或可参考，刊《华学月刊》第 25 期，1974 年，第 31～46 页。

② 《大陆杂志》第 98 卷第 6 期，1999 年，第 1～14 页。

③ 《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第 18 期，1964 年，第 113～142 页。后收入凌氏著：《中国边疆民族与环太平洋文化（下）》，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9 年，第 1461～1490 页。

④ 《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第 19 期，1965 年，第 1～51 页。后收入凌氏著：《中国边疆民族与环太平洋文化（下）》，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9 年，第 1491～1551 页。

⑤ 《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第 22 期，1966 年，第 215～255 页。后收入凌氏著：《中国边疆民族与环太平洋文化（下）》，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9 年，第 1569～1613 页。

⑥ 《大陆杂志》第 34 卷第 5 期与第 6 期，1967 年，第 1～5 页，第 23～27 页。

"昆仑"，也即西亚所谓之"Zi-ggurat"，而中国"京观"之俗与西亚垒尸成塔殆为一事。类似的研究尚有苏雪林的《昆仑之谜》[①] 与《天问正简》[②] 二书。另外饶宗颐的《论释氏之昆仑说》[③] 一文，讨论了佛教传入后，国人将昆仑比附为冈底斯山及阿耨达地之经过。

饶先生的其他文章尚有《丝绸之路所引起的"文字起源"问题》[④]，认为半坡陶器刻符中的"十"符号，可以追溯至西亚。类似的中西早期文字接触的问题，亦可参考饶先生近出的《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⑤] 一书。饶先生早年的论文集《选堂集林——史林》[⑥] 中，也有不少与东西交通史有关的文章，治东西交通史者不应错过。

在古代北方草原文物的交流方面，有张文玲的《古代欧亚草原民族动物造型之初探》[⑦] 及《古代草原世界的贵族服饰》[⑧] 二篇文章，前者比较了中国古代动物造型艺术与欧亚草原所谓"斯基泰"动物文样艺术间的关联性，后者则从出土文物介绍了古代内亚草原世界的贵族服饰。张女士尚有专书《古代中亚丝路艺术探微》[⑨]，论及了中亚丝路的历史背景，以及新疆及敦煌佛教石窟中的佛教艺术。

有关张骞凿空的研究有三篇。陈庆隆的《论"张骞凿空"》[⑩] 是相当重要的一篇文章。文中详述了张骞之前之西域交通，张骞前后

---

① 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56 年。

② 该书于 1974 年由作者自印出版，后来由台北的文津出版社于 1992 年再版。

③ 《大陆杂志》第 46 卷第 4 期，1973 年，第 1～4 页。

④ 《明报月刊》1990 年 9 月号，第 47～50 页。

⑤ 香港：商务印书馆，1998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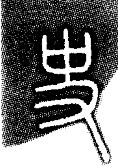
⑥ 台北：明文书局，1982 年。

⑦ 《故宫文物月刊》第 116 期（第 10 卷 8 期，1992 年），第 20～33 页。

⑧ 《故宫文物月刊》第 213 期（第 18 卷 9 期，2000 年），第 4～11 页。

⑨ 台北：故宫博物院，1998 年。

⑩ 《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历史与考古组》，台北："中央研究院"，1989 年，第 403～416 页。



之中西交通路线，以及中西交易之状况等等，阐明中西交通实早在张骞之前即已发生，所谓“张骞凿空”并非指地理孔道而言。陈子槐的《张骞出使之探讨》①，先考汉匈关系，复论月氏史的相关问题，最后谈张骞西使之经过。另一篇是杨远的《张骞出使西域考》②，全文考证张骞西使之路线及其对中西交通之贡献。

在丝路研究方面，桑秀云的《蜀布邛竹传至大夏路径的蠡测》③，除了考证古代蜀印之间的交通路线外，对于大夏国也有一番考略。杨希枚的《论汉简及其他汉文献所载的黑色人问题》④，系主要针对张春树在《居延汉简中所见的汉代人的身型与肤色》⑤一文中所提出的“黑色人”问题而发。他认为这些在汉简上出现的黑肤人，很可能与印度的德拉维狄雅人（Dravidians）有关。

关于古代中国与罗马的关系方面，邢义田有三篇重要的论著。其一是《古罗马文献中的“中国”》⑥，文中主要针对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一书中的部分译文，作一些阙漏或可斟酌部分的补订工作，是读者在研读张氏六册译著时所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文章。其二是《汉代中国与罗马关系的再省察——拉西克“罗马东方贸易新探”读记》⑦，全文主要从介绍 Manfred G. Raschke 的论文⑧入

---

① 《淡江学报（文学与商学部门）》第 12 期，1974 年，第 225～248 页。

② 《幼狮学志》第 16 卷第 4 期，1981 年，第 92～119 页。

③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41 本第 1 分，1969 年，第 67～86 页。

④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39 本第 1 分，1969 年，第 309～324 页。后收入张春树：《汉代边疆史论集》，台北：食货出版社，1977 年，第 200～221 页。

⑤ 原刊《庆祝李济先生七十岁论文集》下册，台北：“清华学报”，1967 年，第 1033～1045 页。后收入张春树：《汉代边疆史论集》，台北：食货出版社，1977 年，第 200～221 页。

⑥ 《食货月刊》复刊第 14 卷第 11、12 合期，1985 年，第 79～90 页。

⑦ 《汉学研究》第 3 卷第 1 期，1985 年，第 331～341 页。

⑧ *New Studies in Roman Commerce with the East*，*Aufstieg und Niedergang der Romischen Welt*，*Geschichte und Kultur Roms in der Neueren Forschung*，*Principat*，*Vol. 9*，*pt. 2*，Berlin：Gruyter，1978，pp. 604～1361.

手，说明有关汉代中国与罗马帝国之间的交往问题，文中认为以目前存留的东西方史料而言，似乎还很难评估其紧密的程度。其三是《汉代中国与罗马帝国关系的再检讨》[①]，全文主要以否定“有罗马人曾在中国骊靬建城”，以及在“公元100年曾有罗马商团抵达中国洛阳”这两个议题为主轴，文中最后认为：目前要证明汉代中国与罗马帝国存有“直接”往来一事，实际上证据还是相当薄弱。其实有关有无罗马人在汉代到过中国一事，杨希枚早年曾有专文《评德效骞著“古中国境内一个罗马人的城市”——兼论所谓罗马人的几种文化成分》[②] 驳斥此种说法。同样探讨中国与罗马古代关系的尚有刘增泉的《古代中国与罗马之关系》[③] 一书，该书除了有对黎靬、大秦、拂菻的考证外，还论及古代中国与罗马世界的人员、商业与科学文化交流。

其他关于宗教方面的研究有杨景棠的《鄂尔多斯区发现的景教铜十字》[④]，文中认为此地区所发现的景教铜十字（Nestorian Cross）可能并非舶来品，而是当地游牧民族的土产。曹仕邦的《浅论中国求法僧俗出国前、后学习域外语文的机缘》[⑤]，文中认为这些西行求法者的语文师资，最初应是来华弘法的天竺或西域僧人，后来加入了旅居中国的印度居士，后期更有求法归来的华僧和译场中人。在教授华人时，西域僧用的是汉语，而在早期，小月氏人曾扮演过重要的角色，在求法僧西行的过程中，求法者主要是透过梵文与西域诸国僧侣沟通。在西域宗教研究的专书方面，目前仅有释东初的《中印佛教交通史》[⑥] 以及王见川的《从摩尼教到明教》[⑦]。王书原为

① 《汉学研究》第15卷第1期，1997年，第1～31页。

② 《书目季刊》第3卷第4期，1969年，第3～24页。

③ 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5年。

④ 《东吴大学中国艺术史集刊》第8卷，1977年，第61～71页。

⑤ 《中华佛学学报》第10期，1997年，第249～265页。

⑥ 台北：东初出版社，1968年。

⑦ 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2年。



作者之硕士论文，内容精实，亦能参考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是台湾极为少见的西域宗教专著。

总括而言，台湾的东西交通史研究自从方豪先生辞世之后，在大学中便未再出现以古代内陆欧亚东西交通史为专业的教授，在缺乏师资指导的情况下，年轻后进自然不愿贸然投身此一领域的研究，这对台湾的历史学界而言，不啻是一种令人担忧的人才断层现象。

五、公元11世纪至公元14世纪

台湾此时期的内陆欧亚史研究首推姚从吾与李符桐。姚从吾鉴于过去部分日本学者对中国史的探究，“注重的是契丹、女真、蒙古曾如何治理满蒙或中国，并非他们曾有过如何的历史”[①]，于是将研究重点聚集在契丹、女真遭遇汉文化后的氛围[②]以及契丹、女真、蒙古本身固有文化[③]等问题上。李符桐的研究多着墨于周邻民族与契丹、蒙古在统治形态上的互动关系。[④] 另外蒙古族学者札奇斯钦则以其敏锐的视角，重新阐释汉文古籍，剖析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之间的互动关系，为台湾地区的内陆欧亚史研究注入一股新意。

（一）契丹研究

契丹的族源问题方面，赵振绩在《契丹族系源流考》[⑤] 一书中

---

① 姚从吾：《阿保机与后唐使臣姚坤会见谈话集录》，第236页，见姚氏著：《东北史论丛》上册，台北：正中书局，1976年。

② 姚从吾：《金朝上京时期的女真文化与迁燕的转变》及《金世宗对于中原汉化与女真旧俗的态度》，见姚氏著：《东北史论丛》下册，第31～64、118～174页。

③ 姚从吾：《契丹君位继承问题的分析》及《说辽朝契丹人的世选制度》，见姚氏著：《东北史论丛》上册，第248～282、283～338页。

④ 李符桐：《回鹘与辽朝建国之关系》，《李符桐论著全集》第2册，第263～405页。《回鹘与元朝建国之关系》，《李符桐论著全集》第3册，第163～272页。《畏兀儿人对于元朝建国之贡献》，《李符桐论著全集》第3册，第273～338页。

⑤ 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2年。

指出：契丹虽有匈奴系与月氏系，实源自鲜卑小酋的轲比能。王民信在《契丹民族溯源》[①] 认为奚是鲜卑的原形，契丹或奚丹是鲜卑的复数形。对此李学智的《辽史中有关契丹民族史料之检讨》[②] 持不同的意见，他认为契丹乃游猎之渔猎民族，并非源自蒙古或鲜卑。关于契丹先世的部落联盟，王民信先生在《契丹古八部与大贺遥辇迭剌的关系》及《遥辇阻午可汗二十部考》[③]，就史籍归纳出各个时期的不同部名。对于契丹政治制度方面，姚从吾的《说辽朝契丹人的世选制度》说明世选制的条件及其功能在于选贤与能，而其《契丹君位继承问题的分析》一文则指出君位继承的制度及转变的原因及结果。王民信的《辽史"契丹语官名"杂考》[④] 指出契丹官职的由来及职权演变的经过。韩道诚的《契丹军制考》[⑤] 则讨论契丹政府中军事组织的特性。另外，王民信《辽朝鞫狱考》[⑥] 指出辽代的狱政并非二元分管，而大半由汉人掌理。

契丹与其他民族间的关系。李符桐《奚部族及其与辽朝关系之探讨》[⑦] 阐述奚族与契丹合作的经过；王民信《辽朝统治下的奚族》[⑧] 则指出奚人名义上虽受奚王府节制，但实归南北二府统领；其另一篇《契丹统治下的渤海人民》[⑨] 点出契丹对渤海族政策失当，

---

① 见王氏著：《契丹史论丛》，台北：学海出版社，1973 年，第 11～34 页。

② 《政治大学边政研究所年报》第 4 期，1973 年，第 7～41 页。

③ 见王氏著《契丹史论丛》，第 35～62 页、第 63～72 页。张哲诚：《早期契丹部族考述》，《中国边政》第 107 期，1989 年，第 43～48 页。

④ 《契丹史论丛》，第 135～182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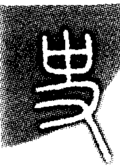
⑤ 《东北历史文化研究》，第 211～252 页。林瑞翰先生讨论辽朝的军制，亦涉及契丹者，见《辽代兵制》，《大陆杂志》第 17 卷第 7 期，1958 年，第 8～19 页。

⑥ 《赵铁寒先生纪念论文集》，台北：文海出版社，1978 年，第 327～364 页。

⑦ 《李符桐论著全集》第 5 册，第 1～112 页。

⑧ 《政治大学边政研究所年报》第 5 期，1974 年，第 47～65 页。

⑨ 《文化大学民族与华侨论文集》第 1 期，1974 年，第 75～104 页。



是渤海人数次起事之因。王民信《高丽史女真三十姓部落考》[①] 指出女真分布于白山黑水地带；《辽汉人赐姓考》[②] 点出契丹人藉由赐姓耶律拔擢汉人，来增强其统治基础。王明荪《略论辽代的汉人集团》[③]，说明两元政治中汉人势力集团的成因及组合成员。涉外关系方面，李符桐《辽与高丽之关系》[④] 阐述辽廷从意欲并吞至要求高丽称臣的过程。至于西辽的历史，胡秋原《耶律大石传——附西辽年表》[⑤] 论叙辽末的政局以及耶律大石西迁、建国兴亡的经过，林修澈《耶律大石与西辽建国始末》[⑥] 则就文化面认为西辽乃是蒙古西征的前驱。

关于契丹的社会与文化，学者多关注在礼俗与汉文化交融方面。姚从吾《说契丹的捺钵文化》[⑦] 细说捺钵生活与特殊习俗；赵振绩《捺钵文化的涵义》[⑧] 分就民族、政制、经济、社会、文化及宗教缕述契丹的动态文化，并说明捺钵而至斡鲁朵是动态转静态的过程。林瑞翰《契丹民族的再生礼》[⑨] 探讨王室即位的礼仪；韩道诚《契

---

① 《政治大学边政研究所年报》第 16 期，1985 年，第 67～94 页。关于契丹对女真的征伐与统治，可见金渭显：《契丹的东北政策——契丹与高丽女真关系之研究》，台北：华世出版社，1981 年。

② 《政治大学边政研究所年报》第 9 期，1978 年，第 183～197 页。

③ 原刊《政治大学边政研究所年报》第 11 期，1980 年，第 229～269 页。后收入王氏著：《宋辽金史论文稿》，台北：明文书局，1988 年。

④ 《李符桐论著全集》第五册，第 177～281 页。

⑤ 《大陆杂志》第 17 卷第 6 期，1958 年，第 1～11 页。后收入《边疆论文集》第 1 集，第 173～183 页，台北："国防研究院"，1964 年。刘学铫：《西辽兴亡史略》，见《中国边政》第 122 期，1993 年，第 25～41 页。

⑥ 《耶律大石与西辽建国始末》（上），《新时代》第 16 卷第 7 期，1976 年，第 67～71 页。《耶律大石与西辽建国始末》（下），《新时代》第 16 卷第 8 期，第 70～77 页。

⑦ 见姚氏著《东北史论丛》下册，第 1～30 页。

⑧ 《中华文化学报》第 1 期，1994 年，第 107～118 页。

⑨ 《大陆杂志》第 4 卷第 2 期，1952 年，第 16～19 页。又王民信：《契丹的柴册仪与再生仪》，《契丹史论丛》，第 88～117 页。

丹礼俗考》[1] 全面论述了契丹君民的日常习俗。黄清连《辽史"射鬼箭"初探——从宗教和法律观点所作的分析》[2] 指出射鬼箭是契丹出征的祭仪，反映出萨满信仰所扮演的角色。王民信《辽朝皇室的婚姻研究》[3] 认为婚嫁辈分凌乱，妇女再嫁者颇多。至于契丹城市的建造，札奇斯钦《契丹和他们的城市》[4] 认为契丹人的筑城无异是汉族力量在契丹内部的扩张，此举是历史的错误；王民信《从辽上京兴建看塞外都市发展之情形》[5] 则谓草原地带兴建城市是延长国祚之举；赵振绩《辽代都市的形成与发展》[6] 认为这是契丹社会文化形态由动态转变为静态的过程，侧面地反映出契丹的汉化。

（二）西夏研究

台湾地区的西夏研究，由于史料的零散，多着重历史的描述。学者较集中在宋夏关系方面，受到传统的正统论的影响，常以宋朝为主体论述，[7] 然近年来大有改善。[8] 廖隆盛《北宋对西夏的和市驭边政策》[9] 指出在宋夏关系中，宋朝拥有主动出击的优势。王民信

---

① 《东北历史文化研究》，第 253～293 页。又韩道诚：《由"蹛林"看契丹与匈奴鲜卑同俗》，《东北历史文化研究》，第 335～356 页。

② 《史原》第 4 期，1973 年，第 55～78 页。

③ 《政治大学边政研究所年报》第 10 期，1979 年，第 113～133 页。

④ 《契丹和他们的城市》（上），《东方杂志》复刊第 15 卷第 10 期，1982 年，第 39～44 页；《契丹和他们的城市》（下），《东方杂志》复刊第 15 卷第 11 期，第 38～41 页。

⑤ 《国际宋史研讨会论文集》，第 7～22 页，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1988 年。

⑥ 《国际宋史研讨会论文集》，第 203～210 页。

⑦ 阙镐曾：《宋夏关系之研究》，《政治大学学报》第 9 期，1964 年，第 267～317 页。

⑧ 区静飞：《党项拓拔氏之崛起》，《华冈文科学报》第 20 期，1995 年，第 123～143 页。区静飞：《李德明时代的西夏政权》，《华冈文科学报》第 21 期，1997 年，第 247～262 页。廖隆盛：《德明时期（1004－1032）宋夏关系析论》，《台湾师大历史学报》第 28 期，第 69～84 页。

⑨ 《大陆杂志》第 62 卷第 5 期，1981 年，第 18～29 页。



的《西夏国名杂谈》[①]，就现存汉籍与西夏文文献说明西夏的国号及相关名词；其另一篇《西夏官名杂考》[②] 则考证皇室的名衔与官吏职名。

（三）女真研究

本时期的女真史研究多着重在族源以及社会文化的探讨。李学智的《释女真》[③] 主张女真的族名与族源是出自室韦的如者部，其义为金。女真社会文化方面，林瑞翰《女真初起时期之寨居生活》[④]，指出女真人有固定的寨居生活；徐玉虎的《女真建都上京时期的风俗》[⑤] 则全面探讨女真人的生活面；劳延煊《金朝帝王季节性的游猎生活》[⑥] 讨论金朝皇帝的游猎生活。桑秀云在《金室完颜氏婚制之试探》[⑦] 一文指出完颜氏的族外婚仅限八个氏族。姚从吾《女真汉化的分析》[⑧]，阐明女真部族的政治革新之举；陶晋生的专书《女真史论》[⑨]，说明女真在汉化的过程中面临社会与文化变迁，

---

① 《政治大学边政研究所年报》第 12 期，1981 年，第 233～250 页。

② 《政治大学边政研究所年报》第 17 期，1986 年，第 81～98 页。

③ 《释女真》（上），《大陆杂志》第 16 卷第 2 期，1958 年，第 10～16 页；《释女真》（中），《大陆杂志》第 16 卷第 3 期，第 22～25 页；《释女真》（下），《大陆杂志》第 16 卷第 4 期，第 19～21 页。李学智：《女真民族兴起之渊源》，《政治大学边政研究所年报》第 6 期，1975 年，第 1～24 页。

④ 《大陆杂志》第 12 卷第 11 期，1956 年，第 24～29 页。

⑤ 《女真建都上京时期的风俗》（上），《大陆杂志》第 9 卷第 10 期，1954 年，第 22～28 页；《女真建都上京时期的风俗》（下），《大陆杂志》第 9 卷第 11 期，第 22～25 页。

⑥ 《金朝帝王季节性的游猎生活》（上），《大陆杂志》第 23 卷第 11 期，1961 年，第 17～22 页。《金朝帝王季节性的游猎生活》（下），《大陆杂志》第 23 卷第 12 期，第 27～30 页。

⑦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39 本上册，1969 年，第 255～298 页。

⑧ 见姚氏著：《姚从吾先生全集》第 5 册，台北：正中书局，1981 年，第 163～203 页。程玉凤：《女真汉化的探讨》，《东北论文集》第 7 辑，1982 年，第 136～183 页。

⑨ 台北：食货出版社，1981 年。

其另一篇文章《金代的女真进士科》[①] 则指出女真进士科的设置在于保存固有的女真文化。徐秉愉《金世宗时期女真民族的危机——金世宗女真政策的背景》[②] 指出金世宗的女真政策，并不限于猛安谋克的重组，也无关集权中央的意图，而是凝聚族群的认同与组织女真人的力量，以对抗契丹的离心，蒙古与西辽的威胁。

（四）蒙古研究

蒙古族系与族称的研究方面。哈勘楚伦在《论“Monggol”（蒙古勒）族称之真谛》[③] 一文中认为：Monggol 一词其意为“多数的中心”。唐屹先生《蒙古部族考初稿——十三世纪蒙古部族之研究》[④]，论证突厥－蒙古的一体化过程。赵振绩《蒙古族系考》[⑤] 指出蒙古民族是承继匈奴、鲜卑、突厥的混合民族。

在政治史研究方面。札奇斯钦《西域中原文化对蒙古帝国的影响和元朝的建立》[⑥]，论述蒙古帝国中的西域法与汉法，以及西进政策与南进政策之间的矛盾。萧启庆《西域人与元初政治》[⑦]，考述自成吉思汗至忽必烈汗之间西域人政治势力的消长。其另一篇《蒙元时代高昌偰氏的仕宦与汉化》[⑧]，指出偰氏家族由根脚家庭转变为科第世家的过程及其对汉化的策略。胡其德《畏兀人与大蒙古国的汗位争夺》[⑨] 指出蒙古帝国初期畏兀人藉由语文、行政及理财等能力影响政局。

---

① 《政治大学边政研究所年报》第 1 期，1970 年，第 135～144 页。

② 《汉学研究》第 19 卷第 2 期，2001 年，第 249～279 页。

③ 《政治大学边政研究所年报》第 9 期，1978 年，第 47～80 页。

④ 《政治大学边政研究所年报》第 6 期，1975 年，第 57～105 页。

⑤ 《国际中国边疆学术会议论文集》，1985 年，第 347～368 页。

⑥ 见札奇斯钦著：《蒙古史论丛》下册，第 217～232 页。

⑦ 台北：台湾大学文学院，1966 年。

⑧ 《中国近世家族与社会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 年，第 263～299 页。

⑨ 《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 23 期，1995 年，第 151～167 页。

在社会史研究方面。札奇斯钦的专书《蒙古文化与社会》①，说明蒙古的社会生活与文化的各个面貌。王明荪的《早期蒙古游牧社会的结构》② 一书，讨论蒙古建国前后的社会结构。札奇斯钦《蒙古帝国首都——和林》③，尝试从中外史料还原当时的和林风貌。劳延煊的《论元代的高丽奴隶与媵妾》④，说明由高丽输入的奴隶、宫女及宦官的由来及地位。洪金富的《从"投下"分封制度看元朝政权的性质》⑤，说明"投下"制度乃蒙古人私产及公产观念在国家组织形态之反映。张中复《蒙古察合台汗国游牧体制之研究》⑥ 考述察合台汗国的游牧体制。经济方面有李则芬的《蒙古羊羔儿利与元初斡脱钱之研究》⑦，文中指出羊羔儿利与斡脱钱的差异，并论斡脱非指犹太人。

在文化史研究方面。李则芬的《汉蒙思想冲突对元代政治的影响》⑧ 指出蒙汉在国家本位、政治体制及法律规章等观念上的差异，及其对元代政局的影响。王明荪《略述元代文化对高丽朝廷之影响》⑨ 一文，指出高丽皇室、朝臣对蒙元文化如辫发、胡服、宫卫、

---

① 台北：商务印书馆，1987 年。

② 台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会，1976 年。

③ 《国际宋史研讨会论文集》，1988 年，第 23～52 页。

④ 《庆祝李济先生七十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7 年，第 1005～1031 页。

⑤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58 本第 4 分，1987 年，第 843～907 页。

⑥ 张中复撰，政治大学边政研究所硕士论文，1987。

⑦ 收入李氏著：《宋辽金元历史论文集》，第 607～634 页。孙克宽：《斡脱钱与西域人对华的经济剥削》，《大陆杂志》第 8 卷第 9 期，1954 年，第 22～25 页。

⑧ 原刊《东方杂志》复刊第 7 卷第 3 期，1973 年，第 33～51 页。收入李氏著：《宋辽金元历史论文集》，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91 年，第 537～605 页。

⑨ 《蒙古民族与周边民族关系学术会议论文集》，台北："蒙藏委员会"，2000 年，第 17～33 页。

政制等仿行。其另一篇《元史所载之蒙古旧俗》① 考述的是蒙古的礼俗。赵竹成在《文化互动与政治稳定一蒙古帝国瓦解的民族文化因素》② 一文指出：蒙古帝国所引进的不同宗教信仰，造成蒙古统治阶层意识上的分裂，从而瓦解了蒙古帝国。婚姻研究方面，林恩显的《蒙元与夏金高昌的联姻研究》③，分析北方游牧民族联姻的形态，并阐明大蒙古国时期与夏、金、高昌的政治支配关系。何美妍《早期蒙古游牧社会的婚姻方法与配偶制度》④，指出蒙古族行族外婚而不禁尊卑婚。洪金富《元代的收继婚》⑤，探讨蒙汉二族收继婚的类型以及相互的影响。信仰研究方面，胡其德有四篇专论，其一为《十二、十三世纪蒙古族的宗教信仰》⑥，考察萨满教在蒙古立国前后之演变。其二为《成吉思汗即位前后的政教关系——以萨蛮教为中心》⑦ 一文，指出成吉思汗自萨满手中夺取祭天之权，迫使萨满沦为大汗的附庸。其三为《蒙古碑刻文献所见统治者的宗教观念与政策》⑧，说明蒙古可汗宗教观念与政策的两大主轴是单纯性与实用性。其四为《蒙古族腾格里观念的演变》⑨，研究蒙古人的泛灵信仰由自然崇拜到诸神腾格里化的过程。赵振绩《萨曼教祭祀阿包（oboo）的涵义》⑩ 考证古史中“巴”、“亳”、“保”、“僰”及北方民族之“钵”与阿包的关系，并说明阿包意即萨满祭祀的器具。

---

① 《中华民国蒙藏学术会议论文集》，台北：文化大学蒙藏学术中心，1988 年，第 1～29 页。

② 《蒙古民族与周边民族关系学术会议论文集》，第 229～244 页。

③ 台北：“蒙藏委员会”，1997 年。

④ 《政治大学边政研究所年报》第 8 期，1977 年，第 291～306 页。

⑤ 《中国近世社会文化史论文集》，第 279～314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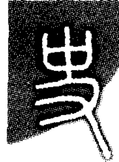
⑥ 《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 15 期，1987 年，第 145～160 页。

⑦ 《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 18 期，1990 年，第 13～62 页。

⑧ 萧启庆主编、许守泯协编：《蒙元的历史与文化》下册，台北：学生书局，2001 年，第 681～701 页。

⑨ 台北：“蒙藏委员会”，1997 年，第 1～49 页。

⑩ 《中华民国蒙藏学术会议论文集》，第 531～537 页。



民俗方面，哈勘楚伦《“海东青”在蒙古族中的象征及地位》①，指出猛禽海东青在蒙古萨满信仰中具有吉兆、族灵及守护灵的象征地位。其另一篇《蒙古族祖先崇拜与鄂博祭之社会礼俗研究》② 指出蒙古鄂博祭具有显隐性功能，目的在整合蒙古的社会。胡其德《十三、四世纪蒙古族数字观初探——以三、九为中心》③，指出蒙古族文化中三、七、九均发展出独立的体系，三指吉祥，九有最礼遇、至高无上的含义。洪金富《四十万蒙古说论证稿》④，说明四十万一词仅是虚词，表示极其众多，包括所有的意思。

军事史研究方面，札奇斯钦《蒙古帝国时代的战略与战术》⑤，阐述蒙古人军事的观念。萧启庆《元代的宿卫制度》⑥ 指出元廷的宿卫军源于蒙古的怯薛及中原的卫军。李天鸣《辽金蒙元的弩与弩箭手》⑦ 说明弩的制造与弩箭手的训练，并指出弩在元末地位消失之故。周德威的《十三世纪初蒙古军战略战术及后勤之研究》⑧ 探讨蒙古军作战的原则与动机并说明蒙古妇女对作战的贡献。

蒙古与西域关系的研究方面，刘义棠《畏兀儿亦都护城》⑨ 指出畏兀儿亦都护城即高昌或西州的回鹘都城。赵竹成在俄国地区的蒙古人研究方面有四篇文章。第一篇为《蒙古西征与俄国历史发展

---

① 《国际中国边疆学术会议论文集》，1985 年，第 733～777 页。（附回鹘式蒙文）

② 《政治大学社会学报》第 22 期，1986 年，第 1～6 页。

③ 《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 13 期，1985 年，第 44～65 页。

④ 萧启庆主编、许守泯协编：《蒙元的历史与文化》上册，第 245～305 页。

⑤ 见札奇斯钦：《蒙古史论丛》下册，第 779～796 页。

⑥ 原刊《政治大学边政研究所年报》第 4 期，1973 年，第 43～95 页，现收入萧氏著：《元代史新探》，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 年。

⑦ 萧启庆主编、许守泯协编：《蒙元的历史与文化》上册，第 307～342 页。

⑧ 周德威撰，政治大学边政研究所硕士论文，1990 年。

⑨ 《政治大学民族学报》第 22 期，1996 年，第 1～40 页。

进程》[①] 指出蒙古人加速俄罗斯国家在政治、民族、文化及社会发展上的进程。第二篇为《“民族”与“民族称谓”间之不恒等关系——以中世纪金帐汗国史上的民族称谓“鞑靼人”为例》[②]，文中认为鞑靼名称指涉的流动性，说明民族历史与民族称谓间不必然的关系。第三篇《金帐汗国与俄罗斯国家的建构》[③]，说明金帐汗国的政治制度在俄罗斯民族的国家意识与性格成形上的角色。第四篇《俄罗斯民族国家的建构中蒙古金帐汗国的影响》[④] 则指出，金帐汗国对于俄国历史的进程虽有直间接的作用，但亦不可忽视立陶宛一波兰的影响。

其他相关研究方面，唐屹先生的《成吉思释义》[⑤]，透过对国际成说的辨析，说明“成吉思”并不与“腾吉思”、“达赖”字义相同，他认为“成吉思”应释为乌鸣之音，始符合当时的萨满信仰。刘义棠《喀喇和林释义》[⑥] 指出喀喇和林即 Qara Qurum 之音译，意指神圣的帝都。哈勘楚伦《蒙古语“兀真”非“夫人”之考证》[⑦] 认为兀真非指夫人，而应释做“国母”、“母后”或引申为“伟大的母亲”。张中复《论元朝在当代回族形成过程中的地位：以民族史建构为中心的探讨》[⑧] 认为元代来华的穆斯林，由于族群与文化的多样

① 收入于《成吉思汗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 63～84 页，台北：“蒙藏委员会”，1998 年。

② 《政治大学民族学报》第 23 期，1998 年，第 79～93 页。

③ 《蒙元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清华大学”历史系，1999 年，第 1～11 页。

④ 台北：“蒙藏委员会”，1999 年，第 1～33 页。

⑤ 《政治大学学报》第 36 期，1977 年，第 149～197 页。哈堪楚伦：《“成吉思汗”非“大海汗”之论证——附帖卜·腾格里名称考释》，《政治大学边政研究所年报》第 11 期，1980 年，第 117～138 页。

⑥ 《政治大学边政研究所年报》第 19 期，1988 年，第 27～50 页。

⑦ 《政治大学民族社会学报》第 15 期，1977 年，第 139～146 页。

⑧ 萧启庆主编、许守泯协编：《蒙元的历史与文化》下册，第 833～863 页。



性，汉人遂以“回”字概括，自此回回人遂成为元代色目人集团的一个组成分子。胡其德《蒙古白话碑新探》[①] 考证竖碑年代、碑铭语法及碑文内显示的政教关系与宗教生活。

关于这个时期的语文研究，李学智《女真译语证误举隅》[②] 指出《女真译语》中的错误。在西夏语文研究方面，则有龚煌城《西夏韵书同音第九类声母的拟测》[③]、《西夏文字的结构》[④]、《西夏语中的汉语借词》[⑤]、《西夏文字衍生过程的重建》[⑥]、《西夏文的意符与声符及其衍生过程》[⑦]、《西夏语的紧元音及其起源》[⑧] 等文章。林英津也有《孙子兵法西夏译本中所见动词词头的语法功能》[⑨]、《西夏语具有空间意义的语词》[⑩] 两篇文章。蒙古文方面则有郑再发的《蒙古字韵跟八思巴字有关的韵书》[⑪] 考订《蒙古字韵》一书的音韵。

总的来说，本时期台湾的内陆欧亚史研究是相当丰硕的，在政治、社会文化、信仰礼俗等方面尤有突出的表现，这与姚从吾、札奇斯钦的推动有着密切的关联，然而台湾的部分学者因长期受到国史思维的影响，探究关注的焦点多在中国汉区的疆域上，也限制了研究领域的开拓。所幸近年来两岸学界的来往，大幅扩展研究的视域，特别是内陆欧亚区域内部的民族、习俗与相邻地域文化的接触，两者之间的比较与互动，已为此间学者研究的重心所在。

---

① 台北：“蒙藏委员会”，1998年，第1～42页。
② 《政治大学边政研究所年报》第7期，1976年，第119～146页。
③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2本第1分，1981年，第17～36页。
④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2本第1分，1981年，第79～100页。
⑤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2本第4分，1981年，第681～780页。
⑥ 《政治大学边政研究所年报》第15期，1984年，第63～80页。
⑦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6本第4分，1985年，第719～758页。
⑧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0本第2分，1999年，第531～558页。
⑨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8本第2分，1987年，第381～445页。
⑩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2本第4分，1993年，第677～716页。
⑪ 台北：台湾大学文学院，1965年。

六、公元 15 世纪以后

台湾对明代女真的探究，由于受到清史研究上溯性的影响，较着重满洲先世之建州地域及明朝的官府建置，学者李学智有其突出的贡献。至于建州女真与朝鲜的关联，学者庄吉发及王永一有深入的探究。对于影响满洲共同体的海西女真及后来的扈伦四部在研究上则较为薄弱。清代女真及满洲部落延续明代的研究，对于满洲、爱新觉罗的意义，学者各有不同的见解；另外族源、姓氏、民俗及民族关系上亦有不少学者着墨，本文因民族史的差异，取舍略有不同。

（一）东北亚地区

明代初期，女真部落因活动地区及社会演进的过程，而有建州女真、海西女真与野人女真的划分。李学智在这方面有以下几篇文章：其一《明代女真民族史之研究——明初女真民族之来源与分布》[①] 说明建州女真的来源及其分布地区；其二《女真（满洲）民族社会组织之研究（一）——元末明初女真民族重组后之社会结构》[②] 指出重组后的女真部族，其组织近于封建官僚制与部落酋长制的混合形态；其三《女真（满洲）民族社会组织之研究（二）——析论明代初期女真民族社会组织形态之演进与经过》[③] 指出明朝的物资赏赐促使女真民族形成“部族其表，官僚其实”的组织形态。其四《朝鲜史籍中之“移阑豆漫”与明代三万卫考》[④] 指出明廷设置的目的在于招抚鸭绿江以东的女真人，卫址应在朝鲜东北境外珲春河沿岸。其他相关的研究尚有庄吉发的《建州三卫的设

① 《政治大学边政研究所年报》第 15 期，1984 年，第 15～40 页。
② 《政治大学边政研究所年报》第 13 期，1982 年，第 23～42 页。
③ 《政治大学边政研究所年报》第 14 期，1983 年，第 93～122 页。
④ 《大陆杂志》第 12 卷第 8 期，1955 年，第 16～24 页。



置及其与朝鲜的关系》① 详考明初建州三卫设立的经过，并就三卫的迁徙说明女真与朝鲜的关系。刘超骅在《明初设置奴儿干都司考辨》② 指出奴儿干都司为招抚的羁縻组织与辽东都司不同，不宜列入明朝版图。

有关满族族系源流及清皇室姓氏问题的研究，素为台湾学者所重，另一方面，学界对满族汉化的议题亦抱有高度的兴趣。管东贵先生《满族入关前的文化发展对他们后来汉化的影响》③ 指出满族在文化发展的过程中，仅是消极地改变生活方式，并未主动掌握文化铸造力，迨移居汉地后，既与母体（东北）失联，复陷于汉族的文化圈与人口网中，满汉两族遂由文化的同化层次进到民族融合的阶段。陈捷先的《说"满洲"》④ 指出满洲一词源于"婆猪"部族。对此黄彰健的《满洲国国号考》⑤ 则认为满洲当从蔓遮而来，嗣后又音转成万朱。陈捷先的《清国姓爱新觉罗考》⑥ 指出清室原姓觉罗，后自高门第添以"金（爱新）"，而成"爱新觉罗"。李学智的《清朝姓氏考》⑦ 则有不同的见解，他认为"爱新觉罗"即女真语的"阿赤卜鲁"，汉义为圣。其另一篇《释满文之"珠申"与"阿哈"——从满文看满洲民族的原始文化》⑧ 指出清人将珠申释为满

---

① 《中韩关系史研讨会论文集》，1981 年，第 163～180 页。收入庄氏著：《清史论集》（五），第 1～29 页，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0 年。王永一撰：《建州女真的形成时期（1403－1467）》，政治大学民族研究所硕士论文，1997 年。

② 《东海大学学报》第 3 期，1979 年，第 23～31 页。蒋武雄：《明代经营奴儿干考》，《中国边政》第 69 期，1980 年，第 4～6 页。

③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40 本上册，1968 年，第 255～279 页。

④ 收入陈氏著：《满洲丛考》，台北：台湾大学文学院，1965 年，第 1～24 页。

⑤ 《明清史研究丛稿》，台北：商务印书馆，1977 年，第 532～551 页。

⑥ 收入陈氏著：《满洲丛考》，第 25～45 页。

⑦ 《大陆杂志》第 10 卷第 12 期，1955 年，第 18～26 页。

⑧ 《政治大学边政研究所年报》第 12 期，1981 年，第 1～34 页。

州奴仆反映出观念的转变。陈捷先《清初继嗣探微》① 从立嗣与争继中说明满族传统制度与汉制的冲突。

黄彰健的《论满文 nikan 这个字的含义》② 指出尼堪原指称蛮子、汉人、南朝及明，迨努尔哈赤叛明后，始专指蛮子与汉人。庄吉发的《从数目名字的演变看清代满族的汉化》③ 指出满族数目名字，由于雷同的字很多，原以汉字小写的数目，或改用汉字数目大写，或采用同音的汉字来代替，反映满族汉化的程度不同。另外在《萨满与跳神驱祟》④ 庄先生指出萨满借助图腾、祖先的神灵，驱除鬼祟。张华克的《海拉尔手抄本〈尼山萨蛮传〉与伦理关系之研究》⑤ 透过各版本《尼山萨蛮传》的对勘，反映满族社会思想与文化的变迁。邓琪瑛《鄂伦春人溯源》⑥ 说明鄂伦春人的起源、族属以及在女真文化体上的意义。

在满鲜关系及民族关系方面。陈捷先的《清太祖时期满洲与朝鲜关系考》⑦ 指出努尔哈赤虽以和顺的态度处理满鲜问题，然朝鲜囿于小天朝观念，以致双方未能和好交往。而在《略论天聪年间后金与朝鲜的关系》⑧ 指出双方在盟约、互市及逃人等议题的交涉。

---

① 收入陈氏著：《满洲丛考》，第 79～95 页。陈捷先：《清圣祖废储考原》，见陈氏著：《清史论集》，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 年，第 137～170 页。

② 《明清史研究丛稿》，第 588～593 页。

③ 收入庄氏著：《清史论集》（6），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0 年，第 41～70 页。

④ 收入庄氏著：《清史论集》(7)，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0 年，第 133～164 页。

⑤ 《中国边政》第 149 期，2000 年，第 10～17 页。

⑥ 《中国边政》第 151 期，2000 年，第 15～32 页。邓琪瑛：《鄂伦春考》，《中国边政》第 147 期，2000 年，第 4～9 页。

⑦ 收入陈氏著：《清史杂笔》第 6 册，台北：学海出版社，1985 年，第 1～40 页。

⑧ 收入陈氏著：《清史杂笔》第 6 册，第 41～77 页。



刘晓莹《清代科尔沁部与满洲关系之研究》① 指出科尔沁在军事、婚姻与新政等方面与清朝的接触过程。鄞秋华《清代索伦部之研究》② 指出“索伦”一词透过清廷所设立的牛录制与贡貂制由地域名称转变部族名称的过程，并探讨伊犁索伦营设立的原因、经过及阿古柏之乱时流落俄国的经过。

政治经济方面。陈文石的《清代满人政治参与》③ 指出满人经由制度的设计，保障参政的机会。另一篇《清代八旗汉军蒙古政治参与之研究》④ 说明八旗内部汉军及蒙古的政治参与活动。赖惠敏的《天潢贵胄——清皇族的阶层结构与经济生活》⑤ 指出王宫宗室的阶层等第足以影响其经济收入。赖惠敏、徐思泠《清代旗人妇女财产权之浅析》⑥ 讨论孀妇所具有官方核可的生活保障及其在分产、卖产与立嗣上的权利。

台湾的15世纪东北亚研究成果较集中于政治及民族关系，对于社会以及经济领域的探究较为欠缺。17世纪以后的满洲史研究在广禄与胡格金台的教导下，相继培养出陈捷先、李学智及庄吉发等学人，他们有个共同特征，即使用满洲语文从事清史的探究，一扫前人仅得使用汉文史料研究清史的缺憾。李学智及庄吉发先后在政大民族所系教授满文，影响所及，台湾的东北亚研究逐渐重视民族语文的使用，然较为不足的是偏重满文材料的发掘，尚未涉及其他相关语文的运用。

（二）蒙古地区

台湾的明代蒙古研究在两岸交流前，颇为单薄。近年来黄丽生

---

① 刘晓莹撰，政治大学民族研究所硕士论文，1995年。

② 鄞秋华撰，政治大学民族研究所硕士论文，1996年。

③ 收入陈氏著：《明清政治社会史论》，台北：学生书局，1991年，第651～754页。

④ 收入陈氏著：《明清政治社会史论》，第755～818页。

⑤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年。

⑥ 《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第4期，1996年，第3～34页。

关于俺答及蒙藏关系的撰著，弥补了这个时段的空白，但对于达延汗以前的研究，台湾学界仍有一段长路要走。

台湾的清代蒙古研究以札奇斯钦为主，札奇氏在姚从吾教授的鼓励下由政治转向学术研究，札奇氏的清代蒙古研究具有足够的海外影响力，但他的蒙古史研究并不仅限于清代。两位研究清代蒙古的学者是张兴唐和李毓澍。张氏早年供职于内蒙古，徙台后创办了“中国文化大学”民族与华侨研究所，专力于蒙古盟旗制[①]的研究。李毓澍先生长期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对近代蒙古史研究至深，同时亦在政大边政研究所兼课并指导研究生的论文写作。

明代蒙古的探讨方面。杨雪峰的《明律对蒙古色目人婚姻上的限制》[②]，指出明太祖的强迫同化政策。钟云校在《明初与北元关系之研究》[③] 讨论明朝与北元之间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的联系。黄丽生的《由军事征掠到城市贸易：内蒙古归绥地区的社会经济变迁(14世纪中至20世纪初)》[④] 指出蒙古人由掠夺至建城所带动的社会文化与经济面貌的变革。其另一专书《论〈阿勒坦汗传〉的撰史意识》[⑤] 指出蒙古人由政教并立的观念发展出政教相成的价值意识。张哲诚的《和硕特源流之推测》[⑥] 认为现今之和硕特蒙古人乃明代后期西奔青海的卜儿孩遗裔。

就蒙古社会的变迁探讨，札奇斯钦在这方面有以下几篇文章：《清季蒙古统治阶层的汉化》[⑦] 指出内蒙古地区的蒙古统治阶层的汉

---

① 见张氏著：《蒙古盟部旗制的意义和沿革》（订正节本），台北：“蒙藏委员会”，1979年。

② 《大陆杂志》第41卷第3期，1970年，第28～3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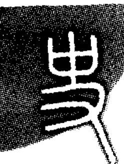
③ 钟云校撰，政治大学边政研究所硕士论文，1980年。

④ 台北：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1995年。

⑤ 台北：“蒙藏委员会”，1997年。

⑥ 《中国边政》第102期，1988年，第26～36页。

⑦ 《国际中国边疆学术会议论文集》，1985年，第517～546页。



化是在满洲政权统治下进行。《满洲统治下蒙古神权封建制度的建立》① 指出喇嘛在蒙古社会的出现及其身份确定的方式，并说明其行政权、封地的设定与朝觐和进贡等权利义务。《满清对蒙古宗教政策的商榷》② 指出清廷的着眼点在于使蒙古不能团结，同时又以加强其个别的向心力。其做法是制造俗权与教权的对立，建立御用宗教领袖，加强蒙古各寺院与北京的关系，减少西藏与蒙古间的政治联系。李毓澍先生《喇嘛教在外蒙的发展和地位》③ 说明蒙古族信仰藏传佛教的经过，并指出清朝在外蒙对藏传佛教的扶抑政策，篇末附哲布尊丹巴世系表。王聪义《蒙古盟旗制度之研究》④ 指出盟旗制度的成因和组织以及分布地域，并就政治、军事及社会经济等层面说明对蒙古社会的冲击。林正全《清季内蒙古垦务研究一东四盟》⑤ 说明清代东四盟放垦与设治的经过以及汉人移垦过程中，清代内蒙古移垦转变的原因、过程及其影响，并探讨清代治蒙政策及移垦政策。吴秀琼《清朝前期汉人在蒙古的经济活动〔清朝建立一清准战争结束（1636－1759)〕》⑥ 指出清代汉人在蒙古的农业、商业及资源开发等经济活动的兴起、发展过程及影响，以勾勒出汉人在蒙古的经济网，包括商业城镇、台站交通与农垦区的结合。张启雄先生《外蒙主权归属交涉 1911－1916》⑦ 讨论民国肇建后中蒙关于名分与利权的交涉，尤其是册封哲布尊丹巴时，中蒙对册封形式

① 收入札奇斯钦：《蒙古史论丛》下册，台北：学海出版社，1980 年，第 1003～1031 页。

② 原刊《政治大学边政研究所年报》第 5 期，1974 年，后收入札奇斯钦：《蒙古史论丛》下册，台北：学海出版社，1980 年，第 983～1001 页。

③ 收入李氏著：《外蒙政教制度考》，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8 年，第 255～444 页。

④ 王聪义撰，政治大学边政研究所硕士论文，1973 年。

⑤ 林正全撰，政治大学边政研究所硕士论文，1982 年。

⑥ 吴秀琼撰，政治大学民族研究所硕士论文，1993 年。

⑦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5 年。

及哲佛名号的坚持，侧面反应外蒙古统治阶层的汉化。黄丽生《从教案问题看西力对内蒙社会的冲击》[①] 指出西力的进入降低蒙汉人民对清政府的认同以及改变内蒙地域社会的风貌；另一篇《由世界经济体系观点看清末陶克陶胡案的历史性质》[②] 说明蒙古基层社会在世界体系的影响下，难有自主的窘况。

关于蒙古个别地域的探究，哈勘楚伦《翁吉剌部族之探讨》[③] 指出翁吉剌部与达斡尔的关系。彭嘉桢《清代热河地区之巡幸活动与区域发展关系之研究》[④] 指出热河地区政治活动的缘起和内容，及其对热河地区经济和制度的发展样貌的影响，并藉由案件的分析了解社会和经济、制度发展间的关系。李毓澍先生《准噶尔与俄国的外交关系》[⑤] 指出准噶尔的历代可汗借助俄国力量抗敌清朝的经过。何耀彰《满清治蒙政策之研究》[⑥] 缕述清朝对蒙古的防范手段——盟旗制度和隔离政策；推恩策略——封爵、宗教、互婚以及围班、年班等怀柔手段。吕能通《清代蒙古边防之研究》[⑦] 指出蒙古边防的成因、中央地方的官制以及清代蒙边的政策检讨。张哲诚《明末清初天山北路和硕特部势力之消长》[⑧] 说明和硕特人与准噶尔人势力消长的经过。其另一篇《青海和硕特对西藏的经营》[⑨] 指出青海和硕特政权的始末。隋皓昀在《青海和硕特发展史 1637－1724》[⑩] 探讨东迁后的和硕特部，其政治主体的分布与政治的结构，

---

① 《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 16 期，1988 年，第 107～154 页。

② 《蒙古民族与周边民族关系学术会议论文集》，第 417～459 页。

③ 《政治大学边政研究所年报》第 18 期，1987 年，第 45～62 页。

④ 彭嘉桢撰，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2000 年。

⑤ 收入李氏著：《蒙事论丛》，台北：里仁书局，1991 年，第 47～81 页。

⑥ 何耀彰：《满清治蒙政策之研究》，台北：台湾师范大学历史所，1978 年。

⑦ 吕能通撰，政治大学边政研究所硕士论文，1986 年。

⑧ 《中国边政》第 109 期，1990 年，第 10～18 页。

⑨ 《中国边政》第 112 期，1990 年，第 22～35 页。

⑩ 隋皓昀撰，政治大学民族研究所硕士论文，1996 年。



并说明其与清、准噶尔的关系。赖福顺的《去而复返的土尔扈特蒙古族》[①] 说明土尔扈特人东返的经过及清廷的处置。而札奇斯钦的《库伦城小史》[②] 说明库伦的位置、建立和命名及内部的城市规划。

台湾的蒙古史研究的成就，同台湾在制度上延续国民党政府在大陆时重视边疆政治的做法，如设置蒙藏委员会、成立边政系等很有关系。但相对于蒙元时期以前北亚的研究，台湾的明清两代的蒙古研究成果较少。而在两岸文化交流之前，台湾少有进行明清时期蒙古地区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吾人可认为台湾的清代蒙古研究基本延续了 20 世纪上半叶的研究重点，且研究地区以全蒙古和漠北蒙古居多，内蒙古地区的研究只占少数。

（三）新疆、中亚地区

这方面研究者也不多，大部分系考证之作。刘义棠在《读明史撒马儿罕传》[③] 认为撒马儿罕是突回语，义为肥沃之城镇。陈庆隆在《撒马儿罕语源考》[④] 一文持不同意见，指出撒马儿罕是粟特语。陈庆隆尚有以下两篇文章：《论白山党与黑山党》[⑤] 指出穆斯林圣裔和卓东来的年代、白黑两党划分的源起及本质。《和卓考释》[⑥] 一文则说明和卓乃波斯语，是指名流贵人的荣衔，然在回疆有教长头衔与政治地位等用法。郑咏立的《哈密政权研究（14 世纪中叶～17 世纪中叶）》[⑦] 探讨哈密政权的政治社会结构及周边势力的作用。其另

---

① 《华冈文科学报》第 19 期，1993 年，第 117～140 页。

② 原刊《政治大学边政研究所年报》第 4 期，1973 年，第 97～140 页。后收入札奇斯钦：《蒙古史论丛》下册，台北：学海出版社，1980 年。张永儒撰：《移动到定居："库伦"发展过程之研究：十七世纪到二十世纪的宗教、政治、经济变迁》，政治大学民族研究所硕士论文，1999 年。

③ 《大陆杂志》第 39 卷第 4 期，1969 年，第 27～28 页。

④ 《大陆杂志》第 39 卷第 4 期，1969 年，第 29～34 页。

⑤ 《政治大学边政研究所年报》第 2 期，1971 年，第 209～231 页。

⑥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40 本下册，1969 年，第 825～838 页。

⑦ 郑咏立撰，政治大学民族研究所硕士论文，1993 年。

一篇《“剌木”与“剌术”之考辨》[①] 指出剌木、剌术所指皆为拉布楚克（Lapchuk），但剌木为罗布，而剌术为小罗布。张哲诚《西伯利亚汗国史略》[②] 详述西伯利亚汗国兴亡始末。

此外刘义棠《东干族属之探讨》[③] 历论东干的族源，说明东干即汉回。唐屹先生“Two diplomatic documents from the Khokend Khanate to Ch'ing Empire in the mid-19th century”[④]透过现藏台北故宫两份察合台文献说明浩罕入侵喀什噶尔及清朝道光帝对此事件的反应。陈旺城《清代回疆张格尔和卓败亡因素探讨》[⑤] 就宗教、政治及军事等方面说明张格尔失败的原因。陈庆隆《清代天山南北的贸易》[⑥] 考述乾隆至同治年间回民在天山南北的贸易活动及清廷的管制措施。其另一篇《论回疆的商头》[⑦] 指出浩罕汗国派遣的贸易头子在天山南路商贸及政治活动的影响。林长宽的“Muslims in China prior to the Qing dynasty（1644－1911AD）－A Historical Survey”[⑧] 认为穆斯林在中国历史可谓由“蕃客在中国”至“中国之穆斯林”的演变过程。

语文研究方面，多描述民族语文的音值与音位，少见语法特质的探讨。李学智的《满文词汇词类转换法则的试探》[⑨] 指出满文词汇虽不多，但因法则转变的灵活，可随汉文适应文化的变迁。哈勘楚伦、胡格金台合著的《达呼尔方言与满蒙语之异同比较》[⑩]，讨论

① 《政治大学民族学报》第20期，1993年，第119～123页。
② 《中国边政》第88期，1984年，第44～47页。
③ 《政治大学边政研究所年报》第9期，1978年，第5～27页。
④ 《政治大学学报》第50期，1984年，第1～47页。
⑤ 《中国边政》第130期，1995年，第19～29页。
⑥ 《食货月刊》复刊第6卷第3期，1976年，第1～10页。
⑦ 《食货月刊》复刊第1卷第12期，1972年，第22～26页。
⑧ 《政治大学学报》第65期，1992年，第525～571页。
⑨ 《政治大学边政研究所年报》第9期，1978年，第81～100页。
⑩ 台北：学海出版社，1979年。



达呼尔方言的音位及词性，从一般蒙古语音的变异推论达呼尔方言的由来，同时比较达呼尔方言与满蒙语的异同。李静桂的 *Phonological constraints in Uighur*① 指出维吾尔的音位及语法。刘义棠的《维吾尔语文研究》② 则就语言形态学分析维语的词性。萧素英的《扎鲁特旗蒙古音韵》③ 探讨扎鲁特方言的音位及元音和谐等问题。廖淑馨的《蒙古科尔沁方言之研究》④ 透过科尔沁方言的音值与音位，归纳出其方言特性。

七、台湾内陆欧亚史研究的检讨与展望

台湾的内陆欧亚史研究目前面临几个困境：其一是学术传承中的人才断层问题。在台湾，近二十年来内陆欧亚史研究从未成为史学界的研究重点，而各大学的历史系也鲜少开设与内陆欧亚史相关的课程，学生无从接触，自然谈不上会有优秀人才投入其中。其次是语文训练的问题。这方面可分为两部分来说，一是外文训练，一是少数民族语文与西域古语人才的培育。台湾的历史系学生，会同时去修习两种以上第二外语的学生并不多见，⑤ 然而内陆欧亚史学界的同行知道，要做好内陆欧亚史的研究，日、德、法、俄等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是不能忽略的，这可能是令年轻学子却步的主要原因。另外台湾目前仅有政治大学民族系将少数民族语文列入学习课程，其他各大学开设这方面课程的并不多见，更遑论是西域古语的教授了。其三是投入研究者的出路问题，现今台湾的内陆欧亚史研究者大部分的学术专业其实都在中国史中的断代史，他们在大学中开设

---

① 《政治大学边政研究所年报》第 10 期，1979 年，第 197～323 页。

② 台北：正中书局，1968 年。

③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66 本第 1 分，1995 年，第 107～244 页。

④ 《政治大学边政研究所年报》第 3 期，1972 年，第 25～94 页。

⑤ 多年前曾有位精通多国语言的年轻学者许章真先生，似乎曾有意投入内亚史研究，可惜英年早逝，仅留下一本译著《西域与佛教文史论集》（台北：学生书局，1989 年），是台湾内亚史研究的一大憾事。

的课程也是以断代史为主，年轻学者若欲以内陆欧亚史为专业在大学谋职，恐怕各历史系几乎无法开出符合其研究领域的相关学程，就业市场的考量，或许也是年轻史学研究者不愿投入的原因之一。

不过虽然面临着上述的困境，台湾的内陆欧亚史研究，仍有发展的远景可期。一是近几年来台湾史学界已慢慢转趋重视内陆欧亚史在国史研究中的重要性；二是台湾目前仍有学者对内陆欧亚史研究持高度的兴趣，相信未来台湾还是会在内陆欧亚史的研究工作上持续进行，并将成果与其他断代史的研究者分享对话。